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莫文骅回忆录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前 言

二十世纪的中国，正处在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华优秀儿女前赴后继，浴血奋战，走过了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谱写了中国革命历史上最壮丽辉煌的篇章。我有幸从 1926 年投身革命，特别是 1929 年参加百色起义后，半个多世纪的戎马生涯，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一直没有离开过军队，可以说，是同这支人民军队一起战斗成长起来的一名老兵。

五十六载改山河，搏敌徒手又挥戈。
自惭沙场立功少，却嫌工作失误多。
壮志请缨曾苦练，暮年卸职更琢磨。
狼烟若起重召唤，拄杖无前战恶魔。

这首诗是我 1988 年 9 月卸任装甲兵政治委员时写的，表达了我卸职后的心情。“暮年卸职更琢磨”，琢磨什么呢？就是回顾过去，因为历史是不该忘却的。半个多世纪的峥嵘岁月，倏然而逝，其间多少风风雨雨的往事令我魂牵梦索，多少牺牲的革命领导和战友让我铭记在心。作为一个幸存者，把自己经历和知道的这些事情整理出来，使更多的人了解我党我军英勇斗争的历史，了解英烈们可歌可泣的业绩，这成为我的一桩心愿。于是，我在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和读书学习之余，陆续动手整理了一些回忆史料。多年来，我已先后撰写了《回忆红七军》、《英雄塔山》、《解放北平前后》、《百色风暴》、《二十年打个来回》等约 60 万字的回忆录。这些短篇记述了我参加革命斗争的一些片断或历史事件。

我离职休息后，接待了不少军内外的来访者，也有一些新闻、出版和党史、军史资料征集部门经常来约稿。我虽年事已高，但记忆尚可，手头也存有一些历史资料，所以，每次都尽可能地满足他们的要求，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亲历者的责任和义务。

也正是在接待来访中，不少同志建议我把过去发表的短篇和资料收集起来，把自己的经历作较系统的回忆和整理，留下较完整的史料。这个建议使我有了解回忆录的想法。我已八十有六，在有生之年能把这本回忆录整理出来，留下经验教训，这对于激励自己，教育家人，留给后代，应该说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回忆录的价值重要的在于真实，实事求是，因为它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对有关史料进行了细致的核查，如与我过去发表的文章在个别地方有差异之处，亦当以这本回忆录为准。

我这本回忆录的写作，得到了军委副主席张万年同志以及总参谋部、总参兵种部领导的关心支持，提供了许多方便。陈欣德同志用两年多时间帮我进行了文字整理工作，王扶犁、袁丹武同志对文稿又进行了改写和补充，最后由王扶犁同志负责统稿。冷博军同志参加了收集、研究材料，并作了大量具体工作。借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年代久远，加之个人经历和认识水平的局限，书中难免有疏漏甚至错误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莫文骅
一九九六年五月于北京

莫文骅回忆录

第一章风云时代

“ 闯世界 ”

澄碧如练的邕江，蜿蜒地由西向东流过南宁市南郊一座小村子。村子不远的东南边，耸立着碧嶂叠翠的青山和五秀岭。

1910年1月7日（宣统元年己酉12月17日），我降生在邕江畔上这个风景绮丽的村子——广西南宁市亭子村。

村里并没有一座亭台，为何叫做“亭子”呢？

传说宋朝仁宗年间，地处祖国边陲广南西路的广源州（宋属左江道）首领浓智高起兵反宋，宋王朝派大将狄青率三军南征讨伐，并从山东押解数千名百姓南迁，以开发南疆。这些被押解的百姓，长途跋涉，来到邕州南郊时，已是疲惫不堪，大家躺倒在地，再也无力爬起来。狄青见此情景，遂生怜悯之情，加之他也看上这块山青水秀的好地方，便下令“停止前进”。那些百姓，就在这块土地上落脚生根、生息繁衍。后来人们为感谢狄青的恩德，便给该地取名为“停止”，并在村里建一座狄武襄公祠，以志纪念。不知什么时候“停止”演变成了“亭子”。

村名来历已无从考证。但据史书记载，公元1052年，依智高举兵反宋，宋仁宗命枢密院副使狄青大将率3万大军南下征讨。狄青夺昆仑关，占邕州，依智高败走云南。当时，确有不少士兵落籍在邕州附近一带，我的先祖，便在其中。

据家存的《莫氏族谱》载，我莫氏太祖文允公，其原籍为山东青州府寿光县白马驿，于大宋皇祐五年（公元1053年），随狄青“调戍而来”，落居邕江对岸“平南村四团白沙之阳”，即今亭子村。从祖上传至我祖父，已有17代。

我的祖父莫予双，号惟一，先开办怡和商店，后习武，中武举，任守备职，诰授“武德骑尉”。但他不入公门，不理团务，仍在家继续经商。

我的父亲莫廷俊，号煦堂，身体魁梧，不愧武人之后。但他却喜诗文，其书房称为“垂柳读书堂”，藏有很多线装古书。他的古诗文造诣较深，能诗能字，常邀文友咏诗对句，遗有诗抄集传家。本来父亲想考秀才，因祖父过早去世，家庭负担重，使他放弃功名的追求，只捐了个贡生，接替祖父从事经商。辛亥革命期间，父亲参加反清斗争，后又参加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活动，曾被选为广西省参议员。但他看到社会政治风云变幻无常，“你方唱罢我登台”，故不热衷仕途，也不愿去巴结绅士名流。父亲老实本分，对人和气，能忍让，肯吃亏，他在《垂柳读书堂咏感》一诗中有“从来富贵非关命，视作浮云万念空”之叹。他76岁时，在自己的相片上题写了这样的诗句：“尔眉太浓，尔目太小，一生货财，过手辄了。惟学吃亏，忍气不少，差幸精神，老犹矫矫。”表露他一生谨慎求安的思想性格。

民国初年，军阀混战，杀来杀去，地方不宁。父亲对动荡的社会忧心忡忡，常告诫我们不要到社会上闯祸。为了我们兄弟几个不受人欺侮，我5岁那年，父亲还请了拳师教我们三兄弟学打拳，练刀棍，以备防身。

我小时候家境还不错，家里有点田地，父亲在城里开了一个卖布的“苏杭铺”。后来，家里人口多了，加之两个叔父都过早去世，生活的担子全落到父亲身上。当时家中有19口人吃饭，日子越过越难，慢慢衰落了。到1925年，父亲做生意破产，布铺卖掉了，后来田地也卖掉了。1943年，日军第二次侵占南宁前，82岁的父亲因家中无人照顾，衣食无着而饿死。

我母亲黄婉卿，壮族，贫苦出身，是一位善良、勤劳、有志气的农村妇

女。她出生在越南一个靠近广西的木马村，14岁时被人拐骗卖到我家。大娘死后，嫁给了父亲。在旧家庭中，母亲是买来的丫头，又当继室，自然没有地位。母亲先生了两个女孩，遭到家庭和族人的非议，很恼火，不知流了多少泪。以后她生了几个男孩，地位才逐渐提高。

母亲除了料理家务外，经常熬夜织布，还到离家好几里路的地方种菜换一点钱，来维持家中日趋衰落的困境。她很迷信，常受巫婆的剥削。母亲一共生了9个孩子，6男3女，大娘生了2男1女。我在男孩中排行第六。我7岁上村里的蒙馆，后到姓雷的一家私塾读书。当时，蒙馆属私塾的小班，是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地方，一般是由某家请来先生，招收附近的孩子来念书。开始学《三字经》、《五字经》、《千字文》，后学《幼学琼林》、《韵对屑玉》等。老师只读不解，学生死记硬背。父母对我的学习要求很严，尤其是母亲总盼孩子念好书，将来有点出息。放学回家，我有时贪玩，母亲经常手里拿着鞭子，坐在我的旁边，流着泪，看我读书写字，“望子成龙”。

那时已兴新学（办洋学堂），入私塾比较土气，上洋学堂吃得开。我的几个哥哥都没有上过洋学堂。当我读了4年私塾之后，母亲支持我上洋学堂，去外面读书，闯世界。可父亲并不打算送我进城上学，他觉得孩子能认识一些字，会写信就行了。父亲比较胆小守旧，总想把孩子拢在身边，生怕我们出去闯祸。为此，母亲与他吵得很厉害，她曾说，我生了五个男孩子（八弟夭折了），要出去闯世界，总要闯出一个来，干一番事业，就是去当兵，也不怕。母亲的话，给我印象颇深。在家境衰落的情况下，让孩子出去闯一闯，这是她对改变困境的唯一冀盼，也是她对社会家庭命运的抗争。

经过母亲多次力争，我14岁那年，母亲带着我到城里考上了南宁市模范高等小学，成了家里第一个上洋学堂的人。从此，我学名为莫万，字六琴。

学校离我家有七八里路，中间隔着一条邕江。每天天一亮便起床，急忙吃碗稀饭，拿上父亲事先给准备好的4个铜板去上学。往返摆渡过江用去两个铜板，剩下两个铜板，中午在街摊上吃碗米粉充饥。早起晚归，每天上学还是很辛苦的。我知道家里供我上学不容易，故读书不敢偷懒，成绩也不错。4年高小，算是扎扎实实地读了4年书。我对英语比较爱好和用功。后来，我住城里，晚上还参加校外的英文补习班。参加革命后，我也一直坚持学习英语，时常读一些英文书籍和英文报刊。我喜爱运动，比较活跃，短跑和跨栏常得第一名。对篮球也很喜欢，我被选为体育部长。

可能与父亲的影响有关，我还偏爱古文，对《古文观止》中的佳作名篇颇有兴趣，能把《岳阳楼记》、《陋室铭》、《醉翁亭记》等名篇背诵下来。

外出读书，使我增长了知识，开阔了眼界，也逐渐了解和认识了社会。

随着年龄增长，对家庭和社会上碰到的事情也开始有了思索，使我慢慢地懂得了一些“人情世故”了。其中有几件事情对我刺激很大，印象尤深。

记得我家的邻居有一户姓雷的寡妇，她家有些田地，靠雇一长工来种。雷寡妇有个16岁的女儿，长得很漂亮，我喊她七姐。雷家雇的长工是个壮丁，很能干活。可时间一长，这个长工和七姐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事情被发现后，可闯下了大祸！有一天晚上，姓雷的家族聚集了上百人，由族里的头人带领，把姑娘捉到母猪湾，硬逼七姐跳河自杀了！而她的母亲就在现场，含泪看着对女儿的“处罚”。第二天我们兄弟才知道这件事，非常气愤，我心里便萌生了社会黑暗，宗法吃人的朦胧意识。

那时父亲的一个胞妹家很穷，父亲为了帮助他们，让姑家的表哥到布店

来当伙计，以后又慢慢培养表哥管帐当师爷。后来，父亲为了让大哥文驹和表哥谋生自立，就分出一部分家产给他俩，每人一份股金，合开了一个“宏章”布店，生意还不错。可我大哥不争气，不到两年就把自己的股份花光了。这时表哥就一脚把他踢了出去，布店全归表哥占有了。由于家里的日子越来越难，父亲只好反过头来向表哥借钱，还要付利息，又过了几年，父亲做生意破产，把布店和房屋都转卖给表哥了。父亲贫困了，表哥也不管他了。有一年除夕，我们兄弟3人（五兄文骢，七弟文骐和我）随父亲在市里过年，晚上我们做好了饭菜等父亲回来，可等到7点多钟还不见回来，我们非常着急。这时，表哥气呼呼地来找我父亲。我们知道他是来讨债的，五兄非常生气，要打他，我说不打，以免引起别的事来。等了一阵他就走了。直到9点多钟父亲才回来，他脸色阴沉，问我们表哥是否来过，并说他在外面躲债到现在才回家。除夕之夜，万家灯火，远近的爆竹声响成一片，我们却相对无语，默默地饮闷酒、吃年夜饭。真是世态炎凉，人情如纸啊！在我幼小的心灵上打下了痛苦的印记。

每年雨季邕江涨水，英国军舰开到南宁，这些横行霸道的英国水兵，是我最早看到的外国人。外国兵舰随便侵入我国内河来示威，这些印象同刚接触到的“列强”、“帝国主义”等新名词一起装进了我脑海中。那时帝国主义的经济势力在南宁也很大，当地一斤麦才值几分钱，可进来的大麦片一罐竟值一块钱；一张牛皮几块钱，从香港进来的一个篮球要10多元。洋货侵入，土货破产。南宁不少人家织土布，我母亲也买了一架木制织布机，可家织土布比不上外来洋布，因而都蚀本破产。这使我初步意识到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苦难。

军阀混战，列强入侵，封建压迫，家道中落，生活艰辛，激起心中的愤愤不平，恨列强，恨军阀，要铲除世间不平之事，就是我在那个动荡年代萌发的最初想法。

痛打“猪仔”议员

南宁的学生富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当“五四”爱国运动的革命风暴席卷到南宁时，各校学生纷纷响应，大力声援北平学生的爱国正义斗争，立即成立南宁学生联合会，举行集会和游行，积极开展宣传和抵制日货等活动，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群众运动，迫使广西当局停进日货，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小学生经常上街去宣传、检查、反对日货。

随着“五四”运动的深入发展，“民主”和“科学”的新思想、新文化也不断传入南宁，在各校学生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激发我们进一步投入时代的斗争激流中去。

1923年10月，北洋军阀曹錕在北京召开国会议员大会，会上，公开使用贿赂手段，获选为大总统，引起了全国舆论的强烈抨击和谴责，民怨沸腾，既谴责曹錕的贿赂枉法，也臭骂议员们受贿的卑鄙行径，称议员们为“猪仔”议员。

10月9日，广东孙中山大元帅府下令讨伐曹錕，并通缉贿选议员，不少省的学生激于义愤，群起殴打其“猪仔”议员。此消息传到南宁，各校的师生员工摩拳擦掌，以拳头等候本省的“猪仔”议员回来。

不久，广西出席国会议员大会参加贿选的议员雷颖川（永淳县人，今属横县）、唐仁阶（宾阳县人）、詹××（武鸣县人）等3人悄悄回到南宁，下榻于仓西门大街邕南旅馆，他们还以为南宁群众不知其丑闻，还趾高气扬呢！

邕南旅馆离我校较近，学校师生接到旅馆附近群众的报信后，进步教师赵秉寿和邓哲（二人后来均是共产党员）带领四五十个同学，于当天上午10时左右，扛着旗帜，敲锣打鼓，浩浩荡荡直奔巨南旅馆。我是其中一员。省立第三师范等校的学生也闻讯列队前来参加，大家在旅馆门前，振臂高呼：“打倒猪仔议员！”“反对贿赂选举！”“打倒卖国贼曹錕！”街上的市民群众也前来围观，把旅馆围得水泄不通。

接着，赵老师和邓老师派人进入旅馆，寻找到“猪仔”议员的住房，勒令他们出来向群众请罪。这几个坏家伙，吓得抱头鼠窜，紧闭房门，不敢出来。这时，大家愤怒到极点，破门而入，从蚊帐里或床底下把他们拉出来。我拼命挤上去，举起拳头，揍了他们一顿。最后，他们只好叩头乞求饶命，表示向民众认罪。大家出了一股怒气，便胜利收队回校。

我汗流侠背回到家里（那时住在市内店中），已过午饭时间，父亲问我干什么去了？我如实告诉参加痛打“猪仔”议员经过。父亲老实怕事，听后叹了口气，说：“你现在年纪这么小就参加社会上的政治活动，将来长大不知道要闯出什么事来！”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政治活动，虽然有些莽闯，但教训了害国在法的坏蛋，心里感到很痛快。至于这些行动是否会给自己和家庭闯祸，我根本没有去考虑。我认为只要我们的行动是正义的，就是冒些风险，也要去干。事后，不少人赞扬我们这些小学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

加入“中学”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我未考中学，参加了以进步学生为核心的南宁学生军，共有200多人，进行军事训练，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抵制日货的斗争。开始，学生军得到广西军政当局的支持，派来教官。后来，旧军队插手学生军，想把我们这些热血青年编到正规部队去当学兵，我们纷纷退出学生军。

1926年春的一天，父亲上街回来说，出布告招中学生了，要我去考，这真是我的一个大转变。于是，我去应考，并考上了省立第一中学，分在第19班。杨赐璋、王文杖、区耀模、陈锡镇、杨载乾、吴文英、雷浩云和女生孙醒侬、洗静娴、韦佩珠、陈佩珩、雷建芳等与我是同班同学。我们建立了亲密的同学友谊，后来发展为革命友谊。

省立一中是当时南宁的最高学府，其前身为南宁中学堂。

当时，正值国共合作，大革命的洪流波澜壮阔。为了加强党对广西工农革命运动的领导，1925年冬，中共广东区委派中共党员陈勉恕到南宁开展建立党团组织活动，其公开身份是省立一中校长兼南宁《三民日报》编辑主任（1926年春，他因担任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广西省党部青年部长，故辞去省一中校长职务，由叶光接任）。接着，共青团广东区委先后派严敏、王克欧、谢蔚然等到南宁建立和发展共青团组织，还有中共党员周国杰（外语老师）、罗如川（理化老师）、夏意超（图画老师）和共青团员李省群（女）等先后被派到我校任教。他们都以省立一中为据点，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条件及合法身份，大力传播革命思想，宣传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宣传十月革命的胜利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号召我们积极投入反帝、反封建、反国家主义派、反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他们经常向我们青年学生介绍革命书刊，如《向导》、《少年先锋》、《新青年》、《中国青年》、《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唯物主义浅说》、《洪水》、《莽原》及鲁迅的《呐喊》、《彷徨》等。随着各种反映社会问题的进步书刊的传入，南宁青年学生的进步思潮活跃起来，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的进步刊物也像雨后春笋般涌现，如由中共党员担任编辑的半月刊《革命之花》（后改为周刊）；南宁学联会出版的《南宁学生》、《血钟》；省一中学生会出版的《赤焰》和《晨钟》；省立第三师范学生会出版的《三师周刊》和《火把》等。这些刊物都很受广大同学的欢迎。我进入一中后开始阅读革命书刊和马列主义理论著作，它点燃了我心灵希望之光，令我激发、奋进。

在党的领导下，南宁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工会、学联会、妇女会、工人纠察队等革命组织纷纷建立起来。为了深入开展声援上海和省港工人的斗争。1926年5月间，南宁举行纪念“五卅”周年活动。5月30日，南宁各界举行纪念大会和示威游行。还有抵制日货、声援北伐、反对祭孔等斗争。这些活动和斗争，我们省立一中、省立三师、广西军校、广西农民运动讲习所等单位的青年学生或学员，都积极参加，我是其中一个活跃分子。

我开始参加街上的宣传演讲时，胆子较小，后来讲多了，胆子也就大起来了，群众越多，我上去演说的声音也越大。

有一次，我校学生会发起全市学生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宗教进行侵略的活动，我们在学生会主席何福谦的带领下，列队到南门附近的天主教、基督教、浸信会等帝国主义势力设立的教堂门前进行宣传演讲，揭露帝国主义

侵华罪行，并高呼口号。我把嗓子都喊哑了。天主教神父对学生的正义行动很害怕，躲在角落里偷偷拍了照，交广西省政府当局，要求惩办“肇事”青年。这更引起我们青年学生的愤慨和仇恨，掀起声势浩大的反帝群众运动，把反帝宣传与抵制日货活动结合起来。

另一次，我和检查日货小组，在何福谦带领下，到洋关码头检查出入船只和商埠仓库，发现先施公司和孔德记商店的仓库进有日货，便把这些日货没收了，并发动各校学生和工人群众把它运到体育场，堆成一起，淋上油，放火烧毁。观看的群众无不拍手称快！不久，我被选为学校学生会工人委员，主要是负责对工人群众的宣传、发动工作。因当时我们对走与工农结合道路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故仍把主要精力放在学生运动方面。

南宁的共青团组织，首先是从一中建立起来的。

1926年夏，省立一中一批经过大革命洪流锻炼的先进青年，首批加入共青团。在一中成立南宁第一个团支部，开始由何福谦任支书，不久，由梁砥接任。梁砥是隆安县人，比我早一年考入一中。他思想活跃，工作能力强，被选为学校学生会总务长（主席）和南宁市学生联合会副会长。他加入共青团（后又转入共产党）后，见我平时积极参加各项政治活动，便主动接近我，经常找我谈心，对我进行教育、培养。

1926年12月的一天，我大胆地向他提出加入CY（共青团）组织的申请。这时，他严肃地与我谈了三个问题：

第一、每个加入CY的人，要坚信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这才与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名字相符合。

我听后联想到旧社会的黑暗，人民生活的艰难，家庭的衰落，父亲的逃债，邻家雷七姐的惨死，以及帝国主义军舰在邕江的耀武扬威，便毫不犹豫地回答：“我已认定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最美好、最理想的社会，我决心为这个崇高理想奋斗到底，直到牺牲自己的一切！”那时，我认为入团就是于革命，干革命就要有为实现理想敢于自我牺牲的精神，准备掉脑袋，并以此为荣。

第二、个人要服从组织，无条件服从组织的决定和纪律，严守组织的秘密。那时每个团员面临最实际的问题是：若组织需要调动团员离开学校，离开家庭，到某个艰苦的地方开展革命工作，参加社会复杂的阶级斗争，你是否甘心情愿毅然前往，还是退缩不前，若只考虑个人的享受和利益，不服从组织分配，那就不符合团员条件。

梁砥边说边用严峻的目光看着我。对此问题，我也坚决表示说：“我一切听从组织的调遣，组织让我到哪里，我就往哪里，组织要我去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第三、要艰苦奋斗，吃苦在先。因团组织的经费很困难，如被派外出工作，每月最多只能发给20元（广西小毫）钱的生活费，生活是很艰苦的，有时还没有生活费供给，甚至要从家里拿部分支持组织，若贪图享受，讲究生活待遇，那也就不够团员的资格了。梁砥一说完，我便毅然回答：“我从乡村来，什么苦都能吃，请组织放心！”

梁砥听了我对以上这三个问题的回答，都满意地点着头，表示接受我的申请，并担任我的入团介绍人。那时，共青团和党组织一样，都是秘密的，对团员要求是比较严格的。

过了几天，梁砥拿来一份入团申请表给我，我填完后，便带我到北门街

马武烈祠后楼，共青团南宁地委的秘密机关，团地委代理书记王克欧同我谈话。

经团地委批准，12月下旬我便正式加入了“中学”（当时称共青团为“中学”，称共产党为“大学”）。与我同时入团的有王文斌、区耀模等。这时，全校的团员已有七八个人。

我入团后，更积极地参加革命活动。我们几位团员经常到洋关东面的商埠公园的湖上，边划船边汇报、研究工作；有时到金狮巷同仁堂陈锡镇同学家里的后楼上秘密开会。中共党员罗如川老师曾召集我们到他家里或仓西门外一小酒楼上边吃宵夜边布置工作。当时，南宁党、团组织领导的每项重大政治活动，我校团支部都事先开碰头会作了研究和部署，然后通过团员去发动校内同学，并与各校进行广泛的联系。我校团支部已成为当时南宁革命斗争的一个主要阵地和坚强堡垒。

为了团结广大同学参加革命斗争，1926年底，在南宁团地委的领导下，成立了广西革命青年联合会，作为共青团的外围组织。由何福谦担任会长。我和其他团员加入这一组织后，一方面积极动员本校同学参加（我班有一半人参加），另一方面从里面培养积极分子入团。至1927年初，全校团员已达10多人：何福谦、梁砥、田云青、陈锡镇、区耀模、莫万（莫文骅）、王文斌、雷浩云、潘海帆，还有女团员孙醒依、洗静娴、韦佩珠、雷建芳等。南宁市的团组织也逐渐发展壮大起来，共建立了8个团支部，团员达70多人。有的团员后被吸收入党，后来有近10名团员参加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

可以说，省立一中是我走上革命征途的起点。

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推动和广州国民政府的帮助下，广西已于1926年1月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但随着工农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的日益高涨，以黄绍竑为首的广西国民党右派集团，对工农运动既害怕又仇视，千方百计进行造谣、破坏、镇压。

他们派桂军“进剿”韦拔群领导的东兰农民自卫军，杀害农运骨干和群众700多人，制造了震动省内外的“东兰农民惨案”和“梧州三工人血案”。面对这一股逆流，南宁的党团组织决定给予坚决反击，于是，发动广大群众，掀起了一场反击国民党右派的激烈斗争。

为抨击国民党右派散布的种种反动谬论，深入宣传马列主义、中共的政治主张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我们一方面通过进步报刊大造革命舆论，如1927年2月出版的《革命之花》第14号上，便为“列宁”专号，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列主义思想；另一方面，我们组织宣传队，在街头、工厂和附近农村宣传；同时，我们还以各校为阵地，开展大辩论，对右派观点进行辩论和批驳。有一天，公开反对孙中山三大政策、咒骂工农运动的国民党右派分子黄华表（曾留学美国，国民党省党部宣传部长）到省一中作反动演讲，我们便贴出“打倒国家主义派黄华表”，“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等标语给予抵制、反击。

为声援东兰农民和梧州工人的正义斗争，反击右派对工农运动的诬蔑，南宁各界先后举行了援助东兰农友群众大会和声讨梧州军警杀害工人群众大会，会后均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这些活动，我们团组织和青年学生都积极参加。因这时南宁的党员尚不多，故团员都站在斗争第一线，起突击作用。经过全省广大工农群众的积极声援斗争，最终迫使广西当局答应惩办镇压农运、工运的刽子手，抚恤死难家属。

右派的嚣张气焰虽受到严重打击，但他们并不甘心失败，伺机进行反扑。

1927年3月29日，南宁各界近万群众在体育广场举行纪念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大会，我们省立一中、省立三师、广西农民运动讲习所、广西军校和南宁工人纠察队及工人群众等都前往参加。会前，我们作了准备，若右派镇压到会群众，工人纠察队和军校、农讲所学员便以武力反击。大会在紧张气氛中结束。因右派看到我们事先做好准备，故没敢在会场发难。

会后，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我们一中的队伍走在前面。大家高举红旗，唱着《国际歌》和《打倒军阀歌》，高呼口号，昂首阔步地向市区前进。“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打倒黄华表”等口号，像春雷响彻邕城上空。青年学生这种豪情满怀的革命气概，吸引了无数市民，有的青年甚至挤进队伍参加游行和喊口号。

当看见我们200多人的队伍，高呼着革命口号经过广西课吏馆门口时，黄华表唆使几十个气势汹汹的人冲出来，有的手持利刀长矛，有的挥舞着“土的枪”，挡住我校队伍的去路，并破口大骂。顿时激怒了我们。我们虽然个子比他们小，手无寸铁，但毫不示弱。开始是对骂，后发展到对打。我们以旗杆为武器，抵挡其利刀长矛，因他们站在地势较高的门口，我们在马路下，加上他们年纪和个子比我们大，故我们处在不利地位。有的同学被刺伤，鲜血直流，有的女同学裙子被扯破。我们没有退缩，坚决与他们搏斗。

这时，农民运动讲习所100名学员闻讯带着武器赶来支援，课吏馆的人见势头不对，立即溜回馆里，关起大门不敢出来。大家愤慨地在其门口再高呼一阵口号后，便整理队伍返回。队伍走到文庙旁边演讲厅暂停下来，召开临时大会。会上，何福谦、田云青作了慷慨激昂的演讲，揭露国民党右派的无耻行径，号召大家与他们斗争到底。大家也纷纷发言，声讨黄华表镇压学生运动的罪行。最后，作了如下决定：向全省发出通电，要求全省学生和革命团体给予声援。

我们回到学校时已是中午1时许，这时，我才感到饥饿和疲劳。因喊口号多，喉咙也沙哑了。

当晚，广西当局连夜发快邮代电到全省各地，诬蔑我校学生是“流氓”，“捣毁”了他们称为“清修之地”的课吏馆。接着，他们又恶人先告状，向南宁地方法庭起诉，诬告我校学生会领导人。我们一中学生会也于第二天向全省各地发出通电并向法院控告课吏馆打伤我校学生的罪行，要求惩办打人凶手。当时，社会舆论和各界人士站在我们一边。南宁律师工会负责人姚啸海支持我们起诉，并准备出庭给我校学生辩护，但法庭既不传讯被告，也不批复原告，而是将双方的诉状搁置起来，不了了之。

后来，我写了《斗狗》一诗，记述当时反击右派斗争的一幕：

日映巨龙穿人群，众呼挥手震霄云。
革命浪潮击右派，惊急走狗吠猎猎。
狂扑棍棒冲行列，男被刺伤女破裙。
奋起斗搏敌夹尾，继续前进抹伤痕。

打这以后，学校组织了学生军约50人，由梁砥任队长，我任排长，每人出钱5元，制军服，进行训练，负责会场维持秩序等工作。

“愿为直士抗横流”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公开叛变革命。

以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集团，也以南宁为重点，开始在广西大举“清党”反共。一时，法西斯白色恐怖，笼罩邕城。

4月13日凌晨，大批荷枪实弹的反动军警包围了省立一中、省立三师、广西军校、广西农讲所、市总工会、《革命之花》编辑部、南宁市印刷厂等单位，逮捕了罗如川、何福谦、梁砥、梁六度、陈立亚、雷天壮、雷沛涛、周国杰、高孤雁、李爱民、岑伯英等90多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有10多人被通缉。这是南宁有史以来的一次最大规模的逮捕“政治犯”，是最黑暗的一天。我校团组织几位领导人都被捕了，我们听到此消息后，心里很着急，又得不到组织的指示，不知怎么办。

同月中旬的一天上午，我校未被捕的共青团员区耀模、王文栻、雷浩云、陈锡镇，还有进步青年杨赐璋等，来到亭子村我家碰头，大家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和我们的处境，感到白色恐怖下，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开展工作就更加困难了。有的主张暂到乡下躲避一下；有的主张不能示弱，若一离开学校，反而暴露自己。最后商定：第一、坚持斗争，设法找到党团组织，听取指示；第二、继续回校上学，装成坦然的样子，保护自己，不露马脚；第三、尽力稳住同学情绪，抓住有利时机，揭露反动派逮捕无辜学生的罪行；第四、若被捕，严守秘密，永不叛变。

大家商议后，又继续上学。

“五四”青年节临近了，南宁空气又突然紧张起来，到处是流言蜚语，说什么“共产党要暴动了”！这是敌人进行新的“清党”反共行动的借口和信号！我母亲听到了风声，很是担心。

5月3日下午，我们刚放学，母亲急急忙忙赶到学校，她小声对我说：“外面传闻又要抓人了，你过去在学校出头露面多，赶快跟我回家躲一躲！”我答应了母亲在校吃过晚饭就回去。

吃饭后，我正要离校回家，走到校门口遇到几位同学邀我去打篮球，便去玩了一阵。打完球，很疲倦，看天色已黑，便没有回去。

5月4日凌晨，天色黑魆魆。我和同学们正在酣睡中，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原来是反动军警持枪闯进学校，按照名单抓人了！

我被押到校门口传达室，看到同时被捕的有：训育主任卢宝贤（28岁）、共青团员区耀模（18岁）、王文栻（17岁）、进步青年杨赐璋（15岁）。我们5个人被五花大绑，押解出校门，沿着凸凹不平的街道，穿过仓西门大街，来到设在东辕门镇台衙门内的国民党15军军部拘留所。

阴森森的15军军部拘留所，共有3间牢房，呈品字形。我们被押进拘留所时，见那里也刚押来十几个青年。相互见面后，都以惊奇的态度问长问短。虽然素不相识，但共同处境使我们变得十分亲热。经了解，原来他们也是同天凌晨被抓来的。大部分是广西军校的学员，其姓名是李仁及（中共党员，23岁）、张铮（中共党员，18岁）、周飞宇（中共党员，26岁）、甘湛泽（中共党员，22岁）、陈可福（陈叔度，23岁）、陈可禄（陈可夫，21岁）、黄德普（中共党员，23岁）、黄道生（25岁）等。还有一部分是省立三师的学生，其姓名是韦兆安（共青团员，19岁）、吴升鹏（共青团员，20岁）、吴有良（吴西，进步学生，24岁）。

我们省一中5个人便被投进一间五尺见方的牢房。隔壁是关省三师的3

位同志，对面一间是关军官学校的 8 位同志。

同月下旬，拘留所又押进一个 30 多岁的人，名叫李炽南，曾任邕宁县长，是国民党左派，因拥护国共合作，不满国民党右派的反动言行而被捕，被关到我们房子里。我们被捕后，敌人大肆造谣说我们被苏联卢布收买，勾结土匪，图谋叛变。父亲听后气愤地说：“我家亚万平时读书的钱，一分一文都经过我手给的，他怎样用我都知道，他年纪这么小，怎么能勾结土匪？怎么会拿人家的卢布花？他连卢布是啥样子都不知道呢！”这里，充分表达了父亲对儿子的信任和对谣言的驳斥。入狱后不久，四兄文骧送物品给我。四嫂雷月娥，把她陪嫁的金戒子也卖了，买东西给我。卢宝贤是一中训育主任，因为支持学生运动，被扣上共产党的红帽子而被捕的。他和李炽南虽不是共产党员，但为人正直，有学问，尤其精通英语，在狱中每天仍坚持学英语，充满乐观主义精神。他们经常勉励我们说：“你们还年轻，要利用时间，好好学习，出去更好地为革命工作。”在他们的勉励下，我们几个年轻人也以牢房为课堂，请他俩当教员，每天安排一段时间学英语。他们认真教，我们坚持学习。

在阴暗、肮脏的囚牢里，每天早上 6 时起床，接着放风。因一天只有一次放风，故大家都抓紧时间洗脸、上厕所。接着，便站着吃早饭，饭后又立即被关起来。午饭、晚饭也如此，晚上 8 时熄灯，整天见不到太阳。

牢中的伙食卫生条件很恶劣，吃的是残羹剩饭，既冷又脏，常见到有死苍蝇，令人作呕。蚊虫叮咬，夜不安眠，难友们的身体一天天消瘦下去。暑天到来了，牢房里像蒸笼一样闷热。恰南宁流行霍乱，牢房如此不卫生，难友们的生命受到严重威胁。在军校难友的倡议和秘密发动下，牢房举行了一次绝食斗争，当狱卒送饭时，大家便围着苍蝇乱飞的饭菜，七嘴八舌地骂道：

“这是猪狗食，人能吃吗？”

“政治犯该杀就杀，为何这样折磨人？”

“监狱要讲人道主义！”“监狱要讲卫生！”

大家敲着碗筷，叮当乱响，边敲边骂。由于大家团结一致，他们不得不改善伙食卫生条件，绝食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

8 月初的一个早晨，牢房里新增加了一男一女，男的二十五六岁，女的二十二三岁，是一对夫妻，斯斯文文的。原来，这一对夫妇，男的叫罗少彦，中共南宁地委书记，其公开身份是广西省政府机关刊物《革命之花》编辑。女的叫陈玉梅，《革命之花》杂志职员，共青团员。他们因为叛徒告密而同时被捕，关在我们中间的一个小房子里。由于罗少彦是南宁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敌人对他多次审问，严刑拷打，软硬兼施，千方百计地想从他嘴里捞到“大油水”，但都动摇不了罗少彦坚贞不屈的意志。

由于罗少彦宁死不屈，严守党的秘密，故敌人始终没有弄到南宁党组织的情况。正因为这样，狱中的党、团员由于没有被敌人发现而得到释放或判刑后释放，我就是其中之一。

同年 9 月 1 日，敌人开始下毒手了。那天下午，南宁上空阴云沉沉，城郊北门外刑场响起一阵枪声，有 13 位无辜青年，未经过法律的审判程序，便被敌人杀害了！他们的名字是：罗如川（中共党员，省立一中教员）、雷沛涛（中共党员，省党部监察委员）、张胆（中共党员，省党部农民部秘书兼省农讲所教授）、莫大（中共党员，省农讲所教员）、邓哲（中共党员，南宁市党部常委兼组织部长）、梁砥（中共党员，南宁学生联合会主席）、冯

荫西（中共党员，南宁市党部常委兼组织部长）、高孤雁（进步青年，《革命之花》编辑部成员）、梁六度（国民党左派，省党部执行委员）、雷天壮（国民党左派，省党部秘书长）、陈立亚（国民党左派，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商民部长）、梁西园（国民党左派，南宁店员工会执委）、周仲武（国民党左派，省党部监察委员）。他们都是第一次被捕而同时被关押在 15 军军部监狱里。就义前，大家非常英勇、坚强，神态自若，视死如归，沿途和在刑场上高唱《国际歌》，高呼“打倒国民党”、“打倒军阀”、“共产党万岁”等口号，有的喉咙被敌人用布塞住，有的嘴巴被打得鲜血直流，但仍拼出全身力气，高呼口号不止，充分表现革命者大义凛然的崇高气节。

1980 年，为悼念这 13 位烈士，我向南宁市政府建议建碑纪念（此碑已耸立在南宁人民公园内），并写了《悼十三烈士》一诗：

触目惊心作楚囚，惨如地狱逼人愁。
敢抗横流称直士，要翻逆势作耕牛。
对月吟哦诗泣血，号天反害布塞喉！
烈士刑场歌慷慨，同侪脱险灭敌仇。

桂子飘香的中秋节到来了，皓月当空，银光洒进铁窗。

一群身陷囹圄的革命者，手扶窗栏，望着溶溶月光，有的回忆过去峥嵘的斗争岁月；有的吟起古人描绘明月的诗句。我也怀着月圆家不圆的心情，参加吟诵，真是百感丛生！既想念家中父老，也非常想念外边坚持斗争的战友，不知他们在做什么？处境是否安全？上级组织有什么指示？拘留所就像一个封闭的大铁桶，外边的消息一点也不知道，真是憋死人！

这时，狱中军官学校的难友，提议举行中秋吟诗联对比赛，看谁对得好，这一提议得到大家的赞同。

“聊与今人谈古月”。李炽南脱口而出，吟了一联，既洽贴，又突出主题。

大家便以此为上联，纷纷思考联对、唱和。

“就听新鬼泣旧坟！”这是共产党员、军校学员周飞宇吟的下联，以表示对 9 月 1 日国民党反动派屠杀 13 位烈士的愤感之情。“愿为直士抗横流！”这是同牢的卢宝贤老师吟的下联，表达一个革命者不畏强暴，敢于斗争，敢于抗拒反革命“横流”的豪迈气概！

最后，大家进行评议，认为卢宝贤的下联，不仅思想内容好，意义深刻，而且对得工整、和谐，是他的耿直性格的体现。大家称赞、议论一番，一致评此下联为冠军。

夜深了，大家久久不能入眠。卢宝贤的佳句在难友们心里回荡。

大约又过了一个月，拘留所的气氛又紧张起来。

10 月 7 日下午，突然，一队全副武装的警兵提前来换班，脸上露出凶狠而紧张的神色。

见此状况，我们知道敌人又要下毒手了。下午 4 时，一个杀气腾腾的卫士队长，带着十几个荷枪实弹的警兵窜进拘留所，他们手上还拿着捆人的绳子。他们首先打开我们牢房对面军官学校难友住的牢门，点名提人。

我们从门缝看去，见李仁及、周飞宇、张铮 3 人已被反手捆绑起来。

突然，我们的牢门也被打开了。

“卢宝贤！”卫士队长像鬼判官点人去见阎罗王一样叫喊着。

卢宝贤知道自己当烈士的时刻到了，他立即取下挂在墙壁上那件翻领的淡绿色薄绒西服，习惯地掸去衣服上的灰尘，穿着好后，理了理微微有些杂乱的头发，便逐一同我们握手告别说：“再见！以后的事由你们去完成了！”他从容地步出牢门。

这时，军校难友、共产党员周飞宇来到我们牢房门口，向其好友王文枳告别。因周的手已被反绑，无法与王文枳握手，他提议说：“我们来一个俄国礼吧！”

王文枳明白他的意思，便趁房门未锁，冲出门与周抱头吻别，情景极为悲壮！

据了解，这批遇害的革命者是：李仁及（中共党员，南宁军校学员）、张铮（中共党员，南宁军校学员）、周飞宇（中共党员，南宁军校学员）、秦霭云（进步青年，南宁军校学员）、何福谦（中共党员，省立一中学生会主席，广西革命青年会会长）、周国杰（中共党员，省立一中教员）、卢宝贤（进步人士，省立一中训育主任）、邓匡（共青团员，省农讲所学员）、阮锦（共青团员，南宁印刷工会干部）、刘汉武（共青团员，南宁印刷工会干部）、林汉泉（南宁印刷工会干部）、归醒南（国民党左派，越南归侨工人）、莫品佳（进步工人，南宁印刷工会执行委员），还有两名工人（姓名不详），共15人。

在刑场上，法官为“验明正身”，问到烈士的年龄时，归醒南和周飞宇等烈士回答道：“老子两百岁！”“老子万万岁！”弄得敌人出布告时，写不上烈士的年龄。

眼看一批批难友无辜被杀害，我们心里燃起万丈怒火。当天开晚饭时，难友见面都默不作声，心里像铅一样沉重。

第二天，我母亲听到南宁第二次杀人的消息，又听说杀人布告中有一个姓莫的，她的心情非常紧张，泪流满面，全家人也都落了泪。母亲先找附近淡村的巫婆问卜，然后带着我一套较新的衣服，自己一个人赶到刑场，准备给我收尸。到了刑场，烈士的尸体尚未收殓，但个个血污满脸，很难辨认。母亲既急于找到我的尸体，又怕真的见到我的尸体。她细心地挨个查看后，才透出一口大气，回家了。

10月下旬，我们在拘留所剩下的难友，被转押到军部监狱里。这座阴森的监狱，高10多米，宽10多米，长30米左右，四周是高高的围墙，从大门到各牢房，层层加锁，戒备比拘留所森严。里面没有厕所，难友们的大小便和吃饭都在室内，这比拘留所更肮脏。

一进狱门，一股腥臭气味扑来，令人作呕。里面暗无天日，屋顶只有一个小洞。站了一会，才看清里面的东西。中间是一个大厅，铺着一张大木床，可以睡30至40人；两边像笼子一样，用木桩隔着，分成许多小间。我们一中和省立三师的难友，被安排散住在大厅两旁的小间笼子里。狱内还关有其他犯人，其中有几个女犯，她们蓬头垢面，衣服破烂、发臭。有的蜷缩坐着；有的在地铺上滚来滚去；有的在大小便。我受到这股腥臭气味的强烈刺激，恶心头昏，开晚饭时，一粒饭也咽不下去。晚上，躺在地铺上，昏昏沉沉好象患了一场病。

奇怪的是，次日晨醒来，却闻不到了臭味，原来我们的鼻腔麻痹，嗅觉失灵了，久而不闻其臭。后来当我们吃饭时，别人在旁边大小便，也照样吃。

由于没有晒太阳，地下潮湿，又没有放风，狱中所有的人都生了疥疮，全身长出小脓包，一个疥疮一包脓。不管是小脓包或是湿疥，都很痒，越痒越抓，抓得伤口出血。狱中供水，每天一次，每人只分到半盆，早上洗过脸的水，要留到下午、晚间再用。

吃的仍是残羹剩饭，一般要到中午才开早饭。

肮脏、饥饿，使同志们受尽了折磨。难友们患病，敌人是不管的，也不准从外边请医生看病，就是要让这些难友被疾病折磨而死。共青团员区耀模因患了传染病，未得到及时治疗，至奄奄一息时，才同意家属保出狱治疗，一出狱就离开了人世。不久，敌人组织一个特别法庭，处理狱中政治犯。我想，我们第二批被捕的难友，除罗少彦夫妇外，都是参加公开活动而被捕的，敌人抓不到什么证据。

大约是12月中旬，狱吏通知我到军事特别法庭候审。临近春节时，拘留所允许家人探监了。我母亲闻讯，便带着弟弟文骐拿着食物来看我。我们隔着栏杆，相距一米多远，总算母子、兄弟见面了。母亲见我的身体瘦弱，脸色苍白，涕泪交流，非常难过。我反复安慰她，并询问家里情况，她都一一回答。并多次问我还要什么东西，我便随口说道：

“快到春节了，拿一点粽子来吧！”

“粽子是用绳子捆的，不能再让你吃这种东西了！”母亲解释说。

我听后笑了，说：“粽子的绳终究要解下来，它捆不死人的！”

又过了几天，我才被押到法庭“审讯”。只见那里坐着3个戴方帽，穿黑长袍的审判官，似阎罗王一样，旁边还坐着一个记录员，坐在中间那个审判官问我的姓名、籍贯、年龄、读书学校等问题后，问：

“你是共青团员吗？”

“我不知道！”我装着很天真，毫无惧色。

“你在一中为什么不好好读书，调皮捣蛋？”那法官又问。

“没有这回事，我的操行甲等，不信，你们看看我的成绩单！”我反驳后，便把事前家人送来给我的成绩单递给法官。

法官看后，不再问我，叫警兵押我回拘留所。同房难友认为法官问我的问题较简单，估计他们没有掌握什么证据。几天后，我又被押到法庭“审讯”。开始，仍由那个坐在中间的法官问我的姓名、籍贯、年龄、读书学校等问题。接着，他有气无力地宣布我“无罪释放”，并说：“回去要好好读书，不要再参加闹事！”

1928年2月初我被“无罪释放”。

后据了解，当时南宁“政治犯”获释的有20多人，被判刑的有46人。到1929年夏，俞作柏、李明瑞主政广西时，通过中共的统战工作，他们才获释放。

出狱后，我在家养病，恢复身体。10个月的非人生活使我的健康受到摧残，可我感到铁窗又可磨练人的意志，在生死面前考验着革命者的忠诚和坚贞，我觉得自己更成熟了。

夜深了，我听到屋外的阵阵蛙声，写下了《蛙鼓》一诗：

黑沉沉的长夜，
阵阵急鼓蛙声，
催着被压迫的人们，

起来哟！

为何还酣睡未醒？

到了6月，我的身体健康状况有所恢复，父亲筹措了几十元旅费和学费，我便到广州廉伯中学夏令班补习高中课程，准备报考大学。出发前，大哥文驹、三哥文骥给我改名为“文骅”。后因旧病复发，家里又没钱接济，遂又返邕养病。回到家里，一边养病，一边复习功课。我设法找组织联系，但没有找到。共青团员韦佩珠、孙醒依等人常来我家看望我，但她们与组织也失去了联系，这使我感到很苦闷。

12月的一天，母亲回家告诉我：韦佩珠等同学被捕了。我很担心韦佩珠等同志的安全。后来知道她是被伪装进步的一个女同学告密而被捕的。被捕前，她父亲劝她到外地躲一躲，她却坚持留在南宁，从事地下活动，如联络情况、印发传单、到监狱探望被捕同志等。她被捕后，敌人用枪毙、上刑、金钱等威胁利诱手段，要她供出南宁党团组织名单，并逮捕她的父亲来劝说，妄想用父女之情来软化她的信念，但韦佩珠毫不屈服妥协，她坚定地说：“我头可断，志不能移！”在敌人法庭上，她理直气壮地揭露敌人屠杀学生的罪行。敌人阴谋失败后，判她12年徒刑。由于她在狱中备受折磨，患病不得医治，至病危时，被推出狱治疗，第二天便离开人世，年仅18岁！解放后，市政府为她建立了纪念碑，并让我题写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员韦佩珠同志之墓”几个大字，以表示辍悼。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回顾大革命以来的斗争历程，思索过去斗争的成败和得失，使我痛切感受到掌握革命武装的极端重要性。大革命时期南宁共青团的历史，是一页英勇奋斗，以鲜血染红的光荣史。在这一时期，陈独秀右倾路线在广西并没有多大影响，南宁的工农和学生革命运动，一直在蓬勃发展，在斗争中广大共青团员和革命青年，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抛头颅，洒热血，英勇不屈，没有一人叛变投敌。但南宁的党团组织尚属幼年时期，对掌握革命武装力量的重要性认识不清。只注意发动学生运动、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却没有争取对军队的领导权，不懂得中国长期处于封建军阀割据下，必须用革命的武装去反对反革命的武装，故当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不少党团员便倒在血泊中，这是血的教训！同时，当反动派举起屠刀时，南宁的党团组织毫无思想准备，在敌人进行第一次大逮捕后，仍没有采取应急措施，安排露面多的人员暂时转移、隐蔽，故敌人又接连进行逮捕，使南宁党团组织遭受严重的破坏，其主要领导人均被捕入狱或牺牲，这也是血的教训之一。这些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经验教训，使我们逐步清醒起来。入狱之后，大家思考：为什么斗争失败，为什么被抓？主要是我们没有武装。因此，大家下决心搞武装，以革命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难友相约，只要活着出去，一定搞武装，要报仇。后来，这些革命者大都从事了武装斗争。

一场新的革命风暴来临了。

第二章百色风暴

风云突变

“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大革命失败后，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军阀集团掌握了中央政权，但各派新军阀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

1929年春，爆发了蒋桂之间的军阀战争。蒋介石利用桂系内部矛盾，策动桂军前线指挥官师长李明瑞于武汉倒戈，进入广西。这场战争遂以桂系军阀的失败而告终。同年6月，蒋介石委任广西籍军人俞作柏、李明瑞为广西省政府主席和广西编遣特派员（后改为第四编遣分区主任）。这一政局的变化，给广西革命带来了有利的转机。

俞作柏是新桂系元老之一，受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的排斥，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曾担任国民党广西省党部农民部长、省政府农工厅长兼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一分校（又称黄埔南宁军校）校长，深受中共和工农运动的影响，倾向革命。“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他被桂系军阀政府通缉并查封家产，被迫退居香港。李明瑞是俞作柏的亲表弟，曾任国民革命军第7军旅长、师长，参加北伐战争，屡立战功，有“虎将”之称。他也遭受桂系军阀李宗仁等人的排斥，积愤不平，早就想摆脱桂系的羁绊，故在蒋桂战争中，与俞作柏一起，借助蒋介石的刀子，击败了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为首的桂系军阀集团，于同年7月率部进占南宁，掌握了广西军政大权。

俞作柏、李明瑞主政后，要求中共派干部协助其工作，以便建立一个独立于蒋介石和桂系军阀集团之外的、类似北伐战争前广东革命政府那样的新政权。当时，中共中央和中共广东省委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先后派遣了龚楚（化名龚鹤村，后叛变）、邓小平（化名邓斌）、贺昌、张云逸、陈豪人（又名陈导民）、叶季壮、龚饮冰（又名龚仁）、徐冠英（又名徐开先）、石迟锋、史书元（又名史遽然）、何世昌、宛旦平、袁任远、许进、许卓、李谦、胡斌、冯达飞、李朴、袁振武（又名袁也烈）、余惠、沈静斋、李干辉、阎伯英、章健、李显、王展、张翼（后叛变）、杨茂、云广英、王逸（后被开除党籍）、林礼等40多名在大革命遗留下来的有丰富政治、军事工作经验的干部，通过各种渠道，陆续进入广西。他们与原先在广西工作的雷经天、俞作豫、韦拔群、陈洪涛等同志一起，开展革命工作，由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负责统一领导。邓小平同志通过中共党员俞作豫与俞、李的关系（俞作豫是俞作柏的胞弟、李明瑞的表弟），做俞作柏、李明瑞等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帮助他们整顿和培训部队，共筹反蒋、反桂系军阀的大计，又趁机开展兵运工作和发展革命武装力量。

经过邓小平等同志的细致工作和内部活动，使俞、李与中共建立了较好的合作关系，同意接纳、安排中共派来的一批干部到其军政部门任职；同意开放工农运动，释放政治犯，启用罗少彦、岑伯英、陈可福、陈可夫、张震球、陈漫远等中共党员干部和革命青年到省和县有关部门工作。从此，广西局势为之一振，各地的工农革命运动又蓬勃开展起来。

俞作柏、李明瑞非常重视扩建军队，邓小平等便趁机向俞、李建议，开办以培养部队初级军官为目标的广西教导总队，并活动由徐开先和张云逸分别担任总队长和副总队长。该总队设3个营9个连，共有学员约1000人。党组织选送100多名优秀青年，安插到教导总队当干部或学员。9个连的干部都是共产党员。排长也是挑选学员中思想进步的人来担任。各连队都建立了党的秘密组织。仅两个月时间，就发展了300多名党员。该教导总队，名义上是训练军官，实际上是中共为改造旧军队、建立革命武装而培养干部。由

于加强对学员的政治宣传教育，向他们灌输革命思想，使学员的思想政治觉悟迅速提高，结业后分配到各部队去，成为改造旧军队的骨干力量。通过党的内部活动，推荐张云逸、俞作豫分别担任驻南宁的广西省政府警备第4、第5大队长。这两个大队是李明瑞回广西后收编一些土匪、民团和散兵游勇组成的，成分复杂，纪律性差，没有战斗力。张云逸、俞作豫等便按照党组织的部署，以合法的身份，对这两支部队进行改造工作。首先在士兵中进行革命民主教育，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在此基础上，发动士兵起来揭发反动军官克扣军饷和打骂、虐待士兵的罪行，果断撤换一批反动军官，另派中共党员干部去顶代。同时，吸收一批工人、农民、进步学生参加部队，增加部队中的工农成分比重，使这两支部队面貌一新，其领导权基本掌握在中共手里。

一天，我听到南宁来了新部队，狱中的罗少彦、岑伯英（《革命之花》杂志工作人员）等同志获得释放，并被安排在南宁的广西军官学校任政治教官，非常高兴，立即与刚出狱的原广西农讲所学员黄奇彦一起，到军校找罗少彦。他和岑伯英热情接待我们，我俩要求到广西军校学习，以掌握武装斗争本领。他们答应把我们的情况和要求向党组织反映。过了两天，经组织同意和罗少彦、岑伯英介绍，我俩便于7月中下旬，考入了广西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分校）校长由李明瑞兼任。

对李明瑞的名字，我早就听说过，知道他能征善战，是北伐军赫赫有名的“虎将”。回想过去自己是个文学生，被捕入狱，束手无策。现在，我是“虎将”的武学生，将会学到更多的军事本领，日后带兵，国民党还能随便捉我？因此，我俩高兴地跑到军校报到。

该校位于南宁南门外旧机场的广西教导总队西边，与教导总队只隔一个大操场。学校刚成立，学员有200多人，还有继续入校的。开始设两个班，第一班学员是连排长，第二班是青年学生，后还扩大若干班，我和黄奇彦被分配在第二班。

我五哥文骢见我入军校学习，很羡慕，也想进军校学习。我便去找罗少彦商量。他问了我五哥的情况，我说，他在旧军队混了几年，当排长，混不出什么名堂，后生病，流落梧州，是父亲寄钱去才回来，其思想倾向进步，就介绍他入军校，以给他一次学习改造和参加革命活动的机会。罗少彦听后表示同意。过几天，五哥被批准入军校学习，因他原是军官，故分配在第一班里。

军校毕业后，他到李宗仁部队当连长，人家把他看成是李明瑞的人，一直不被重用。连长干了十几年，直到1949年才升为代理团长。解放战争后期，他随队伍逃入越南，后来去了台湾。也许由于我的关系吧，国民党不用他，后来让他退伍了。为维持生计，他办过鸡场，摆摊卖过童装。1992年他回广西定居，翌年在家乡去世。他身为旧军人，爱国之心和道德意识比较强，几十年一人在外，一直没有再婚，他生前立下遗嘱决定把自己的大半积蓄捐献给家乡的亭子小学校。

同年8月中旬，随着各地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广西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南宁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广西农协会筹备处，选举雷经天、韦拔群、陈洪涛等11人为执行委员。大会还决定出版《广西农民》三日刊，这个刊物实际上为中共广西党组织的机关刊物。会议期间，经党组织安排，俞作柏会见了右江地区农民运动领袖韦拔群，并同意成立“右江护商大队”，拨给东

兰、凤山地区农军一个营的武器装备，训练农军。

会后，中共推荐了一批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由俞作柏委任为右江和左江地区各县县长或农运特派员，进一步推动左右江地区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

同年9月10日至14日，邓小平和贺昌同志指导广西特委，在南宁津头村秘密召开中共广西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广西党的政治任务决议案》，提出了“深入土地革命宣传和行动”、“准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正确主张，对后来举行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党代会结束后不久，汪精卫派薛岳到南宁游说俞、李与广东军阀张发奎联合反蒋。俞、李迫于形势，决定参加反蒋战争。俞任讨蒋南路总司令，李任副总司令。邓小平等人得到这一消息时，立即与其他负责同志进行了研究，认为俞、李掌握广西政权只有3个多月，立足未稳，加上其部队内部复杂，仓促出兵，必然失败。因此决定：一方面劝说俞、李不要出兵参加军阀混战；另一方面，做好应变准备，应付可能出现的不利局面，以便使我党掌握的武装部队，随时撤离南宁，到农民运动基础较好的左、右江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根据这个决定，中共广西特委对左右江地区的工作进行了部署，并派出一批党员干部建立和加强地方党的领导，为战略转移做准备。

俞、李不听中共的善意劝告，于10月1日在南宁举行反蒋誓师大会，会后即出兵广东，进攻亲蒋的广东军阀陈济棠。

中共以广西教导总队和广西警备第4、第5大队未训练好，后方需要保卫为理由，向俞、李建议让这些部队和军校学员留守南宁，俞、李同意这一建议，并同意由张云逸担任南宁警备司令。

几天后的一天下午，李明瑞骑着一匹白马来到我们军校。军校的全体人员集合在操场上，李明瑞下马走到队伍前面，这是军校开学以来他到军校的唯一一次讲话。他中等身材，30岁出头的年纪，结实而健壮，是个相当标准的军官。他讲起话来，一口广西官话，声音洪亮、有力。他历数了蒋介石的罪状，说他把北伐战争的胜利果实归之于己，贪天下之功为己有，是独夫国贼，号召我们要好好团结起来，若每人毕业后能带一个连的兵，那就可以打垮蒋介石，打遍全中国。他说完便骑马走了。

我听了他的讲话后想：为什么他在讲话中不说一句勉励我们学习的话？难道军校要停办，要拉我们学员上前线？

南宁的风声一天天吃紧。听说李明瑞在军校讲完话后便上前线指挥去了。原来，他这次讲话是向我们作告别的。

不出中共所料，俞、李的讨蒋部队尚未走出广西，他的16师师长吕焕炎、57师师长杨腾辉和15师44旅旅长黄权都被蒋介石重金收买后倒戈投蒋，俞、李只好带几个随从仓皇逃回南宁。

俞、李反蒋失败的消息传到南宁后，在教导总队里掀起一场风波。听说讨蒋的部队已倒戈，部分从部队来的学员闹着要回原部队去。由于有些坏分子从中煽动，弄得人心浮动。

一天夜里，教导总队的电闸被拉断，顿时枪声大作。总队中一些反动分子起哄闹事。事发后，张云逸闻讯赶到教导总队平息骚动，稳定局势。

当晚，他把各支部书记和委员找到一起开会，决定在教导总队中开展一场投向革命还是脱离革命的说理斗争。第二天，学员分组开会，各小组都有党员参加。会上，用事实揭露投蒋分子的反动本质和可耻行为，使他们在群

众中孤立起来。同时，向广大学员指明革命光明前途。经过一天争论，使大部分学员分清了是非，消除了顾虑，表示站到革命方面来。

当天下午，张云逸把全体学员集合起来讲话：

“革命是光荣的，反革命是可耻的。每一个人都要认清形势，对自己的命运和要走的道路作出慎重的抉择。我们革命队伍是由有觉悟的人组成的，来去自愿。现在，南宁已不能停留，凡是愿意跟总队部到右江地区干革命的，站到这边来，要离队的，站到那一边！”张云逸的话音刚落，大部分学员纷纷拥到继续干革命这一边；少数反动军官、兵痞、坏分子到离队的那一边；还有一些人犹豫不定站在中间，许多党员和进步学员就朝他们喊话宣传。那些犹豫的人，又陆续站到革命队伍这边来。最后查点人数，愿意到右江干革命的有 500 多人，要离队的只有百人左右。南宁局势的变化和广西教导总队发生的骚乱，在我们军校学员中有很大的震动和影响。学校的训练已不正常。我觉得形势的发展，自己的军校生活可能要结束了，今后工作，只好等待组织的安排。

这时，亲蒋的广东军阀陈济棠，按照蒋介石的命令，派香翰屏、余汉谋、蔡廷锴 3 个师逼近南宁。中共广西特委在此关键时刻，当机立断，决定把党在南宁掌握的广西警备第 4、第 5 大队和广西教导总队这 3 支队伍撤离南宁，挺进右江和左江地区。

1929 年 10 月 13 日是星期天，学校放假，我同好友黄奇彦一起回到我家，晚饭后，我俩启程返校。到了“洋关”，已近黄昏，邕江沿岸，景色如故，可行人脸上隐隐约约带着惊恐不安的神情。堤上，见有很多部队和满载军火的车辆开赴码头。一群工会会员和农会会员也走向码头，协助部队把汽车上的军械弹药搬上汽船。看样子，驻守南宁的部队要撤离了！

我俩顿时一愣，不知究竟。过一会碰到码头边站着军人装束的陈叔度，旁边还站有他的夫人邓仲琴、弟弟陈可禄、妹妹陈佩珩。陈叔度是俞作柏的少校秘书，又是我家的亲戚（他的夫人是我姐夫的妹妹），1927 年 5 月，他在南宁军校与我同一天被捕，同牢难友，俞、李主桂后他才被释放、启用。我们彼此熟悉，因此，我和黄奇彦立即下去找他，问：“你们走么？”

“是的，走啦！”陈叔度点着头。

“去哪里？”

“百色！”他很兴奋，眼里放着亮光。

“为什么不告诉我们？”我焦急地问。

“来不及啦！”

“我们也去百色！”我俩马上表态，并请他帮忙。

在当时的脑海中，只有从军革命，别无他路。“我无权决定。”他瞅着我们，表现出无可奈何的样子。

我们更为焦急，再三请求说：“有这个好机会，不让我们去搞武装斗争，将来敌人来了，我们不是又要被捕、杀害？”他看我俩着急的样子，沉思了一下说：“有个办法：现有大卡车去西乡塘拉东西，我给你们写个条子，你们带此条子乘车到西乡塘找警备第 4 大队长张云逸，看他是否收留你们。”他说完立即给我们写了介绍信，并派人送我们上车，还给我们几元钱。

我们在西乡塘找到了广西警备第 4 大队长张云逸同志。张云逸是一个 30 多岁的军官，留着一小撮胡子。他看过信后，扬起眉瞅瞅我们两人，笑咪咪地操着海南口音说：“你们都是大革命时期的共青团员、同坐过监牢吧？”

“是的。”我俩高兴地回答。

张大队长又问：“你俩又是军校李明瑞的学生吧？”

我俩又点点头。

张大队长站起来拍拍我们的肩膀，说：“好吧！你们在大革命时期就加入了团组织，经受了大革命的锻炼，很难得，欢迎你们来4大队工作。现在任命你俩为中尉副官，快到大队部副官处报到吧！”

我们一听，真是高兴，立即到了副官处向刘健处长报到。他给我们发了军衔、胸章。这样，我来不及回家告诉父母，也来不及回军校告诉我五哥和取行李，便随4大队去了百色。

第二天早上，张云逸大队长骑着一匹黑马，率警备第4大队和教导总队向百色方向挺进，我和黄奇彦也随第4大队出发。我俩的任务是负责押解现洋，共有十几个挑夫，每人挑500块现洋。大队部考虑我俩任务较重，年纪较小，各配一匹马给我们。大约走了三四天时间，经隆安到达平马，顺利完成任务。

在此同时，邓小平等带领警卫部队和地方机关干部，指挥装满武器弹药的军械船，溯右江而上，经平马到达百色。

在我们第4大队撤离南宁的前一天，俞作豫率领广西警备第5大队挺进左江地区的龙州。俞作柏经越南到了香港，李明瑞则留在龙州，后参加了革命队伍。

百色揭竿

1929年10月22日，我们大队人马沿着右江岸边，浩浩荡荡地挺进桂西重镇百色县城。

百色，是个依山傍水、景色秀丽的山城。人口1万左右，杂居着壮、汉等各族人民。它是右江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连接着云南、贵州交通要道。控制百色，可以北依农民运动基础较好的东兰、凤山两县，作为后方基地；南连左江地区龙州一带，与广西警备第5大队相呼应；它地处桂西山区，却相当繁华，经济上可以取得一批税收。我们警备第4大队的队部就驻在城里的粤东会馆，邓小平、张云逸、龚鹤村等首长住在里边长廊楼上。

邓小平、张云逸率部进驻右江地区后，当务之急，就是与韦拔群领导的右江地区农民运动相结合，填密地筹划武装起义，做好创建红军，成立红色政权的准备工作。为此，在百色召开了部队党的领导成员会议。会议分析、研究右江地区的形势，制定了今后的斗争策略和措施。按照这次会议的部署，立即进行部队的整顿、改造工作。着重对士兵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士兵觉悟，发动士兵揭发旧军官的犯罪行为 and 军阀作风，反对贪污克扣军饷，反对虐待士兵，严办了深为士兵痛恨的一个营长。对那些屡教不改的旧军官和兵痞流氓，则采取撤换、“调训”或“礼送出境”的办法，加以处理，还吸收了1000多工农优秀青年入伍，壮大了队伍。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大力培训新干部。至武装起义前，部队中连以上单位都建立了党支部，地方党的组织也有很大发展，右江地区已有党员五六百人。

同时，在部队和群众中公开宣传党的主张，宣传发动和武装工农群众，支持工农运动。邓小平、张云逸等充分发挥右江地区农民运动领袖共产党员韦拔群、黄治峰等同志的作用，通过他们团结教育各族贫苦农民。

每个连队还组织七八个人的宣传队，深入山村、街道，开展宣传发动工作，还派军事教官帮助各县训练农军。

为加强对百色工人运动的领导，部队党委先后派出黄一平等7位政工干部，指导各工会组织工作。先后成立了12个行业工会，会员1000多人。在此基础上，成立了百色县工人联合会和工人赤卫队。在部队的帮助下。各地的工农运动蓬勃发展，为武装起义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

随着右江群众革命运动日益高涨，平时作威作福、鱼肉人民的豪绅地主和资本家，开始坐卧不安了，他们把第4大队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一面明来暗往地纠集反动民团，占驻据点，妄图负隅顽抗；另一方面，与尾随第4大队进驻右江地区的反动第3大队互相勾结，妄想搞掉第4大队，镇压右江革命。

原来，警备第3大队由广西、云南边界的土匪收编而成，表面上与第4大队称兄道弟，而实际上貌合神离。该大队长熊镐极其反动，性好投机。俞作柏、李明瑞反蒋失败后，他立即听命于卷土重来的桂系军阀，受其主子的密令，紧紧地跟踪第4大队。

来者不善。邓小平、张云逸等看穿了熊镐的险恶意图，决定铲除这只“狗熊”。

恰在这时，奉议农军截获到一份黄绍竑拍给熊镐的有线密电，指令熊镐要“先发制人”，对第4大队进行突然袭击。

在这紧急时刻，邓小平、张云逸等制定将计就计歼灭第3大队的计划。

动手前，仍按“友军”惯例，照常与第3大队来往，麻痹敌人，及时了解对方动向。10月28日，张云逸设下“鸿门宴”，以商谈防务之名，宴请第3大队营以上军官。席间，擒捕了熊镐，后枪毙了他。

同一天，按照原定计划，第4大队1营和恩隆、思林、奉议等县农民自卫军共千余人，分别解除驻平马、那坡的第3大队武装，俘敌千余人，缴枪千余支，为百色起义扫除了障碍。

在此前后，东兰、凤山、奉议、思林、向都、镇结等地的农民武装，在第4大队支持下，也加强了扫荡地方反动势力的军事活动。如韦拔群和第4大队军事教官钟鼎率领东兰县千余农军，攻占了东兰县城，县长弃城逃窜。其他县的反动武装，有的被击溃，有的被缴械，有的逃到外地躲避。整个右江地区，正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我到百色后，和黄奇彦仍在副官处工作。该处除了我俩外，还有李荣（李振亚）、李治、杨英等，处长是刘健。我们的任务是处理日常事务，接待来往客人，协助改造军队和筹备起义的工作。我们几个人佩精神带和横斜的值日带，轮流值日。

那时，实行官兵平等，官、兵、夫薪饷每人每月都是20元大洋，我们大队部的军官，都在会馆中间的大厅里吃饭，每月伙食12元。开饭时，大家先入厅坐下，当邓小平、张云逸、龚鹤村进入饭厅时，值日官发出“立起”的口令，首长入席后，大家坐下，等值日官一声“开动”的口令，大家才迅速吃饭。当领导人吃完了，值日官又叫口令：“立起！”大家便放下碗筷站起来，领导人退席后，值日官发出“解散”的口令，大家才离席。

我加入了革命军队，经常在领导身边工作与领导领同样的薪饷，吃同样的饭菜，深感革命大家庭的温暖，领导分配的工作，都积极去完成。为了提高自己的文化和业务水平，我还利用晚上时间认真读书。有一天晚上，参谋长龚鹤村突然来到副官处，看大队部其他人都外出玩乐，只剩下我和黄奇彦两人在房里看书，他便鼓励我们说：“你们年轻，就应这样好好学习和工作！”

10月30日，中共广东省委通知广西特委，决定建立中共广西前委（后改为红7军前委），由邓小平担任前委书记，统一指挥左右江地区党和军队的工作。

11月初，原从南宁派往香港向中共广东省委和中央请示汇报工作的龚饮冰回到百色，带来了中央批准在左右江地区举行武装起义、建立红军和根据地的计划，颁给成立红7军、红8军的番号，并任命了红7军、红8军的领导干部。这样，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更加紧进行。

12月上旬的一天，龚鹤村到副官处找我说：“给你一件重要而又秘密的任务，你能办到吗？”

“一定能办到。”我回答。

“好吧，你到街上去做一面红旗，旗面写上‘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军部’字样，中间是黄色的镰刀、斧头。另外，再刻圆形的关防和长条戳子各一件。”接着，他把红旗的尺寸告诉我。最后，他问我：“我们很快就是红军战士了，你高兴吗？”

我想到大革命时，我们没有军队，吃了大亏，多少人被捕、杀害，我是幸存者，后听说朱毛在江西建立了红军，我很羡慕、向往。现在自己当红军的愿望就要实现了，心里格外高兴。

接受任务后，我立即到经理处领了红绸布，到离军部不远的一家商店去

做军旗。刻关防印戳是一个私人刻章处刻的。我要求他们严格保密，不得对任何人讲，否则，要负严重责任。这样，只用两天时间，我便完成制作军旗和刻印戳的任务。

起义前的一天，前委在百色分别召开了工人代表大会、警备第4大队士兵代表大会和百色农民代表大会。在这3个代表会上，代表们一致热烈拥护和通过前委关于举行武装起义、建立红军和建立革命政权的决议。当天晚上，前委还在百色商会俱乐部设宴，邀请百色、奉议两县县长和百色商会要员赴宴，向他们说明将成立红军和苏维埃政府的意义、政策，为避免泄密，暂把他们控制起来。同时，当夜派部队收缴百色公署公安局、禁烟局及百色、那坡、平马、果化等城镇商会团体的枪支共300多支。

这一夜，大队部灯火辉煌，领导和工作人员都以紧张的战斗，迎接广西革命历史上光辉、难忘的一天！

12月11日，是广州起义两周年的纪念日。这一天，火样的朝阳刚从东山露出脸，整个百色山城便沸腾起来，一队队工人、农民、士兵、学生和城市居民，打起锣鼓，挥动着红旗，向东门坡广场走去。大街小巷贴满红纸写的革命标语和红7军的安民布告。家家户户悬挂着五彩缤纷的纸旗。我们大队部驻百色的官兵也穿着灰色新军装，颈上系着耀眼的红领带，兴高采烈地列队到东门坡广场参加军民庆祝百色起义和成立红7军大会。

会场上，红旗漫卷，号鼓喧天，鞭炮齐鸣，盛况空前。参谋长龚鹤村主持大会，陈豪人讲话。当他庄严宣布百色起义胜利举行和中国红军第7军正式诞生时，全场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和口号声。

我看着自己负责制作的一面镶有镰刀斧头的红旗在南疆地平线上冉冉升起，再看自己颈上扎了一条红领带，心里充满着难以表达的喜悦。这面大红旗，像团烈火在燃烧，映红了百色山城，映红了灾难深重的壮乡！会后，举行庆祝游行，整个百色山城沉浸在热烈、欢乐的气氛之中。

同一天，在粤东会馆——红7军军部的大厅里，召开了部队排以上干部和军部直属队共500多人的大会。红军指战员在火红的军旗下，举行了庄严的宣誓仪式。我是其中之一。大会仍由龚鹤村主持，陈豪人代表军前委讲话。

会上宣布了红7军的编制机构和领导人：

军长：张云逸（今海南省人）

党代表（后改为政治委员）：邓斌（邓小平，四川人）

政治部主任：陈豪人（福建人）

参谋长：龚鹤村（龚楚，广东人）

司令部机构：

参谋处长：陈叔度（广西人，后钟鼎接任）

参 谋：莫文骅、黄奇彦、陈可夫（均广西人）

副官处长：刘健（广西人，后陈叔度接任）

经理处长：张逸秋（今海南省人，后叶季壮接任）

军医处长：吴清培（福建人）

政治部机构：

秘书科长：余惠（湖南人）

组织科长：罗少彦（广东人）

宣传科长：许进（广东人）

社会科长：黄启滔（黄一平，广西人）

宣传队长：文冠球

军直属队：教导队长：许卓（广东人）

特务营长：符禄（今海南省人）

各纵队编制：

第1纵队：由原警备第4大队改编而成

纵队长：李谦（湖南人）

政治部主任：沈静斋（安徽人）

第1营营长：何莽（广西人）

指导员：黄启滔（1930年2月后调任）

第2营营长：王展（湖南人）

第3营营长：雷竹平（广西人）

第2纵队：由原第4大队一部分、原广西教导总队一部分、百色工人赤卫营及右江沿岸农军组成

纵队长：胡斌（海南省人）

政治部主任：袁任远（湖南人）

第1营营长：符镇

指导员：杨英

第2营营长：冯达飞（广西人）

指导员：麦农本第3营

营长：黄治峰（广西人）

指导员：杨成之（贵州人）

第3纵队：由东兰、凤山等县农军组成

纵队长：韦拔群（广西人）

政治部主任：李朴（四川人）

第1营营长：陈恩深（广西人）指导员：黄冕伦（广西人）

第2营营长：黄昉日（广西人）

指导员：黎心诚（湖南人，1934年叛变）

第3营营长：黄世新（广西人）

指导员：李干辉

3个纵队加上军部直属教导队、特务营、炮兵连共4000多人。

同一天，右江地区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恩隆县平马镇经正书院胜利召开。各县的工农代表及红7军代表共80多人出席了大会。大会选举产生了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雷经天。第二天，在平马镇举行有1万多群众参加的庆祝红7军成立和右江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张云逸代表中共红7军前委出席了庆祝大会。会后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在红7军帮助下，有15个县先后成立了县苏维埃政府或革命委员会，成为拥有100万人口的右江革命根据地。百色起义后不久，组织分配我到红7军司令部参谋处任中尉机要参谋，管行军、作战、电报（有线电报）和其它机要工作。

来百色后，我于11月间写信给张云逸同志，汇报自己的思想情况，提出了由共青团转入共产党的要求。张云逸军长接到我要求转党的报告后，他曾与邓小平同志商量，决定由张云逸、陈豪人、叶季壮（军部党支部书记）3人组成一个审查小组，负责审查我的历史。很快弄清我在狱中的表现，结合考察我在百色各方面的表现后，党支部于1930年1月正式批准我转入中国共

产党。介绍人是张云逸。这是百色起义后司令部党支部吸收的第一个新党员。当党支部书记叶季壮同志告诉我被批准入党的消息时，我心情很激动，同时意识到入党即是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了党，在为共产主义事业斗争中，今后要我去赴汤蹈火、流血牺牲，也是甘心情愿的。

我入党时，军司令部的党员共有4人：张云逸、龚鹤村、叶季壮和我。当时党组织仍处于秘密状况。百色的红色风暴，席卷了右江地区的山山莽莽，“一切权力归苏维埃”、“打倒土豪劣绅，平分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浪潮汹涌澎湃，严重威胁着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敌人不甘心自己的失败，暗中磨刀霍霍，妄想卷土重来。

12月下旬的一天拂晓，忽然城后山头响起枪声，越响越密，越响越近。我们从梦中惊醒，一跃而起，立即拿起武器，投入反击敌人的战斗。

这是一股隐藏在百色西部地区的西林县和西隆县的反动地主和土匪武装，匪首叫韦武。他纠合2000多匪徒，趁红7军主力不在百色之机，分三路突袭百色。这些亡命之徒多是本地人，道路熟悉，仗着人多势众，从西关方向蜂拥而来。不到半个小时，便占领了商业区大街，劈门闯入商店，大肆抢劫财物，并冲进了原禁烟局，争着抢劫其鸦片烟和现洋。城内大部分街巷也发现土匪，他们正向红7军的司令部和政治部的所在街道袭来，情况危急。当时，红7军主力在田州、那坡、果德一带肃清反动武装，留守百色的红军部队只有教导队、机关枪连、半个特务连，连同司令部、政治部的人，总共不足500人。邓小平同志已去龙州，张云逸同志带特务连大部分战士去了平马。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为了保卫红色山城，保卫红7军军部，全城军民都紧急动员起来，各自为战，英勇抗击四倍于我的敌人。

枪声就是命令。干部立即集中起来，参谋长龚鹤村带一部分人负责打东路；组织科长罗少彦带一部分人负责打北路；第2纵队政治部主任袁任远带十几个干部和一个排直奔西门；教导队长许卓率领教导队，第2纵队营长冯达飞和指导员杨英指挥机关枪连，特务营营长符禄带领特务营部分战士，在城内与敌人展开激战；我和黄奇彦及其他五六位同志坚守南门。南城门外有一条小河潺潺流过城墙脚下，离城门约20米远的地方，架着一座石桥，这是进出城的必经之路。我们几个人手持马枪，在岗楼上，密切注视着城外的动静。看见敌人靠近石桥，我们就开枪射击，目的是把敌人赶跑。经理处的同志，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将贵重的金银财宝分别由各人携带保管，有的背在肩膀上，有的分散埋藏在房间的各个角落。他们为预防万一，便在驻地门外，用砖头、木板或木箱装上沙土，筑起临时的防御工事，荷枪实弹警惕地守卫着。处长叶季壮率云广英、陈可夫、李治、李荣等10多人，用驳壳枪反击，将企图进攻军司令部的土匪击溃。红军指战员在百色工人武装配合下，英勇反击，越战越勇，大家只有一个念头：百色是红7军的发祥地，誓死捍卫红色山城！土匪虽然人多，但他们突入市区后，到处抢劫财物，队伍散乱，在红军和工人赤卫队的猛烈反击下，节节败退，纷纷往山里逃窜。经过3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毙敌40多人，伤敌30多人，缴枪10多支。我方亦伤亡30多人。

太阳升起来了，金光灿烂。火红的红7军战旗，仍竖立在百色城头上！击退土匪的进攻后，军部考虑到敌人还会卷土重来，遂从平马调来一个步兵营驻防在百色附近，并在城外山地构筑工事，时刻准备痛击来犯敌人。

不出所料，翌年1月上旬，又有2000多土匪民团武装进犯百色。红军战

士凭借事先筑好的工事，在城外山地与敌展开激战，使敌人始终无法接近城边，我们军部人员也做好参战准备，打了两个多小时，敌人看势头不好慌忙收兵，狼狈逃跑。这一仗，又毙伤敌 70 多人。

这两次土匪进攻，给我们留下一个教训，必须发动和武装群众，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才能巩固和扩展革命根据地。此后，红 7 军对这方面工作虽有所重视和加强，但由于红 7 军处于初创时期，且处在战争环境里，仍把主要精力放在军事活动方面。在百色起义的鼓舞下，从南宁转移到左江地区的广西警备第 5 大队，按照中共广西前委的部署，于 1930 年 2 月 1 日胜利举行了龙州起义，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 8 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邓小平兼任红 8 军政委，俞作豫任军长，何世昌任军政治部主任，宛旦平任军参谋长。李明瑞同志在党的感召下，终于与旧营垒决裂，毅然投身革命，参加了龙州起义的领导工作，被中共广西前委任命为红 7 军、红 8 军的总指挥。龙州起义与百色起义互相呼应，革命风暴遍及左右江地区 20 余县，形成了拥有 100 多万人口的全国瞩目的左右江革命根据地，震撼了西南军阀的反动统治。

隆安保卫战

春花竞放，木棉喷焰。1930年春节刚过，一场血与火的鏖战，首先在右江地区前哨的隆安县城展开。隆安县城，又名蝶城，右江下游的一个重镇，离南宁百多公里，是右江一个水陆交通要道。红7军前委，为扩大政治影响，曾于1930年1月作出决定：趁粤桂军阀在柳州、桂林一带混战、南宁敌人力量空虚之机，联合刚成立的红8军，于2月初到南宁附近汇合，然后夺取南宁。口号是：“打到南宁去！”为此，前委曾派第1纵队长李谦，率该纵队的第3营（后增加第1营）攻占隆安县城，帮助该县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并在当地宣传发动群众，开展打击土豪劣绅、没收豪绅地主财产分给贫苦农民的斗争。

红7军除留下少数部队在百色外，其主力于1月下旬开始向下游的平马等地转移，我也随参谋长龚鹤村到达果德。百色起义吓坏了桂系军阀，加之红7军过早公开提出攻打南宁的口号，惊动了敌人。

1月底，李宗仁在南宁急忙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改变战略，从前线调回兵力，拟先消除后方红军隐患，然后以南宁和左右江地区为后方，再攻打钦廉粤军。他命师长李画新（又名李琪）为总指挥，率杨俊昌团、覃兴团、蒙志仁团以及岑建英的特务营，共32个连3000多兵力，从贵县经宾阳、武鸣直扑右江。

2月3日，敌先头部队已进至隆安县城东30公里的玳瑁村，红军尚未发现。4日晨，敌军渡过右江兵分两路向县城包抄，情况紧急。

这时，驻隆安县城的红军部队只有第1纵队第1营的第1、第2连（第3连尚驻在城西15公里的杨圩），以及纵队直属的重机枪排和迫击炮排，仅有300人左右。加上刚组建不久的县赤卫队，全部守城兵力不过500人。4日下午3时许，覃兴团便出现在城东南的头桥高地，其先头部队的两个连，已逼近城东门。红军岗哨发现后立即鸣枪报警。驻在县城新街观音庙的1排闻讯，最先跑步进入清官亭和布轰一带的上坡布阵。接着，驻县城南门的指战员也快步占领南门外左侧的土坡。开始，以为是民团骚扰，后听枪声越来越猛烈，才知是国民党正规部队。纵队长李谦紧急部署部队后，亲自到南门墙口指挥部队占领有利地形，还击敌人。进入布轰的红军首先与头桥的敌人接火。双方隔沟对垒，展开激战。为了摸清敌情，李谦冒着弹雨爬往前沿阵地观察，不幸，一颗子弹打中他的左臂，鲜血直流，被送回下颜治疗。于是，指挥的重担落在纵队政治部主任沈静斋的肩上。他两眼冒火，抓起一支步枪大喊一声：“同志们，跟我上，坚决把敌人打回去！”战士们跟着装上刺刀，扔出一排手榴弹后，便勇猛地朝敌人扑去，一下子捅倒了七八个敌人，迅速夺回了城东南部分高地。敌见正面地势不利，进攻受挫，便往左右拉开包抄红军侧翼，一路绕过拉蛮、汤扭等地，侧击清官亭一带的红军；一路从右面攻击老寿山下一带的红军。敌人在左路的攻击被红军击退后，便把重点放在右路上。防守在老寿山和猴子翻筋斗岭阵地的部队，是由营长何莽率领的一个连和一个机枪排、一个迫击炮排。敌人先用炮火轰击我山头阵地，然后以一个团的兵力潮水般向红军阵地涌来。扼守在山腰的迫击炮排立即发炮轰击敌群。何莽营长带领部队英勇还击。战斗中1连长不幸中弹牺牲。

经过两个小时激战，敌人败退，红军乘胜追击，将敌人赶过了三桥。当晚，纵队政治部主任沈静斋带领一个排守城，其余由何莽营长率队占领城南的老寿山、牛眠岭一带高地，露营防守。5日拂晓，敌人又以一个团兵力向

老寿山、牛眠岭一带的我军阵地发起猛烈攻击，我军利用有利地形，英勇还击，打退了敌人多次冲锋。

这时，敌总指挥李画新在县城东郊 2 公里处的一个山坡上，召集几个团头目及国民党县长黄晓东研究新的攻城计划：杨俊昌团为中路，攻城东门；蒙志仁团和未到位的岑建英特务营为左翼，先攻下城南一带的老寿山、牛眠岭、虎头岭、雷亮、猴子翻筋斗岭的红军前哨阵地，然后围攻城西门，断绝城内红军退路；右翼由国民党隆安县长黄晓东率领的民团 200 多人堵守河岸；覃兴团改为攻城的预备队。

上午 9 时左右，作为敌增援部队的蒙志仁团蜂拥而至，直扑我军的老寿山、牛眠岭一带阵地。由于敌众我寡，山头被攻占，我军退到山北坡防守。5 日下午，我随龚鹤村参谋长和总指挥李明瑞、军长张云逸率红 7 军第 1 纵队第 2、3 营和第 2 纵队 1 个营及思林、果德农民赤卫军共 700 多人，从果德赶到隆安增援。原来，李明瑞从左江率特务队约百人到右江，第二天，接敌人进犯隆安的消息，他便骑上枣红马，快马加鞭，率部队赶往隆安。他一到隆安，立即投入指挥战斗，我便跟随在他和龚鹤村身边，及时传达他和军首长的作战命令（张军长在第 2 梯队），来往穿梭在枪林弹雨之中。

李明瑞经过了解和观察，深知情况严重，立即命令第 1 纵队第 3 营直插城东门外，抵抗中路来犯之敌，其余则配合城南外的老寿山、牛眠岭一带守军，猛击左路敌人。敌我双方在蜘蛛公、蜘蛛母一带的土坡上展开激战。敌人最怕与红军刺刀见红，我军在李明瑞沉着指挥下，等敌人摸到阵地前七八米时，便猛地跳出壕沟，冲入敌群，拼起刺刀，杀得敌喊爹叫娘。几个回合，便使岑建英营 4 个连伤亡过半，敌团长负伤，红军终于夺回了老寿山、牛眠岭等前哨阵地。战斗在城门外的第 1 纵队第 3 营，艰难地抵挡敌人中路杨俊昌团的多次进攻，直到天黑，才撤入城内防守，等待援兵。这一天晚上，细雨霏霏，春寒袭人，城内外枪声密集，彻夜不停。敌杨俊昌团的黄如勃趁夜冲入城外新街，以观音庙、陆合栈的楼房为垒，用交叉火力向守城红军攻击，并架设人梯，妄图越墙入城，遭我军反击，激战一夜。

6 日上午，红 7 军第 3 纵队长韦拔群率两个营从东兰日夜兼程赶到了隆安。李总指挥让我去传达他的命令，命令韦拔群同志率两个营从左侧跨过田埂，从城西北的火楼岭到城西的虎头岭东北面山脚，正面佯攻；第 2 纵队的 1 个营则从火楼岭南侧攻敌左翼。韦拔群接到命令后，立即指挥这支未经过正规训练的由游击队和农民组成的新队伍，摆成一线式，像猛虎下山般向敌阵奔杀，在 2 纵队的配合下，敌蒙志仁团和岑建英营屡次进攻被冲垮，大有不支之势。坐在汽船上督战的敌总指挥李画新，见势不妙，又不知新增援的红军兵力有多少，便下令撤退，但双方正在胶着激战，难以脱开。他只好带一队卫兵躲到离隆安 2 公里多的右江河面上的小汽船上督战。这时，我军的弹药越来越少。

到了 6 日中午，红 7 军 1 纵队迫击炮队队长乔松等掩护的军火船，从平马镇开到了隆安县城西北的西兴村禄驮屯附近，被占据那旭屯的国民党县长黄晓东率领的民团所阻击，无法将军火接济城内部队。火线上的枪声像爆玉米花一样“乒乒啪啪”地响个不停，炮弹把城外阵地炸得泥土满天飞，又像雨点般往下跌落，灰尘里夹杂着浓烈的火药味。因硝烟弥漫，看不清前方敌我阵势，李明瑞和龚鹤村带领我们参谋和警卫人员 20 多人到前边山脚去观察火线情况。当通过一块 10 多米长的田坝敌人火力封锁区时，李总指挥说：“你

们等一等，隐蔽一下，我先过去，叫你们时再过来。”此时，炮弹和子弹从周围飞过，震耳欲聋，尤其是开花弹，真是有些吓人。李总指挥大步走在前头，几个警卫员离他约1米远跟进，不慌不忙地安全通过田坝。到了隐蔽的地方，他望着天空，听着枪声，招手叫我们分两批通过田坝。第一批安全过去了，第二批正要走时，他摇手叫停下来，过了一会儿他又招手时才过去。

我第一次参加正规作战，在战场上对指挥员的一举一动都用心观察，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可对李总指挥为什么要那样带我们从敌火下通过田坝不理解。后来一位参加过北伐战争的老同志说，开始通过田坝时，枪声虽然激烈，但多是从头上或周围飞过，听起来有些吓人，但打不中人，可安全通过。后看到枪声没有什么变化，李总指挥才告我们分批通过。

当第二批要出发时，他看到有些子弹落在田坝里，尘土飞扬，故叫暂停下来，否则就要受损失。后来听到枪声有变化，才叫走的。大凡敌人打枪，一阵一阵的，不是光打一个地方，我们就得循规律，钻空子。我听后，得益不小，感到李总指挥打了10多年仗，摸透了战场的脾气，不愧是北伐名将。我从他的身上学到了不少打仗的本领。7日凌晨，敌人得知我军弹药不足，火力减弱，便命令其预备队覃兴团的一个连绕道从南坡先登上了城西制高点——猴子翻筋斗岭，居高临下，占了优势。坚守在虎头岭、叫墙、雷亮一带的红军教导队和第1纵队，正面受压，难以抬头。特别是冲到叫墙最前沿的教导队伤亡很大，不得不从山顶步步后撤。李总指挥和张军长即令韦拔群率第3纵队的后续部队，增援第1纵队和教导队，加强正面攻击。但是，由于地势不利，覃兴团已全部占领了制高点，凭险死守，我军几次冲锋，均未奏效。为了保存实力，上午9时许，李总指挥与张军长决定撤退。我们参谋处的几位同志立即分头在火线上传达这一命令。

正当城外的红军部队撤退的时候，敌人的迫击炮打中县城北门的城楼，使坚守城内的1纵队政治部主任沈静斋跟我们城外部队失去了联系。他命令1营营长何莽带领伤员和部队先撤，自己率20多名战士留作掩护。完成掩护任务后，他率战士们从城北门突围，准备沿河往下颜方向赶上部队。但是，当他们冲到城西的花宋屯附近时，被敌人截断了去路，突围的部队被冲散。沈静斋同志跳下右江河，游到对岸。不幸，因负伤被民团所俘。其余突围出来的战士大多牺牲在花宋屯附近。

同日，驻守在城西15公里的杨圩的第3连也朝下颜方向撤退。沈静斋被俘后，敌人凶狠地要他下跪。他怒目而视，昂首挺胸地喝道：“要杀就杀，共产党员决不在敌人面前下跪！”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视死如归的钢铁意志和高贵品质。

2月11日，这位出生于安徽省宿县的26岁的优秀共产党员被杀害于隆安县城西门外，同时遇害的还有隆安县革命委员会干事陈汉（陈维十）、赤卫队员陈天晖。隆安一仗，是红7军诞生后与桂系部队的第一次战斗。我军以不足两个团的兵力，抗击了3个团及1个特务营的敌人，坚持3昼夜，毙伤敌500多人，显示了红军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隆安战斗再次证明：红军要站住脚跟，必须深入发动和武装广大群众，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打倒土豪劣绅，把工作中心放在农村，巩固扩大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而不能偏重于攻城夺地。在红军初创时期，实力尚不强大，去进攻敌人统治力量较强的中心城市，红7军前委作出进攻南宁的决策是冒险和错误的。红7军从隆安撤退后，向平马山区挺进。敌人拼命狂追，紧紧跟踪追击从隆安撤退的我军，企

图再与我军主力决战。敌人一直追至恩隆县境，并趁机占领了右江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平马镇。

2月12日，红7军得到报告，说平马敌人大部分已开往百色，城内只有一营敌人。于是，李总指挥和张军长商定以教导队为主力，以恩隆、思林赤卫军为配合，攻下平马镇，恢复右江沿岸县城。后经侦察，发觉驻守平马之敌约有1团人。敌覃兴团派1个营扼守平马镇外围的马鞍山，其海拔180多米，是平马镇的屏障。

当天上午9时许，军部派教导队长许卓率该队越过上法村，到达马鞍山北面山脚，在当地赤卫军配合下，从东、西、北三面向敌人发起猛烈进攻，敌人顾此失彼，措手不及，士气颓丧，其环山战壕一条条被攻破。经过几小时激战，打垮了该营，歼敌数十人，其余仓皇逃入平马城内，关起街头闸门，负隅顽抗。下午两点多钟，我军乘胜追击，占领了平马镇内半边街。夜幕降临后，红军和赤卫队向死守另半边街的敌人发起攻击，敌人布下层层封锁网，我军多次冲锋，均未攻下。在攻打平马的夜间战斗中，李总指挥和龚参谋长已到前线指挥，我留在张军长身边，指挥所设在一个小山上，离前线约600米。天朦朦胧胧，像罩上了黑纱，前面枪声时密时疏，不知情况如何。张军长因没接到战斗报告，很是着急，他让我去前方找龚参谋长了解情况后回来报告。我问他参谋长在哪个方向？他说不知道，令我去找。我接受任务后即摸黑向平马街方向走去。我不知龚参谋长在何处，只朝有枪声的地方摸去。走着，走着，不觉到了平马镇的边缘，枪声停了，以为是我军的阵地，我便放步再往前走。忽然，一排枪打过来，我马上趴在田坝上，敌人仍在胡乱打枪，我悄悄爬过两块田坝，前面传来喊声：“口令！”我答：“月光！”又问：“天！”我答：“水！”知是自己人，我便顺利通过。我好不容易在平马镇边找到了龚参谋长，他说：敌人凭有利地形死守，人员不断增多，我们组织几次进攻，尚未攻下，看来，拂晓前难以解决战斗，不宜再苦攻下去，拟主动撤退。他还说，李总指挥也在附近，也是这个意见。这样，我便按原来的路线摸回指挥所，向张军长汇报。

第二天一早，发现敌军杨俊昌团从百色回头来到右江南岸，正渡河过来向我军实行包抄。我军便迅速撤出战斗，向恩隆县北部山区转移。这次虽然没有全部攻下平马镇，但红军杀了敌军一个回马枪，威慑敌胆。我军从平马撤退后，敌人以为红军两次惧战退缩，更猖狂起来，李画新派蒙志仁团绕过大湾，经巴丙包抄红7军的退路，企图阻止我军进入右江地区革命根据地的大后方——东兰和凤山县。

2月27日，我军撤至恩隆县燕洞一带时，与第2纵队长胡斌和纵队政治部主任袁任远率领留守百色的队伍不期而遇。原来胡斌和袁任远率该纵队部分战士留守百色，后来他们与我们失去联系，十分焦急，曾派人侦察，发现田州一带有敌阻拦，不能通过。面对这种情况，他们估计我主力部队已经撤出平马，但撤到哪去了，不清楚。他们留守百色只有一营的兵力，敌人来犯难以守住，即使能突围出去，也会遭受损失。在此紧要关头，他们果断地决定暂时放弃百色。他们雇了50多匹骡子，带着全部军需物资，安全地撤出了百色。就在他们撤离的当天下午，敌人就打进百色，扑了空，他们保住了军用物资，还带来10万小洋，解决了部队的经费困难。我们与留百色的部队会合后，当天一起离开燕洞。下午3时许，部队进抵恩隆县亭泗地区（今属巴马县）时，敌蒙志仁团衔尾袭来，一场遭遇战随即展开。天阴沉沉的，细雨

罪罪。我军迅速展开，占领有利地形。敌人队伍不断增加。因我军连续 20 多天行军作战，极度疲劳，一时处于劣势。李总指挥用望远镜观察敌情后，对我们参谋人员说：“快告诉前面部队，后面来的敌人是老兵队伍，要多加注意！”过了一会，从左侧来人报告：“敌人约有一个营，从我左侧而来，像迂回的样子！”这时，我军的主力在正面迎击敌人，没有预备队，李总指挥身边只有一个特务队（警卫队），即一个连，加之带有军用物资，故很着急。李总指挥沉思片刻，便对政治部黄一平科长说：“你带几个兵去左侧山上，向敌人打几枪他们就不敢来了！”

黄一平带人走了约有十几分钟，派人回来报告说：“向左侧敌人打了几枪后，敌人便缩进村子里去了！”

我听后很奇怪，为什么在左侧打了几枪，敌人就不敢出来？为什么总指挥料得这么准？后来李总指挥解开了我心中的疑团。他说：“敌人主攻在正面，他们藐视我们，求胜心切，想从中央突破，左边的只不过是佯攻，企图分散我们的兵力。当敌知道我们有人防守之后，就不敢来攻了。”

正面进攻的敌人像蛆虫，密密麻麻地爬了上来。我军居高临下，把敌人打下去一批，又上来一批。不久，驻在盘阳的第 3 纵队，组成一支敢死队赶来增援，几次正面冲锋都被打退。

这时，一个开花子弹嗖地从我们头上飞过，大家吃了一惊。只见李总指挥脑袋侧歪了一下，本能地躲开这粒子弹。他急中生智，抬起右手随着向右边一指，说：“那是什么？”

我随即转过一看，什么情况也没有。这时，我才悟出他这个动作的含意，不是惊讶，而是提醒人们观察敌情。更主要的是，表现了一个指挥员，在战场上沉着冷静、临危不慌的气质和风度。由于李总指挥亲临前线巧妙指挥，使敌人正面进攻损失惨重，死伤 400 多人。

激战几个小时后，李总指挥看到前方敌人行进时队伍整齐，步伐不乱，随即下令：“告诉前方，来的是正规部队，不要死打，逐步掩护撤退！”我军在入夜前撤出战斗，顺利通过山口到达凤山县的盘阳区赐福乡，而敌人亦不敢追击。赐福，地处东兰、凤山交界处，是著名的西山山脉的余脉。这里山多、石多、土地少。举目四望，周围几百里，峰峦重叠，山深林密，道路崎岖，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同时，这个地方是革命老根据地，群众基础较好，农民武装和乡政权已建立起来，故军部决定在这里休整。

威震桂黔边

3月上旬，红7军在赐福休整期间，前委在盘阳开会，会议由陈豪人（代理前委书记）主持。

会上，总结红7军成立两个多月来的经验教训，分析敌我形势，讨论开展游击战的指导思想和今后的行动方案。会议认为：根据右江地区形势的变化，目前尚不是收复右江沿岸县城的时机，不能与敌人硬拼，应摆脱敌主力，把我军主力拉到外线游击，既可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解决给养和弹药的补充问题，又可分散和减轻桂系军阀对右江根据地的军事压力，待会合红8军之后，则向湘粤边界发展。3月底，军部率第1、2纵队3000余人从盘阳出发，踏上游击桂黔边的征程。第3纵队留在东兰、凤山一带，坚持根据地斗争，保卫后方，并设法与红8军取得联系。后方工作由中共右江特委负责（书记雷经天）。经过短期休整后的红军指战员，顺利渡过了汹涌澎湃的红水河后，向与贵州毗邻的河池进发。河池县只有少数民团和地主武装驻守，他们听说我红军主力到来，不战而逃，我军兵不血刃地占领了县城。在这里，我们开展了政治宣传工作，发动群众，帮助当地成立了农会、工会、妇女会和县革命委员会。

4月初，我们离开河池，几天后，进占怀远镇。怀远是一个有六七千居民的桂西商业城镇，市面比较繁荣。由于我军大力宣传和正确执行党的各项政策，注意保护城市工商业，受到各界的拥护。我们在怀远筹措了几万现洋，使部队得到必要的给养补充。部队在怀远镇驻了3天，于3月19日向思恩进发。我们刚到思恩第二天早上，天才蒙蒙亮，猛然，驻地周围响起了密集的枪声，桂系军阀杨腾辉师追击来了！在此突变的紧急情况下，部队立即投入战斗，暂时阻挡了敌人的进攻。军首长站在村边一棵大树下，用望远镜向四周观察，看到敌人后续部队不断地增加，考虑到我军无险可守，仓促应战，又无援兵，故决定：趁敌人进攻被阻，其后续部队尚未到达之际，用号音指挥第1纵队向西撤退，军部率第2纵队向北撤退，这既可避免行军拥挤，又能互相策应，分散敌攻势，而且总的行动目标在桂黔边开展游击战争早已明确，第1纵队会绕道向预定方向行动的。杨腾辉师原是李明瑞的部属，他们看到我军撤退后，慑于李明瑞和红军的威名，不敢继续追击，只是在后面装样子鸣枪“欢送”而已。

第1纵队按照军部命令，往西沿着崎岖的山路，转向东兰县境，尔后经那地，出南丹，进入贵州省界。军部率领第2纵队，往北经过几天的艰苦行军，到达了宜北县，休整两天，部队又沿着崎岖的山道，穿山越岭，进入贵州省荔波县境，这里陡峭鳞峒的大山，云雾缭绕，时而下起毛毛细雨，直到中午，太阳才渐渐驱散浓雾，洒下淡淡的柔光。顿时，山山**峩峩**，积翠凝蓝，青翠欲滴。一进入荔波县境，在那郁郁葱葱的田野上，在潺潺流水的小溪旁，在姹紫嫣红的半山腰间，随处可以看到一片片“鲜花”，油绿色的嫩叶，衬着鲜红的、淡红的、紫蓝的、洁白的花瓣。有些是单瓣的，有些是复瓣的，像玫瑰又似芙蓉，千姿百态，争艳怒放。在一簇簇花朵间，和花一般美丽的彩蝶上下飞舞，真是迷人！然而，这里的人大都是弯腰曲背，骨瘦如柴，脸色蜡黄，鹤衣百结。他们常伸着双手，打着呵欠，委靡不振。

原来，田野的美丽“鲜花”就是那罂粟花！那些可怜的人们，正是吸了这些罂粟花毒汁而衰弱，连小孩、女人也是同样叼着竹制的烟管，深受其害。看到这些，战士们欢愉的心情消失了。在旧中国，贵州是鸦片烟的主要产地

之一。俗称“黔土”，据说仅次于“滇土”。自英帝国主义向中国输入鸦片以来，国人中毒之深，是难以形容的。这里几乎男女老少都吸毒。若是小孩哭了，大人总喜欢喷小孩一口烟，孩子便安静不哭了。

于是小孩养成抽鸦片烟的坏习惯，可见中毒之深！这里的风俗也特别，凡是说媒的，不问对方家里有多少财产，而是问有多少支烟枪，因为烟枪的多少可看出对方财产的多少。这里的旧军人，每一个官兵都有一支步枪、一支烟枪。打仗之前，这些大烟鬼们，吞云吐雾，过足了瘾之后，才一股劲地上阵打仗。战斗打响以后，只要有间隙时间，就有人偷偷溜到后边几步远的地方躺着抽起烟来。

凡是前进或后退，他们首要的任务是随身的宝贝——烟枪、烟灯收拾好才肯走。有的带着烟炮丸子，以备来不及抽时吞服。在封建军阀长期统治下的贵州，弄得民穷财尽，在群众中流传有“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民谣。经过几天的艰苦行军，我们来到了荔波县茂兰区。

听说前面约 15 公里处有队伍，不知是红军还是白军。军首长估计是第 1 纵队来了，但不能断定，于是龚参谋长把我叫去说：“莫参谋，你是共产党员，现有一项重要任务交给你。”龚参谋长望着我，神色严肃地说：“听说离此地不远的板寨，来了一支部队，可能是我们的 1 纵队，也可能是敌人，现不能断定，决定派你去侦察。这是一件重要而危险的任务。现给你 50 块大洋，以备急需之用。再给你配一个老乡带路，你马上换上老百姓的衣服，徒手赶路。咱们部队还得继续向前走，你完成任务后追赶队伍，万一失掉了联系，就得由你自己灵活处置了。”我听后感到的不仅任务光荣，而且是军首长的信任。

心想只身一人去完成这项任务，遇险牺牲我倒不怕，就怕情况突变与部队失掉联系，找不到部队可就惨了。但当我想到这是对一个共产党员的考验时，便信心十足地回答说：“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首长信任地看着我，拍拍我的肩膀笑着说：“收拾一下就出发，祝你成功！”我换上了便衣，包上了头巾，戴上斗笠，还拿着一根竹棍，装扮成一个赶路老乡，又把 50 块大洋捆在腰里，便和带路的老乡一起上路了。我对老乡并不了解，为防止意外情况发生，我和他一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一前一后，老乡在前，我尾随于后，沿着曲折蜿蜒的山间小道疾步赶路。一路上，我表面上漫不经心地赶路，却认真地观察周围的动静，时时准备应付突发情况。快到板寨村的时候，我的神经格外紧张起来，思考着进村的方法。本来，15 公里路并不算太远，但由于走的急，精神又紧张，故额上早已沁出了汗珠。我和带路老乡约定：他先进村去，我在村口等候，若村里驻扎的是红军部队，老乡就向村外招手；若发现村里是白军，他就向村外摇手。这位老乡是当地人，情况熟悉，不易引起人们的怀疑。他满口同意此方案，便放开步子大大方方往村子里走去。我站在离村口半里远的田埂边，望着老乡远去的背影，心里暗暗揣测着即将出现的各种情况。我抹抹额上的汗珠，眼睛盯着板寨村口方向。

时间过了半个小时，仍不见老乡的影子。我的思想更加紧张起来，思索着应急办法。又过了 10 多分钟，正当我焦虑不安的时候，带路的老乡终于在村口出现了，我的心一下子怦怦跳了起来，瞪起眼睛紧紧盯着他。只见他高高举起双手，用劲向我招手。

我乐坏了，立即向村里跑去。进村后，我见到了第 1 纵队长李谦同志，简要地向他报告军部和第 2 纵队的情况及我的来意。他紧握着我的手，兴奋

地讲述该纵队分开后的情况，并说他们也迫切盼望与我们会合，已派出侦察人员去寻找我们。李纵队长立即集合队伍，正要率队出板寨迎接军部和第2纵队，这时，李总指挥和张军长在第1纵队侦察人员的引导下，已率队赶来了！两个在战斗中离散的纵队会合了，指战员们欢呼、跳跃。小小的山寨沸腾起来了！李总指挥、张军长在李谦纵队长陪同下，说说笑笑，走进了第1纵队部。

在纵队部里，军首长高兴地对我说：“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出色，红7军两个纵队会合你是有功的。”

龚参谋长也微笑着对我说：“你现在可以回参谋处了，好好招待一下那位带路的老乡。”我又回到参谋处，把分文未动的50块大洋，如数交还了会计。

两个纵队会合后，前委作出了新的行动决定——穿过大苗山，向榕江进军。大苗山，是苗族同胞聚居的区域。这里山连山，连绵百里，人烟稀少。多年来，由于国民党军阀和汉族地主的搜刮、抢掠，造成苗、汉对立。苗人有自己的酋长，一般不和汉人来往，也不准外人进入苗寨，否则，刀枪相见，坚决反抗，敌对情绪很重。

4月下旬，我军初进入苗山时，苗胞们对我们不了解，都跑光了，家家户户房门紧闭，沿途给我们留下了一座座空空的村寨。他们大都持着武器，聚集在村寨附近山顶上，监视我军的行动。我军懂苗语的同志向苗胞们大声喊道：“我们是工农红军！”“红军是爱护苗胞的军队！”“红军是打国民党反动派的，请不要害怕！”我们反复宣传，但苗胞们对我们仍有戒心，不肯下山。这时，面临的紧迫问题是：长途跋涉的红军指战员，得不到粮食，饿得饥肠辘辘。如何解决给养？如何通过数百里的大苗山区？为此，军政治部作出决定：一是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耐心向群众做宣传解释工作；二是严格遵守群众纪律，由各单位统一征集住户的粮食、猪和青菜，按汉人区的市价给钱，分文不少。

我们按此决定，在哪里征集了东西，就在哪里留下银元，并留下字条，写明征集给养的原因、数量和留下款项的数目，同时放进宣传我军宗旨和我党民族政策的传单。有的猪跑到外面分不清是谁家的，我军征集后就贴出布告，说明买了外面这些猪的数量和重量，请主人到部队领钱。经过一系列的工作，解决了部队的给养问题，又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和我军的群众纪律。次日，部队继续前进。

苗胞回到家中，见到红军留下的大洋和字条，有些识汉字的苗胞把字条逐字、逐句翻译给其他苗胞听，他们听后才打消思想顾虑，对红军产生了好感，互相奔走相告，传来传去，很快地把红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的感人事迹传遍了苗山。他们开始认识到红军和国民党兵不一样，红军是苗胞的朋友。此后，红军每到一处，苗胞们再也不惧怕红军了。有的拿出食物来兜卖，我们用大洋和他们平等交易。

李总指挥、张军长和陈主任等亲自做苗民酋长的工作，赢得了当地头人的信任。当我军进行筹粮时，酋长登高一呼，山鸣谷应，不一会儿，各家各户都纷纷用背篓背粮食交给酋长。苗胞们不仅主动卖给我们粮食、猪肉、青菜，还热情地给我们带路，帮助开路架桥，抬担架，有的还主动要求参加红军。在苗胞的热情帮助下，我们经过7天阴雨中的艰苦行军，终于穿过了横亘百里的大苗山区，于4月29日，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距榕江县城6公里地

的一个小村寨驻扎下来。那些只知整天吞云吐雾抽大烟的黔军，做梦也想不到红军能穿越苗山来到他们跟前。傍晚时分，前卫部队抓到两个形迹可疑的人，送到了军部。经审讯，他俩是榕江县城守敌史远勋部派出来的流动哨兵。

据这两个家伙提供的情况，贵州军阀与湖南军阀正在湘黔边境混战，王家烈把几乎全部兵力开到前线去，榕江县城内只驻有黔军第25师副师长史远勋率领的1个团，其兵力不过600人，另民团60人，法警20人。针对这一情况，军部决定出敌不意，翌日攻城。榕江县城，是黔东南一个有两万人口的大城镇，是贵州军阀王家烈的后方供应地，城里囤积着许多武器、弹药及军需物资。其城墙系大石垒砌，又高又厚，甚为坚固。城西北面是一座土岭。东面是榕江河，由北向南流去，整个县城依山傍水，地势于我攻城十分不利。

4月30日清晨，梅雨纷纷，白雾茫茫。我军穿过浓雾，沿着崎岖的山路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榕江城下，随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城外守敌发起猛烈攻击。敌不支，纷纷退入城内，关紧城门死守。开始，敌人对我军情况一无所知。当我军突袭其城外守敌时，他们还以为是“土匪”骚扰，毫不介意。后来，看我军攻势猛烈，方知情况不妙。但对我军到底是什么部队，从什么地方来的，仍摸不清。一个猴子模样的黔军小军官，带着一伙士兵，站在城头上，操着一副公鸭嗓问：“你们是哪部分，从哪里来？”“从广西来，快开城门！”红军战士大声地回答。这家伙见阵势，听口音，看出了门道，知来者不善。

于是，他嬉皮笑脸地说：“我们都是邻居，请不要误会，你们需多少油盐柴米和猪肉，我们如数送去。”

我们知道这是敌人搞的缓兵之计，大家回想过苗山区时苗胞对他们的血泪控诉，故忿忿地说：“你们别想得那么便宜，尝尝我们的厉害吧！”我军攻城战斗开始了，正面由第2纵队担任主攻：第1纵队第1营涉水抢占城后山头，截击企图从城后溜出来夹击我军的敌人。

1营营长何莽和教导员黄一平率领该营刚占领了城后的山头，果然，敌人从城内窜出来，企图夺回山头。已近晌午，硝烟代替了浓雾。我1营战士从正面和侧面向敌人发起猛烈的反冲锋，给这些骨瘦如柴的“双枪兵”以迎头痛击。敌人连续发起几次冲锋，被我1营击退。

与此同时，李总指挥和张军长率领主攻部队在正面打响了。英勇的红军战士向城南城墙缺口处冲去，猛烈地冲击着这座古老而坚固的城堡。枪声、炮声、号声、喊杀声，响成一片。但我军缺乏攻城器械，子弹不足，几门迫击炮的炮座尚未运来，只好把炮筒捆在树上打，轰隆隆的炮声只能壮壮军威，却打不准。加上部队是陆续到达的，随到随即投入战斗，无法组织坚强的突击力量。故连续攻打3个多小时，发起几次冲锋，城墙尚未攻下。

此刻，一个严重的问题摆在军首长面前：继续攻城，还是收兵？若继续打下去，敌人已有了准备，边打边加强工事，由开始的偷袭，变成打硬仗；如果不打，问题更大，一二百名伤员无法处理，弹药得不到补充，以后作战会发生更大困难，部队的情绪也会受到影响。怎么办？李总指挥和张军长来到前沿阵地，仔细观察敌情，并征求龚参谋长和李谦纵队长等同志意见。而李谦正指挥第1纵队攻打县城东南门。龚楚率第2纵队在攻打西门。我随他在西门外。龚参谋长即口授报告给李总指挥和张军长，主张坚决打下去，认为我军的数量和士气处于优势，只要做好准备，是可以攻下县城的。我写好报告后即派传令兵送去。过了一会儿，传令兵回来说，李谦纵队长也坚决主

张打，并强调非攻下榕江城不可。军部根据龚参谋长和李谦纵队长的建议，作出了继续攻城的决定。

于是，一个响亮、鼓舞士气的口号提出来了：“攻下榕江城，庆祝五一劳动节！”重新攻城的命令下达后，政治工作人员加强了对攻城部队的政治宣传工作，部队士气更加旺盛；指挥员细心选择登城突破口，重新制定作战方案；重新准备登城的云梯、大竹钉等器械。城外的各族群众也给予热情支援和慷慨奉献。在前沿阵地上，掩护攻城的迫击炮、机关枪，都已安置在离攻击目标几百米的地方；攻城部队也埋伏在攻击出发地，重新攻城战斗已准备就绪。

下午4时整，“轰！轰！轰！”一连3发迫击炮弹向城中射去，这是发起攻城的信号。即刻，我军的机关枪、步枪一齐向城堡猛烈射击。攻城部队随着密集的枪炮声，如同猛虎下山般跃出掩体，扛着云梯、大竹钉，迅速向城墙缺口处爬去。敌人的火力也集中向着我攻城部队，整个山城淹没在浓浓的硝烟之中。由于城墙太高，敌人居高临下，我军爬墙仰攻，不少战士刚爬上去一半，便人仰梯翻，伤亡不断增多，攻城部队只好退了下來。这一次攻城虽没奏效，但没有挫伤红军的锐气。战士们的双眼射出愤怒的光芒，狠狠地说，非入城宰了这帮狗崽子不可！李总指挥的心里也燃起不可遏制的怒火，额上冒出豆大的汗珠。他把烟斗放到衣袋里，回转身，从特务队（即警卫连）抽出12名参加过北伐的老战士，组成登城突击队。他坚定地对战队员们说：“我军能否在天黑前攻入城内，关键看你们这些勇士，军部信任你们，祝你们马到成功！”

明天，我在城里给你们敬酒祝贺！”攻城开始了。我军首先用机枪、迫击炮横扫和轰击敌人的火力点。在我军强大火力掩护下，突击队员们，带着长竹梯和大竹钉，猛虎似地跃出战壕，冒着枪林弹雨，一股劲冲到城墙下，有的架上竹梯，有的用大竹钉钉进城墙的砖石缝中，再踏着竹钉往上攀登。敌人加强火力封锁，拼命向攀登在城墙上的突击队员猛烈射击。一个倒下去，又上去一个。好在城墙年久失修，缺口较多，突击队员们敏捷地攀登上城头，与敌展开肉搏战。接着1连长杨光也爬上城头，使劲地挥动着火线红旗。许多攻城战士都相继登上了城墙。“烟兵”纷纷溃退，城门终被打开，我主力部队洪水般涌入城内。扼守在城外后山头的第1纵队第1营，也在同敌人进行着激烈的战斗。

他们已击退敌人的多次进攻，现在，敌人又发起第8次攻击，但其正面防线已被我军攻破，他们无法稳住阵脚，慌忙从半山腰往回撤，妄图回城救援，但已晚了。1营指导员黄一平把手一挥：“冲啊！”全营指战员使冲下山，敌人遭我军前后夹击，无路逃遁，纷纷缴械投降。至下午5时许，我军占领了榕江县城，鲜红的红7军军旗，插上了榕江县城。在攻城战斗中，连长杨光等同志英勇牺牲，特务连连长李天佑也在攻城中负伤。鲜血染红了红7军的战旗。

榕江战斗，歼敌500多人，缴获步枪、机枪600多支，子弹10万多发，山炮、迫击炮数门，无线电台1部，还有大批军用物资，是红7军成立以来打的第一次大胜仗。

在这次战斗中，苗族群众也奋不顾身地支援红军。他们送来竹梯和竹钉。妇女背着小孩子给我军送水、送饭；冒着枪弹到前沿抬担架；掩埋红军战士遗体。榕江战斗的胜利，是和人民群众支援分不开的。到了第二天上午10

时，细雨初雾，云消雾散，天空中露出火红的太阳，照耀着雄伟壮丽的榕江古城。在县城小学的操场上，红旗招展。红7军在这里召开庆祝“五一”节军民联欢大会。我军指战员和县城各界群众近万人参加了大会。会上，陈豪人主任作了重要讲话，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红7军的宗旨、任务，是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打土豪分田地，建立一个没有压迫、剥削，各民族平等的新社会。接着，军部宣布把没收来的衣服、粮食分给贫苦群众。这时，会场沸腾起来，许多人说从没有见到这样好的军队。开始分发财物时，有的人不敢上前领取，后看见有人拿了，才纷纷挤上去接。人们脸上堆着笑，都伸出大拇指，感谢红军，称赞红军才真是“乾人”的队伍。有不少青年，坚决要求加入红军。正在湘黔边境进行军阀混战的王家烈，得知后方“仓库”失掉了，惊恐万状，连夜从湖南调军回援。这时，我军已在榕江县城休整了3天，筹得了几万元军饷，补充了几十名自愿参军的新战士，达到了游击桂黔边的预期目的，故军前委决定：分水、陆两路，迅速撤出榕江，回师右江革命根据地。

5月4日，我军主力部队沿河北岸疾进，少数部队沿河南岸前进，伤病员及辎重物品安顿到50多艘大小帆船上，由西向东，顺流而下。我军水陆并进，走了5天，到了广西边境的富禄镇。这时，王家烈率4个主力团从北面追来，并派人送一信给李总指挥，其大意是：贵军到敝省，事前不知，引起误会，尚请见谅。闻贵省大炮甚多，此武器乃敝省少有，电台又为蒋总司令赐给，敝省只有两部。贵军对此笨重之物，亦无用处，万望归还，免伤和好，不胜庆幸等等。军前委研究，为避免与王家烈决战，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决定将计就计，答应次日归还大炮、电台，以缓其军，同时命令部队连夜渡河，把带不走的大炮、电台等笨重物资沉入河中。次日拂晓，王家烈率部追来时，我军已渡过富禄河，黔军想过河追赶，但无船可渡，只好望河兴叹，隔河鸣枪“欢送”我们。

在贵州期间，我工作很忙，每天了解敌情、地形，布置警戒，传达命令，还要坚持写行军日记，因这是我的职责。

有一次，我蹲在路旁写着，军政治部主任陈豪人看后问我：“莫参谋，你不休息，还在写什么？”

我回答说：“写行军日记”。

他又问：“你经常写吗？”

我说：“从我担任军部参谋起便坚持写，从没中断！”

他笑着说：“好！日后革命成功了，你拿到上海发表，可有价值呢！”龚参谋长也经常查阅我的行军日记。

可惜，我后因工作变动把此日记移交给参谋处长钟鼎，故没能把它保存下来。

尽管如此，红7军这段威震桂黔边的光辉历史，永远铭刻在红军战士和桂黔各族人民的心中。

回师右江

我军南渡富禄河后，继续向广西的宜北挺进。

南方的5月，已是炎热逼人。大家背着沉重的武器弹药和背包，翻越崇山峻岭，个个汗流浃背，像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

攻克榕江县城时，虽缴获不少军需物资，但衣服、鞋子却很少。部队的穿衣、穿鞋问题并没有解决。许多人没有鞋子穿，我什么东西也没有补充，也没时间去买草鞋。离开富禄后，我只能赤着脚行军，踩在滚烫的石板上，一股人的热气从脚底直钻到心里，有时跳着走，一不小心，还被石硝刺破了脚，鲜血直流。加上在榕江筹了几万元，分配每个军官带50元，身上的背包更沉重，走路更困难。尽管这样，大家都咬紧牙关赶路，情绪很高。

一天，到了宿营地，我向苗胞买了一双竹壳做的竹鞋穿，这东西坚硬而锋利，脚被竹壳刺得钻心的痛，走了一天，竟磨伤了几处，于是，我把它甩掉了，还是赤脚走路。

走了几天，部队到达宜北。这是我军第二次路过这个县城。第一次到这里时，当地群众因受敌人的欺骗宣传，逃避一空。后看到我军的纪律好，态度好，加上我们的宣传工作，群众很快消除顾虑，主动与我军接近。这次，我们重返宜北，群众像接待亲人一样热烈欢迎，还召开了千多人群众大会，不少青年报名参军，我们的队伍又壮大了。我在这里买到了草鞋。

离开宜北，往思恩的路上，杨腾辉率部来袭击我们。那天早上，军直属队正集合准备出发，突然，驻地的山上响起枪声，敌人向我直属队冲下来，直属队正向集合场地开进，被打散了。李总指挥和张军长都在与敌接触中，觉得情况危急。张军长立即对我说：“莫参谋，你快通知第1纵队赶上来！”这时，第1纵队正驻在离军部后面好几里远的地方。我接受任务后，只身向第1纵队驻地跑去。周围是白区，我把手枪上膛，边跑边观察周围的动静。跑了二三里路，看到前边一支队伍跑步而来，一看，正是李谦率领的第1纵队，他们是听到枪声后赶来救援直属队的。我把情况向李纵队长报告后，他坚定地说：“快！非狠狠教训姓杨的不可！”我便随第1纵队向枪声方向跑去。刚打了胜仗的红军战士，士气正旺，只一个回合，便把敌人击退。1纵队要乘胜追击，军部首长说：“不追了，赶我们的路！”

5月中旬，我军经思恩，第二次进入河池县城。前委根据右江地区的实际情况，决定利用粤桂军阀仍在混战之机，回师右江，恢复右江沿岸各县政权，深入土地革命，发展壮大红军力量，然后再向外发展。我们从河池经大山塘、金洞、长老、三旺、安娄，西渡红水河，来到东兰县城驻了约5天，后到武篆。这是韦拔群同志的故乡。早在20年代初期，韦拔群便在这里领导东兰、凤山一带各族农民开展反对豪绅地主的斗争，最早建立了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东兰县成为广西农民运动之先，韦拔群成为广西之彭湃。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时期，韦拔群仍率领农民武装坚持武装斗争。红7军成立后，武篆成为第3纵队部所在地。

我们来到武篆，像回到了家一样，群众杀猪宰羊，送茶送水，热情慰问和关怀子弟兵。

6月初，我们从武篆经甲篆、所圩向百色进发。途中，遇驻百色的广西警备第4团团团长岑建英派往风山县“进剿”的两个连及部分民团武装，李总指挥和张军长即命令部队歼灭这股敌人，共毙敌百多人，打了一个漂亮的前哨仗。

接着，我军马不停蹄，分兵3路，直抵百色。

百色，这个英雄之城，右江地区革命中心又呈现在我们面前，大家该有多高兴啊！收复失地的急切心情鼓舞着每一个指战员！

百色城，没有坚固的城墙，只有一些短墙、鹿砦、小碉堡，而且有一处通道没有堵塞。此时，驻守该城的有岑建英1个团和税警团、民团武装共700多人。敌人在城的周围和城外的重要高地，都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和明碉暗堡，到处设置了火力网。特别在城北险峻的长蛇岭上，修筑了一个牢固的碉堡，以1营兵力据守，居高临下，控制着整个山城。拂晓，红7军像急风骤雨般分3路向百色发起猛烈攻击。

瞬间，炮声、枪声、号声和喊杀声，震撼整个山城。城外各山头阵地变成了烟山火海。担负从东南面进攻的第1纵队，从羌园坡刚冲入南阁亭，守卫在附近浮桥一带的税警和民团武装，乱放了一阵枪后，便弃阵逃窜，该纵队轻而易举地占领了观音堂、大码头、二码头一带阵地。从东北面攻城的第2纵队，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敌人穿插迂回，攻占了一个个山头，扫除了敌人一个个火力点，逼近城区。这时，许多小的碉堡已被我军攻破，唯长蛇岭的主碉堡未攻下。这是岑建英的“核心碉堡”，用钢筋水泥筑成，两层炮楼有守敌40多名，机枪数挺，火力点10多个，形成双层火网，使第2纵队的前进受阻。时近黄昏。如果不能在天黑前攻下主碉堡，敌人趁夜加强工事，我军将会付出更大的代价。军首长冒着敌人的弹雨，来到阵地前观察，认为攻下大碉堡，非用山炮不可，可眼下山炮弹仅剩3发。李总指挥和张军长、龚参谋长决定将1门山炮移到离敌人碉堡约500米的正面山头，改曲射为平射，直接瞄准，以增强射击精度和威力。同时，传令一个排的攻城部队埋伏在距离大碉堡200米的死角处，以便开炮后发起攻击。军首长亲自到前面指挥，我也随他们在阵地跑来跑去传达命令。

第2纵队营长冯达飞带领战士们把一门山炮隐蔽地拖上了山顶。冯达飞是广东连县人，1924年冬在黄埔军校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赴苏留学，曾在莫斯科高级航空学校和苏联高级步兵学校学习。毕业后，再被派到德国炮科研究院将校组学习。1927年冬回国参加广州起义。1929年受中共广东省委派遣到广西，先在张云逸领导的广西教导总队任教官、连长。他军事知识丰富，炮科更是内行。山炮按指定位置架好后，李总指挥亲自走到山炮跟前，测定距离，校对瞄准，然后，他朝大碉堡投去轻蔑一瞥，挥手下令：“开炮！”“轰”的一声，炮弹呼啸着向大碉堡飞去。只见火光一闪，一股烟尘腾空而起，碉堡被豁开了个大口子。

刹那间，漫山遍野响起了欢呼声！接着，又射出第二、第三发炮弹，都击中目标，碉堡被穿了两个大窟窿，敌人一阵惨叫，纷纷溃逃。埋伏在死角处的攻击部队，一跃而上，攻占了大碉堡。我军一鼓作气，分几路突入城内，与敌人进行短兵相接的巷战。这时，夜色渐浓，城里的电灯已放亮。1纵队3营11连，从阁亭入城后，直捣大码头敌据点，活捉了敌营长岑世良，后沿二码头冲入横街，至兴隆桥头时，遭敌桥头堡火力牵制。他们巧妙地爬近敌堡，投去一束手榴弹，趁滚滚浓烟，消灭敌堡内敌人，打通了往较场圩的道路。第2纵队机枪连，从北胜街冲入城内街口时，被敌人的街头堡火力挡住。纵队长胡斌亲自带领两名机枪手，架起机枪向敌开火，在猛烈火力掩护下，机枪连3排长奉命带1个班，绕道爬近敌街头堡，向敌堡投去十几枚手榴弹，随后冲上与敌人展开肉搏战，很快消灭了北胜街守敌。勇敢的红军战士向城

内据点突进。敌人无险可守，乱了阵脚，无力抵抗，争相向那毕渡口逃命。除了一部分当俘虏外，大部分逃过河，向田州方向败退。晚 10 时左右，我军各路攻城部队在较场圩汇合，胜利收复百色城。战斗中，军政治部宣传科长罗少彦同志不幸负伤。

他在战斗紧张时，亲临火线进行宣传鼓动。大炮一响，他站起来，举手高呼：“同志们，冲啊！”突然，一颗子弹飞来，打中他的前额，满脸鲜血。

这次战斗，共歼敌 300 人，缴枪 300 多支，子弹 3 万多发，还有大批军用物资，而我军伤亡约百人。

翌日清晨，百色城头，又高高飘扬着镰刀斧头红旗。全城锣鼓喧天，祝贺百色大捷。百色光复后，释放了一批被敌人关押的红军战士和地方的革命者。

如红 8 军干部潘思文、钟夫翔在凌云县彩架村战斗中被敌俘虏，关押在百色已一个多月。他们被救出狱后，怀着激动心情，立即投入红 7 军行列。我军在百色稍作休整后，便以高昂的战斗激情，挥戈东进，在各地赤卫军的配合下，连续收复了右江沿岸的奉议、恩阳、恩隆、思林、果德、向都等县城，并与东兰、凤山、凌云等根据地联成一片。右江革命根据地又完整地掌握在人民手里。入百色不几天，我的工作有所变动。因第 1 纵队要成立辎重队，军部同意李谦的推荐，要我去任少校辎重队长。我即离开军部，到 1 纵队报到，负责纵队的后勤保障。

一天拂晓，我 2 纵队抓到了似兵似匪的 4 个家伙。他们头戴北伐军式的大沿帽，帽底镶围着一圈红布带，身穿深绿色的军服，口口声声嚷着，要见李师长（即李明瑞总指挥）。他们把这 4 个家伙押送到军部。李总指挥一看，认出是滇军，当中还有一个是军官，便叫战士将其松绑，经他和张军长审问，才弄清是滇军张冲师长派来谈判的代表。蒋桂冯阎的中原大战爆发后，桂系军阀除留少数部队看守广西老巢外，大部分由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亲自带领出师湖南，协同广东军阀张发奎、湖南军阀唐生智部反对蒋介石。蒋介石探悉桂系后方空虚，命令广东的余汉谋从东路进攻梧州；云南军阀龙云从西线进攻南宁。

6 月中旬，龙云派卢汉为总指挥，由师长张冲率领 1 万多人，经贵州之兴仁入广西，拟取道百色，占领南宁，抄桂军的后方，牵制桂军北进。龙云派来的信使，想邀我军和他们一道攻打桂军，我军拒绝参加狗咬狗的军阀混战。鉴于滇军兵力数倍于红军，军前委研究决定：暂让开右江通道，放敌过境，当其大部渡过右江河谷后，斩其尾部，拦截其辎重，以装备我军。

我们在百色休整了 7 天，补充了军费后，便主动撤离百色。滇军进入百色后，又尾随我军向果化方向移动。时值伏夏时节，烈日当空，骄阳似火，大地散发着燃烧似的气息。

部队行军在滚烫的山路上。

为了赶到滇军到来之前到达指定伏击地点，指战员们克服酷热的困难，马不停蹄地走着。第一天到了田州，第二天到达平马镇，第三天到达思林县城。思林，是右江沿岸的小县城，有一条土路沿右江向果化而去，是百色通往南宁的必经之路。

这里，县苏维埃政府已恢复，群众热情地欢迎我军。我们休息了两天。在此期间；军部一方面做好战斗动员，一方面组织连以上干部观察地形，研究伏击方案。我则忙于物资供应的准备和组织群众支前工作。这里的群众基

础较好，纷纷参加送饭、抬担架、送粮草、带路和侦察敌情等工作。第三天，侦悉滇军已到平马镇，我军连夜行军，1纵队隐蔽在离思林15公里的平马镇背后山地；2纵队则埋伏在思林东面往果化的山坳上。这里只有一条山路通往果化，东靠大山，南临右江，大山与长河之间，有一道地势险要的山梁，名叫鹧鸪坳，居高临下，易守难攻。我军到达鹧鸪坳的第二天下午，气焰嚣张的滇军，迎着烈日终于大摇大摆地向鹧鸪坳走来了。滇军和黔军一样，每人背有两支枪，长的是打仗用的枪，短的是大烟枪。鸦片烟成了他们不离身的必需品。他们的训练是法国式的，军事技术和纪律性较好，装备正规，一律法国式步枪，他们的长处是防御。这次遇到了善于进攻的红7军，算是棋逢对手了。滇军也鬼得很，他们走近鹧鸪坳时，发现地形不利，怕被人伏击，立即散开队形，两行并排走，缩短前后距离，并向山坳上发炮，火力侦察。我军沉住气，不予回击。滇军见无异常，便拖着疲惫步伐，慢慢向山坳挪动。夜幕降临了，在通往山坳口的蜿蜒曲折小道上，亮起了无数点点的小火光，犹如若明若暗的萤火虫一样。

晚风吹来。送来了阵阵奇特刺鼻香味。这是滇军在点烟灯抽大烟。他们个个都是大烟鬼，没有过足大烟瘾，打仗也没有劲。“啪！啪！啪！”东边的山腰上，3发红色信号弹在夜空中升起！第2纵队响起了冲锋号，红军战士跃出阵地，向滇军发起猛烈攻击。顿时，漫山遍野的号声、喊杀声、枪炮声交织在一起。

正在吞云吐雾的滇军，遭我突袭，被打得晕头转向，人仰马翻，其长长的队伍，被我军拦腰斩断，首尾分离。我军首次出击，旗开得胜，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骡马、轻重物资。那些骨瘦如柴的滇兵，被打死的还紧紧抱着烟枪；没有被打死的，宁可扔掉枪支，也要抱住烟枪逃窜。

第二天，天还未亮，敌人已过浮桥的前头部队突然掉转回头，过河向我军阵地猛烈反击。敌人用山炮、迫击炮疯狂地向我军阵地轰击后，便一队队、一排排发起轮番攻击。这帮家伙很骄横，凭其人多装备强，打仗不利用地形，而是像欧洲古战场上的队形一样，端着法国步枪，直挺挺地，迈着大步向我阵地压来。我军埋伏在阵地的工事里，等待敌人上来送命。

敌人越来越近了，30米，20米……“打！狠狠地打！”随着反击命令的下达，一排排手榴弹在敌群中开花，一阵阵排子枪横扫过去。我军居高临下，火力猛烈且集中。敌人就像被砍倒的树木一样，一排排地倒下去，又一排排上来，其队伍中间被我军打开了缺口，立即两头又合拢上来，又被我军击退。

敌人虽再次失利，但并不死心。他们从河对岸调来一个旅，与我军展开了激烈的阵地争夺战。这时，我军虽把敌人压到了河边，但也难以前进了。原来，我对滇军估计不足，以为只要投入一个纵队，把敌人的尾巴吃掉就算了，没想到，仗一打起来，不能速战速决，被敌人纠缠住了，加上敌众我寡，双方进入对峙局面。

为了迅速扭转这一局面，军部命令第1纵队立即增援。我纵队跑了10多公里山路赶到投入战斗，从北面山头向敌人压过去。我带领辎重队人员，穿梭于火线内外，保证了部队的给养和伤病员的转送。滇军见我援兵赶到，但不知有多少兵力，纷纷向河边浮桥退去。桥窄人多，不少滇军在拥挤和慌乱中掉下河去。

这时，太阳已下了地平线，山谷中的岚风带着浓重的硝烟，向山下游荡。

军部首长见我军伏击目的已达到，便命令部队趁机撤出阵地，滇军也急于向南宁推进，无心恋战，改道渡河沿右江往果化方向开去。这一仗，毙伤滇军五六百人，其中击毙其团长一人，重伤一个特务营长，缴获步枪400多支，军马10多匹，子弹2万多发，烟土几十担。我军也伤亡约500人。当初，骄横的滇军看不起红军，把我军看成是一群没有经过正规训练的农民队伍。这一仗教训了他们，据说不少滇军士兵寄回云南的家信说，红军作战勇猛，低估他们的战斗力会吃亏的。当时看来，针对滇军的嚣张气焰打它一下尾巴，给它一个下马威，是可以的，但从斗争策略上考虑，当时应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乘机来发展和巩固革命根据地。如滇军打败桂军，滇军暂时统治广西大城市，我们仍然可以在小城市和乡村活动，扩大苏维埃区域；如果桂军打赢滇军，双方要花出很大代价，我们再趁滇军溃退时截击其辎重或消灭它，就比较容易了，损失也会少。这说明处于初创时期的红7军，对于利用敌人矛盾打击主要敌人，发展革命力量，还缺乏经验。我军撤出战斗后，回师平马镇。本想恢复滇军过境后被岑建英重新占领的百色，但途中遇第2纵队第1营突然叛变。

原来，该营位于距离纵队部30公里处，担任向百色的警戒任务。这个营的1连长是兵痞，经不起红军艰苦生活的考验，早欲图谋不轨，便趁远离纵队部之机，勾结少数人，将营长和副营长杀害，挟迫队伍向百色方向逃去。

根据这种情况，军前委决定利用滇桂军阀在南宁混战之机，部队集中在平马一带整训。平马，是右江苏维埃政府和中共右江特委的所在地。早在大革命时期，当地的工农革命运动蓬勃开展，右江地区第一个党组织——中共恩奉特支（亦称田南支部）于1926年在平马所在的恩隆县建立，国共合作的广西省党部农民部田南道办事处（中共党员陆炳堂任办事处主任）也设在平马镇。故其群众基础较好，党组织力量较强。这时，滇军与桂军正在南宁厮杀，平马远离南宁，周围没有敌人重兵，他们还抽不出兵力对付我们，这对我军集中整训十分有利。按军前委的部署，全军的整训从总结经验教训入手，通过首长作报告，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有关文件指示，检查过去的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全军指战员进行一次政治思想教育、组织纪律教育和军事技术教育，以提高全军指战员的军政素质。

为了加强军队和地方党组织的建设，军前委曾对有关健全党的组织系统、健全组织生活、实行党内民主化、培训党的干部等问题发出指示，在部队中健全各级党组织系统，纵队设纵队委，营设营委，各连队设支部；健全政治工作制度，各级设有政治工作机关和政治工作人员，纵队设有政治部主任，营和连设政治委员。同时，组织全体党员学习《党员须知》，对党员进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和政治理论教育。军前委还在平马举办了一期教导队和两期党政干部训练班。教导队设3个区队，每区队分3个班，共有学员百余人。

学习课程有政治课、军事课和文化课。内容有土地革命、武装斗争、苏维埃政权、帝国主义及目前形势等问题。党政训练班每期学员50多人，学习的主要内容是土地革命的意义和政策、苏维埃的组织和任务。通过举办各种类型学习班，为军队和地方培养了一批各族骨干，如韦国清同志就是其中之一。

军事训练上，组织指战员学习军事知识和战术训练，当时，要求军队各级干部做到三会：一会带兵，二会打仗，三会拼刺刀。各部队抓紧时间，苦

练杀敌本领。每当清晨，平马郊外练刺杀、投弹、射击、爆破，练攻防战术，一派龙腾虎跃的练兵景象。整训期间，红军的生活是很艰苦的。从榕江带来的款项已用完了。除粮食有保证外，每天每人连2两肉、2分钱菜的菜金也难以维持。

这对我这个理财新手，真是感到有些难办。一天，纵队长李谦把我找去，他很关心部队的伙食困难，拿出一张从香港带来的50元的香港纸币说：“请你把这张港币换成现洋，作部队的伙食费。”我接过一看，纸币上浸有血渍，这是他在隆安战斗中负伤时染上的。我心里一阵感动，黄埔军校出身的李纵队长，16岁入党，参加过北伐，屡立战功，被擢升为团长。1929年，被党中央派到广西从事革命武装斗争。他担任红7军第1纵队长后，身先士卒，勇猛过人。他负伤后，从不要求任何照顾，现在，又把自己染着血渍的钱拿出来，补贴部队的伙食费，让我这个辎重队长实在过意不去。

李纵队长看我犹豫的样子，性急地说：“怎么？还考虑什么？快点拿去吧！”

“李纵队长，你还是留着这个钱，伙食钱我另想办法。”

为了说服他，我又摆出理由说，“港币在这里难以兑换，何况，港币上还有血渍，别人不会要的。”

他睁大了眼睛，像要发脾气样子，不大高兴地说：

“拿去吧，你想点办法就是了！”

他看了我一眼，口气又稍为缓和下来说：“我留着这张纸币也没有用处，你拿去试一试，若作不了50元，就作40元也可以，战士生活要紧呀！”

我知道这位耿直得被称为“张飞”的纵队长，真的要发起脾气来也是不好办的，只好把港币接过来。

离开李纵队长，我望着手里这张染有血渍的港币，越发感到为难起来。想来想去，只好到军部经理处找叶季壮处长商量，叶处长考虑了半天，最后他下决心，把经理处仅有的100元大洋拿了出来，给我纵队作伙食费。

问题解决了，我高兴地把港币还给李纵队长，并恳切地说：“军经理处已帮助解决了伙食费，你的港币不用再换了，你留下吧！”

他反复问我伙食费是否真正解决，军经理处拨款的数量。我一一回答后，他才勉强收下。

伙食费的问题虽暂解决，但我心里并没有丝毫轻松，若按最低标准，这100元也只够全纵队5天的菜金。为解决纵队的伙食问题，我们辎重队的十几位同志，想办法，主动下到农村去，发动群众筹粮、筹菜，总算完成了整训期间的部队供给任务。在部队整训期间，右江革命根据地得到迅速发展。在红7军帮助下，东兰、凤山和右江沿岸群众基础较好的乡村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打土豪、分田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各族翻身农民情绪高涨，更加热爱红军和新生的红色政权，踊跃参军支前，几千农民报名参加了红军。这样，就使红7军队伍由3个纵队扩大为4个纵队。全军发展到8000人。第4纵队于同年8月在田州镇成立，以恩隆、奉议、恩阳3个县赤卫军为主体组成，黄治峰任纵队长，罗少彦任政治部主任。下设3个营和1个特务连。全纵队共700多人。经过3个月的整训，部队的面貌起了很大的变化，广大指战员的政治素质和军事技术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这是红7军兵强马壮的鼎盛时期。

第三章转战千里

河池整编

1930年秋，蒋、桂、冯、阎军阀混战的形势发生急剧变化，桂系军队在湖南失利，败回广西，为巩固其后方，集中兵力对付已在南宁鏖战两个月的滇军。滇军渐渐不支，经右江撤回云南，桂军也向右江方向追击。

9月中旬，红7军前委根据形势的变化，准备按原定计划向湘粤边发展，相机进入中央苏区，与朱毛红军会合。考虑根据地群众的秋收问题，决定部队推迟到10月1日开始行动。在我们准备出发的前一天，中共中央南方局代表邓岗（拔奇）从香港来到平马镇，传达、贯彻中央指示精神和给红7军下达的指令。由于邓岗的突然到来，红7军的行动计划只好暂时推迟。

原来，1930年6月11日，在李立三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由他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接着，李立三等人又作出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在邓岗到达平马前，即9月下旬中央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上，已批判了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纠正了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计划。但由于右江地区远离上海，交通闭塞，红7军前委尚不知道。

10月2日，邓岗在红7军前委扩大会上，传达6月1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议案和中央对红7军的指令。要求红7军立即离开右江革命根据地，先打下柳州、桂林，然后向广东的小北江发展，建立根据地，阻止两广军阀向北增援武汉之敌，以保证全国红军首先夺取武汉。根据中央的指令，前委会议决定全军集中到河池整编，誓师北上。前委决定，第1、2、4纵队由平马、田州出发，经凌云、凤山、南丹到河池，另一路经东兰到河池；第3纵队则从东兰武篆直奔河池。当时尚未公开中央给红7军的指令，只是进行外线作战动员，加紧扩编部队和疏散部队中的女同志。我也为筹集军饷、干粮、草鞋和组织骡马队及运输队而忙碌起来。

10月6日，军部率第1纵队从平马出发。

出发那天早晨，秋高气爽，霞光满天。出征的战士们从附近的驻地来到平马镇北面大草坪集合，个个轻装，单衣短裤，脚着草鞋，背着小包袱，肩挎小竹帽，钢枪上肩，英姿勃勃。有些随军做宣传、卫生工作的女同志，也戎装打扮，与男同志一道踏上了征途。平马镇附近的工农群众，在当地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人的率领下，也扛着红旗，敲锣打鼓涌到大草坪来了。他们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欢送自己的子弟兵去执行新的战斗任务。

乡亲们问：“你们还回来么？”因为当年太平军起义队伍离开广西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战士回答：“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队伍，一定会打回来的。”集合的军号声响了！

张军长迈步走到了队伍前面，作了简短有力的讲话：“英勇的红军指战员们，亲爱的乡亲们！今天，我们就要离开可爱的右江苏维埃政府诞生地了，离开亲爱的乡亲，去执行党中央交给我们新的战斗任务，去解放天下受苦受难的老百姓，这是十分光荣而伟大的战斗任务，我们决不辜负党和人民群众的期望，我们一定会胜利打回来！”张军长的讲话，激起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根据地人民满怀深情，欢送红军队伍踏上征途。

原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雷经天和思林、恩阳等县的苏维埃政府主席也随军出发。雷经天同志因不同意把赤卫队全部编入红7军离开根据地等问题，被错误地撤销其党内职务，并被开除党籍。我们告别了乡亲，告别了平马后，

便绕道百色、凌云，再折向北面过凤山、东兰等县，向河池开进。秋后的南方，天气变化异常，一时烈日高照，晒得战士们汗流浹背；一时又是狂风大作，雷鸣电闪，大雨倾盆，把大家淋成落汤鸡。沿途重山叠嶂，山道崎岖难行。

经过3天的艰苦行军，到达了凌云县城，受到苏区各族群众的热情迎送。在凌云休整两天，部队继续前进，进至凌云县同乐镇，途中，发生了第4纵队营长罗明山率5连离开大部队返回右江的事件。因该连由几个县的农民赤卫队组成，乡土观念重，不愿远离根据地，拟回奉议、恩隆交界的七里山一带打游击，部队欲派兵追回，被军部首长制止。在同乐休整时，军部派出人员到黔桂边境找到了红8军第1纵队的下落。该纵队在2月上旬，前往攻打靖西县城，以便打通与右江联系的通道。

3月中下旬，龙州失守，该纵队与红8军军部失去联系，后来他们拟往右江地区与红7军会合，因通往右江的通道都已被封锁而不能实现。在纵队党委书记袁也烈带领下，转战滇黔桂边已有7个月之久。

10月23日，袁也烈同志率领该纵队400多名战士，躲过黔军王海平部的耳目，在贵州省望谟县蔗香圩偷渡红水河，到了凌云县讲肥村岗里屯。这时，李明瑞总指挥亲自带领红7军第1纵队第1营来到该屯迎接。两支兄弟部队在同乐镇胜利会师后，便同往河池集中。当李总指挥从同乐镇率部前往讲肥村迎接红8军部队时，我们在张军长率领下，从同乐东折凤山，向东兰方向前进，在东兰休息一天，第二天来到县城北边的红水河边。恰河水上涨，水流湍急，船只又小，大部队渡河很困难。军部便发动各营扎木筏，一部分乘船，一部分坐木筏，渡了3天，才全部过河。

过了红水河后，部队经过的都是白区，人口又稀少，给养十分困难。我和辎重队的同志设法弄到谷子后，要组织群众舂米，当地的舂米工具很落后，速度很慢，真是急死人。为了弄粮食，我们在往随打前站的尖兵先走，一到驻地，忙个不休，几乎每天要到半夜三更才能睡觉，疲劳至极。有时，到偏僻村屯挨家挨户筹粮食，遭到地主民团武装的袭击或冷枪。有一次，到一个山寨筹粮，地主民团紧闭寨门，并在门楼上持枪威胁我们，经多次交涉，仍拒绝送粮、菜。我火了，严厉警告他们：若不如数提供粮、菜，即用武力攻打山寨。这样，他们软了，终于从门楼吊下大米、猪肉和蔬菜。我们走了两天，于10月底到达河池。其他纵队也于11月初陆续到达。这是我们第三次到达河池，群众对红7军早已熟悉，就像看到久别的亲人一般。在河池，部队开始了紧张的政治动员，正式公开部队今后的行动方向，要求大家做好北上攻打大城市的准备工作。

11月7日，红7军在河池凤仪小学召开了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传达中央政治局6月11日决议精神和中央给红7军的指令。提出了“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打到广州去”、“争取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等口号。大会充满了“左”倾盲动气氛。会议决定，取消纵队，整编部队。把红7军4个纵队和红8军1纵队整编为3个师。以红7军第1、3纵队（一部分）合编为第19师；以红7军2、3纵队（一部分）和红8军第1纵队合编为第20师。第21师留下番号，由韦拔群等同志率一连人回右江地区重新组建部队，坚持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第19、20师则北上执行中央命令。整编后的红7军编制序列及领导人是：总指挥：李明瑞军长：张云逸政委：邓斌政治部主任：陈豪人参谋长：龚鹤村经理处长：叶季壮第19师：辖第55团和56

团师长：龚鹤村（兼）政委：邓斌（兼）政治部主任：许进第 55 团，团长何莽、政委黄一平第 56 团：团长章健、政委魏伯刚第 20 师：辖第 58 团和 59 团师长：李谦政委：陈豪人（兼）副师长：黄治峰政治部主任：李朴第 58 团：团长冯达飞、政委杨英第 59 团：团长袁也烈、政委李朴（兼）第 21 师师长：韦拔群政委：陈洪涛副师长：黄明春（黄松坚）政治部主任：陆浩仁参谋长：黄晖下辖团（待组建）军直属队炮兵营：营长邓荣光特务营：营长冯玉雪教导大队：大队长阎伯英、政委袁任远会议改选了红 7 军前委，邓小平仍为前委书记。为加强兵运工作，会议还组织了一个兵委，由陈豪人任书记。

党代会闭幕第二天，红 7 军全体指战员（不含 21 师）7500 多人，集合在河池南郊三里亭举行盛大的阅兵和誓师大会。大会首先由军首长宣布整编后的编制序列及领导成员名单。接着，举行庄严的授旗仪式，由中共中央南方局代表邓岗分别向军、师授军旗。当韦拔群走上主席台接旗时，张军长便特意向大家介绍了这位传奇式的壮族英雄。当地群众早就听到韦拔群的名字，顿时欢声雷动。韦拔群在这次整编中的表现十分感人。他顾全大局，风格很高，为了加强主力部队，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率领的第 3 纵队 1000 多人及武器马匹，统统交给北上的主力部队，而自己只留下七八十名体弱多病的同志和一些破旧武器，带回东兰、凤山坚持革命斗争。充分体现了一位共产党员以革命全局利益为重的崇高品质。

为了教育、勉励北上主力部队中占有一半以上的右江地区工农子弟，消除一些人留恋家乡的观念，韦拔群接过军旗后，在讲台上动员大家说：“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要无条件地执行党交给的一切任务；我们是光荣的工农红军一员，要无条件地为天下的工农利益去战斗。革命者处处都是家乡，我们的目的就是解放全中国、全人类。希望你们出征后，在党的领导下，不畏艰险，不怕困难。英勇杀敌，将来必定会胜利地打回家乡来。我们也一定要用鲜血和生命，保卫右江革命根据地，用战斗迎接同志们凯旋！”韦拔群掏自肺腑的话语，激励着出征的战士。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等同志也在会上作了北上动员讲话。

尔后，举行阅兵式，军部直属队和各师所属部队，在红彤彤的军旗引导下，健步走过主席台前，接受南方局代表邓岗和军部首长的检阅。队伍浩浩荡荡，阵式颇为壮观。

整编后，我被任命为第 20 师少校辎重队长，紧张地进行出征的粮食准备工作。军部要求每人带 5 天粮食，一半炒成干粮，还要添置米袋、草鞋等。

激战长安

整编后，红7军主力开始北征。

11月9日清晨，红7军7000多健儿，迎着火红的朝阳，离开河池，踏上了艰苦、悲壮的征途。我们沿着龙江南岸怀远方向前进，沿途穿行在突兀嶙峋的古峰翠岭之中。19师在前，20师和军部殿后。第二天，进入宜山县境，我军占领宜山县德胜镇后，直下该县怀远镇，该镇守敌数百人，闻风而遁，退到河对岸防守，与我军隔河对峙。我军于11月11日第二次占领怀远镇，拟挥师东进，准备在庆远附近渡过龙江河，进逼柳州。庆远是桂西北的一个重镇，驻敌一个团，又逢龙江涨水，军部认为没有攻克的把握，即使攻下柳州，从柳州去桂林，也很难通过，于是决定放弃攻打庆远镇，以驻扎德胜镇的20师为前锋，以驻庆远的19师为后卫，绕道天河向罗城县城进逼，拟经融县攻桂林。根据军部的命令，我们20师从德胜出发，经盘龙、木寨、安马、龙栈、官村、外村、拉朝，向天河方向前进。先头部队走到宜山县的四劫坳时，与前来阻击的天河县民团武装发生了战斗。我军向敌人猛烈射击，并打了数发炮弹，敌人仓皇向天河逃窜。我军通过四劫坳后，经福好、康靖、华张、共乐、维新，并于15日下午炮击天河县城，敌人溃退，红军遂进入天河县城。这是一个荒凉的小城。

在天河县城休息3天，我们宣传发动群众，没收国民党反动县府的仓库、税务局和大地主的粮仓，以筹粮款。

16日，我们从天河向罗城方向进发。途中要经过离天河三四十里的四把村，该村位于地势险要的隘口上，只有百来户人家，已被敌人逼迫逃走。村子周围石山高耸，断崖峭壁，不易攀登，中间只有一条曲折的泥石路穿过。

当天近午，我师前头部队到达四把村附近佛子坳时，突然枪声四起，发生了一场遭遇恶战。

原来，桂系军阀得悉我军占领怀远后，极为恐慌，为了阻截我军前进的道路，令覃连芳教导师和韩彩凤师进驻长安镇（今属融安县），并派出覃连芳师两个团到四把村截击我军，双方在四把佛子坳展开了激战。覃连芳亲自出马督战，分三路围击我军。

我军指战员经河池整编后，斗志旺盛，当行进在队伍前面的李谦师长发出“消灭拦路敌人”的战斗号令后，霎时，炮声如雷，枪声鼎沸，杀声四起，我军异常勇猛，先敌占领了佛子坳。后面的部队跑步赶到，投入战斗。

四把村确是天险要地，敌人凭险死守隘口，并向佛子坳高地发动多次攻击，以牵制我军，待其援兵一到，再合围我军。战斗从上午11时至下午5时许，一直处于激烈状态，形成了对峙局面。

枪声紧，弹雨急。正当佛子坳争夺战激烈进行之际，桂军杨腾辉师派一个团驰援，攻击我军19师，我军不得不前后作战，处于被动局面。军部领导根据战局发展变化，感到地形于我军不利，决定趁敌暂停进攻之机，部队撤到天河附近的古毛一带。敌杨腾辉师紧迫不放，一直追到天河附近，在河对岸布阵对峙。敌覃连芳师则另路回其老巢长安镇堵截我军。四把之战，是我军离开根据地后与敌正规军打的第一次恶仗，战士们打得英勇顽强，虽未能通过隘口，但给敌人以重创，毙伤敌五六百人。我军也伤亡二三百人。这一仗，大家体验到离开根据地后作战的困难，不仅耳目不灵，而且筹粮筹款方面都遇到很大困难，由于群众条件差，伤病员又无处安置。可以说，离开革命根据地，就好象是儿子失去母亲一样。我们只好设法把伤病员全部抬走，

这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我师撤到天河附近的古毛一带后，经马草、长丰到锅厂，与从天河出发的19师会合，然后从锅厂向三防（今属融水县）方向进发。一天，部队走进一道阴森森的狭长峡谷。峡谷里，一条水流湍急的小河沿着峡谷蜿蜒而去，两岸是悬崖峭壁，只有一条崎岖山路，我们必须通过这一险要山坳口。

突然，从前方传来阵阵枪声和迫击炮声。原来敌人派民团抢先控制山坳口，封锁我军前进道路。我先头部队组织几次冲锋，由于我军的迫击炮火力不强，敌人居高临下火力太猛，不但没有冲上去，反而被敌火力压在狭窄的小路两旁。我军进退两难，情况危险。

李总指挥仔细观察高地的地形后，从预备队中挑选出十几个身强力壮善于爬山的瑶族战士。组成突击小分队。

“同志们，敌人占据高地，封锁了我们的去路，你们要从山的侧面偷袭过去，拿出你们瑶族爬山的拿手本事，以最快的速度，爬上高地，为全军开辟道路”。

随着李总指挥的命令，十几名瑶族勇士，一跃而起，飞快地向山坳口侧面攀援而上。

山坳口，高四五百米，山上怪石嶙峋，荆棘丛生，盘根错节，犹如一张巨大的铁丝网，覆盖着整座大山，找不到一条能够上山的道路。突击队员们像猴子一样，手攀着树枝，脚勾着石缝，穿荆丛，攀峭壁，动作敏捷。当他们悄悄爬到山顶一看，据守在山坳口的30多个民团全都暴露在眼下。敌人做梦也想不到红军战士会攀上绝壁，从天而降。当勇士们摸到敌人跟前时，有的还在抽大烟，有几个家伙朝山下放枪。突击队员们甩出一排手榴弹后，趁势猛扑上去，只用了几分钟时间，便消灭了坳口上的守敌。

夕阳西下，晚霞染红了山野。我军大部队迅速通过这个山坳口，继续向北前进。

我们沿着崎岖陡峭的山路，经龙岸、洞马，于11月25日到达三防镇，进入了广西有名的苗族聚居地区。

三防，位于今融水县西部，九万大山脚下，地势险峻，周围层峦叠嶂，古木参天。三防镇内，就有好几棵几个人也难以合抱的古榕。部队到后，因天下雨和筹粮关系，军部决定在三防休整数天。在三防镇边一个小晒场里，军前委召开部队党员、积极分子会议。大家用芦苇草垫着，随意交谈，回顾离开河池后部队的战斗和行军情况，讨论下一步的行动问题。在座谈中，反映了部队指战员对今后行动去向的担心。

邓小平同志出席了会议。他针对同志们反映的问题讲了话。他首先赞扬同志们在四把等战斗中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指出这次战斗虽未能斩关夺隘，但挫败了敌人妄图把我军消灭在天河一带的阴谋。接着，他分析四把战斗没有取胜的原因，主要是离开了革命根据地，耳目不灵，敌情不明，如虎落平川。

另一原因打的是仓促的遭遇战，缺乏战斗前的思想准备。他号召大家要树立必胜信心，发扬成绩和长处，大力开展对群众的宣传工作，严格遵守群众纪律，顺利通过大苗山区。邓小平同志的话简明有力，令人信服。会后，大家不顾长途行军的疲劳，大力开展对群众的宣传和筹粮工作。军政治部在水街的大古榕树下，召开群众大会，张军长到会讲话，宣传我党我军的宗旨，号召群众起来革命，翻身求解放。我军还派出懂苗语有文化的同志，组成宣

传队到街头宣传，街头巷尾书写了标语，如“红军是工农革命的先锋队”、“红军不拉夫，不发洋财，不强奸妇女”、“打倒国民党军阀”等。我军进驻三防当晚，一些苗族群众上山躲避。后听红军的宣传，亲眼看到红军睡在屋檐下或大古榕树下，烧的是自己刚打来的湿漉漉的杂草，吃的野菜稀饭，群众家里的东西，原封未动。加上我军说话和气，买卖公平，群众很快消除了恐惧和疑虑，主动接近和帮助红军解决给养问题，有不少人主动要求参加红军或支前工作。

在三防休整期间，得知柳州敌人防备力量很强，军部决定放弃攻打柳州，移师东进，向长安镇（今融安县）进发，以解决红军补充问题和扩大政治影响。

12月1日，我军离开三防，分两路日夜兼程，于4日会聚长安镇西面的大坡村。当晚，在大坡村召开进攻长安的战前动员和誓师大会。

5日中午，我军来到长安城外，在镇西面山脚下的南问、黄牛、凤岭、凤凰等村安营扎寨，指挥部设于凤凰寨。

长安镇，是桂北一个重镇，也是通往湘黔边的交通要道。人口三四万。水陆交通很方便，商业繁荣，素有“小柳州”之称。

据侦察报告，驻守长安镇的敌人，除了装备优良的韩彩凤两个团和特务营2000人外，还有刚从柳州调来的覃连芳教导师1000人，加上民团300人，共有守敌3000多人。敌司令部设在镇北的张公庙（今大巷粮所）。

军首长根据这些情况，决定打下长安镇，并在此作短暂休整，筹粮筹款，补充部队过冬物资，而后东渡融江河，直插桂林。李总指挥和张军长带领各级指挥员到前沿观察地形后，作如下战斗部署：19师从西山脚下到隘面寨，从镇的南面进攻；20师由镇的西面和北面进攻，形成南、西、北三面合围态势，以西面为主攻方向，选择西北面的圣山庙作为突破口。敌韩彩凤师和覃连芳师，按照李宗仁、白崇禧“务必在长安合围聚歼”红7军的指令，早已加筑工事，布置了两道防线。覃连芳在四把战斗时已领教了红7军的厉害，他把韩彩凤师推到前面，在镇西北一带布设第一道防线，负责外围作战；而覃连芳自己则在长安镇边缘设置第二道防线，负责内线。同时，他们在江上架起一座浮桥，以便东西两岸互相策应。当听到我军来到城外时，覃连芳立即下令把镇周围的甘蔗砍倒，使之变为一片开阔地，并在主要的街道上插下一排排竹钉，还在街口，设下重重障碍，妄图“以逸待劳”，一举歼灭红军于长安镇。

12月5日下午3点钟左右，我军攻城战斗首先在长安镇西北角的圣山庙打响。霎时间，硝烟滚滚，火光四射。枪炮声、爆炸声、喊杀声响彻城郊。团长章健率领一个主攻营，迅猛逼近圣山庙。战士们高喊着：“活捉军阀白崇禧！”（当时听说白崇禧在城内）“白军兄弟们，你们不要为军阀卖命了，起义过来吧！”据守圣山庙的是韩彩凤师的一个营，他们拼命反抗。在我军猛攻猛打下，渐渐不支。覃连芳急从镇内派出一个营增援，我20师也派出58团3营助战，双方对峙到傍晚6时左右，这时，军指挥部命令驻在长塘坡的山炮营向圣山庙开炮轰击，三发三中，摧毁了圣山庙，残敌退回镇内。

入夜，我军19师从镇的南面和西南面发起攻击，很快突破敌人第一道防线，敌被迫龟缩镇内。我军组织突击队和先锋队，越过又宽又深的环城沟，突入镇边的几条街道，向镇中心发展。

先锋连1排长周达，是一个年仅21岁的共产党员，他率领该排战士，利

用街道两旁的墙壁作掩护，突进到敌人第二道防线时，遭敌反击。因黑夜看不清敌人，容易发生误会。周排长立即命令战士们卧倒不动，凡是看到向我阵地移动的黑影就射击。这样一来，跳出工事来的敌人，几乎都被击毙。周排长乘胜带领战士们靠近敌人工事，由于敌人火力密集，前进受阻。

周排长急中生智，命2班首先发起攻击，他们甩出手榴弹后，用机枪猛扫，用火力吸引敌人。敌人以为我准备冲锋，匆忙集中火力向我2班射击。这时，周排长率领1班战士跳出工事，端着刺刀，在滚滚浓烟掩护下，冲到敌人工事里，与敌人展开肉搏战。与此同时，3班也从左边杀过来，用刺刀与敌人展开格斗。结果，把敌人一个排杀伤大半，残敌狼狈而逃。

正当我军夺下敌人第二道工事时，覃连芳从镇内派出大批增援部队，蜂拥而来，妄图夺回工事。由于敌人人多势众，我军的排枪阻挡不了敌人的反扑。敌人越来越多，情况危急。

“同志们，拼刺刀！”周排长一声令下，战士们一跃而起，奋勇地冲向敌人。敌人退后又重新组织反扑。这时，先锋连覃耀连长率援兵赶到，勇猛冲杀，将敌人击退。此时，1排32名同志只剩下了8人，周排长也负了伤。我攻击部队突入街巷后，与敌逐街逐巷争夺，步步进逼敌人中心区。但越向前深入，敌人兵力越密集，工事越坚固。经彻夜激战，仍未能攻占镇中心区。6日上午，军部调整兵力，组织全线进攻。战士们一鼓作气，冲进了大街小巷。19师两个团从镇南面冲到了下会馆码头；20师的59团从镇西面冲到了江西会馆（现邮电局）门前；58团从镇北面冲到敌指挥部张公庙外围。但敌人凭借其坚固的工事，拼命顽抗，激烈争夺。下午，敌人一支七八百人的增援部队，鬼鬼祟祟地从石蛤口摸到西山脚下的地图岭，妄图从外面夹击我军，打乱我军的阵势。张军长沉着地指挥58团3营，在炮火掩护下，向这股敌人发起猛烈反击，一口气，把敌人赶出10里之外。晚上，月黑风高。军部组织了一批人马，准备了柴草火把，拟强攻敌人的指挥部——张公庙。当我军逼近敌巢时，覃连芳用人海战术，挡住我军的冲击。又是一夜激战，虽敌人累尸如山，但我军仍没有最后解决战斗。战斗持续到12月7日，双方形成“拉锯”状态。如果攻不下长安，部队的给养和休整问题不得解决，取桂林就更困难了。因此，军部调整部署，决心拿下长安。

7日中午，攻击开始。首先，用山炮轰击敌人和据点工事，接着，战士们在机枪掩护下，分别冲进兴仁街（现建设街）中段和贾家码头（现车渡码头）上段。正当我19师两个团准备占领浮桥，切断敌人退路之时，突然，我军东边警戒部队发现有大股敌人从高山直驱而下，是韩彩凤带领约2000人赶来增援，并与攻打浮桥的我军发生激战。此时，我军不得不分兵打援，镇中心攻击力量减弱。夜里，战斗仍在进行。李总指挥和张军长从前线回到指挥部，与邓小平等同志分析目前严峻形势，认为长安是战略要地，敌人经营多年，势必全力死守。现在，敌人援军陆续赶到，而我军经过三天三夜的攻坚战，部队疲劳，消耗很大，若继续打下去，虽攻城有望，却须付出一定的代价，影响继续北上的计划。因此，军前委最后决定，放弃攻城，连夜撤出战斗，向北转移。午夜过后，枪声稀落下来，我迅速收拢，乘夜离开长安，依来路回大段、江门，经大田、大伞，向三江县的富禄方向前进。是役，我军打出了威风，打得敌人魂飞胆裂，毙伤敌600余人。敌主将覃连芳受重伤，肚子被打穿，肠子外露。敌人惊叹红军“多是北伐的老兵”。

因此，我军撤退时，敌人未敢迫击。撤退时，因我军也伤亡三四百人，

我们做后勤工作的同志，一方面组织人力掩埋烈士遗体，一方面安排好伤病员，伤重的寄养在群众家里。这既要做重伤员的工作，又要做好群众的工作。对轻伤的同志，组织他们随队前进。营级以上的伤病员，组织担架抬走。

奔袭武冈

我军撤出长安后，前进在苍苍茫茫的灌木丛林中。战士们常要拨开半人高的杂草寻路前进，有时在林区里转来转去，若没有当地苗胞作向导，根本无法走出去。一天，我们从融水县的白云乡来到靠近三江县边境的黄奈村。这是一个只有7户苗族同胞居住的小山寨。在我军来到之前，山寨的群众已躲进山里，除了几户有老弱病人在家外，其余都闭门上锁。那时已入冬，山区的北风，砭人肌骨。战士们又饿又冷，但大家都自觉遵守群众纪律，不动群众一柴一草。群众锁了门，就露宿在村旁的树林里。为了解决战士们的吃饭问题，军部决定征购群众部分粮食，按市价付款。当地没有现成大米，每家只有挂在屋梁下的谷穗，我们征购了每户的部分谷子后，便发动战士们利用苗胞门外的石臼、木杵舂米，有的甚至用石头或脚来脱壳，由于人多米少，当晚，每人只吃到一碗稀粥。夜晚，张军长带着两位警卫员，到苗胞家里访贫问苦。

当他们走进一苗胞家里时，只见几个人赤裸裸地围在火塘边取暖。主人见外人进来，十分惊慌。男的连忙起身将妇女挡住。女的一只手抱小孩挡上身，另一手拿筛箕遮其下身。他们穷得连青年妇女也没衣遮身。张军长看到这种情景，非常难过，当即脱下外衣，送给了这户苗胞。苗胞非常感激，全家人要在张军长面前下跪，被张军长劝止。

第二天一早，我军离开这小山寨时，有些战士尽管衣服单薄，也送些衣服给了贫苦的苗族兄弟。苗胞们也把红军看成是自己人，在村里摆下3只大木桶，各家各户都纷纷把家里的粮食倒在木桶里，送给红军。我们只收下一部分，并按价付了款。过了黄奈，我们于12月12日来到三江县境的富禄镇。富禄，位于桂黔边境的一个江边偏僻小镇，住有苗、瑶、侗等少数民族，也有为数不多的汉人。上半年，我军从格江回师右江时，曾在该镇住了3天。群众对我军已有所了解，知道红军是为穷人打天下的。当我们又来到该镇时，群众站在街头欢迎我们，有的手里还拿着红色小纸旗，兴高采烈地呼喊着欢迎口号。商人也知道我军保护工商业，买卖公平，又是用现洋买东西，他们见部队来时毫不惊慌，照常营业，市面上显得比以前更热闹了。在富禄的几天，由于群众关系较好，我们筹措给养工作也较顺利。当天晚上，军部在镇内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我党我军的政治主张和政策。一位北伐战争时曾在李明瑞部下当过排长的群众代表，也在大会上发表热烈欢迎红军的讲话。会上充满着深厚的军民情谊。第二天天刚亮，群众纷纷给我军送来鸡蛋、粮食、猪肉和青菜，有的还杀猪宰牛慰劳我军。到处欢声笑语。我军在富禄住了3天。离开富禄前的那天晚上，召开了军民誓师大会。会上，张军长一方面代表军部感谢各族群众对红军的热情帮助；另一方面针对部队中有些同志因四把、长安战斗失利而情绪低落的情况，他用“水滴石穿”作比喻，讲了反动派再强也能打倒，自己的困难再大也能克服的道理。他说：“从表面上，石头比水硬，但实质上，石头并不硬，它连水滴都经受不住。你们看屋檐下的石头，就是被水滴冲凹的。白军和石头一样，再硬也必定要失败。红军是代表工农利益的正义之师，最后胜利一定属于红军！”第二天，我们第二次告别富禄的父老乡亲，取道贵州的龙额、水口，拐过一道山弯，复入三江县的唐朝，然后再向古宜方向前进。沿途是高山峻岭和蜿蜒的羊肠小道，比在桂西山地行军更为困难。山道很窄，有时右边是遮天蔽日的森林，左边是看不到底的深谷幽涧，稍不小心，失足掉下去，就别想再爬上来。

有时山路藤蔓纵横，密如蛛网。个子较高的战士，特别是骑马的，稍不留神，藤蔓就会把你的脖子勾住，把人拽下马来。奇形怪状的石头，布满山道间，人踩上去，硌得脚板疼，身子东扭西歪。遇上过山涧独木桥，更为艰险。小桥只是由几根曲直不一的木头拼凑而成，既不牢固又窄。桥下是几十米深的山涧，初踩上去，有一种悬空、摇晃的感觉，使人头晕目眩，两腿发软。要胆大心细，两眼直视前方，方可安全走过去。最难行的是爬瑶山。瑶山有个叫“猫鼻梁”的地方，是瑶山唯一的通道，又高又陡，一条羊肠小道挂在如刀削一样的陡峭山崖石壁上，人们都要从这个高耸入云的山崖上翻过去。民谣说：要想过瑶山，就得碰鼻梁。对红军健儿来说，山再高再陡，也阻止不了我们前进的道路。大家过“猫鼻梁”时，每人都拿着竹棍或木棒当拐杖，弯腰躬背，一步步往上爬，经常前面战士的脚，碰着后面的人的头部或鼻梁，有时鼻梁碰着山崖上的岩石。马匹上山，是向上冲的，有时就把前边的人冲倒了、踩伤了。

为了使马匹不要冲得太猛，又让人爬得容易些，后边的人就干脆拉着马尾巴上山。人人腰酸背痛，头昏脑胀，汗珠滚滚，精疲力竭。经过长途跋涉的马儿，有时让石头一绊，“嘣”的一声跪下去了，喘着粗气，吐着沫，干叫着，怎么也拉不起来，真是人倦马乏。当队伍抵达三江县孟寨至八江之间的布贡山腰时，突然，一群土匪从树林里冲出来，向我行军纵队猛烈射击。我军措手不及，被打死打伤十多人。19师56团3营营长高潮指挥部队进行反击时，不幸中弹牺牲。我军先头部队闻讯回援，将这股土匪击溃。部队翻过一山腰后，来到八江一带的侗乡。这里几乎村村寨寨都建有鼓楼。有的鼓楼高达10多米，9层檐面，层层叠起，结构精致缜密，外面雕龙刻凤，描花饰锦，栩栩如生。每逢节日，侗胞们会聚在鼓楼前跳芦笙舞，演唱侗戏。这既是侗族议事和娱乐的场所，也是侗族互助互爱的象征。看着这些独特的艺术建筑，我们赞叹侗家人的艺术匠心。听说八江一带群众经常遭受土匪抢劫，我们便拨出十几条步枪给村民作自卫之用。过了八江，我们来到了有风雨桥乡之称的林溪，沿途除了看到举世闻名的“重瓴联阁治神巧”的程阳桥外，还有“合龙”、“普济”等十几座形神各异的风雨桥。据说林溪乡共有风雨桥50多座，几乎每座风雨桥都有塔阁式桥亭及桥廊、亭檐和亭廊，宛如一座长廊式的多层楼阁。桥身雄伟壮观，淡雅大方，与侗族淳朴民风谐然一体，显示了侗族人民的智慧和非凡的创造才能。

根据这里侗胞对红军不够了解的情况，军前委指示部队要严格执行群众纪律，尊重侗胞的风俗习惯，宣传我军的性质和主张，以消除侗胞的顾虑。全体指战员都不住在镇内群众家里，而住在风雨桥里或附近田坝上。同时，我们组织宣传队向群众做宣传工作，动员躲在山上的侗胞下山。有的战士把自己随身带的粮食煮给下山群众吃，帮他们打扫院子，挑水。红军秋毫无犯，侗胞很是感激。当部队离开林溪时，全寨男女老少都涌出家门，燃放鞭炮，为红军送行。他们推选代表，给红军送来米酒和“红猪”（用猪血涂在猪身上，是侗族最高礼品），并派侗族青年给我军带路。

红军为穷人打天下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很快传遍三江侗族居住的地区。我军走到哪里，都有侗胞给我们带路，帮我们解决给养问题。我军原计划从长安取道三江县的古宜到桂林，后了解到敌人已在融江上游一带设重兵防守，故改道从林溪入湖南，拟由湖南的绥宁、武冈一带掉头重入广西。

12月24日，我们穿过一片森林地带，来到了湖南西南部的绥宁县城郊

外。这时天已变冷，山地已开始结冰，来自广西的红7军健儿，从来没有见过结冰，好奇地看着田里的薄冰，感到新奇有趣！部队开进绥宁县城时，城里的人几乎走光了。粮食和各种衣物，也都搬走了，成为一座空城。因这里的群众。过去深受桂系军阀的残害，听说广西兵来了，又以为是桂军，故纷纷搬着粮食、衣物到外地躲避。我军不入民宅，在街头屋檐下过夜。我们行军作战已有一个多月，人员、弹药、物资得不到补充。严冬来临，战士们还着单衣短裤，脚上的草鞋也都磨坏了，有些战士只能打着赤脚行军。本来，军部想在绥宁解决给养问题，但现在该县已无法解决，军部遂作出决定：继续向东北方向推进，奔袭距绥宁100多里的武冈城，以扩大我军政治影响和解决部队给养问题。我们只在绥宁住了一天，于12月25日来到被誉为“六十九福地，楚南鱼米乡”的武冈县城下。据侦察，武冈附近没有敌正规军，城内只有民团六七百人。指战员听到要攻打武冈城，个个摩拳擦掌，战斗情绪非常高。武冈，是湘西一个历史悠久的军事重镇，汉代为都梁侯国的都城，明朝是朱元璋第18子岷王的封地。武冈历来是兵家用兵之地。明清至辛亥革命后，吴三桂、石达开、沈鸿英等都在这里作过战。清曾国藩曾在此办团练，对抗太平军。这里的城墙既高且坚，全是用几百斤或上吨重的方形青石砌成。城外南关，环绕着一条不能徒涉的赧江河，成为城墙的天然屏障。故当地民谣这样说：“宝庆狮子东安塔，武冈城墙盖天下”，素有“铁打武冈城”之称。

守敌已得到我军临城的情报，一方面关闭城门，严密布防；另一方面向宝庆、长沙呼援。城外，稀稀落落的民宅、商店，也都关门闭户，老百姓被赶进城，参加守城。河面冷冷清清，连一只小船也找不到。城里城外静悄悄的，宛若一座死城。紧张的攻城准备工作开始了。军部在城东三里亭土豪肖逸轩家里设指挥部。李总指挥和张军长等亲自到城边观察地形，选择攻击点，要求抓紧时间架设好浮桥。政治工作人员对战士们进行战前动员。我们搞后勤工作的同志则分头下乡筹粮。夜晚，我军工程部队开始架设浮桥，城里敌人见后惊慌地向架桥工兵射击。架桥部队在主力掩护下，经过几个小时奋战，浮桥终于架起来。

19师55团是这次攻城的主攻部队，在团长何莽率领下，该团首先迅猛地冲过浮桥，并分散隐蔽在城墙外围民房里。敌人发现我军过河，惊慌地大喊大叫起来，猛烈地向过浮桥的红军射击。为了减少部队伤亡，我军采取分散队形、各个跃进的办冲过浮桥。我佯攻部队过河后，以民房作掩护，靠近城墙，摇旗呐喊，佯作攻击，吸引敌人的火力。

晚上10时许，我主攻部队发起攻击，顿时，枪声大作，杀声震天。狡猾的敌人从城上去下来很多火把，并在城垛边吊着一个个明亮的灯笼。一时间，把城外照得如同白昼一样，我攻城部队完全暴露在敌火之下。我军是在没有炮火掩护的情况下发起强攻的。55团的战士们，在机枪火力掩护下，将事先准备好的6架云梯送到城墙脚下，可惜云梯太短，只有墙高一半，自然爬不上城头，大家急得没办法。“把两个梯子接在一起！”不知谁提醒了一句，战士们又退回民房，用绑带把两架云梯连接起来，只是梯子太少，仅绑成3架长梯。很快，3架长梯顺着城墙竖起来了。战士们争先恐后冲上梯子，一架梯子，爬上了十几个好汉，长梯被压得晃晃荡荡，像弓一样弯曲，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下面的战士紧紧扶住梯子，保护梯上的战士。城上的敌人，见我军爬梯登城，拼命往下甩手榴弹，有的同志在手榴弹爆炸声中倒下来了。

爬在长梯上的战士们，不顾敌人的手榴弹和机枪扫射，只是一个劲地拼命往上爬。爬在梯子最上边的先锋战士，手握着刺刀，正要伸手抓住城头时，“咔嚓”一声，梯子压断了，一排人从梯子上摔了下去。其它两架云梯，有一架因下面撑扶云梯的战士被敌人手榴弹炸倒在血泊中，云梯失去保护而折断；另一架被敌人手榴弹炸断了。不少战士被摔伤或炸伤，有的同志牺牲了。攻城失败了，战士们急得眼里冒火。这时，56团的战士，抬着几十架群众支援的梯子，一口气冲到城墙下。可是，敌人也加强了防御力量，加上其火把和灯笼把城下照得通亮，攻城战士一接近城脚，就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先是迎头扫来一排排的枪弹，接着，就是丢下一颗颗手榴弹。我掩护部队用强火力向城头射击，几番交锋，才把敌人火力压了下去。敌人的枪声一哑，56团连长赖绍琪立刻抡起大刀，率领全连战士，忽地窜上云梯，飞速地向城头爬上去。当他刚探出城头，一个炸雷突然在身旁爆炸。他手一松，一头跌了下来。接着，敌人将一桶桶滚烫的开水向爬墙的战士们倒去，不少战士被烫伤了眼睛、皮肤、脸和手。这一次攻城又失败了，部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第二天、第三天，我军又组织强攻，敌人居高临下，负隅顽抗，攻城没有进展。而敌人在我军围困下，弹药也越来越缺乏，开始用石头还击。这时，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等指挥员亲临前线，观察地形，找干部和战士商议攻城办法，并找老乡请教。“用炸药崩！”一个浓眉方脸、骨架硬朗的老汉提议说。老汉的建议，立即得到军首长的赞同。

何莽，是个血性汉子。他看到几天来攻城任务没有完成，部队伤亡不小，焦急万分。

现在，听到破城有新办法，眼睛一亮，高兴得几天的疲劳一扫而光。

在何莽的请求下，军部把爆破任务交给了55团。要埋上炸药，就得在城下掏出一个洞口，要掏洞口，就得找敌人的死角。何莽团长观察城脚地形，哪些死角可以利用，早已心中有数。何团长往城下跑去。伏在阵地上的黄冕昌连长看见何团长赶来，以为要下达新的进攻任务。便迎了上去：

“团长，有攻城任务吧？”

“有，用炸药崩开缺口，突入城内！”

“把任务交给我吧，保证完成！”

“不，我先去选择爆破点，你们掩护我！”何团长话语坚毅果断，不容置辩。他向黄连长交代任务后，一个箭步冲出阵地，只见他弯着腰，一会飞奔，一会匍匐，有时刚刚卧倒，敌人就在城头丢下手榴弹，他趁硝烟未散，又继续往前冲。他到离城脚几丈远的拐角处一个房子里，观察敌人的火力点和周围地形，决定从这房子里往城根挖洞。

选好爆破口后，他弯着腰往回跑，刚跑出不多远，就被敌人的一阵枪弹打中，一个趔趄扑倒在地上。黄连长看到此情景，不顾一切冲过去，抱起何团长往回跑。何团长口吐鲜血，奄奄一息。他艰难地用手指着城脚转弯处那座房子，口里却讲不出话来。

战士们把他抬下阵地后，他就闭上了双眼。这位年轻的壮族红军指挥员，为革命献出了年仅25岁的宝贵生命！第四天中午，正当城内守敌弹尽计穷，我军重新组织力量爆破和攻城，即将拿下武冈城时，突然一阵“嗡嗡”的声音，从西北方向传来，越来越近。不一会，飞来了一架敌人的飞机。对绝大多数红军战士来说，还没有见过飞机是什么样子，今天，和它在战场上相遇，更是头一回。顷刻，飞机丢下了几颗炸弹，一连发出几声巨响，浓烟四起，

不幸，有些同志牺牲了。紧接着，一阵密集的枪声，从西而来，渐渐迫近。

原来，湖南军阀何键派3个团兵力赶来增援武冈。我军便面临内外夹击之势。军部首长见情况有变，决定紧急撤退。紧急撤退的号声吹响了，部队分头从浮桥撤退。58团负责牵制增援之敌，掩护主力和军部渡河撤退；56团警戒城内守敌，防止敌人趁机出击。危急时刻，军部首长站在浮桥头，沉着地指挥部队撤退。战士们看到军部首长临危不惧，处变不惊，心也踏实了。敌机又来轰炸浮桥，炸弹掀起冲天水柱。不久，浮桥被炸断了，不少战士牺牲了。会水的，游到对岸。不会水的，跑到下游浅水处涉渡。部队以极快的速度集中起来，向敌人火力较弱的地方突围。在此同时，我军将部分炸药引爆，敌人听到城脚隆隆巨响，不明情况，也不敢轻易渡河追击。我军撤退后，向新宁方向急行军15公里才驻下来。撤退时，有些后勤人员到乡下筹粮去了，有些政治工作人员也到乡下做宣传工作去了，没有赶回来跟上队伍的同志便陷入绝境，有的被敌人杀害了。我当时正从乡下筹粮回到半路，听到枪声激烈，越打越近，估计是部队撤退了，便从近道向东追赶，终于追上了部队。

是役，我军付出沉重的代价。清点人数，损失官兵500多人，士气大挫。然而，我军顽强拼搏的英勇形象和严明的军纪，深深地铭刻在武冈人民心中。听说我军撤退后，群众冒着危险，把红军烈士的遗体埋葬在县城东郊黄家山上，并称该山为“红军山”，以示人民对红军烈士的纪念。

决策全州

我军武冈失利后，为摆脱敌人，一路急行军，继续向新宁方向前进。路上指战员们忍受着饥饿和疲劳，整整走了一天。于夜幕降临时，来到一个山村。军部传来命令：在此地宿营！大家听到宿营命令时，长长地吁了一口气，立即安顿住处，埋锅做饭，布置岗哨……突然，村边传来枪声。顿时，空气紧张起来。原来，哨兵抓住一个湘军的暗探。经审问，才知道敌情十分严重：何键已派两个团的湘军从邵阳尾随我军而来，现正在离我驻地 15 公里外的山地扎营，准备拂晓前向我军发起攻击。军首长根据这一紧急情况，决定改变宿营打算，立即传下紧急命令：煮好饭的抓紧吃，没煮好的不煮了，迅速准备出发！

这时，后到达的部队刚埋锅下米，煮得半生半熟，但军情紧迫，大家把生饭盛到口盅里，又背着行装出发了。为了绕开敌人，设法找到一条较安全的突围之路，军首长亲自找来向导给我军带路。夜色沉沉，细雨靠靠，道路泥泞不堪。为了不暴露目标，我们把随身携带的、能发声的东西一律扎得紧紧的，扎不紧的干脆丢掉。部队悄悄地向东边偏僻的高山爬行。大家沉住气，一个紧跟一个前进。没有发出响声，只听到草丛里小虫的鸣叫声。大家的衣服被雨水湿透了，脚上满是污泥，路又光滑，走起路来更加吃力。加上很多战士来不及吃饭，肚子饿得“咕咕”叫，真是人困马乏！泥泞的道路越来越难走，越来越险峻。四周漆黑一片，过沟时，听到前面的人跳了，后边的人就跟着跳；前边的人踢到了石头，吃了苦头，就告诉后边的人当心；对那些没有马骑的伤病员，均派有强壮的同志搀扶。遇到山下是深沟时，便互相低声传话：“走稳点，小心滑下！”大家小心翼翼，但仍有同志不幸滑下去。

有的骑着马的伤病员，连人带马滚进深沟里。

上山难，下山也不易，容易滑倒。有的同志一连跌了几次，跌伤了，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满身是泥，成了泥人。过了高山，又穿平原。队伍像一条长长的黑影，静悄悄地蜿蜒在田畴之中。东方已出现了鱼肚白，村子里的雄鸡已开始啼鸣，时而传出几声犬吠。战士们经过一整夜急行军，饥寒疲惫，个个脸青腿软，很想寻个地方歇息一下，充填肚子再走。但是，军部刚传下原地歇息的命令，后边又传来了枪声，敌人追上来了！原来，敌人晚间发现我们离开山村，即紧跟于后。

山路泥泞，敌人装备笨重，故没有追上我们。天亮后，平地行军了，敌人追得更近了，已开始与我后卫部队交火。追兵至，军情急。我们只好忍受极度的饥饿和疲劳，继续前进。我带着辎重队和部分伤病员行军，十分艰难，落在了队伍后面。有的伤病员走不动要掉队了。李谦师长见敌人已近，不能让这些战士落入敌手，断然决定自己留在最后，指挥一个排阻击敌人，并鼓励掉队的同志咬紧牙关赶上队伍。敌人发现红军后卫只有一个排掩护，故拼命追压过来。后卫排在李师长指挥下，边打边退，英勇击退敌人多次的追击。但人员不断减少，一个排只剩下一个班，最后，只剩下排长王贵和两个战士了。李谦师长重伤刚愈，身体虚弱，又连续一天一夜行军作战。眼眶陷得更深了。

他眼看敌人快要追上来了，便对王排长说：“敌人又追来了，我们的子弹不多了，千万不能被敌人活捉去。你如看到危险时，先一枪把我打死好了！”王排长坚定回答说：“师长，掉队的同志已脱离了危险，你赶快走吧！”王

排长说着，吩咐一位战士扶着李师长先走，自己和另一位战士作掩护，不一会，那个战士也牺牲了。正当敌人追上来的危急时刻，前边的几位干部和战士听到李谦师长还在后头掩护的消息后，立即赶来支援，给敌人猛烈还击，使李师长和王排长才得以脱险。为了摆脱被敌人撵屁股走的被动局面，军部指派一个营，抢占险要高地，居高临下，猛烈扫射敌人先头部队。敌人挨了这一闷棒，伤亡不少，不敢再追了，我们才摆脱了敌人的追击。

天已大亮了，大家互相看着对方，个个从头到脚满是泥水，十足的泥菩萨！彼此都觉得好笑。雨，仍下个不停。我们又走了大半天，来到新宁县与东安县交界的一个高山上才停下休息。疲乏已极的战士们便不顾一切地躺地而睡，有的两人背靠背撑着伞睡着了。马也倒下睡了。而炊事员仍要忙于埋锅做饭。军部的首长没有休息。他们召开紧急会议，研究部队今后的行动方向。军部原想经新宁、东安两县，再从零陵附近渡过湘江，入湘南，但何键已派兵干永州祁阳间防御，零陵县也有敌两个团驻守。军首长对这些情况进行了分析讨论。张军长来回踱着步子，一手摸着越来越长的山羊胡子，沉思一会后说：“零陵不能去。全州空虚，我们必须以最快行军速度，奔袭全州，以解决部队给养问题。”邓政委久久沉思不语。多日来，他一直为部队的前途而忧心。他仔细听着张军长的发言，反复思考着，认为目前部队虽极度疲困，但只有立即折回广西，才能彻底摆脱湘军的围堵追击。于是，他语气坚定地说：“我同意张云逸同志的意见，立即离开危险的湘地，找个地方休整一下。共产党员要起模范带头作用，做好战士们的工作，动员大家战胜疲劳，战胜疲劳就是战胜敌人！”李总指挥也表示同意张军长的意见，最后作出决定：挥兵南下，奔袭全州。傍晚，雨渐渐停了。熟睡的战士们被冷风吹醒，疲惫地睁开双眼，再也睡不着了。因大家身上衣服湿透，被冷风一吹打，阴冷阴冷的，加上肚子空空，冻得直发抖。开饭了，战士们狼吞虎咽地饱餐一顿，身子才开始暖和起来。出发的命令传下来了，各连队指战员纷纷集合队伍。虽然战士们的体力尚未完全恢复，两腿软绵绵的。但大家知道，只要行动起来就不会感到冷，加上要打回广西，大家更是高兴，纷纷要求担任前卫和突击队。部队沿着弯弯曲曲的山道，昼夜兼程，经新宁县的肖市、窑市，于12月30日进入广西资源县的梅溪镇。那里，有一条百米宽，水深流急的梅溪河挡住我军的去路。附近的敌军会来河边封锁渡口。

“时间就是生命”，部队找来渡船，并架设浮桥，在随滩和鸭渡抢渡过河。李总指挥和张军长，指挥先过河的部队占领河边高地，掩护后续部队渡河。

我军渡河上岸后炸毁浮桥，迅速向越城岭挺进。巍巍越城岭，是广西最高山岭之一。其主峰名叫十字路，海拔两千米左右。一眼看去，群山重重迭迭，到处古木参天，坡陡崖险。前卫部队劈荆斩棘，开路前进。有一段羊肠小径，像悬挂在如斧削过似的峭壁上，我们要互相推拉才能爬上去，一不小心，就有跌下山涧的危险。尤其是骡马、炮兵以及抬重伤病员的担架队，攀登这一峭壁更为艰险，行军速度受到影响。前面一堵塞，后面的部队只好停下来、走走停停，15公里的路走了大半天。当前卫19师翻过主峰，从新宁的窑市包抄过来的一股湘军追了上来，用重机枪封锁住我后卫部队的前进道路。后卫20师和敌人展开了激战。敌人凭借山上的险要地形，跟我军展开逐个山头的争夺战。我军经过一场血战，终于击溃了敌人。在这场激战中，我师又有100多名指战员血洒疆场，长眠在越城岭上！我军翻过越城岭后，

如猛虎下山，过界碑，下柳山，穿过平原地带的会龙铺、大西江、沙子坪、亭子江、小盘石等村寨，于1931年1月2日，直捣全州城。城里的守敌为地方民团，毫无准备，直到我军抵达县城附近时，敌警戒部队才发觉，仓促向我军开枪射击。我前卫部队即向守敌发起攻击。敌人惊慌失措，纷纷逃进城里。我军追进城里，经半小时巷战，敌人大部分缴械投降，少数逃窜。当晚，我军占领了全州县城。我军刚进县城时，群众惊恐不安，家家关门闭户，大人小孩都不敢出门。

第二天一早，群众打开家门，看见红军一个个冒着寒风细雨，偎依在屋檐下睡觉，单衣薄毯，深为感动，红军秋毫无犯，市民才放下心来。这时，我军在墙壁上写好了大字标语，部队的宣传员站在街头讲演、宣传，群众的顾虑打消了，商店开门了，小摊又摆出来了，全州城又恢复了往日的繁华景象。这为我们辎重队筹粮筹款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当时，全州周围没有敌人主力。

桂系军阀担忧红军攻打桂林，把正规军集中到桂林附近去了。湖南虽有一些敌人，虎视眈眈，但不会轻易进入广西来。因此，军前委决定在全州县城休整4天，宣传群众，筹备给养，总结经验教训。我军从河池出发北征以来，已近两个月，为的是执行中央交给的攻打柳州、桂林、广州的任务，在“左”倾冒险主义影响下，部队的目标是攻打大城市，不间断地行军作战。在四把、长安、武冈等战斗中，指战员们打得英勇顽强，但因敌众我寡，始终未能攻克一座较大的城市，伤亡、减员十分严重，许多英勇善战的战友牺牲了，不少有卓越才干的指挥员血洒疆场，至全州时，部队总数尚不到原来的三分之一。加上部队远离根据地作战，军恼困难，冬衣无着，队伍疲惫不堪，思想情绪低落。血的教训教育了广大指战员，感到再这样硬拼下去，部队的前途不堪设想！

大家卧忆起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进行斗争的情景，部队不断壮大，根据地越来越巩固。

于是，对中央的指令产生了怀疑，指战员们迫切要求军前委对这些问题和我军的行动方向给予明确的解答。面对这一严峻情况，军前委在全州县城关岳庙召开了前委会议，讨论中央关于攻打大城市的指令是否行得通的问题。会上，展开了争论。有个别同志仍坚持要攻打桂林的错误主张。邓小平、张云逸等同志，从实际出发，认真总结我军北上以来一路攻城夺寨，强攻硬打，造成严重损失的深刻教训，主张部队放弃攻打柳州、桂林、广州的冒险计划，从根本上转变红7军的战略战术，摆脱部队的被动局面。这一正确意见，得到多数同志的赞同和支持。会议决定部队转移到湘粤边境活动。休整扩大部队，然后到江西与中央红军会合。这次会议是红7军历史上的关键转折。红7军付出沉重的代价终于抛弃了“左”倾冒险主义，为挽救红7军，保持这支劲旅的基于力量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会后，中共中央南方局代表邓拔奇同志和军政治部主任陈豪人同志经前委同意离开部队，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军政治部主任由许进继任。在全州期间，我们辎重队抓紧进行筹款、筹粮、筹冬衣工作。该县城商人较多，经过讲道理、讲政策，很多大商铺主和绅士都主动捐款给部队。有的小商贩也拿出家里珍藏的首饰捐送给部队，但我军为不损害这些小商人的利益，善意谢绝。

全军共筹到4万多元的粮饷，每个战士发给4个东毫（广东钱）。正当

我们准备在该县添置冬衣时，忽闻桂军一个师从桂林方向向全州扑来，军前委决定离开全州，经灌阳县境和湖南的道县、江华向江西方向前进。撤离前，我们突击安置好一批不能随军的伤病员，并派人在粟家渡下游架设浮桥，为东渡湘江做好准备。

1月5日凌晨，“嘀嘀嗒嗒”的军号响了。部队要出发了。战士们经过4天休整，尤其是前委会议纠正了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的影响，拂去了大家心头的迷雾，人人精神欢畅，斗志昂扬。大家听到准备出发的军号后，都忙着打背包，送还老乡的门板，给老乡打扫院子。我也收拾好行装，扎好腰带和绑腿，穿好草鞋，整顿好辎重队，等待出发。连李总指挥的大红马和张军长的大黑马，也抖鬃昂头，嘶嘶地打着响鼻，好象得到出发的命令似的。当时，部队里有一群天真活泼、稚气未脱的小勤务兵、小司号兵、小看护兵，有的是烈士后代，有的是无依无靠的孤儿。他们决心要跟随部队打仗报仇，便从右江革命根据地一直跟到全州来。军部首长考虑到今后征途更加艰难困苦，加上寒冬已到，部队缺乏御寒被服，为了关怀革命后代，决定把他们留在全州，并派军部经理处一位干部去做“红小鬼”们的思想和安置工作。这些“红小鬼”被集中在一位老乡房子里，死拉着那位干部的衣服不撒手，坚决要跟部队走。那位干部无法，只好把心一横，赶紧脱身走出房门，回头“砰”的一声关上了房门，还加上一把大铁锁，然后匆匆走了。这些精灵的“红小鬼”，急得大呼大叫，使劲地跺脚、拉门、捶门，有的大哭起来。后来，他们终于想出了办法，合力把两扇旧式的门板往上门框一抬，门板的圆脚离开了门臼，这样，门被打开了，个个像冲出笼子的小鸟，急忙追赶部队。他们根据老乡的指点，朝东南方向追了一程又一程，仍不见部队的影子。怎么办？他们没有灰心，咬紧牙关，继续追赶。为了加快速度，干脆把草鞋脱掉。最后，不仅赶上了后卫部队和收容队，而且趁部队休息时，他们继续往前追上了军部。这些人小志坚的“红小鬼”，执着追求革命的精神令人难忘。经过两天艰苦行军，部队于1月7日，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一水绕城蓝作带，四山当户翠为屏”的道县县城——道州。道州，是湖南地处湘桂边境的一个繁华市镇。我军进城的时候，已是黄昏时分。县城的保安团等反动武装，已龟缩到离城15公里外的地方，准备等长沙的援兵来后再伺机而动。

在城内，则由商会出面，虚与周旋，拖延时日。街上家家户户都插着欢迎红军的小旗，处处贴着欢迎红军的标语。每户门口还站着一个人，表示欢迎。各商店继续营业，全城秩序井然。尤其是城里的官绅富商们，穿着长袍马褂，手里拿着小旗，放着鞭炮，“热情”欢迎红军。商会还特地组织了筹备会，为我军找宿营地，筹军粮。不一会，慰劳红军的白米、猪肉、青菜，一大堆一大堆地集中到商会来了。商会的头子口口声声说：“一听到你们广西红军到来，高兴至极，欢迎！欢迎！红军真了不起，难得你们光临，请你们永驻这里好了！”看到官绅富商如此“热情”，倒使人感到蹊跷。想到离开右江苏区后，所到之处，不是遭到敌人的前堵后追，便是坚壁清舍，沿途群众受了敌人的反动宣传，对我军不了解，怀有戒心，不敢接近，给我军的给养造成极大的困难。而像道州这样热烈的欢迎场面，还从未见过。军部刚驻下不久，来了几个穿长袍、戴瓜皮帽的人，双手呈上晋谒的名帖，恭恭敬敬地对军首长说：“红军老总，我们是商会代表，贵军莅临敝处，深感荣幸，虽地头不富，但愿尽力为贵军酬劳！”当时已是严冬季节，北风凛冽，砭人肌骨。而我们从广西出发时，天气还炎热，大家穿的是薄衣短裤。经过两个

月来的艰苦征战，有的衣服已破烂不堪，有的草鞋也坏了，在全州只解决极小部分。

现在，大家还身穿单衣短裤，赤足露体，如何能抵抗严寒的袭击！因此，部队的服装问题，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军首长打算在道州解决这个问题，便客气地对商会代表说：“红军不是军阀部队，请大家不必害怕。我们来到贵地，只需要你们帮助筹集粮款和被服。”这些商绅听后点头哈腰，嗫嚅地说：“红军老总之令，我们照办，一定照办！回去马上筹送一两万大洋，表示对贵军一点敬意。”经商谈，约定当天晚上10时，由商会代表负责，将现款送到军部经理处。商谈毕，商会代表便拱手退了出去。晚上，战士们纷纷到街上去，俩一伙，仨一堆，和老百姓、商人交谈，并向他们做宣传工作。有些市民谈到他们去江西做生意时，见过毛泽东、朱德所率领的红军，说江西那里的穷人分得了土地，有饭吃，有衣穿，大家平等。国民党派了很多军队去打他们，硬是打不赢，拿红军没办法。本来，战士们就非常关心江西红军的消息，一听老百姓讲得这么活灵活现，又想到与江西红军会合是即将到来的事情，一个个兴奋得晚上不能入眠。夜里10时，约定的商会代表送款时间到了，军部经理处处长叶季壮同志早就在该处驻地等着，我也在军部等着拨给款项和衣服，可是一直没见送款来。时间快到11时了，仍不见送款人的影子。

叶季壮决定亲自带人到商会去。商会的头子很狡猾，摆出一副没事似的样子，笑容可掬地拍着叶季壮同志的肩膀说：“红军老总真了不起，天下闻名！天下闻名！”叶季壮同志见那家伙东扯西拉，说话避开话题，便单刀直入地询问筹款之事。

“真对不起！真对不起！孝敬贵军的军款已派人去催收，不知什么原因还未送来，让我去催促催促，请稍等候。”说完，那人一转身便溜走了。

叶季壮同志只好忍住气，耐心等待看。但左等右等，一直不见商会的人来。

连刚才几个倒茶点烟的“招待员”也偷偷溜走了。已到接近午夜时分，叶季壮分析认为商会的人不会回来了，知道上了当，连忙带人离开商会，返回军部驻地。街上，家家商店的门关得紧紧的，除了红军的哨兵在寒风中站岗外，一个行人也没有。叶季壮回到军部，见军首长们正围在昏黄的灯光下开会，紧张地讨论着问题。当他把筹款受骗的经过报告后，首长们点点头，似乎在他们的意料之中。邓小平政委瞅瞅叶季壮同志，冷静而果断地说：“款筹不到就算了。”

很明显，这是好商一方面企图用迟交款拖住我军，一方面争取时间向军阀通风报信。我们不能中敌人的缓兵之计！”张军长斩钉截铁地说：“对，我们不能坐而待毙，应在拂晓前离开道州，向江华挺进！”这时，叶季壮同志才清楚，发生了比筹款上当更为严重的情况：据侦察到的可靠情报，湘军正从三面向我军包围过来，预计天亮前到达。军部决定不与敌人硬拼，迅速向江华转移。

江华风雪路

1月8日后半夜，军部发出向江华进军的命令。各连队急忙提前开饭，准备出发。拂晓前，队伍集合在城厢附近的街道上。天漆黑一片，风肆虐地乱刮着。战士们没有御寒衣服，冻得瑟瑟发抖，上牙打下牙。战士们互相鼓励着：“为了革命，死都不怕，难道还怕冷吗？”“走起来，就不冷了！”部队乘夜沿着公路往东南方向出发了。斜挂在天边的冷月，洒下银白色的寒光，刺骨的北风一股劲地刮。四周除了风声，就是战士们“嚓嚓嚓”的疾走脚步声和“哒哒哒”的马蹄声。天渐渐放亮了，大块大块铅灰色的阴云密密实实地布满了天空，气压越来越低，不知什么时候，天空飘飘扬扬地飞起洁白的雪花来。雪，越下越大，像柳絮，像鹅绒在天空飞舞、飘洒，慢慢地覆盖了山野，大地成了银白色的世界，淡妆素裹，煞是好看。绝大多数生长在南疆的红军战士，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大雪，但是大家却无心赏雪，因为雪天带来了无情的寒冷。大雪天，战士仍穿着单衣短裤，有的打着赤脚。

许多人的眉毛、胡子结了一层白霜。大家口里呼出的气，变成了团团白雾。一个个冻得嘴唇发白，脚板发紫，皮肤发绀。我的脚也渐渐变得麻木起来，脚步不听使唤了。而辎重队的骡马和担子也掉队了，队伍渐渐走乱了，体弱和挑担的同志渐渐落在了后头。各连都派人去搀扶伤病员，俩一起，仨一伙，扶着伤病员不停步地往前走，翻越崇山峻岭。这时，不少伤病员和搀扶的同志都精疲力竭，稍一停步，就想休息，一休息，脚就麻木，想走也走不动了。有的人倒在地上，就很难爬起来。雪地行军，这是红7军北上征途中最艰难困苦的考验！面对大自然的淫威，红军战士们咬紧牙关，一个跟着一个走，以坚强意志和友爱精神，与严寒搏斗。共产党员和干部们把军部在全州搞到的极少量衣服，分发给体质差的战士，自己挨冷挨冻。部队因减员或伤病员而没有人扛的大枪，各级干部都扛在了自己肩上。邓政委、李总指挥、张军长非常关心伤病员，经常把马让给走不动的伤病员骑，自己则在风雪中步行。李谦师长与战士们一样，身上穿着单衣短裤，走在队伍后头，收容掉队的同志。他看到革命战友在寒冷中倒下，心里非常难过，不仅常把马让给伤病员骑，还把体弱战士的枪解下来，背到自己的肩上。领导干部的模范作用，教育和鼓舞着红军战士，给了他们战胜困难的无穷力量。大家互相帮助，互相鼓励，始终保持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晌午时分，部队来到一座山势陡峻的勾挂岭。这里，风雪刮得更猛，路更滑，是道县到江华之间最险峻的地带。

行军途中无法埋锅做饭，每个人在出发时用口盅装上的一些饭作午餐，可是天气太冷，饭已冻得硬邦邦的，很难咬得动。大家只好忍饥受冻战胜疲劳，以难以想象的惊人意志和毅力，终于翻过这一风雪山口。55团1连文书黄超同志，正患疟疾，长长的头发和胡子衬着他那黝黑消瘦的脸，战友都担心他顶不住了，可他怀着对革命的坚定信念，硬是裹着条旧毛毯，在同志们的帮助下，爬过了勾挂岭。一些支持不住的伤病员或体弱的战友，在山岭上被冻僵而牺牲，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有的战士冻僵后，知道自己不行了，叮嘱说：“我死了以后，你们就脱下我身上的衣服吧！”战友们挥泪掩埋了烈士的遗体。后据统计，当时长眠在往江华风雪道上的指战员，达80多名！伴随着夜幕，我军经过40多公里的风雪行军，终于到达被白雪覆盖的江华县城。江华，位于湖南省的东南角，与广东、广西交界。县城不大，只有一条街，但却是历史古城。“连九巍之秀，会廉溪之清”，

曾留下过元结、柳宗元、徐霞客等人的游踪。我军进城时，驻守的民团已逃，大商人和官僚也几乎跑光，家家关门闭户，街上很少有人。部队疲惫至极，周围未发现敌情，军部决定在此休息两天。大家一驻扎下来，赶紧烤火取暖、做饭。

这时迫在眉睫的问题，就是解决部队的御寒和给养问题。当夜，军前委召开了营以上干部紧急会议。会议作出决定：为了这支部队的生存，迅速接收县城敌人的仓库，没收反动官僚的财物，并征用大商户的棉花、布鞋、衣服。这是一项临时性措施。军部存有的现款，也决定拿出来购买衣服。对伤病员则抓紧进行治疗、安置。

第二天一早，我们便分头进行接收、没收和征用工作。小小的江华县城，其商店凡是能御寒的布料、棉胎、棉花、鞋子、袜、帽子等物品，都被我们购买或征用光。因为人多衣物少，故不管什么颜色，男式女式，红的绿的，大的小的，都收来了，然后分发给指战员。大家如获至宝，饥不择食，寒不拣穿，顾不得挑选男装女服，是布料还是成衣，统统用上了。大家穿着这些不伦不类、式样各异的服装凑到一起，你看看我，我瞧瞧你，忍俊不禁。有的上身穿穿着翻领衣，下边却穿着女式裤子；有的头上戴顶瓜皮帽，身上却穿着带大襟的棉衣；有的身上穿着长袍马褂，头上却蒙着老太婆的包头巾；有的用蚊帐裹着身子，脚上却穿着女人的绣花鞋，因男同志的脚太大，绣花鞋穿不进去，只好在鞋尖弄破一个窟窿，把脚趾露出来，这般穿戴，真是男不男，女不女，军不军，民不民，五颜六色，光怪陆离，哪里像个武装队伍，倒像个文艺团体了，真是滑稽可笑。那时，我的脚肿了，但工作异常紧张，得不到休息，只得每天早晚，甚至中午，用热水泡脚，以便使脚消肿。在江华，军部曾没收一些贵重的皮货、料子衣服，不好分给指战员，首长也不好要，故决定把这些衣物拍卖给部队的同志（那时部队中有些人身上还存有大洋）。李谦师长来找我，要我完成这一任务。我只好放弃休息，带一位会计，去拍卖这些东西。由于都是自己人，价钱较为便宜，一件短皮衣才10多元，其它料子衣服有十几元一套的，也有几元一件的，很快卖完了，共卖得100多块大洋。在解决衣服的同时，军部派人解决粮食问题。经理处的同志深入到群众中去，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据群众反映，在江华城郊的罗家寨，有个姓罗的大土豪，他的儿子在长沙何键部队当团长，他平时仗势作威作福，鱼肉乡里，群众对他恨之入骨。红军决定去向他筹措粮食，他嚣张地说：“没有粮食，不论是川军还是滇军来到这里，从来都是他们给我送礼，没听说敢向我借粮的。”经理处的同志把脸一沉：“那好，请跟我们到军部走一趟。”那姓罗的大土豪被押往军部路上，碰到熟人偷偷问：“这是什么‘粮子’（队伍）？”当对方说是共产党的队伍时，他腿一软便瘫倒在地上。

后来，红军历数他的罪状，处决了他，并没收他家的财产。群众看到红军贴在他家门口的处决布告后，无不拍手称快，说红军为群众除了一大害。红军还打开县城牢房，释放全部政治犯，并在火神庙前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我军的主张和政策。随着群众宣传工作的开展，群众也逐渐发动起来。那些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贫苦群众，手执钢刀、长矛、扁担，怀着极端愤怒的神情，同红军一起，冲进了一家豪门大户，搬出大批粮食、衣物，堆在街上。

不少人一边高兴地搬着东西，一边指着恶贯满盈的土豪劣绅唾骂。那些平时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家伙被群众反绑着双手，耷拉着脑袋，胆战心

惊地打哆嗦；有的跪在地上，头像捣蒜似的向群众求饶。没收来的东西，除了一些分给部队解决御寒和给养外，其余全部分给当地贫苦群众。霎时，街市上人头攒动，纷纷抬着或背着分到的东西往家里走，脸上流露出感激的神情。为支援红军，群众纷纷行动起来，派代表把衣物和粮食送到红军驻地。负责接待的红军干部，反复宣传我军纪律，劝群众把东西带回去，但是，群众代表硬是要红军收下，不收下就不肯离开。最后急得群众代表拉着红军干部找到军部。经军首长决定，接受了一部分必需的棉衣和毯子。江华群众这种真挚、纯朴、炽热的革命感情，强烈地打动了每一个红军指战员的心！在江华期间，我军为了今后行动方便，将走不动的伤病员寄养在可靠的老百姓家里，又忍痛把背不动的弹药和两门山炮埋到地下。这两门山炮，从南宁随部队上百色，后在隆安、百色、果化、四把、长安、武冈等战斗中，都立下了功勋。但行军中为了抬山炮，也牺牲了不少同志。虽然以后的战斗中仍需要它，但今后，要攀越湘桂边境的大苗山区，环境越来越险恶，部队人员减少，体力不支，再没有力量抬走，只好丢掉了！第三天清晨，天气清冷，大地仍被厚厚的积雪覆盖着。穿着五颜六色衣服的红军战士，来到城北门外的草坪上集合，准备出发。“砰！叭！”突然枪声大作，子弹从城内，从左、右两侧山地打来。

枪声越来越近、越密，部队暴露在敌人三面火力夹攻之下，有些人被乱枪射中牺牲或负伤。那时，我正赶着骡马和催促挑夫向集合场走，听到枪声便催赶辎重队出城。情况很快搞清了。原来，有一部分敌人早就隐藏在城里，有一部分敌人从城外打来，内外夹攻，企图消灭我军。为了保存我军实力，不与敌人拼消耗，军首长当机立断，抽部分兵力掩护，大部队向北突围。敌人拼命想截断我军北面的去路，然而，红军像猛虎一样杀开一条血路，突破了敌人的包围。

在突围战斗中，58团政治委员杨英不幸胸部负伤。敌人仍穷追不舍，我军边战边退。经过多次反冲击，主力部队终于摆脱了敌人，但担负掩护的连队失掉了联系。担任城外警戒的一个连，也没能收回来。军部根据敌情，决定爬过粤、桂、湘三省边界的老苗山，折回广西贺县桂岭。

革命到底

我军摆脱敌人后，踏着崎岖山路，直奔老苗山。雪，又纷纷扬扬地下起来，酷冷，继续向红军袭来。在江华，基本解决了部队的寒衣，眼前，最难办的是伤病员问题。来不及在江华安置的伤病员，有的脚冻了，肿得像馒头；有的伤口淌着血，一步一个血印，在同志们搀扶下，咬着牙关前进；伤病重的同志，一般安排骑马，山路越来越陡，也容易摔下山去。

当时，因部队减员，许多担架兵都补充到作战连队去，担架员极少。加上这些重伤病员不是短期可以痊愈，他们带病行军，不仅不利于病情好转，还给部队增添负担。这样，军部决定把他们安置在途中老百姓家里养伤治病，留给现洋。

但是，这些同志大都不愿意离开部队，离开生死与共的战友。55团1连有个叫黄永的战士，天峨县人，在武冈战斗时腿负了伤，组织上把他留在老百姓家养伤，他噙着泪向连长表示：“我黄永，生是红军人，死是红军鬼，死也要跟部队走！”后来，他硬是一拐一拐地跟着。他所在那个连是后卫连，他一直跟在后面走，克服了种种难以忍受的困难和痛苦，终于跟到了中央苏区。

部队顶着风雪，经桥市、黄庭、大圩等地，来到地处湘桂粤交界的老苗山前。老苗山，海拔1000多米高，气势雄伟，神秘险要。人要顺着山涧的单边小路才能翻越过去。一进山口，霎时觉得天窄地小，漫山满岭积雪未消，冷风顺着山沟吹来，寒冷逼人。老苗山区一带，素来民性强悍，寨寨有民团武装，家家有枪、箭，过去，从来没有哪一支部队能通过这一山区。对这一带山区的民情和敌情，军部早已听闻。于是，军政治部发出过苗山的指示：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注意群众纪律，买卖公平，耐心向群众进行宣传；同时，要时刻提高警惕，防止民团、地主武装的袭击。这些山真怪，爬过一座山，眼看着到顶了，突然，前面又出现了一座大山。再往前走，前面又是一座大山。真是山连山，岭连岭，一山比一山高，山山岭岭老是走不完。部队小心谨慎地走出了山口。天地较前开阔多了。山间涧底，出现了一些梯田，依着梯田，稀稀落落地坐落着几户人家。“砰叭砰……”突然，四周响起了密集的枪声。部队立即疏散开。只见左右山头闪动着人影，还隐约听到人的喊声，我们一句也听不懂。

从一些情况看来，这是当地民团武装拦路。我们派人去喊话，没有效果，他们仍然向我射击。处在这样的形势下，我军立即发起还击。大家毅然飞身跃涧，直向对面山头猛冲过去。花了很大力气，才冲上了山头。奇怪的是，我军冲上山头，却不见人影，敌人枪声也停止了。

一会儿，后卫方向又响起了枪声。敌人偷偷转到后面袭击我们。

我军判定敌人没有多大力量，奈何不了我们，不再恋战，边打边走。

前卫部队前进到一个宽阔的田坝，不远有一个大村庄。

这时枪声没有了，看样子可以松口气，军部也下达了休息命令。

这时，枪声骤起。大家举目望去，只见四周的每一个山头上，都插着一面面白旗，白旗下有一堆堆人向我军射击。村中的石头墙和碉堡里，也不断向我军开枪。看情况，大概是敌人怕我军进来，又怕我们进来后停下来。他们这样做，无非是要赶我们快走罢了。

我军并不着急，打打停停。敌人开枪，我还击，敌人停火，我也不射击。因为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前进。

我军的后卫部队上来了，在前卫部队掩护下，急忙赶着辎重，横过田坝。接着，战斗部队也跟着冲杀过去，变成后卫部队了。

我军边走边走，穿山头，跨山涧，连松口气、喝水的机会也没有，弄得筋疲力竭。

天黑了，四周的枪声也渐渐平息下来。

部队就地露宿，埋锅煮饭，并四处派出警戒。大家太累了，连话也不想说，狼吞虎咽吃了晚饭后，便带着满身污泥或血渍，倒在山坡上入睡了。夜间倒平安无事，第二天清晨，部队又启程继续爬山越岭。军政治部动员部队，要求做好沿途再打一天的精神准备。真奇怪，我们机警地走了10多公里，均未听到枪声。近晌午时，一个大山寨出现在面前，大家都提高了警惕。当我军走近村旁时，仍没有动静，只见路旁站有几个人，摇晃着白旗，并摆着几担大米和猪肉。他们不等我军前卫人员开口，便指着地上的米和肉说：“贵军真是好汉！从今天起，我们各不相扰，你们过你们的路，我们守我们的寨，你们不要进入我们的山寨，这是我们送给你们的一点薄礼，请收下！”我们朝寨内望去，见石墙上的枪眼里探着黑洞洞的枪口；四周山上，隐约闪着人影。看情形，地头蛇是屈服了。他们知道我们已胜利通过前面的大村寨，这里也同样挡不住我军，故采取这一互不侵犯的政策。军部，当即答应他们的要求，但仍保持戒备。这样，我们顺利通过了一个个山寨。每到一个村子，看到的都是他们插着白旗、摆着大米和猪肉“慰劳”我们的景况。

太阳下山了，我军迎着晚霞，吹着嘹亮的军号，以手枪队为前寻，雄赳赳地向桂岭镇开进。桂岭位于贺县东北部的一个小镇。该县急忙派出警兵和民团武装，开枪骚扰红军，并强迫六七百老百姓砍树拦路，妄图拦截红军进入桂岭。红军只打了几枪，敌人便逃之夭夭，红军遂占领桂岭镇。

当晚，我军分别住在镇上的几个祠堂、会馆及圩亭里，有的露宿在街旁，没有惊动老百姓。第二天上午，军部在街中心张公庙门口的戏台前召开群众大会，由张军长给群众讲话，宣传了我军宗旨和纪律，使受长期战乱之苦的老百姓放心了，更加接近红军，并有20多个贫苦青年，自愿报名参加了红军。红7军艰苦征战，部队严重减员。有的干部负伤后，留在白区治疗了，如王展、袁也烈等；也有因身体不好而离队的，如陈叔度，离队后在途中不幸被害了；更多的人是在行军作战中牺牲了。许多团队建制不全。前委根据此情况，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取消师的番号，由原来两个师缩编为两个团，干部降级使用。机关精简，充实连队。

缩编后的红7军战斗序列及领导人为：

总指挥：李明瑞 军长：张云逸

政委：邓小平

政治部主任：许进

参谋长：龚鹤村

第55团团长：龚鹤村（兼）

第1营营长：章健（原团长）

政委：袁任远

第2营营长：张翼 政委：陈漫远

第58团团长：李明瑞（兼）

副团长：李谦（原师长）

第1营营长：李谦（兼）

政委：麦农本

第2营营长：李显

政委：黎心诚

教导队队长：冯达飞（原团长）

经理处长：叶季壮

我改任58团辎重队长。在缩编同时，军部对走不动的伤病员进行安置。

有的发给路费和生活费，设法送回原籍，或就地寄养在老百姓家里；有的被秘密送到自治区治疗。当时部队的思想比较乱，一些意志不坚定的人经不起考验，也离开队伍走了。他们随浪而起，潮落而去。严酷战争考验，如同大浪淘沙，冲走了动摇者，留下的则是中坚。对于我来说，跟随队伍，革命到底，思想上是坚定的。大革命后，由于反动派的缉捕，自己离开家乡参加了红军队伍，南宁回不去了，已无退路，只有当红军，革命到底，别无选择，因此思想上亦无更多考虑。

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自己从军入党后，特别是经过革命战争实践的锻炼，思想和意志更加成熟和坚定起来。学生时期，自己开始接受马列主义思想，唤起革命的理想和志向，如果说那时凭的是青年的激情，如今，经过战争实践，这种激情已成为坚定的革命信念。虽然那个时候自己并不知道革命怎样才能成功，什么时候能够成功，但对革命必定会取得胜利还是充满信心的。革命到底已成为至死不变的决心。我感到，战争这种特殊环境确实考验人，锻炼人，这也正是我世界观形成的重要时期。

那时部队流行一句话叫“革命成功”，大家都清楚它的含义，不是享福，而是牺牲。每当一个同志牺牲了，大家就说：他革命成功了。部队在桂岭驻扎了4天，经过休息、整编，又筹得了一批经费、给养，补充了一批冬衣，大家的斗志又旺盛起来。

1月17日天刚破晓，部队离开了桂岭。我军离开桂岭后，翻过湘桂交界的大锡界，出鹰扬关，复入湖南江华县境的码市，奔向广东连县，准备到粤北建立根据地。一路行军常常筹不到粮食，部队整天吃不上一顿饭。

一天，部队饿着肚子走了几十里路，到了一个村子外宿营。我顾不上休息，赶忙带人去找粮食。我们来到一个土豪寨子外边，寨门关闭得紧紧的。我向他们讲了要征用粮食，土豪不给，反用开枪威吓我。我手里拿着一把斧头，愤怒地对守寨门的人说：“红军的人多得很，你们若不拿出粮、肉，我就用斧头劈开你们的大门。你们若开枪打死我，你们的人也跑不了。”

同志们看着门里门外刀枪对峙的局面，都为我捏一把汗，劝我离开，另想办法。我想，个人危险算得了什么，总不能眼看着部队挨饿呀！我横下一条心，命令他们赶快送出粮食，不然就攻寨打土豪。

这下把土豪镇住了，不得不用绳子从寨子吊下500斤大米、20斤腊肉和部分青菜。

李谦带着既表扬又批评的口气说：“这些土豪佬啥都干得出来，你要小心点！”

我说：“其实，那土豪已先准备好米、猪肉和菜，若不给他一点颜色看，他是不会轻易给的。”

1月19日晌午时分，我军抵达连县北面的东陂镇，由于敌人的反动宣传，街上空荡荡的，看不到老百姓，更找不到商会人员。

教导队长（原58团团长）冯达飞同志的家乡就住在东陂镇。他请假回家

探望，只见家门反锁，空无一人，不知家人去向。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他带着警卫员挨家逐户去寻找亲戚、好友。他首先找到了早年的同学谭荣胜，此人思想较进步，不相信反动派的宣传，仍留在家里。两位知己久别重逢，喜出望外。

谭荣胜告诉他：“县府说什么红军杀人放火，连小孩都要过刀，老乡和你家的人都逃到附近农村去了，我去把他们找回来。”

“文孝（冯达飞的旧名）回来了”的消息，不胫而走。不多久，冯家门前，聚集着其家人和很多乡亲。身穿灰色棉衣、颈系红领带、腰挂驳壳枪的冯达飞，亲切地和乡亲们话离情，拉家常，谈革命，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和红军的宗旨，揭露敌人造谣诬蔑红军的阴谋。到了下午，受骗外逃的群众陆续回家了。商会人员也回到了镇上。

这样，很快解决了部队的给养问题。入夜，街上灯火点点。街头巷尾，摆满摊子。红军买卖公平，说话和气，给老百姓留下深刻印象。第二天凌晨，人们还在梦中，红军把驻地打扫干净后，辞别了东陂，向垦子镇进发。冯达飞的几位好友，执意送红军到垦子镇。

下午三四点钟，部队将到达垦子镇时，不远处的叉路口忽然响起了鞭炮声，并出现了“欢迎红军”的横幅，这使我们感到意外。原来，垦子镇上的大家小户，在敌人的反动宣传和恫吓下，几乎都跑空了，剩下的十几家殷商富户，他们担心自己一走，店铺就会遭洗劫，于是横下一条心留下来，欢迎红军，以求保护。我军北上以来，很少见到这样的欢迎场面。由于有了受江华商人欺骗的教训，大家保持警惕，在欢迎者带引下，精神抖擞，步伐整齐，进入了垦子镇。部队驻下后，李总指挥和经理处处长叶季壮同志，在住所会见了商会会长和有关人员。李总指挥见他们进屋时诚惶诚恐。便热情地说：“大家不要害怕，走了的，快叫回来，照常营业。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目的是打倒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和土豪劣绅，让广大劳动人民得到解放。我军对于正当的工商业，是予以鼓励和保护的，买卖是公平的，纪律是严明的。”李明瑞是大革命时有名的“虎将”，当地有些人知道他的名字，现在看到他没有半点官架子，诚恳慈和，平易近人，他们才如释重负安下心来。

正商谈间，我军查岗的值班员报告说：“洋花街上的‘永成’油榨铺，大门敞开，店内空无一人。我们已派人看守，特来请商会会长派人把该铺老板找回来。”这使丁会长赞叹不已：“红军确是仁义之师！”他离开军部时，连连道谢。

不久，躲走的居民陆续回来了。冯达飞同志也抽时间去拜访以前的几位好友，并打听到连州城守敌的情况。经侦察，敌人正规部队都在韶关以南，连州城只有数百民团驻守。军部决定：乘夜西下连州，以解决部队的给养问题。1月21日黄昏过后，我军乘着朦胧的月色，进抵广东连州城南的城隍街口。连县县城连州，是粤桂湘边较繁华的城镇，该镇除旧城外，在旧城关南郊又发展了一个繁华的商业区。我军神速占领了城南整个商业区，守卫的民团仓皇逃入旧城，凭据坚固的旧城墙，死守城关。旧城守敌只有几百人，我军完全可以打下，但考虑在繁华城南商业区可解决给养问题，故对旧城只围不打。

当晚，李总指挥和叶季壮同志在城南的军部驻地召见了连州商会会长及知名商界人士，向他们阐明我党保护工商业的政策，要求他们帮助红军筹集

军饷4万元。这些人倒明智，看到红军进驻后纪律严明，买卖公平，故心悦诚服，很快给部队送来一些军粮和肉、菜，还有一部分现款。部队分散驻在中峰山、城东、城隍街等处的祠堂、庙宇或其它公房里，有的露宿在老百姓的屋檐下，虽数九寒冬，也没有进民房惊扰群众。战士口渴向老百姓要水喝，也有礼貌地站在门口等主人端出来，从不随便进入民房。深夜，查哨的同志回来反映说：“伙铺街上的一个哨兵用群众的柴草生火取暖。”军政治部闻讯后，立即派人前往调查。原来是卖糍粑为生的贫民陈贤信，见红军哨兵在寒冷的冬夜站岗，衣单裤薄，冻得发抖，深感同情，便从家里拿出一批柴草，亲自为哨兵生了一堆火。这虽是出自群众的一片好意，但怎能白白耗费群众的柴草呢？于是，政治部立即派人给陈贤信送去柴禾钱，并代表军部向他致谢。李总指挥在学宫门前主持召开了群众大会，向群众宣传我军的宗旨和政策，还讲农民种田吃不饱、工人织布穿不暖的原因，揭露军阀、豪绅鱼肉人民的罪行。当时李总指挥在两广很有影响。他深入浅出的演说，充满着对工农大众的阶级感情，替工农劳苦大众说话，深深地打动了群众的心。

城内反动民团，以为我军软弱可欺，不时打来冷枪进行挑衅。商绅也持观望态度，迟迟不交款。军部根据这些情况，重作决定：迅速攻城，狠狠打击敌人。在部署攻城时，发现水口方向有民团近百人，正向县城运动。军部立即命一个连队出击。红军埋伏在良江附近的一条山冲里，当担任正面阻击的一个班佯装退却，把民团引进伏击圈时，两边山上杀声大作，喊声连天。民团被我军打得晕头转向，纷纷举手投降。这一仗，红军大获全胜。

1月24日，我军乘胜向旧城区运动，把云梯、弹药送到了前沿阵地。守敌见势不妙，立即在旧城墙南门架起一座“猪仔辘”（火炮），准备向我机枪阵地开炮，我军发觉后，把装火药的炮手击毙，使那门土炮变成一门哑炮。敌人狗急跳墙，使出了恶毒的一招。晚上8时许，旧城内的敌人用六七张棉胎淋上煤油，点着火，投掷到城墙外的一大片木屋上，正遇刮大风，霎时浓烟滚滚，火光冲天，照亮了新区半个天空。“民团放火啦！”“救命啊！”风声、火声、群众的呼救声交织在一起。攻城指挥部闻讯，当即命令指战员投入救火战斗。指战员迅速赶到现场，冒着生命危险，冲进了火海，救火，救人，救财产。正当军民一体，奋力抢救的时候，城内敌人疯狂地向救火人群射击。为掩护军民救火，我军架设在“裕泰”楼上的机关枪，对准城内敌人吼叫起来。接着，从东较场发出一颗迫击炮弹，准确地打中了叶日嵩的巢穴——敌县府的院子里。在我军强大火力的攻击下，终于把敌人的嚣张气焰压了下去。火借风势，风助火威，大火吞噬了城南的三条街道，繁华的商业区成了一片火海。参加救火的指战员，像在战场上冲锋陷阵一样，跳进火海，一包包洋纱、一捆捆布匹、一袋袋药材、一担担杂货，从熊熊的烈火中被抢救了出来。离火场不远的荣淬巷内的煤油仓库，存放有数千桶煤油，若火势蔓延，油库着火，整个连州城将化为灰烬。战士们奋力抢救，迅速地把仓库里的数千桶煤油转移到安全地方。在救火过程中，部队还派出武装人员警戒现场，保护群众财物。当时，有极少数坏人混进抢救队伍，趁火打劫，背着物品往自己家跑，都被红军战士抓住追回。

至次日拂晓，熊熊大火才变成了缕缕青烟。中山路南段的数百家店铺及其东侧大片民房终得以保存，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事实是最好的宣传，红军英勇救火，深深教育了广大群众。连州群众这样说：国民党杀人放火，红军救人救火。大火扑灭后的当天下午，连州各界组成代表团，

带着 10 头猪来到城隍街的红 7 军临时指挥部，慰问部队。同时，商会的态度也有所改变，把未交付的款项如数送到军部经理部。基督教会医院在我军崇高精神感召下，免费接纳了百余名红军伤病员。这批伤病员经过治疗后，大部分由香港地下党送入中央苏区。

这时，军部得到情报：广东军阀纠集重兵，分数路前来合围红军，其中一个团，已从坪石窜到星子，第二天可到达连州。据此，军前委决定：撤出连州，迂回粤湘边界，再向江西挺进。

梅花血战

1月26日清晨，我军在群众的热烈欢送声中浩浩荡荡地离开连州。因军部在连州筹足了4万现洋和补充了一批服装、药材、弹药，这时，不仅人人穿上了新衣服，而且给每人发了两个东毫。原来不成体统的样子也开始改观了。我们辎重队的现洋也有了，只是负担重了，除挑夫外，每人背50块大洋。前头部队抵达龙坪附近时，遇上民团百多人。他们不是红军的对手。我军刚一开火，敌人就溃退，慌忙逃命。

由星子镇开来拦截的敌人，也闻风丧胆，逃之夭夭。当晚，我军又回到了星子镇，群众夹道欢迎我们。翌日晨，我军迎着万道霞光，向星子镇群众告别。老大爷、老大娘挎着一篮篮花生，提着一袋袋薯干，硬是一把一把地塞给子弟兵。战士们哪里肯要群众的东西，一再推托，实在推托不掉，只好把钱塞到老百姓的口袋里。部队出星子镇北上，经湖南宜章县的黄沙埠、迳口等地，于2月1日抵达广东省乳源县梅花村（今属乐昌县）。梅花村，位于湘粤边界一个约二三里见方的小盆地，周围群山环抱，峰峦重迭，地势险要。南昌起义失败后，朱德和陈毅同志曾率领部分起义队伍，在宜章举行了有名的湘南暴动，这一带有地下党和农民游击队活动。中共乐昌县委就设在距梅花村8公里的大坪村。进驻梅花村时，天空飘着雪花，地上结着薄冰。

村里的大部分群众，因摸不清我军的底细，纷纷逃到山里，只留下一些老人守门。军部设在垌场西北边的莲花坛古庙里。部队一住下，就立即忙开了：参谋人员到周围一带观察地形，测绘地图，拟定作战方案；政工人员迅速开展群众工作，宣传红军主张，了解群众情况；供给人员到处筹措粮款，安排战士生活；炊事班的同志为了不打扰群众，就在露天垒灶生火；战士们愉快地擦枪抹弹，缝洗衣服。群众看见红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又听了红军的宣传，陆续回到村里来了。

有一个土匪头子，过去与李明瑞认识，李利用这层关系，打开了局面，军民关系逐渐亲密起来，有些群众热情地把战士接到家里安歇；有的主动送来柴草，帮红军烧水做饭。梅花街上有一位姓林的老汉，杀了家里一口大肥猪，热情地送给我军。我军按市价，付款给了老汉。有些红军战士见老百姓穿的衣服单薄，便脱下身上的衣服，送给群众御寒。群众很感动，纷纷奔走相告：“当年的红军又回来了！”

当天中午，中共乐昌县委负责人谷子元同志来到军部会见邓小平等同志，向军前委介绍党中央批判、纠正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的情况。这时，前委才知道部队转战数月来备受艰辛和损失，是由于“左”倾路线影响所造成的。前委讨论了部队下一步的行动问题，认为此地有地方党组织和农民游击队，群众基础较好，决定会同地方党组织，在梅花一带开展群众工作，建立以梅花为中心的粤北革命根据地。翌日上午，阳光灿烂，梅花岭下的围子村，人流如潮涌。军部在该村召开了军民大会。军部首长都出席了大会。会上，宣传我军的宗旨，并传达前委的决定。大家喜形于色，拥护前委在梅花建立根据地的决定。不料，会议刚开完，军部侦察人员报告：敌人约有1个团的兵力，从连州、星子镇尾追而来。对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前委立即进行研究，认为以我军现有的兵力，利用梅花村的有利地形，消灭敌人一个团，是有把握的。

于是，决定迎击敌人，打一场歼灭战。准备作战的命令下达后，各连纷纷进行战前动员和临战准备工作。指挥员火速布置阵地，配备部队，组织

火力，选择出击路线；地方党组织也动员群众拥军支前，配合主力红军作战。55团布置在军营下、石墩下和梅花街等地；58团在草家坪、塘头下、桥头、石围一带防守。

近正午时，战斗首先在画眉岭55团前沿阵地打响。粤军先头部队控制了山口前面的一个制高点后，即以猛烈的炮火向我军射击，掩护其两侧后续部队展开。担任警戒的我军55团的一个连，在连长覃亮之、政治委员（当时连设政治委员）王天的指挥下，抢占了山口周围的山顶阵地，英勇地反击敌人。战斗越来越激烈，枪声、炮声震撼着山山岭岭，浓密的烟雾在半空中飞扬。我军顽强地扼守山口阵地，并以小分队反突击，一次次打击敌人的冲锋。

但是，敌人兵力越来越多，其后续部队不断涌来。这时，我军才发现情报有误：来犯之敌不只是1个团，而是4个团，有粤军邓辉团、王守华团和湘军唐伯寅团、陈龙团，还有地方团队。敌人分成两路，一路沿逢口尾随而来，从画眉岭往南打；一路从坪石来，经莲塘向东进犯，形成钳形合围态势。在严峻的形势面前，我军指战员以一当十的英雄气概，奋不顾身地抗击敌人的疯狂进攻。

当敌人接近我55团前沿阵地只十来米时，王天同志便向战士们大声喊道：“同志们，拿出我们红军的英雄本色，上刺刀，把敌人捅下去！”随着该连政治委员和连长一呼，战士们端起刺刀，跃出工事，勇猛冲杀，不到10分钟，敌人丢下二三十具尸体抱头鼠窜。

随后，覃连长和王政委率队又击退了敌人两次进攻。

战斗中，覃连长不幸中弹牺牲。敌人屡攻不克，又调动了两个团的兵力，一齐向我55团的阵地压来，黑压压的一片，我军处境十分危急。55团阵地是整个战场的关键。

张军长亲临火线了解情况后，立即命令军部特务连增援。李天佑连长率特务连赶来了，与55团的同志一起，向敌人冲杀过去，打退了敌人的进攻。输红了眼的敌人，仗其人多弹足，又分三路向我55团阵地发起猛烈攻击。特务连和55团的战士们，为节约子弹，等敌人靠近时，甩出一阵手榴弹后，端起明晃晃的刺刀，随着“抓人摊”（两广白话，肉搏之意）的口令声，便向敌猛扑过去。刺刀捅弯了，便用枪托与敌对打。枪托打飞了，徒手与敌搏斗。

正厮杀得白热化时，突然，敌阵地两侧枪声大作。原来，55团第1营营长章健率该营从左侧杀奔过来，58团第2营营长李显率部出击，从右侧插过来。敌人经不住这两股铁流的冲击，阵脚大乱，急忙后撤，但为时已晚，我军如高屋建瓴之势左右夹击，打得敌人焦头烂额，歼敌百多名。敌人正面攻击未遂，便重新组织兵力，掉转矛头，扑向我军左侧高地，妄图抢占山头，用炮火控制整个战场。

守左侧高地的章健营长，看到敌人猛扑过来，便挥动手枪高呼一声：“同志们，杀呀！”率领战士，迎着敌人的枪弹，以刺刀见红的大无畏精神，硬把敌人压了下去。

这是我军第5次打退敌人的进攻。敌人没有放弃对左侧高地的争夺，过了一会，又发动了对我军的第6次进攻。其人数比前几次更多，其掩护炮火更加猛烈。待敌人冲到山腰时，章健营长身先士卒，率战士们以反冲锋迎击敌人的进攻。不料，他刚跃出几步，“轰”的一声，一颗手榴弹在他身边爆炸了，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战士们见营长牺牲，个个红了眼，紧握钢枪，拚力冲杀，一鼓作气，打退敌人的进攻。与此同时，我军右翼的战斗也在激烈

地进行。

邓小平政委和李明瑞总指挥亲自到 58 团阵地指挥。当邓政委和李总指挥命令李显营长率队转向敌人左侧发动攻击时，敌人也企图从左翼出奇制胜，于是发生遭遇战，双方都是进攻，都在争取主动，经过激战，敌人终被我军压下去。李显营长在肉搏战中不幸负伤。战斗持续到下午 3 时整，敌人孤注一掷，把后援的两个团都用上了，分三路向我军发起集团冲锋，妄图击破我军左右策应、交错冲锋的战术。敌人来势汹汹，炮声、枪声、号声、喊杀声响成一片，烟雾弥漫，沙尘滚滚。

率队镇守在草家坪后山高地的 58 团 1 营营长李谦见敌人扑来，急红了眼，他向李总指挥请命：率队反冲锋。李总指挥表示同意，并亲自率队给予支援。以勇猛著称的李谦，总是在最危急的关头挺身而出。这次，他率领原担负掩护任务的该营战士，勇猛地向敌人发起反冲击，一次又一次地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子弹从他头上飞过，他全然不顾。激战了半天，我军子弹不多了，李谦就带领战士们捡回了一批手榴弹和子弹。他还动员大家修好工事，准备迎接下一次战斗。敌人在李谦营阵地前吃了亏，便集中炮火向该营坚守的高地射击。红军指战员隐蔽在工事里，李谦对大家说：“我们脚下这块高地，是梅花岭的咽喉地带，大家要准备好，敌人不到跟前不打枪，挤到脚下时才扔手榴弹，誓死守住阵地！”敌人用炮火轰了一阵，不见还击，以为我军阵地被轰垮了，便倾巢出动。

敌人黑压压一大群爬上来了，待敌人爬到阵地 10 多米时，李谦才下达命令：“轰手榴弹！”顷刻，一颗颗手榴弹在敌人头上开了花，一排排敌兵，像被炸开了的石头，顺着山坡滚了下去。敌人连续 7 次进攻，都被我军压了下去。夜幕快要降临时，伤兽犹凶的敌人发起了第 8 次冲锋。当敌人冲到近前时，李谦亲自率领一个排的战士，手执钢刀，冲出工事，展开肉搏战。

战士们见李谦冲杀在前，更奋勇杀敌，又把敌人压了下去。李谦率战士们乘胜追击逃敌，当冲出松树林时，突然，射来一声冷枪，把李谦打倒了，子弹穿过他的皮带，肠子从伤口流出来。机炮连连长李标跑过去扶住他。他把枪交给了李标，忍着伤痛，睁着彪圆的双眼，指着山下的敌人命令道：“不要管我，快冲下去消灭敌人！”喊声刚落，他全身一软，昏厥过去。战士们很快将李谦抬了下来。正在军部指挥所的邓小平政委和张云逸军长听到李谦负伤的消息，急忙来到李谦的担架旁，见李谦脸色苍白，呼吸微弱，嘴唇翕动了两下，又昏迷过去。

不久，他在转移路上，突然停止了呼吸。这位勇猛善战的红军指挥员，长眠在梅花岭的幽谷里。李谦和何莽是张军长非常信赖的红 7 军战将，他们牺牲后，张军长不禁落了泪。天黑以后，敌人暂停进攻。军前委认为不能再恋战下去，更不能在此立足开展工作，为保存有生力量，决定放弃原来计划，撤离梅花村，向乐昌河挺进。

我军在当地农民游击队配合下，撤出最后一个阵地——大岭下王家。游击队支队长杨高林奉命把一面红旗插在阵地上，两侧的敌人以为红军还固守阵地，拼命向阵地发射炮弹，打了大半夜，才知道中了我军的空城计。梅花血战，是我军北上以来最悲壮、最惊心动魄的一战。是役共歼灭敌人 1000 余人，我军也伤亡 700 多人，干部伤亡约占干部总数的三分之二。李谦营长（原师长）、章健营长（原团长）等光荣牺牲了；团长龚鹤村（原军参谋长）、营长李显、袁也烈、王展等同志负了伤。部队损失严重！当时我们做军需工

作的同志，除了筹措给养外，主要是协助军部收容所做好处理伤员和烈士工作。因该所包括担架排在内只有三四十人，忙不过来，我们便与政工人员一起，帮助他们抬担架，安置、转移重伤员到附近老百姓家里医治。对牺牲的烈士，只能草草掩埋，连个墓碑也没有，真是：“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血染梅花花更红，红7军指战员的鲜血染红了梅花村的山山岭岭。

抢渡武江河

我军撤离梅花村后，连夜向武江河畔的杨溪口急进，拟渡过武江河后，奔江西，与中央红军会合。途中，漫天雪花，道路泥泞，加上部队与敌恶战大半天，水米未进，大家饥饿、疲劳不堪，但后有追兵，我们连停脚的机会都没有。

撤至大坪村时，已是夜里10点多钟。部队在大坪村稍事休息，匆匆吃了饭，又立即出发了。从大坪至杨溪口要走50多公里崎岖山道。为了甩掉尾追之敌，大家不顾疲劳，日夜兼程，穿山越岭，于2月5日晨，抵达武江河边的杨溪渡口。武江，发源于湖南的临武，经宜章把乐昌县分为东西两面，因它流经乐昌的缘故，人们又把它称为乐昌河。我们来到江边，只见江水滔滔，白浪翻滚，犹如一头咆哮的猛兽，向韶关方向奔涌。河水又深又急，徒涉是不可能的。唯一能够利用的渡河工具，只有那搁在浅滩上的两只小船。邓小平和李明瑞同志站在高坡上观察地形，思考着渡河的手段。过一会儿，他们走下坡来，找张军长等人进行了一番研究，决定由邓小平和李明瑞同志率领军部、55团以及58团一部首先从杨溪口渡河；张云逸同志率58团一部和军经理处、卫生队以及全军伙食担子殿后。

渡河开始。由船夫帮助撑船。因船身狭小，两只船一次只能坐三四十人，而往返一次需要几十分钟。后面的辎重马匹和轻伤病员陆续赶到，岸上挤满了等待渡河的人群和辎重马匹。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渡河的速度很慢，真是急人！若不尽快过河，一旦被敌人发现，我军便处于背水作战的险境。人们屏息不安地观察着四周的动静。至下午3时多，才渡过了军部、55团和58团的部分同志。为防止敌突然袭击，过河部队立即控制了河边的滩头阵地。夕阳将要下山了，张云逸军长率领的军直属队特务连（即警卫连）、经理处、卫生队、休养连和58团的两个步兵连共五六百人尚未过河，我也在其中之一。

这时，河那边突然响起了密集的枪声，紧接着，飞过来几颗炮弹，有几位同志被炸伤。特务连政委吴西被一块迫击炮弹片穿进了右大腿，负了伤。医务人员包扎后，经理处长叶季壮让我给他一些大洋，又给当地农民一些钱，把吴西同志安置在地方了。渡河的小船返回来了，带来了邓政委、李总指挥的指示：大批广东军阀部队从韶关乘汽车来了，乐昌的守敌亦向杨溪附近的长来圩扑来。双方已展开激烈的战斗。过河的部队正在观音山高地一带咬住敌人，掩护部队渡河，未过河的部队要抓紧时间迅速渡河。真是刚离战场，又入火网。敌人的炮火封锁了江心，敌人的炮弹落在河面上升起根根水柱。小船在炮弹溅起的浪花中摇晃，速度更慢了。等待渡河的同志，都焦急地注视着河里拼力摆渡的小船。小船利用战士鲜血换得的宝贵时间，冒着炮火不停地在河面上来往抢渡。太阳下山时，枪声、炮声再度急剧起来。

原来敌人又增加了兵力，分三路向我过河部队展开猛烈攻击。“隆隆”的炮声震耳欲聋，我们还隐隐约约地听到对岸战士们的冲杀声。张军长在岸边，组织部队抢渡。小船每次回来，他都要和船夫交谈几句，询问那边的战况。不久，对岸我军的机枪声停止了，跟着，敌人的炮火也停止了，河对岸出现死一般的沉寂，令人焦虑不安。人们隔河相望，想看出个究竟，可除了团团硝烟之外，什么也看不见。难道过河部队撤走了吗？大家正在猜测、担心时，我们的机关枪又“嗒嗒嗒”地吼叫起来，大家的心里都很明白：这种情况说明阻击部队的弹药不多了。枪声忽起忽落，忽紧忽疏，一直打到黄昏，

形势对我越来越不利。两只小船载满了 58 团的一批战士驶到河心时，对岸射来一阵密集的重机枪子弹。小船转了个弯，被挡了回来。张军长用望远镜一望，看见黑压压的敌人已经占领了对岸阵地，并正在朝我们这边架炮！因敌人不断追来，在敌众我寡情况下，邓政委和李总指挥被迫率过河的部队突围，夺路向仁化和江西崇义方向急进。我们的部队被敌人截断了，继续渡河已不可能，怎么办？留在河边的几百人，除特务连等几个连是战斗部队外，其余都是非战斗人员，病的病，伤的伤，连枪都不全，人们焦的不安，谁也拿不定主意。

大家正茫然不知所措时，人群中有人喊道：“军长来了！”大家回头望去，只见张军长骑着高头黑马迎面驰来。原来，他看到对岸敌人封锁了渡口，骑马到附近探索渡河路径，而下游的长来圩渡口，也已被敌人占领，又立即折回来。

张军长飞身跳下战马，同经理处长叶季壮、58 团的黄子荣等同志商量了一阵后，站在一个高地上对大家说：“同志们，敌人已封锁了渡口，正在架炮对着我们，现在已过不了河，我命令：立即从原路后退！”后退以后怎么办？军长没有说。

他接着说：“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我们红军战士的前进道路！我们一定能渡过武江河，一定能够汇合朱毛红军！”

军长讲话坚定有力，神情自若，大家忐忑不安的心情也慢慢平静下来。

在张军长的带领下，战士们拖着疲惫的身子，摸黑向后撤退了。队伍沿着原路，一口气走到王坪村时，已是晚上 9 时多。前面是大瑶山区，一位瑶胞带路，使我们顺利通过瑶山哨口。到达大洞村时，队伍才停下来宿营。连日来行军作战，战士们疲劳至极，虽然严冬寒夜，但大家随便找个地方，倒头便睡。而在一片鼾声中，一些共产党员和干部，却自动拿起枪，在村边山坡上放哨巡逻，并迎接陆续赶上来的掉队人员。翌日晨，张军长传令集合部队。大家纷纷从山坡上、房屋里向村里的晒谷场走来。有的握着枪，有的赤手空拳，有的拿着扁担，有的拄拐棍，有的牵着牲口扶着伤病员，各式各样，只是拿枪的人太少了。人员到齐了，张军长站在高处，对大家讲话：“同志们，我们中国工农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打不垮拖不烂的铁军。

目前，摆在我们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战胜敌人克服困难，去找中央红军；另一条路是被敌人消灭，当国民党军阀的阶下囚。大家看走哪条路好？”“找中央红军去！”几百人齐声应道。“对！战胜敌人，找中央红军，是我们的唯一出路！现在前有阻敌，后有追兵，我们这几个战斗连队，对付不了敌人，怎么办？”张军长提出了他思考的扩编战斗部队问题。一听说扩编战斗部队，人们的情绪沸腾起来，炊事员、饲养员、卫生员等后勤人员都纷纷要求拿枪参加战斗。张军长拳头一挥，斩钉截铁地说：“为了加强部队战斗力，轻装前进，所有非战斗人员，都要尽可能武装起来，拿起武器，继续前进！”随后，大家立即分头整理行装，把笨重的辎重和伙食担子、箩筐、扁担等东西丢掉，拿起烈士遗下的枪支，部队重新组编为 6 个连，仍用 58 团番号。团长为黄子荣。因团的辎重队撤销，我要求到连队去，张军长分配我到第 4 连担任连政治委员兼党支部书记。连长是曹振亚，湖北人，参加过北伐，作战有经验。我过去没有直接指挥部队打仗，现在，临危受命更感到自己责任的重大。

部队组编后，几百人都武装起来，战士们斗志昂扬，顶着凛冽的寒风向

湖南方向挺进。部队经过一天多急行军，在地方党组织帮助下，绕过乐昌县城，于2月7日上午10时左右，来到武江上游的坪石渡口。

这里的河面不宽，但两岸陡峭，怎么过河呢？大家正议论着，恰见有两条大木船顺水而下，这可把大家乐坏了！纷纷喊道：“船上大哥，我们是工农红军，请麻烦摆渡我们过去！”

船缓缓靠到了岸边，两个年过半百的老汉跳上岸来，很亲切地请我们上船。原来，这一带群众基础较好，湘南暴动时留下了不少党团员和革命者在工作，据说其中一只船是地下党特地从罗家渡派来帮助我们的。在船工老大的热心帮助下，两只船迅速地往来摆渡，仅用两个多小时，到中午时分，我们全部渡过了武江。经理处的同志掏出几十块大洋送给船工老汉，表示感谢。

两位船工老汉连连摇手拒绝说：“同志，自己人不必这么客气，祝你们胜利！”两位老汉迅速撑船离开渡口。

我们登上河边的山顶，回头望着波浪滔滔的河水，老人的船已顺水远去。我们冲破广东军阀的重重封锁，胜利渡过武江河后，由乐昌地下党派来的两位老乡带路，冒雪经乐昌的黄圃、塘村向湘南挺进，“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这是毛泽东同志描写1930年2月红军从广昌进军吉安途中的情景，也是我们当时行军的写照。虽然雪天爬山路又滑又险，但大家想到毛委员、朱总司令亲手建立的湘赣革命根据地就在前面，心里顿添力量。经过几天的雪地行军，我们于2月中旬到达了湖南酃县的一个小村子。

当地的群众基础较好，一听说红军来了，老百姓都热情前来慰问，送来了粮食、腊肉和香喷喷的粽子。当时正逢旧历除夕，村子呈现着一派节日气氛。部队经过长期的行军打仗，生活艰苦。现在，大家都想趁过春节吃顿好饭。各连队把群众送来的大块的腊肉放在锅里煮，发出一阵阵诱人的香味。该地尚属游击区。我们连驻扎在村边，一个排在前沿，连部在中间，后边是两个排。前沿的排放了复哨，在排部门口设了卫兵。我们估计敌人也要过年，不会来攻。

结果，让敌人钻了空子。第二天是农历大年初一，早上，狡猾的敌人悄悄绕过我军的前哨，突然冲到排部门口。门口的卫兵已来不及打枪，急忙跑进屋，关起门来，大喊：“敌人来了！”大家急忙拿起枪，推开门冲了出去。好在这只是敌人的先头部队，我们一猛冲，敌人退了回去。过了一会儿，敌人又来进攻，火力很猛，我军为避免无谓的牺牲，在张军长的指挥下，边打边撤，安全撤出了这个村子。我们把准备过春节的腊肉、粽子都丢了。

那天正下着雨，我们沿着山沟急步向北走，敌人在后面尾追了一段路，追不上，才转回去。我们连续走了几天，几经艰难于2月下旬来到了湘赣革命根据地的酃县黄泥潭。黄泥潭，东面紧邻江西宁冈，地势险要，纵横几十里都是山峦重迭，古木参天。

这一带是毛泽东、朱德同志亲自开辟的革命根据地。就在我军到达的上一个月，赣边的农民游击队还乘虚攻下了酃县县城。该镇已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在我军到达之前，中共湘南分区委已给各地发出关于欢迎和慰劳红7军的通知，所以群众见我们来了，都非常热情地欢迎我们，纷纷前来慰问，送吃的、用的、穿的，杀猪宰羊，问寒问暖，亲如一家。战士们看到这番情景，感到非常高兴。那天，雨雪初霁，春光和煦，山野泛绿，百鸟啼枝头，溪水瀑瀑……这一切，都好象在欢迎我们这支转战千里的队伍。指战员们在热烘烘的太阳底下谈笑着。有的在剪头发；有的在洗衣服；有的在捉虱子；

有的跳至冰冷的溪水里，痛快地洗澡，张军长也来到战士们中间笑着说：“我们终于见到阳光了！”

这句话，隐含了北上几个月来征途的艰辛，也道出广大指战员见到湘赣革命根据地的喜悦心情！部队到达湘赣根据地后，张军长一直挂念着邓政委和李总指挥率领的55团去向，多次派人去打探消息，但都没有结果。部队在黄泥潭刚驻3天，号称“湘南王”的土匪头子胡凤璋率一団地主武装向苏区进攻了。

张军长命令部队投入战斗，歼灭敌人。在当地游击队的配合和群众掩护下，我军隐蔽在高山的半腰，占领有利地形，准备伏击敌人。苏区的群众也紧急动员起来，挑担、带路、抬担架，跟随部队行动。战士们看到这种如鱼得水的情况，感到这与白区作战，真有天壤之别。当敌人进到山沟里刚埋锅做饭时，我军从山腰上猛冲下去，似神兵天降，敌猝不及防，不到半小时，便被我军打得抱头鼠窜，狼狈溃逃。这仗歼敌10多人，活捉40多人，缴枪50多支，我军无一伤亡，敌人煮下的饭菜也都成了我军的战利品，这一小胜，可说是我军给苏区人民献上的一份见面礼，我军把缴来的枪支和俘虏都交给当地苏维埃政府和游击队处理。对于我来说，这是第一次指挥部队打仗，旗开得胜，心里自然高兴。

几天后，我军在当地群众的热烈欢送下，离开黄泥潭，离开前夕，我军留下一些干部，以帮助当地发展革命武装。这些留下的干部或伤病员，后来成为当地红军的骨干。

2月底的一天下午，我军来到宁冈附近的水口镇。这是赤白交界的地区，指战员们都提高了警惕。我连担任警戒。部队吃晚饭时，忽然从警戒线传来了枪声，说是“敌人”从北边上来了。战士们放下饭碗，抢占山头。我们从山头往外看去，对面山上走来一支打着红旗的队伍。我们遂停止开火，经用军号联络，才消除了误会，知道对方是红军队伍。这是王震同志率领的湘赣革命根据地红军独立1师第3团的队伍，王震为该团政委。他们听到红7军开来的消息后，专程来迎接我们。开始，他见我们穿的衣服褴褛不堪，军旗因风吹日晒已褪成白灰色，以为是民团武装，遂发生刚才的误会。两支红军队伍在山头会合了。大家握手，拥抱，互相慰问，虽然素不相识，但都是红军兄弟，就像久别的亲人一样亲热。我带王震同志去见张军长，双方共商行动计划。

翌日，两支部队一起向湘赣苏区的中心——永新前进，以配合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反“围剿”。当部队进到湖南茶陵县李家村游击区时，得到情报说，湖南军阀何键调两个团，由师长陶广率领，尾追我军而来，并有敌军迂回我两翼。当时，独立师第3团是小团，只有3个连，红7军只有6个连。经研究决定，两支部队统由张云逸军长指挥，迎击敌人。除我们第4连担负警戒、特务连作预备队外，其余4个连全部投入战斗。战斗打响后，我58团和独立师第3团分别从正面和左侧面向敌人攻击。敌人控制了两个约600米高的山头，居高临下向我军疯狂扫射。我军一面作佯攻，一面勇敢地向山顶进攻。敌人的密集火力，挡住了我军去路。攻击部队即派出小分队，由侧面绕过山后，准备侧击敌人。

在这时，左边山头敌人的机枪集中射来，我迂回分队陷于敌火网之中，只得撤出。左侧独立师部队的攻击，也进展不大，战斗形成了拉锯战。这对于比敌人兵力少几倍的我军来说，是很不利的。敌人的左侧是一个村庄，有

一个小部队牵制着，中间隔着约 600 米长的田坝。要攻击这个小村庄，就非通过田坝不可，而要通过田坝，会受到村庄敌人的正面射击和制高点敌人的侧击。张军长经过仔细观察和考虑，认为只有通过田坝去击溃敌人的牵制部队，而后迂回敌后，才能战胜敌人。于是，张军长下定决心，调担任警戒的我们第 4 连去执行这个任务。接到任务后，我和连长立即把战士们集合起来，曹连长在队前进行战斗部署：快速通过田坝，占领对面村庄，然后迂回敌主阵地！通过田坝时要勇敢沉着，一个跟一个，相距一米，掙枪跑步前进，到达村边时，拼命猛攻，只能前进，不能后退，打出红 7 军的威风来！随即，曹连长驳壳枪一挥：“跟我来！”战士们浑身是胆，一个个猛虎下山似的冲去。

当冲到田坝时，被敌人发现了，顿时，机枪、步枪从正面、侧面向我连疯狂射击。我和曹连长纵身一跃，跳入田坝，跑步向前，紧随于后的是值星排长王宣和拿大旗的旗手老伍。接着，第 1 排、第 2 排、第 3 排都相继跑步冲了上去。快冲到村边时，敌人突然扫来一梭机枪子弹，我后边的王宣排长等 5 个同志的脚都被子弹打伤了。跟上来的战士看见老伍的脚负了伤，接过他手里的大旗，继续前进……红军战士高举红旗，冒着敌人密集火力，勇往直前。这种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惊乱了敌人的阵脚。我连接近村庄时，敌人怕打到自己人，侧面的火力减弱了。

趁这有利时机，曹连长机警地发出口令：“散开，冲呀！”随着口令，第 2、3 排立即分散在第 1 排的左右两边。大家吼着，潮水般冲进了村庄。敌人招架不住，慌忙退却我连乘胜追击了一阵，又转向左边，迂回敌人主阵地。这时，红 7 军担负正面攻击的特务连、第 5 连，同左翼的红 3 团一起，向敌主阵地发起总攻击。敌人遭到前后夹击，不到半个小时，即全线崩溃。我军猛追猛打，势如摧枯拉朽，不让敌人有半点喘息的机会。狡猾的敌人，以小部队作掩护，撤出大部队。我军也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以小部队攻敌掩护部队，而以主力绕过侧后追击敌主力。这样，敌人的掩护部队也不得不后退了；有的敌人被夹击逃不了，只好缴械投降。

我军一直猛追了 10 多公里才收兵。后面的马夫和挑夫都拿着棍子或扁担当武器，也抓了不少俘虏。太阳西沉，晚霞映红天际，我军收兵凯旋。这一仗，打得干净利索，是红 7 军 58 团与湘东南独立师第 3 团会师后打的第一个大胜仗，共歼敌人 300 余，俘敌副团长以下百人，缴获一批军用品。令人难忘的是在这次战斗中，苏区群众支前参战的担架队、挑担队、炊事队等共达五六百人，和战斗部队的人数差不多。我们的伤病员，及时被抬下火线护理。当我们凯旋时，沿途群众欢欣鼓舞，送茶送水慰问部队。红 7 军进入湘赣革命根据地后，接连打了两个漂亮仗，声威大震。这一带的敌人已知道红 7 军的战斗力，不敢轻举妄动。当地群众到处传颂红 7 军英勇杀敌的故事。

永阳歼敌

几天后，我 58 团和湘东南独立师第 3 团挥师北上，于 3 月下旬到达江西永新县休整。永新，号称“江南古邑”，是当时湘赣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和省委驻地，1927 年秋收起义部队的著名“三湾改编”就在永新地区进行。这里群众思想政治觉悟较高。我们一进永新，看到根据地的苏维埃政权巩固，翻身农民生产积极性高涨；红军部队军容严整威武，顿觉耳目一新。当地党组织、政府派出慰问队迎接我们，一群群前来慰问的人，亲亲热热地把战士们围起来，问寒问暖，像在迎接久别归来的亲人一样。穿戴整齐、喜笑颜开的姑娘们，来到战士们中间唱山歌，跳“毛毛雨”舞，还抢着给战士洗衣服，慰问队走了一批，又来一批，应接不暇。到处是笑声、歌声和暖人心窝的问候。饱受征战之苦的红 7 军将士，来到革命根据地后，处处感到新奇、温暖，真是换了一个新天地！湘赣苏区的红军，除了独立 1 师外，还有红 20 军。这 3 支部队在永新会合在一起了。为统一指挥，湘赣省委决定成立一个临时总指挥部，由张云逸军长任总指挥，曾炳春（红 20 军政委）任政治委员。

部队有红 7 军 6 个连，红 20 军 3 个小团，独立 1 师两个小团，共 3000 多人，军威大振。我们在永新休息了几天，开始接触到毛泽东同志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学习了游击战争、群众工作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许多新鲜的东西，令人难忘。此时，中央苏区正在进行第二次反“围剿”，为牵制敌人，配合中央主力红军粉碎敌人的“围剿”，湘赣省委决定 3 支部队采取联合行动，攻打吉安县的永阳镇。

永阳，位于吉（安）泰（和）盆地之间，是个千余人的小城镇，东、北两面环绕着一条不能徒涉的小河，西边是丘陵地带。南面是一片开阔田畴。该镇距吉安县城 20 多公里，离井冈山 50 多公里。敌罗林旅的两个团驻在该镇，是包围湘赣革命根据地的前哨阵地。我军分两路进攻，其兵力部署是：独立师两个小团从东面过小桥，通过田畴，攻敌右翼，以夺取该镇；20 军从左翼进攻永阳镇右侧，以策应独立师；红 7 军为总预备队，埋伏在独立师和 20 军之间的永阳镇对面，我们第 4 连隐蔽在独立师后面的一个山坡上。

4 月 4 日拂晓，战斗打响。英勇的独立师部队在团政委王震率领下，神速地突入永阳镇内，与敌展开激烈的巷战。因敌人措手不及，独立师一下子就缴获了一批枪支和迫击炮，并向纵深发展。狡猾的敌人以一部抵抗，而其主力沿山地向我左翼的红 20 军阵地进攻。由于敌众我寡，红 20 军的战斗力不强，交战不久便退了回来。一直退到红 7 军的位置，离我军指挥部很近。张军长要组织红 7 军反击，但被后退的红 20 军的部队挡住了，队伍无法展开，敌人又接踵而至，只得向后撤退。于是，敌人很快占领了我总预备队的阵地。敌人追过来了，张军长身边只有一个排，其他部队分散隐蔽。他一面指挥这个排迎击敌人，一面带着两名警卫员，冲上山头，观察和指挥战斗。在此同时，另一股敌人约有一个营的兵力，向独立师侧后的小桥攻击前进。这就使进入永阳镇内的独立师处于被敌包围的危险。当战斗开始不久，我连听到前面激烈的枪声时，以为是进攻得手了，可过了一会儿，枪声越来越近，而且见到左翼山上的部队很混乱，也分不清是敌是我。没有得到军部的命令，怎么办？曹连长找我商量后决定，把全连拉到靠近镇内的河东去，以便了解情况，主动寻机参战。我们当即派传令兵前往军部报告，率全连开始向河边行动。这条小河不太宽，但水流很急，徒涉困难，只得踏着露出水面的大石块缓缓而过。曹连长看小河如此难走，便让我带队先过河，他带一个班控制高

地，掩护我们。然而，过河的速度很慢。20多分钟，才有30多人过河。这时左翼方面的枪声很急，情况不明。我把过河战士集合在大路上，等待尚未过河的战士。枪声越来越激烈。我想，若等到全连队伍过完或等军部指示再参加战斗，恐怕时间来不及了，枪声就是命令，应当积极主动地寻找战机，参加战斗。

于是我率领过河的36名战士从大路向枪声密集的地方奔去。刚赶到小桥边，看见桥边山地上站着十几个人，原来是独立师师长李天柱同志和他的随从人员。李天柱同志表情严峻，焦急地对我说：“七军同志们，你们来得正好！敌人一个营正向这边迂回独立师，如果到了这座桥，截断独立师的退路，我们两个团就撤不出来了，我这里已没有兵了，请你们冲过桥去，把迂回过来的敌人压下去，我们死也死在一起！”情况比我想的还要危急。“请师长放心，我们就是来参加战斗的！”我把火线旗一挥，大叫一声：“同志们，跟我来！”36名健儿箭一般冲过桥去。过了桥，敌人的前头部队已迎面而来。

我又把旗一挥，队伍立即变成横队形，向着敌人冲去。这是一片长着稀疏树木的起伏地。

原来在这里防守的只有10多个赤卫队员，见我们冲过来，十分高兴，立即呐喊助威：“冲呀！”“杀呀！”可我们的队伍并不作声，个个掂着枪直向前冲。对面百余敌人见冲过来的队伍不声不响，也不打枪，拚命往前冲来，断定是碰上了来者不善的老兵。加之后面赤卫队员的呐喊声，摸不清虚实，竟慌了手脚，纷纷掉头往回跑。

我们还没放一枪，敌人自己先乱了营。

“冲呀！追呀！”我连的36名“猛虎”，勇猛地冲杀过去。少数顽敌，利用树木作掩护，企图顽抗，被战士们的排枪打得慌忙逃窜。我们跟踪追击，边追边打，一直追了三四里路。追到田边，我便命令战士们卧倒射击。敌我双方对峙了几分钟，敌人看到我军没有前进，便用一个排反击，从灌木丛中冲了出来，我们一排密集的枪弹打过去，敌人缩了回去，双方对打了一阵。有一个敌军官站起来，骂了一声“吊那妈”，向我打了一排枪。

我也站起来打了他一排枪，双方都没有打着。这时，我看到王震的队伍已近桥边，趁敌人缩回去的时候，一转身，把火线旗向后一摆，喊声“撤！”战士们立即向后飞奔，撤出战斗。

我们走了几十步，当敌人发觉我军后撤又发起冲击时，我们已过小桥，赶上了自己的部队。这会儿，独立师的部队也撤回到桥头那里集结。我检查一下人数，36名战士一个不少，只李顺排长和一名战士负了伤。李天柱师长见我们击退了敌人，高兴地同每个人握手，连连称赞道：“你们红七军作战勇猛，真是名不虚传！”这时，曹连长带着我连其他同志也来了，全连又会合在一起。张云逸、黄子荣、叶季壮等首长得知此战斗情况后，表扬说：“4连主动出击，打得好，不仅解救了独立师，也打乱了敌人的整个部署！”据军首长们说，敌主力见其迂回部队被我连击溃，怕被我军夹击，便慌忙撤退。我军于黄昏时占领了永阳镇。永阳战斗后，我被调到第6连担任连长兼政治委员（不久改为政治指导员）。6连是红7军过乐昌河时组建的新连队。其成员除部分刚治愈的伤病员外，大部分则是机关中的“三兵”（勤务兵、司号兵、通信兵）和“三夫”（伙夫、马夫、挑夫）。在这些勤务人员中，不少人年纪较大，缺乏战斗经验。

我到6连后，针对连队人员来自各个方面，大家各有优长的情况，强调

要注意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搞好内外团结。在党支部委员会中，统一了支委的思想。在党员的带动下，组成了战斗互助组，全连出现了团结、互学、互助的新局面。

安福大捷

4月上旬，我58团开回永新。在休整期间，连队进行了政治和军事整训，学习苏区形势和红军纪律，开展技术战术训练。大家认真学习，刻苦训练，战士们的政治思想和军事技术素质有了很大提高。

4月中旬，军部从敌人报纸上刊登的一则消息中得知李明瑞总指挥率领的55团在遂川一带活动。张军长马上作出决定：除教导队驻永新外，部队即向遂川靠拢。原来，邓小平、李明瑞同志率领先渡过武江河的55团和58团一部分，冲破敌人重重包围和阻截，于2月上旬经广东的仁化县转战到江西省的崇义县。55团在崇义驻了20多天后，遇敌人进攻，便向北撤到营前。

这时，邓政委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指定许卓代理政治委员。后该团经遂川的大汾，到达江西永新县的天河镇，与湘赣边区红军独立师的一个团会合。这时，该团也打听我们58团的消息，正向永新方向赶来。这是一个春色怡人的日子。我们58团走到遂川县城东边的天河旁，夕阳映照在河面上，放出了耀眼的光辉。一支打着红旗的队伍从桥西走过来了。我们的先头部队58团2营也大踏步走过去，猜想是55团队伍。两支军队越走越近，等互相看清了对方是分离了几个月的战友时，桥上一片欢腾。战友重逢，大家欢呼雀跃，笑逐颜开。张军长和李总指挥两双大手紧紧握在了一起，60多天来的悬念，千言万语，尽洒在激动的热泪之中！两支部队会合后，向东走了10公里，到达了衙前村宿营。第二天，战士们唱着嘹亮的战歌，浩浩荡荡开回永新县城。欢迎的群众人山人海，到处贴着红红绿绿的标语。队伍开进永新的第三天，军部召开红7军55团和58团胜利会师大会。会场布置在一个大草坪上，主席台周围飘扬着五颜六色的彩旗，“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军部”的大旗，在阳光下，显得格外火红。红7军两个团和军直属队的指战员，打着红旗，唱着歌儿走进了会场。地方各方面的代表也陆续列队进场。每个人的脸上都流露着激动和喜悦，到处洋溢着热烈欢乐的气氛。9时左右，大会开始。一串串拴在树枝上的鞭炮，“劈劈啪啪”地响了起来，震耳欲聋。排列在主席台前的20多名司号员，一齐吹响了军号，号声悠扬嘹亮。在热烈的掌声中，张军长首先讲话。他回顾红7军在党的领导下，走过的艰难曲折的战斗历程，表扬了全军指战员的英勇战斗的革命精神和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并指出，虽然由于受到党内“左”倾冒险错误的影响，部队一度受到挫折，但经过残酷的斗争考验，红7军锻炼得更加坚强了，现在全军胜利会师，证明我们红7军是经得起任何考验的，是不可战胜的铁打的队伍。张军长勉励全军指战员，保持和发扬红7军的优良传统，虚心向苏区人民学习，为保卫、巩固苏区，夺取更大的胜利！会上，总指挥李明瑞、代政委许卓等首长和当地党、政府及红军负责同志张启龙、甘泗淇、袁德生、李天柱等也相继讲了话。我红7军两个团胜利会师后，随即投入配合中央革命根据地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的战斗。不几天，红7军接中央根据地总前委指示，为统一指挥赣江以西的红军部队，决定成立河西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由李明瑞同志任总指挥，红20军政治委员曾炳春同志为总政委。下辖红7军、红20军、红独立师，其主要任务是在河西牵制敌人，配合中央红军粉碎敌人的“围剿”。

4月中下旬，河西三支红军进攻安福县城。安福，地处赣中西部，离永新100公里左右，是敌人封锁赣西的前哨阵地。守敌是韩德勤师第154旅。我军攻城部署是：右翼是20军，1000多人，装备差，官兵年纪较轻，小的只有15岁；中路为红7军58团4个连，约400多人，战斗力强；左翼为

独立师两个小团，约 1000 人，装备尚好，有战斗力；总预备队为红 7 军 55 团，约 600 多人，战斗力强。攻城战斗打响后，敌人据城固守，闭门不出。黄昏时，李明瑞指挥部队后撤 30 里至廖塘桥，并有意遗弃一些衣物，诱敌人出城。

敌人不知是计，于 8 时许，出城追击。敌人从湖州开阔地带向我右翼红 20 军和中路红 7 军 58 团进攻，来势甚猛。当敌人正面向我团进攻时，我 6 连处于阻击敌人最前线。敌人逼近了，我一声令下，密集的火力即向敌人射去，一二十个敌人应声倒下。然后，我率全连战士继续撤退，从田坝飞速越过小桥。

58 团的另外 3 个连也后退 3 里，敌人又追了 3 里，右翼 20 军也被敌人击退，敌迂回到我侧面。这时，李总指挥即指挥红 7 军 55 团和独立师从左翼迂回到敌后发起攻击。在敌正面的红 20 军和 58 团也立即回过头来，夹击敌人。团长黄子荣，命令我 6 连回头过河反击敌人。此时我连的子弹已将打光，我向黄团长报告，他说：“没子弹抓人摊！”我明白这话的含意，坚决向团长表示说：“好，与敌人刺刀见红！”我集合全连，宣布有子弹的站出来，只有 1 个排长和 4 个战士还各有一两发子弹，我便决定由他们 5 人走在前面，我率领全连紧随于后，飞奔过桥反击敌人。

200 米，100 米……离敌人越来越近了，我们一枪不放。敌人开始向我射击，我们仍不开枪，只是一个劲向前冲，敌人看到这种阵式，非常吃惊，不知所措。当我连冲到距敌只有 50 米左右时，敌人沉不住气了，掉头就跑。我们紧追不舍。敌人一急，躲进附近的几间小屋里，从墙壁洞向外射击。我连跑在前头的 5 名同志不幸被打倒了，我马上命令战士卧倒在田埂边，派通信班长李志明去报告团长，请示如何行动。团长要我连停止前进，命令说：“4 连赶上来了，由曹连长率领冲击，6 连跟进！”4 连冲上去了，很快消灭了敌人，中线稳住了。我连也抓紧补充了一些子弹。敌人被我诱出县城后，其主力正向北侧迂回。李总指挥看到中路之敌已被我 58 团挡住，无法前进，左侧敌人兵力较少。即命红 7 军 55 团和独立师从左翼出击，迂回敌后，直逼安福县城。敌人回不了城，便向东转移。进攻 20 军的部队也后撤了。加上我 58 团和 20 军从正面和右翼反击，致使敌人的中路和左路腹背受到夹击。敌罗霖旅毕竟是老部队，战斗从上午持续到黄昏，才将其击败，敌人纷纷向东溃逃。我 3 支红军部队，像 3 支利箭，在廖塘桥附近的辽阔田坝中追击、围歼敌人，形成一个太极图。是役，红军大胜，消灭敌人一个团，俘敌七八百人，缴枪千余支，迫击炮数门，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反“围剿”战争，保卫了湘赣边区。

4 月底，红 7 军在永新县小学楼上，召开了中共红 7 军第二次代表大会。到会代表 80 多人，都是由各连队党支部选举产生的。大会由许卓同志主持。大会传达了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精神，批判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和给红 7 军带来的严重危害。肯定和表扬了红 7 军不断抵制和摆脱“左”倾冒险主义影响，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把部队带到革命根据地，保住了红 7 军基本力量的革命战斗精神。大会以六届三中全会为指导，结合半年多来红 7 军的斗争实际，总结和检查了过去的工作成绩和错误，确定今后新的战斗任务。

会议改前委为军委，选举许卓、张云逸、李明瑞、许进、袁任远、余惠等组成新的军委。由许卓负责。我和一个士兵被选为红 7 军军委候补委员。

会议还撤销了第一次党代会时给予雷经天同志的处分，恢复了雷经天同志的党籍。

会议开了3天，最后由张云逸同志作大会总结。党代会后，军部召开了军委会议，到会的李明瑞、张云逸、许卓、叶季壮、许进和我，还有一个士兵代表。会议主要研究了今后的具体行动问题。不久，部队奉命开赴莲花，在该县城驻了数日，又北上袁州（今宜春），袁州守敌是在安福被我军击溃的那个团，心有余悸，我军到后，稍作抵抗，即弃城而逃。我军返莲花后西出湖南，在茶陵附近围歼茶陵、安仁、酃县、桂东、醴陵、攸县等9县联防挨户团。在当地游击队配合下，我58团迂回敌北面，神不知鬼不觉地突入圩内，55团从东、南两面夹击敌人。敌人两面受击，激战半个小时，敌人便向茶陵县城奔逃。我军追至茶陵，敌人又向安仁县逃去。我军解放茶陵后，乘胜穷追，直捣安仁县，马上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群众拍手称快。

我军连战连捷，扩大了湘赣革命根据地，也扩大了红军的政治影响。我军在安仁县吸收了一大批青年入伍，壮大了红军队伍。

于都大会师

1931年6月，中央苏区军民胜利粉碎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围剿”。但蒋介石不甘心失败，正调兵遣将，准备发动更大规模的“围剿”。为加强中央红军的实力，积极参加新的反“围剿”战斗，红7军军委决定率部往中央苏区。几个月来，红7军在生活、工作、战斗等方面已和湘赣苏区的党、政、军、民相处得很融洽，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在此期间，湘赣革命根据地的党组织，先后动员了700多名青年参加红7军。现在要离别了，大家都感到依依不舍。为了帮助发展湘赣苏区，红7军军委决定留下了袁任远、林茂同志率领的百人教导队和百名伤病员，归湘赣军区建制。这一切安排妥当后，我军便向赣县之沙地开去。6月下旬的一天早晨，我们的队伍迎着朝阳出发了。

当地党、政、军领导同志张启龙、袁德生、甘泗淇、李天柱、谭余保，以及成群结队的群众，都到郊外欢送。铁流在公路、旷野上流动，我军马不停蹄地沿遂川、万安、泰和地区前进。沿途禾苗青青，灰尘滚滚。虽然连续几天紧张行军，个个汗流浹背，但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因为大家知道，前面光明大道，就是向往已久的中央革命根据地。部队日行夜宿，经过一个星期的急行军，经遂川，到达了沙地镇。沙地，是赣江边的一个小镇，过赣江，便是中央苏区。附近没有敌情，我们便在沙地休息3天。这时，红7军军委对于下一步的行动问题发生了争论。张云逸等同志坚决主张过赣江与1、3军团会合，而另一些同志则不同意过赣江，主张到上犹、崇义等湘赣边区活动。双方意见相持不下，张云逸同志要求军代政委许卓同志召开营以上干部参加军委扩大会议。经开会讨论，多数同志主张过江，去找中央红军。正当部队准备过江的时候，湘赣边区党委书记干首道同志从中央革命根据地请示汇报工作回来，向我们传达中央红军总前委的指示，并代表中央前来欢迎我们过江。

当晚，王首道同志在军连以上干部会议上，代表党中央向红7军全体指战员致以亲切的慰问。他说：“党中央派我来欢迎你们到河东去！为粉碎敌人的进犯、解放全中国而共同奋战！”1931年7月11日，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碧绿的赣江水向东流去，晨风吹动，江面波光闪闪。10多只帆船早已等在那里。帆船载着红军战士，在江中穿梭，直至夕阳西沉，我军才全部过江，进驻良口。

13日，我们从良口经赣县的白露圩，进入兴国县。一进中央苏区，映入眼帘的是一派喜人的景象：田地里，翻身农民在辛勤耕种，黄橙橙的禾穗迎风起伏，不时传来阵阵悠扬的山歌。一队队农民赤卫队员英姿飒爽，练兵习武，站岗放哨。当我们进入兴国时，成千上万群众手持纸旗敲锣打鼓站在街口两旁夹道欢迎，放鞭炮，呼口号，个个喜气洋洋；全城张灯结彩，到处贴着一幅幅大标语“热烈欢迎远道而来的红七军！”“向英雄的红七军学习、致敬！”“粉碎敌人的‘围剿’，巩固中央苏区！”据说这样隆重的欢迎场面，在兴国还是第一次！第二天，兴国县苏维埃政府召开隆重的万人欢迎大会和游艺会，盛况空前。部队在兴国休整，该县党政负责同志给我们作了几次有关形势和中央苏区情况报告。我们也看到了中央苏区发行的报纸。使我们明白了革命斗争形势，了解整个中央苏区的范围和情况，大家深受鼓舞，开阔眼界，感到中央苏区真了不起！尤其令我们赞叹的是中央苏区的干部、群众政治觉悟高，懂得许多重大的政治军事问题。我们在与干部、群众接触

中，他们对毛泽东同志的政治主张和军事路线都比较熟悉，谈起来头头是道，还有声有色地向我们介绍粉碎敌人第一、二次“围剿”的战斗情况。这说明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已在中央苏区人民心中扎下了根。我军在兴国驻了约一个星期，听说中央红军主力正从600里外的福建建宁那边胜利归来，为了与中央红军会合，我们于7月21日移驻于赣江上游的于都县桥头圩。次日，中央红军主力从福建绕道千里到达于都县的银坑和桥头圩一带。彭德怀同志率领的红3军团进驻桥头圩。我们红7军与中央红军胜利会师。从此，红7军编入红3军团战斗序列，隶属3军团指挥，成为中央红军的一部分。张云逸同志脸上浮着微笑，勉励大家说：“从现在起，我们便在中央红军总政委毛泽东同志和总司令朱德同志的领导下战斗了，今后，我们要以新的姿态，迎接新的战斗任务，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新的贡献！”半年多来，红7军在党的领导下，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惊人的毅力，打破了敌人的围追堵截，战胜了种种艰难险阻，从险境中杀出一条血路。先后辗转广西、贵州、湖南、广东、江西5省，行程7000多里，终于完成了与中央红军会合的伟大历史使命！可以无愧地说，这确是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人间奇迹！由于“左”倾路线的影响，红7军遭受到极其惨重的挫折和损失。红7军从河池出发时，浩浩荡荡，7500人，到了江西，却只剩下1300多人。多少优秀的指挥员、英雄健儿，血染沙场，长眠山野。在欢庆胜利大会师的时候，我们更加怀念为革命捐躯的战友，更加认识到党的正确路线对于取得革命胜利的极端重要性。坎坷铸大志，险境砺将才。红7军在漫漫北上征途中，虽然遭受到严重的损失，但在艰险的战争环境中，锻炼得更加坚强、成熟！同时，在沿途播洒下革命火种，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震撼了敌人的反动统治！“从军有苦乐，所问从者谁？”随红7军北征，使我经受了一次严峻的锻炼和考验。历经磨难终不悔。更加促使我世界观的转变，坚定了革命志向，令我终生难忘。中革军委和苏维埃政府为表彰这支来自壮乡、经过千锤百炼英勇奋战的队伍，特奖给红7军锦旗一面，上面写着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转战千里。1978年，我写了《转战千里》一诗，记述了这一段壮丽的烽火征程：

转战七千世人惊，足跨五省山岳倾。
酷日草履脚伤裂，草地单衣唇色青。
肉瘦发长筋骨壮，心红胆大耳目精。
苦战七月终胜利，汇合朱毛请长缨。

第四章 鏖战苏区

精猛红七军

红7军到达兴国后，即在城郊西北集中整训。沿途，稻谷飘香，山花吐艳。我们分享着当地翻身农民的丰收喜悦，从中央革命根据地看到了革命的前途和希望。这时，张云逸军长已调任中央军委第一局局长，军长由李明瑞担任。

我们除了学习政治理论和形势外，还开展了练兵运动。部队驻地的村前村后，路旁草坪，都有战士们在出操、瞄准、刺杀和进行班排攻防演习。在整训中，我们还学习中央红军的民主集中制作风。如提拔一个战士当班长时，先由党支部组织委员提出名单，然后在支委会上进行讨论，并征求党外意见，最后依照多数人的意见确定。发现干部与战士闹不团结的现象，也提到党支部或士兵委员会上讨论解决。同时，我还找双方个别谈话，耐心化解矛盾。就是对犯错误的同志，也坚持从思想教育着手，使之口服心服。官兵关系搞好了，大家都很高兴。

那时，红7军是以班为单位开伙。每班有好吃的东西，都来请我，多被我谢绝。有一次，一位战士来找我，说他们班买了老百姓的衣服，照价给了钱，老百姓却说没有给，正在争论不休，请我去解决。我感到有些奇怪，过去的军民关系是比较好的，为什么会出这事？便立即跟随那位战士去了。到了老乡家里，并没有听到战士和群众争吵。我问他们：

“在哪里争吵？”

他们答：“一会就来，请你稍坐一会。”

过了一会儿，来了几个战士，端着饭菜，有鱼有肉，香气扑鼻。我问：“这是怎么回事？”他们笑着说“是请连长来同我们会餐，怕你不来，所以骗了你。现在，我们检讨就是，请你吃了东西再处分我们。”正说时，又来了一位排长。

我问：“你也是骗来的吗？”

他笑着答：“报告连长，我不是被骗，而是有请必到。”

这时又来了一位房东，他不是来吵架而是来吃饭的。真是盛情难却，我便留下同他们一起吃饭，我说：“以后不能再来这一套。”大家都笑了。1931年7月底，我们整训未结束，便投入第三次反“围剿”的战斗。不甘心连续两次“围剿”失败的蒋介石，亲自到南昌，自任“围剿”军总司令，调集30万大军，发动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

他们倚仗其兵力的绝对优势，采取“长驱直入”的战术，分路由东向西，由北而南进攻，妄图把红军压迫到赣江东岸而加以击破，分区“清剿”，“消灭”红军。面对敌人重兵压境的情况，毛泽东、朱德决定“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率红军主力由兴国的高兴圩、老营盘向富田开进，然后拟由西而东，向敌之后方联络线上横扫过去。

可是，当我们开进途中，被敌发现，遂改变计划，重返高兴圩集中，然后，突然从敌军中间的空隙穿出。我军凭借良好的群众基础，有时在离敌几公里的地方穿过去。有一次，我连白天在山上隐蔽，就看见敌人在山下河边洗澡、宿营，而敌人竟未察觉。我军神不知鬼不觉插入敌人主力的背后，于8月初的几天内，连续向兴国的莲塘、水丰县南部的良村、宁都县北部的黄陂三地敌人发起猛烈攻击，三战皆捷，歼灭了敌上官云相的47师、郝梦龄的54师、毛文炳的第8师共1万多人。在这三次战斗中，我红7军指战员敢于刺刀见红，发挥了入“瓮”捉“鳖”的突击作用。红3军团长彭德怀曾称赞

红7军是“猛如虎，精似猴”的英雄部队。我们吃掉了敌人几个师后，蒋介石才发现红军主力在东面，立即命令向西向南的部队转兵向东，分两路对红军取密集的大包围战术，猛力进逼。红军则取声东击西战术，主力越过与敌重兵之间10公里的大山，回到西面的兴国境内藤田集中隐蔽，待敌军发觉西进时，我军已休整了半个月。在这半个月的休整中，红军还开展文化娱乐活动，部队首长带头演戏。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左权等1军团的领导都出场了。

那时，演戏没有剧本，自编自演，现编现演。记得1军团首长演的是一场研究敌情的话剧。林彪军团长、聂荣臻政委出场后，左权参谋长上场报告敌情，林彪说：“请罗主任来”。此时，站在台后边的罗荣桓同志大概有点怯场，半天不出来。“罗主任还没来呀，敌情很紧张呵！？”林彪又叫了一遍，罗荣桓还是不出来。敌情紧张，剧情也紧张，戏要演不下去了。

这时，后台的人急了，一把将罗荣桓推上了场，惹得台上台下一片笑声。国家保卫部的李克农、胡底、钱壮飞等同志也演了一场话剧。敌军被我拖得精疲力竭，非常沮丧，加上反蒋的国民党两广军阀部队正向湖南衡阳进发，蒋介石只好退却，在敌退却时，得到充分休整的兄弟部队趁机追击敌人。我们红7军与其他兄弟部队奉命开赴兴国的高兴圩、老营盘一带设伏，截击敌人。这是第三次反“围剿”战斗中最大规模、最激烈的一次战斗。敌军为夺路逃命，先后投入战斗共4个师27个团，总兵力达7万人，系蒋军中较精锐的广东蒋光鼐、蔡廷锴部队。敌我双方从9月7日早晨开始交战，战斗越打越激烈，枪炮声轰响，加上敌人飞机狂轰滥炸，真是地动山摇，硝烟弥漫半边天。其战斗之激烈，我自参战以来尚未见过。经过三天三夜的血战，双方都有较大伤亡。我们红7军原为总预备队，牵制兴国之敌。战至第三天中午，总司令部传来命令：红7军准备投入战斗，以击退敌人的反扑。于是，我们立即进行战斗动员，全军1200多名健儿，摩拳擦掌，迅速吃好干粮，整装待发。但过了半个小时，上面又传来命令：为更有效歼灭敌人和减少红军的消耗，我军主动撤到高兴圩西面的永丰圩。敌军也连夜全部撤退到兴国县城。

9月14日，敌第4军团之第9师和韩德勤52师相继退到东固北面的方石岭宿营，然后继续北撤。其他敌人也从兴国的富田、吉安撤退。战机来了，我们红7军奉命追歼驻方石岭的敌第52师。该师是一支装备精良的骄兵，是敌“围剿”军中的王牌之一。其师长韩德勤是蒋介石的同乡，深得蒋介石的器重，他心高气傲，有恃无恐。大家听到追歼韩德勤部，战斗情绪大振，纷纷表示要发扬猛追、猛打、猛冲的精神，来个虎口拔牙。部队飞奔前进，追击敌人，雷经天等同志在路边做拉拉队，高喊我的名字：“莫连长，快跑前进，歼灭敌人！”当天晚上，我们乘着朦朦月色，在崇山峻岭的羊肠小道急走，一气走了50公里山路，于15日拂晓前赶到了方石岭。方石岭是一个环形的长条山地，没有树林，山上只长一些杂草，山中间是一条山谷小路。敌人准备从这山谷小路往北面的富田、吉安方向撤退。天刚亮，我们主力悄悄地从方石岭右侧爬上去，抢占了山顶，封锁了山口。韩德勤看到红军突然出现在山上，即命令部队拼命反冲击。我们从山顶压下来，锐不可当。敌人阵势大乱，前进不得，后退不能。

他们想从左侧翻山越逃，恰我军兄弟部队又赶到堵截。敌人作困兽斗，垂死挣扎，到处乱窜。敌人一个炮兵营过不了山，被困在山沟内，我6连占领了高地，大家齐声往下喊：“缴枪不杀，红军宽待俘虏！”敌人听了宣传

后，向我连大声喊道：“派长官下来谈判！”我当即把部队布置好，自己一个人下山去。

他们见我一个人下来，惊魂稍定。我大声向他们讲道，你们已被我军四面包围，而且你们整个 52 师也成为“瓮”中之“鳖”，你们唯一的生路，就是放下武器，缴枪投降。红军一向优待俘虏，只要你们放下武器，红军绝不虐待，更不杀害，若愿意参加红军的，我们欢迎，不愿意参加红军的，我们发放路费礼送回家。他们听了我的话后，看着高地上一支支黑洞洞的枪口对准着他们，表示放下武器投降。我当即给他们下达口令：枪丢一边，人站另一边，集合！这样，我连俘虏该营 150 多人，缴炮 9 门，轻武器一批。在兄弟部队配合下，我们红 7 军仅用两个小时，便全歼敌韩德勤师。韩德勤被俘后，扮装伙夫逃脱。这一仗，共歼敌 5000 多人，缴获各种枪支 4000 多支，骡马 200 多匹，胜利地结束了第三次反“围剿”的最后一战。

9 月下旬，瑞金召开庆祝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大会，会上，红一方面军和红 3 军团领导高度赞扬红 7 军在这次反“围剿”战斗中立下的赫赫战功。

一个惨痛的教训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结束后，红7军奉命开至瑞金，保卫党中央，听说红20军“AB团”反水，要红7军去保卫。又听说，毛委员来讲话，大家极为高兴。但是他没有来，我们便开至乡下休整。我们在瑞金驻了一段时间，又转至于都县的小密镇。一方面在当地做群众工作，开展土地革命；一方面警戒赣州方面的援敌，掩护中央红军主力攻打会昌。小密镇是赤白交界之地，尚未成立苏维埃政府。我连负责附近一个乡的群众工作。这时，上级派覃耀到6连担任连长，我任连政治指导员，集中精力做地方工作。我们组织干部战士，分组深入群众，宣传发动群众，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和筹款工作，并帮助当地建立革命政权和革命武装。这时，军部传来指示：在全军开展“肃反”工作，以纯洁革命队伍和巩固中央革命根据地，准备迎击敌人新的进攻。我们在进入湘赣苏区时，就听说苏区和红军内部有“AB团”反革命组织，为此，有些人被杀，有些人被捕了。但为什么叫“AB团”[“AB”是英文Anti—Bolsherk（反布尔什维克）的缩写]，他们如何反革命，我们不知道，又不好问，也没地方可问。

红7军离开湘赣苏区开进中央苏区时，我连补充了20多个十四五岁的娃娃兵。他们爱唱爱跳，活泼可爱，又念过书，得到老兵的喜爱。为了加强对新兵的领导工作，军部委任带这些娃娃兵的一位姓张的当地赤卫队队长为我连副连长。但是，红7军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不久，张副连长却被保卫部门逮捕了，说他是“AB团”的成员，是根据湘赣苏区来的材料。几天后的一个早晨，值星排长向我报告，说昨晚保卫部来人，把在湘赣苏区新入伍的娃娃兵都拉出去杀了，并说张副连长被捕后供出这些娃娃兵是“AB团”成员，听说张副连长也被杀了。我听后心里一颤：为什么保卫部捕杀我连的人也不告诉我一声？这些娃娃兵都是反革命吗？我心里很纳闷，便跑去问军政治部主任叶季壮，他说，这是湘赣苏区来的材料和张副连长的口供，保卫部门是垂直领导系统，他们可以不通知部队的党组织和各级负责人而捕杀人。

我听了无话可说，叹了一口气，便回到连部。过去，我庆幸红7军没有发现反革命，故有战斗力，现在也轮到红7军肃反了。领导肃反工作的是刚从苏联回来新上任的红7军政委葛耀山（工人出身）。他在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影响下，看问题只看形式，不看实质，往往只从一个同志的出身看问题。他不相信红7军的一些主要领导同志（特别是一些出身不好的同志），“唯我独革”，怀疑红7军干部队伍混进了国民党改组派，把团以上的多数干部当作改组派而抓起来，不少同志被错杀。这些同志大多是大革命时期留下来，经过严峻斗争考验的党员，在红7军中又是身经百战的。有些同志因不坚决执行其错误路线，或持怀疑、不满态度，便遭到严重打击和迫害。我们敬爱的红7军军长李明瑞同志，是在我党教育和培养下成长起来的红军优秀指挥员，因他在南宁时曾联合改组派张发奎反蒋，故被怀疑为红7军中改组派的头目而被错杀，同时被害的还有团以上干部余惠、许进、魏伯刚等同志。雷经天同志也被捕，后得释放。现在看来，当时反的“AB团”和“改组派”，完全是主观臆测和逼供信的产物，混淆了敌我，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

至1945年，党中央为李明瑞等同志平反昭雪，李明瑞等同志被迫认为革命烈士。现南宁建有他的纪念碑，并有邓小平同志的题词。像李明瑞这样一批忠诚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们在战场上没有被敌人的子弹打倒，却倒在王明的“左”倾路线上。宗派主义与肃反纠缠在一起，这是

一个惨痛的教训！李明瑞军长遇害后，张云逸调回来任军长。

同年 11 月，红 7 军离开小密镇，开往寻邬县整训。这时，覃耀连长调离 6 连，我又担任该连连长兼政治指导员。我连负责一个乡的群众工作，那里是苏区，已成立了红色政权。乡红色政权和“AB 团”对立非常厉害。双方都拥有武器，不时发生战斗，对革命产生不可估量的损失。我连刚到达该乡时，有一个寨子被乡苏维埃政府的赤卫队围困，称里面有“AB 团”。赤卫队的力量对付不了他们，不敢轻易攻打进去。乡政府请我们帮助赤卫队攻打寨子，歼灭对方。我了解情况以后，在寨外与寨子里的人对话，问寨子里是否有“AB 团”分子，要他们出来坦白、交代。他们回答说是革命的，不是“AB 团”，请求红 7 军不要打他们。我又对他们说，既不是“AB 团”，可以出寨来，我保障你们的安全。但他们不愿出来，也不敢出来，提出要我进寨子去谈判。为了了解寨子的情况，我经过考虑，决定进寨子去谈判。连里同志不同意我进去。我说：“红 7 军与他们前世无冤，本世无仇，他们既然说自己不是‘AB 团’，就不会加害我，若危害了我，不就证明他们真是反革命了么？同时，我也可以进去看看地形。”大家听我这样说，也同意我进寨了。

这是我第四次单独冒险了：一次是找第 1 纵队，二次是到地主寨门筹粮，三次是去缴敌炮兵营。有了前三次，这次我心里也较踏实了。我徒手走到寨门口，他们打开寨门迎我进去。我刚坐下，他们便纷纷向我诉说委屈和受围困的情况。有的慷慨陈词，有的痛哭流涕，有的说自己是入党多年的老党员。男女老少一大群围着我。我向他们讲了很多大道理，要他们与乡苏维埃政府解释、商谈，他们不愿出去。我又提出派个别代表跟我出去，保证其安全，他们也不愿意，说与乡政府谈没有用。大约谈了一个小时，毫无结果。最后，我要求他们不先动武。他们送我出寨时，要我向上级反映他们的情况和意见，并请上级派人来解决问题。出寨后，我向乡政府通报了谈判情况，乡政府的人仍一口咬定他们是“AB 团”，要我们协助他们继续围困寨子。为了搞好与乡政府的关系，我表示协助他们。我回到连部，向干部通报进寨情况和乡政府的意见，并向上级反映。

次日晨，发现寨子里的人夜里全跑掉了。因寨子较大，加上我们警戒较松，他们又熟悉地形全部跑掉了，究竟跑到哪里？结果如何？我们不得而知。

赣州攻坚战

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中央革命根据地曾出现一派蓬勃发展的形势。这时，在王明控制下的临时党中央重新提出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等许多冒险主张。

1932年1月1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了《关于攻取赣州的军事训令》。训令要求中央苏区的红军“坚决的取得苏区临近较大城市——赣州……造成以赣州为中心联系的广大版图，进而威胁吉安向北发展，使革命发展更迫近夺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前途。”赣州位于赣江上游的章水、贡水交汇处，东、北、西三面环水，城墙高而坚固，俗有“铁赣州”之称。防守赣州之敌是金汉鼎第12师34旅马崑部的3个团，约3000多人。因赣州四面已被红色区域所包围，马崑为固守赣州，一面备粮草、弹药，一面将逃往赣州的赣南17个县属的地主武装组织起来，成立了“赣南17县属民团指挥部”，下辖17个民团大队（每县1个大队），拥有长短武器5000多件，加上守军共8000余兵力。马崑凭借有利地形固守。危急时，他还可以得到赣州西南方面的粤军（驻南雄）和北面吉安陈诚部队的增援。

1月中下旬，遵照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的攻打赣州的训令，红一方面军主力和地方武装分别组成主作战军、支作战军和机动部队。红3军团和红4军为主作战军，彭德怀任前敌总指挥，滕代远为政治委员，下设攻城部队、监视部队和地方工作部队。其攻城的具体部署是：红3军团第1、第2师和红7军分别担任西、南、东门的攻击任务，第3师控制北门。因城高两丈，故先采取挖地道爆破城墙的方法。

1月上旬，我们红7军从寻邬开赴赣州城下。此时，龚鹤村伤愈由上海回到红7军，担任红7军军长，原接李明瑞担任红7军军长的张云逸同志调回中革军委仍任第一局局长。全军下辖55、58两个团。55团有6个连，58团只有4个连，加上军部特务连，共有1200人，我连所在的58团担任主攻，55团为预备队。我们第6连由于经过几个月的整训和战斗，战斗力增强，被确定为攻城先锋连。这无疑是对我们6连的信任和严峻考验。2月初，我们占领了赣州城外的天竺山和白云山后，军团派来了工兵，到东门挖坑道。我连驻在紧挨城墙边的民房里掩护工兵挖坑道。东门城墙有内、外两层。靠近外层城墙边有两片民房，因打仗老百姓都躲走了，我们便以这些房子为掩护，一面监视敌人，一面掩护工兵挖坑道。坑道口离这些民房只有七八米远，中间是开阔地。

敌人发觉我们在挖坑道后，害怕得很，拚命往我连打枪、扔手榴弹。我们的工兵要从房子到坑道口去，白天是很危险的，只能等到晚上，在我连火力掩护下，偷偷爬过去。过了几天，敌人往我们住的房顶扔手榴弹和汽油桶，为了怕房子燃烧和方便监视敌人，我们用竹竿把房顶上的瓦都捅了下来，留下光秃秃的房梁架子。有一天晚上，敌人把燃烧着的汽油桶扔过来，在楼上烧着了。

干部战士不顾一切，一边还击敌人，一边救火。住在我连的团政委杨英同志身先士卒，带领战士们救火和还击敌人。敌人看到我们救火，便趁机向我连猛烈射击，手榴弹一个接一个扔过来。有一颗手榴弹打中了我的右腿，我跳了一下，把它甩到楼下，“轰”的一声炸响了，幸没有伤亡。在同志们奋战下，终把火扑灭，全连伤亡4人。

一次，军团一位侦察科长来到我连阵地，要去察看坑道。从民房到坑道

口的开阔地很危险，几天来，已有几位同志在越过开阔地时牺牲了。杨英同志决定亲自带那位侦察科长到坑道口去。夜晚，我们的机枪向敌人的枪眼扫射过去。趁敌人抬不起头，杨英同志便和侦察科长迅速越过开阔地。闪入坑道口，他们返回时，杨英同志先走出坑道口，侦察科长跟在后面，他们悄悄地往回走，眼看快回到房子时，敌人打来一排枪，杨英同志没被打着，侦察科长却中弹牺牲了。敌人的地面火力阻挡不了我军挖坑道，便每天出动飞机来轰炸。

那时的飞机只能飞300多米高，速度也很慢，嗡嗡地响了一会儿才看到飞机过来，扔炸弹也不准，因他们不敢向城边扔，怕扔到城内去。有一次，敌机来了，我和杨英政委以及一个排30多人蹲在小楼下，只听到楼上“咚”地一声，接着，“哗啦啦”地一阵响，大家吃了一惊，不知究竟。等敌机走后，我们上楼一看，好家伙！一颗70多磅的大炸弹躺在楼板上，幸好没有爆炸，真险啊！那时炸弹性能较差，好多丢下来不响。于是，我们利用敌人火力间隔时，立即组织人员把这些炸弹搬到坑道里去，当作炸药用。同志们开玩笑说：“用他们的油，炸他们的肉！”

有一次，我从房子走出两步到右边树下观察城墙上的动静，敌人的子弹像雨点扫射过来，封锁了我的去路。同志们叫我等到晚上再回来。那怎么行，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我急中生智，身子躲在树后用树枝撑着帽子向外一晃，敌人以为我探头了，立即一排枪打过来，等他们第二轮子弹未上膛的一瞬间，我快步跑回了房子。坑道将要挖好时，第3军团军团长、前敌总指挥彭德怀同志亲自到我连了解情况。我和杨英同志向他作了汇报。

他想到坑道看看，我们加以劝阻。他来到我们连里就己很危险，我们都为他捏了一把汗！

2月13日，军团命令我连让开。因坑道已挖好，并装上了炸药。我连刚撤离房子，工兵便点燃导火线。只听“轰隆”一声，像闷雷一样的巨响，城墙塌了下来。这次爆破非常成功。城墙上的守敌一个也没跑掉，都坐“土飞机”上天了。另外，爆破后形成一个大斜坡，为我们攻城造成一个有利地形。这次只是爆破外城墙，不攻城。接着，我们着手进行爆破内城墙的准备。因有了第一次爆破的成功经验，大家有了信心，很快把爆破内城的坑道挖好。我连仍担任掩护任务。这次，离内城远了一些，敌人的枪打不到我们，我们的行动比较自由。第二次爆破攻城，是决定胜负的关键一仗。全军上下做了政治动员，战士们斗志昂扬，争先恐后地报名参加“敢死队”。从全军各连中挑选出勇敢、强壮的40多名战士组成的“敢死队”，由一位连长和一位排长带队。攻城的部署是：“敢死队”在前，接着就是我们先锋连，后面是58团，再后是军部直属队，55团为二梯队。攻城前夕，全军发扬军事民主，发动干部战士，人人出谋献策。大家一有空，就围在一起，仔细研究城内地形，记熟城里每条街道的方位，研究如何攻城，怎样巷战，设想了许多可能出现的情况，制定出应变办法。

从团部到连部，到每个排、班、战斗小组，都有一套作战计划。攻城前的晚上，杨英政委检查完工作之后，在我连和我睡在一起。

想到明天就要爆破、攻城了，我俩都激动得睡不着觉。我们畅谈革命形势，也估计到这次攻坚战斗的艰巨性。杨英鼓励我要出色完成上级交给的战斗任务。我对他说，“敢死队”和先锋连在攻城时，必有较大伤亡，扩大战果要靠后续部队。他表示率队极力支援。他还与我谈他的家世，说家在湖南

宝庆，家里有父母和一个瞎了一只眼的未婚妻，若明天牺牲了，要我革命胜利后到他家里去一下，告诉他的家里人。我也向他讲了我的家世，也说假如我牺牲了，请他告诉我家里。我们谈得很晚，才睡一会儿就天亮了。拂晓，准备攻城了。

按照上次爆破的经验，军“敢死队”40多人一字排开在最前边，准备在内城墙塌下后，立即沿斜坡冲上去。我们先锋连排在“敢死队”后面，其他部队依次排列在后。

眼看总攻时间快到了，军团一个专门搞爆破的技术员来这里，看到“敢死队”和我们先锋连离爆破点靠得这么近，马上说：“不能靠这么近，会被爆破的石头打伤的。”

我说：“上次爆破时，我们也离这么近。”

他说：“这次与上次不同，内城墙比外城墙高，装炸药量也多，站这么近会伤人的！”

我听他这么一说，立即报告杨英同志，杨英即告诉军长龚鹤村，龚军长回答说：“总攻时间马上就到，点火时间是军团定的，现在后退会影响一连串的部队调动，时间来不及了！”

开始点火了，听到“轰隆”巨响，地动山摇，乱石穿空，城墙铺天盖地压下来，40多位最精干的“敢死队”战士，大部分被埋在泥石下，有些被挖了出来。有些石头飞出几里远，打死了村庄里老百姓的耕牛。“敢死队”已不能起作用了，我们6连也有伤亡。我的左手被飞石打伤。总攻开始，我们6连率先冲锋，义不容辞地担负起突击队任务。我率队不顾一切地向塌下的城墙斜坡爬去，刚爬上10多米远，又“轰隆”一声巨响，把我们掀了下来。

原来，这次爆破挖了两个坑道，又不是同时爆破，我们并不知道，以为爆破后就可以立即冲上去，结果，这一次又伤了我连不少人。两次损失，使我连战斗力大受挫伤。我连担任的任务更加艰巨，整个部队都在看着我们。我考虑不会再有坑道爆破了，便毫不犹豫地继续率队往上冲。一口气冲到斜坡顶上，只跟上来26人。

潘副连长和一些战士还未爬上来。顶上的城墙还没有彻底摧毁，突兀而立，形成一堵高墙。我命令战士们两人一组搭人梯，爬上墙去。可是，敌人拚命往我们这里开枪，战士们上去一个，打下一个，上去几个都牺牲了。我正准备爬上去时，只觉得周身一麻，身子一晃摔下来。这时，杨英同志带着部队上来了，他跑过来扶起我问：“莫连长，你怎么了？”我当时不觉得痛，但说不出话来，神志不清地往河边走去。杨英同志喊道：“那边是河！”我才看清是一条河。这时，我觉得腿一软，再也站不住了，倒在地上，血流满地。杨英立即对4连的战士说：“赶快把莫连长抬下去。”一个大个子的战士便把我背到卫生员处。

上药时，我才知道是左腿筋受了重伤。上药后，担架队抬着我向后方走。因我的伤势较重，出血较多，又是山路，担架走得较慢。

后面有个担架跟上来了，催促说：“前面走快一点！”抬着我的同志回答说：“六连长伤势较重，快不了！”

恰巧躺在后面担架上的是杨英同志，他听后马上说：“哦，是莫连长！”

我问：“你是谁？”

他回答说：“昨晚同你躺在一起的，想不到今天都躺在担架上了！”到了卫生所后，我和杨英住在一起。

没有床，我们都睡到禾草地铺上。我问杨英是怎么负伤的。他说：“你负伤以后，你们连冲上去的人几乎全部伤亡。我把剩下来的一些人编到4连去，继续冲锋。我们虽然冲到顶上，但敌人火力太猛，反复冲杀几次，还是站不住脚，人被打掉了一多半，我也负了伤，被抬了下来”。他是眼角边受伤，幸亏眼睛没打坏。后来才知道，那天的攻城战斗打得非常激烈、艰苦。敌人凭险顽抗，58团攻不下，55团也拉上去了，结果还是攻不进去，双方伤亡都很重。

过了几天，红军又进行第三次爆破攻城，仍未果。双方处于对峙状态。敌旅长马崑一面组织兵力进行顽抗，一面给蒋介石告急求援。在红3军团久攻不克、敌援兵将到的情况下，应及时放弃攻城计划，撤离赣州。可红军仍于3月初发动第四次攻城，部队付出重大伤亡，仍未攻入城内。这时，蒋介石的主力陈诚部几个师已从吉安赶来增援，从南门搭浮桥过河入城。我军既不攻城，又不撤离，相持半月。有一晚，敌人从东门城内挖一地道，直到3军团司令部驻地，突然冒出，我军被打乱。后幸得红5军团增援上来，将敌击退，才解围，随即撤离赣州。此役，3军团有一师长牺牲，一师长被俘。赣州战役，前后历时一个多月，广大指战员在战斗中英勇顽强，气壮山河，但在王明“左”倾错误路线指导下终归失败，使红军遭到严重的损失。听说当时毛泽东同志就不同意打赣州，主张在上海“一·二八”抗战发生后，红军应向敌人统治力量较弱、党和群众力量较强的赣东北发展，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以巩固和发展中央苏区，声援上海军民的抗日爱国运动。但是，毛泽东同志这种适合形势的正确主张，却遭到拒绝，且被批评为右倾。战役结束后不久，毛泽东同志又被撤职，红军沿赣江而下，继续执行赤化赣江两岸和夺取两岸城市的“左”倾冒险计划。

战斗在湘赣边区

我和杨英在卫生所住了一段时间，我因伤势较重，被转到军团卫生部野战医院。杨英因伤势较轻，在我转院前，他就伤愈出院了。从此，我们失去了联系。

到长征时，我才打听到，他出院后被调到江西 24 师当政委。1935 年初，他与该师师长率第 70 团到闽西活动，在一次遭遇战中，他率队突围时英勇牺牲。

1949 年，我率部南下时，曾经过湖南宝庆，我想设法打听杨英同志家里的情况，可是没有打听到。后来，又托人多方打听，均无消息。自己为没能实现他生前的嘱托而内疚。我转到野战医院后，该院的药物很缺乏，医生每天只用粗白布条蘸碘酒给我敷伤口，伤口发肿不消，疼痛难忍。医生说我的腿伤至筋骨，不易治愈，要我锯掉腿，我认为还未到非锯不可的地步。我负伤时，政治部主任叶季壮发给我 32 块大洋治疗费。我到医院后，带一个勤务员，住在一个小茅草房里，每天用一块大洋买只小鸡和一个甲鱼煮来吃，约 20 天，伤口大体好了。同年 6 月初，接叶季壮同志来信说，部队即将渡赣江南下向广东南雄开进，可能不再回来，希望我能随队出发，并将派担架来抬我。我看了信，立即收拾行李，坐上担架出发。约一个星期路程，到了崇义县苏区，我利用部队在该县休息时间，找到一名中医，他给我开了活血松筋的中药，要我买一斤糯米酒慢火煮，煮到剩下两茶杯时服用。我连服了 5 天，果然见效。拄着棍子，勉强能走路了。我很感激这位中医，并动员他参加了红军。这时，军部任命我为军直属队政治处主任，因我腿伤，走路困难，还不能在前边冲锋陷阵，曾骑着马，随队去崇义地区打了一仗。回崇义休息几天后，部队开往广东南雄，走的是山路，不能骑马，我的腿伤不能随部队长途行军作战。途中，遂被留在上犹县乡村医院养伤。上犹县是靠近白区的革命根据地。因红军主力远去，根据地的革命武装力量较空虚，当地的地主武装便和广东军阀相勾结，趁机来进攻。苏区的游击队、赤卫队分散各地，群龙无首，真是人心惶惶。我休息一个月后，可走路了，地委书记黄道同志知道我曾带兵打仗，请我出来担任该苏区临时总指挥。我开始没有答应，因走路还不方便，后来他们一再请求，我也考虑以大局为重，勉为其难，便答应担任上犹、崇义游击队临时总指挥，黄道同志兼任政治委员。我上任后，把部队集中起来，进行短期的整编和训练，把当地的游击队编为主力部队和支援部队，主力部队有 400 人左右，除步枪外，有几挺轻机枪。其余的赤卫队编为 3 个支援部队，约 700 多人，三分之一使用梭标。经过一个星期的整训，便向敌人进攻的方向开去。沿途，我骑着马，但侦察地形和打仗时不得不下来步行，很吃力。曾率部几次袭击地主武装，取得一些小胜。后又与军阀部队打了两仗。这两仗都没有正面接触，因敌强我弱，我们先避开敌人主力，等其疲惫或撤离时，再给予袭击和追击。过去，部队作战接近敌人时才打枪，而现在，游击队员远远看见敌人便开枪，常把敌人赶跑或暴露了目标。经过一个多月的游击战，虽然战果不大，但打击了敌人进攻的气焰，缓和了局面，群众的情绪也稍有安定。这时，我想指挥打仗都在前面，可我现在经常跟不上队伍，不骑马便掉队，若发生意外，将会贻误战机，这样怎么指挥

仗。于是，我不得不向地委提出辞职，他们研究后同意了。我在上犹休息了几天后，便带着一位勤务员和一位饲养员，骑着马随 3 军团教导团去湘赣苏

区永新县。行军三天，到了左安。第四天早上，部队刚出发时，敌人突然从山上插下来，部队边打边撤，行军队伍被打散了，我的马匹和勤务员也被打散了。过了一会儿，我发现敌人从后面追来，一边用广东话高喊：“捉活的！”子弹打到田地里，打到我的腿边。我跑过田坝，便躲进丛林里隐藏起来。不久，听到丛林附近有脚步声，还有说话声，我想：可能是敌人来搜索了。我端着驳壳枪从丛林里往外看，却见一队衣着不整齐的队伍，前面还飘着一面红旗，是自己的队伍，我转忧为喜，立即走出来。他们是当地游击队，听到枪声赶来支援的。游击队问明我的情况后，便带我绕过几条山道，找到了教导团。原来，该团开始是边打边撤，后与地方游击队一起，把敌人的袭击打退了。我随教导团又经过4天的艰苦行军，于同年9月到达永新县。这是我曾战斗过的地方，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感到亲切。休息了两天后，湘赣省委要我担任湘赣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我听后感到自己理论水平不高，怕难以完成任务，我谢绝了。但过了一天，省委领导又找我谈话，说我是中学生，有文化，担任过政治指导员工作，现在腿不好，不能带兵打仗，搞宣传工作是合适的。最后我只好答应下来。当时的省委书记是王首道同志，军区总指挥张启龙，政委甘泗淇，政治部主任于兆龙。宣传部有我和两个干事，他们都是刚出来参军的学生，年纪比我小，很活泼。由于我行动不方便，故在机关较多。我对宣传工作不太熟悉，对地方部队的情况也不熟悉。我利用这段时间，除工作外，多看各种汇报材料、报纸和杂志，晚上还在青油灯下读了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等理论书籍，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理论水平。同年10月的一个中午，我的留在中央苏区治病的罗少彦同志到饭馆吃饭，恰巧遇到刚从前线回来的张启龙和李天柱同志。李天柱对我在永阳战斗的表现很满意。一见面，他高兴地问：“你什么时候来到这里？”我把情况告诉他后，他又问：“你的腿好了么？”我说：“已基本恢复。”他说：“好，打仗去！”当时，敌人发动了对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自己的腿伤已基本好转，故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好，上前线去！”他与张启龙低声说了几句，对我说：“明天通知你！”次日，我接到湘赣军区的命令，委任我为遂（川）万（安）泰（和）分区指挥员（司令员）。我即动身上任。该军分区是新组建的，设在万安县。武装队伍有1个独立营（300多人）、3个游击队（约700多人），还有若干赤卫队，共1000多人，有步枪600多支，机关枪数挺，其余的是梭标。战士们较年轻，有朝气。原来分区有一位政委，我来后，军区把他调到永新县搞地方工作。他去了一个多星期没有回来，后听说他被打成“AB团”而被杀了。过几天，军区又命令我兼任军分区政治委员。为配合中央红军的斗争和粉碎敌人对湘赣军区的“围剿”，我立即把分区独立营和游击队武装集中整训，部队的情绪很高。大家知道我是红7军的干部，加上我上任时军区领导介绍过我的情况，故大家对我还比较尊重。部队开始行动了，这是该地区的地方武装第一次主动出击敌人。

有一次，我们渡过一条小河去袭击地主武装，敌人有200多人，我们的部署是：独立营为主力，从正面进攻；游击队从两侧迂回，包围敌人。战斗打响后，主力部队冲得较快，迂回部队的行动较迟缓，致使独立营把敌人击溃后，迂回部队赶不上来，让敌人跑掉了。该仗只缴获一些物资，没有抓到敌人。过后我们开总结会，大家一致认为，主力的出击是对的，但主力部队没有和迂回部队配合好。我也在会上主动作了检讨，并要求大家吸取教训，加强时间观念和全局观念，以利再战。后来，我又指挥打了几仗，部队互相

间配合得较好了，取得较大战果。12月，我到永阳开会回来，接红7军政治部主任叶季壮同志从中央苏区来信，要我立即回红7军。这时，恰遂（川）万（安）泰（和）军分区撤销，拟把该分区的1000多名地方武装编为一个大团，新任的军区政治委员蔡会文与我谈话，要我留下担任该团团长，我感谢他们对我的信任，说已与原单位取得联系，要求我回去。最后，他们同意了。

重返中央苏区

冬天又到了，天气干冷干冷的，但我的心是热乎乎的。在当地游击队的护送下，我迎着凛冽寒风，东渡赣江，直奔中央苏区。那时，蒋介石正调集30多个师的兵力，分三路向中央苏区发动大规模的第四次“围剿”。为了迎击敌人“围剿”，红一方面军总部对所属部队进行整编，红7军番号已被撤销，编入红3军团。该军团尚在福建泰宁一带作战。据了解，赣州战役后，3军团与红16军组成西路军，红7军成为西路军中一支劲旅，纵横驰骋于赣水闽山之间，逐鹿于湘赣粤闽边境，为保卫和巩固中央苏区立下了卓著功勋。我不歇息，又立即从瑞金赶到泰宁，找叶季壮同志报到，他已调到红军总政治部，担任组织科长，我又到总政治部驻地找他，他热情接待我。第二天，他经与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副主任杨尚昆等同志研究，决定分配我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总部直属队党支部书记。不久，成立直属队政治处，我兼任政治处主任。

过去3年多时间里，我主要是在基层、在前线、在战火中带兵打仗，而现在不同了，离前线稍远了，工作性质和环境变了，较多接触上层领导同志，经常参加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政委、王稼祥总政主任等召集的汇报会，或直接听取他们的报告。

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自己能直接得到党的路线、方针的指导，对形势、战局的情况了解很多，眼界较开阔，并从领导同志身上学到不少好作风、好的政治工作方法和经验，另外，在工作过程中，经常迫使自己较多开动脑筋和独立思考，也有时间看书看报和各种资料，故自己的思想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有较大提高。一天晚上，周恩来总政委召开各部门工作汇报会。他对各部门的工作要求很严，一丝不苟。当他看到一份电报中的统计数字比上个月少一人时，他立即叫参谋向红1军团询问。这个人到什么地方去了？是逃跑，是伤亡或统计上的疏忽？其工作认真、细致的精神令我佩服。

有一次，我们总部直属队机关离开一个村子，出发前，王稼祥同志发现有的房子没有打扫干净，他立即找我说：“要严格检查群众纪律，哪个单位的住房若没有打扫干净的，要给予批评”。

我便带了几个人，逐个房子检查。村子很大，我们整整花了半个多钟头时间，按照群众纪律要求，采取补救措施，把所有的住房打扫干净，把门板上好，把铺地的禾草捆好，对需要赔偿的给予赔偿。我们检查处理后，才急忙追上已出发的队伍。到了宿营地，我将检查的情况向王稼祥同志汇报，他又指示我向总部直属队党总支部、各单位领导通报情况，并订出改进计划。从此，我们直属队执行群众纪律情况比较好，与群众关系也密切了。1933年初，总部直属队迁到乐安县固岗村，这是一个只有五六户人家，四面环山的村寨。队伍到达的第三天早上，忽然有两架敌机来盘旋，警报号吹响了，人们立即躲避，敌机打了几个转就飞走了。过了个把钟头，警报号又吹响了，远远听到飞机的嗡嗡声。一会儿，两架敌机在天空出现了，人们赶快疏散、隐蔽。该村有几个小防空洞，供总部领导使用。我在路边组织大家疏散，见到军委第一局局长张云逸同志走进防空洞，却没见到其他领导同志进去。

原来，总部正在开会，是苏区中央局青年工作会议。为照顾前线工作，在瑞金的中央领导同志上前方来开会。到会的有博古、顾作霖、周恩来、朱德、王稼祥、杨尚昆、袁国平等。会址就在山边的一个古庙里，附近有稀疏的树林，没有防空洞。飞机来时，人们以为没什么，后来急急忙忙疏散，有

些人还来不及出庙门，飞机就到了。因早上来的飞机，转了一下就飞走，给人们一种错觉和侥幸心理，哪知第一次来是侦察，这次是来投弹了。第一批炸弹投下来时，恰落在我附近，伤亡了一些人。我躲在墙边，右腿被弹片擦伤。敌机连续轰炸、扫射了20多分钟。飞机的怪叫声、炸弹的爆炸声和我军打飞机的机枪声交织在一起。我很担心在古庙开会来不及躲避的中央和总部领导同志，幸而几次炸弹没有命中古庙。敌机飞走后，我协同总卫生部长贺诚同志，立即组织抢救伤员，掩埋烈士遗体，还连夜组织担架队把伤员运到后方。这次共伤亡300多人，以特务营为最多，因该营疏散在树林里，挨了几次炸弹。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同志的腹部受了重伤，弹片打在右侧肚子里，这是严重的损失。同年2月下旬，红一方面军采用大兵团伏击，以两天激战，先后在宜黄南部的黄陂地区，歼灭进犯之敌52、59两个师，活捉了这两个师师长李明、陈时骥，俘敌1.3万多人。给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以致命打击。因俘敌人数多，我被派去做收容俘虏和处置伤员工作。

同年3月，红军又在宜黄县南部地区的草台岗一带歼灭敌第11师，该师师长肖乾重伤后毙命，是役俘敌600多人。至此，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不久，红军总部调我到红5军团担任政治部宣传部长。该军团是1931年12月由原国民党冯玉祥部第26路军在宁都起义后改编而成。董振堂任军团长，朱瑞任政治委员，刘伯坚任政治部主任，全军团1.7万多人，下辖第13师、14师、15师。宣传部只有两个干事：黄镇和李雪三同志，宣传工作是紧张繁忙的。好在政治部有刘伯坚同志的直接指导，故工作开展较为顺手。刘伯坚同志是四川才子，三十七八岁。他曾到法国、比利时勤工俭学，后留学苏联，知识渊博，能诗善文，政治工作经验丰富，为人也和善，只是身体较胖，行动迟缓。而我年轻，身体结实，行动较轻快、灵活，加上有中学文化，故政治部很多事情，他都交代我去办，有些信件要我代为处理。中央红军长征后，他留赣南坚持游击战，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1935年在江西大庾牺牲。1945年5月17日，党中央在延安为烈士开追悼会，当天，我写了《悼刘伯坚同志》一诗，表达我对他的怀念之情：

一代才华少与侪，弱冠遍历东西欧。
文章有价耀珠玉，气概无前逼斗牛。
西北军中驰令誉，红军帐里足良猷。
百战何尝计苦乐，劳身为解万民忧。
日寇侵袭战鼓震，摇摇欲坠我神州。
对外奴颜来内战，同胞四野血横流！
豺狼在邑龙在野，贼子当权志士休。
可怜雄才竟未展，深锁梅关无限愁！
景仰遗风惭弩马，缅怀劳绩茹在喉。
一人殉节千人慨，竖眉切齿恨贼酋。
今日哀悼非昔比，百万雄师为国谋。
他年南国春意好，重修荒冢奠庶馐。

同年4月，因红5军团34师政治部主任张凯同志在黎川战役中负伤，军团调我去接替他的工作。该师原是地方独立师，后编入红5军团，师长是陈

树湘，政委程翠林。全师约 4000 人。我在该师参加了两次较大的战斗。至同年 5 月下旬，张凯伤愈回来，军团又调我到该军团 13 师担任政治部主任，接赖传珠同志的工作。该师是宁都起义由国民党 26 路军改编而成的，战斗力较强，师长是陈伯钧，政委是罗华民。我到达不久，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了。

失利的堡垒战

蒋介石经过半年准备，于1933年9月下旬，调动了100万军队、200架飞机，开始向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其中以50万兵力，采取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新策略，首先重点进攻中央苏区。蒋介石自任“围剿”总司令，还聘请以赛克特为首的德国军事顾问团和一些意、美军官帮助其战术的指导与训练。面对敌人空前残酷的反革命“围剿”，王明把持下的中共临时中央，一开始就错误地估计敌我形势，继续推行军事冒险主义。

尤其是同年9月下旬，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从上海到达瑞金后，执掌了红军的战略决策和指挥大权。他刚愎自用，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无视红军四次取得反“围剿”胜利的经验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提出“不放弃根据地每一寸土地”、“寸土必争”、“全线出击”，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要求红军在苏维埃区域外战胜敌人，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以单纯防御路线代替积极防御路线，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运动战、游击战，同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拚消耗，其结果是红军辗转于敌军主力和堡垒之间，陷于被动地位。当时，敌人集中兵力于中央苏区外围的各战略要地修筑碉堡，用公路连接各重要碉堡据点，形成碉堡公路网，层层构筑碉堡，以碉堡推进，步步为营。对于敌人在军事上所采取的这种“堡垒主义”新策略，红军并没有像过去那样，集中优势兵力，运用运动战、游击战的灵活战略战术原则，而是采取分兵把口、“短促突击”的方针，这正符合蒋介石“堡垒主义”新战略的需要。蒋介石为切断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的联系，首先命令周浑元部的3个师向中央苏区北部战略要地黎川发动进攻。

由于留守黎川的只有地方游击队和一个70余人的红军教导队，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闽赣军区政治委员肖劲光为避免无谓损失，率领教导队和游击队主动撤离黎川。（为此事，肖劲光同志被打成军队罗明路线的代表，予以撤职、判刑，开除党籍，直至红军长征到毛儿盖时才平反）。李德等人震惊于黎川一城之失，为夺回黎川，命令在福建的红3军团和我们红5军团回师江西，出击黎川。

我们红5军团第13师，接到命令后，于同年10月上旬赶到洵口和黎川之间的烧茶亭，侧击增援洵口之敌周浑元部第96师，以策应我红3军团在洵口与敌陈诚指挥的3个师的遭遇战。敌人吸取过去四次“围剿”失败的教训，小心万分，稳扎稳打，见我师阻击，便退回黎川碉堡里。接着，中央和中革军委命令红3军团向黎川以北的硝石进攻，而硝石周围驻有敌重兵集团。红3军团猛攻不克，且一度处于被敌围歼的危险境地，先后伤亡1000多人。与此同时，我5军团也奉中央之令攻打黎川东北面敌军巩固227的白区资溪桥，结果也未取胜。后我们在白区打了几仗，均未得利。从表面上看，我们是在主动进攻，试图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实际上由于红军兵力不集中，又是在敌人堡垒密布的白区作战，故我们一开始就处于被动的境地，可说是虎落平川。同年12月中旬，中共临时中央和中革军委见红军在白区苦战两个月，损兵不少却未打开战局，不得不命令红军停止进攻，从白区撤回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转入防御阶段。我们红5军团在董振堂、朱瑞同志率领下，从白区撤回南丰西北一带防御。我们挖战壕，建碉堡，造野战工事，并发动群众上山砍树木。工事完成后，少数部队进入碉堡（原来我们骂敌人的乌龟壳），其余部队隐蔽在山林内或山沟中，进行政治动员和讲授短促突

击战术，等待敌人来进攻。敌人进攻时间一般为拂晓，先用飞机轰炸，大炮轰击我碉堡、工事、前沿阵地和隐蔽部队。这样一来，我们土木结构的堡垒、工事都被严重毁坏，部队也伤亡不少。当敌人攻占我前沿阵地而立足未稳时，我前沿部队则以少数部队从正面和两侧向敌先头部队实行短兵突击，歼其一部，叫斩“乌龟头”，而后即撤出战斗，说什么积小胜为大胜。

这种打法，虽然指战员们很英勇，歼灭了一些敌人。但每次敌人进攻时，我们都丢阵地，伤亡不少人员。至下午4时，敌人就收兵，他们每天前进10公里就不追了。而我们丢了阵地后又在新阵地修工事和堡垒，一次一次修，一次一次挨打，一次一次丢失阵地和伤亡人员。至1934年2月初，我们红5军团和红9军团及红1军团一部，在抵御失利的情况下，被迫从南丰西北部往南撤退。

2月下旬，我军团与敌94师激战于芦坑，失利后又继续南撤。不久，北线总指挥部命令红1、3军团和我们红5军团开赴广昌，在南丰至石城一带的甘竹、广昌、高虎脑等处约40多公里的距离内，摆下三道防线，构筑工事，分兵把守，准备死守广昌。经过历时10多天的激烈保卫战，至同年4月下旬，红军虽然大量杀伤敌人，但敌人在其空军、炮兵的协同下，摧毁了我军在广昌城外构筑的堡垒工事，并逐次攻占各制高点和战略要地。我军几次突击，均未成功。据《彭德怀自述》中说，当时在李德所谓永久工事里担任守备的红军一个营，全部壮烈牺牲。最后，我军不得不撤离广昌，转移到头陂、白水等地集结。敌人所到之处，毁掉大片农田，修公路，筑碉堡，建机场。到处布满坚固的碉堡，一人多深的战壕四处交叉；山岗上，大路旁，到处都是敌人扎下的白色帐篷。幸得当时霪雨连绵，山水横流，滞缓了敌人进犯的步伐。我们军团抓住这个空隙，奉命在广昌以南的头陂一带休整和布防，顶住向宁都进攻的敌人；红3军团撤到广昌南部的贯桥地区设防，准备利用位于广昌、石城、宁都之间的高虎脑的险要地形阻击南进石城的敌人。红3军团的第5师（红7军番号取消后改编为该师）处于正面，红4师为该师的左翼，我们军团第13师在红5师的右翼，数万红军部队摆成一道几十公里宽的防线。在这样广阔的战线上，红军准备和进犯的20多个师的强敌打阵地防御战。北线总指挥部几乎每天都向下面打电话、发指示，三令五申要修坚固的工事，要战士们准备付出最大的牺牲，“死守阵地”，“不让敌人前进一步”。那时，我们只觉得这次打法与过去不一样，还不知道这是“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指导下消极防御的错误方针。因过去几次反“围剿”都取得了胜利，故大家还是信心百倍，斗志高昂，日夜构筑工事。过了十几天，我们刚筑好工事，敌人就来进攻。成群的飞机像黑者鸦低空飞转，把密密麻麻的炸弹扔到我军阵地上，立即掀起冲天的烟尘，脚下的土地被震得摇摇晃晃。紧接着，敌人的大炮又轰得山头、村野硝烟滚滚，整个大地好象在粗重的炮弹爆炸声中崩塌、下沉。

红军指战员蜷着身子，蹲在残存的工事里，伏在弹坑中，用身体护着手中的枪弹干挨炸。不少人还没捞到跟敌人交手，就被炸成重伤，甚至壮烈牺牲。敌人的炮火延伸后，他们便钻出碉堡，以密集的“羊群战术”，漫山遍野地向我军阵地压过来。敌人近了，红军的步枪、机枪一齐猛烈射击，但不能制服敌人。

尽管敌人在红军阵地前倒下了一大片，但后面敌人还是一股劲往前冲，我军也有很大伤亡。这样拚消耗，对兵力弱小的红军来说非常不利。我们这

样与敌人“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打了大半年，部队天天在减员，消耗得不到补充，弹药物资越来越枯竭，苏区越缩越小。最后，我们军团被迫退守到兴国附近一带。在这次反“围剿”的战斗日子里，本来战争环境是异常艰苦的，而我们红5军团又经常担负牵制敌人的任务，没有什么缴获，部队的消耗得不到补充，与其他兄弟部队相比，确是更苦一些，不仅弹药缺乏，而且衣服、草鞋破烂不堪，有的干部连一条洗脸巾也没有。

我军团与兄弟部队相遇时，许多同志总是低着头，闷着走，加上该军团是从国民党军队起义过来的，总觉得比别人低一等，这给我的政治工作增加了一定的难度。

有一天，我师一位团长对他的小勤务员发火，勤务员不高兴地说：“你再发火，我明天不给你手巾洗脸！”原来，这位团长已经很久没洗脸巾了，常借用勤务员的洗脸巾。我知道此事后，找供给部，给那位团长送去一方尺的土白布，他很是感激。一次，我师有一位连长在防御前沿阵地趁黑夜逾越警戒线，企图逃跑，哨兵发现后，立即令他站住，他还算听话，没有继续越界。于是，哨兵按军纪把他逮捕。因当时军纪规定，私自走出警戒线的，一律逮捕，不服从的，哨兵可以开枪。

保卫干部把那位连长押到师部，我亲自进行审问：“你是起义过来当红军的，由士兵升为连长，组织很信任你，现在生活虽然艰苦，但革命是有前途的，你为什么要逃跑？”他没有马上回答我，只是哭，最后难过他说：“我并不怕死，也不怕苦，但是……”他说到这里停了一会儿，才慢慢说出事情的经过：“前天早晨，我召集全连战士训话时，有几个战士指着我的裤子笑，我低头一看，原来自己的裤裆破了，裂开了一个大口子，露出了下身，感到万分羞耻，急忙解散队伍。晚上，睡不着，认为自己不好再继续担任连长了，便决定逃跑。现在冷静一想，真是罪过，后悔莫及！”对这位连长的问题，本应按军法严处，考虑他为革命立过功，且态度较老实，认罪较好，故免除他死刑，判5年徒刑，发给一条旧军裤，送他到后方服刑。由于反“围剿”战争节节失利，生活日益艰苦，指战员们对这种“堡垒对堡垒”的消极防御打法越来越感到不满和想不通。当时前方打仗的部队，每天能吃上两顿饭，二分钱菜，二钱盐，这是最高享受。有时激烈战斗一天，吃不上饭，喝不上水。饥饿和疲劳，使许多同志的脸色越来越苍白，身体越来越瘦削，但大家的革命意志丝毫没有动摇。可以说红军是世界上最忠诚、最勇敢、最刚强的人！

有一次，我去军团开会，见到刘伯坚主任穿的衣服又旧又破，我回师部向供给部要了一块蓝布托人送给他。隔了一段时间，我去军团开会，见他穿的还是那套破旧衣服，我问他是否收到送去的布料，为什么没有缝做衣服？他说，布料已送到瑞金，给老婆了。那边生活更苦，那里每人每天只能吃到两顿饱饭（即每袋半斤米，用布包起来，煮熟后每人一袋），吃硝盐（用尿或小便坑的土熬的），青菜很少。我听后无话可说，可我再也没有布料送他了。同年八九月间，敌东、北两路军开始向中央苏区的中枢地区推进，汀州、兴国、宁都等地处在敌军的直接威胁之下。我红5军团和红1军团等部队奉调兴国防守，战事越来越危急。有一次，陈师长、罗政委和我等人上山观察地形，部署战斗，碰巧红1军团的指挥所也在同一阵地上，看到该军团长林彪和政委聂荣臻等人正在指挥所用望远镜观察敌情，而我师指挥所里几位师部领导也正在使用望远镜，10多个望远镜的反光被敌人发现了，一排排平射炮打过来，很危险，大家立即跳进坑里，结果，伤了几位随员。从

9月上旬起，敌北路军第6路军薛岳部的4个师，采取一面前进，一面修碉堡、公路，轮番向兴国的古龙岗进攻。新成立的红8军团及其他红军部队，同敌接战于龙岗至古龙岗间的雄岭、上下流等山岭要隘。我军节节抵御。其处境也越来越危急。10月上旬的一天黄昏，暮霭朦朦，晚霞染天。敌人停止了一天的进攻，我从火线回到宿营地。恰机要科送给我一份急电，是总政治部来的，内容是：命令我立即动身，两天内赶到古龙岗镇，向驻在该镇的红8军团报到，任命我为该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接我工作的是一方面军政治部组织科长周碧泉。电报最后加一句：“如迟到了，就赶不上队伍！”我看了电报，心里很焦急。因为师长、政委尚未回到宿营地，新任命的师政治部主任周碧泉又未来到，而去古龙岗的路程有100公里，计算一下，若不马上动身，真有赶不上队伍的危险。这时，我想起半个月前，5军团政委李卓然到我们师部时说，分给我们500个新兵，要好好巩固，以后不容易补充了，当时我有些诧异，又不好问。联想起来，我估计这次已不可能粉碎敌人的“围剿”了，红军主力可能很快突围，撤离中央苏区，如果赶不上队伍，就会被留在根据地里，故我决定立即动身。我留了一张条子给师长、政委，便带着勤务员吴太、饲养员张继胜，牵着一匹马，披星戴月，连夜上路，直奔古龙岗。晚风徐徐吹来，吹走我们身上冒出的热气。我们一口气走了几十里路，至深夜才在一个小客栈住下。第二天拂晓，月亮尚未落山，我们便动身赶路。天上微弱的白光，照着地上一层薄霜，真有点“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的景象，沿途山青水秀，景色如画，我们匆忙赶路，无暇欣赏。我们马不停蹄地整整走了一天，黄昏宿营时，因马太累了，一卧下就站不起来。次日晨，马仍站不起来，没办法，只好将这匹马送给当地苏维埃政府。饲养员为此而感到非常惋惜，他背着马鞍上路，有依依不舍之情。我们又整整走了一天，至黄昏时，终于按时赶到古龙岗镇。8军团已离开，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同志留下正焦急地等我。他看到我按时赶到，非常高兴。第二天，我便与他一起追上军团机关，想不到这竟是踏上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征途！回想在中央苏区战斗的两年多时间里，我学到很多新鲜的东西，也经受了一场新的严峻斗争考验。尤其是参加了第三、四、五次反“围剿”战争，对毛泽东同志的关于人民军队建设、人民战争思想、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坚强的政治工作等方面有较深刻的认识和体会，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给第五次反“围剿”带来的恶果，也有切肤之感，可以说，这是我思想上、政治上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时期。1963年我写的《欢庆八一》一诗，回顾了这段战斗生活。建设红军任务多，军事行为政治先。耿耿忠心服从党，纯洁思想志方坚。民主集中严纪律，核心支部设在连。平等官兵阶级爱，团结战斗史无前。白匪“围剿”已四遭，长驱直入却被包。步步为营难稳打，分兵合击且咆哮。七分政治三军事，欺骗杀戮又火烧。农民土地被重夺，群情激愤孺嗷嗷。我军战略实英明，诱敌深入瞎敌情。坚壁清野敌拖瘦，游击四出迫敌惊。盘旋推磨团团转，集中优势歼弱兵。堤缺一口全线溃，粉碎围攻迫不停。235

五次围攻敌转略，爬行推进乌龟壳。军政经文吹总战，坚持内战丢河山。党内教条弃传统，单纯防御分兵多。血战频繁歌慷慨，突围倾泻涌人波。

第五章 长征路上

血染湘江

风萧萧兮赣水寒。

1934年10月中旬，由于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利，中央红军和中共中央机关85000人，被迫离开中央苏区，实行战略大转移，踏上向西突围的征程。当时我们虽然意识到要突围，但并不知道这就是长征的开始。

10月17日，我赶到古龙岗向红8军团政治部报到后，便跟随部队强行军。因时间紧迫，罗荣桓主任只好边行军，边向我介绍部队情况。

8军团是同年9月在兴国集资圩由扩大来的新兵编成的。下辖21师、23师，共7000余人。军团长周昆，政委黄甦，参谋长唐浚。为加强领导，中央还派刘少奇同志担任军团党代表。该军团21师原配属江西军区，还打过几仗。而23师则全是新兵，尚未上过战场。周昆和黄甦两人原在1军团时分别为师长和师政委，罗荣桓同志原是红1军团的政治部主任。行军步子在逐渐加快，当部队向西跨出苏区边界时，大家不断地回头，凝望着中央苏区的山山水水，不胜留恋！10月22日，我们从赣州以南的王母渡、立濂圩之间渡过桃江，便进入了白区。这时，前面有敌人堵击或民团骚扰，后面又有追兵，两侧还有夹击之敌，加上空中敌机的轰炸扫射，行军更为艰难，几乎天天要打仗，得不到休整机会，遇到不少新的情况和问题。我们政治工作机关，不仅要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而且沿途还要向群众做宣传，工作繁忙，经常迟睡早起，很少休息。本来，红军的团级以上干部都配备有牲口，而我的马在来古龙岗途中留给当地苏维埃政府了。到8军团后，看到部队刚刚组建，没有什么家当，要从别处抽出一匹马给我确不容易。因此，自己不便开口提出要坐骑。我天天跟着队伍徒步行军，翻山越岭，有时天下雨，道路泥泞，一不小心就滑步跌倒，弄得满身泥浆。开始，每天行军总是说翻过前面那座山献到，无论如何要坚持到目的地就好办了。谁知部队越走越远，越走越快。走了十几天，一边工作一边走，体力渐渐支持不住，脚开始肿了，只得拄根棍子，一瘸一拐地赶路。我想，过去多大的困难都克服了，现在，也要以坚强的革命毅力，战胜脚肿行军的困难。又走了几天，队伍经过广东边境进入湖南。一天早上，部队正在集合，我刚来到集合地，就听见有人喊道：“莫部长！”转头一看，原来是罗荣桓主任。我赶快跑过去，他高兴地对我说：“党代表刘少奇同志送给你一匹马。”说着，他马上引我会见刘少奇同志。见到刘少奇同志，我敬了一个军礼。他和蔼可亲地对我说：“你不是没有马么？你的脚肿了，工作又忙，前面的路还很长，你就把这匹老黄马牵去用吧！”我听后十分感激地问：“党代表，这匹马给了我，那你怎么办？”他微微地答：“昨晚，部队打土豪，搞来一匹大骡子，送给了我，我的行李多些，还有书籍，骡子力气大，我把它留下了，这匹黄马就多出来了。”他停了一下，又接着说，“这匹黄马是我从瑞金骑来的，马虽老一点，但还健壮，又老实，走路小心，记性好，还有不少优点呢！”我哪能要党代表的马呢？便推让说：“党代表，马还是你留下驮行李，或者换着骑吧，我另想办法解决。”少奇同志马上认真他说：“我不需要两匹马，现在，你的脚肿了，比我和其他同志更需要马，不要再推了！”站在旁边的罗荣桓主任也插话说：“快要出发了，党代表决定给你，你就要了吧，我帮你找了好几天，都找不到呢！”在当时困难的情况下，少奇同志送给我这匹马，确是雪中送炭，这不仅是对干部无微不至的关怀，也是对我们工作的支持。我向少奇同志感谢了几句后，

全军的后卫之一。对于我们这支新部队来说，是一副过分沉重的担子。拂晓，银霜遍地，秋风萧瑟。我们迎着晨曦，尾随红9军团从左翼往湘江岸边前进。5军团34师留在水车掩护。当我红8军团在奋力前进时，听到右翼剧烈的枪声，空中飞弹如雨，知道右翼的主力兵团正在突破敌人的封锁线。接着，从水车方向又传来了枪声，知道34师抗击追敌的掩护战斗也开始了。我军团跟在红9军团后面旅次行军，相隔只有一个小时路程，起初听到前面有一些零碎枪声，不知究竟。罗荣桓主任对我说：“你对广西情况较熟悉，到前面去了解情况。”我接受任务后，便骑着马随尖兵排走在前面。走着，走着，突然，只听“砰！啪！”几声枪声，继而“哒！哒！哒！”响成一片，步枪和机枪从前方百米山腰丛林中打来，在我后边的尖兵排梁排长负伤了。我的马鞍也中了一弹。我立即跳下马，协助指挥队伍就地散开，攻击前进。过一会，前卫团长很快赶了上来，侦察敌情，指挥部队占领阵地。这时我也搞清了情况。

原来，红9军团走过一个多钟头后，一支广西敌军从灌阳方向插过来，开始听到的零碎枪声，就是他们打9军团掉队的同志。我们必须击退前面之敌，扫清障碍，才能继续前进，不然，后头的追敌，将34师压下来，我们就前后受敌了。于是，军团首长下令强攻。但敌人已先占领了主要阵地，其后援部队又纷纷赶到，人数有多少，不很清楚，看来，我们难于短时间内消灭敌人。那时，9军团已走远了，右翼枪声亦已稀疏，而且越打越远，估计冲破敌人的封锁线了吧，若我们不尽快扫清道路，其处境是很危险的。

下午3时，敌机飞来了，低飞离地面只有300来米，俯冲时用机枪往下扫射。我军除战斗部队外，行李、伙食担子、马匹、担架等分散在山上，到处寻隐蔽的位置。敌机更逞威风，其机关枪不断往下扫射。

此时，后面34师的枪声大作，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听到这个师的声音。

我军团且战且走，有时敌我几乎搅在一起，敌人的追兵曾离军团指挥机关几十米。罗荣桓主任常和机关人员一样，掏出手枪直接参加战斗。暮色降临了。看情况，我军团已不能从正面通过，但如何追赶主力呢？从前方渐远的枪声和飞机在较远上空盘旋的情况判断，主力与我军团相隔已有好几十里，我们必须迅速从侧方去会合，不然，天黑了更难于行动。于是，军团决定把机关的行李、伙食担子、马匹等集中起来先出发，战斗部队与敌人对峙一阵后撤回，急忙沿着先出发的后勤部队方向前进。在朦胧月色中，精疲力尽的战士们跌跌撞撞地走着。边走边打盹，肚子饿了，只能靠身上带的一点干粮充饥。远处不断传来枪声，部队不敢停下休息。战士们越走越心急，步伐却越走越慢。队伍越走越稀，掉队的越来越多。就是那些鼓动别人前进的宣传员，自己也走不动了。我随战斗部队徒步行军，也已经疲劳至极，两脚又开始肿起来。我只得拄着棍子，咬着牙赶路，再累也不敢停歇一步，生怕跟不上队伍，且一休息，就难再站起来。就在这样极度紧张，极度疲劳的情况下，我们走了50多公里路。至拂晓时，来到一条马路边的平坝子，四面火光，好似有许多部队在宿营。我们分析，可能是先出发的后勤部队，但未见哨兵，又觉得奇怪。再走，听见一匹马在路旁向我嘶鸣了几声。我转眼一看，啊！原来是少奇同志送给我的那匹老黄马，正向我招

呼呢！少奇同志曾说它记性好，看来确是不差。我高兴极了，赶忙走过去，又看见饲养员老张正在路旁睡觉，我立即叫他起来，询问有关情况：“你们先出发的同志都在这里吗？”“不，伙食担子休息一会又走了！”他睡眼惺惺地回答。“你呢？”“我在这里等你！还有军团首长的饲养员也一起在这里等你们！”“附近有什么部队？为什么四周有这么多火光？”“没有，都是掉队的！”“喂过马吗？”“已吃过草料，也饮过水了！”“赶快走吧！”我督促周围掉队的同志上路后，便立即骑上马往前奔去。停留在这里是很危险的，敌人会很快追来的。老黄马很有精神，“嘚、嘚、嘚”地在大路上有节奏地走着。早已疲劳万分的我，坐在马上，摇摇晃晃，感到很舒适，边打盹边想，真要感谢少奇同志给我这匹马，如果没有它，我脚肿走不动，可能要掉队；如果不是饲养员老张忠诚待我，哪能把马放在路边等我；如果不是这样一匹记性好的马，又可能失之交臂，过而不知，那也就很可能脱离不了危险的处境！大约又走了10多公里路，来到离湘江边20公里的一个小镇，天已放亮了。狗吠鸡鸣，似催着熟睡的人们早起，可我们连续走了100多公里路尚没有合过眼呢！小镇的街道平直，也较干净，有些同志都想躺下睡一觉再走，但此镇不是久留之地。据了解，主力已渡过了湘江，我们必须迅速赶到凤凰嘴渡口渡河。一出街口，在初升的微红的太阳映照下，看到马路旁边满地的书籍文件，一片狼藉，里面有《列宁主义概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土地问题》、《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步兵操典》，还有许多地图、书夹、外文书籍等。有的书原封未动，有的扯烂了，有的一页一页地散落满地，溅满了泥浆，这是红军的运输人员从瑞金艰难搬运来的图书馆的书籍，也是我们的思想武器及战斗中必需的材料，现在不得不扔掉，烧了，真是可惜呀！我自己从中央苏区带来的两捆书籍、文件仍挂马背上，还是不舍得丢掉。马路上行军，本来是好走的，但是，战士们太疲劳，太饥饿了，且走惯山路的人走平路反而吃力，觉得20公里路太远了，膝盖疼痛难忍，每前进一步，都要使出全身的气力。有的战士走着走着，一头倒在路旁便呼呼睡着了，我们叫醒这一个，那一个又躺下了。各连队的政工人员，沿途利用可能利用的时间，向战士们进行宣传、解释、鼓动，说明我们的处境，抢渡湘江的重要性和我们担负的任务，指出我们仍处在敌人重围之中，必须尽快赶到渡河点，抢渡湘江，否则就会被敌人截断去路。据了解，原担任殿后的34师已另走别路，不在我们后面，殿后的便是我们8军团我们忍着饥饿和疲劳，走到离凤凰嘴渡口约几公里的广西境内时，头上出现了敌机，沿着公路向我们队伍投弹、扫射。而公路两旁没有隐蔽地，也没有时间允许我们停下隐蔽，为了抢时间，我们只能冒着敌机的扫射和轰炸前进，再没有比在这种险境下行军更困难、更危险的了。大家都抱着最大牺牲的决心，生死存亡，全不顾及。沿途有不少同志牺牲在敌机的轰炸、扫射之下，敌机只能夺去我们一些人的生命，但并不能最后解决战斗。在公路两旁附近，还有其他零星部队不断向凤凰嘴渡口急进，这表明渡江尚未完毕。担任掩护的我红8军团至此再不能前进了，遂急急忙忙地布置了警戒，准备迎击追来的敌人，以掩护尚未渡过江的部队。布置好警戒后便安排煮饭吃。不知伙食担子到哪里去了，各单位只好派人煮。没有菜，没有盐，也没有碗，大家用帽子装来吃。饭还没吃完，敌人就从旁边插过来了。我们把帽子里未吃完的饭包起来，立即拿起武器，登山抵抗。这时，前面的部队均已渡过湘江，我们的掩护任务已经完成，便边打边撤，向渡口前进。12月1日中午，我们军团终于赶到

湘江边的凤凰嘴渡口。大家看到了波光粼粼的江水，心里稍松了口气，因我们到底抢在敌人的前头赶到湘江。凤凰嘴渡口是湘江的上游，江面有百多米宽，江水不深，可冰冷砭骨。我们刚到江边渡口，后面传来追敌的枪声。敌机又在渡口上空轮番轰炸、扫射，江面激起了一股股水柱，渡口临时搭起的浮桥已被炸断。我们便立即冒着弹雨冲进江里，徒涉渡河。我和军团机关及23师部分同志走在前头，到了河心处，水淹没到腋下，大家举着枪和行李，奋力向对岸移动，个子矮小的仅在江面露出个头来，有的女同志趟不过去，便抓住骡马的尾巴渡过去。在抢渡中，不少同志中弹倒在江里，被湍急的江水卷走……刚到对岸边，敌机又俯冲过来，我们在沙滩的洼地卧倒，待敌机投弹、扫射过后，疾步冲进岸边的一片茂盛的树林里。我从中央苏区带来的书籍、文件，在这次渡江时全部丢失了。江东岸的枪声越来越激烈，我们在树林里继续向前奔跑。此时，敌人已追到江边，我军团未过江的部队与敌人进行几次激烈拼杀，损失很大，建制也被打乱，大部同志过不了江。入夜，我们在山凹树林处停下露营。看着周围的同志，许多熟悉的面孔不见了，我心里感到非常沉重，虽然疲惫不堪，但总是睡不着，眼前浮现着那些倒在江里，曾同甘共苦过的战友。第二天早上整理队伍，我军团的21师几乎全部损失，23师也严重减员，全军团剩下不足两千人。整个红军部队在这次战役中伤亡也十分惨重，元气大伤，还有相当多的同志身体不支掉队了。34师为掩护我军渡湘江，而被敌截断，垮掉了。此时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已从8万多人锐减至3万多人。湘江战役是长征途中战斗最激烈、最残酷、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战役。但是，我英勇的红军指战员，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以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浴血奋战，血染湘江，苦战一个星期，终于胜利渡过了湘江，突破了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我军渡过湘江之后，进入西延山区，前进在连绵起伏的崇山峻岭之中。真是往后看血迹斑斑，往前看是云山茫茫。本来，红军总部拟在西延地区休整一两天，然后向湘西前进，与贺龙、肖克率领的红2、6军团会合，但敌人已于12月2日、3日占领了界首、资源一线，全州的敌人也紧追上来，将红军紧紧缠住，另外，蒋介石也急调湘军向新宁、城步、武冈一带转移，妄图配合桂军，前堵后追，于湘桂边境歼灭我军。在这种情势下，我军决定尽快脱离敌人，放弃从西延地域出湖南城步的打算，向西深入越城岭山区。我军团开始于胡岭一带负责警戒全州的桂敌。12月6日，奉命同红5军团向兴安县的越城岭山脉前进，担负扼守老山界各隘口的后卫任务。老山界，是越城岭山脉的中段分支，耸立在湘江西岸，是湘、粤、桂边有名的五岭之一。其主峰苗儿山，海拔2141米，是越城岭的最高峰，也是五岭的最高峰。上下有40公里路，所谓路，也仅仅是直上直下的羊肠小径。远远望去，像一条细长的带子，挂在犬牙交错的悬崖峭壁之间。其地势险要，森林茂密，瀑布飞溅，浓雾弥漫，气候瞬息万变，人们视为畏途。我军团和5军团，作为全军的后卫，以要道隘口为屏障，居高临下，使敌人不敢轻进。由于山高路陡，大军拥塞于途。当晚，主力未能通过，战士们只能就地露宿在山壁曲曲折折的小径上。至第二天下午，主力攀过老山界后，我军团和红5军团一边迟滞追来的桂军，破坏来路，一边开始翻越老山界。这确是长征以来最难走的第一座高山。走至靠近主峰苗儿山时，山路更加险陡难爬。除了要通过由几根圆木架成的又滑又晃、使人头晕目眩的栈桥外，还有百步陡、雷公岩、三跳等10余处险地，所谓百步陡，又叫一百零八步，是在70多度的陡壁上，凿下了一百零八级的石阶。我们上山时，后

面的人的嘴巴可以碰到前面人的脚跟，下山时，后面的人的脚会踩着前面人的头顶，石阶的一边是数十丈的深渊；令人生畏。尤其是雷公岩，它以 90 度的角度拔地而起，在直立的峭壁开凿出来的石阶很狭窄，一次只能爬上去一个人。所有的伤员来到此岩，都必须离开担架，由人搀扶着缓慢攀登上去。有的不能离开担架的伤员，只能留下来。在此岩下，摔死了不少骡马，没有摔死的马匹发出痛苦的嘶鸣。红军指战员以惊人的勇气和毅力，发扬互相关心、团结互助的精神，终于胜利越过这些险道。我们到岩顶四望，真有“一览众山小”之感。当地群众得知我们红军是从老山界过来时，无不感到惊讶。我们翻过老山界后，即进入龙胜县境。其山势未见平缓，前面仍是一望无际的群峰。这里是人烟稀少的苗族聚居区，人们都称它为大苗山。这些苗胞住在人迹罕至的山沟里，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由于民族隔阂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造谣，许多苗胞听到红军到来时，都先逃到深山去了。这就给我们筹粮工作增加了困难。罗荣桓主任指示我们说：“这里是苗族聚居区，告诉大家千万要注意纪律，不要拿群众的东西，群众不了解红军，也听不懂我们的话，若他们看到我们就跑时，我们不要追，也不要喊，更不能开枪。我们要用自己的模范行为影响、宣传群众，有困难要咬紧牙关克服，两三大后通过这个地区就好了。”根据罗荣桓主任的指示，我们政工人员大力开展宣传鼓动工作，教育部队严守群众纪律。有时搞不到粮食，大家饥肠辘辘，忍饿行军，情绪仍很高涨。山路，依然是那样陡峭。那些背着笨重通信器材的无线电队和扛着大炮的炮兵们，个个大汗淋漓，不停地喘着粗气，吃力地往上爬。为了保证器材的安全，防止山路崎岖而摔坏，他们把器材捆在背上，抱在怀里，提出“人在器材在”，“人在大炮在”的口号，有的肩膀磨破了，有的因饥饿、力竭而昏倒。他们个个是英雄好汉！走出了大苗山区后，队伍陆续离开广西龙胜县境，向湖南边境的通道县前进。那里仍有不少桂林式的小山。沿途虽有敌机在上空侦察，但空中威胁已大为减轻，大家也懒得理睬它了。12月中旬，我军攻占了贵州省东部的黎平县。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了会议，讨论了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部队利用此机会进行休整。这时，大家才能较放心地睡觉，这是从中央苏区出发以来最难得的休整。“四川的太阳，云南的风，贵州下雨像过冬”。贵州山

区雨多，气温低，寒气袭人。我从中央苏区带来的衣服，经过两个多月的行军作战已经磨得破破烂烂了，沿途又得不到补充，很多人没有棉衣，现在天气冷了，大家不得不把带来的家当都穿在身上。有民谚说：贵州“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情况确是如此。贵州到处种植鸦片，人们吸毒成瘾，变得痴呆，丧失劳动能力。他们住的是用泥土和茅草、木板条盖的房子，屋顶盖着稻草，男人只在下身系一根遮羞的布带，有些少女连这样的布带都没有，赤条条地在地里干活，当地农民几乎都是赤贫如洗。在休整期间，我们从军团首长那里听到了黎平会议的主要精神，知道中央已决定放弃与 2、6 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较薄弱的川黔边界发展，拟在遵义一带建立革命根据地，这样，北可以与川陕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呼应，东可以与 2、6 军团配合，四面都有回旋余地。我们听后觉得眼前开阔了，对革命的前途充满胜利的信心，但那时，还不知道这是毛泽东同志的主张。

在红色上干队

由于红8军团在湘江战役中严重减员，建制不全，丧失战斗力，故中革军委于12月18日在黎平命令撤销8军团建制，把现存的部队并入红5军团。刘少奇同志回中央，周昆、黄甦、罗荣桓同志另分配工作，我被调到总政治部待分配工作。我觉得红8军团从成立到撤销，这里面反映了一个建军方针的问题。本来，在中央苏区扩大来的大量新兵，应该补充到主力兵团去，而“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为了追求增加部队的番号，却另外成立那些没有骨干和基础的新部队，这样，主力部队得不到补充，越打越少，削弱了战斗力，而新成立的部队又因缺乏骨干力量，战斗力不强。这在建军方针上是一个深刻的教训。黎平会议后，为贯彻中央新的行动方针，我军沿着黔境剑河、镇远、施秉、余庆和台拱、黄平、瓮安一带横扫过去，在薛岳、周浑元等部10多万大军追击下，于1935年1月初，胜利突破了乌江天险。接着，又攻占了贵州古城遵义。这可说是新年开门红！1月中旬，春光融融，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集中讨论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尖锐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中实行单纯防御、在长征中实行退却逃跑的错误，会上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毛泽东同志参加了党中央的核心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付出沉重代价之后作出的正确选择。我到总政治部报到时，恰总政治部刚发布关于建立川黔根据地工作的训令，我便协助总政治部贯彻这一训令，开展宣传鼓动工作。到了遵义，我又帮助总部直属队俱乐部工作和处理伤病员等工作，有时去教红军士兵唱歌。我记得有一首歌是红军总政治部编印的，内容是歌颂共产党和红军及讥笑蒋介石碉堡政策的，歌词是：“共产党领导真正确，人民拥护真是多，红军打仗真英勇，粉碎了国民党的乌龟壳（指碉堡），我们真快乐，我们真快乐！”因在遵义会议期间，部队得到较长时间休整，补充了衣物冬装，士气大振。遵义会议结束后，听中央领导同志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心头烟云散去了，就像阳光穿透了迷雾，混乱的思想得到了统一，人们的情绪也较稳定、振奋了。这次会议是在极其危急情况下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革命。在遵义期间，红军曾在中学操场里召开军民大会，近万名工人、农民、学生、商民和红军手执纸旗参加大会。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同志出席了大会并讲了话。毛泽东同志主要是讲红色政权不收苛捐杂税、实行全民选举和主张抗日救国等内容。朱德同志则讲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说红军愿意联合国内各界人士一致抗日。我站的地方离主席台很近，第一次看到了这两位领袖人物的英姿。我军在遵义休整了12天后，便按军委命令，分三路北进川南，拟在四川建立革命根据地，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创建根据地的决定。1月下旬，我军进驻赤水河边的土城后，川军的模范师衔尾而至，妄图阻击我军北进入川。我军在土城附近向川军发起攻击，战斗非常激烈，红军给敌以重创后主动撤出战斗，西渡赤水，进入川南古商县。我在这次战斗中，负担火线上照顾伤员工作。组织群众抬担架，并分一些大洋给伤员、群众，请群众抬伤员到山沟养伤。这一工作十分难做，因为伤员不愿离队，只得做细致的思想工作，依依惜别！由于北面长江沿岸敌人已调有重兵封锁，且后面追兵甚紧，军委决定放弃北渡长江的计划，部队主力转向川滇边的云南扎西（威信）集结。打算在川滇黔边广大地区活动，争取在这三省边区中创造新的根据地。2月上旬，我军进驻扎西，在此进行短期休整。这时，总

政治部组织部长李弼庭通知我，说组织决定分配我在军委红色上级干部队担任政治委员。该队是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前夕由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和一些地方干部合编而成，学员共 130 多人，均为中层以上领导干部。队部属中革军委建制，由红色干部团指挥。该队的队长是肖劲光同志，湖南长沙人，早年赴苏联学习，1922 年入党，1924 年回国后，曾任国民革命军第 2 军 6 师党代表，参加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前期担任红 5 军团政治委员和红 7 军团政治委员。五次反“围剿”时，受“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迫害，被打成军队罗明路线的代表，撤去军团政委职务，开除党籍，判 5 年徒刑。后到红军大学工作算监外执行。长征将开始时，调任现职。该队原政委是余泽洪，四川人，先在赣东北红军担任过政治部主任，后在中央机关做过青年工作，曾受过王明路线的打击迫害。他为人忠厚。遵义会议后，红军离开古简时，他被调离上干队，留在川黔边境地区做地方工作，以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我到该队时，他已离开，后听说他留在地方工作时牺牲了。队部下设军事指挥科、政治科、地方工作科等三个科。指挥科是训练团、营级军事干部的，约 40 人。科长周士第，他是海南岛人，1924 年加入共产党，同年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朝，后担任过叶挺独立团参谋长，南昌暴动后任师长。起义军南下失败后从事反蒋活动，曾任 19 路军团长。1934 年初进入中央苏区，在红军大学做教育工作，长征开始时，担任上级干部队指挥科长。政治科是训练团、营级政治工作干部的，约 30 多人。科长苏进，曾到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回国后担任国民党 26 路军旅参谋长、副团长，1931 年参加宁都起义，后担任过红 5 军团师长，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受“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迫害而被捕，长征开始时释放，先调任上级干部队军事教员，后任现职。地方工作科是突围时由随军行动的地方县级干部（县委书记、县长等）组成，约 40 人。科长是冯达飞，他是广东连县人，早在大革命时就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到黄埔军校和苏联航空炮兵学校学习，回国后参加著名的广州起义和百色起义，担任红 7 军纵队长、团长，后又担任过中国红军大学第 4 分校校长、红军独立第 3 师师长、湘赣红 8 军代军长等职。曾遭受王明“左”倾路线的打击而被撤职和开除党籍，长征开始时调任现职。后在皖南事变中牺牲。遵义会议后，中央还将董必武、徐特立、成仿吾、李一氓和冯雪峰等五位资格较老的负责同志分配到上级干部队来，他们是以“政治教员”的身份随队行动的，是我们的重点保护对象。我来队工作后，感到责任重大，困难较大。因为队部和科长一级干部中只有两名党员，有两名受过开除党籍的处分，有一名脱离过党。他们的年龄比我大，过去有的职务比我高，其政治水平、军事技术水平也比我高，我能胜任这一领导工作吗？再者，学员都是团、营军事、政治或地方县级干部，尤其是原广西右江苏维埃主席雷经天同志，已是 30 出头的人，他被开除了党籍，中央苏区肃反时，又被打成改组派，长征开始，才放出来，到地方干部科当学员。这些学员都有相当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身边有勤务员照料，现在，他们当普通战斗员，自己扛大枪，背背包，长途行军作战，能经受得住吗？我这么年轻，如何做他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呢？尤其是中央分配来的五位老同志中，董老是党的创建者之一，徐老是老教育家，两位均年近 50，是大家熟悉敬重的老前辈。其余三位同志在白区时就是有名的文学家、文学评论家。李一氓还在上海做过地下党的工作，长征前往国家保卫局局长；成仿吾曾被称为“创造社”的“四杰”之一，曾任鄂豫皖苏区省委宣传部长；冯雪峰曾任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委书记，长征前在瑞金任

中央党校副校长。他们都是党的宝贵财富，其政治思想及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都很高，我怎能谈得上对他们的领导呢？中央首长对这几位老同志十分关怀，时常过问和前来看望他们，要求我们保护好他们，若万一途中发生什么意外，如何向中央交代呢？根据这些情况，我的主要工作方针是：相信广大干部，尤其是队长和三个科的领导干部，给予充分信任的态度。当时，有些同志，对队里一些曾脱离过党、或被开除了党籍以及犯有“错误”、“罪行”的干部很不放心，怕他们逃跑或干出什么事来，曾布置一些人暗中监视他们的行动。我认为，这些遭受过“左”倾路线打击、迫害的同志，虽然对左的错误做法有意见，但他们经过长期革命斗争，是忠于党和人民的，是懂得革命大局的。我分别同他们坦诚交谈，引导他们向前看。同时，尊重他们在工作上的意见和建议，放手让他们工作，做到有职有权。有关全队性的军事、行政方面的事，由肖队长去做；各科的事，原则决定后，让各科长分头负责。为了发挥党团组织的作用，我们分别成立了党支部和团支部。每科都选出一位年轻而有工作能力的党员为支委。我和苏进两人只担任普通的党支部委员，另选较年轻的彭善和同志担任党支部书记。支部开会讨论问题时，常吸收队部领导和有关老同志参加，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另外，队部决定的工作，又通过党支部，发动党员贯彻执行。对五位老同志，我们给予尊重和爱护，遇事向他们请教、学习，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如他们的政治理论水平高，我们便请他们负责政治课的教学工作。本来，在讨论政治问题时，最后应由我作结论，但我每次都请董老来作，这使有一次参加会议的洋顾问李德感到奇怪。平时，我们还利用行军间隙请他们给学员上政治课，我几乎每次都去听。有这五位老同志的帮助，使我在政治思想和工作上受益匪浅，自己的政治理论水平也有较大的提高。长征中的行政管理和生活问题，是个大难题。首先，要吃饱饭就不容易做到，因为粮食要靠打土豪或向当地群众购买。每天快天黑才到宿营地，即埋锅做饭，吃掉带来的粮食，如不立即筹措，第二天就没吃的了，为了筹粮常常要付出很大的力气。菜有什么就吃什么，无法讲究。行政管理的问题，主要是防止减员，防止掉队。长途行军中，时常有人生病，我们组织了收容队，搀扶病员，或请老百姓用担架抬。全队只有我从8军团骑来的那匹老黄马，我经常让给病号骑，或干脆交给收容队使用。后经我多次向上级请求，才给肖队长配了一匹马。最使我担心的是董老等五位“政治教员”，他们年纪较大，又无马骑，每人都拿着一根自己做的手杖走路，平时行军走在中间，有情况时，随伙食担走，真怕他们出了事。而这五位老同志有顽强的革命意志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有时敌机轰炸过后，他们边拍拍身上的泥土，边开玩笑他说：“感谢马克思在天之灵！”惹得大家都笑起来。我看到他们吃力地拄着拐杖跋涉，心里感到很内疚。直到云南境内，我们才设法给董老和徐老配备马匹。他们很少骑，那两匹马不是驮病号，就是驮东西，甚至驮过走不动的马夫。有一天，部队在贵州行军时，因山路难走，大家走得很疲劳，拉的距离越来越长，中间接不上。队伍原来走大路，后来向右拐，上山走小路。前面的队伍留下了路标——将树枝拦在路旁，示意部队向右上山走。可是，这五位同志拄着棍边走边聊，没有注意拦路的树枝，仍顺着大路往前走。当我们到达宿营地时，发现少了他们五位，收容队也说没有见到。那时真急死人啦，如果被敌人抓去或发生意外，那还了得！肖队长和我急得满头是汗，马上向军委报告，周恩来副主席很着急，立即发电报指示各军团帮助寻找。但在白区，找到他们的可能性有多大，天

才知道！我们连饭也吃不下，急得没办法。直到半夜，接军委来电，说他们已走到红1军团那里，幸好路上没碰到敌人。我们听后，悬在心里的石头才放下来。第二天，1军团派人护送他们回来，在行军途中遇上他们，大家非常高兴，我们一方面向他们道歉，一方面向他们祝贺。他们却说：“应怪我们自己没注意看路标。”一场虚惊结束了，从此，我们更加注意关照、保护他们。由于队部和各科的领导团结一致及五位老同志的支持帮助，上干队后来的工作都很顺利，没有掉队或离队的，大家情绪一直很高。1935年2月下旬，红军主力为摆脱敌人，在二渡赤水后，再次占领了桐梓城和娄山关，敌军溃逃，1、3军团继续东进，向遵义方向追击敌人。接着，中革军委纵队也向遵义开进，唯有上级干部队奉命被留在桐梓城，其任务是担任警戒，等9军团来接防后再向遵义归队，这是长征以来上干队第一次离开干部团单独执行任务。而我队只有百多人，几十条枪，上级暂拨一个警卫连归我们指挥。桐梓是贵州较大的县城之一，人口上万，商业也比较繁华。我们守不过来，只好把警卫连放在城西，向西警戒；指挥科学员放在南边城外，向南警戒；东北方向接近娄山关天险，没有派部队警戒。队部还有政治工作科30多人，地方工作科除一部分学员去做群众工作外，尚有20人左右，其余就是伙食担子。我们迅速布置好岗哨，随时做好战斗准备。当晚，没有什么情况，至第二天下午，我们派出去的老百姓侦察报告说，似乎有敌军向县城开来。老百姓中也有些传闻，到底是真是假，很难说。下午4时左右，从北边和南边传来几声枪响，但没有接到哨兵的报告，我立即告诉肖队长，迅速把队伍集合起来。正在这时，红9军团军团长罗炳辉和政治委员蔡树藩率领军团直属队由南边开进县城。我和肖队长将敌情和我们的任务向他们作了介绍，他们听后说：“你们走吧，这里由我们来接防。”我看他们带入城的只有人数不多的直属队，便问：“你们的队伍呢？”罗炳辉同志回答说：“还有两个团在后边。”这样，我便和肖队长率上干队奔向娄山关。走前，派通信员去告警卫连，即刻撤向娄山关去。他们回答，营部原来交代，熬全营的猪油，正在熬，熬完即撤。大约走了半个小时，在快接近娄山关时，忽然，从桐梓方向传来了密集的枪声，我回头一看，见不远处罗炳辉等同志率9军团直属队气喘吁吁地向我们这里奔来，后边有敌人在紧追他们。罗军团长个子高，身体较胖，穿着一双布鞋，走路比较慢，两个警卫员搀扶着他。他的手枪队也在后边护卫抵抗。敌人越来越近，大声吆喊道：“抓活的！”我感到形势危急，立即同肖队长一起指挥学员占领阵地，阻击敌人，把罗炳辉和他带领的人员接过来。我对他说：“关口由我们把守，你先走吧！”当时，原在桐梓暂由我们指挥的那个警卫连已归还建制没有跟来。原来，罗炳辉和蔡树藩同志率军团直属队到达桐梓不久，其后面两个主力团已绕过娄山关直接向遵义方向开进，他也接到军委通知，要他立即撤离桐梓，赶到遵义。但他率直属队出发将接近娄山关的路上，碰到四川军阀刘湘的教导师从旁边插过来，咬住他们不放。若不是遇到我们，其处境是不堪设想的。敌人气势汹汹地向我们阵地发起攻击。我们利用有利地形，英勇地把敌人阻击在娄山关脚下。那时，原军团一级的队长，作为连长用了；原军师一级的科长，作为排长用了；原是团营一级的干部，作为列兵用了！有枪的学员拿起武器参加战斗；没有枪的学员便拿起棍棒和石头，迎击敌人。敌人见我们占据了有利地形，且时间已近黄昏，暂停了进攻。我便到地方工作科去，要冯达飞科长带队伍爬过山去找老百姓做担架抬伤员，并要求他们保护好五位老同志。在此同时，我

们又派通信员过山去找红9军团，请他们发电报给中革军委，于拂晓前派部队来接应。我又告诉司务长，带伙食担子过了山即埋锅做饭，煮好后送上山来。布置完毕，我即返到前沿阵地。夜色深沉，月淡星疏。我透过迷朦的月色，看到关口四周群峰陡峭，草深林密。山下是一条蜿蜒曲折盘旋而上约400米的山路，真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过去主力红军攻占娄山关是从西而来，而今，我们扼守这个关，是对付从西面而来的敌人。在敌我力量极悬殊的情况下，都作了最坏思想准备。由于双方都在准备战斗，四周万籁俱寂，除了远处不时传来几声狼嚎的声音外，就是冷嗖嗖的风声。入夜不久，敌人便向我们发动骚扰性的进攻，我们沉着应战，与敌人打一阵后，敌人便退回去。半夜时，饭送上来了，后又由地方工作科学员带来了几副担架，以备急用。我叫他们在路旁休息，看到几位老乡都是赤着脚，便问：“你们没有鞋穿吗？”他们回答说：“我们连苞米也吃不饱，哪有钱买鞋？”我又问：“赤脚走山路，碰到石头或踩着刺怎么受得了？”他们说：“走惯了，脚掌皮厚了，不要紧，就是碰出一点血，用草灰包扎起来，过几天就好了。”我听到这里，心里很难过。可惜我们当时每人只有一双旧草鞋，无力支援他们。后来，知道他们在寒冬时，把脚板放在火上烤，尔后涂上桐油再烤，再涂，反复几次，脚板厚了，就不怕刺了。我们吃饱饭后，都在自己的岗位上警惕地守卫着阵地。至天将拂晓时，敌人因摸不清我们的虚实，不敢再贸然攻关，已撤离山脚。这时，中革军委派5军团一个营来接防，并告诉我们，红军主力在遵义打了一个大胜仗，大家听了非常高兴，精神振奋。交接完后，我们向遵义前进。娄山关距遵义约45公里，我们于黄昏前赶到遵义城，归还中革军委建制。当晚，肖队长向周恩来副主席汇报娄山关阻敌情况，周副主席听后赞扬我们阻击得好，保卫了遵义，保卫了党中央，并给我们布置了新的战斗任务：准备占领仁怀县城和茅台镇，以保卫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并为主力三渡赤水做好准备。当时，红军主力部队正在鲁班场与敌周浑元作战，中革军委离北面的仁怀县只有15公里，而驻地除警卫部队外，再没有战斗部队了。仁怀县城有多少敌人，尚弄不清楚，如果敌人向我首脑机关袭击，那就麻烦了。因我队在桐梓与敌较量中，显示了战斗力，故中革军委将这一艰巨的任务交给我队，拨一个工兵连配属我们。我们接受任务后，立即进行战斗动员。我队过去很少直接出击敌人，这回可以试一试了，大家的战斗情绪都很高。过了几天，我军通信部门从敌人的电话里获悉：仁怀县城的守敌只有一个连，且是地方部队，战斗力不强，这是我们出击的好时机。当晚，我和肖队长，带领我队和工兵连悄悄直奔仁怀县城。天上没有月亮，山野一片漆黑。因为夜袭，我们不敢点火，也不能出声，走的是两座高山夹着的一条小路。路右侧的山下有深涧。一位老乡在前面给我们带路，我们在后面一个挨着一个摸索前进。有时脚碰着石头，有时脖子上被树枝或藤条挂住，有的同志不慎摔倒了，别的同志立即伸手把他拉上来。周士第科长脚上扎进一根很尖的刺，淌着血，脚一着地，钻心一样痛，他只能用脚尖一颠一拐走路，一直坚持到目的地。从驻地的小村到仁怀，约15公里路，部队摸黑赶路，竟整整走了一夜。天渐发亮时，队伍爬到离仁怀几里远的一个山顶上。肖队长下令跑步前进。他率尖刀班跑在前面，我率队伍紧紧跟上。到了城边，部队迅速散开，选择有利地形，迅猛向城内敌人发起攻击。一时，枪声大作，红军犹如从天而降的神兵，打得敌人惊慌失措，乱成一团，纷纷向北逃跑。他们是本地人，熟悉地形，逃出城便窜进丛林中，我们不再追，没费多大力气，

便占领了仁怀县城。过去土城战斗时，干部团伤亡很大，后有人向中央提议学员都是连排干部，太可惜了。中央表示，以后不轻易使用了。但是现在任务非常重要，连上干队也不得不用了。可见，长征中，我军付出了多大的代价！我们入城后，一边肃清残敌，一边向群众做宣传工作。当地群众深受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早已知道红军是他们的救星，纷纷出来欢迎我们。我们吃完早饭后，上干队学员和工兵连迅速赶往茅台镇，担负护桥任务。茅台镇是座落在山脚下的一个小村镇，对面也是山，中间有一泓清水河，河面约10多米宽，不可徒涉。河上原有简易木桥，人马多不易通过，我们在此基础上架设浮桥，让三渡赤水的红军主力方便通过。村子旁边有一家酒厂，这就是驰名中外的茅台酒厂。据说该酒是用麦子酿造的，有独到的制法，加上清泉水，故芳香甘甜，沁人心脾。为了保护酒家的利益，我们派人监护该厂，不许部队随便进入酒厂。在茅台护桥期间，我与肖队长和几位老同志去过酒厂。未入厂，一股酒香扑鼻而来，酒厂里有很大的酒池，还有一排排的酒桶。香喷喷的酒味弥漫厂区。管理人员打开酒桶，让我们每人品尝一小杯，真是一种莫大的享受。大家不约而同地赞叹说：“好酒！好酒！简直是玉液琼浆！”为了让广大指战员分享这一口福，我们买了一些酒带回去给大家喝。可以说，我们在茅台护桥三天，饱饮美酒三天。在这三天中，后方的主力源源不断地从工兵连架设的浮桥通过。而敌机每天都来投掷大量的炸弹，并向我守桥战士扫射。好在我们事先已有准备，在山边挖了防空洞和壕沟，故伤亡不大。另外，我军的高射机枪手英勇向敌机射击，敌机不敢轻易俯冲下来，投弹不准，故未能断我交通。

我们完成架桥和护桥任务后，奉命离开茅台镇归还干

部团序列，临走前，老乡送我们几瓶茅台酒，我们都当作宝贝放在马袋里，作为路上解乏之用。茅台饮酒，印象极深。1980年冬，写了《忆茅台》一诗：

桥上健儿猛进，军后强敌急追。
神速灵巧绕一回，歼我心机白费。
天空铁鸟下蛋（弹），地面尘土纷飞。
解除警报敬一杯，品尝茅台香味。
三日护桥惊险，晴天只盼夕晖。
和衣含笑三分醉，来日行军早睡。

飞渡天险

1935年2月中旬，红军主力在茅台及其附近三渡赤水后，再次入川南，摆出北渡长江的姿态，蒋介石急忙调整部署，企图将我军围歼在长江以南。可是，我们走了不远，又突然悄悄掉头东去，于3月21日夜起，由二郎滩到林滩渡过赤水，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四渡赤水。随后，红军迅速南下，再次渡过乌江，直插云南境内，声东击西，避实就虚，把尾追的敌人甩得远远的。同年4月，我被调在干部团担任政治处主任。我的职务由周桓同志接任，该团是由原中央苏区几个红军学校编成的。团长陈质，政治委员宋任穷，参谋长原是钟伟剑，我到时是毕士梯（朝鲜人）。下辖3个营。营长先后有韦国清、黄彦斌、李荣、林芳英；营政治教导员有罗贵波、黄欧东、丁秋生。全团共800多人，均是连排干部，装备好，每人有钢盔一顶，有战斗力。4月的云南，天气已相当闷热。在太阳照晒下，我们穿着单衣，扛着枪弹、包裹、粮食，急速地向金沙江畔奔去。很多人脸上汗珠儿刷刷地流下来，衣服湿透了，有的张着嘴，喘着气，遇到路旁有泉水，便捧上喝两口，又继续前进。当我们前进至云南彝民地区时，接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命令我干部团迅速夺取金沙江。从彝民地区到金沙江皎平渡口尚有140公里。抢渡金沙江，这是对整个北进战略方针的实现有着决定意义的任务。红1、3、5军团都要靠这一渡口渡河。因为其它上下游的渡口均已被敌人占领，敌人扼守对岸，且烧毁了渡船。皎平渡口尚未发现新的敌情。此时，我军后面有10万敌兵分三路向我们追逼，如果不尽快夺到这一渡口，则前无去路，后无退路，形势严峻。一天早上，由党中央书记张闻天同志在一个山坡上向全体官兵作动员，号召急行军，迅速夺取金沙江。接到这一命令后，谁都知道任务的重大和艰险。团部要求全团指战员以顽强的战斗意志，坚决勇敢地完成这一光荣任务。我们的部署是：以第3营（即政治营）第8连为前卫连（该连均是年轻的连政治指导员、副指导员、连党支部书记和青年干事所组成），该营部及两个连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刘伯承和团政治委员宋任穷率领，作为前卫营；其他两个营及团部直属队由陈赓、毕士梯和我率领；上级干部队随后跟进。5月2日晨，稀少的晨星还在闪烁，我们便整装出发。第8连是一群朝气蓬勃的优秀政工干部，精神抖擞地走在最前头。连日行军，已很疲劳，天又闷热，他们克服困难，当天就走了50公里。“明天还有90公里路，大家快些休息。”宿营时，该连连长督促大家赶快用热水洗脚和吃晚饭，争取时间休息。至半夜，当大家睡得正酣时，起床号把他们吹醒了，大家急忙起床、吃饭，又整装出发了。时间就是胜利，第8连不顾疲劳，以比昨天更快的速度在山路上疾走。大家互相鼓励着，催促着，送走了清冷的月亮，又迎来火辣辣的太阳，至夕阳西下时，听一位彝族老乡说，离渡口只有几十里了，大家听后松了一口气，因已走完了三分之二，再过几个小时便可按时到达渡口。天慢慢黑下来。高耸的山岭，在夜空里像炭块一般画着粗犷的弧线。我们加‘决脚步，急速地走着，当爬上一座高山顶时，向西望去，远处模模糊糊地有一条狭长的白带子，大家猜想那就是金沙江。果然，下山不多远，随着夜风，送来了深沉的“沙，沙！”的响声，打破了黑夜的沉寂，再细听，是浪涛声！同志们高兴他说：“到了，到了！”金沙江映入了前卫的眼帘。那滚滚的浪涛，汹涌澎湃，如万马奔腾般地向前涌去，真是“浩浩长江水，莽莽向东流”。它是长江的主要水源，从3000多米深的狭谷里奔泻而出，声势夺人，震人心魄。突然，迎

面来了几个人，有一个提着一只灯笼。“是敌人的巡查队吧？”8连的同志想捉活的了解情况，于是将1班的队伍散开埋伏准备出击，其余队伍隐蔽在路旁。前面的人走近了一看，原来是自己部队派在前头的便衣侦察员！侦察员告知了敌情和渡河点，该连便迅速而秘密地摸到渡口，正巧河边横着两只小船，大家非常高兴。渡河开始了，因船小，每次一船只能坐15人。第1排先出发，撑船的是我们预先准备的好手。小船划入300米宽的滔滔江水中，急流冲击着船体轰轰作响。小船在浪涛中一浮一沉，浪花打进船里，战士们的衣服被水花溅湿了，他们怕打湿枪支，便把枪紧紧抱在怀里。小船越过急流，渐渐靠近对岸。1排同志一上岸，走了几步，忽然发现几米远有一个黑影，那人见来势不对头，立即拔腿往回跑。一排战士便在后面紧追，黑影跑到一座房子门前，急敲门叫喊着：“快开门！快开门！”没等里面的人应声，红军已把那黑影抓住，原来是一个守岸的敌军哨兵。那房子驻扎的是敌人厘金局。里面听到敲门声，很不高兴地骂着：“见鬼了么？半夜还来敲门！”里面还传出“白板”、“三索”的叫声，看样子，敌人正在打麻将呢！同时，从门缝里飘出阿芙蓉的气味，触鼻生香。战士们开始敲门了，“快开门哟，先生！”“什么人？”房子里面一个粗哑声音厌烦地问。“过路的！”“夜晚不办公，明天再来！”“我们纳烟税后还要赶路！”一位战士大声地说。“纳烟税么，好！好！”里面听到“纳烟税”三字，好象猫闻到腥味，立即有一个出来开门。那人一开门，便被红军抓起来，随后该排战士冲进屋里，大声喝道：“我们是红军，快把枪交出来！”里面正在赌钱、抽大烟的敌人个个被吓得面如土色，全身筛起糠来，结果，不费一枪一弹，红军缴获了收税关卡的敌人枪械30多支，还没收敌人剥削来的税款5000光洋。这时，该连其他排战士也渡过了江。据俘虏日供：明天一早，便有一营敌人开到渡口扼守，并将破坏船只，断绝交通。他们已在附近一座半山上宿营，以为红军离此渡口尚有100公里，故尚未来这儿。前卫连听到此情况，感到形势危急：如果真的来了一营敌兵，破坏了船只，后面的主力部队便难渡过惊涛骇浪的金沙江。于是，该连由俘虏带路，即向半山上的敌人发动突然攻击。敌人在甜梦中惊醒，慌忙抵抗，遂被击退。该连在江滩上烧起一堆大火，向对岸发出胜利占领渡口的信号。那火焰在夜空里欢跃地抖动，江水也反射着一片抖动的红光。当晚，我们干部团的主力也陆续赶到江边，连夜渡过了河，在沙滩露宿。我们考虑到船小人多，渡船一次来返需半个多小时，按此速度计算，一天一夜只能渡1320人，那么，要渡整个方面军，非需一个月时间不可，这还了得！为解决渡船问题，立即派人分头到附近江边寻找，因船工听到敌人烧船的消息，已把船开到离渡口较远的地方。经深入宣传、访问附近群众，在群众帮助下，终于弄到了6只船。这些受苦受难的船工都很同情红军，表示要替红军撑船。我们也表示给予适当报酬。这又是一件成功之事。5月4日早上，一觉醒来，天已大亮。环顾四周，江面弥漫着乳白色的晨雾，浩渺无际。两岸万山重叠，高耸入云。峭壁悬崖，浪拍滔天。山坡上树木稀疏，杂草丛生。那齐天大圣的子子孙孙（猴子），在石崖上攀来跳去，动作敏捷，太阳出来了，照射在沙滩上，因沙滩确有金沙，闪闪发光，金沙江之名大概与此金沙有关。战士们来到江边，一边洗脸，一边抓弄着金沙，很是惬意。因河水清凉，大家都喝了几口，感到全身爽快。有的同志打趣地说，不是“饮马长江”，而是饮人金沙江！早饭后，突然无线电传来命令，要我们干部团即刻出发，占领离岸10多公里的一个重要据点——通安镇，消灭昼

夜兼程赶来渡口增援的川军刘元堂部的一个团敌人，以保证红军主力安全渡江。我们留下一个连维持渡河秩序，其余向北挺进。这是我们入川的第一天，走着曲折盘旋、崎岖险恶的山道，不禁想起了古人的诗句：“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走了一个多小时，我们爬近一个险要的山顶隘口时，前面传来了“砰！啪！”的枪声。原来敌人已先占领了隘口，这对我军威胁很大。前卫连立即拉开距离，一个接一个，不顾一切往前进击。大家知道，只有前进消灭敌人，才有生路，后退，便是死路一条。“哗啦！……哗啦！”敌人见我军拼命往上爬，除了火力封锁外，还滚下一块块大石头，这手好厉害！石头越滚越破，碎石乱飞，击中我们好几个同志，有的伤了脚，有的头部被击破，有的身上被击肿了，伤亡人员不断增加。前卫连感到难以应付。这时，团部陈赓、宋任穷、毕士梯和我来到阵地前指挥，研究了避石前进办法，政工人员也以身作则，到前边做宣传鼓动工作。敌人仍疯狂地往下扫射和滚石头，团部继续吹响冲锋号。前卫连在团部的指挥下，戴着钢盔，灵活跃进。当石头滚下时，他们闪向石壁，待石头滚下去后，又迅猛地向前跃进，待敌人发觉，滚下第二批石头时，我军已越过了一段危险区。这样，虽然多费了些时间，但伤亡减少了。该连的尖兵排跃进至隘口约100米的一个“死角”集结时，敌人的枪声更密了。这时，我们的机枪也愤怒开火了，后头的部队继续从左右两侧跃进。山崖里，“哒哒！”的机枪声和“哗啦！哗啦！”的滚石声交集在一起。敌人密集的子弹和石头，并未能阻止我军前进。冲锋号吹响了，英勇的红军勇士们，纷纷从“死角”处跃出，奋不顾身地向隘口进击。经过一阵猛烈激战，我军虽有较大伤亡，但终于占领了隘口。敌人向通安退去，我军乘胜紧跟追击，一直追到通安镇。通安是靠在山边的一个普通小镇。我前卫营到后，发起一阵猛攻，便突入街内，敌人向后山溃逃。我军缴获一些枪炮后，因兵力薄弱及敌情不明，又见右边山头敌人似有增兵的样子，故我前卫营主动退出街道，占领镇外山顶，以待主力到来。敌人见我军退出街道，又回占街道几个据点。不久，我团主力赶到，重整阵容，进行战斗动员和新的部署。这时，才知道敌人有两个团向我们反攻，情况甚为危急。占领通安后，宋任穷同志在后边布置中央机关过河工作，随即又上前线来，看到如此紧张的情况，焦急地说：“中央机关过河了，如敌人反攻，我军退却，中央危险，务必打退敌人！”于是，选敌人的制高点攻击。因为按一般的战斗原则，一个一个山头的打，已来不及了，天快黑了，不能拖下去。于是，各营开展冲锋比赛，在机关枪、迫击炮的掩护下，分两路向街道和右边山头阵地发起猛烈进攻。5月4日下午4时30分，“嘀哒嘀哒”的冲锋号吹响了，头戴钢盔、手执刺刀、腰缠手榴弹的红军英雄们，先向敌人阵地制高点猛扑过去，轻重机枪、迫击炮弹和手榴弹的爆炸声与红军战士的冲杀声汇在一起，一时山摇地动，震人心魄。敌人抵挡不住，开始溃退了。红军占领制高点后，左右开弓，紧紧追击，最后，插入敌群，展开肉搏战，只见刺刀闪来闪去，敌人血肉横飞，没有做刀下鬼的，便当了俘虏。战斗结束，天也黑了，我和陈赓团长、宋任穷政委赶往通安时，见一个黑影在移动，发现原来是一个国民党兵在山边放哨，我们即把他的枪缴了。原来，国民党军溃退了，他还不知道呢！但他听到我们的脚步声，不喊口令，也不开枪，真是木鸡似的。通安战斗的胜利，掩护、保障了党中央、毛主席和整个中央红军北渡金沙江天险的安全。第1、第3军团也折回来，从此渡口渡江，至5月9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了金沙江。后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通报嘉奖了我

们干部团。从此，干部团的威名不仅在红军内传开，而且震惊了敌人，特别是川军，他们看到戴钢盔的干部团，便望风而逃。后来，毛主席在一次对部队讲话时，开玩笑说：“以后若遇到四川军队，每个人都把煮饭的黑脸盆顶在头上，去吓他们！”人们以为威声赫赫的干部团，一定有很强兵力，其实，抢渡金沙江时的先头部队，仅有80多人，参加通安战斗的也不过是700多人。有人称干部团是“御林军”，意思是说，我团担负着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任务。其实，我们在这一方面做的工作还不多。当时，中央之所以使用干部

团抢渡金沙江，主要原因是，1、3军团在左右侧，中央周围没有红军主力，只有干部团在附近，后面有5军团，而入数不多，正抵御敌人的追击，故这一任务落在了我团身上。干部团在通安镇驻守两天后，体力稍恢复，便奉命向会理县城前进，以配合红3军团攻击该县城。城内驻有川军刘元堂一个师的兵力，加上城墙又高又坚固，我军攻了几天，没有攻下，在城墙根下埋炸药进行爆破，也没有奏效。这时，党中央清醒地意识到：红军渡过金沙江，虽然暂时摆脱敌军无休止的尾追、堵击，但现在渡过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雅砻江以东的这块狭小地区内，处境仍很危险，因此决定放弃进攻会理，立即北上，向大渡河急进。从会理到大渡河约1000公里，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通过冕宁经大凉山彝族自治区到达安顺场渡口；一条是经过越西到大树堡渡口。前一条路是小路，比较难走，但敌人兵力较少些；后一条路是通成都的大道，比较好走，敌人估计我军要走这条路，派川军杨森部正向那里急进，兵力较雄厚，中革军委决定以大树堡方向作为佯攻，主力走安顺场这条路。“金沙江的流水哗哗响，常胜的红军胜利地渡过江，蒋介石吓得大惊慌，帝国主义弄得没主张”。我团战士们唱着渡金沙江歌，沿着崎岖的山路日夜急进。有时走下深沟峡谷，仰首上看，天变得又窄又长；有时攀上山顶，头部又像顶住了天。沿途几乎没遇到敌人的抵抗。尤其是从冕宁进入彝族自治区时，由于先头部队做了许多群众工作，不仅没有遇到什么麻烦，而且出现群众拥军、参军的热烈情景。听说先遣部队司令员刘伯承亲自与彝族兄弟敌血为盟，取得了彝族人民的信任和支持，为我军顺利前进开辟了道路，一时传为佳话。我们顺利通过彝族自治区的大凉山、小凉山后，敌人的飞机经常在我们行军路上撒传单。有的传单上猖狂地叫嚣：大渡河是当年石达开全军覆没的地方，现在共军后面有周浑元、薛岳、吴伟奇数十万大军追赶，前面有川军刘湘、刘文辉的“精悍部队”扼守大渡河所有渡口，共军有翅也难飞过，必将成为“石达开第二”。红军会不会成为第二个石达开？这个问题引起了战士们的关注，大家边行军，边议论起来。当年，广西贵县籍的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与洪秀全分裂后，曾率三四万人从南京出走，转战几省到四川时，也是从这条小路往大渡河渡口安顺场，因后有追兵，前有大渡河阻隔，加上与彝族关系不好，缺吃缺穿，人马饥苦，最后在河边全军覆没，饮恨千载！而我们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有崇高的革命理想，顽强的战斗精神，严明的群众纪律和正确的民族政策，故在红军面前，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没有突不破的天险。许多指战员在议论中都这样说：“湘江、乌江、金沙江都冲过来了，大渡河再险也要冲过去！红军不是石达开，历史的悲剧不会再重演！”山径越来越窄，两侧是高山，密林，奇峰，怪石。山坡上开满了红的、白的、紫的杜鹃花，五彩缤纷，还有叮叮当当的流泉，景色迷人。可是，大家却无

心观赏，心里考虑的是要赶在蒋介石的前面到达安顺场，渡过大渡河。时而骄阳当空，时而大雨倾盆。大家身上的汗水接雨水，雨水接汗水，衣服和帽子几乎没有干过。有时身上湿透的衣服被夜风一吹，冷得直打哆嗦。我们忍着长途行军的疲劳，经过十几天的连续行军，于5月中下旬到达安顺场附近的马鞍山、营盘山一带。山坡上荒坟垒垒，据说这是当年埋葬太平军的坟墓。史书载“浮尸蔽流而下者以万余计”，写的就是当年太平军发生在这附近大渡河上的惨况。我们翻过一座大山，刚走下山坡时，就听见一阵“轰隆隆轰隆隆”的响声，时高时低，显得沉重激越，像是远处的风暴正在袭过来似的，那就是横在我们面前的与红军生死攸关的大渡河。我们站在山腰上向前望去，透过迷迷蒙蒙的暮色，看到了山脚下星星点点的灯光，那就是渡口安顺场。安顺场是一个有近百户人家的村子，原有两个连敌人防守，对岸有一个团敌人驻防。他们听到红军要来，把所有船只抢走、毁坏，只留下一只小木船供他们来往使用。我团作为后梯队到达该村时，先头部队红1军团杨得志率领的17团，已占领了该村，并挑选了17位勇士，在强大火力掩护下，乘着这只小木船，冲过一个个巨浪，避过一阵阵弹雨，强攻对岸滩头阵地，把号称“双枪将”的川军杀得溃不成军，为我军后续部队的抢渡杀开了一条血路。大渡河虽不宽，但水流湍急，漩涡翻滚。有的漩涡，大如车轮，其势如龙卷风，翻滚而下，令人望而生畏。部队先后只弄到3条船，又不可能架桥，要把全军渡过去可不是容易的事。我们渡金沙江时是6只比较大的木船，还渡了6天7夜，若照这个样子不知要多少时日。此时，敌薛岳和周浑元部已渡过金沙江衔尾追来。为了尽快使红军摆脱险境，避免石达开的命运，中央当机立断，决定兵分两路，飞夺大渡河：一路是我们干部团随红1师继续从安顺场渡河，仍由刘伯承、聂荣臻同志指挥；一路是红2师、1军团团部和5军团溯河北上，从泸定桥过河，由林彪指挥。渡河时，每条船运载40人。因水流太急，船工总得先把船往上拉到周家碾房，从那里斜渡过去，才能开到对岸渡口。到了对岸，还得往上拉半里水路，才能开到上岸的渡口，每次往返需个把钟头时间。我渡过不少浩瀚的江河，但尚未见过如此气势磅礴、险恶的大渡河。我们乘坐的小船，在惊涛骇浪中浮浮沉沉，一时被抛向浪峰之巅，一时又被推下波峰谷底，大家身上都湿透了。有一条运载我团供给物品和牲口的船，不知是遇到大漩涡还是浪大使小船失去平衡，牲口受惊，乱蹦乱跳，使船翻了过去，船上的人、牲口、物资全部坠入急流中，水性好的船夫也无例外，都牺牲了。我团过河后，即沿河北岸，上溯而行，支援第二路的兄弟部队飞夺泸定桥。至月底，红军终于征服了狂傲不羁的大渡河天险，打破了蒋介石要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梦想。1982年，我写了《安顺场有感》一诗：

阅墙一怒率孤兵，蜿蜒西南赴远征。
水浪天翻伤劲旅，汗泪横流吊群英！
时势变，举新旌，红军飞渡波涛惊！
倮罗支援掀谷浪，敌人溃退似巢倾！

战友情深

红军渡过大渡河后，乘胜向西北方向急进，先后占领了北龙坪、天全、芦山、宝兴等地，6月下旬，我团掩护中央机关，跟随主力来到了高耸入云的大雪山——夹金山脚下荒凉的大碓碓村。这里，天气冷嗖嗖的，好象太阳失去了热量，盛夏来临，老百姓还穿着皮背心。夹金山，位于四川宝光县的西北部，懋功（今小金）的南部，高达4316米，为邛崃山系著名的高山。山上终年积雪不化，雪连天，天连雪，只有夏天才能通过，并且要在气候好的每天上午10时至下午2时通过。故当地群众流传说：要过夹金山，性命交给天。有人还称夹金山为神仙山。很多善良的老百姓，都为我们走这一险道而捏把汗。当晚，我们在这个荒凉的半山上露营，做好爬雪山的思想准备和物资准备工作。因这是我们长征以来要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而广大指战员，多数来自气候炎热的南方亚热带地区，缺乏爬雪山的常识和经验。因此，各营都分组进行动员活动，把爬雪山将要遇到的困难和当地群众提供的经验向战士们作了介绍，要求大家互相帮助，互相鼓励，战胜困难，胜利越过夹金山。说是做好充分准备，在当时物质条件极差的情况下，实在很难做到“充分”。当地居民少，而且很穷，无法买到御寒的烈酒和辣椒，更难找到冬天的衣服、鞋子。这个村子能给我们最大的帮助，是给予每个人提供一根拐棍，以借力爬山。这时，我们的衣服都很单薄，我脚穿的一双胶水鞋，还是在贵州打土豪时分给我的，已穿了4个多月，鞋底很滑，鞋头也破了，身上又没有备用鞋。别人提醒我说：“明天你穿水鞋怎能爬雪山？”对此，我是知道的，但有什么办法呢？只好用绳子把水鞋捆在脚上，免得松脱下来。次日拂晓，队伍浩浩荡荡地沿着蜿蜒小路向夹金山麓进发。我们干部团被安排走在中革军委纵队前头，担负着保护中央机关的任务。到了山麓，气温骤降，拐棍着地，碰着冻得邦硬的路面，发出“咯咯”的响声。爬山时越往上爬，天气越寒冷，空气越稀薄，呼吸也越困难。到了山腰，开始进入冰雪世界，雪花飞舞，狂风呼啸，周围一片混沌，路越来越滑了。路左边是深厚松软的雪涯，右边是陡立险峻的雪壁，若不小心滑下雪涯，就很难爬上来了。我穿着水鞋，脚下很滑，东倒西歪地一步一步往上爬。水鞋磨烂了，爬山更费劲，有时上一步，退两步，常常滑倒。同志们把我拉起来又继续往前走。有些体弱的同志，在战友搀扶下，走起路来还是左右摇晃，尤其是严寒和空气稀薄对他们的威胁更大，有的被冻得浑身发抖，嘴唇发白，倒下牺牲了。有的喘不过气来长眠在雪山上。我们一步一喘，好不容易爬到了山顶，放眼四顾，白雪皑皑，银峰环立，一片琼玉世界！在阳光照耀下，白雪亮得耀眼，刺得眼睛隐隐发痛。俯视山下的后续队伍，像一条银灰色的长龙，蜿蜒而上，把一望无际的银装世界分成两半。山顶上，气候变幻无常。刚才还是阳光高照，一时又狂风骤起，风雪交加，冰雹劈头盖脑地迎面打过来，过了一阵，风势减弱，冰雹停歇，太阳又露出脸来。我们觉得太阳好象是冰雪做成的，没有一点暖气，把所有能披的衣物都披在身上，但都无济于事。由于山顶空气更加稀薄，我感到胸口很闷，好象心头压着一块大石头，憋得难受，脚也发酸无力。大家互相催促：“快走，千万不能停下！”下山时，我以为会好走一些了，谁知穿着这双水鞋，成了累赘，滑得更厉害。看着同志们往下奔跑，而我跌跌爬爬，渐渐落在队伍后面。我想，自己还担负着全团政治工作的责任，需要走得快些，以便了解部队情况，做些宣传鼓动工作。于是我干脆丢掉了这双穿烂的水鞋，打着赤脚在雪地中行军。我原想咬咬牙，跑上一阵，

身体发热，就不会有什么问题，可当我赤脚踩在雪地上时，一股刺骨的寒气从脚底向上窜，霎时全身冻得直打哆嗦，牙齿不停地打颤。我立即踩在一块石头上，想休息一下，喘一口气。可冻石更冷，全身很快发麻冻僵，走不动了。后面的同志要搀扶我走，我说：“我不行了，你们别管我了！”这时，团政治处青年干事严长庆跑了过来，从背包里抽出一双自己备用的新草鞋送给我：“莫主任，快穿上吧！”在那关键时刻，一双草鞋，如同救人一命。我怀着感激的心情，穿上了战友这双新草鞋赶路，身上增添了力量，也慢慢赶上了队伍。这样，我们干部团终于在当日中午12时前胜利越过了夹金山。严长庆后来被派去苏联学航空，1945年回国在哈尔滨被苏军摩托车撞死了。我一直都很怀念他，若没有他的那双草鞋，我可能下不来雪山了。雪山茫茫，荒野苍苍。我们翻越人迹罕至的大雪山—夹金山后，于6月中旬随先头部队到达懋功东南的达维，见到了日夜盼望的另一支红军主力——红四方面军的同志。他们在此迎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大家想不到两支红军主力在此会合，激动得热泪盈眶，大家紧紧握手，欢喜若狂。当晚，在村里晒场上举行联欢晚会，我们干部团也到会参加，大家尽情欢唱，欢呼声震撼山谷，熊熊篝火映红了天空。后来，我们沿着小金川河谷来到懋功以北的两河口时，又在那里举行红一、四方面军庆祝大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张国焘等都出席了大会。毛泽东同志在会上发表演说，号召两支红军主力会合后，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为消灭国民党反动派，赶走日本帝国主义而共同战斗。但是，张国焘却主张向青海、新疆或西康等偏远地区退却，他说列宁主张落后地区可建立革命根据地。博古听后，找来斯大林写的《列宁主义问题》反驳说：“如果落后地区可建立根据地，那是什么根据地，是雪山草地根据地，是游牧苏维埃！”后来我翻看了《列宁主义问题》一书，张国焘把列宁说的“比较落后地区”的“比较”两字删去了。在两河口休息几天，中央红军主力又继续北上，于6月底，翻过了长征路上的第二座大雪山——海拔4100米的梦别山。它比夹金山低一点，也不像夹金山那样陡峭，由于我们有了第一次爬雪山的经验，事先做好各种准备，虽遇到不少险情，但大家心里都感到轻松一些。到了山顶，雾霾弥天，时浓时淡，人行其中，宛如腾云驾雾。下山时路边青松翠柏，清泉流溪，并有一群群非马非牛的长牦牛在戏逐，这是我们在雪地里第一次见到动物，大家都感到新奇。到了山下，每人都喝了几口泉水，精神为之一爽。走了几天，到了卓克基，该村有一座庞大宏伟的喇嘛庙，是藏族土司头头卓冠英的宅邸。他与国民党勾结，曾指使藏兵阻止红军先头部队入境，后率藏兵逃走，留下印有中文、藏文、英文的名片。该庙是7层高的一座城堡式建筑，上面有箭垛和枪眼，每层都有相通的雕花走廊。里面装饰很华美，木柱漆有红、黑、绿三种颜色。墙上挂有壁毯和藏文条幅。所用器皿，多是铜制的。家具饰有木雕。靠椅铺有缎面。窗户镶嵌着玻璃，闪闪发光。整个庙可容纳几千人。我们谁也没有想到，在这样人烟稀少、荒凉落后的地方，竟有这样富丽堂皇的建筑，都为之惊愕不已。部队在卓克基短期休整，以筹集给养和向藏胞做宣传解释工作。由于当地藏胞很少，有的听了国民党的反动宣传，都逃到外地去了。后经我们的宣传解释，他们看到红军纪律严明，才陆续回来了。藏胞家里很贫困，很难筹集到粮食。饥饿，成为当时红军最大的威胁。在休整期间，我到喇嘛庙看望罗荣桓同志。他已调到红军总政治部担任巡视员，与中央机关一起，住在喇嘛庙里。在谈话中，我了

解到总部机关生活比战斗部队更加艰苦，首长也常常忍饥挨饿，吃不饱肚子。我回想起在长征出发不久，罗荣桓主任分到一只鸡，他舍不得自己吃，请我和其他几位同志一起吃。现在我能帮他什么呢？我想起自己还有准备行军时用的烧饼，便说：“我住处尚有15个烧饼，送给你吧！”罗荣桓同志客气地谢绝：“还是你留下用吧，你在战斗部队，是饿不得的。”我恳切地说：“明天一定派人送来，我再另想办法。”他看我态度这么坚决，只得笑着说：“好吧，我明天去看你，在你那里吃午饭。”他又问我住的地方，我用手一指说：“就住在对面的半山腰上的一间小屋里，看起来很近，走起来也有十几里，还是我派人送来吧！”他坚持要去看我，我也只好答应了。次日中午，罗荣桓同志和总政治部的王盛荣同志一起来我处赴“宴”了，我们喝着冰凉的泉水，痛快地吃起烧饼。饼虽没油没盐，可都觉得好吃，不一会儿，15个烧饼吃得只剩3个。我把剩下的3个包起来给罗主任带走。他不同意，笑着说：“你不坚壁清野已很好了，又何必一扫而光呢！”驻了几天，我们每人只带一点干粮离开卓克基，经仓德来到打鼓山。这是长征路上第四座大雪山。山腰的空气逐渐稀薄，寒风砭骨，乌云密布，积雪齐腰，冰块闪着寒光。真所谓“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因给养困难，大家越来越瘦，满脸蜡黄，走路腿发软，故爬山越来越感到吃力。听说爬过这座打鼓山，便是打鼓镇，那里麦子快要熟了，有很多粮食，可以解决吃饭问题，因此，大家鼓起劲来，拼命地往上爬。越爬，空气越稀薄，风雪更大，心跳越来越厉害，简直要从喉咙里冒出来似的。有几位体弱的同志头昏得厉害，连站在其面前的人也分辨不清，腿一软，便不知不觉地倒下去。同志们赶忙把他们搀扶起来，有的同志把身上舍不得吃的干粮递过去，让他们轮着咬，费了好大劲，才帮助这些体弱的同志爬过山。走到打鼓镇附近时，看到满坡绿绿的麦子，随风吹动，如河中碧浪荡漾，很美观。到了镇里，问先到达的兄弟部队，他们说筹粮困难得很，群众家里已没有麦子，山坡上的麦子还不能收割，他们只能观麦而炊。战士们听到此情况，大失所望，本来，我们一粒麦子没有带来，期望着到打鼓镇吃一餐饱饭，谁知道情况又是如此。一到宿营地，各营、连都到团部请示：“今晚吃什么呢？麦子已没有了！”此时已是下午3点，如何解决晚餐问题？陈赓、宋任穷、毕士悌及我进行商量，决定吃一餐老豌豆根拌野芹菜。于是，各营、连都派人到附近菜地和山边采摘。我布置完工作便上床休息，想豌豆苗还是好吃的，两广叫做龙须菜，酒馆上一碟还要几毛钱。因过于疲劳和饥饿，一闭眼便睡着了。“开饭啦！”我听到喊声，立即起床，问勤务员：“饭在哪里？”他指着桌上说，“放在这里。”我一看，是一碗老豆根、野芹菜，我思想早已有所准备。大家看着这美其名的“饭”，直皱眉头。我自己便首先拿起碗来，夹了一箸送进口中。“饭”里既没油。又没有盐，清汤寡水，一股麻涩腥味，的确很难咽下去。大家也跟着吃了一顿清水豌豆根。次日，粮食问题仍未解决，吃的还是老豆根、野芹菜，虽然很难吃，但因肚里饿得厉害，还是硬吃下去。大家装一肚野菜“饭”上路了。从打鼓到沙锅，约45公里路。途中，在雪山腰休息时，我和陈赓、宋任穷、毕士悌、肖劲光、陈明、郭化若、冯雪峰、李一氓、罗贵波同志坐在一起，尽情欣赏在阳光照耀下反射着万道银光的雪景。这时，肖劲光同志提议说：“大自然恩赐给我们这么多冰淇淋，大家痛吃一顿吧！”大家表示赞成，便解下漱口盅，各自从雪堆里挖出一缸子最洁白的雪。接着，有人说：“这些白雪，若拌糖，准好吃，谁带有糖精，请拿出来‘共产’吧！”肖劲光、毕

士梯、郭化若身上存有少量糖精，分给了每人一点。大家高兴地品尝起来，有的说：“我这杯冰淇淋比世界上最好的冰淇淋还要高级！”在艰苦环境中，红军战士亦不忘苦中作乐。7月中旬，我们在饥寒难挨中来到毛儿盖附近的沙锅，这是一座偏僻的山村，村里也建有喇嘛庙。因村子小，很多战士只能在村边、树下露宿。这时，山谷里的麦子已经成熟，一片金黄，为了红军的生存，总政治部做了统一而严格的规定，要通过调查，首先割当地土司头人的麦子，只有在其他办法得不到粮食的情况下，才能收割群众的麦子，而在这样做时，必须将所割麦子的原因、数量，用墨笔写在木板上，插在田中，告知群众回来以此木牌向红军领取款项。这样，战士们受辘辘饥肠熬煎的情况才有所改变。在极端困苦的日子里，军委机关也苦得很。一次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和军委一局局长张云逸同志患病，军委机关的同志曾告诉我们：若弄到肉或油送来一点给生病的首长补补身子。我把这事一直记在心中，可一连几天也没有弄到。有一天，部队供给处给我分来了四两腊肉，我便让勤务员小刘把肉切成两份，给周副主席和张局长送去。这件事，张云逸同志一直记在心里。解放初，我在北京见到张老时，他便提到长征中我送腊肉的事，他说，那二两腊肉，比现在请我吃烤鸭还好啊！一双草鞋，二两腊肉，十五个烤饼，两片干姜，这发生在长征路上的几件小事，让我终生难忘，因为它饱含了红军战士深厚的阶级感情和革命队伍里真挚的战友情谊。

不平静的红军大学

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县会合后，人们希望两支主力汇成一条巨流，共同北上抗日，但事情却没有如此简单。时任四方面军政委的张国焘，由于权欲熏心，反对中央的北上抗日方针，主张红军向荒僻的川西地区退却，诬蔑中央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企图篡夺党中央的领导权。党中央和毛主席对张国焘的严重错误进行了耐心的教育与帮助，但张国焘仍执迷不悟，到了毛儿盖，其斗争日趋白热化。张国焘拉拢其亲信，公开进行了反党和分裂红军的活动。这种斗争，也反映到在毛儿盖新成立的中国工农红军大学。该大学是由红一方面军的干部团和红四方面军的彭杨军事学校合并而成的。校长、政治委员分别由红四方面军的倪志亮、何畏担任，均未到职。政治部主任由红一方面军的刘少奇同志担任，也未到职。教育长为红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担任，已到职主持全校工作。我为校党总支书记，主持政治部工作。学校实际工作由李特和我负责。学校驻扎在毛儿盖西边的卡英村，离毛儿盖5公里左右。有一天，我到李特住的小楼上。他冲着我说：“你们红一方面军干部团很散漫，衣服不整，精神不振，思想右倾。”我听了很吃惊，感到他说话气味不对头，便向他解释说：“一方面军干部团在艰苦环境下转战了七八个月，饱尝人间的艰难困苦，战胜了敌人，征服险恶，保卫了党中央和毛主席，才能到达此地。因沿途得不到补充，故衣冠不整，破烂不堪，不少人受饥寒折磨，身体瘦弱，但大家的精神状态是好的，忠诚革命，战斗力也是强的，怎能以衣着论人、说他们右倾呢？”李特听到这里立即火冒三丈，发起怒来。这时正好原独立师政治委员张平凯从窗下走过。他左手提着一只羊头壳，右手拿着一土罐子，衣衫褴褛。李特便指着他说：“你看，这像个什么样子？整天找吃的，其艰苦性在哪里？这不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吗？”我又反驳说：“这是休养连的一位病员。他是师级干部，有病还坚持跟着部队行军，其革命意志是坚定的，在条件允许情况下，增加一点营养也是无可非议的，怎么能随便说他缺乏艰苦性，是右倾呢？”谈话无法继续下去。我回来仔细想，李特诬蔑干部团右倾，其用意是借此来暗指中央右倾罢了。如果自己跟随他承认干部团右倾，那他便可抓住这一点来攻击中央，因干部团是中央直接领导下的、曾受到中央领导同志赞誉的部队。我把这次争论的事情向有关同志谈了，他们听后也很气愤，说我反驳得好。李特知道红军大学的底子干部团，故不敢发动群众同我斗，但他对我仍抱着幻想。次日，李特约我去谈话，我答应了。当我走进他的小楼时，看到桌子上摆有一盆苞米糊糊。我坐下后，他热情地请我吃苞米糊。我不客气，吃了一大碗。当时，在生活极端艰苦的情况下，能吃到苞米糊糊，是很不容易的。我吃过后，李特笑嘻嘻地说：“我们昨天谈的事，你想得怎么样？干部团确是存在右倾机会主义，承认它好转变！”我认真回答说：“干部团确没有这回事，叫我怎么承认呢？”他转了一个弯，问我：“你读过书吗？”我说：“进中学读了一年半。”这时他严肃地说：“你读过中学，算是知识分子了，难怪不容易承认自己的错误。”我听“知识分子”一词，吓了一跳。因那时张国焘很歧视知识分子，若被戴上“知识分子”的帽子那是很危险的！张国焘曾伪造列宁的话，说要两个工农分子监视一个知识分子，就是企图对知识分子进行陷害。幸好，我知道李特是从苏联学习回来的，是军政大学的学生，因此，我毫不示弱，便讥讽地回答说：“我哪能谈得上是知识分子呀！如果中学生算个知识分子，那只能是小小的知识分子，与教育长同志相比，你不就是大大

的知识分子啊？如果说，不承认错误是知识分子的特点，那么，造谣生非就是大知识分子的特点喽！”他听了我的反驳后，脸一沉，手一捏。我原以为他又要发火了，但出乎我意料之外，他却笑眯眯地问我：“你过去是干什么工作的？”我把自己的经历简单地说了下，他听后不怀好意地说：“像你这样的干部，在四方面军里当军级干部也是可以的了。”我知道他是在耍花招，就冷冷地回答说：“像我这样的干部，在红一方面军里多得很，我算不了什么！”谈了半个多钟头，话不投机，我便告辞了。临别时，他狠狠地说了一句：“这两天谈的问题，我劝你还是慎重考虑为好，布尔什维克党是不允许搞机会主义的！”我认为这不是一般闲谈的问题，它不仅关系到干部团的声誉，而且关系到党中央的问题。李特对干部团的诬蔑，是与张国焘称中央红军为“叫花子队伍”的说法同出一辙的，是别有用心，必须继续同他作斗争，并及时向党中央反映情况。于是，我先去找原干部团政委宋任穷同志商量，他已调任特科团政治委员，也住在卡英村。他听我反映的问题后，很赞同我的意见，遂相约第二天一起去毛儿盖向中央反映。第二天早上，宋任穷同志忽然生病肚子痛，不能同我前往，我便带身边的两位同志去毛儿盖。我先到上级干部队去访问肖劲光和冯雪峰等同志，他们都表示支持。冯雪峰同志还向我分析了张国焘反党右倾机会主义实质，从理论上、路线政策上提高了我的认识，并提醒我说，和李特他们斗争，要抓住主要矛盾，抓住他们反中央、搞宗派主义、搞分裂红军这个根本问题，不要同他纠缠小事，这样才能帮助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分清是非，这给我的启发很大。接着，我又去访问博古同志和李富春同志。这时博古同志代理总政治部主任，李富春同志为总政治部副主任。他们都拥护中央的北上抗日主张。我把与李特争论的情况向他们作了汇报，并请他们转报中央和毛主席。他们听后非常气愤地说：“对李特这种错误观点和气焰，必须继续与他斗争，决不能让步！”当天，他们便把我汇报的情况报告了毛主席。我返回时，因天色已晚，回卡英要经过一段密林，他们担心我路上出事，便留我在毛儿盖住了一夜。次日晨，李富春同志来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可以继续和李特斗争，但要注意策略。目前，因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还没有完全认清张国焘的错误，所以，还不宜发动群众斗争李特。我听后深感毛主席的深谋远虑和宽大的胸怀，表示回去照毛主席的指示办。离毛儿盖回卡英时，在村边，陈赓同志在路口等我，我简单地向他传达毛主席的指示。他也表示支持我按毛主席的指示继续与李特斗争。这时，李特可能觉察到我已向中央汇报了此事，不再和我谈这个问题了。我也不理他，见面时，大家只讲一些具体业务工作。我利用工作空隙时间，向政治部的同志讲中央关于北上抗日的主张，并组织力量，以备不测。后来我发现，当部队转移时，李特总是派几个警卫员跟着我，监视我。不久，来了政治委员何畏，他是广东工人，参加过广州暴动，原是红7军的连长，后任营长，和我认识。他到江西时，离开部队去上海，后中央分配他到四方面军工作，任军长，他调任红大政治委员时，我即把李特诬蔑干部团的事告诉他，建议他处理。他没吭声，又说，过去的事（指他在红7军脱队去上海的事）不再谈了，怕我揭他的底。在卡英驻了一个月，队伍准备向北面的草地开进，拟经松潘向甘南发展，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大家根据上级指示，每人准备5天的干粮和木柴，也准备了草鞋、包脚布和木棍，但过了两天，又传说不过草地了，大家思想紧张起来，议论纷纷。有一天，李春富同志经过原干部团驻地去找3军团找彭德怀同志。我们知道他会很快回来，我和陈赓、宋任穷

等几位同志便在路口等他。等了一阵，李富春同志回来了，我们问他是否过草地，他没有明确答复。我们激动地对他说：“若队伍南下向西走，我们只好开小差，途中可能被敌人杀死，那么请你证明一下，我们并不是叛变革命！”他安慰、鼓励我们几句，并要我们继续做好北上准备，便走了。8月下旬，中央红军终于向纵横数百里的草地挺进。草地，是一片绿草如茵、茫茫无边的神秘地带。有人称它是用鲜花编织而成的“魔毯”。因那里有一眼望不到边的茂草，有色彩绚丽多姿的野花，但是，草底下却是一片片终年不干的积水，河沟交错，泥潭深不可测。淤水呈黑色或赭红色，像生了一层红锈一样，散发着腐臭气味。我们踩着软绵绵的草丛，摇摇晃晃，就像航行在水天相连的大海一样。一不小心陷入深潭，几分钟便可以把你吞没。草地天气变幻无常，时晴时雨，时雪时雹，狂风轮番袭来，如同妖魔变法似的。红旗在茫茫的草地中猎猎飘扬。开始，大家看到这些五彩缤纷的水草、野花，觉得新奇，边走边哼着山歌，行军速度较快。但过了几天，一路上不见人烟房舍，不见牛羊动物，连天空的飞鸟也绝迹，根本找不到块栖息之地。有些同志带来的干粮已吃完，而周围根本找不到吃的东西，能吃的一些野草，前面走过的部队已采摘完，留下的大都是有毒的草，吃后四肢抽搐，口吐白沫，危及生命。草下的积水也不能随便吃，人和马饮后要胀肚子，或患痢疾病。加上天寒雨淋，身边的同志不断饿倒、病倒、牺牲，队伍不像先前那样整齐，掉队的人愈来愈多，大家感到要征服这块神秘地带，并不比爬雪山轻松。原广西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上级干部队学员雷经天同志，是以一个士兵的身份参加长征的。他在将近走完草地时，不小心跌下一水沟，幸有同志把他拉起来，但衣服湿透，嘴唇发白，脸色铁青，全身发抖，坐在一旁，无法继续前进。恰好我经过此地，问其究竟，见他这个样子，危险至极，好在我身上还带几片干姜，我立即拿两片给他口含和擦身，并从马袋里拿出一套旧单衣给他换上。不一会，他嘴唇变红，也不发抖了，再休息一会，便能拄着拐棍继续前进。1956年，他到北京来我家里作客，一进门便对大儿子安来说：“过草地时，是你爸给我两片干姜，救我一条命！”原红7军干部、干部休养连队员李爱民同志，1927年曾与我一起在南宁坐过牢。他在干部团当过政治教员，在金沙江时曾和部队一起打冲锋。过草地前的一天上午，他拄着拐棍，来政治处找我，说他几个月来疾病缠身，缺医缺药，身体一天天垮下去，过草地无法自己背行李和柴米，请求我帮他找匹马。我听后，看他形容枯槁，既感同情，也感到为难，便安慰他几句说：“你先回去，我尽量想办法，请你下午再来看看。”他走后，我立即找有关人员商量，总算设法调剂了一匹马给他。当他接到马时，激动得流下眼泪。我说，没有马夫，他说：“得了，不要了。”说完他便拉着马走了。开始过草地时，他有时骑着马走，有时牵马而行，因草地既软又有泥潭，马走得吃力，时常跌下沟里要人用力拉上来。后因天空经常下毛毛细雨，马整天吃湿草，拉稀了，他既要照顾自己，又要照顾马，弄得更加疲惫不堪。最后，马卧下走不动了，他只得舍弃了马，拄着拐棍，一步步挪动，以坚强的毅力，终于走出了草地。但由于体弱有病，劳累过度，过草地第二天，便病逝于巴西。我得知后，便去悼念并协同休养连同志把他安葬了。

草地上的艰难困苦，夺走了不少战友的宝贵生命。我们生存下来的同志个个蓬发垢面，衣衫褴褛。过了草地后，在巴西一带，红一、四方面军关于北上抗日还是向西发展的问题仍在继续争论，并已传遍了所有部队，大家都非常关心这个问题。红一方面军的同志，包括我们红军大学的干

部团的人，都认为只有北上才有出路，表示要跟毛主席北上抗日。但当时张国焘的力量暂占优势，还控制着红军总司令部。该司令部设在四方面军总部，朱一德任总司令，张国焘担任总政治委员，故大家心情异常紧张，担心回头再过草地到西康去。一天早上天未亮，洋顾问李德突然来到我的床前，把我从熟睡中叫醒。他着急地说：“快起来，中央决定北上，命令即到，你把身边的人组织好，要密切注意李特的动作，不要让他把队伍带走。同时，防备他整你。”李德是德国人，是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的军事顾问，在中央苏区时是“左”倾机会主义军事路线的决策人，但他对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是拥护的，同中央大多数同志的观点是一致的。我同李特争论的事，他是知道的。他来通知我，当然是军委示意的，因为以前我和他没有来往。我急忙起床，召集有关人员进行动员、布置。我又派青年干部张正光到骑兵科长苏进同志处，告他立即出发，随中央直属队前进。队伍很快集合起来。大家精神振奋地向北出发了。路上，我和俱乐部干事严长庆等几位同志跟在李特身边，防止他把队伍调向西。他这时情绪很低沉，一声不吭地随着队伍走。而刚到职几天的何畏，一接到继续北上的命令，就借口找军委谈谈，带着自己身边的卫队，向西溜到张国焘那里去了。中午时分，队伍已走了几十里路，我们和中央直属队到了一个山脚的村边休息。村子有几间破房子。村边有一座200多米高的山和一条可以徒涉的小河。我们正在休息，突然，红军大学的队伍乱起来了，原来，红四方面军的300多名学员，在李特的煽动和压力下，不愿北上，准备回头向西走。这时，后面的骑兵也来传话，说红四方面军总部命令在红军大学学习的红四方面军学员立即回去。过一会，又传说红四方面军的部队追上来了，可能会发生战斗。对此，红一方面军的学员很愤怒，痛恨李特跟随张国焘搞分裂。我们立即开展思想工作，劝说红四方面军的同志留下来，共同北上抗日，在我们的劝说下，也有一些红四方面军的同志表示愿意随中央北上，但李特一面拿皮鞭抽打不愿回去的同志，一面高喊着：“不要跟机会主义者北上，南下吃大米去！”这时，李德和李特争吵了起来。我就在他们身旁，只见双方的情绪非常激动，吵得耳红面赤。李特骂李德是“赤色帝国主义”，而李德骂李特说的是俄语，我听不懂，据懂俄语的同志翻译说，李德骂李特是“分裂主义者”、“流氓”。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他们正争得不可开交时，毛主席从一间破旧的小屋里走出来，他指着附近小河，对李特说：“你不要闹了，彭德怀来了！”只见彭德怀从小河边走来，那时，红3军团改为第3军，他任该军军长，率一个团在后面掩护北上。李特害怕彭德怀同志，见毛主席和彭德怀来到，马上溜开。毛主席对红四方面军的同志说：“你们要求回去是可以的，我同意你们回去，也欢迎你们回来。”毛主席又向我说：“你们也不要劝说了，让他们回去，我们要相信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将来会回来的！”并叫我带一方面军的干部继续北上。这里，充分表现了毛主席与张国焘斗争的高度原则性和灵活性。过一会，李特便带着红四方面军的学员折回去了，其中部分想北上的同志也只好依依不舍离去。后来，正如毛主席所预料的，红四方面军南下碰了钉子，在广大指战员的醒悟和中央的催促下，终于与二方面军一起共同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红四方面军的学员走后，我便集合红一方面军的学员随中央继续北上。至此，红军大学也宣告解散。红军大学解散后，红一方面军的学员被分配到战斗部队中去了。我被调任中央直属纵队政治处主任。该纵队除中央军委、中央政治局的领导同志外，还有许多资历深、职位高或年龄较大的同志，如董必武、

林伯渠、谢觉哉、徐特立、成仿吾、蔡畅、邓颖超、贺子珍、李克农等。我觉得自己任务艰巨，工作千万不能马虎，决心照顾好这些党的宝贵财富。同年9月中旬，我们从巴西出发，继续北上。沿途没有什么敌情，政治处的主要精力是协助搞好思想和后勤方面的工作。行军出发前，检查人数，交代注意事项；行军途中，观前顾后，照顾病号和体弱者，组织收容掉队人员；到宿营地，检查人数，安排住宿，设法保证他们吃饱睡好。总之，事无论大小，我都亲自过问，不厌其烦。他们有什么问题或意见，也主动找我谈。在通往甘南的途中，我们通过一条高悬在危岩峭壁之上仅一尺来宽的险峻古栈道后，来到川甘“天险门户”腊子口。山口下面的两座山峰之间，是一条深不见底的腊子河。河上架有一座用两根圆木搭成的仅一米宽的木桥。要过腊子口必过此桥，别无他路。甘肃军阀已先在此桥头筑有碉堡，真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是长征路上的最后一座天险。我们先头部队的英雄们，在没有任何登山工具的情况下，靠背包带和绑腿带连接在一起，从最陡峭的悬崖后面悄悄爬上去，给敌人以突然袭击，终于砸开了这道险关。我们后续部队通过这一山口时，差不多每个人都停下步来，带着惊讶、敬佩的神情看其险峻地势和被红军手榴弹炸毁的碉堡，发出一阵阵赞叹声。我们穿过腊子口后，又翻过岷山——长征途中最后一座高山，于9月中下旬到达甘肃省岷县哈达铺。这是一个住有几百户人家的村镇，群众多是回民，也有汉人，他们没有逃离，对红军热情。村里有一条一丈多宽的小街，街里店铺很多，摆卖很多食物，价钱也很便宜，不用一块大洋便可买到三个大面饼。大家已经有几个月见不到大米、白面和油盐了。为了填饱肚子，恢复体力，准备继续北上，有的用身上存的钱大吃一顿，胀坏了肚子。各单位还杀猪宰羊，举行会餐，邀请驻地附近的老乡来作客。到处闻到肉香，像过年似的。总之，从荒凉的雪山、草地跋涉到这里，真是另一个天地，就像又回到了人间。在哈达铺休息时，中央在该镇西面的关帝庙里，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会上宣布：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原红1、3军团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下辖3个纵队：原红1军团编为第1纵队；原红3军团编为第2纵队；军委纵队编为第3纵队。支队还新成立随营学校（也称干部营）。陈奇涵为校长，宋任穷为政委，我为政治处主任。此外，又成立上级干部队，周士第为队长，罗贵波为政委。会上，毛主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他精辟地分析了当前的形势，指出今后新的艰巨战斗任务，号召我们继续北上，到抗日的最前线去，那里不但有刘志丹领导的红军，还有根据地，目前，我们虽只有7000多人，但个个都经过了考验，我们一定能够达到抗日的目的。大家听后深受鼓舞，报以惊雷般的掌声。在哈达铺休息两天，大家理了发，洗了澡，顿觉全身轻松。9月23日拂晓，这支7000多人的队伍又启程北进了。我们一出岷山，敌机发现了我们，天天来侦察、轰炸、扫射，影响了我们的行军速度。到了渭河平原，虽然地势比较开阔平坦，没有什么悬崖峭壁，但那里是黄土高原地带，有数不清的深沟幽壑，有些地方，只相隔一条大沟，对面看得见，但走下去再上来，这上上下下要大半天才能走到。天气干旱，群众吃水很困难。吃的是泥浆水。我们也经常吃这种水，先挑来沉淀一会才煮用。老百姓为了储藏水，有的在公路两边挖一深沟，等下雨时，水流进去，再倒几十斤羊粪下去，这样，水就清了，也不腐臭。当地能吃到这种水的人并不多，因要挖深沟，又不容易从深沟里把水提上来。翻过六盘山，临近陕北根据地时，敌人紧跟在我们后面，像一条甩不掉的尾

巴，缠住我们不放。一天，青海军阀马步芳部派一连骑兵来袭击我们。他们骑着一色的棕色马，挥舞着马刀，凶狠地向我们扑来。我们因只顾急行军，对敌人的突然袭击，真是措手不及。开始，我们随营学校的队伍被打乱了，毛主席的警卫部队也遭到袭击，处境甚是危险。后来，我们有了对付敌骑兵的经验。大家见到骑兵，立即就地或卧或立，成立体火网，瞄准着目标，等敌人冲到近处时，机枪、步枪一齐射击，一颗颗手榴弹飞进敌群里开了花，顷刻之间，这群凶猛的“骑士”，死的死，伤的伤，滚的滚，爬的爬，拼命向后逃跑。但是，马家的骑兵仍在后面紧跟着我们，直到吴起镇时，毛主席部署 1、2 纵队才把这一尾巴彻底切掉。10 月 19 日，我们随中央机关到达吴起镇。这是我们从甘南进入陕北的第一个市镇，也是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边缘。镇上挂有苏维埃政府的牌子和贴有“中国共产党万岁”等标语。群众热情地接待我们，送茶水，送吃的，送穿的，使我们感到十分温暖。吴起镇是长征的终点站，周围遍地黄土，是一个贫瘠的不毛之地，不宜屯兵。因此，我们在该镇呆了两三天，便前往瓦窑堡。这里是陕甘宁边区苏维埃政府和省委的驻地，位于延安北部，四面群山环抱，地理位置险要。人口有两三千，街道整齐，小巧玲珑，商业较繁荣，毛泽东同志率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在此落脚，至此，举世闻名的红一方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才真正结束，这时只剩下非常精悍的 7000 余人，小小的瓦窑堡，成为推动全国抗日的革命根据地的中心！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和壮举。它宣告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妄图消灭红军计划的破产，表现了广大共产党员和红军战士异乎寻常的勇气和毅力，显示了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人民军队无坚不摧的战斗力量，预示着中国革命新高潮的到来。

第六章从红大到抗大

撤离瓦窑堡

我们于1935年11月上旬到达瓦窑堡后不久，便听到老百姓传颂刘志丹的事迹。刘志丹是西北红军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之一。他与谢子长等同志一起，经过多年的艰苦战斗，建立了一个拥有20多个县的苏区，在陕北遐迩闻名。但是，在1935年秋，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执行者在陕北根据地实行错误的肃反运动，逮捕了刘志丹等一批领导干部，关押在瓦窑堡。一些人在“莫须有”的罪名下被迫害致死，使革命根据地陷入严重的危机。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及时发现和纠正了这个严重错误。当我们到瓦窑堡时，毛主席和党中央已派王首道（红军保卫局局长）等同志先期到达此地查处这一问题，并把被捕的刘志丹等100多名干部释放出来，从而使陕北根据地转危为安，出现团结战斗的新局面。当时，若“左”倾冒险主义者把陕北这块根据地也搞掉了，我们红军长征连歇脚的地方也没有了。到瓦窑堡不久，中央决定把中央红军随营学校与陕北的红军学校合并，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学员近千人，周昆任校长，吴岱峰任副校长（不久调走），宋任穷任政治委员，我任政治部主任。红军学校成立后，便进行紧张的政治、军事训练。虽然学校的物质条件比较差，住的、吃的、穿的都很困难，但大家的学习情绪很饱满，求知欲旺盛，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克服了学习、训练中遇到的不少困难。当时已是隆冬，雪花纷飞。很多南方的同志，刚到陕北，水土不服、气候不适应，患了病。因大家开始只穿单衣单裤，进屋有火炕，出屋易着凉，有些人发高烧，加上部队的药物已在长征路上用尽，这里较偏僻，买不到西药，故有些同志被病魔夺去了生命。真是饿会死人，饱也会死人；冻会死人，暖也会死人，多灾多难！我们想方设法，逐步帮学员解决了棉衣问题，大家也慢慢适应了。同年11月下旬，中央红军的元气尚未完全恢复，便同西北红军一起，为粉碎国民党军队对陕甘边区的“围剿”，发起直罗镇战役，取得了歼灭国民党109师一个师又一个团的重大胜利。这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我们听到这一胜利消息，无不欢欣鼓舞。听说张云逸代表中央军委带一个剧团前往前线慰问。12月25日，党中央在瓦窑堡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即瓦窑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正确分析我国政治形势的变化，及时地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决议还改变了一些不适应抗日要求的政策，指出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左”倾关门主义，必须坚决加以纠正。这是一个大的战略转变，我们学校认真组织学习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学习党中央瓦窑堡会议决议。开始，有些学员的思想转不过弯来，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参加抗日统一战线与工人阶级联合抗日的可能性表示怀疑，对一些政策的改变也想不通，真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好在我们靠近党中央，大家通过学习，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分析“左”倾关门主义的危害，认识到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在《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中提出的“必须大数量的培养干部”的决定，以适应抗日形势发展的需要，1936年1月，党中央决定把红军学校改名为西北红军大学。仍由周昆任校长，原政委宋任穷已调离学校，改由袁国平任政委，我仍任政治部支任。学员扩大至1000多人。当时，毛泽东同志对红军干部的培养、训练工作非常关心，经常过问红军大学的办学情况。我们住在山坡上，坡下就是毛主席住的石窑洞，离我

很近，毛主席经常叫我去汇报学校的学习和工作情况，给我讲当前党的政治路线，使我受益匪浅。有一天，毛主席叫我到他的窑洞里，谈有关培训干部和学校招收学员问题。旁边站着一位身骨壮实的年轻战士，毛主席看了一眼这位战士说：“我这里有一个战士，是经过长征考验过的好同志，我想把他送到你那里学习好吗？”我点着头，连声回答说：“欢迎！欢迎！”于是，毛主席就指着旁边的战士说：“他叫陈昌奉，是我的警卫员，已跟我五六年了，长期没有得到很好的学习机会，现在，我们的根据地一天天扩大，各种工作都需要干部，你把他带到学校让他系统地学习，学好以后，让他出来更好地为党工作。”毛主席还特地交代要我帮陈昌奉同志识字、学文化，他说：“对红军干部战士的培养，首先要提高其文化水平，不识字的从识字开始。”

过了几天，陈昌奉同志带着毛主席送给他的两个本子和两支铅笔等学习用具来到学校报到。我把他编班后，便指定专人教他认字。他也刻苦学习，进步很快。学了40天，因工作需要，他被调到西北保卫局保卫队当指导员。他离校后，不仅自己认识不少字，还能教保卫队的战士识字了。学校根据毛主席的有关办学指示，制订出一个教育计划，呈送给毛主席。毛主席即于同年4月26日给我校写了批复信。信中说：“文化教育（识字、作文、看书报能力的培养），是整个教育计划中的最重要最根本的部分之一……如果学生一切课都学好了，但不能看书、作文，那么他们出校后的发展仍是很有限制的……如果学会了看书作文，那么他们出校后的发展就有一种常常用得着的基础工具了。”从此，我们学校便把文化教育当作一项重要教学内容来抓，安排学员学文化时间占总学时三分之一左右。学习的课程包括语文、数学、自然和史地常识等。陕北的春天比南方来得迟，但其山野很美，绿绿的山坡上，开着红艳艳的山丹丹花。布谷鸟也不时地在拉长嗓门尽情地歌唱。瓦窑堡会议像一股强劲的东风，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我国正处于一个伟大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前夜。在新的形势下，党中央估计到内战将停止，新的抗日民族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为了加强对红军干部的培训，提高干部特别是中高级干部的政治思想和军事技术水平，以适应新的战略转变，党中央决定：以西北红军大学为基础，筹建中国工农红军大学。1936年5月14日，毛泽东同志在陕北延川县大相寺村召开的军团以上干部会上，强调各军团单位应该利用全面抗战开始之前的时机，抽调大批干部，从军团领导到连排基层干部，进红军大学学习，并要求部队各级党委要保质保量地把优秀干部选送到红大去，以此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来完成。当时国内战争尚未停止，中央工农红军经过长征刚刚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党中央就创办了红军大学，并下决心抽调大批红军主要领导干部进红大学习，这是党中央、毛主席在形势任务的转折关头，为培养干部，造就人才，迎接伟大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到来豹一个重要战略决策。6月1日，瓦窑堡的旧庙堂前红旗招展，歌声嘹亮。近百名优秀的红军干部，集合在这里，举行“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开学典礼。会场布置得简朴、隆重、庄严。庙墙上贴着红绿标语。临时垒起的一个土台上，悬挂着一条红布横额。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领导同志出席了大会，同学校的主要领导同志坐在主席台上。毛主席在开学典礼上作了重要讲话。他说：“第一次大革命时有一个黄埔军校，它的学生成为当时革命的主导力量，领导了北伐成功，但到现在它的革命任务还未完成。我们的红大就要继承着黄埔的精神，要完成黄埔未完成的任务，要在第二次大革命中也成为主导的力量，即是要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毛主席的讲话，

阐明了创办红大的目的、意义和办学方向。会上宣布，毛泽东同志兼任红军大学政治委员，林彪任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林彪和罗瑞卿既是学校领导，也是学员。全校分为三个科。第一科主要训练师以上干部，40人，科长为陈光，政委为罗荣桓；第二科主要训练营、连级干部，225人，科长周士第；第三科主要训练班、排干部，由原西北红军大学改编而成，约800人，科长为周昆，政委为袁国平。全校学员超过千人，学员主要是一方面军和陕北红军干部。我趁学校整编之机，请求到红大学习。因为自己的军事、政治、文化水平低，任务重，过去没有机会坐下来学习。但袁国平政委不表同意。我遂去找总政治部代主任杨尚昆，他同意我到第一科当学员。因红大不设政治部，他叫我兼任红大党总支书记，管第一、第二科的政治工作，并明确规定，近日如有行动，随第三科。我表示同意。第一科驻在城北面隔一条小河的祁家湾。我立即搬到那里住，一边工作，一边学习。红大一科的学员有：林彪、罗荣桓、罗瑞卿、刘亚楼、陈光、张爱萍、彭雪枫、陈士榘、杨成武、谭政、周建屏、彭加伦、王平、耿飏、刘惠农、边章武、许建国、苏振华、张纯清、张树才、张经武、张达志、宋裕和、赵尔陆、贺晋年、郭述申、黄永胜、谭冠三、莫文骅、杨立三、邓富连、刘鹏、吴富善、罗保连、贾力夫、符竹庭、童小鹏、肖文玖，还有朝鲜的武亭和越南的洪水同志。一科科长陈光和政委罗荣桓同志也是学员兼领导干部。一科学习的主要课程有哲学、政治经济学、军事战略学等，还有党的方针政策。基本上是军事政治并重。毛主席、洛甫（张闻天）、博古等领导同志，曾到校讲课或作报告。6月21日，是星期天。学员们都到街上去了。因我对这小镇已很熟悉，故留在学校里预习“资本主义”这一章的讲义，还看了一些参考书和地质学方面的书。过去长期处在战争环境里，自己没有机会住校学习。现在，有了较安定的学习环境，觉得很难得，故自己也较用功学习。上街的学员陆续回来了，见我还在埋头苦读，纷纷开玩笑说：“喂！你星期天还这么用功，是想当孔夫子还是当马克思？”我只微微一笑，继续看我的书。下午3时多，我突然想起晚上学校要开同乐晚会，于是，放下书本，穿好胶鞋，打好绑腿，准备晚饭后赴会。过了一会儿，第三科吹起了“嘀嘀哒哒”的开饭号。我心中纳闷：为什么这么早开饭？我们一科为什么不开饭？学员也正在议论着。这时，陈光科长急急忙忙跑来对司号员说：“快吹开饭号，快！快！”饭后不久，罗荣桓政委从外面回来了，挥着手对我们说：“快做好准备，马上出发！”大家知道有军事行动了，紧张地收拾行李和备马。勤务员、饲养员也来了，忙个不停。准备就绪，我叫饲养员拉着马随大队行动，自己则带警卫员张力同志到校部去打听消息，以便随三科行动。我到校部，才知道三科800多人已全部出发上战场了。原来，国民党第86师高双成部，趁我红军主力渡黄河东征之机，从榆林方向来偷袭瓦窑堡。而当时瓦窑堡是后方，除一个连负责警戒外，只有第三科这点武装力量。幸该科的学员，几乎都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干部，军政素质较好，战斗力较强。我带着警卫员到了北门城楼，见杨尚昆代主任、林彪校长、罗瑞卿教育长等领导同志正在那里，用望远镜观察敌情。此时，他们已与城外前线失去联系，城内已没有正规军，他们身边只带着警卫员，另有当地一个班的赤卫队。我问敌情，他们不清楚，只听到城西北桃源方向的枪声似乎越来越近了。我向几位领导说明来意后，即带警卫员出去找三科的队伍。罗瑞卿提醒我：“你要注意大路！”出城走了1公里左右，快过河时，突然看到一个穿女同志衣服的士兵，像是敌人。心想：我们第三

科的学员已由周昆率领到前方去了，为什么敌人能钻到这里来呢？正在这时，左侧来了两个老百姓样子的人，向我们打招呼，摇着手，示意我们不要前进。我知道情况不妙，敌人已撇开我前方的主力（第三科）钻进来了。于是，我急忙往回跑，上城楼向领导报告敌情。城楼上正唱着“空城计”呢。罗瑞卿听了我的报告后，他用望远镜看了又看，说：“那不是敌人，是我们的部队。你不见么？他们的屁股是朝我们这边坐的。”我不好再说什么，便带着警卫员再出城去找三科的同志。因周昆科长紧急率队出发，来不及吃饭，他的警卫员陈炳群拿了一盒饭菜，随我也出了城。我们边走边加强戒备。快过河时，我们三个人成三角队形前进。到了河边，在第一次发现有几个人的地方，又发现有10多个人隐蔽在树林里。由于阳光照射很刺眼，一时看不清前面的人是敌人还是自己人。警卫员张力大声喊道：“哪里的？”他们不作声。再连问几次，他们才回答：“保安队的”（保安队是当时陕甘宁根据地的地方武装）。我再仔细看，有几个像戴着红军的帽子似的。于是，两位警卫员持驳壳枪先过河。看他们距树林只有10多米了，我也下河踩着石头向河岸走去。当警卫员接近他们时，突然“砰！叭！砰！”一排枪向我们射过来，同时，夹杂着“抓活的”的喊声。啊！原来对面是冒称“保安队”的敌人，很危急！我们沿着弯弯曲曲的河边，边打边往回撤。敌人的密集枪弹从身边、头上叫着飞过，陈炳群负了轻伤。我们一口气跑回城里，上了城楼，见到杨尚昆同志，他急忙问：“怎么样？”我指着河边回答：“那些人不是自己人，是敌人，追着我们过来了！”林彪向旁边左侧高山一指，对我说：“你去指挥山上的队伍，叫他们坚决顶住，不得后退！”我问：“那山上是什么队伍？有多少人？要守到什么时候？”他说：“那里有一个赤卫班，要尽力坚守！”这是一座海拔600米左右的高山，光秃秃的，没有树木，看不见山上的人。我跑到山前时，口干极了，警卫员忙着找水去了。我来不及等他，自己先往上爬，刚爬了100多米，见上边的人从侧边往下向南跑去。我判断敌人是从侧翼钻到山上来了，我已不能再上山了，想回头去找林彪，也来不及了，估计他们在城楼上也会看到的。于是，我立即下了山，沿城墙向南门方向走去，想跳城墙出去，又有壕沟，于是，再从南门下城内。心想，如果敌人进城，那就麻烦了。天已黄昏，夜色朦朦，敌人未敢贸然入城。城里一片寂静，街面上只见几只鸡狗，城里已是一座空城。我又转出南门，准备再去找第三科的队伍。走了300多米，看到前边有几个人往城外走。我跑近一看，啊！毛主席！他是最后一批撤离的，身边只有几个警卫员。于是，我决定不再向前赶，拿着手枪，在毛主席他们后面跟着，如遇敌人，就在后面掩护。跟随了一阵后，见毛主席已脱离危险，我便向我军的警戒线走去，那里似乎有一连部队的样子，在散开防守。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正在指挥。他见我过来，即向我询问敌情。我简单报告后，便问杨尚昆、林彪、罗瑞卿等领导的情况。听了他说：“都过去了！”我才放心。随后，我按周副主席的指示，去后面找红大队伍归队。瓦窑堡战斗就这样结束了。我们被敌人突然袭击而急忙撤离到瓦窑堡附近小山村，政治上、军事上的损失是很大的。随后我们红军大学便随党中央及直属队行军一星期迁往保安。事后，人们对这场战斗议论开了：为什么没有经过激烈的战斗，就被敌人占领了瓦窑堡呢？第三科3个营英勇善战，科长周昆曾任红1军团师长、红8军团军团长，而敌人只有一个营，为什么反而打输了呢？事情是这样：桃源方向原来有我军一个排的警戒部队，敌人进攻时被打散了。周昆率第三科学员出北门御敌，把少数部队放在

大路上，以主力占领北山制高点。从正规战的战略眼光来看，是无可非议的。但敌人是突然偷袭，这样部署就不妥当了。结果，敌人撇开我主力，沿大路利用树林、沟坎、山腰死角隐蔽前进，钻了我们的空子。另一方面，既然抢占了制高点，本可以居高临下，向敌进攻，或截击敌人，是可以把敌人打退的。更何况敌人是从榆林地区经 45 公里的奔袭，到达瓦窑堡时已相当疲劳，系强弩之末，我军虽无准备，处于守势，但战斗力强，精力充沛，以逸待劳，是可以变被动为主动，击退敌人的。周昆却没有这样做，成了高山观战，贻误战机。他这次指挥上的错误不是偶然的，因他担任红 8 军团长时，在湘江战役中表现不好，打了败仗，被撤职，当然，8 军团的失败不能单怪他。尔后，他的政治情绪一直不佳，故在这次战斗中表现消极。1938 年 2 月他携公款潜逃，成为可耻逃兵。瓦窑堡战斗留给我们的教训也是深刻的。这次袭击我们的敌营长张廷芝，解放后被处决了。

“元始天尊”的弟子

太阳从山岗后面升起，东方一片绚丽的朝霞。我们红大一、二科的学员，背着简单的行装，从瓦窑堡附近山村出发，经过7天的行军，1936年7月2日晨，来到了保安县城东南面的山边石洞驻下。一科驻地在离保安1公里处的半山坡上。二科离我们一科有三四里路。三科已去甘肃庆阳，后该科在那里改为步兵学校，与红大脱钩。保安，是陕西北部一个偏僻的县城。四面群山环抱，土地贫瘠，人烟稀少，交通不便，物产匮乏，只有小米和山药蛋。群众生活非常贫困，正如当地民谣所说的：“陕北好地方，小米子熬米汤”，“保安穷山窝，破庙比房多，菩萨比人多”。从城廓上看，保安县城的规模还不算小。但由于历年来不断发生战争，特别是回、汉民族之间的战争，加之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的烧杀，保安城只剩下几间破庙、几栋土屋、几座破烂的石窑洞，人口不足400人。绕着土城围子，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河向东南流去。黄色的河水缓慢地流着，它是洛河的一条源流，离我们的驻地只有300米。城外的山坡上稀稀拉拉长着几丛酸枣树。石壁上露出几十个黑黢黢的石洞口，远远望去，好似蜂窝似的。这些石洞，是哪个朝代开凿的，已无从考证，据说是供奉“元始天尊”的。大的高宽都在1丈左右，深约1丈4尺；小的高宽6尺左右，深约5尺。长期没有人居住，有的做过羊圈，有的是兔窟狼窝，里面野草丛生，乱石纵横，狼藉不堪，不时从里面飞出一群蝙蝠或野鸽子。红大的校舍，除了这些石洞以外，什么也没有。为了战胜困难，建设好校舍，我们一科党支部召开党员会议，号召大家发扬艰苦奋斗精神，自己动手，建设校园。我们一科40名学员，大都是师级以上干部，有3位是团级干部，但年龄除个别接近“而立”之年外，大部分都是二五六岁的青壮年。大家在党支部号召下，不论职位高低，都积极投入建校的劳动中。我们的教室选择在一个最大的石洞里，它原是一个羊圈。我们先把羊粪、杂草清除掉，打扫干净，又在石壁上凿出一块大石板，用石头砌成了桌子和凳子，还选了一些石头作粉笔，给老师用石头砌成一个挺像样的讲台，并用石灰水把洞壁刷白。在窑洞口，便用石块垒成墙和门洞，找一些旧木料做成门框，打茅草编成厚厚的门帘。同时，在窑洞之间平整好道路。这样，一座以窑洞为教室、以石壁为黑板、以石头为桌凳、讲台的大学课堂建成了。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课堂。晴天，我们在大树底下露天上课；雨天就搬进石洞里上课。我们把石洞改造成简陋的校舍，小的窑洞住两三个人，大的住四五个人。在窑洞里，有的睡石炕，有的用石头砌起床铺，在上面铺一块木板或铺垫上些禾草。那时候，保安一带狼很多，夜里经常听到狼嚎。有几次，狼跑进我们住的窑洞，因为我们的窑洞都没有门，晚上怕狼进来，在睡前便把桌子、脸盆堆放在门口，若狼一进来，拱翻这些东西，其声响会把狼吓跑，并惊醒屋里的人，我们还在床头备有一根打狼棍，以防万一。清晨，当林中小鸟吱吱叫起来的时候，我们像战士一样出早操了。学校没有操场，周围也没有一条平坦的道路，我们每天出早操时，鞋子、裤子被荆棘挂破。老师们来校上课行路也很困难。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党支部研究决定：自己动手，修建一条贯通校门的大路和3条通往交通大道的支路。7月13日清晨，我们拿起锄头、铁锹、锄头等工具，迎着旭日朝霞，开始了修路劳动。平静的校园出现了热火朝天的修路场面，歌声笑语汇成一片。有的唱起并不很合拍的“冲！冲！冲！我们是开路的先锋……”的歌。大家谁也不甘落后地干着，砍树的，挖地的，搬石头的，挑土的，拔草的，于不多久便汗流浹背。我们

这些人，耍了多年的枪杆子，当了高级干部，长枪也拿得少了，拿镐头更少，所以干起这些重活来，开头还是比较吃力的。有的两手起了泡，有的气喘吁吁。大家猛干了一阵子，完成了一段路后才吃早饭。平时，吃的是带糠皮的米饭（因碾米工具落后），菜是土豆、干豆角和白菜，而今天早上，炊事员却给我们做了一顿难得的炖羊肉，还做了荞麦面。饭后休息一会儿，便开始上课。虽然身体有些疲劳，而学员们仍然聚精会神地听课。晚上，躺在床上，我伸开胀痛的手一数，共起了6个水泡。同洞的学员武亭（朝鲜人）、贺晋年（陕北人）的手上也起了泡。由于手脚和腰背酸痛，我们3个一时睡不着，摸黑躺在床上聊起了各自参加革命斗争的往事，说着说着，便入睡了。第二天和第三天早晨，我们又继续进行修路劳动。经过3个早晨的奋战，一条宽两米、长100米的大路和3条支路竣工了。大家议论说：通向城里的大路修好了，假如我们有汽车的话，就可以开车去接“教授”们来学校上课了。那时候，毛主席和其他“教授”们都是步行几里路来校上课。当地群众见我们用自己的双手把一片荒山野洞改造成整洁的校舍，深为感动，特赠给我校一面锦旗，上面写着：“劳动者可以创造世界”。开课当天，毛主席、张闻天、徐特立、秦邦宪等领导同志来到我们一科驻地。当毛主席等领导同志走进教室时，大家站起来热烈鼓掌。毛主席微笑着摆摆手，让我们坐下后，先介绍随他来的几位领导同志。他说，“我今天帮你们请来几位教员，有洋的，也有土的，我就是个土的。”当他介绍到徐特立时，说：“他不仅是你们的老师，也是我的老师。”接着，毛主席作了重要讲话，他讲了当前的形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新时期党的路线政策。他说：“我们前一段时间，用两只脚走了两万五千里。孙悟空会腾云驾雾，一个跟斗能翻十万八千里。我们不会腾云驾雾，也走了二万五千里。要是会腾云驾雾，就不晓得会走到哪里去了。现在，我们红军从过去几十万减为两万多人，要不是刘志丹帮我们安排好这个落脚点，我们还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呢！反正我不到外国去。中国的地方大得很，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还有北方。当前，党中央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决定把‘反蒋抗日’的口号改为‘逼蒋抗日’。就是要逼蒋介石走抗日的道路……”随后，毛主席等领导同志参观了教室和学员宿舍。他看到我们用石头做成的一件件用具，诙谐地说：“你们是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学习着当代最先进的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你们是‘元始天尊’的弟子，在洞中修炼。什

么时候下山呢？天下大乱你们就下山！”毛主席还勉励我们安心学习，以便迎接和促进抗日民族革命高潮的到来。毛主席的讲话，使我们明确了形势任务和自己肩负的责任，每个人心中都充满了使命感。红大创办之初，学校机构简单，仅有3位专职教员，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经常来校讲演或兼课。我们开设的主要课程有：毛主席讲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张闻天讲授《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博古讲授《辩证唯物主义》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凯丰和吴亮平讲授《政治经济学》；杨尚昆讲授《各国论》（主要是英、美、法、德、日、意）；徐特立讲授《新文字》；李维汉讲授《党的建设》；李德（共产国际顾问）讲授《兵团战术》；林彪讲授《战役学》，但只讲了一次开场白，听的人没兴趣，他自己也没有信心再讲下去，就作罢了。此外，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还时常到校作时事和党的政策问题等报告。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工作很忙，除了讲课，不可能经常到学校

来。因此，我们每次除了听两三个小时课外，其余都是自学或讨论。我们学的各科教材，都是教员编的讲义。印讲义的纸是用过的废纸背面或敌人飞机上撒下来的传单，有白的、黄的、红的、绿的等，因纸的背面不光滑，印得不清楚，看起来很费劲。每天晚上，我们坐在石凳上，俯首石桌，在油灯或烛光下，啃得津津有味。大家往往学习到配给的灯油点光、蜡烛燃尽才合上书，上床休息。当时，每3天才发一支蜡烛。为了节约灯油和蜡烛，我们有时讨论便吹灭灯，摸黑躺在床上讨论。后来蜡烛没有了，改用胡麻油灯，没有灯草，只好捻一条小纸捻来代替。由于陕甘边区地瘠民贫，筹粮筹款较困难，当时党中央的财政状况十分困难，但是，对我们红大学员的生活却尽量给予照顾，让我们吃饱肚子。除了平时吃小米饭和干豆角外，一个星期还可以吃上一次羊肉汤，偶尔还可以吃上一顿荞麦面做的食品（7个月里共吃了3顿）。这样的生活，已算是很高的标准了。在物资极其匮乏的情况下，洗脸盆的功用很大，可供洗脸、洗脚、洗身、洗衣服和盛菜，一盆多用。饭堂没有碗，盛饭时有的用茶缸，有的用土碗，五花八门。困难磨练着我们的意志，大家既坚强，又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每天早晨，在那偏僻的黄土高原的窑洞前，都能听到红大学员高亢的歌声。曾在部队担任宣传工作的彭加伦同志，教我们唱《大路歌》、《毕业歌》等歌曲。为了活跃文化生活，强调领导起带头模范作用。罗荣桓曾找我和张爱萍、童小鹏、彭加伦等同志商量演戏的事，决定由彭加伦执笔写一个反映拥政爱民的剧本。剧本写好后，由罗保连演男主角，童小鹏演女主角，肖文玖演红军战士，演出时，党中央和军委许多首长都来观看，轰动了保安城，成为当时保安文化生活中的一件趣事。记得还有一次，为了欢迎朱总司令从红四方面军归来，我们赶排了文娱节目。其中有一个节目，由罗瑞卿、张爱萍、宋裕和等同志自编自演。原来让高个子耿飏同志饰蒋介石，可他执意不肯，后改由罗瑞卿饰蒋介石，他个子比较高，又瘦，演得不错。剧中还有一个小脚老太婆，由宋裕和同志扮演，他穿上从老乡家借来的老太婆衣服，用脚后跟一拐一拐地学小脚老太婆走路的样子，惟妙惟肖，引得台下的观众连眼泪都笑出来了。除了文化娱乐外，我们还自己动手修了篮球场，组织打篮球。我们埋下4根柱子，钉上几块木板，找两个桶箍代替球筐。尽管条件简陋，可大家玩得兴致很高。晚饭后，撂下饭碗，便争着往球场跑。朱德总司令在休息时也经常来和我们一起打球。他一般是打前锋。我也喜欢打球，一般打后卫。后来，美国记者斯诺和医生马海德到红大访问时，曾同我们的学员一起打网球。彭雪枫、张爱萍、赵尔陆、肖文玖等同志都同他俩打过网球，斯诺还曾拍照留念。这些身经百战的学员，虽然是红军的高级干部，但在 学习期间，仍然保持着军人的举止和作风，衣着整齐，生活紧张有序，早出操，晚点名，动作迅速整齐；集合站队歌声嘹亮。课堂上，像小学生一样站起来回答教师的提问，我们称之为“亮相”；师生之间，上下之间，学员之间，打成一片，亲密无间。为后来抗日军政大学优良校风的形成打下了基础。在当时西征战事紧张的情况下，党中央下决心抽调这么多干部到红大学习，这是一个多么难得的机会啊！我们这些人中，有的参加过大革命，大多数参加过土地革命战争，平均每人经历了8年以上的革命战争锻炼，经历过无数次的激烈战斗，平均每人负伤两次以上，都有一定的斗争经验。但是，在艰苦紧张的战争环境里，没有专门时间去学习革命理论，也没有很好总结一下过去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以便上升为理性认识，大家都是先干后学，边干边学的。现在，能有这么个好机会让

我们安心专门学习，这怎能不叫我们从心里高兴和珍惜呢！那些暂不能进红大学学习的同志非常羡慕我们。尤其是在新的历史转折关头，民族抗日战争新的历史使命和任务，对这些在红军中担任重要职务，指挥千军万马的高级干部来说，深感身上的职务责任与知识水平还不相适应。想到党中央、毛主席的殷切期望，大家心中都有一种学习的紧迫感，为中国革命而学，为抗日战争而学的目的非常明确。我们吃小米，点青油灯，在石洞里上课，学习情绪很高。在红大学习期间，除了讲义，没有别的什么书籍。保安城里党中央机关有个小图书馆，规定可以去借书看，但每次只准借一本。有些书很珍贵，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一书，只有毛主席保存一本。我们便向毛主席借来刻印，每组发一本，大家争先恐后地阅读。大家对学习时间抓得很紧，一放下饭碗，便夹起书本，找个禾草堆一靠，如饥似渴地读了起来。我们整天读书，连星期天也不肯休息，党中央非常关心我们的身体健康，多次派杨尚昆同志来传达指示，要我们注意劳逸结合，以利长期坚持学习和斗争。晚饭后的自由活动时间不准读书；星期天一定要过假日，把门锁起来，不准留在洞里，要到野外去休息。其实，我们的窑洞并没有门，所以谈不上锁。我们当然理解中央领导对我们的无微不至的关怀。星期天到了，我们吃过早饭，便拿着书本，走出窑洞，找个禾草堆，三三两两地躺着看书。时值深秋，漫山遍野一片枯黄，湛蓝的天空白云朵朵，和煦的太阳晒得人暖烘烘的。在战争环境下我们能如此静心读书是非常不容易的，因此，每个人都在为着实现中国革命的艰巨任务而刻苦学习。看书看累了，我们便望着蓝天游云，漫谈起来。有一次，一位年轻的学员正在啃政治经济学，对“货币”的概念不大理解，便与同学讨论起来。有一位同学说货币就是钱。他想到有个同学曾向他借过钱，便说：“哪位同学借了我的货币？”他的话引得不少人笑起来，也引起一番理论上的争论。经过争论，大家对“货币”概念的理解也比较深刻一些。每当晚饭后，我们也三五成群走到窑洞外的草地上或小河边散步，边散步边谈心。每个人都有一番独特的斗争经历，都可写成一本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大家回忆往日的战斗，都深感应该把自己的曲折经历写出来，以免少走弯路，可惜当时物质条件太差，纸张笔墨困难，我们写的学习日记和日记太少了。后来，随着学习的深入，尤其是听了毛主席深入浅出讲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课，给我们的启发、教育很大。我们每个人都总结自己的斗争经验，联系实际，进行深刻学习和理解。大家着重联系长征的经验教训，写了自己的学习体会或革命回忆录。中央对这件事很重视，曾派杨尚昆、陆定一同志来做专门动员、指导。后来，中央把大家写的文章编为《红一方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记》，油印出来作为内部资料，解放后才在北京公开出版。大部分学员的文化程度不高，但肯动脑筋，钻研问题，思路开阔，接受能力和理解能力提高比较快。有一天上午，美国记者斯诺在校长林彪陪同下，应邀到我校演讲。他讲的题目是：《英美对华政策》。他概略讲了英美对华的态度后，表示愿意解答学员提出的有关问题。一下子，学员们提问的条子像雪片一样飞到讲台上，提的问题涉及面很广，如：“英国政府对亲日的冀察委员会的成立持什么态度？对驻在华北的日军又持何种态度？”“如果中日战争爆发，德国和意大利会帮助日本吗？”“你认为如果日本没有他国的帮助，它对华的大规模战争能维持多久？”“国际联盟为什么会失败？”“既然共产党在英、美国内都是合法的，为什么这两个国家却没有工人的政府？”“英国反法西斯阵线的形成进展如何？美国又怎样？”“以

巴黎为中心的国际学生运动的前景如何？”“你认为李滋·罗斯访问日本能使英日双方就对华政策达成协议吗？”“一旦中国开始抗日，英、美会帮助中国还是日本？”“请告诉我们，如果英美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为什么他们还在中国驻有舰队和军队？”学员提出这些问题，完全出乎斯诺意料之外。本来只安排演讲和解答问题的时间为两个小时，结果，从上午10时一直到下午很晚才结束。后来，他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感慨地说：“我概略他讲了美英的态度，然后同意回答问题。我很快就意识到这是个大错，这顿‘面条宴’抵偿不了我回答问题所处的窘境。”有一次，一科欢迎朱德总司令和张国焘（他当时还是红军总政委）来讲话。当张国焘哼哼地说了几句话后，有个同志站起来请他讲课，讲党的建设，把他难住了。还是朱总司令给他解围，说，讲课要准备的，以后再说吧，这才收场。学而后知不足。我们越学习越感到自己知识贫乏，大家深深感到自己任重而道远，需要我们掌握更多的知识。在徐特立同志的号召下，课余时间许多人学起了新文字（即拼音文字，那时是用英文26个字母拼的）。一些学过英文的同志，学起来比较容易，很快就可以用拼音文字写信了。大家对新文字很感兴趣，学习热情很高。我和彭雪枫、张纯清、张爱萍等几位同志，商量好用新文字来“通信”，就是写好信，当面送给对方，尔后，再一起推敲写得是否对。没通上几次信，我们就发现一个难以克服的困难：各人讲的都有方言，而不是普通话，写的信对方有很多地方看不懂或闹出笑话，这使我们意识到，不统一祖国语言，要使用新文字是很困难的。同年12月，红大第一期教学计划接近完成时，突然，传来一声霹雳，西安事变发生了！当我们听到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把蒋介石抓起来的消息时，欢喜若狂。大家纷纷议论说，蒋介石追杀我们十几年，这回该报仇了！但事隔几天，中央决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释放蒋介石，促成国共合作抗日。对这一方针，我们在感情上一时接受不了，觉得蒋介石一向奸诈刁猾，言而无信，不能轻易放虎归山。为了把学员和干部的思想统一到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上来，12月26日，即张学良释放蒋介石的第二天，毛主席亲自在我校操场上给全校学员和中央机关于部作了关于西安事变的报告，介绍了西安事变经过，阐明党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他针对部分学员、干部要求杀蒋的思想，着重说明了释放蒋介石和联蒋抗日的道理。他说，在目前的形势下，杀掉蒋介石，会使国内形势更加复杂和混乱，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何况杀了一个蒋介石，还会出现第二、第三个蒋介石。过去诸葛亮对孟获还搞七擒七纵，我们对蒋介石为什么不可以搞一擒一纵呢？毛主席还风趣地打比喻说，陕北毛驴很多，赶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是不愿抗战的，我们就用赶毛驴上山一样的办法，拉他，推他，再不走就打他。这就是我党“逼蒋抗战”的方针。我们听了毛主席的报告，茅塞顿开，思想豁然开朗，再经过学习其它有关文件和讨论，统一思想认识，一致拥护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由于发生了如此震惊中外的重大事变，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忙于处理大事，无暇再给我们讲课了，这对我们确是极大的损失。特别遗憾的是毛主席讲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课，还没有讲完，他是写一章讲一章，尚缺《战略反攻和政治工作部分》，他说，没时间了，不讲了。

这时，新时期的战斗任务已摆在我们面前，各方面都需要大批干部去开展工作，我们再也不能像7个多月来那样在洞中“修炼”了。随着形势的发

展，同年 12 月底，红大第一期没有举行毕业典礼便结束了，学员陆续走上新的工作岗位担负起“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政治，实现对日抗战”的新任务。有的到前线统帅千军万马；有的到大后方去工作；有的到国民党统治区做抗日统战工作。这正如毛主席所讲的：天下大乱，你们就下山！红大 7 个月的学习生活，我们在保安石洞扎扎实实地读了 7 个月的书。这段时光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回忆。红大学习是我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基本理论，联系亲身实践，学历史，学理论，总结战争经验和教训，眼界打开了，获益匪浅，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领导和前途等根本问题，大体上搞清了，在政治理论上确是个飞跃。同时，我也深切地感受到，毛主席办红大，确实目光远大，表现了革命领袖的战略眼光。搞革命，路线正确与否是至关重要的，但有了路线，还要靠大批拥护和懂得路线的干部去贯彻执行。因此，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当中央红军刚刚落脚陕北，毛主席亲自动员部队调送干部入校学习，亲自讲演授课，抓干部学习，重视教育，造就人才。这对于我们党后来能够顺利地开展对张国焘、王明左右倾路线的批判，并夺取抗日革命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中国革命的历史发展，充分证明了毛主席的远见卓识。

宝塔山下的红星

为迎接抗日高潮的到来，加速干部培养，1937年1月，中央决定把红大从保安迁至延安，毛主席找林彪、刘亚楼和我谈话，要我们到延安组建红大第二期。林彪仍任校长，刘亚楼任教育长，我任政治处主任。罗荣桓随党中央机关迁往延安后，就任红一方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他主管军委直属机关、学校、工厂和陕北军事部的政治工作，红大的政治工作也归他管。同年3月，中央曾任命刘伯承兼红大副校长（未到职）。在此同时，红大政治处升格为政治部，调红四方面军的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任主任，我任副主任；邓富连（邓飞）任党总支部书记。政治部下设组织科、宣传科、保卫科和俱乐部。李志民曾任组织科长，谭冠三任俱乐部主任。

红大二期于1937年1月20日开学，正值西安事变和

平解决之后，内战大体停止下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本形成，国内正处在全面抗战即将到来的新形势。这时，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山西、甘肃、宁夏的国民党军阀，看到国共合作抗日，已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不得不作出一番“抗日”的姿态，放松了对我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尤其是三支红军主力会师陕北，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更加巩固和扩大，给处在严重的民族危亡关头的中国人民带来了信心和希望。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全国革命青年参加抗战，培养大批青年干部，党中央曾发出红军大学的招生章程。红大招生简章在各地传开后，全国各地的革命知识青年，纷纷奔向延安，寻求抗日救国的真理。延安红大像一颗光芒四射的红星，影响和吸引着国统区和沦陷区的广大革命青年。1937年春节前后，大批热血青年，满怀抗日救亡的激情奔赴延安红大，有从甘肃陇东来的，有从太原过黄河来的，多数人是从小西安转道而来。这些青年学生大部分是平津沦陷区的学生和东北流亡学生，也有河南等地学生，还有从南洋来的侨胞。他们中有的身着翻领西服，有的穿旗袍、高跟鞋，三三两两，男男女女，背着行李，拎着小包，日夜不停地奔向延安，在西安至延安几百里的道路上，人流不断。

徒步八百里，这对于青年学生本身就是不小的考验，所

以毛主席说过，步行八百里就是考试合格。虽然学员名额已满，我们还是都收下了。除了青年学生外，还有张学良和杨虎城部队的进步军官及抗日志士。如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杨虎城的儿子杨拯民，国民党师长赵寿山的儿子赵元杰，而董启文和董启强哥俩则是国民党旅长的儿子，甚至还有国民党军官的姨太太、汉奸的儿子。有的已是几个孩子的妈妈。大批革命青年、抗日志士从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汇集于黄河之滨，宝塔山下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为适应新的形势发展，同年4月，红大改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领导成员除刘亚楼改任训练部长外，其余不变，教育长暂缺。红大改称抗大后，期数接着红大的一期，一开始就是第二期，故有“红大无二期，抗大无一期”的说法。由于全国各地的青年入校学习，使抗大的招生范围由八路军干部学校扩大为全国性的抗日干部学校。随着学员数量的增加和学校的扩大，中央军委为加强对抗大的领导，决定成立“抗大教育委员会”，由军委主席毛泽东同志兼任主席，直接领导学校的教育与建设工作。各大队也相应建立了军政委员会，以加强统一领导。在此同时，学校除成立政治部、训练部外，还成立校务部，先后由杨立三、杨至诚、周文龙担任部长。学校在职干部由第一期的14人增至87人，教员队伍也不断得到扩大。党中央和毛主席下决心从机关和部队中抽调一批军政素质较好的干

部，到抗大担任教职员。为了照顾教员的生活，学校给教员每月额外补助两斤大米、一斤鸡蛋和几斤面粉，对抽烟的同志还发给几包“风车牌”纸烟。后来，还给他们发一点津贴费。这时，学员名额已达1300多人，边区以外的青年占三分之一以上。全校共编成4个大队及1个女生区队。抗大的教育计划、课程设置，毛主席都亲自审定。开学后，毛主席和中央其他负责同志都亲自到校讲课。统一战线课，由毛主席亲自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当时党的总的政治路线，除毛主席外，还有其他中央负责同志讲授。毛主席还讲授《辩证唯物论》（主要讲了《实践论》、《矛盾论》），每周二、四上午来讲课，每次4小时，下午参加讨论，从5月份一直讲到“七七”事变后，历时3个多月。党的建设课主要是在一、二队由朱总司令讲。董必武同志讲授中国现代革命史。张闻天同志讲授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博古同志讲授马列主义基础知识。政治工作课，由罗荣桓和我讲。后来学生队多了，罗瑞卿、刘亚楼都讲过，游击战争的战术课，由刘亚楼、谭家述讲授，材料是毛主席组织部分同志写成的。同时，李富春、张皓、何凯丰等同志也常来兼课或作报告。抗大是在我国历史发生重大转折时期创办的。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形成，全面抗战即将爆发的前夕，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工农红军自然为全国人民所关注。红军能够在十年内战中从小到大，不断发展，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而不溃散，胜利进行举世闻名的长征，靠的是政治优势，是坚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但红军政治工作是什么？还不为人们所知，了解和学习红军政治工作是人们的迫切要求。那时国民党军队感到奇怪，红军枪械破破烂烂，蒋介石说红军是“乌合之众”，可国民党军竟打不赢“乌合之众”。红军的政治工作对他们来说简直是个谜。当时有个传闻，说西安事变后，国民党一位将军在队前讲话说，我们要向红军学习，红军有政治工作，国民党整不垮他们，说红军是“乌合之众”，我们就是要向“乌合之众”学习，把部队训练成“乌合之众”。这近似笑话的传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红军政治工作的威力和影响。同时，由于长期处于战争环境，红军政治工作的作法和经验，尚缺乏系统的总结。而抗大的创办，第一次把红军各方面军及西北红军的干部汇集在一起学习，这就有可能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总结和交流10多年来各地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经验。为此，李富春同志受中央委托来抗大组织编写红军政治工作经验，一方面是为抗大教学之用，另一方面也提供给后方的国民党军队参考。我和李富春、刘亚楼等同志参加了这一工作。我们分工编写，李富春写总论，我写战时政治工作部分。我这部分中比较详细地阐述了战时政治工作的地位作用、任务与内容，及战时对居民和对敌军的政治工作，初步总结了红军战时政治工作的根本经验和基本做法。李富春同志组织我们编写的这些文章，后来上海的一家杂志以《抗战政治工作纲领》为题发表。红大时，曾开设《中国革命基本问题》课，由张闻天讲授。后来抗大也设这门课，但还没有教材和教员授课。4月初，张闻天受中央委托，在抗大组织了一个“研究中国革命运动史委员会”，进行学术研究和编写教材工作。参加的人有刘亚楼、张爱萍、杨兰史、郭全和我。朱德总司令虽没参加这个委员会，但参加研究活动和讲课。我们每人都参加编写工作，并担负讲课任务。大家先找有关的书籍资料阅读，尔后编写，每人写一章，初稿由张闻天同志统一修改。我负责写辛亥革命这一章。在编写过程中，又去听张闻天在第一队（军、师级干部）讲课。听后再对自己的讲课提纲进行修改和加工。这样现炒现卖担负起了这门课的教授任务。除朱总司令到第二队（也是

高干队)讲课外.我和其他同志到团以下干部队或学生队去讲课。抗大讲课与红大不同,既要从纵的方面叙述历史过程,又要总结出经验教训,寓叙述过程中解决理论问题,要求更有理论性和系统性。这对自己来说,也是一次学习过程,从理论上提高了一步。我们讲完课后,把讲稿再作修改、整理,交郭全编纂,或补充资料,或文字修饰、加工,使其上下连贯,最后送张闻天同志审阅定稿。这就是1938年出版、铅印成32开本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该书没有署名。其实,是张闻天同志主持编写的,主要是张闻天同志的功绩,我们只不过是“跑龙套”而已。该书可以说是我党研究革命史、党史的最早著作之一,1987年在北京再版。到1937年下半年,许多进步理论家从国统区来到延安,如范文澜、何干之、艾思奇、张庆孚、杨宪吾、王学文、王思华、任白戈、徐懋庸等,他们对历史和政治理论有专门的研究。此后,抗大的政治理论课就由他们讲了。红大时,我兼党总支书记,但主要任务还是学习,可抗大的情况不同了,随着教学机构的日臻完善,教学工作步入正轨,需要以全部精力投入到教学的组织领导工作,同时还要兼两门课,既当领导,又当教员,工作是紧张而忙碌的。那时没秘书,自己干,好在年轻,精力充沛,备课写教案,看书学习,每天熬到很晚才休息,早晨爬起出早操。这是我工作最忙的时期之一。

“ 我们的伟大事业 ”

“七七”事变后，延安，这个革命圣地成为全国抗日的中心。在国家危亡之际，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冲破重重阻挠，从祖国四面八方奔向延安抗大。1937年8月1日，抗大第三期开学。全校学员1200多人，分为三个大队。第一、二大队主要是红军干部，第三大队为各地来的知识青年。“七七”事变后，林彪离开学校上前线，但仍挂校长职，傅钟也离校上前方，我任政治部主任，胡耀邦为党总支部书记，后为政治部副主任。另外，中央从西安调罗瑞卿到抗大任教育长，我俩一起管理学校，遇有重大事情则请示毛主席。因那时，红大、抗大均无校党委，都直接由毛主席管。随着新学员的不断增加，加上学校要让出一部分校舍作为陕北公学校舍，学校校舍越来越紧张，我们就报告毛主席，毛主席说自力更生，自己动手打窑洞。延安有个好条件，用镢头挖个窟窿，就能住人，冬暖夏凉。于是，学校号召全校教师、学员，发扬抗大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自己动手挖窑洞。大家积极响应学校的号召，立即行动起来。10月22日晨，全校千余师生拿起镢头、铁铲，浩浩荡荡地开赴城北门外凤凰山，在其左边半山腰上，开始挖土窑洞。罗瑞卿和我、刘亚楼、杨至诚（校务部长）等学校领导同志，都参加劳动。毛主席对抗大自己动手建校舍给予了热情鼓励，10月23日为抗大新建校舍题词：听说你们建筑校舍的劳动热情很高，开始表现了成绩，这是很好的。这将给你们一个证明：在共产党与红军面前，一切普通所谓困难是不存在的，最严重的困难也能克服，红军在世界上是无敌的。挖窑洞，对于这些男女青年来说，并不轻松。他们中间有的过去是手不能提，肩不能担的少爷、小姐，从未摸过镐把，但他们有自我改造的决心。开头几天确是不适应，个个汗流浹背，气喘吁吁，有的腰累酸了，手起泡了，可谁都不歇手，没有一个叫苦的。工地上开展了劳动竞赛，大家劳动热情十分高涨。当时有几句最生动的口号，成为工作的尺度：两个星期，完成150个窑洞！每5个人完成一个窑洞！每个人都要争取“坐飞机”！创造大批建设新校舍的斯坦哈诺夫（苏联劳动突击手）！教员和学员们像上战场一样，你追我赶，有的带病出工，轻伤不下“火线”，每天争先上工，推迟下工，下雨下雪坚持作业，星期日或晚上也不休息。哪个班完成了任务，就得到了“坐飞机”的光荣，而完不成任务的形象则是一个慢慢爬行的“乌龟”。由凯丰作词，吕骥作曲的抗大校歌等抗战歌曲响彻山岗，学员们还用自己编的歌词，配上熟悉的小调，边劳动边唱起来：手拿着镢和镐呀！暖呀！手拿着铲和镐呀！暖呀！革命的战士，不怕那苦和劳呀！为了咱们的学习呀！大家来挖窑洞呀！呀唉呀暖唉暖！整个工地上，歌声嘹亮，热气腾腾。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路过凤凰山下时，看到这一动人情景，很是高兴。毛主席赞扬说：“你不要小看挖窑洞，这是挖开知识分子同工农隔开的一堵墙啊！”这就是进抗大的第一课——劳动。经过半个月的突击劳动，我们修马路3000米，新挖窑洞175个（超额25个）。整齐排列在半山坡上的土窑洞，气势不凡，夜晚窑洞透出的层层灯光给延安古城增添了光彩。学员们把这山峦托起的窑洞，比作是灯市重叠的香港和城堡森严的马德里，自豪地说，我们的窑洞大学开学了。11月14日下午，学校举行新校舍落成的盛大典礼。会场上布满了彩联、祝词和小彩旗。毛主席手书的大字“我们的伟大事业”高悬在会场的横额上。各处赠送的慰劳品、照片放满了会场的每个角落。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出席了大会。毛主席在讲话中，对抗大的建校劳动给予高度评价和赞扬，他说：“在这次伟大

事业中获得成功的原因.....就是能够克服困难与联系群众.....如能如此，可以战胜一切.....你们现在已经有克服困难与联系群众的精神，只要在这个基础上，经过你们的天才，把它继续发扬与发挥起来，战胜日寇，驱逐日本出中国，是完全可能的。”会上，我作了挖窑洞的总结讲话。抗大校风是毛主席亲自倡导的。那时1937年4月的一天，林彪从毛主席那里回来，给了我毛主席亲笔写下的8个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我让政治部的同志用红布把这8个字放大剪出来，贴在校门口。从此，“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就成为著名的抗大作风，成为优良传统，一直到现在我们军队院校还是把这8个字作为校风。那时，延安的物质生活是很苦的，开始还有一些大米吃，后来都是吃小米。每天的菜金只几分钱，吃的是小米饭，老南瓜，土豆白菜。没有饭堂，一个班一盆菜，大家在门口围着吃。也没有专门教室，好在上课大都是以队为单位，每个队的“救亡室”就成为上课的地方。“救亡室”相当于连队俱乐部，不过那时条件差，没有桌椅板凳，大家都是席地而坐，两条腿当课桌作笔记，学的都是在国民党区域大学里学不到的东西。一个窑洞住一个班。土炕上铺着禾草，炕上装备最好的要算罗瑞卿了，因为他从西安来时带了一个褥垫子。那时，学校的各级领导同学员一样，住窑洞，睡禾草，吃一锅饭，同操课，上下打成一片，亲密无间。青年们进抗大一开始就要过军事生活。为了抗日救国，小姐们脱下高跟鞋，换上了草鞋；少爷们脱下西装，换上了军装。大家把红底金字的抗大校徽别在衣领上，扎上皮带，个个精神抖擞，每天都是在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氛围中度过的。早起晚憩，上课下课，军号嘹亮，作息有序。早晨出操站队，动作要快，不能等你照好镜子，擦好雪花膏。夜里紧急集合，摸黑穿衣服。野外爬山，一跑几十里。上军事课，女学员和男学员一样操练，一样打靶、刺杀、投手榴弹。在学习劳动和训练中，青年们脸晒黑了，身体壮了，去掉了娇气，变得坚强了。抗大生活条件虽然艰苦，但大家朝气蓬勃，精神奋发，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操场上，课堂里，一休息就有嘹亮的歌声。每逢上大课或听报告，坐满了学员的露天大操场上，顿时就沸腾起来，学员队之间互相拉歌，歌声此起彼伏，气氛非常热烈。学员中的各方面人才真不少，有时也有人独唱，或说上一段大鼓，唱一段曲子、落子、梆子等。学员队的“救亡室”积极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他们出墙报，教唱革命歌曲，组织文艺晚会，歌咏比赛和体育活动，文体生活很活跃。开音乐会，指挥要穿燕尾服，学员们就找来西装穿上，再找块布挂在身后，衣着虽然可笑，可音乐会还蛮像那么回事。休息时，朱总司令常与学员一起打篮球，大家围观助威，上下亲密无间。朱总司令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女学员背后都亲切地叫他“老外婆”。朱总司令和我与学员打篮球的照片，现陈列在军事博物馆。抗大继承和发扬了我党我军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形成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抗大作风。为了抗日救亡，大家勤奋学习，朝气蓬勃地工作。这段延安学习生活的历史，成为抗大人一生中最难忘的黄金时代。

革命熔炉

抗日烽火在燃烧，大批革命青年像大海的波涛涌进抗大。至抗大第四期时，学校迅猛发展，学员人数已达 5562 人，成为抗大的“黄金时期”。为适应形势的发展，从第五期开始，抗大挺进敌后办学和创办分校，先后发展到 12 个分校。抗大是随着抗战的发展而壮大起来的。抗大，确是越抗越大。在 1939 年抗大成立三周年纪念时，毛主席高度评价了抗大的成就。他说：“抗大是抗日的，抗大的目的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彻底解放中华民族。抗大三年来创造了很多坚强的抗日干部，到前线去，到敌人后方去，打击敌人，消灭敌人。”还说：“抗大为什么全国闻名，在国外也有点名气，就是因为它同所有的抗日军事学校比较起来，是最革命、最进步的……抗大的革命和进步，是因为它的职员、教员和课程是革命的、进步的，没有这两方面的革命性、进步性，抗大绝不能成为一个被国内外革命人民所称赞的学校。”抗大继承了黄埔的精神，但它较之昔日的黄埔，更具革命性、进步性。而抗大之所以成为最革命、最进步的新型学校，正是党中央、毛主席领导的结果。党中央、中央军委把办好抗大作为我党我军建设的“重工业”，对抗大的建设与发展十分重视和关怀，经常对抗大的工作进行检查指导。我军高级干部大都进抗大学习过，而中央负责同志大部分也都到过抗大讲课、作报告。抗大每期开学、毕业典礼和重要集会，在延安的中央领导同志都尽可能参加。毛主席、朱总司令、张闻天、博古、周恩来、刘少奇、王稼祥、李富春、陈云和董老、林老、徐老等，经常到抗大向学员们作讲演，作报告。他们是青年的导师，他们把人类最宝贵的知识财富传授给了青年。抗大是毛主席亲手创办和直接领导下成长、发展起来的。毛主席亲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对抗大领导班子的配备、教员的选调、学校作风建设及课程的设置、教材的组织编写审定都亲自抓。尤其是毛主席亲自为抗大制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这一教育方针，为抗大规定了正确的办学方向，深刻而全面地体现了抗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革命学校的本质特征。毛主席除了对学校建设的重大问题决策外，还经常到抗大讲课作报告。毛主席在抗大第一期讲了《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第二期讲了《矛盾论》、《实践论》；第三期讲了《论持久战》等。这些首先在抗大发表的光辉著作，是毛泽东同志留给抗大的宝贵财富，也是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科书。抗大的广大干部学员把聆听毛主席的讲课引为最大的光荣。毛主席经常来抗大讲课，既不兴师动众，也不戒备森严，带个警卫员就赶来了。有时课后或课间休息，许多学员围着请他题词、签字，每次都是有求必应，不论递来的是笔记本、书籍，还是一张纸片，都能满足学员的要求，有时还写上一两句勉励的话。至今，有的同志还珍藏着毛主席当年赠言的手迹。来抗大学习的知识青年大多出身于非无产阶级家庭，虽然革命热情很高，但缺乏实际斗争经验，也缺乏工农感情，存在不少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为把他们培养成坚定的党的干部，中央军委十分强调抗大“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员的思想”。按照党中央、毛主席的办学思想，我们抗大政治部和各级干部，大力加强学员中的思想政治工作，坚持把改造思想放在首位。通过政治教育和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参加实际斗争和劳动锻炼，接近工农群众，帮助知识青年克服知识分子轻视实践、轻视工农、好高骛远等弱点，使他们感情发生变化，政治上逐渐成熟，开始树立起共产主义世界观。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抗大像一块磨刀石，把那些小资产阶级

意识——感情冲动、粗暴浮躁、没有耐心等等，磨它个精光，把自己变成一把雪亮的利刃，去开创新社会，去打倒日本。

抗大是一座伟大时代的革命熔炉，它把一批批革命青年培养成团结紧张，有组织纪律性，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抗日干部。

抗大每期学习时间不长，但这几个月的学习主活却为青年们奠定了一生革命道路的基础。

大批青年是在抗大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临毕业前，几乎百分之百的党外群众都积极申请入党。在前几期中，知识青年入党人数占青年总数的百分之七十。

每期毕业典礼，我们都唱起抗大校歌，唱毕业歌：

这是时候了，同学们，
该我们走上前线，
我们要去打击侵略者，
怕什么千难万险，
我们的血沸腾了，
不驱日寇不回来相见。
别了，别了，同学们，
我们再见在前线。

我们和学员们一起唱着歌，每个人都很兴奋和激动。我

们送走了一批批抗战干部奔赴战场。毛主席曾在抗大二期学员毕业证书上题词：“勇敢，坚定，沉着。在斗争中学习。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抗战8年，抗大为抗日前线输送了20余万军政干部，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起到了巨大作用。当年的青年学员中许多人现已成为党、国家、军队等各方面的领导人。仅我记得的就有宋平、陈慕华、迟浩田、段君毅、铁瑛、周子健、吴冷西、丁雪松等同志。理论联系实际，是抗大的重要教育原则。我们注重联系革命斗争实际，组织学习革命理论，坚持在斗争中学习，在斗争中提高。抗大第二期成功地开展了对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的批判，提高了广大干部和学员的政治水平与鉴别能力，使之成为一次极为生动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运动。1937年3月底，党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抗大坚决贯彻中央延安会议精神，开展对张国焘错误的批判。由于张国焘在四方面军工作多年，一直挂着马列主义的招牌，所以四方面军的一些干部学员出于对党的朴素感情，对张国焘还存有盲目迷信，把他当成四方面军的化身和代表，对抗大贯彻中央决定，批判张国焘错误的学习产生了反感和不满情绪。在这些同志中，有的甚至走上与党组织对立的悬崖。4月4日，是一个星期天，天气晴朗。学校放假，大多数学员离校外出了。我因有事，留在学校。11时左右，校党总支部书记邓富连急急忙忙跑来告诉我：他刚接到第二队党支部书记、校总支部委员、原四方面军的师级干部谢富治的报告，说原四方面军的一位军职干部学员向他反映，10多个来自四方面军的军、师级学员，由于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满，对批判张国焘的错误不满，在一个原是军长的学员串联下，密谋带上每人的警卫员于当晚午夜举事，拟杀死×××后从北门城边墙脚下的水沟爬出去逃走。他们平日已侦察好了，水沟可同时爬两个人，以避免被门卫和城墙上的哨兵发觉。我听了邓富连同志的报告后，感到事情

严重，自有红军以来，还没有发生这样的事，真是破天荒了！我让邓富连留下继续了解情况，观察动静，自己立即去找刘亚楼、傅钟等领导人。跑了几处，都没有找到，于是，我只好去找校长林彪。估计他在毛主席处开会，毛主席住在凤凰山下窑洞里，离学校不远，过一条街便是，我即到那里找到了林彪，向他报告了此事。他让我先回学校，不动声色，注意了解新情况，待他向毛主席报告后，再作处理。我急忙回到学校，好在时间还来得及，只要消息没走漏，不至于立即发生什么意外的情况。我先向学校保卫科及身边同志通报了情况，以便有思想准备，以防万一。不久，林彪回来了。他马上召集刘亚楼、傅钟、邓富连、谢富治和我，还有保卫科的同志开会，传达党中央、毛主席的决定，立即将策划事变的主要成员逮捕。下午4时，学校吹紧急集合号，以各学员队为单位集合开会，分别通报此情况和中央的处理决定。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学员主要编在第一、二队，第一队由党支部书记胡耀邦主持，第二队由队长倪志亮主持。政治部主任傅钟和校党总支委员谢富治分别向第一、二队学员宣布中央关于处理密谋事变的决定。宣布前，陕甘宁边区保安处长周兴，已派人把一、二队的教室包围起来。两个队把参加密谋事变的人一一点名叫出来，由保安处人员押走，一共抓了10多人。与此同时，由邓富连带几个人到学员宿舍，收缴了所有的手枪。这场未遂事变，就这样被平息了，使抗大避免了一次可怕的灾难。1937年6月6日，边区苏维埃政府最高法院举行公审大会，对这一拖枪逃跑案件进行了公开审理，董必武为审判长，书记周景宁，陪审员雷经天、周兴等4人。国家检察机关代表傅钟报告了此案件中的主要6人的犯罪行为。6名被告亦直供不讳，承认是一种反革命行为。法院经过审理认为，该6人拖枪逃跑是一种反革命行为，是破坏统一战线的，但念其均参加长期革命斗争，有过光荣的成绩，监禁后认罪态度较好，均有深刻悔悟，这个案件中的主要6人，被分别判处6个月到一年半的徒刑。判处后不久，党中央又决定对这6名参与事变的人“特赦”，予以释放，重新安排工作。党中央这样做，既严肃处理，又宽大对待，化敌我矛盾为人民内部矛盾，不仅对于争取教育这些参与事变的人起了很好的作用，而且对团结教育红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也起了很好的作用。这次事变的揭露和处理，使参与事变的同志受到深刻教育，终于认清了张国焘的丑恶嘴脸，站到了党中央、毛主席一边来，并在以后的斗争中，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他们的贡献。此事变发生后，抗大震动很大，议论纷纷，大家认为这一事变与张国焘坚持错误的顽固态度有关。为了挽救和教育张国焘本人，中央要张国焘给抗大特别是四方面军的学员讲一次话，希望他能作自我批评，启发尚未转过思想弯子的同志认清他的错误，站到中央决定上来。张国焘迫不得已，才答应来校讲话。那天学校在城隍庙门口草坪开大会，张国焘来到会场。张在会上的讲话中，对自己的错误和策划事变的人的罪行一字不提，却哼哼哈哈，不痛不痒地说什么党员要遵守纪律，有意见可以向中央提，中央不能解决，可向共产国际提……张国焘来校讲话更引起了大家的不满和愤怒。针对这种情况，学校领导和政治部十分强调批判张国焘错误，要同四方面军干部严格区分开，坚持从团结教育的目的出发，在认真学习中央决定和有关文件基础上，引导大家紧密联系张国焘右倾逃跑和分裂活动，进行回忆对比，分析认识张国焘错误的严重性质和危害。不管哪方面军的同志，大家敞开思想，各抒己见，摆事实，讲道理，反复讨论，进行正面教育，使大家从思想上统一认识，增强了革命团结。1938年4月，当张国焘逃离边区，投

敌叛变时，只落得孤家寡人，连一兵一卒也没能带走。后来张国焘在他的回忆录中，对抗大那次思想教育仍怀恨在心，竟诬蔑说：“罗瑞卿、莫文骅等率领着一群斗争打手，分组或个别实行向四方面军干部展开斗争”，并诬蔑在抗大的原四方面军的领导干部傅钟和王维舟拥护党中央是错误的。这也从反面说明抗大开展对张国焘错误的批判是非常成功的。

红军婚恋

1935年11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瓦窑堡，走完了千难万险的二万五千里征途，结束了整整一年的颠沛流离。红军到了陕北有了落脚点，从此有了革命的根据地，有了自己的家。队伍到了陕北安顿下来，形势的发展也暂时出现了相对平静的局面。红军到了家，干部们何尝不想有个家呢！在中央苏区时，由于战事频仍，无暇顾及个人的婚事，如今不少干部已到了30岁左右的年龄了，尚未成家，一些同志便开始考虑解决个人的婚事了。一段时间内瓦窑堡出现了结婚热。刘少奇、董必武、周昆、宋任穷、刘道生、王智涛等同志都是在瓦窑堡成的家。我们红军学校的教员和干事也有在瓦窑堡结婚的。红军干部主要找红军女干部或地方机关的女同志。那时，部队都在前方，瓦窑堡主要是驻中央机关和红军学校，人口少，女同志更少。这对红军婚恋客观上是个限制，因此，有的人找到了，而多数红军干部的婚姻问题还没能解决。过去在中央苏区时，苏维埃政府的法定婚龄是男18岁女16岁，到了陕北，也是沿用这个规定。有位干部违反规定，与一位15岁的少女结婚，受到了处分。当时我25岁，也有人给我介绍，因地方女同志不多，部队女同志年龄较大，不大合适，加之工作紧张，想多学些知识，所以，自己对这个问题还没有更多的考虑。1936年底，中央机关和红军大学都搬到了延安，罗荣桓、谭政等同志先后在延安结了婚，当时也主要是红军找红军。解决红军干部的婚姻问题也为领导上所关心，罗荣桓同志曾找女同志谈话，为部属牵线搭桥做工作。那时，延安找对象也很困难，就与延安河防警备司令杨至诚联系，因为他那里有个女生队（四方面军女干部），杨司令也是热心肠，他用汽车送来了10多名女同志来延安见面，后来，都与老干部结婚了。1937年由于抗战形势的发展，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奔赴延安，大批男女青年涌入延安，给延安古城带来了生气，延安一下子活跃起来、年轻起来。女同志多了，婚恋情况也多起来了，不少同志纷纷办起了自己的“终生大事”。不过，这些久经沙场的红军将士，办起自己的“终生大事”并不浪漫，有的仍然是军人的性格和作风。战场上林彪作为一名战将肯动脑子打仗还是很有办法的，可在“情场”上却显得有点“木”。别人给林彪介绍了一名抗大女学员，见面前介绍人没跟女方讲明，只是将女孩子带到林彪处就离开了。女孩子尚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只当是林校长找她有事，静静地坐在那儿等着校长说些什么。可等了一会儿，林也没说话，两个人尴尬地坐着，林彪突然说话了，当头一句就是“我们结婚吧？”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的女学员顿时愣住了，当她明白过来确是林校长向她求爱时，“哇”的一声，哭着推门而出，边跑边嚷：“我不干！我不干！”跑掉了。事后，我们开林彪的玩笑，埋怨他太直太急：“情场不比战场，哪能直来直去，猛打猛冲，也要讲点战略战术呀，结婚的话可以以后再说嘛”。可林彪有他的道理：“这话反正早晚都得说，晚说不如早说”。当时抗大学员每期基本上是6个月左右毕业，学习操课还是比较紧张的，学员学习期间谈恋爱，势必影响学习。一次，我去毛主席处汇报工作，顺便提出了这个情况，我说：“主席呀，女学生一来，谈对象的情况多了，学习期间谈恋爱影响学习呀。”主席问：“怎么办呀？”我说：“学习期间不能谈恋爱，不能结婚，过半年毕业再谈”。主席马上同意：“好，你回去下个通知，规定一下，学员学习期间不准谈恋爱，不准结婚。”之后，抗大政治部下了通知，规定学员学习期间不准谈恋爱、结婚。不久，一名抗大校领导干部没有报告，与女学员结婚了。这事主席知道了，一纸手令下来，

这位领导干部被撤了职，降一级使用。我接到手令后，考虑事情已经发生了，批评一下就行了。于是我与林彪商量后，给主席写了一个说情报告，请主席“收回成命”。毛主席住处离我很近，他接到报告后，把我叫去了。一进屋，主席迎面就是一通批：“你这个莫文骅，规定学习期间不准谈恋爱、结婚的是你，现在说情的又是你，出尔反尔，怎么搞的嘛？”我一听，自知理亏，赶紧作了检讨，表示回去按主席手令执行。后来抗大发生了黄克功事件，我就不敢再保了。黄克功是抗大三期六队队长，他很小就参加红军，在长征中立过大功，当过师宣传科长和团政委，在抗大学习后留校任职。他自恃年轻有为，立过战功，比较骄横。他与山西大同来陕北公学学习的女学员刘茜谈恋爱，关系也明确了，可后来刘茜又不同意了。1937年9月底的一天傍晚，黄克功约刘茜到延河边上谈话，谈来谈去谈不拢，黄竟残忍地开枪把刘茜打死。“这是苏区中从未曾见过”的事件，一下轰动了延安城，舆论哗然，群众反映强烈，要求严惩。尤其是女学员们非常气愤，“无不咬牙切齿，痛斥这种行为是惨无人道的，一致要求法庭实行枪决，以严肃革命纪纲”。但也有不少同志，认为黄克功同志是有功之臣，年纪还轻，应该给他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黄克功自知有罪，写报告给毛主席，请求减刑，让他到前线杀日本鬼子，立功赎罪。教育长罗瑞卿同志念及黄克功出身贫苦，工作有才干，很能打仗，又年轻，曾去找主席说情，被批驳而回。时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的雷经天同志，也写了报告给毛主席，提出减刑意见。毛主席不同意，毛主席对雷经天还比较客气，亲自给他写了信，指出：“当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到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自己的行为决定的”。10月11日边区高等法院举行公审大会，审判长雷经天宣读了毛主席的信，并宣判将黄克功执行枪决。宣判时，全场鸦雀无声，当宣判结果时，会场上出现了唏嘘之声，一些女学生反而伤心落泪了，有的竟失声痛哭。此时，人们的心情是很矛盾的，对黄克功的罪行，非常气愤，对共产党执法严明的公正判决感到满意，但又为处决这样一位有着艰苦奋斗光荣历史的红军干部而感到惋惜。黄克功事件后，毛主席还特地到抗大作了一次“革命与恋爱问题”的讲话，提出了婚恋要遵守的三条原则，即“革命的原则，不妨碍工作学习的原则和自愿的原则”。随着女青年学生来延安日渐增多，恋爱结婚的情况也多起来了，陕北公学等单位对此并不限制，我们抗大也挡不住了。我们按照毛主席关于婚恋问题的三条原则，引导青年学员严肃地、正确地对待恋爱、婚姻、家庭问题，培养和树立无产阶级的思想与情操。抗大三期临毕业前，我和女生队学员杨枫同志认识了。杨枫是河南鄆师人，来抗大前在北平上学，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底转党，政治可靠，年轻活泼，是女生队党支部的宣传委员。我俩经过两个多月的相互了解，于1938年1月16日在延安结婚。结婚那天，我借了17块大洋，请抗大的主要领导干部和双方的好友，热热闹闹地聚在一起吃了一顿便饭。时正严冬，我们没有棉被，我的一床旧毛毯是我们新家的唯一家当。在那个战争年代，红军结婚差不多都是这么简单。记得毛主席结婚也是请人吃顿便饭而已。那是1939年夏的一天，主席秘书叶子龙同志打电话给我说，主席请你中午12点来吃饭，我问吃什么饭呀？他说，你来吧，来就知道了。主席请客还能不去。我到了凤凰山脚下主席的住处，窑洞外面摆了三桌，桌上放着很普通的几个菜，一盆大米饭，没有酒，也没有凳子，大家都站着吃饭。请来的客人主要是延安文化界的人士，我很纳闷，便问身边的同志：“今天吃的是什么饭呀？”

旁边的人笑了：“你真傻，今天是主席和江青结婚呀！你还不知道？！”“啊！是婚宴，没人告诉我呀。”窑洞里边还有一桌，主席始终没有出来，只看见江青到外面转了转。婚宴没什么仪式，大家自己打饭吃，吃完就走，也不辞行。那时，不少新婚的年轻人没有房子住，延安腾出了十几孔窑洞作“青年宿舍”，有点像现在的公寓吧，不过，屋里只有一张床，被褥得自己带，也不开饭，住一次交5毛钱。每到周六，小俩口背着被褥来住一晚上，第二天又背上行装回到各自的战斗岗位。延安结伴，风雨同行。1989年，全国妇联组织了全国50对金婚佳侣评选活动，我和杨枫入选，并获双鹤纪念杯。我写诗一首，赠杨枫：

战火纷飞万事艰，狂飚险恶互相关。
隔地各尝千辛苦，同居共御五更寒。
儿女强随军长大，孙辈共享国昌繁。
抚摩古铜交颈鹤，功业家务两求全。

第七章 留守延安

“边区靠留守兵团吃饭”

正当抗大迎着抗日烽火，越抗越大的时候，我于1938年2月，被调任为八路军后方政治部主任，接替谭政同志的工作。我在抗大的工作则由张际春同志接任。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四军。1937年8月，八路军主力在朱德、彭德怀正副总司令率领下，挺进华北抗日前线。同时留下了一部分留守部队，保卫陕甘宁边区。

其实，在边区留不留兵的问题上，开始是有争论的。有的人认为，统一战线了，国共合作抗日，陕甘宁边区没有必要再留部队，主张红军全部过河抗日，但毛主席认为，蒋介石是否真诚抗日，尚不可靠，我们不能麻痹大意。在洛川会议上，经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在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的同时，留下少量部队以保卫陕甘宁边区和党中央的安全。

当时，后方留守部队是由八路军3个主力师直属营和原陕甘宁边区地方部队，以及第129师第385旅旅直大部和第770团，第120师第359旅第718团等部队编成，共9000余人。留守部队均是来自各个根据地的老部队，部队军政素质较好，战斗力较强。干部也是老干部，绝大多数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锻炼，一部分是陕北红军，都有较丰富的斗争经验。为加强后方留守部队的领导和指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了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以肖劲光为主任，统一指挥各留守部队。各留守部队的政治工作由八路军后方政治部领导。这两个机关都设在延安北门外山腰土窑洞里，同隶属于中央军委领导。肖劲光同志是我的老战友，在长征途中，我们一起在上级干部队共事。这次，我们又一起合作共事，他仍然管军事方面的工作，我管政治方面的工作，相互之间配合还是比较好的。我到八路军后方政治部时，留守部队已进行了改编，整个部队已扩大至1.5万余人。除385旅旅部及770团番号不变外，留守后方的各独立营统一改编为警备团。改编后，各留守部队及领导人为：385旅：旅长王宏坤，政委王维舟，参谋长耿飏，政治部主任方强，副主任谢扶民第770团：团长张才干，政委肖元礼，副团长胡奇才警备第1团：团长贺晋年，政委钟汉华，副团长李祥，政治处主任李志民警备第2团：团长周球保，政委甘渭汉，参谋长和随书

警备第3团：团长阎红彦，政委杜平

警备第4团：团长陈先瑞，政委罗志敏，副团长刘国

祯

警备第5团：团长白志文，政委李宗贵

警备第6团：团长王兆相，政委张达志

警备第7团：团长尹国赤，政委周芝光，政治处主任

孙文彩

警备第8团：团长文年生，政委帅荣，副团长贺庆积，

参谋长欧阳家祥，政治处主任曾家庆

另，编有骑兵营（1938年3月扩编为骑兵团，团长孔令甫，政委马泽迎）和酃甘独立营（1939年10月与军委炮兵团合编为特务团，团长刘国祯，政委袁光）。1938年1月成立绥德警备司令部：司令员陈奇涵，政委郭洪涛。1939年秋，八路军后方留守处正式改称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对外仍称后方

留守处)。以原后方留守处为兵团司令部,原八路军后方政治部为兵团政治部。肖劲光任留守兵团司令员,我任兵团政治部主任,我俩都兼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委员。曹里怀任参谋长。1939年10月,359旅由前方回师绥德地区,归留守兵团代管。旅长兼政委王震,政治部主任袁任远(后为王恩茂)。到1941年底,留守兵团所属部队(含代管),计3个旅部、20个团和10个独立营,总兵力已达3.1万余人,成为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坚强的人民武装力量。兵团政治部开始只有组织、宣传两科,4个干事。1939年科改为部,设巡视团。1940年增设民运部。1941年设联络部。当时各部的领导是:组织部长吴光远,宣传部长李兆炳,保卫部长丁荣昌,民运部长李芳远(后为马玉章),联络部长徐彬如,总务处长沈新发,军法处长莫文骅兼,副处长沈新发兼。各部下面是科,宣传部管一个报社,巡视团长由保卫部长兼,部队艺术学校由政治部管。政治部干部有四五十人,另有一个警卫排。陕甘宁边区共辖23县,人口150万,地理位置较偏僻,交通不便,是敌人进攻的薄弱环节。但其东面,隔河相对有从华北沿平绥线进攻的日本侵略者,虎视眈眈,多次举兵进犯,企图突破我黄河防线,并多次对河西城镇和延安进行轰炸或空袭,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损失;其南、西、北三面,则受到蒋介石从抗日前线调回的胡宗南30万大军和马家回军重兵包围,初则进行侵扰蚕食,继则制造军事摩擦事件,并勾结边区内残存的土匪进行骚扰破坏,后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中,有两次把军事进攻矛头重点指向陕甘宁边区。与此同时,国民党还对边区实施严密封锁,妄图从经济上扼杀边区。后来斗争的实践证明了毛主席坚持留下少量部队保卫陕甘宁边区的意见是非常正确的。中央军委根据边区所处的地位和形势,给留守兵团正式下达的任务是:保卫边区,保卫党中央,固守千里河防,随时准备抗击东面入侵的日军;严阵以待,对付南、西、北三面的国民党重兵包围,反摩擦斗争,团结、争取友军,共同抗日;肃清区内残存的40余股土匪,安定人民生活;加强军政训练,提高部队战斗力和积蓄干部,巩固与扩大留守部队,把留守兵团建设成为正规化、有较强战斗力的部队。毛主席对留守兵团是十分信赖的。当时,王明搞右倾机会主义,主张把党中央从延安搬到国民党统治区武汉去。毛主席坚决反对,他说:“要去你们去,我带留守兵团坐镇清凉山。若党中央搬到武汉,国民党派几个卫兵守住门口,不让你们出来,看你怎么办?”毛主席还打比喻说:“鸟有巢,毛毛有摇篮,革命要有根据地。后边有个‘家’,开出去的部队就有回旋余地。”毛主席曾多次说过:“我们在边区靠什么吃饭?就是靠留守兵团吃饭”。这是党中央、毛主席对留守兵团的重托和希望。毛主席对留守兵团非常关怀和重视,经常过问兵团的工作,亲自参加兵团的一些重要会议,帮助解决部队建设上的重大问题。兵团成立之初,毛主席就对兵团的领导干部说,留守部队是根据地赖以存在的必不可少的武装力量,要把留守任务看得同前线抗日救国一样重要。他指示我们,要首先做好干部的工作,使他们明确留在根据地的意义和作用,带好部队,完成党中央赋予的光荣任务。毛主席的关怀和指示,使我们对留守任务明确了方向,树立了信心。边区部队长期守备、生产,任务繁重,生活艰苦,加之部队少,发展慢,在一些同志中存在不安心后方工作,想“打出去”的思想。针对边区守备部队的特点和部队的思想情况,兵团政治部和各级领导适应新的斗争任务的需要,认真做好革命转变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加强了对部队的形势任务教育和党的路线政策教育,使全体指战员认识到建立留守部队是毛主席的英

明决策，保卫边区，保卫党中央的安全是关系到抗战全局的战略任务。通过形势任务教育，大家明确了肩负的责任，增强了使命感，正确处理革命前途与个人前途的关系，树立起像毛主席对留守部队干部讲的“死在延安，埋在清凉山”那样的决心，长期守备，安心于留守兵团的工作。1942年5月，留守兵团并入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司令部。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留守兵团部队在毛主席、中央军委的领导和关怀下，在边区政府和人民的支援下，不断发展壮大起来，胜利地进行了政治、军事和经济的斗争，多次打退了国民党右派掀起的反共高潮和军事摩擦，英勇地保卫了全国抗日战争指导中心的安全，完成了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西北，保卫党中央的光荣历史任务，为推进抗日战争胜利的进程，发挥了巨大的作用。5年来，留守兵团部队培养选拔的干部，除满足兵团本身的发展需要外，还向前方兄弟部队输送了团以下干部1530人。到抗战后期，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组织留守兵团部分部队及驻陕甘宁边区其他部队，共20多个主力团，并抽调大批干部，开赴前线。先后有王震、王首道同志率领的

南下支队第一、第二梯队开赴华中、华南。有张才干、陈先瑞分别领导组建的两个支队，参加王树声、戴季英同志率领的豫西纵队，开赴豫西，有文年生为司令员、雷经天为政委、我为副政委的南下支队，原拟进至广东北江一带，后改到豫北活动。还有385旅（欠770团）、独立第1旅、抗大总校及七分校等开赴晋西北和华北，骑兵旅开赴绥远大青山等。这些部队奔赴抗日前线，表明留守兵团及驻陕甘宁边区部队胜利地完成了党中央赋予的储备反攻力量的光荣使命。

清匪御敌团结抗战

抗战之初，陕甘宁边区匪患严重，土匪四处窜扰，奸淫掳掠，残害人民。据统计，边区境内共有惯匪 40 余股，4000 多人，2000 多支枪，社会环境很不安定。1937 年 5 月，在甘泉县劳山脚下的公路转弯处，曾发生上匪伏击前往西安同国民党谈判的周恩来副主席和张云逸局长一行的事件。周副主席的随身秘书和护送卫队数人牺牲，幸军委闻讯后派警卫团及时赶到救援，周副主席和张云逸局长才脱险。这是一股被国民党右派收买的“政治土匪”所为，其头子是东北军一个少将旅级军官。像这样有国民党顽固派操纵指使背景的“政治土匪”，除抢劫钱财外，还常以破坏我党政机关，刺杀我党政领导人和军队人员为目标，给边区的危害尤烈。后期随抗战形势的发展变化，这些“政治土匪”实际上成为国民党制造摩擦的工具。为尽快肃清匪患，除暴安民，1937 年底，留守部队曾集中 2000 多兵力，到匪患较严重的三边等地区进行军事“围剿”。1938 年 2 月以后，我驻各地的警备部队，在地方群众武装的紧密配合下，采取政治瓦解与武力清剿相结合的办法，运用灵活机动的战术，对大小股匪，全面进攻，穷追猛打，堵截合围。部队在山高沟深、人烟稀少的地区剿匪，环境很苦。尤其是地接塞外沙漠的三边一带，遇到大风天，风沙弥漫，天昏地暗，砂石打到头上和脸上，火辣辣的痛。经过政治教育和学习的广大指战员，斗志昂扬，克服种种困难，翻山越岭，爬沟涉壑，连续作战。当地的群众和地方武装自卫军，积极配合，发现匪迹，及时报告。在剿匪过程中，我们大力开展政治攻势，宣传我党的剿匪政策和我们清匪的决心，做到标语上山，传单入窑洞，分化瓦解胁从人员。有些地方政府采取了改善人民生活，解决群众温饱问题的措施，使得一部分因生活所迫挺而走险的普通散匪改邪归正，断绝土匪生存的社会条件。对一些明知有其政治背景，与国民党军队或政权有密切关系的政治土匪，如盘踞陇东一带的赵老五，盘踞三边一带的张廷芝，盘踞邯甘地区的夏老么等，我们则采取“先礼后兵”的办法，致电其后台老板，揭露这些土匪祸害群众的罪行。要求给予配合清剿，然后进行军事清剿。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匪患基本肃清。绝大部分的股匪被彻底歼灭，有少部分被击溃后逃离边区，共生俘匪徒近千人，缴获大批枪支子弹。对那些被捕获的罪大恶极的匪首，一般由当地革命政府公审后予以镇压。那个制造劳山血案的匪首，于 1938 年底带一伙匪徒窜到一个叫苏凹的村子里，逼着村长给他们搞饭吃。而村长富有对敌斗争经验，当他发觉这伙歹徒来意不善。就装作乐意效劳的样子，借故出去打酒，到村头我们一个交通站报告了情况。部队及时赶到后，将这伙匪徒及那个罪恶累累的匪首击毙在村长家的窑洞里。边区的东面是黄河天险，留守兵团担负着千里河防，随时准备抗击日军西渡的艰巨任务。河防防线，北起宋家川，南至宜川、延川，蜿蜒千里。这一防线能否巩固，不仅关系到边区和党中央的安全，而且关系到边区与各抗日根据地的联系。为完成河防守备任务，部队进行了形势教育和抗日教育，使大家认清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侵略野心和暴行，激发对侵略者的仇恨，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心。根据新的任务和作战特点，当时留守部队的训练，突出了游击战、夜战、近战、河川战斗及河防守备作战的训练。兵团政治部在政治工作指导上也强调总结研究不同特点，不同作战样式的战时政治工作，各级领导干部都加强了战时政治工作研究。我曾写过《战时政治工作概要》和《夜间战斗政治工作》。1938 年春，由于蒋介石实行片面抗战和单纯防御的战略方针，日军占领了我华北、华中的大片国土后，分

兵几路直逼黄河东岸，并抢占了河东的军渡、马头渡等重要渡口，炮击宋家川，轰炸凉水岩等。这时，河防形势紧张起来。后方留守处和后方政治部立即对所属部队进行保卫河防的总动员，命令河防部队及地方武装力量，立即行动起来，紧急备战，随时准备迎击敌人。我们在兵力上作了部署，深入进行政治动员，抓紧进行战前练兵和构筑防御工事。由于赶修好了一道相当坚固的纵深防御工事，当敌人的飞机、大炮轰击我河西阵地时，大大减少了部队的伤亡。同年3月中旬，有2000多从晋西北兴县方向来的日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企图渡过黄河，进犯我河西阵地。我警备6团指战员执行积极防御的方针，沉着应战，采取“半渡而击”的战术，先选择河岸的有利地形隐蔽，待日军密集拥下河岸开始渡河，进入我火力范围时，便集中机枪火力，突然一齐开火，大量杀伤敌人，把敌人打得晕头转向，慌忙掉头逃窜。这时，我事先准备好的一支精锐部队，乘势渡过河去，主动从侧背袭击敌人，敌人孤军深入，两面受击，虽作挤死顽抗，但抵挡不住我军勇猛冲杀，仓皇向兴县方向逃去。是役毙伤敌近两百人，其中击毙40余人。我军仅伤亡6人。同年9月和翌年6月，日军又多次进犯我宋家川对面的军渡、碛口一带渡口和柳林地区，因这些地方有公路，交通较为方便，日军在飞机、坦克的掩护配合下，沿着公路，步步推进。我河防部队保持高度警惕，沉着、镇静地昼夜坚守阵地，并派出精锐部队，渡过黄河，袭敌侧背，配合正面防御部队，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进犯，打得日军丢盔弃甲，狼狈溃逃。有的葬身于黄河；有的被我军和友军活捉。我军还缴获一大批军械和粮秣。1939年6月前往河防部队慰问演出的“烽火剧团”的一些文艺战士，也跟着部队渡河英勇追击日军，涌现许多动人事迹。1939年10月初，120师第359旅奉命调回陕北，加强了河防守备力量。至1940年下半年，该师主力又奉命调回晋西北根据地，严重打击进犯日军，加上华北各抗日根据地不断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尤其是八路军发动的“百团大战”，重创敌伪力量。这时，日军对河防的进犯才有所收敛。实现国共合作抗日，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亲英美派，虽然继续抗日，但表现出很大的动摇性，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尤其是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国民党政策的重点从对外转向对内，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企图在抗日战争中削弱甚至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人民军队。他们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采取各种阴谋手段，围困和封锁抗日根据地，而且不惜使用武力，掀起反共摩擦逆流，连续制造了陕西旬邑事件、山东博山惨案、河北深县惨案、湖南平江惨案和河南确山惨案等。在陕甘宁边区，也先后发生了陇东、关中、绥德、三边等地的几次大的军事摩擦事件。他们还增派军队围困和进攻陕甘宁边区，甚至准备袭击延安。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党纠正和批判了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错误，坚持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和“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顽固势力”的正确方针和策略，以维护团结抗日的政治局面，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中央对统一战线工作很重视，成立了“统一战线委员会”，王明为主任，我是委员之一。我们曾几次到王明家去开会。那时，六届六中全会王明的右倾错误受到批判后，他回到延安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长，他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已经不灵了，他也不再吹了。王明这个人口才不错，爱夸夸其谈，爱吹吹乎乎，有时也爱开个玩笑。他曾对我们说：“你们这些将军，将来革命胜利了，每

人都分一套别墅”，“要像苏联红军那样，一是拥护党，再就是打仗。”意思是军队只管打仗，别的可以不管了。当时我感觉到我们八路军和苏联红军不完全一样。我们除了打仗，还做群众工作，组织政权，筹款搞生产等。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是全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的指导中心，是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总后方。8年抗战中，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高潮时，大都把进攻的矛头指向陕甘宁边区，在边区周围不断制造军事摩擦事件。当时在陕甘宁边区23个县中，有的县城是国民党的政权，但驻军是我们的；有的城镇是国民党的，而周围的乡村则是我们的。这些地方形成两重政权，相互交错，斗争尖锐，摩擦与反摩擦的斗争经常发生。我们边区留守部队的反摩擦斗争，是在党中央毛主席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毛主席对留守兵团遇到的这方面问题，非常关心，都亲自作出决策和指导，亲自帮助我们修改写给国民党军政要员的电文，领导我们对国民党顽固派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反摩擦斗争。团结抗日友军和反摩擦斗争是贯穿于整个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大任务，既是政治斗争，也是军事斗争，是我军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新课题。为了做好这一工作，留守兵团政治部和各级领导对部队深入进行统一战线和反摩擦斗争教育，认真学习和贯彻执行党的有关方针、政策与策略指示，如关于不在友军内部发展我党组织和进行组织活动的指示；关于帮助友军的方针原则的指示；关于团结和保护边区的友军家属的政策；关于优待在反摩擦斗争中被俘的友军官兵的政策；关于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和反对顽固势力的指示；关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指示；关于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策略等。使广大指战员认清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摩擦阴谋和争取广大友军抗日的重大意义，既不能因国民党的反共摩擦活动而放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不因为团结抗日而放松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警惕性。在此同时，我们还加强对部队的无产阶级思想品质教育、革命气节教育、反腐败教育、防奸保密教育等。为了做好友军的工作，我们对周围友军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一般的杂牌军并不愿与我摩擦，愿意与我保持友好关系，如边区北部的邓宝珊将军所部；有的迫于上命，与我有小的摩擦，但主观上不积极，动摇观望，经做争取工作后，可与我谅解与交往；那些封建军阀色彩较浓的实力派是反共反进步的，但由于其内部矛盾重重，为保存实力，一般不愿意与我发生武装冲突，如西北部的马家回军；国民党中央军中的大多数士兵和下级军官，对反共内战是不赞成的，有的上层分子审视当时形势及反共失败教训，认为“反共好，反不了”，一边制造摩擦，一边缺乏信心；真正顽固搞反共摩擦的是少数上层顽固分子和靠摩擦吃饭的地方顽固武装。根据他们的不同政治态度，我们采取了不同的方针政策。对仇视我们，消极抗日，积极搞反共摩擦的国民党顽固派，我们针锋相对，给予无情揭露和坚决斗争。如国民党派到绥德地区的专员何绍南，是一个专门搞反共摩擦的顽固分子，他在任职的两年里，以“确保地方治安”为名，调来400多保安队员，又收买了一批兵痞、匪徒，合编成5个保安队，分驻各县，充当反共摩擦打手，大肆进行反共活动。他指使这些保安队和他们的伪县长、保甲长，公然扣押我方县长，绑架、暗杀我方工作人员，阻挠群众向我出售粮草物资，伪装八路军贩运鸦片，聚敛、贪污白银。1939年5月，曾指使安定县伪县长田杰生率保安队袭击我杨家园子，用机枪扫射、打死打伤我官兵数十人。他甚至纵兵为匪，到处抢劫，破坏社会治安，罪恶累累，群众恨之入骨。开始，我们多次对何绍南进行规劝，他路过延安时，毛主席曾当面进

行批评教育。但他不思悔改，仍旧为非作歹，反共活动日益猖獗，竟组织 13 个保安中队，企图袭击我河防部队。针对这一情况，驻绥德王震同志率领的 359 旅，与他进行了坚决斗争。除了在军事上不给他便宜可占外，还发动强大的政治宣传攻势，召开群众大会，公开揭露他的罪行，打掉他的嚣张气焰。同时，还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和留守处主任肖劲光的名义，致电国民党中央要员，要求逮捕、惩办何绍南。我兵团也派队侦缉他。结果，他在绥德呆不下去，便率保安中队哗变为匪，逃离边区，最后，走投无路，出家当了和尚。对其奉命向我进攻，但主观并不积极，态度犹豫的，我们除进行必要的斗争外，耐心进行团结、争取工作。如 1938 年 7 月上旬驻洛川的新编骑兵第 2 师师长马禄（属马家回军），率 3000 余人进占我梆县南部的一些村镇后，来电要借道延安经绥德去榆林，意在试探我军虚实。肖劲光同志拿着电报向毛主席请示，毛主席指示说：不准他们过延安，这是阴谋。若他们的骑兵到了延安，假说没有粮草，马匹到处乱窜不走，你怎么办？若他们真的去榆林，可经延川、清涧等地。如果他们强行来延安，我们可以打，即使他走延川，我们也要事先作必要布置，让兵团参谋长曹里怀亲自去鄜县组织部队戒备，监督马师行动。并给国民党战区负责人、洛川专员及马禄本人发电报，说马师若强占不退，引起冲突之后果概由马禄负责。我们兵团还派郭化若、袁光同志为代表先后去与马禄谈判，我也负责接待马禄的联络参谋，向他说明不同意他们经延安的意见和严正态度，并送他到鄜县和洛川交界处。后来，马禄见我方态度坚决，义正词严，来信说是“误会”，表示双方要团结，互不侵犯，不上别人的当。又如 1939 年 6 月间，驻榆林地区的国民党团长胡魁生带 1000 多人马到瓦窑堡，并有张廷芝匪部 200 多人同来。当时，我兵力薄弱，没有主力部队。闻讯后，我们一面调警备 4 团作应变准备，一面派安定县县长薛斌同志与胡魁生谈判，经多方争取和教育，不久，胡部撤回榆林，张廷芝匪部也逃往三边。对于与我友好不搞反共摩擦的友军，则真诚相待，增进友谊关系。如驻榆林的国民党某集团军副总司令邓宝珊将军（后改任晋陕绥边区总司令），早就与我党一些主要领导人有过交往。“七七”事变后，抗日态度坚决，对我态度友好，在交通方面给我们很多方便。他数次路过延安时，我方都给予热情欢迎、接待。肖劲光同志亲自陪同，我也主持召开过欢迎大会。毛主席多次亲自接见并宴请他，对他做了大量工作，因而双方始终和睦相处，一致团结抗日。同时，我们还与驻榆林地区的国民党军长高双成部保持友好关系。这样，就大大减轻了边区北面抗日战线力量的内耗，更好地协同抗日。其它地区的国民党军，也有与我们友好的，如驻关中淳耀县小丘地区的国民党中央军一个营，与我关系较好。有一次，在边区与我方发生误会冲突，被我地方武装打死一人。我方除将其厚葬外，立即去函道歉，说明纯系误会。其营长回信表示谅解。后我县负责同志与该营营长会晤，共商如何避免误会、增进友谊。该营始终与我保持友好关系。为了团结友军共同抗日，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反共阴谋，我们有组织、有领导地广泛开展与友军交朋友活动，积累了一些经验，其主要做法：一是主动联系。采取主动通信、派代表、架电话等多种形式。在联系中，善于从扯闲谈、拉家常开始，多谈有关当地的开放交通、采购粮秣等日常生活问题，少谈大的政治道理与党派的问题。联系人员要兵对兵，将对将，职衔相当。要掌握对方的不同特点，如中央军重政治文化水平，喜欢大方，少客气。地方军则重礼节感情，有江湖习气。对回军要尊重其风俗习惯、教规等。通信转送要可靠，

防止被对方特工人员截留。如能通过当地开明绅士、名流学者等与友军联系，则比一开始就直接联系的效果更好。二是酬酢联欢。如对方喜庆大典，送礼贺电，节假日共同举行纪念联欢、文艺演出、运动竞赛、参观、会餐等。还组织共祭黄帝陵活动，1939年清明节，边区组成了高岗为团长，林伯渠为副团长，我为军方代表，张琴秋为妇女代表，齐华为工会代表，艾思奇为文化界代表的代表团，同国民党代表团（团长张继）一起共祭黄帝陵。三是实物馈赠。赠送边区及我军公开出版的书籍刊物、土特产品等。对生活困难的友军赠送蔬菜、食盐、肉类、木炭等生活必需品，调解他们与群众的纠纷等；四是礼遇往来。对过往友军的物资检查，手续简便，态度和好，尽可能给予食宿方便和生活照顾，交通要道设公共休息室。对高级人员适当组织迎送。对做走私生意的友军，在不违禁例的前提下，多给予方便；五是热情照顾其家属。对在我区的友军家属，给予与我军属同等优待，并热情招待探家友军人员；六是双方发生武装冲突时，进行火线喊话，救治对方伤员。如此等等，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除巩固和加深了原来与北线友军的友谊关系外，在西线、南线、陇东、神府等方面都交了一些朋友，有中央军，也有地方部队和马家回军。我方给友军发出的联络信，有三分之二得到回音，他们表示愿友好团结。这样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减少了摩擦，增进了团结，并建立了一些通商贸易关系。在交朋友过程中，我们始终持谦虚而又郑重的态度。不在交友中发展党团组织，不挖墙脚，使对方感到有益无害，没有顾虑，不给破坏者以口实。1941年7月，中央统战部、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向全军转发了《介绍陕甘边区、留守兵团与友军交朋友工作的经验》。在反摩擦斗争中，我们掌握“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做到武装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即以军事力量为后盾，旗帜鲜明，态度坚决，坚持原则，又要注意运用灵活的策略，从抗日大局出发，达到军政全胜。如1939年国民党顽固派在陇东、关中地区多次向我进行有计划的军事进攻，侵占我镇原、宁县等5座县城，围攻我陇东西峰办事处，制造了一起又一起血案。特别是1939年5月残忍地杀害我设在关中地区旬邑县城南边土桥镇残废院里的残废军人20多人。真是伤天害理，我军极为愤慨，纷纷要求增兵还击，夺回失地。但我们采取克制态度，冷静地分析当时局势，从抗日大局出发，尽力避免武装冲突的扩大，对内说服部队采取克制态度，等待上级妥善解决。对外向国民党最高当局发电报，指出边区所属23县是国民党最高当局所划定，我们并未越雷池一步，其武装侵占实为非礼，说明我方在被侵占地区不增兵、不扩大事态的严正立场。同时几次通电全国，揭露顽固派在陕甘宁边区的种种倒行逆施，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这样，迫使顽固派的反共摩擦行动不得不有所收敛，派代表与我们谈判，和平解决上述问题，当时，我们若不冷静，增兵进行武力还击，那就可能大打起来，一大打就不可收拾，不仅给顽固派以借口，而且削弱河防抗日力量，使整个边区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毛主席对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了如指掌，他曾对我们这样说，蒋介石既承认陕甘宁边区和我军的合法地位，但又搞溶共、限共、灭共；他既搞反共摩擦，又怕受到全国人民的谴责。因此，当他讲我们好话时，就是反共摩擦的开始；但反了一阵未见效后，当他把共产党大骂一顿，就是反共摩擦快收场了。不出毛主席所料，1940年2月，国民党天水行营政治部编印一本《中共不法行为及破坏抗战事实纪要》的小册子，书中颠倒黑白，歪曲事实，胡说共产党挑起摩擦事件，不久，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在我党的反击下，便草草收

场。陕甘宁边区反摩擦斗争，维护了团结抗日局面，提高了我党的政治威望，对我们兵团广大指战员来说，也受到了一次生动而深刻的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思想的教育。

用古田会议决议建设部队

留守兵团部队来自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红 25 军和陕北红军，可以说它是各路红军的一个缩影。由于过去所处的斗争环境及斗争经历不同，各部队在思想作风、管理方法和组织制度等方面并不完全一致，部队的作风纪律、内部团结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如何克服这种散乱状况，把留守兵团建设成有战斗力的正规化部队，这是我们面临的重大任务。党中央毛主席经常听取兵团领导的工作汇报，亲自参加兵团的重要会议，嘱咐我们要按照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搞好内部团结，把部队建设好。由内战到抗战，从阶级斗争到民族斗争，从土地革命到减租减息，从苏维埃政府到边区民主政府，是中国革命的一次伟大的战略转变，党中央及时地提出了建立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然而，在新形势下部队指战员对这一伟大转变的重大意义和全部内容，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认识上并不是很清楚，思想上疑虑很多。不少干部战士认为，我们与国民党蒋介石是冤家对头，打了 10 多年仗，他杀了我们多少人，如今把蒋介石放了，和他搞起统一战线；过去看到国民党青天白日旗就仇恨就打，现在摘掉红五星换成青天白日徽戴在头上，思想上不通，感情上转不过弯来。也有的认为国共合作了，到哪里抗日都是一样，个别战士甚至为此开了小差。加之留守兵团长期担负繁重的守备和生产任务，部队分散，环境艰苦，生活困难，一个时期里出现了少数人员逃亡现象。为适应新时期斗争形势的需要，做好革命转变时期的政治工作，我们采取各种形式，深入进行任务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开始部队教育的重点是抗战教育、统一战线教育和留守兵团任务教育，组织部队学习贯彻《论持久战》和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及兵团政治部编印的《统一战线教程》。这一教育，使大家明确了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必要性、目的、意义、前途及我党一些重大政策的变化，并结合批判王明先是“左”倾关门主义、后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各部队几乎天天讲抗日统一战线，从国内的阶级矛盾讲到民族矛盾；从国民党营垒中的矛盾讲到西安事变；从蒋介石的顽固反共讲到被迫接受我党关于共同抗日的主张；从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作用讲到独立自主的原则；从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讲到其侵略野心和暴行；从抗日战争的形势讲到持久必胜的前途。通过学习，提高广大指战员对党的抗日路线、方针、政策的思想认识，统一了部队的思想。针对留守部队任务重，条件苦，发展慢的特点，我们教育部队摆正个人前途与革命前途的关系，坚定政治方向，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继承和发扬我军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克服困难，担负起保卫边区的重任。为了配合部队的政治思想教育，我们兵团政治部出版油印的《烽火报》，经常刊登有关党的抗日路线、方针、政策，表彰好人好事，并及时报道前线抗日胜利的消息，深受广大指战员的喜爱。同时，成立“烽火”剧社，自编、自演、自己制作乐器，通过形象生动的文娱节目，对指战员进行教育。为广泛开展文娱体育活动，我们在“烽火”剧社基础上，开办了部队艺术学校，我兼任校长，王震之为副校长，肖元礼、刘禄长先后为政治委员。该校设有戏剧、美术、音乐系和普通班。周扬同志对艺术学校很支持，调来许多专业教员任教。冼星海、张庚、吕驥等艺术家也来讲课和指导。该校为部队培养了一批文艺工作骨干，促进部队文娱活动的活跃开展。《义勇军进行曲》和《黄河大合唱》等革命歌声，响彻兵团的各个军营，部队保持了高昂的战斗情绪。在提高对抗日统一战线的思想认识与政治觉悟基础上，开展群众性的积极的反逃亡活动，废除原组

组织“反逃亡十人团”的消极做法。对开小差回来的，不是惩办，而是采取讲清道理热情欢迎的态度，因而部队逃亡现象逐渐减少，至1938年底，有的团连续几个月都未发生过逃亡事件。有一个驻守在甘肃合水、华池一带的连队，该地区比较复杂，生活异常艰苦，时有敌对分子拉拢、勾引，连队逃亡现象严重，连党支部书记也逃跑了。后经过学习，加强其政治思想教育，该连连续16个月没有发生逃亡现象，该连党支部成为一个模范党支部。我调查和总结了该连的经验，写成了《十六个月没有发生逃亡的模范支部》一文，刊登在当时党中央内部刊物《共产党人》第6期上。增强内部团结统一，巩固和扩大革命队伍，这是我们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目的之一。当时，全兵团连以上干部1879人中，来自一方面军的占13%，二方面军的占5%，四方面军的占16%，陕北红军及红25军的占33%，地方干部转入军队的占13%，新入伍的知识分子干部占20%。为了搞好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之间、上级与下级之间、干部与战士之间的团结，我们反复讲团结统一的意义，号召外来干部向本地干部学习，本地干部向外来干部学习；知识分子干部向工农干部学习实际工作经验和作战经验，工农干部向知识分子干部学习文化和理论，团结互助，共同进步。我们结合贯彻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用毛主席在六中全会报告中提出的“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党的组织原则教育干部和党员，要求他们自觉遵守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在官兵关系方面，强调干部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下级，关心和尊重士兵，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坚决克服惩办主义和打骂士兵等军阀主义残余影响，加强官兵团结。搞好内部团结，关键是在提拔使用干部上要有正确的政策。我们坚持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对干部一视同仁，公道正派用干部。坚持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坚持搞五湖四海，不搞山头主义的小圈子，特别注意团结红四方面军和陕北红军的干部。兵团至1942年止提拔营以上干部174人中，属原四方面军的有26人，属陕北红军的38人。我们对待干部，既严格要求，又热情关怀，积极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对有错误的干部，既不搞惩办主义，又不作无原则的迁就。对新参加革命的知识青年干部，热忱地给予政治上的信任，工作上的大胆使用，并注意帮助他们在实践斗争中锻炼、提高。当时，新旧干部之间、工农干部与知识青年干部之间、上下级干部之间的关系还是比较融洽的。为了提高兵团干部队伍的政治、军事、文化素质，以适应抗日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完成新时期交予留守兵团的历史任务，我们开展了大规模的干部队伍培养、训练工作。根据中央军委对留守兵团下达的“培养与积蓄干部”的指示，按照毛主席对抗大学员提出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从当时的斗争形势和任务出发，采取了军事、政治、文化训练并重的方针，做到干部的教育训练与部队的政治、军事斗争相结合。在培训组织领导上，层层负责，军政领导一起抓。各团都建立了由团长、政委、副团长、参谋长及各营营长组成的教育委员会，负责培训连以上干部。各营又有营一级干部和各连连长组成的教育小组，负责训练排以上干部。然后再去训练战士。形成一个教育训练网。各政治机关和政工干部具体负责组织领导政治训练、文化训练和安排干部离职学习的工作，并做好培训工作中的政治思想工作。在培训干部工作中，我们首先抓在职干部的政治理论学习，充分利用兵团靠近中央的有利条件，组织干部较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除了学习有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方针、政策外，主要是

学习毛泽东同志当时发表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等主要理论著作。后来还开展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政治经济学》（列昂节夫著）、《中国革命运动史》、《共产主义与党的建设》、《党的策略》等内容。我们根据干部的文化水平和职务分别编组，区别学习内容和重点，提出不同的要求，分级管理指导。一般连排干部，着重学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党的建设和游击战争战略战术问题；营级干部着重学习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联共党史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团级以上干部学好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论、军事理论和战略战术的研究。大家每天挤出两小时进行学习，并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到实际斗争中来。文化水平低，是当时干部学习的一大障碍。据统计，当时兵团排以上干部中，受过中等以上学校教育的占 10%；上过小学的占 28%；未念过书的占 61.5%，有的连队竟找不到笔墨，有的指导员不识字，上课时由文书读一段，指导员解释一段。为此，我们把文化教育列为部队干部训练的重要议事日程。尤其是后方留守部队第一次党代会上，对干部文化教育提出了明确具体的要求。会后，各部队采取分段突击与经常学习相结合的方法，掀起了群众性的学习文化热潮。当时部队学文化热情很高，课余时间，训练间隙，有空就学起来。笔墨纸张缺乏，战士们找来木箱或盛米的斗，内放沙土，沙盘当纸，树枝作笔，练习写字。至 1942 年下半年，抽查部分单位连以上干部，原来约有 67% 是文盲或半文盲，后经过文化学习，已有 31% 能写简单的报告，35% 具有一般的或初步的阅读能力，识字均超过两千。干部坚持在职学习外，还举办训练班或送学校进行培训。兵团一方面抽调干部到学校学习，如送马列学院的有 30 人，送中央党校的 70 人（旅团级），送抗大学习的有 1092 人，还有的送到陕北公学、安吴堡青年训练班等。另一方面兵团自己办学，短期轮训干部，如各团开办教导队，培训班长、老战士，每期一年；各旅开办连排干部轮训班，每期半年，以上两项共培训班、排、连干部 1845 人；兵团开办军政研究班，每期半年到 8 个月，共培训营以上干部 349 人。这些训练班都围绕部队的实际需要，开设军事、政治、文化等课程。兵团办的军政研究班，开设军事和政治课。军事课主要由肖劲光、曹里怀及司令部一些同志讲课，也聘请郭化若同志来讲课；政治课较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联共（布）党史等，主要聘请中央党校的艾思奇、吴亮平、陈唯实、马洪等同志来讲课，毛主席也曾给我们讲课，共办了四期，杨宪吾（学者）、耿飏、张文舟、肖元礼等同志担任过班主任。经过学习，广大干部的军事理论和政治理论水平都有很大提高。毛主席在 1938 年底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就提出了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任务，号召在党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开展一个学习竞赛，看谁学得更多一些，更好一些。1939 年 3 月中央宣传部颁布了《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暂行计划》。1940 年初，中央发出了《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和《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延安党政军干部已建立起学习制度，平均每天学习两小时。中央还决定以 5 月 5 日马克思的生日为学习节，总结学习经验并举行奖励。延安掀起了热烈的学习运动。留守兵团大规模地培训干部正是在这种形势下进行的。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1938 年底，我在后方留守部队第一次党代会的报告中，向部队提出了学习政治、学习军事、学习文化、学习党的领导开展四个学习的号召，并

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学习、进步，真正成为模范的领导者。在延安学习运动中，毛主席既是倡导者，又是学习和实践的典范。1938年2月，毛主席组织了“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研究会”，参加的人有滕代远、罗瑞卿、叶子龙、肖劲光和我等人，学习地点就在毛主席的住处，每周学习讨论一次，晚上七八点开始至深夜11点钟。《战争论》是普鲁士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和军事历史学家克劳塞维茨撰写的经典著作。他运用辩证的方法探讨战争理论问题，得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结论。他的著名论点“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战争的本质。此外，他对战略战术也有精辟的论述，得到了列宁的高度评价。他的军事思想反映了资产阶级初期的进步倾向和革新精神，对世界军事学术的发展具有较大影响。当时《战争论》翻译的是文言本，加之翻译粗劣，晦涩难读。开始只有一本书，大家轮流看。后来由何思敬同志直接从德文原版译出来，译一章，介绍、研究一章，并发了讲义。大家边读边议，讨论一番后，由毛主席作小结发言。记得当时讨论最多、最热烈的是关于集中兵力问题。毛主席在学习讨论这一问题时说：“克劳塞维茨的作战指挥实践不多，但集中兵力问题讲得好，拿破仑用兵重要的一条也是集中兵力。我们讲以多胜少，也是在战术上集中比敌人多5倍到10倍的兵力。当然，这里也有个政治问题。我们是正义战争，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援。凡是非正义的战争就不得不分兵把口”。毛主席还列举秦始皇先后派李信和王翦领兵一胜一败的故事，来说明这个问题。以后毛主席还曾联系中国革命10年内战实际，对军事辩证法问题作过一个报告，可惜没有印发讲稿，我设法向别人要了一份很不完整的记录稿。其报告中很多内容，毛主席已写进1938年发表的《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两篇军事著作里。学习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特别是听了毛主席的辅导，我对军事辩证法和战略问题甚感兴趣，收获很大。有一次，我们学习结束时，已经很晚了，毛主席诙谐他说，人说姓毛的一毛不拔，今天我要拔一毛，请你们吃夜餐，引起一片笑声。大家有了学习收获，又在主席家里聚餐，真是开心。而且吃的是大米，在那时是很不容易的，我们算是双丰收了。1938年4月，毛主席写出了《论持久战》初稿，先打印成册，送一本给我，并附一信，要我提出意见。毛主席在这篇文章中，运用唯物辩证法，全面分析中日战争所处的时代及敌我双方的基本特点，阐明持久战的总方针，批驳了当时党内外存在的“亡国论”和“速胜论”及轻视游击战争的错误思想，不仅指出了必须经过持久抗战才能取得最后胜利的客观根据和前景，而且提出了一整套动员人民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不断削弱敌方优势，生长自己力量，夺取最后胜利的切实可行的办法。我阅读之后深受教育和鼓舞。本想再读，但不久，叶子龙同志来电话，说毛主席准备对初稿进行修改，要我退回初稿，并要我提出修改意见。我即给毛主席写了简单的复信，说此文写得很好，读了两遍，提不出什么修改意见。1939年初，毛主席亲自组织哲学研究会，参加学习的人员有艾思奇、张仲实、和培元、叶子龙、肖劲光和我等。每周一个晚上，在主席家里开会。学习方式由艾思奇写学习提纲，由几位哲学家分头报告一章，然后讨论，大家结合实际，畅所欲言，最后由毛主席讲话。主要是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后来，毛主席写了《辩证唯物主义提纲》，供干部学习。1940年，我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发表《八路军留守兵团在职干部的学习运动》一文，全面总结了兵团部队两年来开展学习运动的情况和成绩，指出这一学习运动“是在不断的遇到困难与克服困难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以领导

机关与领导者自己的学习模范，来推动全体干部的学习情绪，检查工作也把学习运动作为一个标准，现场谈话也把学习运动作为一个内容，而造成紧张的学习的空气”，“由于不断的克服了许多困难，学习运动便顺利开展起来，建立成为一定的制度，并收到了相当的成绩”。经过几年的培养训练，干部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为部队的进一步发展。夺取抗战胜利，迎接新的斗争任务打下了基础。1942年初，正当延安整风开始的时候，谭政同志（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给我转来了一封毛主席的亲笔信：谭政

二同志：

莫文骅

将四军九次大会决议多印数千份，发至留守

部队及晋西北部队，发至连长为止，每人一本，并发一通知，叫他们当作课材加以熟读（各级干部均须熟读）。

毛泽东

1月23日

毛主席这一指示信对留守兵团的建设是非常重要和及时的。古田会议决议是我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规定了我军建设的路线和原则，奠定了我军政治工作的基础。大革命时期，我党不少干部在北伐军中担任各级党代表、政治部主任，做革命军中的政治工作。那时苏联红军的经验也不断地被介绍过来，其军队政治工作也得以传播，比如“政治工作是军队的生命线”的提法，就是出自《苏联红军政治工作》这本书。可见北伐军的政治工作和苏联红军的政治工作，对后来我军政治工作的形成和发展，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由于这些历史的原因，加之王明、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影响和红军各根据地长期分散的历史条件，造成政治工作从指导思想、工作内容到方法作风，还不够统一，有的部队政治工作还比较薄弱。接到毛主席的指示信后，兵团军政委员会立即进行了研究部署。4月6日，肖劲光和我签发训令，安排部队进行为期3个月的教育，各部队掀起了学习和贯彻古田会议决议，深入整风学习的热潮。印一本书，那时可困难了。首先是纸张缺乏，没有纸，我们就自己造。陕甘宁边区的路边、旷野，到处长着一簇簇的马兰草，它的叶子又扁又长，很有韧性，是造纸的好原料。那时印刷设备又少又简陋，铅印本不能满足需要，我们就土法上马，组织人刻蜡版，搞油印。窑洞里，油灯下，文印员们一笔一画，精心地刻印。各部队的运输队员，打着响鞭，吆喝着牲口，把印好的古田会议决议驮运回去，很快就发到各级干部手中。兵团各部队根据干部文化水平和实际斗争经历的不同，分别编成学习小组，由文化程度高、斗争经验丰富的同志作辅导讲解，大家把决议当作教材，熟读牢记，指导工作。同志们用决议条文对照本部队实际，感到毛主席写的这个决议，好象就是针对自己部队写的，既实际又亲切。特别是过去没有见过这个决议的政工干部，更是感到新鲜解渴。这次学习和整顿，重点抓干部，抓领导思想作风的转变。普遍召开了民主大会，由战士提批评意见，帮助领导整风。广大指战员是一起从战争环境里打出来的，同甘苦，共患难，生死相依，阶级感情十分深厚。战士们的意见提得很尖锐，有些话很不好听，但都是从爱护观点出发的，干部们能耐心听取，诚恳接受，虚心检讨，认真改正。贯彻落实毛主席指示信，使留守兵团面貌一新。广大指战员进一步明确了我军是党领导的革命军队，明确了我军的性质、宗旨，提高了贯彻执行党的路线的自觉性。各部队加强了党的领导，要求领导干部参加党小组过组织生活，整顿

和加强了基层党支部建设，健全了党的生活，要求连长、指导员定期向党支部报告工作，把连队的各项工作置于党组织的领导之下。有的部队还举办了党支部书记训练班，学习怎样做支部工作，提高了政策水平。兵团政治部组织了考查团，抽调许多机关干部，分赴各部队，以数月的时间深入连队，进行调查研究 and 传帮带，用古田会议精神统一政治工作的指导方针、基本任务、工作内容、各项制度和工作作风，克服教条主义影响，发挥政治工作的领导和保证作用，从而加强了部队政治建设。学习古田会议决议，广大指战员明白了八路军是一个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不是单纯地打仗的；不但要会打仗，还要搞生产，做群众工作，既是战斗队，又是生产队、工作队。部队拥政爱民活动和大生产的积极性空前高涨。结合整风贯彻古田会议精神，进一步加强了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毛主席的军民一致、官兵一致的原则深入人心。在军民关系上，部队对过去做得不对的地方，主动登门检讨，赔礼道歉，消除隔膜。在拥政爱民活动中，部队帮老乡治病、盖房、耕地、收割庄稼，给群众做好事。加强了军民团结；在官兵关系上，过去管理教育简单生硬，训人骂人等旧军队的习气已经没有市场，干部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士兵，尊重战士的人格，关心战士疾苦，帮助战士进步，官兵关系大为改善。1944年4月12日，谭政同志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当时留守兵团早已并入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谭政同志兼任联防军副政委，因对外不用联防军番号，故报告仍用留守兵团政治部的名义。这个报告是在总结留守兵团政治工作经验基础上写成的，对留守兵团政治工作经验与成绩予以充分肯定和很高评价，同时指出失误和改正的办法。毛泽东、周恩来同志亲自主持了报告的审查和修改，是继古田会议决议之后，我军政治工作的又一历史性文献。

自己动手生产自给

陕甘宁边区地处西北黄土高原，地广人稀，土地贫瘠，经济落后。抗战以来，到边区来的非生产人口增多，又要支援抗日战争，其经济压力是很大的。我们留守兵团部队的生活也一直非常艰苦。国民党根据红军改编时两党达成的协议，每天只发给每人5分钱菜金，有时连饭也吃不饱。每月每个战士的津贴费只有一元钱，连一双布鞋都买不了。冬天，棉衣穿烂了，补了又补。有的战士把烟斗挂在树上，用树条抽打，干部问为啥打烟斗，战士发牢骚说：“它不听话，明知没有烟叶了，还要抽”。从1939年春起，国民党顽固派为了配合其反共摩擦，采取种种方式，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扼杀政策，给边区经济造成极大困难。尤其是从1939年9月起，国民党完全撕毁了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停发了八路军、新四军很有限的一点军晌和军需物资，并破坏了交通，堵绝了商品输入途径，甚至唆使兵匪到边区境内抢劫破坏，给边区的经济造成了严重困难。在面临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我们根据党中央号召和毛主席的指示，在1938年7月召开的第二次后方各留守兵团首长会议上，便提出“战斗、学习、生产”三大口号，布置开展生产运动。会议结束后，大家要会见毛主席，我和肖劲光、曹里怀、王维舟、耿飏、甘渭汉、杜平、白志文、袁渊、张才干、贺晋年、阎红彦等同志都去了。毛主席正在午休，我们在门口等了一会，他起来了，让我们进去，就同我们交谈起来。大家向毛主席汇报部队物质生活上的种种困难情况，毛主席听后这样说：“怎么办？困难是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顽固派给我们造成的，解决的办法有两个：一个是把军队解散，各自回家；一个是自己动手搞生产。我看还是自己搞生产好，自己动手，自力更生嘛！战士们不也都有两只手么？你们就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头，把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大家听后赞成搞生产，增强了战胜困难，生产自救的信心和决心。12月，我在留守部队第一次党代会的报告中，便把开展集体生产运动，作为今后两大任务之一，指出“估计将来要遇到更困难艰苦的环境，而要支持这长期的持久战争，以至争取最后胜利，须以最大的毅力，以克服物质上的困难，这是抗战建国的物质上的保证。我们有集体的人力，有坚韧不拔的毅力，有资源，有相当实际的经验，因此明年要开展大的生产运动（种粮食、开菜园、辟农场、喂猪、喂羊、办合作社等），以部分帮助给养，更加改善战士生活，以至准备万一将来经济困难的时候，亦能自给……不因战争而停顿生产，实际回答毛泽东同志的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的号召”。1939年春，毛主席又对陕甘宁边区提出了“自力更生，自己动手，生产自给”的指示，留守部队成立了生产委员会，我兼任主任，供给部副部长张永励同志为副主任，具体领导生产工作。从此，留守部队的生产运动更加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从丘陵到山沟，从河滩到原野，到处都是开荒种地的人群，到处响起赞颂劳动的歌声。我们干部和党员，充分发挥以身作则的模范带头作用，既是生产的组织指挥者，又是生产劳动的参加者。做到劳动吃苦在前，分享成果在后。上上下下，同甘共苦，共度难关。中央领导同志也和大家一样，参加生产劳动，他们每人开荒两分地种菜。毛主席一有空，就到他住的窑洞对面山沟里的菜地浇水、拔草、施肥。朱总司令种的西红柿吃不完，送给大家吃。他还每天清晨带着警卫员到马路上拾马粪。周恩来副主席参加种菜，纺纱，中央领导同志身体力行，对边区军民生产热忱以极大鼓舞。在生产运动中，我们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有关方针政策和毛主席的《抗日战争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等指示精神，以发展经济保

障供给为总方针，根据各个部队不同环境和条件，提出不同的要求和口号。开始，为解决副食品和生活用品困难问题，我们发动各部队种菜，饲养猪、羊、家禽，打柴烧炭，捞盐采药，开磨坊和副食作坊，捻毛线织毛衣毛袜和做棉鞋，以及开办商业合作社、骡马店等，当时叫做“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目标是减轻粮食困难，解决过冬温饱问题。至 1939 年，提出开荒种粮，生产自给的口号，以减轻边区人民的负担。生产转入以农业为主，继续开展多种经营，反对单纯赢利赚钱的重商轻农思想，规定商业资金不得超过生产资金的 30%。生产和供应实行统一领导，分散经营，服从统一的计划安排和边区政府的政策。团、营以下单位经营农业、手工业、畜牧饲养业、小作坊、消费合作社性质的小商业等，较大规模的手工业、运输业、商业等由旅和独立团以上单位统一组织经营，对边区以外的贸易活动，还需统一于边区物资局的指导下，反对各自为政，闹独立性和违犯政策法规等现象。要求在生产过程中处理好军政、军民及公私关系，不动用民力，不长期借用群众的农具，严防与民争利。军民利益发生矛盾时，以人民利益为主，求得合理解决。在生产与消费关系上，既要增产，又厉行节约。加强组织监督，加强纪律检查，防止和克服铺张浪费、大手大脚、贪污盗窃、腐化堕落等不良倾向。由于在工作指导上，注意加强生产经营中的政治工作，保证了兵团部队大生产运动热烈健康地发展。1941 年，在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下，边区军民掀起更大规模的生产运动，部队实行大规模的屯田生产。遵照中央的命令，八路军 359 旅在王震和王恩茂同志的率领下，从 3 月起，陆续开赴南泥湾实行军垦屯田。朱德同志亲自前往勘察屯田地点，具体组织开荒工作。那里荒无人烟，但土质肥沃。他们在缺乏生产资金、生产工具和住房的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一面动手挖窑洞解决住宿问题，一面勘察开荒的地区，学习耕作技术，制作生产工具，披荆斩棘，开垦荒地。连续苦干几个月，硬是用自己的双手，建了窑洞，垦出良田，种上了庄稼，把一个荒凉的南泥湾建成了“陕北的好江南”，他们提出的豪迈口号是，“不要公家一粒粮、一寸布、一分钱”。结果，他们经过两年的辛勤劳动，至 1942 年，全旅粮食自给达到 80%，经费自给达 90% 以上，大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成为生产战线的一面旗帜。据此，《解放日报》发表了《积极推行南泥湾政策》的社论，赞扬他们实行“屯田政策”的伟大成绩。此外，驻在陇东的 385 旅，在王维舟、甘渭汉、耿飏同志率领下，也进行开荒屯田，大生产运动搞得热火朝天，成绩也很可观。辛勤的劳动，换来了丰硕的果实。据统计，从 1939 年至 1943 年，兵团部队共开垦土地 33 万多亩，生产细粮 4 万多石。1941 年、1942 年两年，边区政府给军队的生产投资约六七百万元，而军队不仅保障了 3 亿元以上的供应，还在经营的农工商业中积蓄了约 8000 万元的资金。全兵团 1943 年除粮草外，其它军需物资自给率达 79.5%。兵团卫生部医药材料厂能自制药品 87 种，解决了最感缺乏的医药问题，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大大改善了部队的的生活。以兵团政治部来说，1943 年平均每人每月伙食消耗粮食、木炭各 45 斤，肉 3 斤 9 两 5 钱，菜 35 斤 10 两，油 1 斤 5 两 9 钱，盐 1 斤 3 两之钱，调料 8 两（均按旧制 16 两秤计算）。1943 年全兵团被服供应达到每人单衣 2 套，单鞋之双，毛巾 2 条，棉衣 1 套，棉鞋 1 双，大衣、被毯、皮带、绑带、子弹袋、干粮袋等各补充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大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陕甘宁边区农民所交的公粮，1941 年占总收获量的 13.85%，1943 年降至 9%。毛泽东同志曾说：“仅有人口 150 万的陕甘宁边区

却养活了 15 万公家人而民不伤”。这是很了不起的事，大生产运动，培养了边区军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造就一大批不怕艰苦、能劳动、会理财的干部，涌现一批劳动英雄模范。如我兵团的赵占魁、张治国、李位、武生华、胡青山、冯国等同志评为边区的特等劳动英雄。1942 年底至 1943 年初结束的西北高级干部会议上，因领导经济建设有功得到奖励和得到毛主席题词的 22 位同志中，属于部队领导干部（包括 359 旅和边区保安司令部）就有王震、王维舟、文年生、贺晋年等 9 位同志。当时美国记者斯诺和爱国华侨陈嘉庚等到延安时，见到边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喜人景象，无不啧啧称赞。大生产运动的胜利，不仅改善了军民的生活，克服了物质的困难，战胜了日寇的破坏和国民党的封锁，为巩固抗日统一战线，支持长期抗战，奠定了物质基础，而且改善了党政军民之间的关系，全面锻炼了部队，巩固了战略后方。

“双拥”运动的由来

留守兵团建立后，继承红军的优良传统，在剿匪御敌、建设边区的斗争中做出了贡献，与边区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其军政、军民关系是比较密切的。边区人民关怀支持子弟兵，出现了许多拥军优抗的感人事迹。但是，在相对安定的环境下长期驻军，军政军民之间难免产生一些矛盾。尤其是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反共摩擦、停发军饷和进行经济封锁后，给边区的经济造成严重困难。边区主要领导者高岗又不给部队任何补助，军队的生活更加困难。在此情况下，军政军民之间的矛盾也随之增多。有不少人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互相埋怨。在搞生产中，曾发生一些与民争利问题。如去定边运盐，部队是公家骡马运的，费用少，成本低，而老百姓是自己的骡马运的，费用多，成本高；部队开骡马大车店，吃的是公家的饭，收费低，而老百姓开的骡马店，吃的是自己的饭，收费高，故住的旅客比部队少等等，开荒种地时，有些部队占好的荒地较多，引起一些群众的反感。有的部队干部，只强调自己的困难和需要，不体谅政府和群众的困难，袒护部队的缺点，使部队一些不良现象得不到及时的纠正。加上国民党顽固派千方百计制造谣言和阴谋，甚至制造事件，嫁祸于我，破坏我军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党中央、毛主席对这种情况非常重视，毛主席亲自做工作，协调军政军民关系。1939年冬，我到驻永坪的警备4团检查工作，团长陈先瑞向我汇报说，战士去借老百姓的锅，有的老乡不肯借，把锅沉在池塘里。炊事班到老乡家去做饭，老乡把烟筒堵起来。我为此给边区高自立副主席打电报，反映有关情况，希望边区政府给予帮助。我回延安后不久，一天，毛主席突然叫我去，进门一看，有毛主席、朱总司令、任弼时、李富春、肖劲光、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高自立等同志在座，还有西北局书记高岗，看样子，他们是在开会中间临时叫我去的。毛主席见我进来就严肃批评说：“你们军民关系不好，自己不检讨，还向中央告状！”我知道是电报出了问题，赶快作检讨，并说明电报是打给个人反映情况的，并没有向中央告状。我讲完后，边区政府一位负责同志又讲了一些部队不遵守群众纪律的事。毛主席听后说：“莫文骅检讨了，你们也要检讨嘛！”又说：“军民关系发生问题，军队应先检讨自己，军队要拥护政府，要爱护人民；你们做地方工作的，也要拥护军队，照顾子弟兵！”大家不再吭声了，我便退出来了。后经了解，我发给高自立同志的那份电报，是肖劲光同志把它批送给中央领导同志，朱总司令批评了边区政府，而高岗不服，向毛主席报告此事而引起的。我从这件事也认识到，在军政、军民关系上发生矛盾时，军队应该首先检讨自己，作自我批评，不能只强调自己的困难，更不能互相埋怨，互相指责。经毛主席做工作，军政、军民关系得到了改善。1940年下半年，毛主席在杨家岭接见留守兵团的一些领导同志，到会的有肖劲光、耿飏、阎红彦、甘渭汉、贺晋年、文年生、钟汉华、余飞、周仁杰、刘随春、李宗贵和我等10多人。毛主席笑着说：“今天请各路诸侯来谈军民关系问题。”在座谈中，有的同志反映部队有些怨气，埋怨群众态度不好，有的说老百姓动不动就要拉部队同志去找毛主席评理。毛主席听后，耐心地开导我们说：“开天辟地以来，只有军管民，老百姓见了军队就跑。现在老百姓敢批评军队，这是大好事。从古到今，哪有老百姓敢批评军队的？你们懂历史，你们说说看，是不是这样？如今变成民管军，这多好呀！这说明我们边区政府的民主建政工作有很大成绩。军队有人民群众当老师，你们做军队工作的同志才不会犯大错误，边区才有希望”。毛主

席的一席话，说得大家豁然开朗，心悦诚服，深受教育。大家表示要摆正军队与人民群众的位置，牢固树立拥政爱民的观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1942年，留守兵团结合整风学习古田会议决议，进一步提高了对人民军队宗旨和本质的认识，随即掀起了搞好军政、军民关系的热潮，获得显著效果。为进一步密切军政军民关系，1943年春节前后，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延安兴起了空前热烈的拥军优属、拥政爱民运动，1月1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了关于拥护军队的决定。1月25日留守兵团司令部、政治部发布了关于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决定。边区政府林伯渠和贺龙同志，先后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拥军优属和拥政爱民的专题文章。“双拥”运动就在整个边区轰轰烈烈而又扎扎实实地开展起来。那种热烈的气氛，我至今想起来，仍然感奋不已。从分区到县、区乡政府，都根据边区政府的指示，举行了扩大的政务会议，邀请部队同志参加，进行认真的自我批评，检讨过去对军队认识不够、尊重不够、爱护不够的缺点。边区政府还动员群众支援军队搞生产，借给生产工具，保障粮草供应。在拥军月里，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亲自率领慰问团，到南泥湾生产中有成绩的359旅慰问。延安文化界专门组织了文化劳军团，著名诗人萧三、艾青、柯仲平和作家丁玲等，亲自深入部队，慰问子弟兵。机关学校，工厂商店，民众团体，纷纷响应。爱护军队、爱护抗属的呼声，响遍了边区。人民要求代交的慰问品堆积如山，留守兵团机关门口的操场上，高跷队、秧歌队、耍狮子的、玩杂耍的，一队接一队，整日不断，锣鼓声、鞭炮声、唢呐声，响成一片。大街上，男女老少，人山人海。整个边区，到处是拥军的歌声，“正月里是新春，赶上那猪羊出了门，猪呀！羊呀！送到哪里去？送给那英勇的八路军……”人民群众赶着猪，牵着羊，抬着衬衣、鞋袜、毛巾、肥皂和铅笔、识字课本等各种各样的礼物，到部队联欢慰问。人民群众以各种方式表达对子弟兵的爱护之情。当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敌情紧张时，人民群众大力支持子弟兵备战。军队开赴前线时，各县在一两天里，就组织起了担架队、运输队，随时准备开赴前线。在敌情威胁严重的情况下，更看出了人民离不开军队，军队离不开人民这一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根本观点，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的拥军优属活动，给了边区部队以深刻的教育和极大的鼓舞。在拥政爱民月活动中，边区部队普遍开展了军民联欢活动。向政府和群众写贺信、发贺年片、送春联、送年画、送锦旗、送匾牌，请房东和老乡一起会餐。老乡兴高采烈，有的离部队驻地一二十里路，也喜气洋洋地赶来会餐。各部队普遍组织了秧歌队，一路扭着秧歌，唱着拥政爱民歌，到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中去表演，给政府工作人员和人民群众拜年。老乡说，从来没有见过军队给老百姓拜年，这还是第一次。

在拥政爱民月活动中，边区部队还普遍开展了清理旧

案，即清理过去违犯政府法令，侵犯群众利益的事件和赔偿、送还物件的活动。部队各级都认真地进行了纪律大检查，由干部带队，到政府、到群众中去，逐门逐户访问，征求意见。在军民大会上，把违法乱纪的事情，一件一件讲出来，向群众检讨。个别问题严重的，带到军民大会上，当众宣布他的错误。参加大会的群众很感动，说八路军真是纪律严明，不护短，真是好军队。纪律检查之后，又普遍开展了送还物件和赔偿的活动。部队借老百姓的东西，基本上都送还了，损坏了的，按价赔偿，做到一物不落，分文不少，更提高了军队在人民群众中的声誉。同时也使部队自己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群众观念和群众纪律的教育，提高了部队的政治素质。

在群众工作上，当时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安置难

民。不少家在敌占区、国民党统治区的群众，逃到边区来。军队大力协助政府，进行安置工作，使难民有吃、有住，能生产、能生活。仅警备第 1 旅 1 团就安置难民 30 多家，让出住房 30 多间，捐款 1 万多元。有的部队还帮助难民打窑洞，开荒，借给耕牛，或者把自己开的荒地让给难民耕种。驻城镇的机关部队，则节约口粮和津贴费，捐献大批粮食和现金，帮助难民安家立业。各部队还普遍开展了爱民竞赛活动，争着为人民群众做好事，比如打井、挑水、砍柴、开荒、修房子、打窑洞，有的部队还建立了星期日为民服务的制度。一到星期日，干部战士纷纷到老乡家去，拉家常，磨豆腐，扫院子，使军民关系非常融洽。延安兴起的“双拥”运动，使军政、军民关系有了显著的改善。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战斗，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边区军民终于战胜严重困难，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多次反共高潮，胜利地保卫了延安这个抗日战争的指导中心。真是“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1943 年 10 月 1 日，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写了《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的党内指示，要求各抗日根据地于明年农历正月“普遍地、无例外地举行一次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的广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并明确规定这一运动“以后应于每年正月普遍举行一次”。后来党中央的文件中把“双拥”工作称之为“旧历年节中最重要的革命工作”。从此，“双拥”运动推广到了各抗日根据地，并延续下来，成为我们党、政府、军队和人民群众的光荣革命传统。

“深知慎处”

1941年秋的一天，西北局组织部长找我去他那里谈话。他说，359旅有两位连排干部违法营业，与县大队发生冲突，在延长县政府院内开枪打了县大队的人，蛮横无理，对此事西北局已决定，将肇事的那两个连长和排长枪决。因我兼兵团军法处长，他通知我要马上执行，我听后，吃了一惊，对此事毫无所知，怎能立即执行？我说，此事我们一点也不知道，待调查清楚后再严肃处理。359旅属兵团代管的部队，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我得回去告知肖劲光同志和王震同志。这位部长回答说，不行！西北局已经决定了，不能改变，这是党的决定，你一定要执行！我仍坚持先调查后处理的意见，我俩争执起来，谈了半天，没谈成，部长火了，拍着桌子大声说：“莫主任，你不执行西北局的决定，你这个主任还想不想当了？”我也火了，拍着桌子说，我不当了，便骑马走了。回到兵团，我把此事告诉肖劲光、曹里怀等同志，肖劲光是西北局委员，他还不知道此事，他们也不同意西北局的决定。延安城小，此事很快反映到中央去了，朱总司令出面找西北局的同志说：“莫文骅是广西人，有犟脾气，光压是不行的，要调查，讲点道理。”后来毛主席也说话了，指示双方要进行调查。于是我和这位部长各带几个人，一起去延长县调查处理。路上走了两天，我俩一路没有话。到了延长县，我们召集有县党政领导同志参加的双方当事人开会，了解情况，双方都说是对方开的枪。我查看了县政府院内墙壁上留下的两个枪眼，像是“七九”枪的枪眼，县大队的枪均是“七九”枪，而359旅两位干部背的是驳壳枪。我问开枪的距离，都说是离墙10米左右。我叫人用一张红纸贴在墙上枪眼的旁边，我站在离墙10米的地方，用“七九”枪对准墙上的红纸打了一枪，墙上的枪眼与红纸上的枪眼基本大小一致。我又拿359旅那位连长的驳壳枪向墙上打了两枪，其枪眼很小，与墙上原来的枪眼不同。这证明开枪的是县大队的人，而非359旅的两位干部。这时，这位部长也无话可说了。我问他，怎么样？不是359旅的人开的枪吧，还枪毙人吗？枪毙谁？他不作声，我又说：“算了吧，回去各自作检查好了！”他表示同意。这样，我们便回延安汇报，和平解决了这一问题，救了两条人命。回来后，我写下了“深知慎处”四个大字，一直挂在墙上，成为警策自己的座右铭。深知，就是一定把情况搞清楚，了解事情的本质，不被现象所迷惑；慎处，就是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实事求是处理问题。作到慎重处理问题也并不容易，往往会受到环境形势的压力和影响，这是需要有点勇气的，有时还要冒点风险。这件事也说明了在军政关系上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有些事情上还闹得很僵。边区军政关系上存在问题这是有缘由的。延安时期，高岗成为陕北红军中的最高领导人。开始高岗在军委当科长，肖劲光是军委参谋长，肖对高不感兴趣。后来，高岗当骑兵团长、陕甘宁苏区党委书记、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书记、西北局书记，官越当越大，掌握了边区党政大权，只差军权尚未到手。他虽然兼延安保安司令，但这只是千八百人的地方部队。当时边区部队主要是八路军留守兵团。高岗一心想当留守兵团政委，但1939年秋中央军委任命肖劲光为留守兵团司令，我为政治部主任，政委空缺。高岗继续活动要兼政委。一次肖劲光找我谈话说，留守兵团没有政委不行呵，最好请中央军委派一个来，实在派不出，能否在我们两个中出一个人来兼呢？当时我想，没有政委确实不行，怎么办？中央已经考虑过，没让高岗来兼政委，不便再提了；上级派人来，看来一时也困难。不如让肖兼为好。于是，我并没和别人商量，以个人名义写了一个报告给毛

主席和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同志，建议肖劲光兼政委，不到三天，毛主席下手令让肖劲光兼政委。这样，高岗的希望落空了，对留守兵团很是不满。1939年9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反共高潮，突然停发八路军的军饷。寒冬在即，留守兵团部队措手不及，衣食无着。朱总司令说，我没钱了，发不了饷。边区的主要领导者高岗又不给部队任何补助，军队的供给更加困难。平心而论，陕甘宁边区经济落后，人烟稀少，却供养那么多部队、机关、学校，群众负担确实很重。加上国民党的军事围困和经济封锁，使边区的财政更加艰难。但是，在部队衣食无着的情况下，边区一点也不管，一颗粮食也不发，也确实是不正常。这里问题的实质是高岗在处理军政军民关系上掺杂了个人的情绪。这样边区的军政关系就不平静了，许多简单的事情也变得复杂起来。仅就我经历过的事情就很有感觉。1939年夏，毛主席《论持久战》公开发表。有一天，毛主席叫到我家里去。一进门，他便问我：“莫文 驿，你对《论持久战》有什么意见呵？”我听了吓了一跳，真是摸不到头脑，忙回答说：“没有呵，主席把初稿给我，并写了信让我提意见，我阅读了两遍，认为很好，提不出什么意见，还想再看，但叶子龙来电话收回去了。”主席又问：“你没有意见，为什么出版后不向部队传达呀？”这问题就更大了，我赶忙汇报说：“我们早已向部队传达和学习了，还专门组织了学习班，至于学习效果如何，待后还要检查。”主席说：“你们做的工作为什么自己不汇报？”我这才听出点原委。我问是谁报告的，主席说是高岗。我即骂了一句：“高岗，这个坏蛋！”便讲了军政关系方面发生的一些问题及对高岗的看法。主席静静地听着，有时“哦”了一声，没有说话。突然主席问我：“你在什么地方工作啊？！”主席的话讲得很慢，声音拖得很长。唉，怪了，主席的问话让我感到莫名其妙：“我在留守兵团呀！”“留守兵团在什么地方啊？！”语音还是很慢很长。我更奇怪了：“在陕甘宁边区呀！”“在陕甘宁边区？！”主席点点头，自言自语地重复了一句后，态度严肃起来：“对了，部队住在边区，你们就要和高岗搞好关系，你要知道，中央的东西，高岗不点头，在边区也行不通。”我火了：“这是要挟中央！”我走时，主席送出门口，拍着我的肩膀说：“你多大年龄了？”“30岁”，“你还年轻啊，过些年就好了。”主席的话，我一直装在心中，当时只感到高岗权力不小，心术不正。后来边区在一段时间里军政军民关系发生一些矛盾，其根本原因，即源于此。至于后来高岗个人主义、宗派主义恶性发展，搞反党联盟，这只能说明事情总有个发展暴露的过程。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在毛主席直接关怀领导下，在保卫边区，保卫党中央，抵御日寇侵略，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包围封锁和摩擦，参加边区建设等斗争中，做出了贡献。对此，毛主席在一次讲话中曾评价说，留守兵团的工作，在西北局高干会后有成绩，高干会前也有成绩。当然，作为兵团主要负责人，我们也有错误和不足，在工作指导上也有失误的地方。但说到边区军政关系问题上决不是那么简单，肖劲光与高岗工作上存在矛盾，也不能笼统他说成是留守兵团与西北局的矛盾。我认为，这段历史情况也应实事求是地加以说明。

难忘的中央党校整风学习

1942年5月间，我打一报告给毛主席，说自己以前是军事干部，负伤后改做政治工作，现早已痊愈，要求到前方做军事工作。毛主席批回8个大字：“继续工作，不要调动”。后我又向党中央秘书长任弼时和总政组织部长胡耀邦同志提出自己的想法和请求，他们表示考虑。8月，经中央军委批准，我进中央党校学习，佩带上印有党旗、毛泽东同志头像和“学习”字样的校徽。当时，党校校长由毛主席兼任，主持工作的是副校长彭真，党总支书记是黄火青。我在一部学习，开始担任一部第八党支部副书记，后为第六支部书记。一部的学员是地委、旅级以上干部和部分七大代表。当年，中央党校的生活环境也是很艰苦的。六个部的学员分散在城外南北相距20公里的地方，办公室、教室加卧室，基本都是窑洞。每间窑洞住二至四人。窑洞冬暖夏凉，但光线不足，不利看书学习，雨季还有倒塌的危险。吃的是黑豆小米饭、南瓜汤。起初，每周见一次牛羊肉算是好的了。用的是延河水，学员们自己从河里往山上挑，很费力。没有电，点的多是煤油灯。煤油是没有经过提炼的原油，很稠，要用火炉子烤化才能点，一灯油要点三个晚上或一星期，亮度很差，像萤火虫似的，看书写字很费神，鼻孔熏得黑黑的。纸张更为紧张，高级领导干部给点窗户纸用，一般干部都以桦树皮当纸，或用本地马兰纸。穿的是土布衣服，多是本地织的粗布，冬天每人发一套粗布做的棉袄、棉裤和棉帽，不发棉鞋、棉大衣。延安的冬天很冷，每个窑洞或房子每天发3斤木炭取暖，仍解决不了御寒问题，像我们带有家属小孩的学员，困难更大。生活虽然很艰苦，但学员们有理想，有志向，大家为打败日寇、解放全中国而学习，吃苦不怕苦，情绪饱满。当时，窑洞内外，山坡上下，延河岸边，到处可见学员们手捧马列著作阅读和两两互相探讨的学习情景。在听报告或上课时，大家聚精会神，认真听，仔细记；讨论会上，争先恐后，踊跃发言；开会前，高唱革命歌曲，如《抗大校歌》、《毕业歌》、《大路歌》、《黄河大合唱》、《八路军进行曲》等；经常举行体育活动和文娱晚会；每星期六晚上还在俱乐部举办舞会，中央领导同志和一些学员都穿着布鞋或草鞋跳起交谊舞。开始，舞会伴奏是借用邓发同志从苏联带回的留声机，后来，大家对放唱片不过瘾，要求组织乐队伴奏。因我学过洋琴，俱乐部同志要我参加器乐组。器乐组有拉二胡的、吹笛子的、弹月琴的，大家都热情为舞会伴奏。我到中央党校时，全党范围的整风学习运动已经开始，中央党校是全党整风运动的重点。这是一次普遍的马列主义教育和党的路线教育运动。其主要内容和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为了使整风运动健康发展，党校首先组织学员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有关著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全党，并贯穿于整风运动全过程。整风中，我们主要学习中央规定的22个整风文件，其中有马列主义关于党的建设的论著、党中央的有关文件。整风学习，首先是精读文件，领会精神实质，然后是联系实际，进行检查。根据文件精神，检查自己的思想、工作和历史，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分析错误的根源，提出改正的办法。从个人的检查，又发展到对自己所在地区和部门的工作检查，实事求是地总结各地区、各部门的经验教训。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延安召开了为期80天的高级干部会议。这次会议用整顿“三风”的精神检查总结陕甘宁边区的工作及经验。会议前半段主要是总结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前该苏区的历史经验教

训，分清路线是非，批判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影响下陕北党内少数同志所犯的错误的，特别是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会议后半段提出开展“五整”，即整党、整民、整政、整军、整关（系）。会上，有几十位团以上干部各自检查过去工作中存在的“三风”问题。会上作的关于留守兵团的工作情况报告，说到留守兵团存在军阀主义、军党论等问题，引起到会的留守兵团干部的反感。肖劲光同志作了自我批评，同时受到了批评。主要是批评他不尊重西北局，在输送干部方面有本位主义等问题。高岗、康生等人把火力集中在他身上。他一时受不了，中途退出会场，情绪很不好。我怕他出意外，告诉李富春同志，李富春即到他的宿舍找他谈心，他才继续参加会议。建国后，肖劲光同志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说：“在会议期间，对留守兵团的错误的批评有些扩大化了，上纲过高，例如说是路线错误，是军阀主义，甚至与张国焘的军党论相提并论，对留守兵团的干部打击面过宽，挫伤了一部分同志的积极性，这一历史问题，也应当实事求是的加以说明。”“实事求是地说，当时我对高岗的印象并不佳，感到这个人政治水平低，眼界却很高，计较个人得失，品质也不好”。这些意见和看法是对的。我认为，高岗和肖劲光的矛盾，根源在于高岗想兼留守兵团的政治委员，肖劲光不欢迎。中央党校大部分学员到会旁听。我则正式参加会议，但不要求我全部参加。会议前阶段，我去听主要的报告，后阶段涉及到留守兵团时，我大部分时间参加了。我作为曾担任过兵团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自己有责任在大会上进行工作方面的自我批评，向大会有所交代。在我发言前一天，康生在大会发言中，除了批评肖劲光外，还说了留守兵团政治部对西北局的“锄奸决定”不仅不执行，而且也不安排讨论。我认为，这不是不尊重西北局的一般问题，而是关系到对敌斗争的立场问题。估计是高岗在背后搞名堂，而中央社会部长康生也偏听偏信。我听后沉住气，没有立即答复。安排到我发言时，我除了对兵团过去在军政、军民关系上存在的问题作自我批评外，还讲了传达贯彻西北局关于“锄奸决定”的情况。我说：“我们接到西北局的锄奸决定时，认为很必要、及时，立即在我的房里召集政治部的部务会议，兵团的锄奸部长、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都参加了，还请了总政治部锄奸部长吴溉之和边区保安处长周兴到会指导，研究讨论后写了一个贯彻执行此决定的通知，发到全兵团各部队，当然，贯彻还不够深入”。我在发言中，没有直接批驳，只是摆事实。康生坐在讲台下边，旁边正坐着周兴，他向周兴耳语一阵，估计是问他是否到兵团参加此会，周兴点点头，康生只好垂下头来不吭声。散会后，我和肖劲光一道骑马回家的路上，他说我的发言很得体，有说服力。

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进行整风

运动的决定》，要求在整顿党的作风的同时，对全党干部进行一次普遍的组织审查，指出“整风不但是纠正干部错误思想的最好方法，而且是发现内好与肃清内好的最好方法”。根据这一决定，中央各部门、各直属单位（包括中央党校）都在整风中增加了审干和反好的内容。我认为，陕甘宁边区处于民族敌人与阶级敌人双重包围之中，敌情较复杂、严重，日军和国民党特务潜入边区，甚至混进要害部门也是有可能的，加上大批从敌占区、国统区投奔革命的知识青年涌向延安，有些人的历史和政治面目不清楚，确需进行必要的审查，但是，中央4月3日的《决定》，对敌情作了过分的估计，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7月15日，中共中央社会部长、整风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康生在延安中央礼堂干部会上作了《抢救失足者》的动员报告，说党

内混进了大批特务，仅在教导旅就可以集合几百个特务。说什么“现在是紧急军事动员时期”，号召一切“失足的人们！现在应该觉悟，应该下最大的决心，向共产党悔过自新，赶快脱下特务的衣服”。其报告剑拔晋张，咄咄逼人。从此，中央党校掀起了所谓“抢救运动”高潮。就是要被审查的人赶快坦白，赶快交代，在他“向党坦白”的条件下，抢救他的生命，以免受到更严厉的处置。在“抢救”过程中，大搞“逼、供、信”的过火斗争，把国民党统治区的共产党组织，打成为被敌人收买的“红旗党”（意指地下党外红内白，表面是共产党，实际是国民党），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来自白区的地下党员，大都以有特务嫌疑被作为审查对象。我妻子杨枫也是其中之一。当时，杨枫也在中央党校学习。由于河南省地下党被打成“红旗党”，她哥哥是地下党员，被打成“特务”，故她被作为“特务”嫌疑进行审查和斗争。有一位党校领导干部找她谈话时说：“只要你承认自己是特务，保证你丈夫莫文骅不会同你离婚”。她年轻（仅21岁）幼稚，在连续几天的斗争和诱逼下，违心地承认自己是“特务”。接着，问题又来了，有人继续追问她：你既然是特务，几年来干了些什么坏事？偷了丈夫多少文件、电报？因她没有干过坏事，故无法回答。于是，便找到我的头上来了。那时，杨枫被隔离审查，我和她很长时间不能见面。在党校一次干部大会上，一位领导这样说：有个高级干部，他的老婆是特务，已承认交代了，而他还不知道，坦克车已开到床上去了，应该立即醒悟，站在党的立场上揭发妻子的特务罪行。这话明明是在说我。我当时戴着草帽，只好把草帽沿拉低盖住脸，不吭气。会上，有个老干部检讨说，他老婆是特务，他受老婆拉拢，也是特务。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有人高呼口号：“老干部做模范！”不管这位老干部夫妇是否真是特务，我听后感到难受，老干部打仗干工作可以做模范，难道当特务还要做模范么？会后，有人来问我丢了什么文件和电报，是否被杨枫偷去。我说：“在中央党校学习时，她们二部住在原延安女大那里，每星期六才回来一次，星期天又走了。我的文件、电报都由秘书保管，她从来没有拿去看过，我也没有丢过文件、电报，你们可以去问我的秘书”。一天晚饭后散步时，有两位老干部把我夹在中间，边走边谈，谈到抢救出许多特务时，他们说，从白区来的姑娘靠不住，有的已坦白交代了，作为老同志，应站在党的立场上揭发，大义灭亲。原来，他们是在做我的思想工作。我想他们的老婆也是从白区来的，便说：“是呀，我们的老婆都是从白区来的，都应当检举、揭发！”他们无言可答。后来，杨枫又被迫“承认”偷了我的文件、电报，但经调查，我的文件、电报一份也没丢。我所在的第六支部也进行“抢救”工作，对在白区坐过牢、犯过错误、历史较复杂的学员进行审查，紧张了好几个月，各小组共提出几个有反革命嫌疑的对象，后经党支部反复研究，觉得这些审查对象是属于思想认识方面的问题，不应当作反革命处理，便实事求是地给他们作了结论，没有扣上反革命的帽子。有一位叫王伟的朝鲜同志，他原已被党小组作出了“特务”的结论，后经党支部研究、讨论，我认为证据不足，不同意党小组的结论。其他支委同志也同意我的意见，党支部便把王伟同志作为思想认识问题处理。王伟同志对此万分感激。1945年他回朝鲜工作后，寄信给我，要我有机会到朝鲜去（当时我已到安东工作，与朝鲜只隔一条鸭绿江），一定请我吃狗肉。可是后来一直没有实现。结果，我所在这个党支部没有抢救出一个“特务”来，得不到表扬。而有的党支部，因抢救“特务”有功，学校某些领导不仅给予表扬，还送苹果奖励。在我们党

内，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是比较深的，运动一起来，一阵风，容易头脑发热，生怕比别人落后，拼命“站在党的立场”上，因为有上下级和同级的压力，搞得人晕头转向，讲实事求是就不很容易了。

不久，党中央和毛主席发现审干工作走偏了方向，及

时纠正“抢救失足者运动”的扩大化错误。8月1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强调“一个不杀，大部不抓，严禁逼、供、信”的审干方针，指出“如果是冤枉了的或被弄错了的，必须予以平反，逮捕的宣布无罪释放。未逮捕的宣布最后结论，恢复其名誉”。这时，康生的倒行逆施才不得不有所收敛。党校的“抢救运动”也开始刹车，对全校的冤假错案进行了甄别平反。原来被抢救出来的所谓“特务”分子，一般都平反了。杨枫也平了反，只有极少数人的政治问题因条件限制，无从查证，暂不作结论。

在甄别工作中，毛主席多次主动承担责任，利用各种

场合向受害者赔礼道歉。记得有一次，毛主席在党校大礼堂作报告时，讲到“抢救运动”，说把许多同志搞错了，伤害了同志们，同志们受了委屈，我在这里给大家赔个不是，说着，就当众鞠了一躬。当场，我们许多同志都感动得流下热泪。现在看来，康生搞的“抢救失足者运动”，使审干工作走偏了方向，对延安整风运动是一个干扰，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延安整风运动所取得的巨大成就。1943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党的高级干部转入重新学习党的历史和党的路线问题，开展党的历史大讨论，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

当时学习党史的主要材料是中央书记处编印的党的历史文献《六大以前》、《六大以来》及《两条路线》等几本厚书。在整风学习中，对党的历史上几次机会主义路线特别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彻底批判，分清了两条路线是非，大大提高了党的高级干部的思想水平，统一了思想。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是整风学习的重要内容。七大之前，在整风后期的学习讨论中，对“山头”的问题议论比较多，反映很强烈。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山头”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过去中国革命是各根据地的武装割据局面，自然形成的“山头”。有的虽然不是一块根据地，但思想一致，气味相投，形成了一个派，也是一种“山头”。“山头”是客观存在的东西，在历史上曾起过好作用。在武装割据的年代，各个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如遍布在各地的星星之火，构成中国革命的燎原之势，没有这样的大小“山头”，中国革命就看不见了。但山头主义是完全错误的倾向，它只看见局部利益，看不见全局利益；只看见当前利益，看不见长远利益；注重感情，忽视原则。在王明路线统治时期，王明践踏党的组织原则，大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给党造成严重危害。特别是当山头主义与肃反纠缠在一起时，使我们党和军队蒙受了很大损失。

整风中，一些部队和根据地同志有意见，有委屈，对

“山头”问题有些议论，于是，中央决定召开座谈会，也可以说是“山头会”，由所在地区的领导同志召集，中央派人参加。比如湘鄂赣边区、鄂豫皖边区、闽粤边区、赣东北地区、闽西地区、潮梅地区及红7军、红1军团、红5军团等历史座谈会。会上，大家自由发表意见，有什么委屈都可以讲出来，包括给领导同志提意见。目的是检查以往的工作，总结经验教训，化解矛盾，增强团结。有的问题则由中央进行处理。

原红7军在延安的一些同志，如叶季壮、雷经天、李

天佑、袁任远、黄一平、卢绍武、云广英、黄惠良、黄宣华、谢扶民、

黄道充、阮平、韦家规、黄雨山、黄超、卢永克、李志明、覃延年、陆秀轩、黄征、吴西和我等人参加了红7军历史座谈会。张云逸和陈漫远曾来电来信提过意见。当时，我们红7军的老领导邓小平、张云逸同志不在延安，座谈会是由朱老总和陈毅同志主持的。大家发言之后，陈毅同志作了总结性发言。座谈会由中央派来的人写了一个决议交给了中央。座谈会中，大家探讨问题，推心置腹，心平气和。朱德、陈毅同志都说这个会开得是好的。因为会后别人都要回去，我在中央党校学习，大家要我把这次座谈会上的发言整理个材料。后来，我根据会议情况和收集的有关资料编写了《红军第七军简史》的小册子，作为内部材料印发给中央领导同志参考。这本小册子作为研究红7军历史的最早资料，现仍保存在中央档案馆。红5军团的座谈会开得很激烈，因为他们是宁都暴动的队伍，不被“左”倾路线所信任，肃反时抓了不少人，当反革命而错杀了，连总指挥季振同也被杀害。军团长董振堂、参谋长赵博生、前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后政治部主任曾日山等军团领导相继牺牲，部队留下的人很少了，随西路军过黄河时基本上打光了。会上。发言的人很激动，当有人拿出董振堂军团长被国民党杀害时的头颅照片时，不少人嚎陶大哭。因长征前我先后曾任军团政治部的宣传部长和34师、13师政治部主任，所以我也参加了5军团座谈会。后来中央把肃反中错杀的同志都平反了。中央党校在整风时，大家就揭发出王明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的很多问题。如王明在苏联追随米夫搞宗派，在旅莫（斯科）支部搞夺权活动等。还揭露王明在苏区推行“左”倾路线，排挤毛主席，不相信起义过来的部队，搞肃反扩大化的问题。红7军北征到中央苏区后，王明派来一个上海工人当军政委，叫葛耀山，此人受王明“左”倾路线影响很深，看问题只看形式，不看实质，看干部只看出身，不看表现。他来时第一次集合队伍讲话，站在土台子上叉着腰说道：“我是工人，是无产阶级，是共产党的代表。你们是国民党来的，你们是小资产阶级”。他这么讲，把大家都吓了一跳，大家都不明白，红7军是邓小平、张云逸、李明瑞领导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建立起来的。其前身是共产党员张云逸和俞作豫领导的队伍与后来韦拔群领导的土地革命的农民武装队伍合编而成的，不少是大革命时期就参加革命的共产党员，大部分是工农出身，有的还大字不识，怎么一下子就成了小资产阶级、国民党来的呢？红7军刚成立时发的，官兵平等，每人每月20块大洋，由于战事频繁，钱花不出去，带在身上不方便，有人就换成了金戒指。这下成了葛耀山攻击红7军是小资产阶级的把柄：“你们看看，你们看看，好多人手上都戴着金戒指嘛！”葛耀山夺权后“唯我独革”，胡作非为，贯彻“左”倾路线，怀疑红7军混进了“改组派”，把团以上干部差不多都当作“改组派”抓了起来，不少同志被杀害。就连红7军、红8军总指挥、共产党员李明瑞同志也惨遭毒手。后来，葛耀山搞不下去，红军过瑶山时调走了，在一次游泳时淹死了。说宗派主义害死人，确是一点不假。开始长征时，苏区的高级领导干部大都带出来了，但由于宗派主义排斥异己，把本该随队长征的好同志却留在苏区打游击，如肺病三期的中央教育部长瞿秋白；因负伤致破的总政治部副主任贺昌；长得胖、不能骑马只能骑驴子的5军团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和毛泽东的爱弟毛泽潭等，后来，他们都牺牲了。提起这些，大家都非常痛心和惋惜。张国焘搞的宗派主义，分裂中央，仗着人多势众，以武力要挟中央。不是他“山头”的人就排挤，由白区去的廖承志同志都险些被杀掉了，是周副主席做工作才救出来。陈赓同志也差点被害。在我党的历史上，王明“左”倾路

线统治时间最长，危害也最烈。这当中一个最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他拉山头，搞宗派，网罗一帮人。错误的路线靠山头来支撑，错误的路线又促进了山头主义的发展。座谈讨论中，大家对山头主义在建军方面的问题也提出不少意见。红7军是左右江起义的队伍，战斗力比较强。由广西出发时的7500人，纵横5个省，转战7千里，到中央苏区时剩1300人，留下的不少是大革命时期的骨干。苏区作战，威名大震，被红3军团长彭德怀誉为“猛如虎，精似猴”的英雄部队。但由于长期得不到应有的补充，部队越打越少，后来编为一个师，再后编为一个团，最后编没了。红5军团大体上也如此，补充很少，后缩为一个师，即13师。这支起义部队经过改造后，思想坚定，能征善战，但始终不被王明的宗派主义所容纳。在苏区打仗时，主要任务是打防御战。防御战是消耗战，没什么油水，每次都要损失一些兵力，丢掉一些装备物资。不比进攻战，有时还能得到一些补充。直到长征，5军团殿后，掩护主力，顶住追兵，又要收容伤员，抬担架，任务很重。过湘江时，34师垮了。过金沙江时，5军团只剩下3个团，与尾随而至的敌人10个团激战一星期，掩护主力渡过金沙江。后随红四方面军西路军过黄河，5军团损失惨重，1.7万多人的队伍到达陕北时只剩下400多人。老部队得不到补充，越打越少，但王明却热衷于新编部队，搞工人师、少共国际师、地方独立师。这些新编部队都是新兵，多数是游击队、赤卫队编起来的，缺乏骨干和作战经验。少共国际师是十几岁的娃娃，有些“枪比人高”；工人师没打过仗，行军也不行。新编部队开始走得猛，该休息了也不休息，最后累得没劲了，掉队的越来越多。长征时8军团的两个师都是这些新部队，过湘江后，严重减员，丧失战斗力，8军团被迫撤销，部队补充给主力了。宗派主义领导者追求增加部队番号，成立那些没有骨干力量的新部队，主力部队越打越少，严重损害了部队的战斗力。建军上的宗派主义，其教训是惨痛的，当时这方面的意见大家也比较多。

1944年10月25日，毛主席在中央党校的一次报告

中，当谈到山头主义危害时曾说过，七军是广西军队，历史上是有成绩的，如果有态度不好，任人行政不好，我要承认错误。还有五军团，宁都暴动来的，受了很大牺牲，过去有不对的地方，我也要承认错误，为什么会有错误呢？这里头表现着一个不信任。

当然，这些问题是过去“左”倾路线造成的，当时毛

主席亦受排挤，抗战之后是毛主席主事，他是替中央来承担责任。

整风学习中，大家还批判了带有宗派主义倾向的说法。

如有一股阴风提出：“是陕北根据地挽救了中央红军？还是中央红军挽救了陕北根据地？”这本来是一个非常明了的问题。当时，错误路线使陕北根据地遭受严重挫折，刘志丹、习仲勋及高岗等人都被关押起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党中央、毛主席派王首道同志前去解救，把被捕的人都释放了。显然，党中央、毛主席不到陕北，陕北根据地也会被机会主义路线搞垮了。当然，陕北根据地对中央红军也是有功的，中央红军如不到陕北根据地，会有更多的困难。但讲陕北救中央是非常错误的。还有一种所谓党内有苏区、白区两个领袖的说法，也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大家的批判。1944年4月12日，毛主席在延安高级干部大会上作了《学习和时局》的重要讲话，为这次党的学习讨论作了深刻的总结。在进行党的历史大讨论基础上，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总

总结了建党以来的历史经验，对党内若干重大的历史问题作出了全面的实事求是的结论。至此，整风运动胜利结束。党的整风运动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它彻底清算了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曾一度严重危害我们党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三大歪风受到了整肃。使广大党员从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以及经验主义的思想枷锁中解放出来，这就为七大的胜利召开奠定了基础。凡是经历过延安整风的人，所受的教育是终生难忘的。那时，除了中央规定的学习文件外，在延安凡有中文译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我都找来读了，认真作笔记，写学习心得，可以说是自己入党以来较系统的马列主义理论学习和党史学习。

经过党史的学习讨论，分清了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一

些重大问题的是与非，进一步认识到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正确性。整风学习中总结出来的党内路线斗争经验教训，对我以后的革命斗争实践起到了深刻的指导和借鉴作用。

延安整风运动，主要任务是解决政治路线问题，其中

还有一项任务是解决军事路线问题。因此，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也是整风学习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大多数学员，曾跟随毛泽东同志征战多年，对毛泽东军事思想虽有一定的感性认识，但尚未来得及系统地学习和研究，缺乏理性认识。所以党校安排一定比例的军事课，学习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我们都是很高兴的。我们在学习整风文件的同时，结合学习毛主席的军事著作，主要学习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重要著作。同时，还多次聆听了毛主席、朱总司令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讲军事课，作政治报告。当时，团以上干部重点是学战略战术思想，学指挥艺术。学习方法比较活泼，主要是看书自学，认真思考，小组讨论，互相启发。学习中，理论联系实际，不生搬硬套，不回避矛盾，允许不同意见的争论，民主空气很浓。记得当时毛主席曾讲过：“我的东西你们可以提出疑问，大家讨论，不要囫圇吞枣。我不要盲从的学生”。毛主席这种实事求是的民主作风，对我们教育很大。在学习中，我们回顾土地革命战争的历程，特别是联系“左”倾冒险主义给苏区、红军造成的严重危害，进一步认清了毛主席军事路线的正确性，对毛主席关于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作用、根据地建设、党指挥枪、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等论述和人民军队三大任务、三大民主、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队政治工作、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宽待俘虏等一系列建军方针以及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积极防御、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思想，掌握和理解上更系统，更深刻了，增强了对毛主席军事思想的崇敬和信赖，提高了贯彻执行毛主席军事路线的自觉性。三年整风学习，是使自己的思想、立场、观点、方法、作风无产阶级化的自我改造过程，是自己一生中关键性的一次革命洗礼。

团结胜利的历史盛会

延安整风运动灿烂之花，结出七大团结胜利之果。在党的整风运动取得圆满成功的基础上，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胜利召开。会前，中共中央组成了以彭真为主任的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中央党校将准备出席七大的代表集合起来成立第三支部，对代表资格进行审查。支部书记是陈奇涵同志，副书记是邵式平同志，我是一个小组的组长，负责本小组的代表资格审查工作。我们小组的成员有陈赓、聂鹤亭、宋时轮，还有几个从白区来的同志。审查工作是非常严格的，都写了自传，讨论通过。1945年4月23日下午5时，我们期盼已久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隆重开幕了。第一次参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我，置身于这庄严的会场里，看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出现在主席台上，不由得心潮激荡，百感交集。建党24年来，我们党的优秀儿女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下，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英勇奋斗，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才赢得了今天的胜利局面，这是多么不容易啊！我们党经过严重的挫折，终于找到了一条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路，毛泽东的旗帜已成为中华民族解放的旗帜，中国共产党已成为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我们党在斗争中成熟起来了，对中国革命的未来充满了信心。七大会场布置的庄严朴素。主席台上，悬挂着毛泽东、朱德同志的巨幅画像，鲜红的党旗挂在两边。会场后面的墙上是“同心同德”四个醒目的大字。两侧墙上的标语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特别引人注目是主席台上方悬挂的一横幅：“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这些标语口号集中体现了延安整风运动的精神。会场的摆设也非常简单。主席台上只有几张条桌和10来把木椅。我们代表们坐的是长条靠背椅。出席七大的代表共有755名，其中正式代表547名，候补代表208名。代表着全国121万名共产党员。分为中直、西北、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华中和大后方等8个代表团。大后方代表团是指蒋管区和沦陷区的。我是在留守兵团任政治部主任时（1942年）被选为七大代表的，故参加西北代表团的的活动。西北代表团的团长是高岗，副团长是贺龙。由于战争和其它原因，这次大会距1928年召开的党的六大已有17年，故它负有总结以往革命经验和迎接抗日战争胜利的使命。会上，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央委员会作了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这个报告是毛主席亲自起草的。共有三个版本，一个是毛主席在大会上讲的，一个是代表手中发的，再一个是公开发表的。其语调一个比一个要缓和。报告里有些内容对我们现在的改革开放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如：“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地知道，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从这可以看出，毛泽东同志的胸襟是非常开阔的，的确站得高，看得远。4月25日，朱德同志向大会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在5月14日、15日两天时间里，刘少奇同志作了修改党章的工作报告。在报告中第一次将毛泽东思想写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党章。周恩来同志作了《论统一战线》的重要讲话。任弼时、陈云、李富春、陆定一、张鼎丞、乌兰夫、叶剑英、彭德怀、陈毅、高岗、聂荣臻、林彪以及各代表团团长等作了大会发言，日本反战同盟代表冈野进，朝鲜独立同盟代表朴一禹也在会上发了言。会议期

间，始终洋溢着民主、团结、融洽的气氛。由于在大会之前，通过整风学习，大家把有关宗派主义、山头主义这方面的问题，造成的危害，及个人的意见、委屈都讲出来了，中央对这些问题也进行了处理，并作出了正确的结论，所以七大的会议上，就不再提这些问题了。大家心情舒畅，情绪振奋，发言热烈。在讨论毛主席《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刘少奇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朱总司令的军事报告时，代表们都是一致通过。在代表们的一致要求下，会期也一再延长。七大是公开举行的，连重庆的国民党报纸都作了报道。七大前，日军的飞机多次飞临延安上空轰炸，军民伤亡较大。为了保障七大会议的顺利召开，党中央特地调集了防空部队，加强了安全保卫工作。七大期间，延安是比较平静的，没有遇到敌人的骚扰和破坏。七大期间的业余生活轻松愉快。代表们在戎马倥偬的抗日前线，难得有片刻的闲暇。他们到了延安就好象到了家一样。这些过去生死相依的战友，由于战争环境，天各一方，音讯沓渺。延安相见，兴奋异常，叙不完的亲情，话不完的友谊，会议间隙，举行体育活动和文艺晚会，每星期六晚上还举办舞会。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和留守兵团部队艺术学校等文艺剧团给代表们演出了节目。在大会前，还演了《甲申三百年祭》、《李秀成之死》等话剧。七大期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发展很快，5月2日，苏联红军攻克柏林，法西斯魔首希特勒服毒自焚。5月8日，德军无条件投降，协议在柏林郊区签字。5月9日，斯大林在莫斯科向苏联人民发表讲话，宣布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消息传来，整个延安沸腾了，我们七大代表也同苏联人民一起分享胜利的喜悦。我们受到了鼓舞，也充满了抗日战争胜利的信心。除了开庆祝会，还放映了《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等苏联电影。这些影片有的是译制好的，有些没有译制的就由苏联回来的同志当场口头翻译。大会后期，在高度民主和高度集中相结合的基础上，经代表们的充分酝酿和讨论，选举产生一个包括各地方、各岗位、各种经历的优秀人物在内的、有威信的、空前团结的新的中央委员会。其中，包括王明等几位犯了错误的同志。开始，大家有些想不通，特别给王明提出了很多意见。毛主席在作关于选举的报告时解释说，从党的历史经验来看，对于过去犯错误的同志不应一掌推开，只要他们承认错误，并决心改正错误就行了。毛主席还在另一次会上这样说，这些人的错误，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犯的，经过整风，已经把问题弄清楚了，就不应太着重于个人的责任。过去毛主席也说过，批判陈独秀时有些偏重个人责任，而对总结经验不够。治病救人，与有不同意见的人合作共事，是毛主席的一贯思想。经毛主席一再说服工作，王明、博古等才以稍过半数的票当选，王稼祥同志也以半数以上票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6月11日，历时50天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终于完成了历史赋予它的使命，胜利闭幕了。那天的执行主席是彭德怀。在闭幕式上，朱德、吴玉章、徐特立等者尚志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接着由毛主席致闭幕词，即今天我们所见到的《愚公移山》。正如毛主席所说的，这是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它确立了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总路线；第一次将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写进了新党章；选举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全党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达到了空前的团结统一。

永不忘怀的回忆

从1935年10月我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甘宁苏区，到1945年8月离开延安南下，其间整整10个年头。对瓦窑堡、保安和延安，这些我曾学习工作过的地方，是那样熟悉而怀有深情，因为这里留下了当年那个烽火年代的风风雨雨，留下了魂牵梦绕的不尽回忆。悠悠延河，巍巍宝塔，延安是我成长的第二故乡。在延安10年中，有幸在毛主席身边工作，并直接接受工作指导，聆听教诲，使我获益终身，永不忘怀。我最初听说毛泽东这个名字是在大革命时期。那时，从传闻中，我知道了毛泽东主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他是共产党员，是代表共产党领导农民运动的。1928年初，我出狱回家，听二姐夫邓绍棠说：“朱、毛吹来吹去，现在吹起军队来了，在江西有了红军了。”这是我第一次听说红军，感到很高兴，因为那时经过斗争实践，我已懂得了搞武装斗争的重要性。1929年底，在百色起义的政治纲领中就提出了“汇合朱毛红军”的行动口号。后来，红7军历尽艰险到达中央苏区，与中央红军会师。来到中央苏区，使我们耳目一新。苏区政权巩固，红军纪律严明，战术灵活，士气旺盛，翻身农民热情支前，有时出的民工担架比部队还多，伤员都能及时救护下来。看到苏区军民团结，官兵团结，根据地建设形势这样好，我们很受鼓舞，并且认识到，这都是执行毛泽东路线的结果，对毛泽东同志非常钦佩和敬仰。但是，在中央苏区战斗的日子里，我还没有见过毛主席。直到长征路上的遵义会议后，总政治部召开军民大会，毛主席向中央红军总直属队和群众传达遵义会议精神，我挤到主席台前，才第一次见到毛主席。那时毛主席瘦瘦的，讲话的声音很洪亮。以后，我到了上级干部队和红军干部团，在长征中随总直纵队行动，这才经常见到毛主席。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我在红军学校（后改为红军西北大学），随中央住瓦窑堡，见毛主席的机会更多了。那时，我住在山坡上，毛主席就住在下边，每天都能看见毛主席。后来成立了红大，毛主席兼政委；抗大时毛主席是教育委员会主席，经常来校讲课、作报告；在留守兵团期间，曾和毛主席一起学习，又经常得到毛主席的关怀和教导。在主席身边工作学习的日子里，毛主席的伟大人格，深邃思想，渊博学识，勤奋精神和朴素作风，使我敬佩不已，深受教育，是我一生中最幸福最难忘的一页。毛主席聪颖智慧，天资很高，看问题、理解问题的能力很强，确是与众不同，令人佩服。1938年，我参加毛主席组织的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研究会时，每次讨论，主席除了插话，都是在最后讲自己的看法。毛主席对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性质和集中兵力等观点表示赞许。毛主席还评论说：“克劳塞维茨军事理论可以，实战不行，军功不多，只能当个参谋长。”毛主席看问题，目光敏锐，见解独到，分析精辟，确是高人一筹，使我们得到许多启示和教诲。后来，毛主席写出《论持久战》初稿，送给我看，让提意见。我看了以后，感到非常解渴，心里明亮起来。那时，全面抗战的烽火已经兴起，正面国民党战场节节败退，在国民党营垒中弥漫着亡国论和速胜论的情绪。抗日战争将向何处去？抗战的前途怎样？这是全国人民十分关注的问题。蒋介石一筹莫展，只是一个劲地吹嘘：相信他蒋委员长是有办法的。却拿不出什么像样的办法来。毛主席通过对中日双方国情特点和力量对比的分析中，得出了抗日战争由防御到相持到反攻的战略发展阶段，提出了持久战的战略思想，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指明了方向。后来战争的发展进程，完全证明了毛主席的英明预见。毛主席高瞻远瞩，目光远大，很有预见性。毛主席理解能力强，记忆力也非常好。他

爱学习，读了大量书籍，许多古诗词，他都特别熟悉。他在晚年时，还能把《枯树赋》背咏下来。聪明来自勤奋，除了天资条件之外，当然也在于他的勤奋用功。毛主席的学习精神是大家普遍敬佩的，他除了工作之外，就是看书学习。白天日理万机，晚间熬夜苦读。讲话作报告及各种工作文稿，大多是他自己动手写，有时还为报纸写评论。毛主席非常爱读书，很注意收集书刊。那时延安艰苦，各种书籍都很缺乏，他让我们在各地送延安的慰问品中，经常挑选一些书刊送给他。一次我到毛主席处汇报工作时，顺便提到我得到一本小册子，是日本人写的关于外线作战问题的，主席马上说：“借给我看”。过了一天，我就给他送去了。主席见到这本书很高兴，因为主席已经开始考虑外线作战问题了，急需参阅这方面的书籍。其实，在我还没把书送去时，主席已经给郭化若写信，说发现了这本书，告郭化若“向莫主任要”。毛主席还经常推荐一些书给大家看。我们在红大学习时，毛主席看到艾思奇写的《大众哲学》一书，认为很好，便告诉林彪，让红大第一科学员都读一读。于是，由我去主席处借回这本书，大家配合哲学课认真阅读。毛主席看过李达编写的《社会学大纲》后，便告诉肖劲光和我，要读这本书。我们托人去西安买来，啃了两个月。在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倡导和带动下，当时延安的学习空气非常浓。广大干部怀着高度的革命热情 and 责任感，学理论，指导工作，改造思想，虽然物质生活艰苦，大家吃小米，住窑洞，穿草鞋，却能集中精力，专心致志，响应毛主席号召，开展学习竞赛，掀起了广泛而持久的学习运动。当年毛主席倡导的延安学习运动，成为延安精神的重要方面。延安时期，毛主席认真看书学习，结合中国革命实际，致力于理论研究，是他出书最多的时期。他经常到红大、抗大、中央党校等他讲课，作报告，先后发表了《辩证唯物论提纲》、《实践论》、《矛盾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与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许多重要的理论著作，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这一时期是毛泽东思想比较完整地形成的历史时期。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包括党的建设的理论和处理党内关系的原则（人民战争理论策略战略思想），在这个时期都比较完整地形成了。作为伟人，毛泽东有过人之处，也有常人的一面。他讲话幽默风趣，给人印象颇深。一次毛主席亲自修改我起草的一篇文章，把我叫去了。一进门，主席笑着说：“莫文骅，你比斯大林还高明啊！”我一下愣了，忙问：“报告主席，是怎么一回事？”主席说：“斯大林的对德宣战，才用了不到千字，你的文章三千字，不是高明么？！可是，他把问题讲清楚了，你却没讲清楚。”我这才明白，说：“我写不好，所以请主席改。”主席说：“你不是当过宣传部长吗？”我说：“战争时期的宣传工作，大多用口讲或写提纲，我文章写得少”，他“哦”了一声。接着，主席给我讲了怎样写文章，怎样抓住中心，做到简练生动，并告诫要向鲁迅讲的那样，文章写成后至少要看三遍。那时，见毛主席很容易，主席也平易近人，自己有点什么事情就跑到主席那里去请示。有一次，一个工作上的问题，我想了两个方案一时下不了决心，跑去请示主席，问他哪个办法好？他考虑了一下说：“两个方案都可以考虑，不过你应该有个倾向性的意见，不能你出题目让我做文章呀！”我这才意识到自己的作法不妥，便谈了倾向性想法，他说：“这就对了，就这么办”。这是要求我独立思考解决问题。在延安艰苦的岁月里，毛主席和大家一样喝延河水，吃小米饭，同甘共苦，每

月津贴都是几元钱。他比我们好点，有大米吃。那时，我们常在他家开学习讨论会，到深夜，毛主席把组织上照顾他的大米用来请客。毛主席生活非常俭朴，节衣缩食，粗茶淡饭，穿有补丁的衣服，棉鞋烤火时烧个洞照样穿出来。都说毛主席爱吃红烧肉，那时能吃上红烧肉算是最高的享受了。有个传说，陕北老乡下馆子，掌柜的问吃什么菜？吃红烧肉吧，吃得高兴，又喊掌柜的：“再来红烧肉！”第三次喊掌柜的还是红烧肉。可见下馆子吃红烧肉也算最高标准了。毛主席爱吃红烧肉，因为那时没什么好吃的，另外也是吃出感情来了。毛主席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一直保持到建国以后。1951年5月，我从广西去东北，路过北京去拜访毛主席，他留我吃晚饭。四碟菜一碗汤，碟子很小，两荤两素，其中有一小碟油炸青辣椒。因为待客，才加了一瓶通化葡萄酒。解放几年了，主席工作那么忙，吃这么简单能顶得住么？为什么不改善一下？这件事，如果不是自己亲身经历是不敢相信的。多少年了，我对这顿饭还是记得很清楚。3年困难时期，毛主席知道人民吃不饱，有浮肿病，还有饿死人的，很难过，决定不吃肉。我们知道后，甚为感动。当时苏联赫鲁晓夫逼我们还债，国务院传话，有什么东西，可支援国家。于是，我们政治学院党委决定将准备学员毕业会餐的10多头猪交给国家还债，此决定经教职员工讨论，大家说毛主席不吃肉，我们也不吃。于是把猪交给了国家，这10多头猪虽然对还债起不了大的作用，但这是我们大家的一份心意，是向毛主席学习，为国分忧啊！延安时期，毛主席率领我们度过了那漫长的艰难岁月，我有幸得到他许多指示和教诲，留下了难忘的记忆，感到非常自豪和幸福。毛泽东同志的名字与中国革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毛泽东思想成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他亲手缔造了我们党和军队，并领导我们赢得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造就了中国历史上的辉煌。毛主席的伟大思想和实践，影响教育了我们几代人，是我们党和军队巨大的思想财富，成为我们世代相传的传家之宝。

第八章风雪辽东

南下支队

七大刚刚闭幕几天，中央党校副校长彭真同志找我谈

话说，为了推动今后抗日形势的发展，中央决定抽调留守兵团 718 团和八路军总司令部特务团，合编为人路军南下第 3 支队，到湘粤桂边区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任命文年生为支队司令，雷经天为政委，卢绍武为副司令，我为副政委。在抗日战争迅速发展的新的形势下，我觉得这次南下是去开创新局面，故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一新的战斗任务。在这之前，王震、王首道的南下第 1 支队已去大别山，与我支队同时南下的，还有张启龙、刘转连率领的第 2 支队。

回到家里，我把工作调动之事告诉杨枫说：“这次南下，

不知何日能见面，也不知这辈子能否见面，你要有思想准备，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要坚持革命，抚养好孩子。”她表示服从组织安排，要我放心。我考虑她年轻，一人抚养未满 5 岁的孩子，困难不小。为安排她母子俩的生活，我拿着家里的旧皮箱，托军委供给部长叶季壮同志替我变卖了 27 块大洋，交给了妻子。临行前的一天晚会上，我遇到刘少奇同志，向他汇报了自己将南下执行新的任务。他十分诚恳地说，你们这次南下的任务是艰巨的，千里迢迢，有黄河、洛河、长江等大江阻隔，并要通过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线，会遇到很多困难和危险，你们不要因形势大好而冲昏头脑，要充分做好战胜各种困难、险境的思想准备。到了南方，要穿便衣，要紧密依靠当地广大群众，不断发展、壮大革命力量，坚持到大军南下。单靠你们自己的力量是很困难的，等大军南下才能发展。少奇同志的话很实际，想得很周到，使我们的脑子更加清醒，有了长期艰苦奋斗的思想准备。经过十几天的准备，队伍终于在 1945 年 7 月初出发了。告别延安时，难免产生一种依依不舍之情，自己在陕北战斗、学习、生活了整整 10 年，对边区的军民，乃至一草一木、一山一水，我都感到格外亲切和留恋。回想 1929 年离开南宁上百色参加武装斗争时，自己连父母兄弟也不能说一声，那时不说倒痛快，而现在，能向妻儿告别和叮嘱，心头却有几分牵挂。因此，当我走出家住的窑洞时，便把门反关起来，不让他们母子送出来。我骑上马，一甩鞭，马便“嘚！嘚！嘚！”向东北方向奔去。回首眺望，巍巍屹立的宝塔山渐渐地隐没在白云里，我离别了延安，踏上新的征途。我们经过几天行军，到了绥德，休息两天，又往葭县，在那里东渡波涛滚滚的黄河。大家坐在民船上，随着滔天巨浪，有的唱起了《黄河大合唱》：“怒吼吧，黄河……”大家的抗日激情同黄河一样激荡。过了河，便是日伪军占领区。我们走了几天，便与日军遭遇。敌人有五六百人，我们有 1000 多人，且多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兵和干部。卢绍武首先率一个连攻击敌人。开始，敌人以为我们是游击队。战斗打响后，看我军的布阵、队形、火力，知道不妙，遂撤退。我们的任务不在歼灭，故杀伤其后撤部队数十人后便继续前进。这是过河后的第一仗，旗开得胜！敌人很怪，凡是被我军打死的，尸体抬走，抬不走的，割下脑袋或耳朵带走。到了山西平遥附近时，我们支队与一起南下的张启龙同志率领的第 2 支队，组成一个总指挥部，由文年生同志兼任总指挥，张启龙同志兼任总政委。两个支队到达汾河时，在一个镇上吃午饭，准备过河。一会儿，天上出现了日军飞机，我们立即就地疏散隐蔽。据我们的侦察员报告，离此不远有日军的据点，说不定我们会遭受据点敌人的袭击。那时，文年生同志已随总指挥部在上游过河，而我们支队由副司令员卢绍武同志和我率领，渡河

点尚未选好，情况很紧急。听说有徒涉河段，但不知其具体方位。如派侦察员去找，时间已来不及了，我和卢绍武同志便骑着马涉河寻找徒涉点。在一位老百姓的帮助下，我们找到了渡河点，立即跃马返回驻地，命令部队迅速过河。结果，不到一小时，全支队安全渡过了河，我的胞弟文骝也随广西支队在此渡过河，向平遥方向前进。在离平遥县城约 10 公里的地方，我们侦察到平遥县城有日军的碉堡。总指挥部的部署是：张启龙、文年生率第 2 支队从离平遥 5 公里远的地方通过：我们支队作掩护，在离平遥不远的地方通过，且白天在敌人炮火射程内。因此，我立即动员部队，每人保持一定距离，快步前进，不管情况如何，队伍不能散。接近平遥外围时，日军的山炮从碉堡里打过来了，伤了我们一些人。其机关枪也狂叫起来，我们冒着炮火，继续跑步前进。突然，我们左侧枪声大作，估计是总指挥部和第 2 支队与敌人接触了。我们没有接到新的情报和指示，只得按原路线继续往前跑，以尽快脱离平遥地区。这时，右侧又发现一支队伍向我们这里开来。我当机立断，立即调一个连的兵力，前往右侧山地迎击。同时，紧急集合其余队伍，以便接应。从右侧来的那支队伍走近了，我们仔细一看，原来是当地抗日游击队，这真使我们喜出望外。他们带我们离开平遥向南而行。不久，第 2 支队的部队也集合起来，听说他们被日军追得很紧，牺牲了一位团参谋长。原来，日军得知我们要通过平遥的情报，估计我们不会在离县城很近的地方通过，故先到离县城 5 公里外设伏。这样，正与文年生、张启龙率领的支队遭遇，而我们支队却较“安全”地通过了。7 月下旬，我们到达晋南时，恰遇欧致富同志率领的原八路军总司令部特务团南下开辟游击根据地，按总司令部的指示，该团隶属于我支队，这样，我们支队便增至二个团了。接着，我们便一起向河南漯河方向前进。

这是一个较偏僻地区。凡是国民党占领的地方，只有少数保安队；若是日军占领的城镇，也只有几十个日伪军守卫着。对那些国民党保安队，我们以正规军身份，强行“借路”，要求他们安排吃、住；对那些日伪军据点，我们有时绕道通过。有的不便绕道的，便给予强袭，缴了他们的枪，然后开拔而走。一路上，打了一些仗，缴获了敌人一些武器，而我们尚没有什么大的损失。8 月，苏军出兵东北，对日宣战。中国抗日战争进入全面反攻阶段。8 月 15 日，传来了震撼人心的特大喜讯：日本天皇被迫公开宣布无条件投降！8 年的艰苦抗战，终于以我们的胜利而告结束了！这是近代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武装侵略斗争第一次取得完全的胜利，洗雪了百多年来中华民族的耻辱。举国上下，一片欢腾，庆祝这来之不易的胜利。我支队广大指战员，也沉浸在一片喜悦之中。在胜利喜讯鼓舞下，我们日夜兼程，向南开进。到了河南漯河附近，遭到伪军和地主武装的阻击，过不了河。而日军虽宣布投降，又不愿放下武器，故我们八路军、新四军的反攻作战仍在继续进行。根据中央军委的电令，我们支队暂在豫西一带活动，配合晋冀鲁豫部队，先后收复了济宁、新乡等地，控制了北宁线，阻止了国民党军利用铁路四处抢摘抗战胜利果实。不久，中央军委根据抗日战争胜利后形势的发展变化，电令我支队停止南下，迅速挺进冀热辽，以接收日军投降，开辟东北根据地，部队遂出发北上。

挺进东北

1945年8月底，我们冒着暑气逼人的天气，从豫北出发，急行军到林县时，听到林彪等人从延安来，经林县向濮阳往山东去的消息。七大期间，林彪曾对我说，他准备到山东去，并希望我同他一起去。当时我也想到前线去，便答应跟他到山东工作，后因中央令我南下，故没去成。现已不南下，且来到山东边境，倒不如就此到山东去。我给中央发电报请示。中央电复说：随队北上或去山东，由你自定。这样，我便带秘书徐宗华和警卫员罗克康、李杰同志，乘4匹马向东追去。沿途是新解放区，到处涌现参军支前热潮。我们走了几天，赶到濮阳县，见到鲁西军区司令员杨勇同志，他说，林彪已奉命转向北往冀察热辽去了。我们遂向北追去。每天以40至50公里的速度追赶，因林彪的行动保密，故我们追赶了几天都不见他踪影。到了冀南，遇见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副书记薄一波和组织部长宋任穷同志。他们见后惊讶地问我：“你为什么到这里来？邓小平同志曾电报中央，要你到冀鲁豫军区担任政治部主任，中央也同意了，你还不知道？”我回答说：“不知道。”并对自己近况作简单说明。他们说：“你现在返回已不可能了，也不必要了，还是去东北与蒋介石抢天下吧！你若同意，由我们报告中央。”这样，我按照薄一波和宋任穷同志的意见，策马北上。一路上，马不停蹄，昼行夜宿。好在这一带是新解放区，群众对八路军热情接待，每天供给谷草喂马，帮助我们解决很多行军上的困难。我们虽然疲劳不堪，但精神一直很振奋。本拟沿北宁线出山海关，因美国海军帮国民党运部队抢占山海关，我们遂改道从天津附近往承德。在离天津约50公里处，要通过马路过运河，我们跟着地方武装掩护的干部队伍走，有男女老少，有步行或坐大车的，都是赶赴东北前方的。我们4人带有驳壳枪，故走在后面殿后。通过马路时，遇到美国军队的炮兵队，为防万一，走在前面的赤卫队即先占领马路上的小炮楼，幸而双方没有发生冲突。我们安全通过马路后，便乘坐木筏，渡过了运河。途经热河无人区时，真是满目疮痍，赤地千里！在日军铁蹄蹂躏下，村镇的房子被烧光了，田野杂草丛生，有些老百姓刚刚回来，搭棚重建家园，有的赤身裸体，有的用禾草遮身，10多岁的姑娘也不例外。过了无人区。不久便到了承德，这是河北东部较大城市，也是我们10多年未见过的大城市。它是京承、锦承、承隆3条铁路的枢纽，周围群山环抱，是一座具有北国风光和名胜古迹的山城，当时，该城新解放，由苏军占领，我们便开始组织人民政权。许多从延安来的同志，都汇聚于此，再待机去东北。我们已经走了整整两个月，在此稍作休息，把马交给地方政府，另乘火车去沈阳。热河省委负责人胡锡奎同志给予我们热情接待和帮助，并送给我两瓶烧酒。这在当时是较贵重的东西，我没舍得喝，留下来准备办事用。听人说，若拿着酒到火车站与苏军打交道，便有上火车的希望。于是，我拿着这两瓶烧酒，并带一位俄语翻译到车站，我对一名苏军士兵说：“我想乘火车去沈阳，请求帮助。”他问我是什么职位，我说是师政委。他听后对我很尊敬，表示愿意帮忙，并说，他想得到一些外伤用的药品，问我可否帮弄到。正好我从延安来时带了几瓶云南白药，便拿出一瓶给他说：“这是外伤特效药，送你一瓶。”他接药后非常高兴，我又把带去的两瓶烧酒送给他，他立即带我去找司令部。其实，这是一个班部。经他与“司令”（班长）商量，同意让我上车。他们则拿着我送的烧酒，开怀畅饮。快开车时，原红5军团13师政治部主任周碧泉同志来送我。他刚从苏联学习回来，听说我经承德到沈阳，赶来看我，并送给一些

伪币，作为路途之用。到了锦州，见到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副司令员兼锦热军区司令员李运昌同志，虽然我们过去不相识，但他很热情，设法帮助我搭上去沈阳的日本难民坐的火车。车上很拥挤，没有座位，我只好站在两节车厢之间，摇摇晃晃，虽很疲劳，但总算比别人快些到了东北。沈阳是东北一座古老的大城市。因当时它是苏联红军占领，八路军的招牌拿不出来，戴的仍是伪警察的帽子，甚是难堪。我即找到先期到达这里的彭真同志，他与陈云、程子华、伍修权等同志到达沈阳后组成了中共中央东北局，彭真为书记。他即分配我担任沈阳警备司令部副政委。过了10天左右，罗荣桓同志率山东抗日部队冒险过海来到沈阳，担任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政委。我们相见，分外高兴，他介绍我到安东去，说那里是山东过来的抗日部队，新成立南满军区，要我担任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这样，我第二天即持介绍信从沈阳动身，乘火车经本溪湖到安东去赴任，开始我在东北新的战斗生活。安东（丹东），是辽宁东南边的一座中等城市，人口约有二三万，市面很繁华。隔鸭绿江与朝鲜为邻，江上架有铁桥，可以互相往来。背靠镇江山，依山傍水，景色秀丽。当时刚10月底，但已大雪纷飞，到处呈现出一片银色的世界。苏军已撤出安东，驻守在江对面的朝鲜。南满军区刚成立不久，肖华同志担任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及省委书记；江华同志担任军区第二政委兼省委副书记；吴瑞林同志担任军区副司令员；我担任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及省委委员；沙克同志担任军区参谋长。军区管辖的范围从沈阳以南、大连以北（该半岛仍为苏军占领）至抚顺以东的长白山一带。部队基本是从山东渡海过来的八路军115师的6万多人，他们经过8年抗战锻炼，有战斗力；有一小部分是东北解放后才参军的贫苦农民；还有一部分是东北解放后参军的伪满士兵，加上后来冀热辽军区第16军分区合编过来的部队，共有15万多人。编成两个纵队（即第3、第4纵队）、3个军分区和1个独立师。从“九·一八”事变起，东北已被日本帝国主义蹂躏了14年之久，奴化教育使许多人麻木起来。经济上遭受的盘剥到了顶点，群众家里除了铁锅、菜刀外，别无其它铁器。食物供应很紧张，吃的是配给的有限量的高粱米、玉米，或白面中掺入玉米粉，叫协和面，很少人能吃到这种面。日本投降后，留下烂摊子，民生凋敝，工厂遭到严重破坏。苏军出兵东北时，把日本人在东北建造的许多工厂的重要机器拆除，作为“胜利品”搬运到苏联。故我们初到东北时，许多工厂关闭，有的设备不足，有的缺乏技术人员或原料，电厂发电很不正常，火车经常要烧木柴，运输非常紧张。政治环境更为复杂。日军投降前，将日、伪、满的反动势力集中在南满。因那里是火车“盲肠”，隔江是朝鲜，再不能往前走了。日军投降后，留下了日、伪、满的散兵、警察、宪兵、特务、汉奸、土匪以及地方反动势力，他们互相勾结，伺机反扑。国民党潜伏的特务机构也活跃起来，造谣惑众，散布“八路军长不了”，煽动群众要“服从中央政府，拥护中央军，迎接蒋介石军队占领东北”。他们甚至暗杀我军政人员，在安市，就曾发生我们干部被杀害事件。

从1945年11月开始，在美帝国主义大力支援下，国民党从秦皇岛登陆两个军，先后攻占了山海关和锦州。敌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扬言说：不出半年，全部占领东北。

面对东北严重局面，我们根据中央《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放手发动群众，肃清匪特，安定社会秩序，解决人民的生活困难，并尽快恢复交通和工厂的生产，以便站稳脚跟，整顿和发

展武装力量，坚持长期的、艰苦的斗争。

我到南满军区后，首先建立了政治部，由李毅担任秘

书长，王淮湘任组织科长，刘汉同志任宣传科长。我们政治部的主要工作是：收容日本投降的官员和难民，把他们送回瀛洲三岛去；吸收伪军参加部队，对他们进行教育改造。对其要求解甲归田的，则给予适当安置；热情接待从关内渡海经安东到北满的大批干部，给予种种物资补充等。至于接收日军武器，因主要的武器已被苏军搬过江去了，剩下的武器很有限。开始，我们工作量很大，干部少，对城市工作又缺乏经验，但在省委和军区的领导下，边干边学，较好地完成了任务。

当时，我们与驻在对岸新义州的苏军，一直保持着较

友好的关系。我们对苏军当作“老大哥”一样尊敬，经常邀请苏军军官偕夫人来欢宴。他们也请我们过去庆贺新年，双方关系很融洽。尤其是那些下级军官，对中国革命很同情，知道我们需要武器和弹药，设法将其接收日军的一些枪炮弹药给我们，故我们军区的军械比较充足，还由海上运送一部分到关内各革命根据地。1945年12月，国民党军队沿北宁线向沈阳方向进攻，为了贯彻党中央关于“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决策，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从沈阳撤到本溪。不久，我们南满军区也从安东移到本溪。这时，东北局对南满军区领导成员进行了个别调整。调辽西军区副司令员程世才同志为南满军区司令员，肖华同志任军区政委。同时，把冀东第16军分区曾克林、唐凯部编入南满军区，曾克林同志任军区副司令员，唐凯同志为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副主任。1946年2月16日，程世才和肖华同志率军区主力第3、4纵队攻打沙岭村，该村驻有敌21师一个营，经过几天战斗，因其工事坚固，未能奏效，即撤离。在此同时，我和曾克林同志率一个多师兵力，向辽中方向进击，目的是打敌人增援沙岭的部队，曾与敌22师一个团遭遇，经过激战，歼敌一个营，俘敌百余人。后我又与曾克林、谢甫生同志率部到北边柳林一带作战。有一次，战斗很激烈，敌人凭其美式装备，拼命死守其据点，我们围攻了三天三夜，我没有合过眼，只靠煮人参水提神，战斗结束后，我竟睡了一天一夜。1946年1月底，春节临近。杨枫带着6岁的孩子小琴（安来）突然来到了本溪，延安一别，已半年多了，想不到会在冰天雪地的东北相见，政治部的同志也为我们的久别团聚而高兴！原来，杨枫在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看到中央党校有大批大批的学员要求分配出去工作，她从总政治部组织部长胡耀邦同志那里，打听到我在东北的消息，便找党校党总支书记黄火青同志，要求分配她去东北工作。黄火青同志当时代表中央组织部给党校学员办理分配工作手续，他答应了杨枫同志的要求。因杨枫是个别调动，不是成批分配，所以没有编队。后勤部长叶季壮和徐林同志给她买了一头大骡子，我的老饲养员老李同志因长征时耳朵被大炮震聋，没有参加南下支队，他听到杨枫要到东北去，坚决要求同她一起去，帮助饲养骡子。另外，后勤部政治部主任邓飞同志还派炊事员老杨同志在路上帮助照顾小孩。他们一行4人，于1945年9月18日从延安出发，经过绥德到黄河边上，乘坐木船渡过黄河，到了兴县，晋西北军区副参谋长陈漫远见到杨枫母子只有一头骡子，便又给了一头小毛驴，并安排她与陈奇涵同志一家同路而行，以便互相照顾。从兴县到张家口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较平坦的大道，另一条是山路。为安全起见，他们决定走山路。一路上真是山连山，峰连峰，加上天气不好，狂风暴雨，路又滑，有时牲口跌了个四脚朝天，杨枫和小琴都曾被摔过。有的

同志不幸掉到了山沟里。山下还有国民党阎锡山军队在路上截击。他们翻山越岭，穿过敌人封锁线，于11月7日到达张家口。途中因岔路较多，饲养员老李同志在一个十字路口走失了。到了张家口后，他们满以为可以坐火车了，故把牲口交给了组织。谁知前边不通火车，杨枫又重新分到一匹马，仍和陈奇涵同志一家继续行军。到了承德时，天气冷了，陈奇涵同志劝杨枫母子留下过冬后再走。但她急于去沈阳，便坐上运货的大闷罐子车赶往阜新。因货车的人很拥挤，下车时找不到帮助照顾小孩的老杨同志，杨枫只好自己背上孩子，拎着包袱行军。原打算从阜新坐火车到沈阳，因黑山有敌情，故坐了一段火车便改坐马车，于1946年元旦到达彰武。马路上积雪没到膝盖以上，人一出门，呵气使头发冻成白霜，眼眉和睫毛也变得雪白。杨枫见孩子冻得可怜，打算到招待所住一段时间再走，但敌情变化，只好继续坐马车往前走。她已打听到我离开沈阳到南满，现住在本溪湖的消息，便从彰武经铁岭到抚顺，想在那里停一停，因那里的同志也正准备转移，只好再往南转。由于天寒地冻，马车的车轮上无论放多少油都不起润滑作用，反而把车轮和车轴冻在一起。马车像爬犁一样滑行，下坡很危险，只要轮下有一点东西，大车就整个翻过去。有一次，杨枫和小琴被摔出去好几米远，被大车扣在下面，孩子没有一点声音，她以为被压死了，幸好没有伤到要害处，也许是孩子冻僵了，哭不出声来。他们从延安带出来的被子、褥子和几件换洗的衣服，一路上送了一部分给那些赤贫如洗的老乡，每人身上只存下一套衣服，另留下一床延安土产的老羊毛毯子。他们坐在马车上，浑身都被冻得像木头一样，下车时，两只脚是否挨着地自己都不知道，摔痛了也没什么感觉。他们终于战胜了严寒和困难，来到了本溪湖。经组织决定，杨枫安排在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办的《战士报》编辑部工作。春节后不久，为执行1946年1月国共两党在重庆签订的停战协定，由美国、国民党和中共组成的3人和平调处小组，由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参谋长伍修权同志带他们到沈阳谈判。调处小组的美方代表提出，南满军区应派一名代表参加谈判。于是，肖华同志决定由我以军区参谋长的身份参加谈判，并带副参谋长谢甫生、英文翻译王萍同志前往。到了抚顺，调处小组把情况报告沈阳军调处，那里的国民党当局不同意南满军区派代表参加，要我回去，否则，不保障安全。我便对美军代表说：“是你们要我们来参加的，应保证我们的安全。”在沈阳，我们住在军调部中国东北分部处，组长是饶漱石，副组长是李立三。国民党方面仍坚持要我们回去。我们仍揪住美方代表，让他设法送我们回去。那时，敌机活动频繁，有向本溪湖进攻的态势。这样，我们不好直接回本溪湖。恰巧，我军解放长春时，扣留了两名美国记者，经交涉，美方派飞机会接，并让我坐他们的飞机去长春。我坐在飞机上经四平上空时，往下看，硝烟弥漫，敌我双方正在激战。到了长春，彭真同志说，我军已撤出四平，日内，长春也要撤退。这样，我带一位警卫员，立即离开长春，乘火车往吉林，拟经吉林到梅河口。因火车无煤，我们改乘压道车，由杨至诚同志派一个班护送到通化，又乘火车去凤甸。火车烧的是木柴，烧一阵，走一段，走走停停，好不容易到了凤凰城。南满军区机关已放弃本溪湖迁移到该城。回到军区当天，得知南线我军攻打海城时，云南部队以潘朔端为师长的184师师部及两个团起义，军区决定派我去迎接他们，于是，我第二天一早，便经安东、岫岩到大石桥。这是国民党军在东北战场上的第一次起义。我向他们宣传当前形势和我党的主张，指出蒋介石背信弃义，撕毁国共双方签订的停战协定，发动内战，其内战前途

是：我军必定胜利，国民党军一定失败。我把他们接到安东附近，进行整训。不久，军区机关又迁回安东。因敌情紧张，敌人已从本溪湖南下进逼，我们随时都做好转移的准备。

七道江会议

东北国民党部队强占沈阳、长春、本溪等地后，经过补充和整顿，于1946年10月中旬，纠集10余万兵力，采取“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对我南满解放区发动大规模攻势，妄图先吃掉我军南满主力，解除其北进的后顾之忧，然后转兵北上松花江，全力进攻北满，实现最后占领东北的梦想。鉴于敌强我弱的形势，苏军曾向我们建议：死守安东，把安东变成第二个马德里。但我们按照毛主席关于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而不计较一城一地得失的方针，决定暂时放弃安东，把军区机关转移到临江。而军区的伤病员和家属，如王新兰、吴仲莲和杨枫等都带小孩迁至新义州，由苏军照顾。我和曾克林同志乘汽车到赛马，向第4纵队传达军区的决定，要他们诱敌深入，选择有利时机，歼敌一路或一股，逐渐消耗和削弱敌人的有生力量。时值初冬，高山见雪，寒风凛冽。我第4纵队指战员，根据军区的指示精神，在代司令员胡奇才、政委彭嘉庆率领下，于10月31日至11月2日，集中3个师8个团的相对优势兵力，在宽甸西北30公里之新开岭地区，全歼蒋介石反共老本之一、自吹为“能征惯战”、有蒋家“千里驹”之称的敌25师，生俘其师长李正谊以下官兵6200余人，毙伤团长以下2100余人。此役，首创东北我军全歼敌一个整师的辉煌战绩，保障了辽东党政军民战略转移，夺得了我军四保临江的准备时间，因而得到中央军委、东北民主联军总部、辽东军区的嘉奖。毛主席亲自起草中央军委嘉奖电报。新开岭战役后，敌军经过短期休整，于1946年12月中旬，又对南满我军发动进攻。这时，南满根据地只有长白山麓的临江、抚松、蒙江、长白4县在我控制之下，其它地区已沦陷，成为敌后游击区。长白山区纵横不到175公里，地域狭窄，深山老林，山高坡陡，道路不便，回旋区域小。这里地瘠物乏，气候严寒，村庄稀少，人口共25万，生存条件差。这里群众尚未发动起来，严冬时节，大雪封山，气温降到零下40度。军区和省委机关及主力部队都聚集在这山沟里，粮食供应困难，装备不足，兵员无着，衣食住藏都成了大问题。加之敌重兵压来，情况非常险恶。正当南满斗争形势严峻和极困难的时候，为了加强对南满斗争的统一领导，东北局派陈云、肖劲光等同志来到辽东，在临江成立中央东北局辽东分局，统一领导南满地区党、政、军的工作。陈云同志任分局书记兼军区政委，肖劲光同志任军区司令员，肖华同志改任军区副司令员兼副政委，程世才同志任副司令员，罗舜初同志任军区参谋长，吴克华同志为副参谋长，我为军区政治部主任，唐凯为副主任。在国民党军大举进犯，重兵压境的情况下，军区于1946年12月11日在七道江军区前线指挥所召开了军事会议。会议由肖劲光同志主持，因他刚到南满不久，会议主要由肖华同志具体组织。参加会议的有罗舜初、我、曾克林、刘西元、彭嘉庆、韩先楚以及3、4纵队师级干部。陈云和程世才、吴克华等人因在临江，没有到会。会议的议题，主要是研究今后行动方向和作战方针问题。会议第一天，军区领导同志作了报告，提出了撤离南满，转移东满的问题。其理由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敌强我弱，不能与敌决战，长白山区地形狭窄，大兵团作战没有回旋余地，不是主力久留之地；主力撤至东满，可摆脱敌人追击；尔后与北满主力汇合，兵力集中，不会被敌各个击破；到了北满若有危急情况，可背靠苏联，比较保险，等等。这个报告，是会前一天的晚上，由在七道江的几位军区领导同志研究的意见。实际上，会前军区已下达了主力北撤的预令，部队做好了过山林的斧头、锯子、绳子和爬犁、干粮等各种准备。对会议的

报告，大家议论纷纷，各抒己见，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最后，基本上形成两种意见。一种是同意报告的意见，撤到东满，保存实力。另一部分同志主张坚持南满，反对撤退，持这种意见的人是少数，有韩先楚、彭嘉庆和我等几位同志。其理由是：南满的战略地位是举足轻重的，如果放弃南满北撤，正中敌人“南攻北守”的战略意图。坚持南满，可以拖住敌人，与敌周旋，等于在敌人屁股后面吊个大冬瓜，牵制敌人主力，配合北满主力南下。对整个东北战局有利，对今后战略反攻有利。敌人虽强，但其战线拉长，兵力不足，内部矛盾重重。南满我军已有相当实力，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可以坚持的。4纵队全歼敌25师，已充分显示了部队的战斗力。我在发言中，还讲了这样一段话：若把队伍拉到东满去，要经过深山老林，很难通过，即使去了，敌人会尾追而至，把敌人引到东满，再撤北满，敌人再追至北满。当时，我用了一个不很恰当的比喻是“水涨船高”而已。这是下策。会议讨论了两天，对去留争论很激烈，意见统一不起来。这时，接到敌情报告，敌人两个师已向我梅河口、辑安进犯，形势急迫。于是领导同志决定撤离南满，并讲了明天早上，派一个师作为先头部队，开向东满，并准备通过大森林时用的刀、斧、锯、绳子及干粮。会议结束时，已是13日的晚6时。我回到宿舍，正好警卫员弄来了狗肉，我请韩先楚、刘西元等四五位同志一起去吃饭。形势紧迫，大家心急如焚，边吃边议论开会之事，都认为南满应该坚持，也有信心坚持。并说我是政治部主任，应再向军区领导反映这一意见。饭后，我即去了军区一位领导同志的宿舍，他刚好吃完饭，和他的夫人（也是秘书）在屋。因我们两次合作共事，彼此很熟，故谈话比较直率、随便，我便把大家的要求和坚持南满的理由又讲了一遍。最后我说，陈云是中央分局书记，不在场，对撤出南满这么重大的问题，你们是否商量过？你是否向陈云同志请示汇报了？他的意见如何？如果不经上级党委同意，便放弃南满根据地，日后我们这些领导人的政治结论如何写啊？他听完，“唔”了一声，当即挂通了临江陈云同志的电话，把我刚才反映的意见向陈云同志汇报，并说我还在他家里。陈云同志和他说什么我也听不清楚。他打完电话对我说，陈云同志马上动身连夜乘火车赶来，明早可以赶到。于是我便告辞回了宿舍。听到军区参谋处已下了通知，要求各部队准备刀斧、锯、绳和干粮，整装待发。次日一早，我便去看陈云同志，见连夜赶来的陈云同志正在室外洗脸。我跟他打了招呼，他毫无倦意，问昨天开会情况，我简单把会议情况和我们几位同志的意见向他作了汇报，他听后说：“吃过早饭再开会议一议”。14日上午9时许，继续开会，议题是对昨天会议决定的复议。这表明陈云同志对这一重大问题的处理是持慎重态度的。会议由陈云同志主持。会上，主张坚持南满斗争的人多了起来。原来主张撤退的同志，态度也有所转变。陈云同志倾听了各方面的意见后，全面分析当前的形势，权衡撤退或坚持的利弊，提出了坚持南满斗争的意义和可能性。他说，闯进东北的敌人好比是一头牛，其牛头是向着北满的，尾巴在南满。若我们松开牛尾巴，这头牛就要横冲直撞，南满保不住，北满也难保；我们抓住了牛尾巴，它就进退两难。而要抓住其尾巴，是比较费劲的，也要付出较大的代价，但从全局来说，这个损失要比放弃南满的损失要小得多。大家要我来拍板，我现在拍板就是坚持南满，一个人都不走，留下来打。他的讲话坚定、果断，分量很重，基本上统一了大家的思想。会议最后确定了“巩固长白山区，坚持敌后3大块（即辽南、安东、辽宁3个军分区所辖的地区）”的战略指导思想，制定了正面与敌后

两个战场密切配合、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相结合、运动战与游击战相结合的作战指导方针。这次会议，解决了南满向何处去的问题，为挽救南满危局，打破敌人的战略部署，最后决胜东北，具有重大的作用和意义。在南满斗争的危急时刻，陈云同志全局在胸，高瞻远瞩，拍板定案，打破了那种“保存”实力的退却思想，解决了部队干部思想上怕伤亡，保实力的问题，又弄清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在今天的意义，绝不仅仅是指部队实力，而大部分是指硬要保住完整的长白山区，当然也指部队。统一了部队坚持南满立足于打的思想，这是部队特别是高级指挥员思想的转折点。后来的战局发展完全证明了陈云同志临危拍板的正确性。我认为，七道江会议的激烈争论，是民主讨论的正常现象，也是我军军事民主的优良传统。大家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如何打败敌人的进攻，只不过是具体打法上看法不同。会议通过民主讨论，特别是陈云同志的工作统一了思想，大家齐心协力，赢得了四保临江的伟大胜利。对这样一次正常的民主会议，“文革”中有的同志却说成是路线斗争，本来是自己主张撤退的，却说成自己是坚持的，把主张坚持的说成是主张撤退的，更把没参加会议的同志说成是主张撤退的。而且无限上纲，说成是反毛主席、反林彪的正确路线，是逃跑主义，这就不实事求是了。即使在那个不正常的年月，也是很不应该的。七道江会议结束后，东北局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来电说：南满的斗争必须采取像热河或冀东及华北抗战困难时期那种局面下坚持斗争的经验，在“斗争中采取局面的坚持，以待东北与全国形势之逐渐好转”。七道江会议的决议，是与这一指示精神相一致的。基本方针确定后，我们立即转入各方面具体的战斗准备工作。当时军区物资供应非常困难。由于根据地缩小，有 3000 多伤病员和军区后勤机关被安排在临江至长白山的鸭绿江边上，时值数九寒天，气温达零下 40 度，给养运不进来，供应中断。那时，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筹措到一批粮食、药品、被服，将由东满火车站经朝鲜运至长白县隔河对面的朝鲜惠山镇，一过小河就是长白县城。本来，河已结冰，可以通行，但因雅尔塔协定关系，来往人员一律要经过小桥，桥上有苏军和朝鲜人民军把守，运到惠山的物资无法运到长白县城。这对前方作战和 3000 多伤病员的供给产生很大影响。军区党委决定派我到长白县去，沟通联系，解决后方物资的运输和供应问题。肖华同志问我有没有把握，我自认为在安东时曾与苏军打过交道，有了一些“外交”经验，便回答说：“你们放心打仗吧，后方的供应我包下来！”他又问我需准备什么东西，我说准备一卡车通化葡萄酒和一卡车冻猪肉。他即答应按我提出的数量，叫后勤部给准备好，立即运去。过了几天，我回临江，带秘书、警卫员和一个班的武装人员出发，沿着弯弯曲曲的长白山麓和鸭绿江边，奔向长白而去。经过一个星期的急行军，赶到长白县城。当晚，我即了解有关情况，决定第二天下午我以辽东军区政治部主任名义，宴请守桥的苏军和朝鲜军官。第二天，苏朝两方约 20 人按时赴宴，最高军衔是上尉。我祝酒时说，我是来视察后方部队工作的，请你们吃便饭，感谢你们过去对我们的支援和帮助。大家举杯共祝三国领袖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万岁，相互间的情谊进一步加深。宴会结束时，送给他们每人一瓶葡萄酒，他们很是高兴，表示感谢。我说，过两天去惠山镇检查我方联络处工作时，再宴请你们。过了两天，我们先送些酒、肉到惠山镇准备宴请之事。但经过小桥时，被苏军扣下了，我们的同志提出去交涉取回，我说：“算了，反正是宴请他们的。”后我们再送去，这次安然无事。第二次宴请结束，我从惠山过桥回长白时，守桥的

苏军连长和朝鲜人民军排长把我夹在中间，送我过桥，十分友好。苏军连长说：“守桥主要由我们负责，以后有什么事可找我们。”朝军排长说：“这是朝鲜领土，过桥要经过我们才能放行。”我笑着对他们说：“以后有什么事，请你们双方都帮忙吧！”隔一天，我叫联络处的同志向他们提出：由东满运来的一批粮食、被服，将要到达，请给予方便放行。我不直接出面是想留有余地，若联络处同志办不成，我再出面。想不到他们双方都慨然应允。过了几天，这批物资源源到达后，很快地从惠山运过河来。我们先把一些粮食、被服分给伤病员，解决了他们挨冻、挨饿的问题。大批物资运到南满，稳定了后方。长白山区，一片银装素裹，山川、河流、树木、房屋全都覆盖着一层白茫茫的厚雪，遥念前方作战部队和窝棚里的伤病员，我写下了《大雪有感》这首诗：

狂风昨夜雪封山，一片白茫寸步难。
疆场将士踏冰战，窝棚伤病苦衣单！
筹措军需千条策，支前群众冒严寒。
愿变一轮大红日，总把长白雪晒干。

四保临江

七道江会议结束不久，战神随即把南满根据地拖进血与火的狂涛中。在坚持南满的正确方针指导下，我南满部队贯彻军区党委提出的“咬紧牙关，度过困难，爬过山顶，迎接胜利”的号召，以坚韧不拔的战斗意志，发扬我军攻必克、守必固、追必歼的特有素质，胜利地粉碎了蒋军连续四次对临江根据地的进犯，这就是东北战场上著名的四保临江作战。第一次保卫临江的战役，是从1947年1月2日开始的。蒋介石纠集5个师的兵力，分四路向临江进攻，敌人的意图是在狭长的正面歼灭我军后，再向临江挺进。我军根据七道江会议确定的作战方案，决定分兵两面对付敌人。在正面，由第3纵队3个师及第4纵队1个师进行积极防御。他们从1月2日起至20日止，迎着风雪严寒，趁敌主力北调之际，采取速战速决的灵活机动战术，向通化、辑安线反击，连续战斗40多次，歼敌1700多人。另一方面，我第4纵队，跳出敌人包围圈，英勇地挺进敌后，一边出敌不意地歼灭敌人，一边宣传发动群众，开辟敌后战场。他们在敌后东至鸭绿江，南至普兰店，西至抚（顺）本（溪）外围，北至永（陵）通（化）公路长宽几百里之广大地区内，截击敌人交通，断其粮草，打掉敌人的据点，迫使敌人不得不从正面拉回3个师的兵力，以巩固其后方，从而减轻了我正面战场的压力。为配合南满作战，北满我军集中1、2、6纵队及一个独立师，于1月5日南下松花江，向中长路两侧的长春、吉林以北地区展开强大攻势，迫使敌人不得不暂时放弃对南满的进犯。粉碎敌人第一次对临江的进攻后，南满的战局由敌人猖狂进攻转变为敌我拉锯的局面。但敌人侵占南满的野心不死，不到两个星期，于1月底，又纠集了3个师的兵力，分别由通化、桓仁、三源浦等方向，开始向临江地区的第二次进犯。为粉碎敌人的进犯，我们采取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相结合的方针，抓住有利时机，选择正确的主攻方向，各个歼灭敌人。在内线，根据对敌情的分析，我军于2月5日，集中第3纵队3个师和第4纵队1个师的兵力，选择孤军深入高力城子、大荒沟地区的号称“常胜军”的敌52军195师展开激战。经过一天激战，歼敌5个营，毙、伤、俘敌2300余人，接着，又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乘胜挥师三源浦，向企图策应敌195师的207师发起猛烈攻击，歼灭该师两个营，俘敌团长以下1370余人。在此同时，我第4纵队两个师再次挺进敌后，牵制敌主力，相继收复了苇子谷等大小据点20余处，控制了纵横100余公里的广大地区，使敌陷于首尾失顾之境地。这样，敌人的第二次进攻临江，又以失败而告终，我长白山根据地，岿然未动。敌人两次进犯临江均遭失败后，隔了几天，经调整部署，由杜聿明亲自出面，又拼凑了4个师的兵力，于2月中旬，分3路向我临江发起第三次进攻。那时，我军只有一周时间休整，加上天气奇冷，部队缺乏御寒衣物，许多战士冻伤，其人数比枪伤还要多。但大家斗志昂扬，英勇迎击进犯之敌。2月18日，我第3纵队第7师、第9师先歼灭敌侧翼暴露的21师两个团及山炮营。与此同时，我第8师战士在老岭一带，冒着刺骨寒风，在大雪没膝的山头上，坚守两昼夜，与数倍于己的敌人浴血奋战，击退了敌91师和2师的数次疯狂进攻。接着，我第7、9师迅速南下，与第10师、第8师一起，分头向敌主力91师发起猛烈进攻，经过一天多激战，于2月22日黄昏时分，全歼该师272团及师直属工兵营。在追歼逃敌战斗中，敌195师少将副师长何世雄被我战斗英雄周桓农同志击毙。此间，我北满部队也于2月22日，再次渡过松花江南下作战，歼敌38师89团和88团一部，占领城子街、九台等地并转攻

德惠。敌为解德惠之围，拼凑了 15 个团的兵力，企图寻找我北满主力决战，并把进犯临江的敌 22 师北调增援。为拖住南满敌人，不让其北上，我南满部队即向柳河、辉南孤立之敌发起进攻。这时，敌 22 师连续遭我打击，惊恐万状，自感孤军难保，于 2 月 26 日放弃金川、辑安两城，我第 7、8 两师遂解放了柳河和辉南两座县城。敌人在我南北部队夹击下，疲于奔命，首尾不能相顾，竟丧心病狂地打开小丰满发电站的水闸，企图阻止我北满部队回师江北，并调集新 1 军和 91 师残部进行截击。我北满部队冒着严寒，涉水安抵江北，并复于 3 月 7 日三渡松花江，向扑来之敌展开迅猛反击，经过 10 天的出击，给敌 88 师和 87 师以严重打击。我南满部队也立即主动向三棵榆树与旺清之敌发起进攻，并解放了这些地区。同时，我深入敌后的第 4 纵队第 11 师、12 师也寻机歼灭敌人，先后解放了桓仁、碱厂等地。这一战役历时 37 天，共歼敌 1.4 万余人，打垮了敌人 3 个师，解放了 5 座县城，胜利粉碎敌人对临江的第三次进攻。三保临江后，我南满部队为配合北满主力部队作战，牵制敌之主力，在敌 22 师、91 师北调长春、四平之际，向通化守敌发起进攻。通化是辽东的门户，敌人的老巢，敌三次进犯临江都以此为前进基地，常驻守 1 个师的兵力。我第 4 纵队 10 师和 12 师 36 团奉命包围通化，屡遭我重创的敌 195 师面临覆灭之危境。这时，杜聿明为解通化之围，并继续贯彻其“先南后北”的进犯方针，仍把进攻重点放在南满。遂集中 10 个师的兵力，组成 3 个兵团，采取扼守要点、主力集中机动使用的战术，于 3 月 28 日向临江地区发动空前规模的第四次进犯。敌东北保安司令郑洞国、13 军军长石觉，亲临新宾坐镇指挥，妄图以营盘至通化这条路为枢纽，占领通化两侧地区，打通新宾至通化的道路后，再直取临江。面对这种严峻形势，陈云同志在临江主持召开了辽东军区党委会议。会议正确分析当前战争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情况，部署粉碎敌人进犯的战斗任务。陈云同志重申坚持南满的指导方针，他说，坚持南满，是我们应尽的责任。打下去，虽然我们可能损失很大，但对整个战局是有利的。只要有利于全局，我们损失再大也是值得的。我们要准备打大仗，打恶仗，准备付出重大的牺牲和代价，打胜这一仗，把敌人牵制在南满，大家是否同意？在讨论时，肖劲光、肖华、江华、程世才、罗舜初、吴克华和我等人，都表示坚决打下去。最后，陈云同志逐个问：“日后对这个决定后悔不后悔？”大家都回答说：“不后悔！”于是，陈云同志一拍桌子说：“成交了！坚决打下去！”在战役的部署方面，我们分析敌中路的 89 师刚从热河到东北，未与我主力交过手，自恃兵力装备的优势，骄横气盛，军区决定集中第 7、8、10 共 3 个师的兵力，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先歼灭 89 师；第 9 师抗击左路之敌；第 11 师从正面抗击进犯桓仁之敌，并牵制通化敌人，待北满主力南下时，进行全面反击。3 月 31 日，军区发出关于四保临江的指示，号召广大指战员：“要发扬革命的英雄主义，在大敌当前表现英勇无畏，以积极负责努力和坚决勇敢顽强的精神，来狠狠地消灭敌人。”战斗首先在红石砬子打响。4 月 2 日，第 4 纵队 10 师前卫 29 团前进至红石砬子附近时，敌 89 师 266 团一个营，也由西向红石砬子前进，与我接触。为查明情况，我 29 团先敌抢占了 501 高地及红石砬子西北高地。把敌人阻击在 501 高地下面。战斗至下午，我已查明情况，遂撤出战斗，诱敌深入。敌见我后退，误认为我是掩护主力向东转移，即向我阵地发动猛烈攻击。我为继续造成敌人错觉，利用敌人骄横冒进和远道新来不明情况的弱点，继续向东转移，同时，把我军主力放在机动位置上，控制了预歼该敌的有利阵地。

这时，军区决定7师由西北迂回到兰山、西葫芦一带担任主攻；8师由三源浦向西南沿李家油房对敌正面反击；9师位于梅河口、南谢家营子和红石砬子西北鱼亮子一带打击南山城子和梅河口方向可能来援之敌，并断其退路；10师由左翼沿铁路迂回到敌之侧后，与7师取得联系，防敌向西逃窜。至此，歼敌之口袋已经布置就绪，红石砬子将成为敌89师和54师162团的葬身坟墓。敌人见我节节向东撤退，更是目空一切，继续向我“口袋”猛钻，一直钻到郭家沟一带扎营。其前锋于4月2日黄昏进占了歪头山。歪头山在三源浦以西，是一个标高约300米的石山。敌人居高临下，用火力控制了三源浦。当晚，我军除留少数部队监视敌人外，主力撤至歪头山的西北高地。敌占领歪头山后，想翌日晨进攻三源浦。4月3日晨，我军已三面包围了敌人。6时总攻开始。我军炮声轰鸣，打破了敌人的美梦。在炮火支援下，我8师23团3营战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占领了歪头山的小砬子，并立即向歪头山顶猛冲猛攻，迫使敌人纷纷溃退。我即占领了制高点。此时天色微明，我军居高临下，俯瞰山沟里的敌人，正乱作一团。我们的步枪、机枪、小炮立即向山下密集的敌人射击。炮弹颗颗落在敌群中炸裂，炸得敌人血肉横飞，抱头鼠窜。我第3纵队主力同第4纵队第10师一起，分路将敌人分割包围，在红石镇和兰山地区展开了围歼战。敌人虽然组织多次抵抗，但见大势已去，纷纷向兰山方向溃逃。我预先埋伏在山上的部队和追击部队，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敌人展开全面围歼战和强大政治攻势。敌人在雪地里溃不成军，乱作一团。其汽车、火炮、骡子、大车挤满道路。我军趁敌混乱之际，边打边向敌人喊话：“蒋家官兵们，缴枪吧！缴枪不杀，优待俘虏！”许多原在国民党军队当兵的新入伍的解放战士也纷纷喊话：“我们是195师和91师解放过来的，这里待我们很好，你们过来吧！”在我军强大的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下，敌大批官兵纷纷放下武器，从各个山坡上、山沟里走到俘虏群去，按我军的指挥，互相喊着：“到三源浦去集合！”“在三源浦开饭！”至下午4时，我军将敌89师和54师162团全部歼灭，俘敌代师长张孝堂、副师长秦世杰、政治部主任唐彬以下8000余人，毙其团长以下660余人。当我军押着一群俘虏军官在一个草坪上集合的时候，敌代师长张孝堂无可奈何地说：“你们真行，我真没料到那么厉害，几分钟工夫，就把我们的队伍打得稀烂，把通信系统都给打乱了……”有一个被俘的蒋军说：“你们的炮打得真准，好象跟着我们打一样。我在头一个地堡时，一炮打塌了，就逃到了第二个，接着第二个又打塌了，一连5个都打塌了，最后我也被打着了。”敌中路89师及54师162团被歼后，其他各路纷纷撤退，敌人对临江的第四次疯狂进攻，被彻底粉碎了。第四次临江保卫战，我军从兵力展开到战斗结束只用了3天时间，创造了东北战场一仗歼灭敌一个整师又一个整团的辉煌战例。这次战役开始前，我主动要求到前方去，考虑敌人已进至红石砬子一带，第3纵队面临的形势最为严重和紧张，我便乘吉普车，带着一个冲锋枪班乘一中卡车，从临江经老林赶往红石砬子。虽已大地回春，但路上积雪尚未完全融化，山路很不好走，汽车时走时停。连续走了4天，赶到三源浦时，得知前一天（即4月3日），我第3纵队已歼灭敌军主力89师，我即参加对俘虏的处理工作，找被俘的敌代师长谈话，并召开战斗英雄大会，给予鼓励、表彰。四保临江的胜利，是与辽东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分不开的。当时部队的粮食异常缺乏，老百姓也缺少粮食，但他们把仅有的玉米碾碎，自己吃玉米皮，把玉米面送给部队吃；各家各户存下不多的酸菜水，自己舍不得用，却送给

战士们洗脚治冻伤；部队到山村里宿营时，老百姓纷纷把自己的鞋子让给战士穿，尤其是朝鲜族的女同胞们，曾做了大量军鞋和草鞋支援部队；有的县长或区长，带头上战场抬担架，帮助安置伤病员，许多老百姓的家里，成了病房，很多妇女同志热情照顾伤病员。至于群众参军、抬担架、看守俘虏、给部队带路、送信的，就更多了。抚松、蒙江等县，几乎成年的男人都参军，甚至有不少残疾人到部队当炊事员。毛主席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四保临江战斗，充分体现了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没有辽东人民的支援，便没有四保临江的胜利。四保临江的胜利，彻底粉碎了东北国民党军“先南后北，南攻北守”的进犯方针，结束了敌进我退的局面，扭转了南满和整个东北战局，打破了敌人独占东北的美梦，为东北我军及早转入战略进攻、缩短东北解放战争的进程创造了条件，是东北解放战争胜利的重要转折点。四保临江作战后，我军经过短暂的休整，根据毛主席“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指示精神，从1947年5月起，发动了历时50天的强大夏季攻势，横扫辽东各地国民党军，攻克了通化，收复了安东、梅河口、本溪及辽南广大地区，使辽宁、辽南、安东3大块连成一片，巩固和扩大了南满根据地。夏季作战结束后，我军又发动了大规模的秋季攻势和冬季攻势，“万马战犹酣”，各路主力歼灭了大量敌人，收复了一大批失地，我军已完全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东北以至全国已处于新的人民大革命高潮的前夜，革命胜利的日子已在望了。

部队教育的方向

从南满军区创建开始，我一直在这里工作战斗了两年多的时间，这个时期正是南满斗争最艰难的岁月。在保卫和坚持南满根据地的作战中，南满军区部队以阶级教育为中心，广泛开展了诉苦运动、练兵运动和战评立功运动，部队中创造出来的这些生动有效的群众性政治工作形式，大大活跃了部队政治工作，激发起指战员坚强的战斗意志和高昂的战斗热情，并转化为巨大的战斗力，保证部队赢得了四保临江战役的伟大胜利。这些生动鲜活的群众性创举，代表了解放战争时期新的历史条件下部队教育的方向，成为后来人民解放军开展新式整军运动的基础。抗日战争胜利后，党中央不失时机地派遣大批部队和干部先机进入东北，建立东北根据地，使之成为中国革命的战略基地。历史证明，党中央的这一决策是非常英明正确的。初入东北，我们的工作方针是以城市为主，还是以农村为主？在一段时期里大家思想上并不是很清楚。开始南满军区驻在安东，国民党军进攻东北后，军区撤往本溪湖。军区撤离时，不少人留恋城市，舍不得坛坛罐罐，把沙发都搬到了山沟。反映出干部思想上不愿让出大城市，怕艰苦，图安乐。8年抗战胜利了，都希望我军能独占东北，进入和平民主新阶段，长期艰苦奋斗的思想准备不足。当然局势的发展有个过程，人们的认识也有个过程。随着东北局势的明朗和中央下达“让开大路，占领两厢”思想的明确，大家的思想也逐渐统一和明确起来。1946年初，在沙岭战斗中，我军优势兵力却未能取胜。除了组织指挥、战术技术等原因外，也暴露出部队轻敌、厌战等思想问题。军区主力部队是从山东渡海过来的老部队，抗战时部队唱的是“打完鬼子就回家”，现在打败了鬼子不回家，又来到关外打仗，思想弯子确实很大。新部队大都是刚参军的贫苦农民，也有不少是伪军改编过来的，家乡观念重，不愿离开家远出敌后。在国民党军开始向东北大举进犯，我独占东北已不可能，双方争夺东北之战不可避免的客观形势下，在打与和的问题上不少同志思想混乱，对和平心存幻想。再有，打谁的问题似乎也成了问号：抗战时有个口号，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国民党占有合法地位，苏军把大城市交给了蒋介石。群众中也存有视国民党为正统的思想，流传着“想中央，盼中央”的说法。这些对部队也有影响。抗战胜利后的新形势下，部队出现的这些新情况、新问题，集中反映了在为谁扛枪、为谁打仗的根本问题上，成为政治工作亟待解决的新课题。怎样把思想统一起来，把部队的情绪调动起来，巩固和扩大部队？这是我在开始的半年时间里一直思索的问题。那时，南满部队新成分比较多，俘虏过来的伪军数量不少，有的部队多达三分之一。这些出身寒苦的俘虏兵，受尽了日军铁蹄蹂躏之苦，饱尝了当亡国奴的苦难。他们开始控诉日军奴役东北人民的种种罪行，后来发展到诉军阀、官僚、地主、豪绅的压榨之苦，这样把日本侵略者和官僚地主的罪行捆在一起控诉，激发起大家的民族仇、阶级恨。许多干部战士家都有一本血泪帐，有的沦为乞丐，家破人亡，有的还不起阎王债，卖儿卖女。当干部战士讲到自己的亲人惨遭迫害时，悲痛欲绝，放声恸哭起来。不少连队还为干部战士的受害亲人设灵堂、祭奠、诉苦，开追悼会，气氛悲愤，情绪激昂，有效地激发起大家的阶级仇、民族恨的革命感情。在此基础上，引导大家认识这些苦难的根源，明白官人为什么富，穷人为什么穷和天下穷人是一家的道理。并进一步寻根挖源，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虽然投降了，但国内的剥削阶级还存在，蒋介石就是剥削势力的总代表，只有拿起武器，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劳苦大众才能翻身解放。这样把诉

苦与启发教育结合起来，提高了干部战士的阶级觉悟，较好地解决了干部战士中存在的视国民党为“正统”，“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打完鬼子就回家”等思想，懂得了个人解放、阶级解放和民族解放的关系，明确了“打倒蒋介石，翻身求解放”的基本道理。我认为，诉苦教育，抓住了阶级教育这个中心，解决了为谁扛枪、为谁打仗的问题，是解放战争新形势下部队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向。当时军区总结了3纵7师21团3营9连诉苦教育的经验，在全区部队进行推广，并向中央军委写了报告。毛主席对3纵诉苦教育的经验亲自作修改，并批转全军。诉苦教育是一场群众性的自我教育，广大干部战士人人开口“倒苦水”、“挖苦根”、“算剥削帐”，群众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教育自己，使诉苦教育在全区部队中迅速发展为群众性的生动有效的诉苦运动。1947年6月，辽东分局根据中央和东北局的指示，发出关于放手发动群众，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实行土地革命的通知。我们便把阶级教育与土改教育结合起来，使指战员明确封建地主阶级是国民党、蒋介石反动统治的阶级基础。号召部队支持土改运动，进一步增强阶级觉悟，在诉苦运动中，我看到3纵7师一封电报，反映有的部队受“贫雇农坐天下”口号的影响，把地方土改的一些不妥当做法搬来，对一些出身不好的干部不信任，进行批斗，有的战士还把出身成份高、文化程度高的同志当假想敌，练刺杀。我立即下到7师，了解情况。我在师党委会上指出，一些干部文化高、家庭出身不好，但他们已经投身革命，转变立场，就不能搞唯成份论。强调大敌当前，军队内部不能搞阶级斗争。回来后，我向陈云同志和军区党委作了汇报，得到同意。并以政治部的名义发了一个通报，及时纠正了这种偏向，稳定了干部情绪，使军区部队的诉苦运动健康发展。部队干部战士一经倒苦水、挖苦根的阶级教育，杀敌立功的劲头就空前高涨。大家把阶级仇、民族恨化为坚强的战斗意志，纷纷表示在战斗中为阶级的解放，为受苦难的亲人报仇立功。这样，我们又要求把诉苦教育与杀敌立功运动结合起来。

最初，部队各连队建有功劳簿，给战斗中有一功人员记

功和发奖金。1946年在本溪湖时，看见苏军有功勋章，戴上很荣耀，对激发士气、增强荣誉感有一定作用，军区决定要搞。兵工厂很快就设计制造出来了。军功章分三个等级，打完仗就发，但那时还没有形成群众性的杀敌立功运动。后来，我们吸取诉苦运动的经验，发动广大指战员，人人参加立功运动，选标兵模范，评战斗英雄，召开庆功大会，宣传英模事迹。要求人人开口表决心，订立功计划，向功臣学习，向功臣挑战，掀起群众性的为人民立功的热潮。在四保临江战役中，军区部队杀敌立功运动开展得非常好，涌现出一大批战斗功臣和英雄模范人物，不少英雄事迹，当时新华社都进行了宣传。

诉苦教育和杀敌立功活动的广泛开展，又促进了群众

性练兵活动和战评活动的开展。在诉苦中，干部战士产生了报仇立功的强烈愿望。杀敌立功就要有本事，就要练兵。那时，部队中新成分不断增加，不少刚入伍的新兵就奔赴战场。因此，各部队利用战斗间隙广泛开展练兵活动。每次战斗结束后，进行战评活动，主要评作战指挥、战术技术、战果和伤亡的大小及战斗情绪、防冻伤、防事故等情况。这样做到打一仗，进一步。经过这样的战评，评功活动也就有了依据，训练方向也更加明确了。1947年初，我在部队看到指战员求战心切，情绪很高，墙报上贴满了请战书、决心书，“吃饭要吃白菜心，打仗要打新6军”的口号叫得很响。新6军是国民

党军进攻南满的主力，一色的美式装备，号称“王牌军”。当1946年10月敌人向南满根据地大举进攻时，我3纵9师指战员在强敌面前，毫不示弱，特别是对骄狂的新6军，部队提出了“吃菜要吃白菜心，打仗要打新6军”的战斗口号，顽强地阻击敌军5昼夜。后来，这一口号在南满部队普遍叫响，反映出经过诉苦立功教育部队士气的变化。于是，我写下了“吃菜要吃白菜心”这首顺口溜：吃菜要吃白菜心，打仗专打新六军。菜心味甜营养好，歼灭新六军建功勋。同志们大家来竞赛，看谁是人民大功臣！经音乐家牛元甫同志谱曲，在南满部队广为传唱，部队风貌为之一新。那时连敌军听了也胆颤心惊，一个被俘的国民党军官惊魂落魄地说：你们吃了白菜心，连我们这白菜帮子都给吃了。辽东军区部队以阶级教育为中心的诉苦运动，结合土改教育，发展到群众性练兵运动、战评和立功运动，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部队教育工作经验，大大活跃了部队政治工作，保证了部队在四保临江、夏季攻势、秋季攻势和冬季攻势作战中取得了重大胜利。东北严冬，呵气成冰。在零下40度的严寒中，部队夜间行军休息时要不停地跺脚，不然脚就会冻在地上。有的部队一连十几天爬冰卧雪，冻伤减员很多。严寒威胁着部队。那时粮食、被装供应非常困难，部队御寒物资奇缺，不少部队没有棉衣、棉帽、手套，战士们把草绑在身上御寒。部队杀猪，将皮剥下来扎几个眼当鞋穿。有的连队把毯子剪成小块，分给战士包脚。部队到了山区没有油盐，吃的是老百姓家的酸菜水，玉米面窝头冻得像石头一样邦邦硬，牙咬不动，只好放在嘴里慢慢咽。部队常常露宿在风雪地里，靠烤火过夜。天寒，冻得枪栓拉不开，撞针也冻宿了，打不响枪，战士们就两人合盖一条被子，抽出一条被子来作枪套，在那异常艰苦的战斗岁月里，部队始终保持高昂的战斗情绪。广大指战员不畏严寒，不怕流血牺牲，连续作战，在冰天雪地里与敌人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创造了惊天动地的辉煌战果，涌现出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如追敌35公里、捉敌50余名的英雄高英富；半个月连立三次特等功的鞠永业；歼敌百名的英雄王永泰；独胆英雄周桓农；负伤后仍爬行指挥的老英雄李培江；赤脚冲锋的连政治指导员赵兴。元；爆破英雄高英旺、韩乐学；带领战友一夜三潜敌阵俘敌120多人的司号员苗海文。还有挺进敌后的第4纵队第11师，曾连续战斗8昼夜未眠未休，8天只得7餐，行军250公里，作战9次，歼敌1400余人，连续冲破敌数次合击，胜利完成作战任务。军区给该师指战员每人记了一功。还有以功臣名字或建功地点命名的英雄群体，如常伦连、王永泰班、范天吉排、长岭连、博山连、神社山连、蓝山排、东丰英雄班等。1947年冬，我在通化八道江写了《冬战即景》一诗，赞颂部队出现的战斗新貌：

长白山腰松声烈，八道江畔泥如铁。
健儿午夜宿沟边。共围篝火观残月。
鼻呛脸熏胸前暖，背挡北风寒凛冽！
饥吃窝头先哈气，站起欲行急跺脚。
喊杀威震空谷响，银里桃红染斧钺。
天空阵阵飞盐洒，枪机冰冻短兵接。
猛追残敌雪没胫，睁眼凝视恨妖孽。
胜利回营相对看，哈哈大笑众欢跃；
青年战士成老翁，须眉皓白冰凝结！

1948年2月，在哈尔滨召开的东北民主联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我作了《关

于辽东军区情况和政治工作的报告》，东北民主联军政委罗荣桓同志对辽东军区的政治工作经验非常重视，他亲自找来《东北日报》记者发表谈话，后来《东北日报》介绍了辽东军区政治工作的做法和经验。并发表了《部队教育的方向》的著名社论，对辽东军区政治工作的做法和经验给予了充分肯定和极高评价。指出：“进行诉苦教育的全部过程，在部队教育工作上是一个具有极大意义的创造”，“虽然还是一个开始，但这确是部队教育的革命，是真正体现了毛主席教育部队的思想，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和群众运动。这是巩固部队、提高觉悟、改造思想、激发杀敌情绪、提高战斗力最基本、最生动有力的教育，这不是单纯的教育方法问题，而是部队教育的路线问题和部队教育的方向。”后来，我在《东北日报》上发表了《立功运动的初步经验》的文章，使辽东军区的政治工作经验很快推广到东北全区部队，并成为后来我军开展新式整军运动的基础。

第九章英雄塔山

移师北宁线

1948年春，南北满已打通，根据东北战场的形势发展，东北局决定撤销辽东军区。不久，我被任命为东北人民解放军第4纵队政治委员、党委书记，纵队司令员、党委副书记是吴克华同志。我于同年5月到达鞍山任职。4纵队的老底子，是抗战初期以115师先后派去的两批老红军为骨干组成的胶东天福山起义的游击队。曾驰骋胶东地区，以神出鬼没的游击战，打得日本鬼子胆颤心惊。“八·一五”日军投降以后，又奉命横渡渤海，挺进东北，转战于长白山下、辽河两岸，以无坚不摧的英雄气概，同兄弟部队一道，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解放了辽东广大地区。在刚刚结束的新式整军运动中，又专门学习了“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的战术和技术，是一支富有朝气和战斗力的部队。当时，东北战场形势和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已发生重大变化。东北蒋军遭我夏、秋、冬季攻势沉重打击后，完全丧失了战争的主动权，其存下的48万军队，龟缩在长春、沈阳、锦州三座互不相连的孤城内。其地区狭小，没有回旋的余地，仅赖辽西走廊这一狭长地带，保持锦州与关内的交通联系。其补给困难，有的靠空投接济。长春守敌为我久困，是撤是守，蒋介石举棋未定，处于无计可施、被动挨打的局面。而东北我军主力部队已达70多万，加上地方部队30万，达百万大军，数量上已占优势；在武器装备上，由于缴获了大量日军枪炮弹药和国民党的美械装备，我军装备加强，弹药充足；部队经过近半年的以阶级教育为中心的新式整军运动和军事大练兵，部队的军政素质有很大提高；解放区已连成一片，土地改革基本完成，翻身农民踊跃参军支前，兵力雄厚，给养充足，后方更加巩固。根据东北和全国战场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党中央、毛泽东审时度势，通观全局，确认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到来，决定把战略决战的方向，首先指向东北国民党军卫立煌集团。我欲全歼东北敌人于东北地区，必先攻打锦州，切断东北敌人与华北的联系，造成“关门打狗”之势。这是毛泽东同志全局在胸，投下的一着绝妙好棋，因东北国民党军，从北到南，是长春、沈阳、锦州三点一字排列，若先打长春，沈阳和锦州的敌人势必向关内逃跑，这无疑是“赶蛇归洞”，敌重兵逃向关内，麇集于华北、华中，影响全国战局。锦州是东北通向关内的咽喉，先打下锦州，就可以关上东北大门，不让敌人一兵一卒逃进关内。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把辽沈战役的主要方向首先指向锦州，这最有利于战役的推进和全国战局的发展，是非常英明的战略决策。早在1947年10月13日，毛泽东同志就给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林彪打了招呼：“攻克吉林后，应将主攻方向转至北宁、平绥两线”。林彪胸无全局，竟回电说：“锦州方向无仗可打。”1948年2月7日，毛泽东同志又电示林彪，强调控制北宁线的极端重要性，指出“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但林彪怕主力南下，受东北、华北敌人的夹击，怕劳师千里，补给困难。而把主力摆在长春、四平一线，对长春一会儿要打，一会儿要围，举棋不定，徘徊数月，无所作为，迟迟不愿南下北宁线作战。一直拖至同年7月下旬，在毛泽东同志的批评帮助下，他才不得不放弃攻打长春的错误主张，表示愿意执行南下作战的方针。林彪虽然口头上表示愿意南下作战，却畏敌如虎。他一再要求华北部队派兵围攻大同，以分散傅作义的兵力；他还无理提出东北主力行动时间要以华北部队行动的迟早来作决定，并以久雨不晴、全军无雨具、粮食补给困难等为借口，拖延时日，按兵不动。同年9月7日，毛泽东同志在《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电报中，再次催促林彪南

下北宁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还要求我军确立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在毛泽东同志的一再批评催促下，林彪才干9月上旬移兵南下，部署攻打锦州。阴险狡诈的蒋介石，在1948年8月的军事会议上，曾“钦定”了一个作战方针，叫做撤退东北，确保华中，坚持沈阳至10月底，以牵制我东北大军入关。他原以为我军在东北的下一个攻势，一定会指向长春。因长春守敌十几万人马，被我久困，内缺粮草，外无援兵，已是“死棋”。他万没想到，我军竟舍近求远，舍弱攻强，在他的侧背长驱直进打锦州。待我大军云集辽西，兵临城下时，他惊慌万状，急急忙忙从南京飞到北平，又从北平飞到沈阳，谋划对策，孤注一掷，妄想组织两路兵团，东西并进，夹击我军于锦州城下。蒋介石决定把沈阳国民党军编为防守兵团和攻击兵团，严令卫立煌以12个师的兵力，组成西进攻击兵团，由廖耀湘统领，出辽西直插锦州。蒋介石又乘坐7千吨级的“重庆号”巡洋舰赶到葫芦岛，调兵遣将，组织了一个有11个师配以空军支援的“东进兵团”，妄图出锦西，过塔山，同锦州敌人会师锦州城下。蒋介石自恃兵力雄厚，锦西离锦州又近在咫尺（30公里），召见营以上军官训话打气。严词训令各级长官要亲临前线指挥，以“杀身成仁”的决心“报效党国”。于是，敌三军张牙舞爪杀奔锦州而来。声势浩大的辽沈战役从9月12日开始以来，我第4纵队便奉命从鞍山、台安地区出发，直插北宁线。一连几天急行军，以神速迅猛的动作，于9月15日协同9纵，突然包围了锦北重镇义县。随后奉命将攻城任务移交给3纵、2纵和炮纵一部，旋即挥师南下。首战月亮山，再战砬子山，连战皆捷，一刀斩断兴（城）、锦（西）、葫（芦岛）敌之联系；又以两小时攻克兴城，切断关内同锦州的铁路交通。这时，部队已先后赶到锦州附近，迅即形成重兵包围锦州的态势。与此同时，配合我东北部队的作战行动，华北部队和冀察热辽部队，在打下昌黎城后，分别西进和东进，掐断北宁线，以实现毛泽东同志“切断华北与东北敌人联系”的部署。10月4日，我纵队正在兴城附近，利用战斗空隙，开全纵第二届士兵代表大会，总结战斗经验，表彰功臣模范。全纵指战员战斗情绪旺盛，准备经绥中直逼山海关。忽然，机要人员匆匆送来一份急电，上级命令我第4纵队、11纵队、热河独立第4、6师，统归第二兵团指挥，阻击锦西、葫芦岛向锦州增援之敌。要我“四纵在塔山、高桥地区布防”，坚守阵地，阻敌7至10天的时间，掩护主力攻克锦州。又说，打下锦州不成问题，关键的是四纵队能否守住塔山！任务的突然转换，我们毫无思想准备。当即，我们召开纵队党委常委会议，莫文骅、吴克华、胡奇才、欧阳文、李福泽参加，对上级的命令、意图和要求，进行详细的讨论，分析了面临的敌情、地形和部队因任务改变可能产生的思想问题，以及由于时间紧急而要求我纵队在军事行动上和政治动员方面所必须采取的措施。参谋人员摆开地图，我们几位纵队负责同志都围拢上来，吴克华司令员指点着塔山、高桥一带，用红笔在地图上重重地划了一个圈圈。我移目望去，只见地图上锦西、锦州两座重镇南北相对，塔山堡就虎踞在中间，张着嘴巴，衔着由锦西北上锦州的公路和铁路。塔山，好一个两锦的咽喉！“只要我们守住塔山，挡住援锦敌人的去路，锦州的敌人就没指望啦！”我默默地思考着上级的意图和我纵队担负的艰巨任务。“政委啊，任务再艰巨，也要坚决完成，可是部队要求攻城的呼声正高，这180度的急转弯，做好思想工作可是当务之急啊！”吴克华同志在会上对我说。“对呀！这次守塔山，敌情严重，任务重大，虽然保卫本溪时打

过一次防御战，而这样大规模的防御战，在我们纵队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当前首要的是搞好政治动员，打通思想。只要我们把塔山阻击战的重要性、艰巨性讲清楚，思想问题也不难解决。”我满怀信心地说。会议统一了党委的思想，确定立即从师以上干部着手，在全纵队迅速开展塔山守备战的战斗动员。

众志成城守塔山

东北的深秋，已是凉意袭人。纵队党委常委会结束后，已是深夜。为了抢时间，我们到离纵队机关较远的田家屯向第12师传达命令，要求他们星夜出发，以神速秘密的行动，占领塔山堡和白台山一线，掩护纵队主力进入防御地区。并派副司令胡奇才随队先行。此次阻击任务由兵团司令程子华指挥，他就近先到塔山，决定守塔山的重点。胡奇才和12师到后，照其指示部署。第二天早上，立即召集纵队就近的第10师、第11师及纵队直属单位的师以上干部会议，由吴克华司令员传达上级的命令、纵队的决心和部署。针对部队思想情况，我特别强调要搞好政治动员，使大家充分认识：一是塔山阻击战意义重大，能不能全歼东北敌人，关键在能不能打下锦州，锦州能不能攻克，关键又在于守住塔山，堵住援锦之敌，确保主力拿下锦州。要树立全局观念，我们这一仗，不应以本身伤亡与缴获多少来计算胜利，而应以完成整个战役任务来看待胜利。只要守住塔山，保障主力攻下锦州，不论付出多大的牺牲，都是胜利。二是塔山阻击战，必将是一场十分激烈、十分残酷的争夺战，绝不比攻城任务轻松，而是更加艰巨。敌人为了解锦州之围，必将依仗其优势兵力和现代化装备，拚命进攻，我们必须死守阵地，一步不退。要准备打硬仗、打恶仗，准备几天几夜不睡觉，苦熬苦斗死打硬拚。三是塔山阻击战，胜利一定属于我们。锦州敌人已陷入我军重围，败局已定。援锦之敌，表面上气势汹汹，实际上在整个战局失败的形势下，内部矛盾重重，士气低落，指挥混乱。只要我们万众一心，死守阵地，敌人只能在我铜墙铁壁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以失败而告终。我特别强调，上级叫我们守塔山，是党的信任，绝不能辜负党的期望。各级要开好政工会，迅速把上级的指示和纵队的任务传达到全体指战员，打好这一仗，为人民立大功。会议结束时，各师干部心情激动。纷纷要求承担最艰巨的战斗任务，保证完成纵队交给的任务。10月6日，纵队率主力出发。任务一传达，道理一讲明，部队情绪振奋，日夜兼程，直奔塔山地区。纵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欧阳文同志，具体负责组织战斗动员工作。他经验丰富，作风细致，工作搞得十分活跃。参谋长李福泽同志具体布置调兵遣将工作，也忙得不亦乐乎。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的同志都在紧张地部署自己的工作。师、团政委和各级政治机关的干部、连队指导员，一边行军，一边了解情况，一会儿同战士谈心，一会儿向党员布置工作，一会儿替战士扛枪、背背包，一会儿进行行军鼓动，深入进行战前思想动员工作。10月6日晚至7日夜，各部队先后到达塔山地区，分别进入指定位置：第12师位于老官堡、徐家屯以南，李家窝棚以北，红旗营子以南，塔山以东，上坎子以西一线。34团守备以塔山堡为重点的东至打鱼山阵地；36团毗连34团，守备塔山以西白台山阵地；35团毗连36团，守备李家窝棚、261高地及前沿阵地；师指挥所设于张家屯以东高地。第11师32团毗连35团，守备靠山屯以北223高地及前沿阵地；师率31团、33团位于颜家屯、吴家屯一带。第10师率28团位于红旗营子以东高地；29团位于朱家屯；30团位于王善屯、大石股地区。纵队炮兵阵地设于潘家屯以东高地。集中全纵92步兵炮以上的火炮110门，组成两个炮兵群，随时集中使用。纵队指挥所设于九户屯；纵队前方指挥所设于排路沟西北高地，即九户屯以南高地。塔山，其实并不是山，周围是平缓的起伏坡地，无险可守。各部队到达指定位置后，不顾行军的疲劳，立即勘察地形，昼夜不停地抢修工事，紧张地投入战前各项准备工作。全纵上下，人人明白：争取时间就是胜

利。为抢时间完成构筑工事任务，纵队动员机关和其他能够抽出的一切力量，一齐动手，筑掩体，挖战壕。虽然秋风送爽，干部战士身着单衣，仍干得满头大汗。12师政委潘寿才和34团团氏焦玉山、政委江民风一起，带头抬铁轨、扛枕木。铁轨有几百斤重，枕木也有百十斤重，他们扛起来就跑，每趟往返六七里路，晚上也继续干。当地老百姓闻讯赶来，男女老少一起上阵，挖的挖，抬的抬，全力协助我们抢修工事。材料缺乏，群众便主动拿来了桌子、门板，甚至房梁。有位老贫农主动拆了自己的房子，把木料扛到阵地上。有些年岁大的老人还把家人为自己准备的寿材板送给了部队修工事。人民群众的支援，极大地鼓舞和教育了部队。全纵队上下一个信念：筑成打不烂、攻不动的堡垒，叫敌人有来无回！8日晨，我们纵队几个负责同志，率师、团干部察看前沿地形。我们的前沿一线阵地，东临渤海，西依虹螺山，正面宽12公里，距锦西敌人前沿远的不过1000米，最近的只有几十米，距锦州敌人也不过15公里。南面大小东山、影壁山一带高地，敌人筑有坚固工事，配置着各种火炮，居高临下，以火力钳制我塔山一线。塔山堡是个小火车站，住有百十户人家，位于北宁铁路西侧1公里处，至纵深高桥，均地势平坦，无险可守，只能依托村落、小高地和隘口进行防御。而我们面临的敌人，是蒋介石亲自督战的9个师，除2个师外，都是蒋的嫡系，建军较早，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敌人不仅兵力3倍于我，而且有空、海军的支援配合。很明显，我纵队担负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同时，由于我们缺乏大规模阵地防御作战的经验，在敌情严重和地形不利之外，又增加了我们的一项困难。“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我同吴司令员商量，必须充分发扬军事民主，依靠群众智慧完成守备任务。当天下午，召开了纵队党委护大会，团以上干部参加，群策群力，献计献策。我和吴司令员静静地听着大家的发言，不时提出问题，启发大家思考，力求把阻敌作战方案搞得更加完善。大家经过对敌情、地形、我情的详尽分析，一致认为：敌人的主攻方向，很可能是沿塔山堡直接向高桥方向进攻，或者沿刘家屯向白台山方向进攻，打下制高点，形成翼侧屏障，进而夺取塔山、高桥，开通公路，直迫锦州；无论敌人从哪里主攻，其目的都是夺取塔山，打通交通线，以便大部队北上增援锦州；敌人援锦心切，其战术特点必然是依仗优势兵力和炮火，组织集团冲锋，反复冲杀夺路。根据这些情况，我们必须正确选择要点，组织严密火网，以精兵坚守要点，保持强大的预备队，用反复的反冲击打垮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冲锋，把敌人大量消灭在我阵地前沿。吴司令在集中大家意见的基础上，作了总结，决定以12师全部和11师32团展开于正面；以部分兵力重点守备塔山堡、塔山桥、白台山等一线的几个战术要点；以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的兵力作为第二梯队，保持强大的后劲，用于支援第一梯队和反冲击。10师和11师31团、33团，按纵深梯次隐蔽配置在第一线部队侧后，作为纵队的预备队。吴司令员布置完毕，我向大家讲道：“我们这回是死守，要不惜一切代价，以鲜血和生命，寸土必争，死守到底，一步不退！敌人打到营部，营部就是第一线；打到团部，团部就是第一线；打到师部，师部就是第一线；打到我们纵队部，纵队部就是第一线！后边就是锦州，往后没有我们的地方。各级领导，就是天塌下来，一步也不能退。就是打到最后一个人，打到最后一口气，也要坚决完成任务！大家回去以后，要把这次作战的意义和纵队党委的决心向全体同志讲透，把纵队党委的决心变成每一个指战员的决心，真正做到万众一心，誓死坚守阵地，保障主力拿下锦州！”纵队党委扩大会议结束后，

我同纵队几位负责同志商定，又分别召开了纵队党员代表大会、阵前士兵代表大会，向基层党员和战士作直接的深入的动员，发布了《告全纵队共产党员的信》、《告全纵队指战员书》。并特制“英勇顽强”、“守如泰山”等奖旗，号召开展杀敌立功和夺旗竞赛。提出了“坚守阵地”、“寸土不失”、“与阵地共存亡”、“人在阵地在”、“争当杀敌模范，做守备英雄”等响亮战斗口号，并要求把这些口号写在木板上，插在阵地前沿。通过政工会、干部会、支部大会、军人大会的反复动员，使坚守阵地、确保攻克锦州的战斗口号深入到每一个指战员的心里，变成坚不可摧的钢铁意志。8日晚上，浓云密布，大雨倾盆。指战员们冒着大雨继续抢修工事，雨水在身上哗哗直淌，也不停歇。入夜，兵团程子华司令员来纵队检查备战情况。第二天一早，程子华、吴克华、欧阳文等负责同志到前沿视察阵地。随后，各师、团举行了庄严隆重的阵地宣誓。12师师长江燮元、政委潘寿才在阵地上，当着指战员的面，指着自己的位置宣誓：“我的阵地就在这里，绝不后退一步！”各师、团首长及营、连干部，都分别在阵地上向党宣誓：“誓与战士同生死共患难，死守阵地，寸土不失！”领导干部的铿锵誓言，极大地鼓舞着指战员，全纵队上下的战斗情绪空前高涨，“死守阵地，杀敌立功！”“打好这一仗，挂毛主席奖章”的激昂口号，此起彼伏，响彻阵地上空。此时，部队已是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纵队指挥所里，异常忙碌，几部电话，同时响起。参谋们捂着一只耳朵，蹲在角落里大声地和对方讲着话。有的盯着地图，随时标记上新的情况。根据上级通报和侦察的情报，敌人企图趁我工事尚未完备之际，于10日拂晓向我阵地发动进攻，妄图一举突破我防御，拿下塔山，增援锦州。恶战将临，空气顿时紧张起来。

敌人碰了硬钉子

10日凌晨，我们连夜抢修的工事还没有完全修好，敌人就开始了进攻。我同吴克华司令员迅速来到山上的纵队前线指挥所，接到12师师长江燮元的报告：约3时半，敌人趁落潮之际，偷涉海滩，首先袭击占领了我打鱼山岛阵地；在前沿，有几个尚未修好的工事和还没有来得及修工事的小高地也被敌人偷袭抢占了。听了12师师长的报告，我的心猛然一沉。打鱼山岛是突出在连山湾北岸的一个半岛，位于我防线的东端，东与西海口阵地北侧陆上毗连，西与塔山堡隔路相望。丢失了打鱼山岛，敌人就直接威胁了我西海口和塔山堡阵地的侧翼安全。如果敌人从海上登陆西海口，可以越过塔山，绕过高桥，直抵锦州外围。虽然我们判断敌人还不太可能作此冒险，但打鱼山岛的丢失，对我们侧翼安全的威胁实在是太大了。再说，战斗刚刚打响，即使是小的阵地丢失，也将对我全线防守产生重大影响。一定要坚决夺回阵地，立即夺回来，要给敌人一个下马威，绝不能让敌人逞疯狂。“迅速组织反击，夺回阵地！绝不能一开头就叫敌人逞凶，要打掉他的威风，打下他的气焰！”吴司令员用坚毅的声调，在电话里对12师师长下达了反击的命令。为了加强对12师的指挥，总部指定派纵队副司令员胡奇才去帮助。前沿迅速展开了一场反击战。战士们冒着敌人的弹雨冲上去，用刺刀狠狠地教训了偷占便宜的匪徒们。在有的小高地上，敌凭借我们尚未修好的工事进行顽抗。战士们一次冲击不成，再冲；正面上不去，俩翼包抄。敌人来时容易去则难，企图顽抗的敌人作了战士们的刀下鬼。丢失的几个小高地在我连续反击下重归我手，唯有打鱼山岛还没有夺回来。海潮涨上了半岛的颈部，打鱼山岛成了孤岛。海水阻挡了我待命反击的29团1营和34团的部分战士，也困住了岛上的敌人。这是塔山阻击战一场小小的前哨战。随着这场开台锣鼓，战幕拉开了。天色微明，大地剧烈地抖动起来。山炮、野炮、加农炮、榴弹炮，加上飞机俯冲，舰炮侧射，敌人集中了全部炮火对我塔山阵地进行全线猛轰。成千发炮弹带着刺耳的呼啸，刮风般地倾泻到我军各个阵地，爆炸声像暴风雨来临前的惊雷，突然从空中压到了地面，沿着打鱼山、塔山、白台山一线，轰轰隆隆不停地滚动着。战前紧张的期待，乍听到丢失阵地时的焦躁，被炮声驱赶得一扫而光。“终于开始了！”过去，每当响起总攻的冲锋号声时才有的那么一种豪情，此刻又涌上了心头。我提起望远镜大步迈出了指挥所向前沿观察。可是，除了弥漫的海雾和滚滚的烟尘之外，什么也看不清楚。此刻，我们时刻关注的前沿，正经历着一场空前激烈、空前残酷的战斗。敌人猛烈的炮火，几乎毁坏了我们所有的工事。地堡掀掉了，掩体炸塌了，铁轨翻飞，枕木破碎。由于工事不完备，不少战士在敌人的炮火下付出了鲜血和宝贵的生命。随着炮火而来的是密集队形的敌人连续不断地冲锋。敌人以新6军暂62师、54军8师和62军151师，共3个师的兵力，在我10余公里的正面，实施全线攻击。整连、整营、整团的敌人，有的军官率队在前，有的督战队压后，密如蝗虫，气势汹汹，一梯队接着一梯队，一拨连着一拨，叫着骂着，直往我军阵地压来。我们每一块阵地都抗击着几倍、十几倍，以至几十倍于我的敌人。刘家屯北侧高地——白台山7号阵地是我警卫连2排守备的。151师的敌人分6股猛扑过来。第一次以一个排的兵力试探。当敌人刚刚靠近我工事前沿，手榴弹便围着半面山坡炸起来，敌人成片地倒下，被我压了回去。接着，敌人增加至一个连。2排在副排长姜万昌的指挥下，以阵前侧翼反冲击打退了敌人的两次冲锋。随后敌人又增加至两个连，在4

架飞机的配合下，连续5次发起集团冲锋。一梯队打掉了，二梯队冲上来，前面的打死了，后面的踩着死尸上，炮火轮番轰击，进攻接连不断。前沿的战况，迅速汇集到了指挥所。为了教训敌人，吴克华司令员命令炮兵：集中火力轰击敌人后梯队集结地域，叫敌人的冲锋接不起捻来。同时要部队加强反冲击。吴克华同志狠狠地说：“敌人想不让我们喘口气，我们也叫他舒服不了！”霎时，我猛烈的炮火向敌后梯队集结地域排山倒海般轰击过去。集结中的敌人被打得鸡飞狗跳。我前沿部队适时进行反冲击，敌人疯狂的连续冲锋被压住了。当敌人向白台山7号阵地发起第6次冲锋的时候，已是下午时分了，这时，坚守阵地的警卫连2排只剩下9个人，干部已全部伤亡。眼看敌人就要爬到山顶，在这紧急关头，共产党员冯日江与潘福录俩挺身而出，带领战士打击敌人。冲上来的敌人被反击下去了，而敌人的炮火又成排地轰击过来。冯日江被压在炸翻的焦土底下，剩下的8个人也全部被震昏了，倒在壕沟。这时，20多个敌人已悄悄爬上来，靠近了壕沟。侧面阵地上的1排长肖殿盛，观察到这紧急情况，没待连里命令，便组织3班战士迅速向敌人反击。3班在副班长朱贵率领下，以猛虎扑食之势，一顿手榴弹打得刚刚爬上2排阵地的敌人，滚的滚，爬的爬，一溜烟似的消失了。他们在山前的小营地里固守起来，并机智地打退了一个排敌人的反击。1排的同志立即招呼起歪倒在沟里的2排同志，一起迎击敌人的下一次冲锋。直到太阳落山，敌人也未能爬上我们的阵地。在塔山堡东之铁路1号高家滩阵地，激战至下午4时，34团3营已经打退敌暂62师一个团的9次冲锋。这时，一个营的敌人在炮火掩护下，又蜂拥着冲上来，遭到我火力拦阻，不得前进；其后路也被我炮火切断，后退不得，乱作一团。我反击部队迅速迂回至敌侧后，截断其退路。经30分钟激战，敌全部被歼，活下来的280人，也乖乖当了俘虏。海潮退落，打鱼山岛与大陆连成一片，我29团1营和34团的部分战士，向岛上猛扑过去，敌人抵挡不住，被歼一部，其余落海逃命，被浪涛吞没了。这一天，敌人妄图寻找薄弱环节的试探性进攻，都碰上硬钉子。血战了一天的战士们，在阵地上吃顿饱饭，有的开始重修工事，有的开展起战评来。干部战士一起讨论怎样把防御战打得更加积极主动，怎样更多地消灭敌人。前沿部队不顾激战的疲劳，夜晚又派出了一个个坚强的小分队，深入敌后，侦察袭扰，搜集情报，捕捉俘虏，像一把把锋利的匕首，插入敌人的心脏，搅得敌人昼夜不宁。

争夺塔山堡

根据我们的判断，敌人在全线试探之后，很可能重点攻击我塔山堡阵地。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天，敌人以第62师、8师、157师、151师共4个师，改用中央突破的方式，在其两翼策应下，全力向我前沿核心阵地塔山堡突击。晨7时，塔山堡遭到了敌人各种炮火的猛烈轰击。敌人集中炮火，从前沿排击到纵深，又从纵深排击到前沿。顿时，一个街道整齐的大堡子，成了一片瓦砾场，树木截断，房屋倒塌。在残垣断壁的废墟上，横竖躺着被炸死炸伤的无辜老百姓。修筑在村边的工事被打塌了，泥土翻卷，硝烟弥漫。敌人的总攻又要开始了。脸被熏得乌黑的战士们，眼里充满着愤怒的目光，准备同敌人作殊死的决斗。随着炮火过后，敌8师一个团，同时从正面和左右两翼向塔山堡阵地压过来。敌人的机枪疯狂地扫射着，掩护着冲锋的敌人，蜂拥而上。守卫在村口最前沿阵地的是34团1连1排和2排5班的战士们，他们瞪大了眼睛，准备好手榴弹，一声不响地等待着敌人。敌人见我阵地上没有动静，大着胆子一直扑到离我阵地几十米的地方。“哒哒哒”，我们的机枪吼叫起来，“轰隆，轰隆”，手榴弹在敌群中开了花，炸得敌人血肉横飞。战士们沉着、准确地打击敌人，敌人成片地倒了下去。正面冲上来的敌人一时被压住了，然而，两侧的敌人却绕过了地堡群，像疯狗一样张牙舞爪地同我们抢夺起村沿的阵地来。枪声、喊声响成一片；手榴弹来回飞舞，敌人扔过来，我们甩过去，整个阵地一片混乱。我们的地堡盖很快就被炸塌了，许多战士被埋在地堡里。敌人冲进了阵地。5班副班长迟德山等4个战士从泥土里拔出身子，迟班长大喊一声：“同志们，杀出去啊！”他端起刺刀，奋不顾身地同敌人展开肉搏。共产党员王广明投出了最后一颗手榴弹，也向敌人冲杀过去。两侧的地堡里向敌人交叉射出了复仇的子弹，后续的敌人垮了下去。敌人虽然被打乱了，但在督战官凶恶地驱赶下，仍然继续不断地冲上来。失去指挥的5班3个战士在阵地里顽强地抗击着。当敌人又一次蜂拥上来的时候，王绍明对两个战友说：“上级叫我们死守阵地，剩下一个人也要坚守，没有了我还有你，没有了你还有他，不要忘了纵队奖给我们的‘英勇善战’大旗啊！”说完，他纵身冲入敌群……敌人丢下了成堆的尸体，终于扑上来了。我们的工事被摧毁了，地堡被炸塌了，34团1连也伤亡过半。1班副班长卜凤刚掩护着本班仅有的5个战士，从被毁的工事转到了后边的院子里，继续向敌人射击。敌人趁机占据了村沿的民房，战斗逐渐转到了村子里来。相互失去联系的战士，从街头巷口残垣断壁的各个角落里顽强抗击着，同敌人周旋、厮杀，进行殊死的搏斗，阻止敌人向村内发展。塔山堡阵地到了最紧急的关头。各级指挥所都在注视着塔山堡前沿的战斗。我直接把电话要到了34团指挥所，对焦玉山团长说：“要迅速组织反击，你亲自组织，坚决顶住！”焦团长十分有把握地说：“请首长放心，我们正在组织反击，我们一定顶住！”于是，团政委江民风同志亲自率领预备队4连（连长刘春光），迅速向血战中的塔山堡扑过去。塔山堡战斗仍在急骤地发展着，当敌人冲上1排和2排5班阵地的时候，迎面碰上了1连连长刘景山正带着8班、9班反击上来。一场逐屋逐院的争夺战展开了。敌人向这间屋子钻进去，战士们就向这个屋子扑过来；敌人从那间屋子跑出来，战士们立刻向那间房子追杀过去。村口路边、屋里、院外，都是战场，刺刀、枪托、石头、手榴弹，都是武器。刘景山命令9班从另一路包抄过去，自己带领8班步步紧逼，一直把敌人逼到了村东南口的一所大院子里。当他带领战士们从墙头冲进去，

一阵拼杀，消灭了院内的敌人之后，不料，又被另一股敌人包围在大院里。这是敌人进村的必经之处，显然，敌人拚死命也要拔掉这颗钉子，为他们的后续部队开路。正在危急之时，9班杀开一条血路，向包围大院的敌人冲杀过去。刘景山趁敌人一阵混乱，大喊一声：“上刺刀，跟我冲！”想从大门口冲出去，哪知大门仍被敌人机枪封锁着。大个子李清林急中生智，几膀子撞倒了院墙，战士们从缺口处一跃而出，步步紧逼，敌人被压缩到村口的一些房子里困守，伺机反扑。

与连长刘景山率领8、9班反击的同时，在东面小山上

观察前沿战斗的1营副营长鲍仁川，见敌人突入我阵地。他不顾敌人炮火封锁，把身子一侧，飞奔入村，迅速把1连零散人员组织起来，同敌人拚杀。当敌人被刘景山他们压到村口的时候，5班的战士们正好从另一个院落里用机枪迎接他们。

接着，5连1排不待命令，顺着鲍副营长的路线也冲进

堡子里来了。迎面正碰上敌人的后续部队。1排立即展开反冲锋，没等敌人架好机枪，战士们的刺刀已经捅进了敌人机枪手的胸膛。这时，江政委和刘连长率领的团预备队也冲上来了。多路反击部队向敌人展开夹击，杀声震天，势不可当。还没有站稳脚跟的敌人，像被洪水冲决的土堤一样坍塌了。窜进村里的敌人被消灭了，残余的敌人仓皇夺路逃命。连长刘景山端起冲锋枪大吼一声：“同志们，跟我冲，把这群瘟猪斩尽杀绝！”他一个箭步窜出去，同志们紧跟着，向丧魂落魄溃逃的敌人猛追过去。副排长王文礼带领8个战士，从右翼插入敌群，用机枪横扫。机枪打不响了，又和敌人杀成一团。我们的炮兵发出密集的炮火，准确地轰击着刚刚撤回去的敌人和掩护攻击的敌人，直打得这个吹嘘为“荣誉第8师”的匪徒们四散逃命，血肉横飞。狗急跳墙的敌人妄图从中央突破的梦想，在我们铜墙铁壁面前又一次破产了。在塔山堡两翼，我们的一些阵地也曾一度被敌突入，但最后终将敌击退。英雄的战士们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充分显示了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英雄气概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在白台山36团4连2排阵地上，5班长徐忠智同志，在全班伤亡、敌人突入阵地之后，他一个人顽强抗击，至死不后退一步。机枪打坏了，他英勇地与敌人死打硬挤，终因寡不敌众，力气用尽，他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后在我第二梯队反击下，阵地仍归我手。下午4时许，太阳还没有落山，被打得胆颤心惊的敌人已经丢下了遍地的尸体，龟缩回去了。

各部队汇集上来一天的战况，组成了一幅幅惊天地、泣

鬼神的勇敢战斗场面。我的心潮犹如渤海的波涛，汹涌翻卷，难以平静。我走出纵队指挥所，到前沿去看望与敌人苦战了两天的战士们。弯弯曲曲、上上下下地走了半个小时，来到一个山脚下的小庙里。当时前沿还在激烈战斗，飞机在头上扫射。一些刚刚从前沿撤下来的战士，正在谈论着当天的战况。看见这种情景，我欣喜地上前问他们是哪个单位的。战士们整齐地回答了我的问话。原来这就是坚守塔山堡，把敌“荣誉第8师”打得屁滚尿流的34团1连。这个连战前有178人，经过这场恶战，我看到从火线上撤下来的仅有7个人了。

我激动地逐个望着这些衣服被撕破、满脸乌黑、缠着

绷带，但精神抖擞的勇士们，心里默默地赞许着：“个个都是英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英雄啊！”我对他们说：“同志们，你们打得好啊！打

得英勇顽强，你们用鲜血和生命保住了阵地。烈士们的血不能白流，我们一定要坚守住我们的阵地，夺取最后胜利，为烈士报仇！同志们，你们还能不能打呀？”

“能打！”战士们的回答是这样雄壮有力。接着战士们七嘴八舌争着要求分配任务。

我赞扬了他们高昂的战斗精神，同时要他们好好休息，养精蓄锐，准备分配到别的连队去迎接更激烈的战斗。

离开了战士们，我的脑海里不禁回旋着一个问题，是

什么原因使我们的部队有如此高昂的战斗情绪？是什么力量使我们的战士如此坚强？回顾这支胶东子弟几年来的战斗历程和在辽东参加过的各个战役，回顾半年前难忘的鞍山整训，深深感到，这次整训使全纵队上下思想上起了多大的变化啊！这正是新式整军运动在塔山阵地上开出的毛泽东思想之花，是深入进行诉苦教育开出的阶级仇恨之花，是广泛的立功运动开出的革命英雄主义之花。有这样无畏的战士，任凭敌人如何疯狂，想占我们一寸阵地，都是妄想！

恶战前的沉寂

敌人两天攻击未逞，第三天只以少数兵力在前沿与我保持接触，但并没有发起进攻。炮火向我们阵地轰了一阵，就没有多大动静了，海上的兵舰开走了，空中没有飞机吼叫了，对峙的敌人阵地也只有零星的枪炮声。战火纷飞的塔山，全线沉寂，笼罩着几天来未曾有过的宁静。这沉寂意味着什么呢？此时，我攻锦部队已经扫清锦州外围据点，正在城墙四周加紧挖掘运动部队发起冲击的交通壕，像一支支利箭指向敌人的胸膛。虽然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不停地发出梦呓，说什么“国军9日夺回高桥，10日已逼近女儿河，正策应锦州国军……”然而，困在锦州的敌兵团司令范汉杰，却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眼睛都望穿了，还不见一个援兵的影子。塔山前线的全线沉寂，正预示着一场更大更恶的厮杀就要展开了。种种迹象表明，敌人正在酝酿更大规模的进攻，在大小东山一带的高地上，敌大批军官在炮火掩护下，不断向我阵地窥视，其后方部队进行着频繁的调动。显然，他们在调整部署，观察地形，重新选择主攻方向，以便孤注一掷，夺路得逞，解困兽之围。纵队指挥所及时指示部队，抓紧时机，加修工事，整顿组织，总结经验，鼓舞士气，迎接来日恶战。战前，我们的工事都是仓促修成的。两天来，敌人倾泻了几千发炮弹，大部分被炸塌了，打毁了。虽然不断利用晚上修整，到底时间有限。两天的战斗，已经使每个人懂得，防御工事是发扬火力、杀伤敌人、保存自己的重要依托，没有铜墙铁壁般的防御工事是很难守住阵地的。12日这一天，部队抓紧时间抢修，大大小小的地堡从内部得到加固，扩大了射界，增设了附防御工事，改善了战斗条件；迷惑敌人用的各种明堡，像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交通壕、堑壕加长了，加深了，沟通起来了；有的还增修了又深又宽的防坦克壕；前沿的铁丝网也增加了，有屋脊形或半屋脊形的，有一列桩或绊马索的；各种各样的鹿砦也加密加厚了；在敌人进攻的路上，有的埋上了地雷，有的布下了爆破筒、手榴弹和桩钉板等；每个战斗岗位上修了防炮洞和储备弹药的小仓库。经过这么一番辛勤劳动，工

事面貌完全改观了。这一天，政治工作尤为活跃，各部队调整和合并了部分建制，提拔和配齐了各级干部，健全了党组织，吸收了经过考验的积极分子火线入党；组织了评功、查功、补功、记功活动，及时授予奖旗、奖章、颁发嘉奖令，表彰各部队的英雄事迹；同时组织了大规模的慰问活动。慰问信、慰问品很快分到战士手中。兄弟部队互相贺功，宣传队在阵地上组织了贺功晚会，就地编写、演唱英雄模范事迹。阵地上的标语牌整修一新。各部队还普遍进行了战评，甚至评论了每个人的单兵动作。发扬军事民主，根据敌人特点，研究打法。对指挥员来说，最要紧的是弄清敌人的企图，确定自己的对策。为此，各部队组织了大批的侦察分队，分批分点对敌人进行了侦察。这天下午，34团侦察排7班接受了一个不寻常的任务：抓“舌头”。以往他们虽然多次到敌后去捕捉俘虏，但那通常是在战前，敌我距离远，空隙多；而现在，两军对峙，阵地对阵地，地堡对地堡，要想插进去抓个俘虏，不是件容易的事。晚上7点，在班长纪仁祥带领下，7班战士化装成被敌人拉来修工事的民工，向敌人的阵地方向出发了。他们越过了饮马河，来到了两个小山豁口处，悄悄摸进了敌人的一个地堡。不料，地堡里空无一人，却碰到了敌人巡逻的哨兵，但由于距离远，不好下手，又使敌人溜掉了。最后，他们越过封锁线，来到敌后300米的岔路口。这是两条大路的交叉路口，一

一条通向敌人的另一个阵地，一条通向前边的村庄，后面是敌人的碉堡。左边小山上还隐约听到构筑工事的声音。前边的村庄里，闪动着几点灯光。这里正是敌人的交通要道。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我们的侦察兵已经钻到他们的肚子里了。不一会儿，通向敌人前沿阵地的大路上，出现了七八个灰色的影子。他们左晃右摆，不紧不慢地朝路口走来，里面还有一个穿大衣的家伙。纪仁祥心里琢磨：这可能是一个大家伙。正向敌人移动的班长，突然被敌人发现了。敌人厉声问道：“哪一个？”“我们是军部谍报队！”班长说着站起来，战士们随着班长大模大样地走过去。趁敌人还在犹豫之中，班长一个箭步跳到跟前，一把揪住那个穿大衣的敌人的脖领，把他摔倒在地。与此同时，7班的战士们立刻向其余的敌人一阵猛烈的射击，这帮家伙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就糊里糊涂地见了阎王。一场搏斗不到两分钟就结束了。当他们押着俘虏，机警地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无一伤亡地回到自己的阵地时，时间才10点钟。捕捉来的是敌21师63团副团长高录臻及其参谋人员和卫兵。那天晚上他们出来视察阵地，准备换防，没有想到当了俘虏。经过审讯，进一步弄清了敌情。原来，蒋介石十万火急地从华北调来新的增援部队，所谓“王牌”部队独立95师，已经海运到达。今天经过调整，独立95师已全部调上前沿。上午，在大小东山一带向我纵深窥视的正是他们的连以上军官在察看地形，准备明天投入战斗。独立95师是蒋介石的中央嫡系部队，一色的美式装备，被吹嘘为“赵子龙师”。此次来塔山前线，由原师长，现为总统府战地视察组组长、华北督战主任罗奇亲自督战。他为了要在蒋介石面前邀功，在95师建立了庞大的督战组织，并重金收买亡命之徒，组成了所谓“敢死队”，准备大干一场。他吹嘘说：没有“赵子龙师”拿不下的阵地！真是趾高气扬，不可一世。既然是敌人的王牌嘛，当然是要认真对付的！由于12师连日来伤亡较大，纵队决定缩小其防御正面，把面对95师的培山以东阵地，交由10师主力28团接替；经兵团批准将11师31团守备的第一线阵地移交给11纵队；31团移至12师侧后，归12师指挥，加强纵深配置，阵地前移，集中保障塔山堡两翼，重点放在塔山堡以东方向。经过调整，第一线的防守部队、预备队和炮火支援力量都大大加强了，而且，根据敌人先用飞机、舰炮、地炮狂轰滥炸一通，然后步兵按一梯队、二梯队、后续部队，像浊浪一般，一拨连着一拨地实行集团冲锋的战术特点，我们采取了新的对付办法，就是：敌人打炮时，我留少数人在阵地上警戒，其余的进入工事隐蔽起来；等敌人炮火延伸，步兵开始冲锋，我再迅速进入阵地；待敌人靠近了，我突然开火，然后趁敌人迟滞之时，以精干的小分队迂回到敌人两翼，配合正面，实施突然猛烈的反冲击。实践证明，这种依托阵地、守中有攻的战法，自己伤亡小，杀伤敌人多，回回奏效。那时，我军弹药很缺乏，在两大战斗中，部队的弹药打得差不多了，有的阵地已经出现了用石头打击敌人的情况。为了支持第一线的战斗，每天夜间，总部后勤人员和支前群众，马驮人扛，把第二天需要的弹药运到前线。连派人到营部、营派人到团、团派人到师部、师派人到纵队部坐等。弹药一到，立即分发，保证把子弹、手榴弹等弹药于拂晓前送到战士手中。今天，利用战斗间隙，第一线的部队已经得到了新的补充。紧张的调整部署一一就绪，真是铁拳在握，严阵以待，只等着敌人前来就范了。

决战的时刻

13日，天刚拂晓，敌95师、8师、151师、157师在数十门重炮和军舰、飞机炮火的掩护配合下，采取两翼突破，夹击塔山的战法，全力向我阵地展开了猛烈的进攻。我28团防守的铁路桥头堡阵地、高家滩阵地则是首当其冲。此时，潮水已经退落。敌人利用露出的海滩进攻，这是兵家很少用的。这说明敌人一方面是狗急跳墙，另一方面是想钻空子。他们错误地估计我们会麻痹大意，这里的防御一定薄弱。可结果又是碰得头破血流。“重庆号”巡洋舰的侧射炮弹，加上正面发射来的炮弹，雨点般地落在阵地上，刚刚修复的工事，大部被毁。开阔的海滩上，整团、整营的敌人，由“敢死队”作前导，像黄色的蚂蚁，哇哇叫着冲上来。我28团的英雄们在团长鞠文仪和政委张继璜的率领下，沉着应战，以机枪、步枪、手榴弹把敌人杀伤了一批又一批。敌人冲到了阵地前沿，战士们端起了刺刀，迎了上去，一场混战，接着是一场挤杀，前面的敌人打掉了，后面的敌人还在往上冲。战士们打红了眼，只要还有一个人，决不后退一步。地堡打塌了，跑到战壕里打；战壕打平了，再转到弹坑里打；打光了手榴弹就拚刺刀、拚石头，反复冲杀。正在危急的时候，28团3营冒着敌人的炮火拦阻，付出了伤亡70多人的代价，从侧翼反击上来。震天的喊杀声，压倒了敌人的炮火。敌我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没有间隙地拚杀了七八个来回，“敢死队”成了“送死队”，尸横遍野，血溅海滩。敌人终于被打退了。上午10点，前沿捉到95师的一个士兵送到了纵队部。这家伙说着广东话，像个疯子一样，一个劲地大喊大叫：“你们把我活埋吧！”“你们把我活埋吧！”“我不活了！”我亲自审问他，用粤语向他宣传俘虏政策，但毫无结果。从俘虏的表现，我们看到了95师官兵受毒害之深，对这样的敌人，不可小看。遭到痛击的敌人，在督战队的威逼下，又不顾死活地一次次重新组织冲锋。那些头戴大檐帽的军官，好象吃了“刀枪不入的护身符”一样，跑在队伍前头。他们把尸体垒成活动工事，向我阵地一步步推进。进攻的凶猛程度是前所未有的！我们的阵地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不管是坚持在阵地上的防守部队，还是作为2梯队的反击部队，经过与敌人反复拚杀，伤亡都很大，情况很严重。在这个时候，指挥员的坚定、顽强，就是关键性问题。我拿电话对10师政委李丙令说：“你告诉蔡师长，一定要死守，敌人打到哪里，哪里就是第一线，一步不能退！”他表示：“请纵队首长放心，我们决不后退一步！”纵队决定把预备队11师1个团移至28团侧后山上，以备在敌人危及我阵地时，从侧翼打下去，歼灭敌人，支援28团，即告该师师长田维扬和政委吴保山执行。同时命令各炮群全力打击向塔山桥方向进攻的敌人。下午，战斗更激烈。28团营连之间的两条电话线，全被炮火打断，各阵地指挥员发挥独立作战的精神，与敌奋战。在2连指导员程远茂率领的1排阵地上，6个地堡被敌人掀掉了5个，剩下的1个也只是个骨架子了。这时，2、3排那边还有断续的枪炮声，而这里突然寂静下来。程远茂很快发现：对面山坡上的炮兵正在转移阵地，一直向这边推过来；东面海面上，轰击了多时的两艘军舰旁边，又增加了一艘。程远茂明白：更大的恶战就要来了。他抓紧战斗间隙挨个去动员鼓励大家：“敌人正在垂死挣扎，我们要以一顶百。没有子弹还有手榴弹，没有手榴弹还有刺刀，石头也是武器。死守阵地，寸土不失，实现我们的决心”。说话间，敌人的炮火已经轰击过来了，连续的爆炸声把战士们震得发聋。营部通信班长跑来报告说，电话线被炸成一截一截的了，无法再接，和营部的联络中断了。程远茂见他

的棉袄被撕成了碎片，脸被熏得乌黑，嘴唇流着血，显然是用牙接线割破的。程远茂急忙压下他的肩头，让他隐蔽好，随手抓起身旁的步枪给他，说：“你到右翼去，用它打击敌人，只要上级还听到咱们的枪响，就知道阵地还在咱们的手里！”通信班长刚离开，一颗炮弹在程远茂身旁爆炸了，他头顶上原来的伤口又冒出了血。他觉得脑袋更加沉重，就像有人用锯子拉来拉去似的。他顾不上这些，急忙擦擦眼睛察看阵地。3班长倒下了，3班只剩下了三四个同志。程远茂把他们分别补充给1班和2班，这时，通信员已经把纱布一圈一圈地缠在他的头上。敌人的炮火延伸后，又开始冲锋了。蜂拥的敌人在200米外的小河岸出现了，不成连，不成排，拿着一色的冲锋枪、机枪，有的抬着重机枪，队伍中还夹着挑弹药的，挺着腰直冲过来。程远茂沉着地指挥大家，把敌人放到几十米的地方一起开火。机枪、冲锋枪、步枪，加上后边的火力构成了密密层层火网，裹住了敌人，而敌人的火力也像开了锅似地打过来，1排又牺牲了两个同志。前边的敌人撂倒了，后续的敌人在戴大檐帽的军官带领下冲上来。突然，左翼的那挺最能杀伤敌人的机枪不响了。程远茂跑去一看，掌握机枪的代理排长倒在血泊里。他像被敌人砍去了一个膀子似地疼痛，半天说不出话来。1班只有5个人了，个个都缠了绷带，他们愤怒地把手榴弹甩到敌群里。右翼的2班也没有几个人了。他迅速把全阵地组成一个排，指定2班长魏殿荣代理排长。这时，敌人的炮弹又夺去了我另一名机枪射手的生命，机枪也出了故障。阵地上没有机枪射手了，机枪不响就等于给敌人让路。程远茂正在着急，机枪班弹药手张连喜主动要求担任射手。程指导员鼓励他说：“阵地上两挺机枪都交给你，张连喜同志，这回就看你的了。”此时，敌人已经趁虚涌上来，只见张连喜竖起机枪，用脚一蹬，拉开了枪栓，就在相距六七步远的两个掩体上固定好，向敌人射击。他时而打这挺，时而打那挺，打得敌人抬不起头来。“真是好样的，真是机灵鬼！”程远茂不住地鼓励他，并派3个伤员帮他擦拭武器，保证机枪不出故障。10多个敌人终于冲到被炸碎的铁丝网跟前了，而我们的弹药也将告绝。程远茂鼓励大家说：“要节省子弹，准确地杀伤敌人。”我们的火力弱了，敌人的军官站起来高喊：“冲啊，他们没有弹药了！”话音刚落，就被程远茂点了名。战士们用手榴弹消灭了铁丝网附近的敌人。然而后面的敌人又冲了上来，他们用自己人的尸体当活动工事，慢慢向前移动着，情况越发危急。程远茂拉开盒子枪一看，还有3发子弹，他想只能再用两发了，他把自己的决心告诉战士说：“有一口气，也要和敌人拼到底！”听了他的话，重伤的同志努力睁开双眼，向他微笑；轻伤的同志靠着胸墙站起来，掏出最后一颗手榴弹；不能起来的同志，不停地鼓励别人；有的拣起了子弹头，使劲地在胸墙上画着、写着：

“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与阵地共存亡！”张连喜的机枪还在点射，打光了子弹的同志端起了刺刀，拿出最后一颗手榴弹，阵地上能动的人都拿起了武器和石头。突然，前面的敌人成排地倒下了，左右方高粱地里发射出密集子弹。“我们的反击部队上来了！”同志们欢呼着冲了出去。在我们反击下，那些被铜臭熏迷了心窍的“敢死队员”们，一个个被敲碎了财迷梦，至死也未能踏上我们的阵地。经过反复争夺；在6连1排阵地上，也只剩下1班长和机枪手孔守法带领的两个战斗小组了。这时兄弟部队正在向前压缩，孔守法找到1班长，两个商量好，每人带一个小组往里插。

他对自己组里的卢金福和王锡山说：“我们平时下了决心，现在是实现的时候了。敌人往里打得这么急，咱们干脆钻进敌人的肚子里，搅他个翻江倒海！”全组同志战斗情绪非常高，坚决表示：“好！你打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临行前，孔守法把一颗手榴弹紧紧拴在腰上，准备万一遇到意外，宁肯与敌人同归于尽，绝不能当俘虏。他们脱去棉衣，穿着同敌人服装颜色近似的黄色服装出发了。刚越过路基，迎面碰上四五个敌人冲上来。孔守法拣起敌人扔过来的手榴弹甩了回去，接着就是一梭机枪，撂倒了敌人。不料一发炮弹打过来，机枪被炸坏了，孔守法被震昏了。他清醒过来对两个组员说：“机枪打坏了，咱们还有步枪手榴弹哩！”于是他们端起步枪，往东直插过去。在敌人的一个地堡里，一挺机枪正疯狂地封锁着铁路，孔守法他们靠上去，一齐掷出手榴弹，扑进了地堡，缴下了机枪，还有3箱子弹和1箱手榴弹。孔守法突然发现，左边小营盘的敌人正要发起冲锋。于是他掉过机枪，对着敌人的屁股后边就是一阵扫射，打得敌人莫名其妙地叫唤。但是，敌人打来的手榴弹却把机枪又打坏了。王锡山也负了伤。孔守法把机枪交给王锡山，并动员他回去包扎。王锡山刚走，敌人的军官又赶着一群士兵冲上来。孔守法连忙把3个手榴弹一块掷到敌群中去。顿时，敌人大乱，狂喊着：“来炮了，来炮了！”夹着尾巴就往回跑。于是，卢金福只管揭盖，孔守法追着敌人，只管猛掷手榴弹，把敌人打得王八啃西瓜，滚了回去。他们撇开小营盘的敌人，向南山根猛插下去。在一个小河沿上，发现了敌人的一个炮兵指挥所。孔守法一声大吼窜了上去，犹如神兵天降，在敌人腹地突然出现。敌人吓慌了，撒腿就跑。可是当他们发觉孔守法只有两个人时，就鬼鬼祟祟地又回来了。孔守法急中生智，高喊：“冲啊！左右面一齐上来！”敌人一听，掉头就跑。孔守法赶上去，一刺刀捅了一个，腿快的只顾逃命。两名独胆英雄继续向山根底下前进，在一个交通沟里，又用3颗手榴弹，缴获了两挺机枪。这时，孔守法唯一伙伴卢金福也负了伤。孔守法的决心坚如磐石，他动员卢金福扛一挺刚刚缴下的机

枪回去，自己端着另一挺机枪继续往前打。四周全是敌人的阵地，我们的独胆英雄毫无惧色，不断地寻找新的目标。他发现山坡上有一挺机枪像抡鞭子似地怪叫着，它向桥头打两枪，炮就往桥头打；它朝碉堡打两枪，炮又转向碉堡。孔守法看出了道道，气得冷笑一声：“好小子，你还能指挥炮！”他机警地靠上去，哗哗两梭子打过去，那怪声怪气的机枪和六炮再也不叫了。孔守法在敌人的心脏里究竟战斗了多久，他自己也记不得了。不知不觉，星星已布满了天空。这时，他借着照明弹的光亮，看见我军牢固地占据着争夺一天的桥头阵地，而敌人丢下了横七竖八的尸体，留下一滩滩血迹，已经滚回去了。寂静的旷野里，只剩下他一个人了。他虽然疲惫不堪，却充满了胜利的豪情，艰难地踏着烧焦了的草地，越过弹坑，回到了阵地。这一天，是敌人投入兵力最多、火力最猛、进攻最凶的一天，也是对塔山存亡有决定意义的惊天动地的一天。但是，敌人投入的赌注越大，输得就越惨；那个号称常胜不败的“赵子龙师”，在我英雄阵地面前同样碰得头破血流，在那乌黑血泊里的尸堆中，几乎包括了全部的“敢死队”。夜幕笼罩了塔山，噪耳的枪炮声停止了，只有渤海涛声，不时被风吹到阵地上来。已经胜利地度过了第四天激战的英雄阵地上，又响起了叮当的镐锹声。战士们又赶紧加固着被打坏的防御工事。

迎来最后的胜利

这天夜里，野战军总部指示：锦州外围据点已全部肃清，攻锦准备已全部完成，主攻锦州的部队在明天就要发起总攻。估计葫芦岛的敌人不会甘心失败，战斗可能更为激烈与残酷，要部队积极准备，坚持到底！锦州决战的时刻终于来到了！我和吴司令员连夜把总部的指示传达下去。指战员们兴奋地传播着，更加信心百倍地准备痛击敌人。14日，狗急跳墙的敌人，在蒋介石的严令威逼下，继续倾其全力猛攻我塔山左右两翼；铁路以东阵地遭到了敌95师的3路突击。刚刚接替28团阵地的30团指战员们，学习28团的榜样，同凶恶的敌人展开了反复争夺。天刚拂晓，敌人的军官发疯似的驱赶着士兵在强大的炮火掩护下，分3路以密集的人群一拨又一拨地涌向我阵地，其中路爬上了我铁路4号阵地铁路桥头堡。4连反击过去，夺回了阵地，把敌人压缩到了铁路以东。不久，敌人再度突进我工事，伤亡过大的4连在工事里正与敌人作最后的拼杀，5连3排这时猛烈地反击上来了。刚从卫生队赶回来的刘殿哲同志，决心要在这次战斗中让党考验他够不够一名共产党员。他冲在队伍的最前头。当他和战友们刚刚抢占了桥头堡，敌人便从铁路上压了过来。刘殿哲和马海新抡起机枪钻出地堡向敌人猛射。他一马当先，冲上铁道，把敌人压了下去。可是，敌人的机枪打中了他的头部和右臂，回到地堡就昏迷过去了。当他醒过来的时候，指导员和同志们都劝他下去，他断断续续他说，“不能下火线，不死就和敌人挤到底……”地堡的战友们，都以敬佩的眼光看着这个英雄无畏的战士。这时，探头探脑的敌人又爬上了铁道。指导员组织第三次反冲锋。躺在地上随刘殿哲咬着牙爬起来，端起机枪悄悄地跟着队伍冲了上去。不幸，他又负伤栽倒在地上。他顽强地爬起来，又冲上去。正赶上1排从铁道上向南压过去，他兴奋地忘记了疼痛，使出浑身力气，冲到前面，用机枪追着敌人猛打，一气追了150多米。突然，一颗炮弹打来，顿时把他炸翻了，身上也着了火。他咬紧牙，用尽最后力气，朝同志们大喊：“坚决守住阵地，寸土不丢，给我报仇啊！”这个硬骨头战士终于为人民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为刘殿哲报仇啊！”战士们呼喊着，把敌人打得抱头鼠窜。敌人的攻击，被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击退了，他们的锐气也被我英雄战士给打掉了。敌人的气焰已经被压了下去，我们的阵地逐渐巩固下来。正在激战之际，吴司令员接到1纵李天佑司令员的电话。李天佑同志亲切他说：“我们奉军区首长命令来做你们的预备队，现在高桥一带。我代表一纵全体指战员向你们致敬，你们什么时候需要，我们随时可以支援上去！”吴克华同志非常激动，高声地说：“4纵全体同志向1纵老大哥致敬。你们远道赶来，请先休息，一旦需要，我们就请老大哥上来。”有兄弟纵队做后盾，我们战胜敌人的信心更加坚定了。上午10时，锦州方向传来了震天动地的炮声，锦州总攻开始了！日日夜夜盼望的，用无数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时刻终于来到了。这个振奋人心的喜讯，在塔山全线闪电般地传递着，从指挥员到战斗员，从前沿到纵深，个个欢欣鼓舞。“坚守阵地，保证全歼锦州守敌！”“用更大的胜利迎接锦州解放！”阵地上一片欢呼，士气越发高昂。狡猾的敌人强攻不成，耍起了花招。在靠近我前沿阵地一两百米的地方，筑起了临时工事；而且在我阵地前组织人力，派出小股部队实施攻击，当我反击时，立即缩回，而我撤回时，他们又发起攻击。他们妄图引诱我大部队出击，以使用火力大量杀伤有生力量。我们识破了敌人的诡计，指挥所命令各部队，要依托工事坚守，不要轻易作远距离反击，必要时只以小分队进行不

脱离阵地前沿的反冲击，同时又用炮火轰击敌人。这样，打得敌人无法藏身，死伤无数。敌人的阴谋又破产了。在塔山堡以南，敌人一直隐藏了一个师的兵力，只待其两翼得逞，好一举夺下塔山堡中心阵地。然而，直到太阳落山，两翼进攻的敌人始终未前进一步，他们也只好夹着尾巴溜走了。敌人一招不成，再来一招，妄图以偷袭手段占领塔山堡。夜半过后，趁敌人炮火无法封锁的黑夜，炊事员把热饭热菜挑到阵地上，让苦战了几昼夜的战士们吃顿饱饭。副排长王文礼忙着给大家分饭、分菜。突然“嗖”的一声，王文礼觉得脸上有点刺痛。他知道是负了伤，转身就去拿枪，枪还没拿到手，墙上已经伸出来几个奇怪的脑袋，影影绰绰地看出有青天白日帽花。王文礼顺手抓起墙上的石头，向敌人砸去。敌人缩在墙头下不敢动。他干脆连泥带石头把墙头推了下去，同志们丢下饭碗，进入工事，手榴弹、机枪、六炮、迫击炮一起开了火。与此同时，顺着交通沟去后面接子弹的弹药手魏海云转过弯，模模糊糊看到前面有一个人，他一眼发现了那人头上的白帽花：“敌人！”他机警地盯住对方，一个箭步窜上去，赤手空拳与敌人扭打起来。他拼命将敌人压在身下，威逼他交枪，这家伙却要喊后面的敌人上来。魏海云一阵拳打脚踢，闻声赶来的副指导员又给了敌人一手榴弹，才乖乖地交了枪。保持高度警惕的指战员们，都迅速发觉了敌人的偷袭，奋起反击，与敌人短兵相接，一鼓作气，将敌人逐出了阵地。此时，天色大亮，敌人偷袭不成，突然发起了集团冲锋。重机枪射手阎成兴和他的战友们用一挺重机枪沉着迎击敌人。敌人一上来，他就点名，一连点了四五十个敌人。左翼地堡群里警卫连的同志们猛向敌人侧后射击，形成了严密的交叉火网。指导员史升起带领警卫连的同志数次发起反击。1连的同志也跳出了工事，及时反击。敌人被打得鬼哭狼嚎，狼狈逃窜，他们的冲锋完全垮了。敌人的最后挣扎失败了。溃乱的队伍被我军强大人力截断了退路，畏缩在饮马河岸一个高坎下的开阔地里，半天动弹不得，远处不断地响着一长一短的催命哨，敌群里也一片叫骂声，但始终没有一个人再敢上来。一个指挥官指手划脚地叫骂着，正在威逼士兵冲锋，被指导员王金忠一枪撂倒了。面对着丧失了进攻能力的敌人，我军适时地展开了一场攻心战。1连和警卫连的瓦解敌军小组迅速跳出了战壕，穿过硝烟越过弹坑，分散在鹿砦后、坟包旁、河沟边，向敌人喊起话来：“锦州已经解放了，蒋军兄弟们，再不要给蒋介石卖命啦！”“你们的退路已经被切断了，只要放下武器，才有活路一条！”敌人正犹豫不定，副营长鲍仁川立即派1班副班长卜凤刚和另一个战士深入敌阵。卜凤刚他俩机警地出现在靠近敌人的土坎下，大声喊道：“缴枪吧，老乡，不要替蒋介石卖命啦！”一个士兵扔下武器向卜凤刚隐蔽的土坎跑过来，却被后面一个顽固不化的家伙打倒了。卜凤刚回敬了那家伙一枪，送他回了老家。接着，他们连续几个大步，从土坎跃入敌群，高举着手榴弹威吓道：“缴枪不杀！不缴枪我这铁馒头就开花啦！”瓦解敌军小组又趁势接连喊起话来：“枪是美国佬的，命是自己的，赶快放下武器，解放军优待俘虏！”“天下穷人是一家，穷人不打穷人，回家和老婆儿女团圆吧！”一句句喊话像攻心炮弹在敌人的心里炸开了，敌群中骚动起来。又有两三个人扔了枪支，一个军官模样的人见了，举起手枪要打，被卜凤刚大喝一声：“谁敢开枪，饶不了他！”给吓了回去。敌人的士兵也骂起来：“谁开枪，先宰了他狗日的！”开阔地里的敌人，纷纷站起来，一窝蜂似地举着枪，从我们为他们扒开的铁丝网中向我军阵地走来。有的军官开枪射击，被他们的士兵打倒了。就这样，在我强大

的军政压力下，两个连的敌人乖乖地当了俘虏。到中午 12 时，敌人全线溃退了。太阳照耀着巍然屹立的塔山阵地，奋战了 6 昼夜的英雄们充满了胜利的豪情：“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突然，远处又传来了飞机的轰鸣。蓝天下，一架大型飞机，在 3 架战斗机的护卫下，从葫芦岛方向飞来。战士们警惕地监视着敌机的动静。它既没有轰炸，也没有扫射，只是绝望地像吊丧似的在塔山一线盘旋两圈后，向西南方向窜去。据后来在天津被俘的国民党 62 军军长林伟涛说：这天拂晓，蒋介石又来到葫芦岛督战。当时，一个从锦州化装逃跑出来的副团长报告说：“锦州情势非常危急，东北野战军的部队已攻入街道，只有零星守军在战斗。”蒋介石眼见援锦已是无望，“夹击共军主力于辽西走廊”的梦想无可挽回地破灭了。如此优势兵力，拿不下一个小小的塔山，这是他做梦也不曾料到的。他情绪颓丧，连给他准备好的午饭也没吃，就气急败坏地坐上飞机窜回北平。途中颇不甘心地飞到塔山上空，想看一看究竟是什么样的共军，挡住了援兵的去路。往常，敌人一般攻至下午 4 时，不得手，便收兵了，今天才过了中午 12 时，便停止了进攻。于是，我打电话问 1 纵队李天佑同志，过一会，他告诉我了解放锦州的胜利消息。“锦州解放了！”这胜利的消息从纵深传到前沿，从打鱼岛传到白台山，阵地上掀起了狂欢的浪潮。经历了 6 个昼夜生死搏斗的广大指战员怎能够抑制自己的喜悦！为保卫塔山而英勇牺牲的烈士也会在九泉之下欢笑了。是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铸造了塔山的钢铁阵地，是他们创造了震动全国的光辉的防御战例，是他们为解放锦州立了第一功！不管蒋介石如何限令其军队“占据塔山”；也不管国民党的“造谣社”（“中央社”）如何造谣说蒋军“已越高桥”，“东进兵团”始终没有东进一步；大肆叫卖的所谓“赵子龙师”，也终究没有能把范汉杰这个“阿斗”救出来。留在塔山战场上的，只不过是蒋军几千具发臭的尸体。越高桥的，只有放下武器举手投降的国民党军俘虏而已。当激战至第 5 天时，总部首长给胡奇才副司令、江燮元师长、潘寿才政委发来嘉勉电，表扬 12 师全体指战员“英勇顽强的防御战，是模范的，值得赞扬的”。后总部又发电给蔡正国师长、李丙令政委，表扬 10 师指战员的英勇战绩。塔山阻击战的胜利，保证了锦州战役的胜利。它以光荣的战绩和我军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永远载入了中国革命的光荣史册；为保卫塔山、争取锦州战役的胜利而英勇牺牲的烈士们，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塔山战斗的启示

塔山阻击战，是辽沈战役中最为激烈的一仗。我第4纵队以3个师抗住了敌人在飞机和舰炮掩护下的11个师（还有一个师才从关内调来，没有用上）的猖狂进攻。战斗最激烈的日子，在我防御正面上，双方曾有22个团、7架飞机、2艘军舰和约500门大炮、迫击炮同时交战。连续6天血战，毙伤敌副团长以下6222名，俘敌副团长以下667名，敌人始终未能前进一步。我军坚守塔山阵地，岿然不动，以比敌少一半的伤亡代价，保证了攻克锦州和辽沈决战的伟大胜利。这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胜利！塔山阻击战，是解放战争中我军一次大规模的野战阵地坚守防御作战，其灵活的战术和活跃的政治工作为我军留下了宝贵经验。塔山战斗结束后，我用3天时间赶写了《略谈塔山战斗》的总结报告，重点探讨和总结了战场上的政治思想工作。罗荣桓同志曾说过，塔山作战主要是打政治仗。罗政委的话既是对我们的鼓励，更指明了坚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对战胜敌人赢得战争胜利的极端重要性。塔山阻击战的政治工作，是在新式整军运动的基础上进行的。1947年冬季攻势结束后，4纵队集结于鞍山一带，进行了为期5个月的政治整训和军事大练兵。全纵队深入开展诉苦和新式整军运动，形成了“诉苦、练兵、报仇、立功”一整套与训练、战斗紧密结合的政治思想工作，使全纵队的战术技术、战斗作风和思想觉悟，有了进一步加强，它的威力，在塔山作战中充分发挥出来了。当数倍于我的敌人，在飞机、舰炮的支援下，向塔山阵地发起疯狂进攻的时候，敌人的炮火异常猛烈，把附近的铁轨都炸成一截一截的，有的连队伤亡惨重，打得只剩下十几个人。但是指战员们临危不惧，英勇顽强，一次次地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不仅守住了阵地，还主动出击，大量歼灭敌人。部队士气高昂，战士们战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正是以政治教育中激发出来的高度阶级觉悟为基础的。当战士们一旦明白了苦根在哪里，自己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时候，他们的力量就像山洪爆发，任谁也阻挡不了。这使我们体会到，战争不仅是兵力和兵器的对比，也是人心和意志的较量。在觉悟了的战士面前，勇气和斗志可以转化为战斗力。36团7连战士陈士云，见到别的阵地插的“复仇立功”的鼓动牌，就把它插到了自己的阵地上，他说：“我看到这牌子，就想起自己父母的惨死，我要为父母报仇！”他一腔怒火，同敌人作殊死的搏斗，战斗到最后阵地上只剩下他一个人，还打垮了两个班敌人的3次冲锋。这个战士的话，其实说出了全纵上下共同的阶级仇恨。阶级仇恨化为忍受一切艰难困苦，与敌拚杀肉搏的大无畏精神力量。塔山当面之敌，无论在兵力和装备上都处于优势，他们的进攻是很凶狠的，他们要越过塔山驰援锦州的决心很硬，蒋介石亲自到葫芦岛督战，并亲自在“重庆号”巡洋舰上进行指挥。可是，在我们面前，敌人的一切招数都失败了，他们始终不能越雷池一步。原因何在呢？这是我在塔山作战后常常思索的问题。敌95师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一色美式装备，号称是“没丢过一挺机枪”的“赵子龙师”，战斗力不可谓不强。这个师的“敢死队”是用每人60万金元券买来的亡命徒，抓获的俘虏开始态度死硬，当了解了我们的俘虏政策后，他们的“精神防线”瓦解了。万金之下必有勇夫，可是这些“勇夫”（特别是那些穷苦出身的士兵），一旦觉悟，认识到自己给反人民的战争卖命的时候，一切金钱收买和漂亮的谎言都失去了作用。“赵子龙师”解不了锦州之围，800万蒋军在大陆的覆灭，亦挽救不了蒋家小朝廷的末日。这就是敌人为什么必然失败的根本原因。事隔45年之后，我曾与当年“赵子龙师”的参谋长

张伯权先生谈起这个问题。昔日塔山对手，相逢一笑泯恩仇，他告诉我当时的心境：“没心思打”。这话道出了蒋军上下人心动摇，不愿为蒋卖命的情绪，也反映了解放战争形势发生的根本变化。

当年骄横于东北战场的敌人，而今成了瓮中之鳖，解

放全东北的伟大战役已经开始。敌人虽然还在张牙舞爪，但毕竟是大势已去，困兽犹斗，垂死挣扎。表面气势汹汹，掩盖不住本质的虚弱。只要我们守住塔山，保证主力拿下锦州，全歼东北蒋军的日子就不会远了。这就是纵队上上下下全体指战员在战前形势任务教育中形成的共识。这也使我们感到，部队高昂的斗志和必胜的信心，来源于政治觉悟，同时也来源对全局情况的了解。战前深入形势任务教育，使部队全局在胸，看到光明，看到希望，鼓舞士气，树立起敢打必胜的信心是非常重要的。

从根本上说，政治工作是党的工作，是党领导下的群

众工作，群众路线是政治工作的根本方法。塔山作战命令下达后，如何把上级的意图和决心变为全军上下的意志和决心，化为部队的自觉行动，这对于铸起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铜墙铁壁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相信和依靠群众，把情况和任务交给群众，采取群众路线的方法，召开各种会议，从上到下，从党内到党外，从干部到战士，层层动员，宣传发动，使每个人都明了上级的意图和战斗的意义，激发责任感和光荣感，从而掀起了杀敌立功的热潮。除各级深入战斗动员外，纵队召开了士兵代表大会，各战斗连队派代表参加，由纵队领导直接动员，激励他们充分发挥战斗骨干作用。发布了《告全纵队指战员书》，提出了“死守阵地”、“寸土不失”、“与阵地共存亡”、“保证锦州胜利”等战斗口号，特制“英勇善战”、“稳如泰山”等奖旗，号召开展夺旗竞赛，看谁当杀敌模范，看谁当守备英雄。群众发动起来了，部队情绪高涨。进入阵地后，大家不顾行军疲劳，昼夜不停地构筑掩体，挖战壕。阵地上插着各种口号的木牌，人人开口宣传鼓动，个个动脑，献计献策。在这次阻击战中，完全证实了做好战前动员的极端重要性。36团有个连队，参加士兵代表大会的20人，战斗中个个英勇顽强，带头杀敌，打到后来只剩下9人，全部被炮火震聋，仍顽强坚守阵地，有力地鼓舞了全连斗志。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战前的政治动员，特别要抓好各级领导干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极为重要。可以说，这是全纵队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统一，胜利完成战斗任务的关键。在纵队党委扩大会上，我们明确地提出了“敌人打到哪里，哪里就是第一线，绝不后退一步”的誓言。纵队党委正副书记还特别发布了致师、团党委书记指示信，要求师、团党委书记在紧要关头，不负党的重托，以身作则，以自我牺牲精神完成任务。我们纵队负责同志也上书东北军区及攻锦兄弟部队，决心不惜一切代价，绝不让敌人前进一步。并组织师、团、营各级首长进行军旗下宣誓和阵地宣誓，鼓舞和坚定部队坚守阵地的决心。纵队还召开了党代表大会，发布《告全纵队共产党员的信》，号召共产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带头打好这一仗。战斗中共产党员坚决响应党组织的号召，真正做到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哭叫，战斗在前，紧急情况下挺身而出，以自己模范行动影响和带动群众，坚决完成战斗任务，充分表现了共产党员英勇献身党的事业的崇高革命精神。12师通令记功的160人中，共产党员达113名，占70%；该师共产党员战斗中流血牺牲的，占全师伤亡总数的70%。

在战斗最后急时刻，指挥员的决心起着关键作用。激

战中，我一侧阵地是敌人进攻的重点，战士们打得非常英勇，伤亡很大，情况非常严重。前方指挥所报告了前沿情况，说他们尽量坚持……这时，电话线被炸断了。我们的任务是死守，怎么说尽量坚持？我马上又要通了电话，查明情况，明确决心：“告诉同志们，一定要死守，一步不能退！”对方解释是语言表达问题，请纵队首长放心，我们绝不后退一步。在危急时刻，胜利往往决定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指挥员的决心对稳定部队，聚拢人心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战时政治工作的总目标，就是巩固部队，提高部队战

斗情绪，保证战斗的胜利。而要实现这一目标，要靠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特别是针对部队的思想问题，化解矛盾，排除一切不利因素的影响，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塔山战斗任务一下达，部分干部战士就反映出要打进攻仗，不愿打防御战的思想。4纵队原是辽东军区的一支能征善战的老部队，曾挺进敌后，转战辽河两岸，创造了东北战场最早歼灭敌人一个整师的辉煌战绩，由于远离根据地作战，补充非常困难，部队在零下40度严寒中行军作战，棉衣、棉帽、手套等御寒被装奇缺，冻伤多于枪伤，造成大量减员。在准备攻打锦州呼声正高的时候，奉命守塔山，一些同志思想一时转不过弯来。通常来说打进攻仗，缴获多，油水大；防御作战，缴获少，伤亡和消耗大。愿打进攻仗，不愿打防御战，实质上是保实力、怕伤亡的思想。我们在战前教育中，把塔山阻击战在锦州战役中的重要意义讲清楚，号召部队下大决心，敢打大仗、硬仗、恶仗，不计缴获，不怕伤亡，为攻克锦州作贡献，很快打通了思想。塔山战斗开始的第二天，总部派来了一位处长到纵队当联络员，其任务是上通下达，加强联系。总部联络员可参加纵队的党委会（只听不表态），总部给他或他发给总部的电报，我们不能过问。个别同志私下开玩笑称联络员是“监军”，纵队主要领导对此做法也有反感。不管上边出于什么意图，这种作法会引起下边的考虑，甚至影响到作战情绪。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嘛！何况，激战正酣，指挥员的任何一点分心，问题可就大了。于是，我找纵队主要领导谈心，我说：“这次任务，非同小可，叫我们守塔山，是党的信任，我们都是几十年党龄的党员，绝不能辜负党的期望，别的情况先不要想它，坚决打好这一仗”。战斗中，阵地上弹药很缺乏，由于我刚来4纵不久，比较超脱，要弹药、请求友邻部队支援等这些“叫苦”的事，我主动出面，以我个人名义给总部发报，减少了不必要的误解。这也使我感到上下一致，相互信任，是保证作战胜利的重要一条。对政治工作来说，及时掌握部队思想，排除不必要的误解，协调关系，稳定情绪，巩固部队，保证指战员同心协力，一心一意打好仗，这是战时政治工作的首要任务。

塔山作战胜利后，我到总部汇报工作。总部首长表扬

了4纵队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并告诉我们，现在准备打廖耀湘兵团，4纵队要继续防守塔山一带阵地阻击锦西、葫芦岛之敌，以保障我东北主力围歼廖耀湘兵团。我受领任务后向总部反映说，敌“重庆号”巡洋舰在葫芦岛附近游戈，向我阵地开炮，我们的大炮打不到它，请考虑调配大口径炮给我们。林彪听了说：“好吧，这次我给你一个营，9门炮，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最大口径的榴弹炮，汽车牵引，是日本仿造德国的。”我想，有了这几门炮，就再也不怕蒋军的舰炮了。可是，我高兴得有点太早了。当晚，林彪又跑来找我，慢吞吞地对我说：“咳呀，我打廖耀湘兵团需要大炮，你们也需要大炮，是不是少给一点呀？给你们3门怎么样？”我回答说：“好吧，3

门就3门吧，我们服从大局”。我便带着这3门炮回到纵队。当时，我4纵队尚未下火线。我们根据总部指示，进行第二次守塔山的部署，严阵以待。也许敌人有了塔山的教训，未敢再来碰我塔山阵地，只对我左翼11纵发动攻击。为支援11纵，我们用大口径榴弹炮远距离轰击敌人，并轰击敌“重庆号”巡洋舰。这种大口径火炮，射程远，威力大，腾起的烟云升起很高，“重庆号”吓得掉头逃走了。后来直到沈阳解放，廖耀湘兵团被歼，我们才真正完成了塔山防守任务。

战斗结束后，我在塔山高桥写下了《英雄塔山》（鹧鸪

天）一诗：炮弹狂轰工事隳，狼群猛扑阵垂危。地震隆隆尘埃滚，刀光闪闪血肉飞！敌急逃，我神威，残兵败退弃尸盔。钢铁长城谁越步？保障攻锦凯旋归。

第十章在解放北平的日子里

先遣入关

声势浩大的辽沈战役即将胜利结束，中国革命的形势发展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

1948年冬，辽沈战役硝烟未尽，淮海战役鏖战正酣，华

北大地一场新的战略决战又在党中央、毛主席的运筹帷幄之中。

当时，国民党华北集团所属4个兵团，12个军，52个

师（旅），60余万人，受华北野战军的塘制，东西应援，疲于奔命，猥集蛰伏于山海关至归绥一线。在人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的声威面前，预感到强大的东北野战军即将入关，如惊弓之鸟的华北“剿总”慌忙收缩兵力，是南逃还是西窜？或从海上逃跑，举棋不定，采取“暂守平津，保持海口，扩充实力，以观时变”的方针，将其嫡系部队部署在北平至张家口一线。

这时，东北野战军迅速入关，便成了华北战局的关键一着棋。

1948年10月下旬，蒋介石、傅作义调集3个军，2个骑兵师企图偷袭中共中央所在地平山和华北人民政府所在地石家庄。10月29日，毛泽东亲拟电稿，调锦州附近的部队火速入关，这也是东北野战军提前入关的一个原因。我第4纵队自从塔山战斗后，一直未下战场。指战员们长时间战斗、生活在潮湿的战壕和隐蔽部里，许多入关节都有了毛病。沈阳即将解放时，部队才从塔山阵地撤下来，驻在锦州以南六官屯、女儿河地区。10月30日，东北军区命令我第4纵队与第11纵队归东北第2兵团指挥，组成东北野战军入关作战先遣兵团，神速而隐蔽地挺进冀东。我们接到指示后，部队尚未休整，冬装还没发齐，便于11月1日从驻地出发。这完全出乎国民党反动派的意料。他们以为我东北解放军至少要经过3个月的休整才能进关。我们的行军路线是沿虹螺岬、江家屯、六家子、喇嘛洞、于沟镇、马圈子，然后横越长城，由冷口、喜峰口分路入关。在向关内开进的头两天，由于部队刚补充了5000多名新战士和解放战士，未经休整和动员就仓促出发，加上部队入关属隐蔽行动，出发前未向战士们交代行动意图，有些家乡观念重的东北籍战士，情绪不稳定，曾发生个别逃跑的现象。途中，我和纵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欧阳文同志研究了部队的思想情况，认为塔山战斗的胜利，使部队充满了上进的气氛。这次的行动虽然比较突然，但大家都有共同的思想基础：解放东北后，一鼓作气解放全中国。关里来的同志，这个愿望更加迫切，纵队上下情绪都很高。部队在执行新的进军任务中出现的问题，通过政治思想工作是可以解决的。在东北作战时，我们提出的口号是“保家保田”，现在东北解放了，一些东北籍战士便认为自己的任务完成了。一些农民出身的战士，地域观念很深，把关内关外看成两个世界，认为关里贫穷落后，而关外出门有火车，城市里烟囱林立，高楼大厦栉比鳞次，故留恋关外，不愿入关。针对这些具体问题，我们很快制定出动员方案，首先向大家讲清天下穷人是一家，没有华北和全国的解放，就不能巩固东北的解放；同时，对症下药。在这个“关”字上作文章，使大家打开眼界，从阶级、民族解放的高度，看入关的重大意义。

11月5日，纵队发出了《东北全部解放后，部队向华

北进军作战，纵队首长告全纵队指战员书》，里面这样写道：“现在沿途老百姓对我们慰劳，粮食不用自己背，早准备好粮柴，没什么困难”，“老

百姓对我们希望很大，看到我们进军，他们非常高兴。我们应该严格群众纪律，宣传胜利。”并在书面上进一步作了动员：什么是“关”呢？门里扭上铁丝就是“關”（关的繁体字）。过去穷人是不好过关的，有各种关，我们要打进关去，扔掉保守思想和旧的观念，把老百姓面前的关卡都打烂它！这样宣传，内容很实际，不空洞，有很大的动员力量，使战士懂得了“保家保田”与进关作战的关系。大家说：“我们要趁热打铁，打下北平再休整”。有的东北籍战士说：“关里老同志能出关帮助我们解放东北，我们为什么不能进关解放全中国！”我们还决定在途中休息一天，根据宿营地区的情况，尽可能召开大一点的会来进行动员。有的营和团是结合庆功、授奖大会进行的。当时，还根据部队不断行军作战的特点，创造了“飞行会议”的形式，在行军途中，政治工作骨干与连队干部一起边走边开会研究部队的思想情况，研究如何执行上级指示和分配下来的任务，统一认识，提出办法，然后由指导员出面布置，各班组回去传达落实。全纵队采取边行军、边动员的方法，让每一个战士明白先遣入关作战的意义和重要性，同时还加强了互助工作、收容工作和改善行军的伙食等。这样，逃跑的现象很快杜绝了。虹螺蚬一带是丘陵地，到山前店以后，越走山越大。经过动员后的部队，士气更加高涨，目标更加明确。每人的负荷虽然很重，但是很少有掉队的。行军队伍中凡是“双枪将”或背两个背包的，准是党员或干部。在热河一带，途经日本侵略者制造的无人区，虽然有些老百姓已陆续回来了，仍是几十里难见一处人烟。这里山沟中散住的群众生活异常艰难，有的一家人只有一条裤子；时值冬季，没有棉被，只好把高粱壳子在炕上铺约一两尺厚，晚上烧热了炕，全家人钻进高粱壳子堆里睡觉。在诉苦运动中倒过苦水挖过苦根的战士们，见到这些正在遭受苦难的同胞，更加激发了打进关去、解放全中国受苦人的战斗意志。那时候部队的宣传队和民运工作队都有女同志。她们在行军作战中遇到了更大的困难，却没有一个示弱的。10师供给部政委吴朝祥同志，是一位女红军，她在战斗和行军中，后勤工作做得很出色。宣传队不论男女的，每天都是出发在前，宿营在后。沿途写标语、设立鼓动棚、说快板、喊口号鼓舞士气。最后，他们还要当收容队，帮助那些因病落在后面的同志。民运队的同志每到一处，都要访贫问苦，发动群众，了解社会情况，检查群众纪律。这一带的妇女，很多患了大脖子病，民运队的同志便联系卫生队帮她们治病，并从部队的给养中抽调粮食和衣物，救济穷苦的老百姓。接近长城了，雄伟挺拔的长城使大家为之振奋。在阳光的照耀下，它像一条金色的巨龙，在崇山峻岭之间透迤绵延，或翘首于峰巅之上，或俯身于山谷之中，跌宕起伏，望不见尽头。它是我国劳动人民的心血和智慧的结晶，是伟大祖国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它俯视着这即将解放的中华国土，仿佛欢喜得要腾空而起！面对气势磅礴的万里长城，指战员们一个个激情满怀，信心百倍。回想3年多以前从延安奔向关外，还有那些从胶东渡海到东北的战士们，每人只有几发子弹，为了使敌人摸不清我们的底细，大家使用高粱秸把子弹袋塞得满满的。曾几何时，我们回来了，又进关了！身上不仅装满了子弹，而且还有汽车、大炮……历史的辩证法就是这样。年轻的战士们，在熟悉民间传说的指导员的影响下，早就在行军路上对这座古老的长城展开了想象的翅膀：它该有多么高大啊！那么高的城墙，孟姜女是如何把它哭倒的呢？这个美丽而凄凉的传说，多么强烈地表达了苦难的人民对残暴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愤恨。然而，伟大的长城是属于人民的。我们热爱它，热爱那即将被解

放的历史名城。我们是怀着这种爱去战斗，并准备为它献出自己的生命。我们从冷口进关时已经黄昏了，再前进十几公里，就是建昌营。这一带是冀东老解放区。老区人民热烈欢迎进关部队，他们组织了秧歌队，晚上点燃了花灯和火把，辉煌的灯火照耀得如同白昼一般。远远地，我们就望见站在道路两旁的群众，举着各种形式的灯笼：菱形的，五角形的，六角形的，长方形的，还有腰鼓形的。有的点燃了松明，燃起了火把，就像一条火龙，在春雷般的锣鼓声中滚动着。路旁摆着桌子，除了茶水，还有花生、红枣、柿子、熟鸡蛋等，各种各样的慰问品全都堆放在一起。小孩们端着茶水碗，老大娘们忙着向战士们口袋里塞吃的。借着火光向前望去，影影绰绰，这儿一堆，那儿一片，走近一看，原来是修路的人群，男的女的都有。我向地方党组织的同志一打听，原来他们听说东北大军进关都摩托化了，公路要修6米宽，能并排跑大卡车，好拉大炮。我们便对地方干部说，我们虽然有些大炮，但不需要修这么宽的公路。他们说，那就少修两尺吧。这是我们进关遇到的第一个拥军高潮，大家心里热乎乎的，受到了极大的鼓舞。我们胜利的基础就在这里啊！11月8日，纵队从建昌营到达北平以东的石门、马伸桥、赵各庄一带隐蔽集结待命。我们便利用这机会，开展群众工作，宣传辽沈战役的胜利，并帮助群众劳动。老区人民的精神面貌就是不一样，他们对待子弟兵真像一家人那样亲热，修桥铺路，送粮草，腾热炕，问寒问暖。他们围观着我们缴获来的美式十轮大卡车和大口径火炮，孩子们和年轻人爬上炮车，骑在炮管上。有的战士便笑着说。“没见过吧，这都是蒋介石送来的美国货。”一个十五六岁的姑娘大大方方地回答：“我们不是没见过这世面，主要是想看你们的胜利，看你们的成绩！”说得大家都笑起来。集结待命期间，部队经过短期休整，纵队召开了一系列团以上干部会议，研究布置了军政工作。军事训练方面，根据傅作义部队骑兵多、汽车多的情况和他们的“快速袭击”、“一点围歼”的战术特点，我们在战备训练中专门增加了打骑兵的训练。我们还调查了傅作义部队的装备和编制，造出他们团以上主官花名册，以便抓住俘虏时点名对照。政治方面，深入进行战前动员，提出“到华北打响第一炮”、“解放华北立大功”等口号。因为又补充了3000多名冀东战士，便结合进关作战和战备训练的动员，在全纵队普遍开展诉苦教育。有的连队邀请冀东群众一起诉苦，使战士们得到更多关内群众受国民党迫害的感性认识，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在这期间，按照中央军委11月17日关于实行统一编制番号命令，我们第4纵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1军”，领导人不变。纵队原属的步兵第10师、11师、12师，分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21师、122师、123师”的新番号。原辽南独立2师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154师”的新番号，调归我41军建制。全军共6万多人，各种火炮270门。11月23日，我们在驻地马伸桥召开军第四届士兵代表大会，响应毛主席关于“军队向前进”的号召，动员部队迎接新任务。会上，马伸桥的群众代表给我军赠送了“亲如手足”、“造福人民”两面大旗。在马伸桥时，我与吴克华等几位军部领导前往马兰峪参观清代东陵。那里埋葬着清朝的几代皇帝，规模宏大，不知凝聚了多少劳动人民的智慧和血汗。冀东党政干部和群众，纷纷向我们控诉国民党军阀盗窃清陵墓葬的情况，讲了墓内“翡翠西瓜”和其它珍贵文物被盗的事情，情绪非常激动。我想，像清陵这样的古迹，既是满清王朝奴役人民的铁证，又是劳动人民血汗和智慧的结晶，我们一定要把它完整的保留下来。联想到即将解放的古都北平，必须教育部队认

真执行城市政策、纪律，注意保护名胜古迹。由于我先遣兵团提前入关，对华北部队在平绥线上的作战行动，也起到了及时配合作用。

腰斩“长蛇”

进关后，急盼的第一个作战行动终于来到了。12月3日夜，东北第2（先遣）兵团命令我军，为配合华北兄弟部队的作战行动，由蓟县地区出发，尾随48军（原11纵队）渡过白马河，因48军攻打密云，5日，我军改为先行，日夜兼程，向平绥线疾进，于7日到达四海地区。

绥远（1954年撤销该省，并入内蒙古自治区）是傅部

常驻之地，张家口是他们西逃的必经要道。所以当我华北3兵团扫清张家口外围时，傅作义慌忙命令其主力35军（欠262师）、104军（欠258师），于11月28日、29日两天先后由丰台、长辛店、昌平等地增援张家口，104军原守怀来之258师于12月1日北援宣化。至此，傅作义赖以起家的主力部队，除35军的262师留在北平外，其余都分布在平绥线上，成一长蛇阵。

这是党中央、毛主席在平津战役的开始阶段，以我军

的部署和行动，调动敌军就范的一大杰作。当时，东北野战军的主力正在进关途中。我们一方面要把敌人抑留在华北，一方面又要使傅作义在北平、天津、张家口、塘沽摆开的一字长蛇阵，不能连成一气，首尾不能相顾，以利战局的发展。中央军委采取“围而不打”、“先西后东”的部署，即令华北部队先打张家口外围，目的是抓住张家口的敌人，使其不能西走，并借此吸引北平之敌增援，将北平傅部主力向西拉开；同时，抓住蒋系部队于平津地区，攻歼芦台、塘沽守敌，控制海口于我手中，迫使傅作义难下撤退或坚守的决心。我则采取分割平、津、张、塘一带守敌，给予各个击破的方针。这就是平津战役的指导思想，而傅作义也不自觉地顺着这条线上钩。傅作义正在调兵遣将之际，发觉我大军向北平、张家口两侧集结，平、张全线告急。敌35军两个师害怕被我围困，在12月6日奉命乘汽车300余辆，在飞机掩护下，向北平回窜。途中，被我进至琢鹿地区之华北2兵团围困在新保安。前往接应之敌104军，也被堵击于怀来、新保安之间。战役的序幕刚刚拉开，傅作义的方寸就已经乱了。他除命令104军的5个团继续从怀来沿公路向西攻击外，并令南口的16军赶紧向西接应35军，企图拚全力把该军拉出去。我军的作战任务，就是要迅速切断敌人西窜的道路，不让敌人在南口的16军与被我围困在新保安的35军靠拢，腰斩傅作义的长蛇阵。这一仗关系重大，如让傅作义的104军及16军主力接应35军的行动得逞，就会形成对我华北2兵团的东西夹击的形势。问题的严重性不仅如此，敌人若解开新保安之围，就会影响我军对张家口的包围，平绥线上的敌人也不能被分割包围，平绥路亦不能被切断，给傅作义留下西窜之路，将会影响整个平津战役的进程。因此，我军能否及时赶到平绥线，拦腰切断接应傅部35军之敌，是至关重要的。在向平绥线进军途中，我们曾收到军委、毛主席亲自签发的电令，要我军加快前进速度。部队轻装走小路，抄捷径，穿过无人区，翻越内长城，在崎岖的石路上行走，星夜插向延庆地区，直指平绥线上的康庄和怀来。这一带是过去的古战场，荒野茫茫，风沙荡荡，战士们顶着长城内外的风沙，抢渡即将封冻的河水，朝平绥线急奔。遵照中央军委电令，为迅速抓住傅作义主力，我41军必须于12月8日切断康庄、怀来与南口敌军的联系，并包围康庄守敌。途中，军长吴克华和我、副政委欧阳文、参谋长李福泽等同志，研究了作战部署。8日夜，部队按时到达指定位置。9日拂晓，我军3个师突然出现在平绥线上的怀来、康庄、八达岭一带，投入战斗。担任

切断康庄与怀来敌人联系的我军 122 师先头部队，在康庄西面的小王庄与敌 16 军一部遭遇。康庄在延庆南面，我们部队过延庆后，背着寒冷的西北风，向南挺进。敌人则从东向西行进，迎着扑面的风沙，一个个把帽耳扎得死死的。那时正是隆冬时节，天还没有亮。远远地，我 365 团参谋长刘云庭同志跟着的尖兵班，发现前面有灯光，并且听到炮车声。部队进至小王庄村西头的铁路、公路交叉之处，刘云庭即令 6 连抢先占领了小王庄。敌先头部队约有一个连的兵力，在公路北侧行进。战斗打响后，我们抓住俘虏，带到村里审问，俘虏在灯光下看到我们的服装跟华北解放军穿的不一样，便傻了眼。我们没费多少口舌就把敌情基本摸清楚了。原来敌 16 军 22 师 64 团，已有两个营进至怀来，与我遭遇了。刘云庭同志马上让通信参谋报告团指挥所，把 2 营调到公路以南，1 营在公路以北，3 营为预备队。一场遭遇战变成了伏击战。成 4 路纵队急行而来的敌人塞满了公路。我用猛烈的火力袭击，只 20 分钟便解决了战斗，俘敌 500 余人。122 师当即将情况报告我们。敌情有了变化，军里领导最担心的情况出现了。我们的心情都有些不安，生怕抓不住敌人。正在这时，担任包围康庄的 121 师也来了电话，得知敌 16 军的大部分队伍都还没有过去，被该师包围在康庄了。心头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我不觉笑出声来：“不要紧了，敌人跑不掉了”。紧接着，担任切断敌人康庄与八达岭之联系的 123 师也打来电话说，他们占领阵地后，击退东来铁甲列车一辆，并保证不让敌人西进一步。我们总算把这条长蛇阵的身子给掐住了，只待挥刀把它斩断。这真是兵贵神速，如果不是拚命疾进，按时到达指定位置，敌 16 军主力就可能开进怀来，那就麻烦了。被围在康庄的敌 16 军指挥所，109 师、94 师一个团、22 师 66 团的两个营，由于西行受阻，已成瓮中之鳖，更加无心恋战，他们害怕被我歼灭，便想溜之大吉。10 日凌晨，他们想趁我军连续行军、作战十分疲劳的机会，寻找我军包围空隙，冒险向南突围东窜，企图经南口逃向平郊。9 日午夜，我 362 团即发现被围在康庄的敌人有突围逃窜的企图，但团、师电话不通，待师里获悉这个情况时，敌人已全部向南口方向逃窜。情况紧急，我 362 团政委刘玲同志没等到师部命令，当即带领第 3 营迅速沿公路跟踪追击。刘玲身边只有七八个参谋干事，他们在公路上追到一股敌人，大家便扯着嗓门对敌人喊起话来：“你们被包围了，赶快缴枪！”晕头转向的敌人，一个个都把枪扔到地上，放成一堆一堆。后来他们一看我们没有几个人，有的敌人就操起武器抵抗，我们的一位参谋负了伤。这时我 3 营 7 连和 8 连跟上来了，很快把企图逃窜的敌人消灭了。当时，敌人在康庄设置了严密、坚固的防御工事，深沟壁垒，鹿碧刺网。如果负隅顽抗，还会残喘一阵。但他们却弃阵逃跑了。当我 362 团追击的先头部队于外泡村追上逃敌后尾时，恰全部敌人被我 123 师堵击在泡儿山、杨岭一带。敌逃不得，又想回窜康庄。这时，我各路部队猛插敌群，两侧包抄，前后夹击，除敌 16 军军长带一部分队伍，趁黑夜和混战之机逃脱外，敌 6600 多名被我歼灭。在康庄战斗中，我们缴获了傅作义关于我 4 纵队进关的通报。电称守备塔山的共军已进关内，各部密切注意动向，不可掉以轻心。我正拿着它向各师传达这个情况时，怀来方向又传来炮声。吴克华同志用电话询问 122 师前沿部队，365 团参谋长刘云庭报告说，三家子火车站起火了，敌人的大部队从怀来涌出来，正在渡河，向十八家子逃跑。情况变得复杂起来。怀来方向敌 104 军，从 12 月 2 日至 8 日，即向西轮番攻击，遭我 159 师及詹大南部两个独立团于土木一带坚决阻击，未能得逞；该敌又于 9 日由怀来沿

铁路西进，企图接应被我包围于新保安之 35 军突围，合力东撤，但被我华北 2 兵团阻于沙城以东，不能前进。同日早晨，我们突然将怀来至八达岭一线分割成数段；康庄守敌突围被歼，该敌（104 军军部、27 师、31 师及 16 军 22 师 64 团主力、66 团一部）即于 10 日上午仓皇回窜怀来，并于中午弃城逃走。他们是被华北兄弟部队从新保安方向打回来的，沿铁路东撤的道路又被我们军堵住了，铁路以北也是我重兵所在。怀来的敌人只剩下城南的一条路可逃，那里有一条年久失修的公路可通北平，道路地形也比较隐蔽，而我们的兵力又比较薄弱，只有一个骑兵旅部署在那个方向。本来，我军的任务是切断平绥线，阻击敌人西窜。但现在情况变了，难道能眼睁睁地让敌人跑掉吗？军长吴克华同志迅速地把敌情及我情作进一步的分析：康庄敌人被歼后，怀来之敌又决意逃跑，在这种情况下，南口、昌平地区的敌人用大兵力西犯的可能性不大；我 123 师在八达岭方向，阻击敌人，已击退敌铁甲列车一辆，他们只要再坚持一天多，48 军就可以赶来支援；而怀来城南只靠我兄弟部队一个骑兵旅的力量，绝对抓不住万人之众的逃敌；如果我们只抽一部分兵力配合，也难于完成任务。吴克华同志果断地决定用两个师去追击企图逃窜的敌人。我完全同意他的分析和意见。太阳偏西了，逃敌突破了我骑兵旅部队的阵地。我们一面把情况向上级报告，一面指挥部队立即行动。122 师由十八家子向南跟踪追击逃敌；121 师抄近道经大山口，从左侧取小道直奔长城边上的横岭，拦头堵住敌人回窜北平的去路。正在此时，48 军经居庸关逼近南口，将那里的敌人歼灭并占领了南口，我军指挥部即率领 123 师也从康庄沿大山口平行追击而来。怀来追歼战是紧接着康庄追歼战胜利后开始的，充分体现了我军连续作战的战斗作风。121 师连战场都来不及打扫，便投入了新的战斗。有的团队做了 3 次饭，都来不及吃又背着锅紧急转移。122 师来不及集合队伍，刚从阵地跳出来就向前追击，其先头部队 365 团刘云庭参谋长率领的 3 营，更是扔下背包就往前追，边跑边整理队伍。他们像一支离弦箭，直射长城的横岭。敌 104 军军长安春山率领该部及 16 军一部乘汽车沿公路飞快逃走，开始还有飞机掩护。我们部队靠两条腿去追，虽然以每小时 7 至 9 公里的速度猛跑，到太阳落山时，也没有追上敌人。入夜，天上没有星星，我们只凭敌人沿途扔下的罐头盒、香烟盒、汽油桶当“路标”，跟踪追击。刘云庭参谋长带着 3 营跑在前头，他手里掌握的有 6 个半排和团的 82 炮连。他们追击到庙官岭、内长城以北一带，便和逃敌打响了。敌人在那里以一个营兵力掩护其主力逃窜。我们的战士瞅着满天乱飞的曳光弹，心里可高兴了，总算把敌人的尾巴抓住了。我 3 营与敌激战一个小时，攻占敌一个阵地后，365 团团团长、政委率领团主力赶到了。政委尼少久带领 1 营又迫到最前面去了。3 连在敌侧射火力下，从公路插过去，成了全团追歼中的尖兵连。远看追击的前方，有一排大山的黑影，齿形的山峰，衬托着淡墨似的天幕。天幕下蜿蜒着古老的长城，那些垛口、地堡，遮挡着阴暗的天空，使山峰显得更加陡峭、险峻。121 师先头部队于当日午夜即进至横岭一带。363 团 2 营尾随 361 团 3 营前进。当他们进到横岭山地时，发现 361 团 3 营方向已经打响，并传来敌人汽车的马达声。363 团 2 营迅速占领与控制了两侧的可利警戒阵地，完全切断了敌人的去路。这时，365 团尖兵 3 连，也逼近敌人的主力。他们由大道的左侧冲向敌人和车马最拥挤的地方，像尖刀似地插进去，抢占就近的高地，轻重武器迅速开火，把一股企图向山上逃窜的敌人用火力压制在沟底。敌指挥首脑机关——104 军军部与军直属队，被

我们打得乱成一团，其他部分的敌人乱得更像一盆浆糊了。在我军追击和堵击部队的攻击下，敌人溃不成军，散兵遍野。我各部队搜山抓俘虏，于 11 日上午基本解决战斗。在这次追歼战中，蒋家王朝分崩离析，兵败如山倒的迹象已呈现出来了，我军一插进敌群，就发现前后都是黑压压的一片散兵。挤得转不过身来。敌人惊慌失措的面孔，像流水一样，从车子旁边挤过去，吉普车已失去它的越野能力，如同蚂蚁群里的屎壳郎一样动弹不了。我们的追击部队则像是一双巨足，在蚂蚁似的敌群中踩了一脚。几百辆美国汽车，驮着山炮的骡子和乘马逃窜的骑兵，争先恐后地冲进乱成一锅粥的步兵队伍里。有些步兵爬上了汽车，车上的人用枪托或刀柄把他们打下来。马匹把步兵撞倒，铁蹄踏过人群，美国造的汽车就在敌人的尸体上开了过去。在追击战中，部队发起攻击后，敌人漫山遍野，夺路而逃；战士们奋勇争先，紧追不舍。敌人乱，我们也乱。敌人是逃跑中的乱，慌不择路，像没头苍蝇，到处乱窜。我们是主动进攻，独立作战，实则杂而不乱。我们军指挥所的几位领导同志，原来是乘车的，现只好改为骑马前进。我们带着电台和参谋人员，还有一个警卫排，约五六十人，于 11 日上午进至内长城边。只见公路沿线到处都是翻倒的车辆，我们踩着遍地冻硬了的敌人尸体往前走。这时，部队正展开抓俘虏竞赛。我和吴克华军长等牵着马，攀援而上。翻过长城，刚下山，一检查队伍，发现携带电台和手摇摩托架（发电用）的人员和一个警卫班没有跟上来。由于前面部队已经走远了，我们不能停下来等他们。忽然，发现不远处有一股敌人堵在路上，还架着机枪。我们这支小部队，很沉着地从敌人面前走过去。我还故意地问道“是哪部分的？”他们回答：“报告长官，是军部的。”当离开他们十几米远时，我小声对身边的伍参谋说，“决去缴他们的枪！”他掏出手枪回过头，毫不费事地就缴了敌人的枪。这充分说明已成惊弓之鸟的敌人，一心想的只是如何保住自己的性命，没有一点战斗力，手里的枪成了“吹火筒”。就这样，我们在尚未打扫的战场上一天竟抓了 300 多个俘虏。开始，我们让俘虏把枪栓卸下，交给我们；后来，连枪栓也拿不动了，干脆叫俘虏把枪扔在地下，空手跟我们走。前面碰到押送俘虏的连队，便把俘虏交给他们。军部于 11 月 7 日到达横岭。军首长抓俘虏一时传为佳话。11 日 8 时，整个怀来追歼战胜利结束，守敌除 104 军军长安春山率一部分逃向东北方向的白羊城、马刨泉地区被我友邻 48 军歼灭外，其余全部被我军歼灭，共歼敌 8115 名，缴获汽车 189 辆、山野炮 3 门和其它大批战利品。康庄、怀来进攻战，是平津战役的第一仗，战斗激烈程度不亚于塔山防御作战。我军旗开得胜，不到 3 天，我们在康庄、怀来，把傅作义布下的长蛇阵连砍两刀，平绥路被我们拦腰斩断了。这样一来，北平的蒋军再不能西去，那些被包围在张家口和新保安的敌人，就更不能东逃了。我们打响了进关第一炮，受到了兵团首长的嘉奖。我们的战士，有的好几顿没吃上饭了，战斗结束后，部队埋锅做饭，可到处没有水，好不容易找到一眼井，把拴着一拐子电线的桶放下去，但提上来的只是一点泥汤，根本没法做饭。附近的群众，看到解放军这样艰苦，有的把家里酸菜缸里的酸菜水舀出来，有的把冻柿子也拿出来送给部队。我们部队用俘获来快要死去的马的血和面，但马血和面揉不成团，做不成块，大家只好将就用它塞饱肚子。那些俘虏兵每人也分到一份。12 月 12 日和 12 月 14 日，东北 13 兵团和华北 2 兵团首长分别致电我军，赞扬我军“不怕困难，不怕疲劳，英勇机动积极地向敌进击的精神”，“迅速歼灭傅匪之 16 军军部及暂 3 军（即 104 军）军部及其两个师的伟大胜利，为

围歼 35 军及消灭整个傅军主力，造成更加有利条件”。

张家口追歼战

按照毛主席关于平津战役作战方针，采取“隔而不围”、“围而不打”的办法，把傅作义摆下的一条长蛇阵斩成数段，切断了平绥线。至此，平津战役的整个部署业已完成。现在，我军在华北战场按照“先打两头，后取中间”、“先吃小点，后吃大点”的方针，来解决华北的敌人了。

康庄、怀来战斗胜利结束后，我军奉命占领南口、八达岭一线的阵地，阻击北平的敌人西窜，并威胁北平。我军立即向南口方向开进。14日各师先后到达南口指定位置。军部驻居庸关。12月17日中午，我和吴克华等同志正在南口看地形，收到东北野战军总部转来军委急电，命令我军暂归华北3兵团（杨成武兵团）指挥，立即出发，配合华北主力歼灭张家口的敌人。平津战役的第二阶段开始了。张家口，又称张垣。群山环抱，地势险要，是蒙汉交通要道，察哈尔省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傅作义嫡系部队的大本营。由于我军在800公里的战线上展开了空前规模的出击，将东起塘沽西至张家口全线的敌军，分割包围于北平、天津、张家口、塘沽、新保安5个孤立据点，并且歼灭了敌人5个整师及两个师的大部，使傅作义这个长蛇阵宣告瓦解；而傅部嫡系除被歼者外，其主力被围于张家口、新保安两个孤立据点上，傅作义本人则被困于北平，与其嫡系部队完全失去联系。我们围歼阶段先从傅部主力开刀，即使傅作义想南逃也没有力量。这样，利用蒋傅矛盾再加上强大的军事打击，就有可能为保护北平这座古老的文化古城，创造一条和平解放的途径。党中央、毛主席这个决定确是一着高棋。现在，首先要使傅作义西逃的梦想完全破灭。军党委进行了政治动员和安排行军序列后，部队在“解放张家口，不让傅作义军队跑到绥远去”的口号鼓舞下，迎着西北的风沙，急速向西开进。长城线上的冬天，气候格外干燥，口外刮来的风沙，遮天蔽日，使人双目难睁；天空中铅云密布，除了长城烟尘外，我们还看到“大如席”的燕山雪花。我们穿行在长城古道上，从内长城奔向塞外的战略重镇——张家口。路过新保安时，遇见了华北第2兵团政治委员罗瑞卿同志。我俩自延安分别后，几年不见，今日在华北战场相逢，分外高兴。华北部队与我军中的许多营团干部在延安都是老相识，战友重逢，大家心情都很激动。在新保安附近宿营时，华北2兵团的首长把领导机关住的房子腾出来让给我们，还请我们干部吃饭。我们在东北缴获了不少武器和物资，在装备上比华北部队要好些。现华北第2兵团即将对新保安发起总攻。新保安过去是古驿道上的重要驿站，构筑有高大的城墙。2兵团缺少攻城的大炮，罗瑞卿便向我们提出，想借用我们的炮兵团。我们预计新保安攻击在前，我军抵张家口外围后，还有一些准备时间，同时考虑战斗中，兄弟部队之间互相支援，互相配合，炮兵团可先借给他们。经双方请示东北野战军总部和军委，得到批准后，便把炮兵团留了下来。后在攻打新保安战斗中发挥了很大威力。新保安到张家口尚有一天行程。12月21日，天还没有亮，我们就到达宣化。吃早饭时，华北3兵团司令员杨成武同志到我们部队来看望。这一路上，华北兄弟部队沿途欢迎我们，像老百姓迎亲一样敲锣打鼓，特别是那些喜庆的唢呐声，高亢嘹亮。杨成武司令员对我说，他们已经包围了张家口，要我们先休息，看情况再接防。杨司令员还热情招待我们军师干部吃饭，用浓郁的宣化葡萄酒欢迎我们。当时，吴克华同志与我商量，认为上级把我们配属给华北3兵团，是为了更加严密地包围张家口，

不让敌人有一点空隙可钻，因此，我们应主动到前面去。于是，我们给东北野战军总部发了一份电报，表示感谢杨成武司令员对我军的关怀，提出为防止敌人逃跑，我部应继续前进。当天上午命令就来了，同意我们的意见。电报是发给3兵团并转我们的。下午，我们便到达张垣外围接防，并把带来的俘虏交给3兵团补充部队。我军主要接替华北3兵团1纵队主力在张家口东南的阵地，以加强对张家口的包围及攻击力量。12月21日，我121师、123师进至张家口以南的宁远堡、榆林堡地区。部队进入阵地后，马上进行进攻准备工作，并防止敌人逃窜和增援新保安。122师将南口的防务交给48军后，于22日进至花园附近地区，继续向张家口急进。这时，被困在新保安的敌35军两个师，已被我华北2兵团歼灭。张垣的孙兰峰兵团更加孤立，获援的希望已绝，于是企图突围向绥远方向逃命。23日上午，我和吴克华同志正带领师、团长到山上的阵地看地形，突然，遭到张家口孙兰峰部队炮兵的袭击。接着，敌一股兵力进行试探，被我们的炮火打了回去。根据康庄、怀来战斗由围歼战转变为野战运动中追歼作战的经验，我们要求部队在准备进攻的同时，充分作好随时追击的准备。看来，敌人准备逃跑。我们看地形的位置在367团与369团的结合部。为了摸清敌人的动向，吴克华司令员命令367团的一个营，派小分队沿公路搜索前进，发现外围的敌人已经缩回市区。中午，留在军指挥所的副政委欧阳文和参谋长李福泽同志，接到华北3兵团杨成武司令员的电话“张家口之敌全部向北突围，先头8个团已进至西甸子与我6纵在激战中，令你军驻宁远堡一线部队，沿十三里茶房、七里茶房，向张家口攻击前进”。当时，我和吴克华同志正在离军指挥所10多公里的山上看地形。欧阳文和李福泽接到电令后，在速派人向我们报告的同时，即命令各师迅速由南向朝天洼方向突击，与各兄弟部队对逃敌形成南北夹击的态势。我和吴克华同志赶到指挥所后，又给部队下达了补充指示：敌人跑到哪里，部队就追到哪里！下午2时，华北3兵团又来命令：“因尚未完全判明敌是否突围，各部仍然待命攻击”。此时，我362团、367团已经占领了1130高地东西一线阵地，发现张家口市内的敌人，已经向北逃窜，即向军部报告，我们便立即命令各师按原计划追击敌人。至4时30分，我军进占了张家口市。随后，121师、123师继续沿铁路两侧，直奔张家口北面；122师从右侧迂回过去，向乌拉哈达方向截击逃敌。等部队挤出张家口城北的大境门以后，天早已黑了。又是一场秋风扫落叶的战斗！大境门是市内敌人逃跑的一个口子，也是我们进入张家口市内后向北追击的一条主要通道。千军万马都要从这里挤过去，车马人流，汹涌而来。加上敌人逃跑时，故意把带不动的辎重、驮马、骆驼等，堵在通往大境门的道路上，等于给大境门安上了一扇“闸门”，我们追击的部队，争先恐后，夺路向前。力气大的，见一点缝隙就朝外挤；灵巧的，攀上炮车顶，登上骆驼背，在上面绕行，追出城外。溃退的敌人像决了堤的河水一样朝前涌，我追击部队像浪涛一般追赶。这时，满天纷纷扬扬的雪花又飞舞起来。真是“忽于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这一场好追！好赶！好杀！指战员们被汗水浸透的棉衣已冻成“铠甲”，趟过冰河的裤腿挂上了冰凌，一个个白眉毛，白帽耳，简直成了雪人！敌人发现我跟踪追击，就以大约一个师的兵力，企图在东窑子东西高地一线抗击。我追击部队当即发起冲击，占领该地后，又尾随敌人追至西甸子。敌人分两路向北逃窜，一路向陶赖庙，一路向二道井子。这个地区是一条宽1公里、长10公里的大山沟，大山沟里还有不少小山沟。从二道井子出去，就是公路，

那里有我华北兄弟部队重兵把守。陶赖庙方向却是山路，只有一个狭小的山口通向张北大草原。孙兰峰部有5万多人，如果同时涌向那里，不知要多少时间才能挤出去。所以，只要我军紧追不舍，敌人是难以逃脱的。黄昏，我们军部几位负责同志匆忙扒了几口饭，便连夜乘车进入张家口市。军指挥所暂住在一座银行的房子里，马上架设电台与部队沟通联络。在市区街道上，到处是敌人丢弃的军用物资，有的车辆轧在手榴弹上，常常引起一阵阵爆炸声。一些散兵游勇在街头巷尾，东一处、西一处地燃起许多火堆取暖。他们在等待着陆续进入市区内的我军有关人员进行收容。当夜，寒风凛冽，大雪纷飞。部队不顾疲劳饥饿，继续追击敌人。368团5连指导员戚殿文，率领全连同志，急行军30多公里，6次趟过没膝的冰河，没有一个人掉队或失去联络，始终跑在最前面担任堵击任务。午夜，他们到达陶赖庙西南一线高地，当发现该地西山沟内敌人两个师的兵力开始突围时，368团就派3排再次趟过冰河直插敌群，占领了陶赖庙南小山，将敌人两个师的兵力堵住。敌人先头突围出去的数百人，也被我6连配合兄弟部队迅速出击歼灭。陶赖庙西南小山是陶赖庙西沟及西南大山的咽喉。敌人两个师在山谷中无路可走，要想突围出去，南山是必争之地，敌人组织了两个营以上兵力反复冲击10多次，但均被我3排打垮，没有一个人钻得出去。3排守的小山虽是要点，地形却对我很不利。因南面大山早已被敌人控制，他们居高临下，易于发扬火力并钳制我方的行动。小山上只能容纳下一个班的兵力，还不便于观察情况。3排长刘瑞芝同志对战士说：“别看这个小山不起眼，能否守住它是能不能歼灭突围敌人的一个重要条件。如果发现敌人向我投弹就迅速卧倒，紧贴地皮！”敌人发起进攻了，指导员戚殿文喊道：“同志们！我们要保持尖刀连的光荣称号，创造模范排”。他亲自带领一个战斗小组向敌人反击，敌人被打垮了，指导员不幸在反击战中光荣牺牲。当敌人进行第3次冲击后，3排的手榴弹和机枪子弹已经打光。他们除了从战场搜集敌人遗弃的弹药外，还派人到6连搬来一部分弹药。3排长鼓励大家说：“守住这个小山，绝不能让张家口的逃敌窜到草原、沙漠上去！”3排长为了减少伤亡，每当敌人冲击时，只留一个人在小山的制高点掌握观察情况，把排的主力分散隐蔽于山的两侧。敌人冲到面前时，个个轮番到山顶投手榴弹，然后步枪、机枪一起开火。就这样，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冲击，一直坚持到我大部队的到来。我军在城东北朝天洼会师的有5个团，他们根据上级的意图，自动在一起研究分路追击敌人，并与华北主力取得了联系，继续追击前进。在追击途中，有一个小插曲：我361团团团长鞠文仪同志派一个通信员沿公路给部队送信。有一股敌人从公路岔口过来，通信员被裹进敌人队伍里去了，由于天黑，开始敌人没有发现。一路上敌人挤挤撞撞，夺路逃跑，他也免不了与敌人擦身摩肩。忽然有人发现他的帽子跟自己不一样，便大声惊叫起来：“东北兵！”通信员十分沉着，随机应变地答道：“乱嚷嚷什么！我的帽子都跑丢了，这顶是在公路上拣的。”敌人信以为真，他们想，既然在公路上拣到了东北解放军的帽子，说明追兵就在跟前，这一下更乱了营。后来，这股敌人被我们追击的大队伍赶进了一条山沟里，这位通信员一个人就抓了150个俘虏。

当我368团5连3排在陶赖庙堵住两个师的逃兵进行鏖战的同时，敌人的另一部被我华北主力阻击在陶赖庙以西二道井子990高地一带。我部即会同华北兄弟部队分别由南北向敌压缩。367团1营副营长鲍仁川，带领3连

向二道井子追击逃敌。这个连的全体指战员，入关后屡次上书营、团，要求交给他们艰巨任务。营、团为培养、锻炼他们，在张家口追击战中，把尖刀连任务交给了他们。团里命令1营与361团并肩突击，3连力求插到兄弟部队前头。他们不顾敌侧射火力，突入村里追击敌人，听到村西北沟里枪声很猛烈，估计敌人已向西北逃窜。营里马上配属他们连重机枪两挺，在鲍副营长率领下向西北方向猛追；并令1、2连沿公路与团主力向北追击。从此3连与团、营失去联系。半夜，3连向北沟追击。当前卫爬上险要的横山，吹号与营部联络时，被敌人发觉，向他们发起进攻。他们立即控制要点，拖住敌人，至24日晨，团主力赶到，终于在二道井子以南抓住约一个师的敌人。拂晓，我368团1营与华北3兵团主力一部追至陶赖庙，扼守在小山口的该团3连5排的英雄们，已坚守阵地7小时，他们正准备粉碎敌105军军长亲自指挥近3个营兵力的第12次集团冲击时，便在大部队的支援下，把堵在山沟里两个师的敌人全部歼灭了。我122师主力于24日晨到达高家营、乌拉哈达一带，一部进至二道沟时，发现高家营南山有一股敌人，当即配合师警卫营向敌发起攻击，于10时许将敌全部歼灭。整个战斗于24日上午10时基本结束。孙兰峰的部队只有少数逃了出去，其余大部被歼灭。一夜之间，张家口5万多敌人就被我军和华北兄弟部队迅速解决了。许多老战士说，参加革命队伍以来，从未遇到这么好打的仗。你的劲还没使出来，敌人那里就完蛋了，真是豆腐兵！我和吴克华军长乘吉普车出大境门，因为到处是俘虏，我们只好在成堆的俘虏群中穿行。俘虏很多，还拿着自己的枪，骑着自己的马。但是，他们已逃不了，也不愿逃了。路上，到处是敌人丢弃的军用物资和面粉等东西，塞满了道路，我们的战士又是好几顿没吃饭了，可是没一人动这些面粉。我们通知军后勤部，给每个连发一袋面粉。战士们端着枪骑在马上，一前一后，把一批批俘虏从北面押回来，送进一些大院落里，有的地方竟拥挤着上万人。俘虏们也是又冻又饿，我后勤人员可忙坏了，一边组织人力解决其吃饭、喂牲口的问题，一边风趣他说：“谁料到一晚上能抓到几万人，就是捉鸭子也捉不了这么多啊！”在城外，我们看到许多战士对缴获的骆驼毫无办法，东北、山东的战士都没见过骆驼，更不了解它的脾性。牵它不走，推它不动，越是扯着绥绳硬拽，它越是跟你对着干，比你的劲还大。后来请当地老乡帮忙，只见老乡牵上头驼，后面便跟上来一大串，走的可整齐呢！在休息的地方，有些战士把附近的死骆驼的蹄砍下来烤着吃。我一问，原来是蒙古族的战士。驼蹄熊掌，是我们中国的名菜，但对这些劳苦功高的战士们来说，他们不是在品尝美味，而是用它来充饥。半个月来，我们配合兄弟部队，打了3个大胜仗，纵横驰骋400多公里，歼敌5万余。25日，东北野战军首长发来贺电：“庆祝你们全歼张家口敌人的伟大胜利，望传令嘉奖有功指战员，并继续争取胜利”。

回师平郊

张家口战斗的硝烟未散，大境门外的部队还在打扫战场，12月24日中午，我军又接到总部的命令：以最快的速度，返回平郊，对北平实施包围。

塞外隆冬，风吼雪飘。当天中午，我军便将俘虏和缴获物资全部交华北3兵团后，立即离开张家口向北平开进。看到刚刚回到人民手中的平绥铁路上，蒸汽机车喘着粗气向北平飞驰。“向着北平，向着天津，胜利进军”的歌声在塞外回荡。途中，红旗猎猎，军号声声，战马嘶鸣。好一派大进军的气势！

29日，我们到达指定地点——北平西北郊的青龙桥、清河、东北旺、海淀一带。军部驻在海淀。

部队一到，立即把颐和园、八大处、香山、玉泉山等

风景区保护起来，禁止随便出入，严格约束部队，贴出布告规定部队不准参观，不准从里面拿任何东西，连一草一木都不准动。那时，我们也无暇观赏这些美丽壮观的风景名胜。只有一次，叶剑英同志在万寿山佛香阁宴请李宗仁的谈判代表黄启汉。因黄是广西人，叶剑英同志特地叫我去作陪。叶剑英同志为我引见黄启汉。我一见，我们不但是同乡，而且是中学时的同学，当时我在19班，他在20班。后来，社会浪潮把我们卷进了不同的阵营，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叶剑英同志带着我们欣赏了颐和园这闻名于世的园林艺术瑰宝。当时，我平津前线司令部，已调动两个兵团4个军的兵力，把北平包围得严严实实。根据兵团的部署，我们军的战斗地段是北平北郊，任务是，尽快肃清西北郊外围敌人的工事、据点，并完成对阜成门至德胜门及城内北半部的侦察工作，作好进攻的准备。随后，我和军里其他领导同志，到阵地前沿了解情况。眼前，就是古都北平，灰色的城墙，耸立的城楼，城楼上隐约可见的青天白日旗，使我想得很多很远。历史上元、明、清三个朝代都在这里定都，成为三朝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后又成为新旧军阀奴役人民的大本营。“慷慨悲壮士，相传燕赵多”。广大人民群众，一次又一次地进行反抗、斗争。今天我们一定要让它回到人民的手中。我们对进攻北平的工作进行了周密的部署。那些天里，军、师、团的侦察分队，接近敌人，并进行化装侦察。为了顺利攻入城内，负责进攻的121师在沙河进行了紧张的攻城演练。战士们抬着云梯，爬上旧城墙，一次又一次地演习。在曾被英法联军严重破坏了的圆明园里，不时传来阵阵喊杀声，这是二梯队在进行市内巷战。在玉泉山下的炮兵阵地上，指战员们对射击目标进行精确计算，他们要炮弹准确地落在敌群里，而不落在文物、古迹上。总之，进攻准备一切就绪，只等中央军委一声令下，我们就可把红旗插上古城头。1949年元旦过后的一天，天气晴朗，树枝上挂满了晶莹的霜雪，在阳光下分外好看。我和吴克华军长来到松柏常青、古刹耸立的八大处。在一所四合院内，见到了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叶剑英、第四野战军政治部主任谭政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同志。叶剑英同志神采奕奕，热情地询问部队情况。随后，又给我们谈平津战役的形势。

党中央决定成立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平津卫戍司令

部。聂荣臻和薄一波同志分别为平津卫戍司令部司令和政委，叶剑英任北平军管会主任，彭真任中共北平市委第一书记。

领导同志告诉我们，战争的进程，比原来预料的还要

快。眼下，平津前线司令部正在和傅作义进行谈判。因此，解放北平可

能出现两种情况：如果敌人不接受我方的条件，我们就打进去；如果他晓大义，接受人民的和平条件，北平就可能和平解放。中央和军委都在积极争取其和平解放，创造一个“天津方式”之外的新方式。

领导同志还告诫我们，和平是手段，解放才是目的。没

有强大的军事压力，对方是不会在和平协议上签字的，部队需要作好进攻的准备，丝毫不能松懈。尤其是领导干部要作好多方面的思想准备，迎接这场特殊的战斗。

说这场战斗特殊，特殊的情况随着就出现了。1月18

日，我军西直门方向前沿部队报告：西直门内开出一辆挂着白旗的汽车，车子一直开到我方阵地前。经过盘问，知道是原国民党北平市市长何思源先生率北平各界代表来和我方谈判，并要求见叶剑英同志。我们立即将情况报告总部。总部当即回电，指示由我们接待。我和副政委欧阳文同志在海淀接待了他们。这个代表团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其中有吕复（中国大学教授）、康同壁（康有为之女）、王乔年、马振源、张宝万、卢其然（女）、冯莲溪（女）、刘鸿瑞、郭树棠等11人。他们推举何思源先生为首席发言人。何是山东菏泽人，早年留学美国、德国、法国。曾任国民党山东省主席，1946年11月调任北平市市长。因追求进步，爱好和平，为蒋介石所忌恨。1948年6月，被蒋介石罢免了其北平市市长职务。但他继续为和平奔走，多次与傅作义促膝谈心，劝傅作义尽早摆脱蒋介石。他于1月17日组成11人的“华北人民和平促进会和谈代表团”，并通电南京国民政府和中共中央要求和平解决北平问题。蒋介石得到通电，大为恼火。指令保密局长毛人凤：“何思源早已背叛党国，留有何用！”毛人凤心领神会，密令北平特务组织在位于王府井北口锡拉胡同的何思源寓所安放了两枚定时炸弹。17日夜，何夫人及长女何鲁丽、长子何理路等被炸伤，次女何鲁美被炸死，何思源先生幸免于难，但左臂也被炸伤。何思源先生是强忍悲痛，臂缠绷带出城谈判的。我党我军对愿意和平的人，向来是以礼相待的。我们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设便宴为他们洗尘，并对他们的行动表示欢迎。当晚，我们和11名代表进行了交谈。在灯光下，他们的脸上显出不同的神色。有的焦躁，有的疑虑，有的神情淡漠，莫测高深。我觉得，不管怎样，这是宣传我党我军政策的一个好机会。在我致欢迎词后，何先生表明了来意，他说：“现在国共双方，城下对峙，枪炮一响，文化古都将顷刻变为灰烬。我们受200万北平市民的委托，希望国共双方以大局为重，对北平这座古城实行和平解决。”

随后，吕复，康同壁也相继发言，表达华北民众要求和平的意愿。

我也向他们表明我党我军的立场，我说：“保护文化古都，大家都要尽心尽责，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当然责无旁贷。党中央、毛主席已经提出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我们当然希望能够和平解决北平，但现在的关键在于傅作义将军的态度。”

何先生说：“傅作义将军为了保护北平这座700年古都的文化古迹，为了保障200万市民的生命财产不受损害，他已经表示和平解决的主张。”

我即插言：“我们认为不是傅作义保护了北平城，倒是北平这座古城保护了傅作义。”

停顿一会儿，何先生接着说：“傅作义将军向来是尊重

民意的。他的部队一向注重军队纪律，不扰民，不害民。”

听到这里，我严肃地问道：“照何先生这样说，傅作义如此爱民，那么，我们解放军要革傅作义的命是革错了。”

何先生一时无言以对，非常尴尬，他们的代表也为这

位团长兼首席发言人捏着一把汗，担心应付不了这种场面，反而会把事情弄僵。这时，一位姓王的先生站起来为何思源先生解围说：“请莫将军不要误会，解放军是为了解放人民的革命军队。傅作义将军的部队根本不能和解放军相比。何先生的意思是说，在国民党各派系军队里面，从纪律方面而言，傅作义将军的部队要比蒋介石嫡系的中央军好多我看了王先生一眼，态度也缓和下来，接着说道：“那么，请诸位告诉傅作义，要看清时局，深明大义，不要把破坏北平文化古城的责任转嫁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傅作义将军不是自认为很能打仗吗？那么，请他把部队拉出北平城来，我们让出一片战场，彼此较量一番。”一个代表提出：“贵军不要逼得太紧了，要给傅作义将军一个考虑时间，给他一条路走。”欧阳文同志当即回答：“摆在傅作义将军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接受我们的条件，把部队拉出城来改编；另一条是顽抗到底，我们被迫攻城，与其一决雌雄，不过，城破之日，老百姓和文物古迹的损伤，这笔帐是要算在傅作义头上的。看来，不是我们给他一条路走的问题，而是他走哪条路的问题。长时间以来，我们围而不打，已给傅作义先生留下了考虑时间，请何先生转告傅作义，我们还可以给他几天时间，等待他的答复。但是，要告诉他，人民不允许他以和谈为名，拖延时间，继续与人民对抗。”代表们又提出一些问题。我们一一作了答复。最后，我问：“诸位对毛主席的八项条件有何意见和看法？”何思源先生当即表示：“毛主席的意见本人赞成，只是傅作义将军对惩办战犯的条款，还有疑虑。因此，战犯问题是否待成立人民政府之后，由法庭考虑为好。”因他们是代表北平各界，而不是代表政府的，所以双方只是交换一些有关解决北平问题的意见，不可能达成任何具体的协议。但代表们要求和平的愿望非常强烈。散会后，还继续找我们的代表交谈。天晚了，我们留他们住了一夜。第二天，我们根据总部的指示，送这些代表回城。我陪同他们看了我们的炮兵阵地，一门门大炮直指蓝天，其中有在塔山阻击战时总部给我们的3门大口径大炮。他们对我们有这样强大的炮兵而感到惊讶。我指着一门门竖起的炮口，对他们说：“如果傅作义将军不肯悔悟，我们可以打，而且有精良武器和高超的战术，既能攻下城市，又能尽量保护古都。请代表们转告傅作义将军和北平各界人民，我们力争和平解决北平问题。”代表们点头称是。康同壁是广东人，她听出我是广西人，就用广东方言对我说：“这些人是各界代表，但大部分都有政治背景。”我很坦率地告诉她：“这在我们的意料之中，不论谁来，我们的政策都是这样的。”临别时，代表们纷纷拿出名片，约我们进城后再见面。他们表示回城后要尽力为和平奔走，争取古都早日解放。平津战役以它紧张的节奏进行着。我们送走各界代表不久，就接到平津前线司令部的指示：北平解放后，由我们41军担负警备北平的任务，成立北平警备司令部，彭真同志在北平南郊的良乡向我们具体交代了警备任务，并确定吴克华为警备司令，我为政治委员，欧阳文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警备司令部成立的布告已印制好，让我们进城就把布告贴出去。我们领受任务后，把印好的布告和印章都带了回来。过了两天，上级又通知我们，警备司令部改由兵团组织，兵团司令员程子华任警备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明治、吴克华同志任副司令，

我任副政委，刘道生同志为政治部主任。部队进城后张贴的就是这第二种布告。由于这种布告都已张贴出去了，而第一次印制的布告因变更作废没有使用反倒保留下来了。现在北京档案馆保存的一张北平警备司令部成立的布告，就是第一次印制的布告。警备北平的任务非同一般。我和吴克华、欧阳文、李福泽等同志商量，抓紧时机召开党委会，先让党委一班人统一思想，明确认识。会议开得很短，但确定的问题相当重要。会上吴克华同志明确提出，我们军的工作重心由攻取城市转变为警备大城市，全军干部战士必须适应这个转变。我从政治工作的角度，阐述了这次进城的重要意义。会议形成一个决议，其中写道：“我军进城，是代表我党、我军进城的，因此，我们政策纪律之好坏，不仅是我一个军，而是全党全军对国内国际有极大影响。”

“我全军干部战士，对北平城内的一切工商业市政文化、名胜古迹、国家仓库、财产物资及一切公共设施，只准看管，不得动用；只准保护，不得破坏；空手进，空手出，切实做到秋毫无犯。”军党委会后，立即在全军范围内开展了为期一周的政策纪律教育。颐和园里，佛香阁下，我给团以上干部进行动员。面对还没有解冻的昆明湖，迎着料峭的早春寒风，我对同志们说：“我们今天坐在排云殿下，就说明革命已经发展到战略决战阶段。我们的思想，必须适应这个形势！”各师、团也层层动员，不留死角，结合召开党员代表大会、士兵代表大会，使这场教育更加扎实深入。教育的方法也多种多样。123师采取“评入城资格”的做法（后来发展到全军），他们制定了六项纪律：一是爱护城市，不准破坏；二是看守警卫，原封不动；三是空手进去，空手出来；四是立场坚定，不腐化，不被坏分子利用；五是不违反警备规则；六是有责任心，别人犯错误及时制止。从师长、政委到炊事员、驭手，一个一个评，谁不够条件，就不得入城执行任务。这项活动一开展，部队可热闹了，机关、连队都在为某一个人够不够入城资格而争论。369团一个大个子的副指导员，在张家口战斗中，缴了一支钢笔，揣在衣袋里。在这次评议中，连部的通信员、司号员、卫生员都认为他没有入城资格。特别是司号员的意见像在他耳边吹号一样，使他坐立不安。司号员说：“你在张家口可以拿到钢笔，到北平谁敢保证你不拿其它东西。我看你没有入城资格。”评议会上，副政治指导员的入城资格没有被他的战士批准。他检查了两次，人们还是不同意他入城。他流着眼泪去找团长、政委，请给他作“保”，这才勉强被通过。那些解放战士更紧张。过去，他们在国民党军队里，“大炮一响，黄金万两。”现在可着急了。他们反复表示，虽然过去犯过错误，但现在当了解放军，一定要执行解放军的纪律，认真过好政策纪律这一关。后来宣布，过去在国民党部队犯的纪律，不追究，今后不犯就行。这样，解放战士才放心。通过评议，还有极少数人没有评上，部队入城时被留在城外。欧阳文同志对我说：“这次教育，可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如122师在抓干部教育中，采用的是“干部政策鉴定”的方法。各党支部彻夜开会，检查过去的情况，根据各连队、机关于部的不同情况提出不同的要求，一一给他们作出政策鉴定。121师搞了“政策点名”，操场上站满了英姿勃勃的战士，由一个干部拿着花名册，念一个名字，点一条政策纪律，要求战士对答如流。战士们把警备城市的政策和纪律写在小纸片上，贴在枪托上，以便随时背诵。那些天，部队驻地锣鼓声、歌唱声此起彼伏。军和师的宣传队排演了一些宣传遵纪爱民的节目和京剧《闯王进京》，告诫大家吸取历史上农民起义军的经验教训。一天，叶剑英同志风尘仆仆来到我们军部。他像往常一样，耐心地

听取我和吴克华等汇报了警备北平的准备工作。他一边听，一边记，或是提出他的建议，或不时的点头称赞：“这样好！”最后，他说：“你们不仅要在战场上打硬仗，还要在新解放的城市打好警备仗。这次进城不简单哩，正像你们说的，是代表我党我军进城的！”他还认真地审阅了我们的警备方案，并叮嘱我们，不要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把这项工作做好，不光从精神上，还要从物质上做好进城的准备。晚餐时，叶主任与我边饮边谈，纵论历史和斗争经验，展望光明前途。叶主任走后，我们便分头到各部队检查准备工作情况。在121师驻地东北旺、土井一带，我看到不少战士坐在老乡的院子里拆洗棉衣。宣传队、民运队、后勤医务部门的一些女同志，手把手地教他们拆洗。一些性急的小伙子把整个棉衣泡在水里，一时干不了，只得穿着单衣，坐在炉火旁边烤棉袄。师里买来白布，扯成崭新的背包带和绑腿，分发给每一个战士。战士们想出一种新的打背包方法，就是用竹棍绑成一个五星架，把背包往上一搁，既方便，又美观。在122师驻地，更是一派繁忙景象。司务长、炊事班的同志忙得脚不着地。烙高粱面饼的，买青菜的，打油的，称盐的，准备马草的，熙熙攘攘，好不热闹。他们买来新锅、新水桶和一些生活用具，备足了3天的干粮。123师正抓紧进行礼节教育。战士演习走方队，操正步；干部则练习骑马入城。他们说，我们进城要走出军威来，让人们看看我们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爆竹声中旧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时值春节前夕，在繁忙的工作中，警备司令部在颐和园石舫边招待军管会、兵团、华北兄弟部队和我们军的团以上干部。万寿山松柏青葱，昆明湖坚冰未消。大家聚在石舫附近的湖边，叙友情，谈未来。在热烈的掌声中，叶剑英、程子华等领导同志，举杯给大家敬酒，叶剑英同志祝同志们春节愉快，程子华司令员代表警备司令部给大家敬酒。他说：“北平解放在即，让我们为北平的解放，为全中国人民的解放干杯！”会后，大家到紫光阁参加交谊舞会。在我强大的军事压力下，加上北平地下党长期的艰苦斗争和各界群众的推动，傅作义将军终于走出了关键性的一步。1月22日，他通过华北“剿总”的机关报《平明日报》宣布接受我平津前线司令部关于和平解放北平问题的意见，并且向北平守军发出了《关于全部守城部队开出城外听候和平改编的通告》，城内20多万军队陆续向城外开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远在千里之外的南京，新闻媒介也在同一天刊登了蒋介石于1月21日中常会上宣布引退的特大新闻。消息传来，如春雷唤醒了沉睡的古都，200万北平市民喜气洋洋，奔走相告，沉浸在幸福与欢乐之中。我们这些为北平和平解放浴血奋战的解放军指战员，更是以无比激动的心情，与北平市民分享着胜利的喜悦。与此同时，平津前线司令部电令我军的一个师准备进城与傅军交接防务。军里决定由我率121师进城。就在我们准备进城的时候，总部来电，称傅作义的部队撤离时，为了给市民留下好印象，尽量约束部队不搞破坏活动。我接到电报后，即对参谋长李福泽等人说：“好哇，他们预先给我们敲了警钟，立即通报各师，要求部队以更加严明的政策、纪律，让北平市民认识我们解放军。”1949年1月31日，是平津战役胜利结束的日子。虽是数九寒天，但北平到处弥漫着春的气息。巍峨耸立的北平城楼，披着银装，在冬日的照射下，晶莹闪亮，显得格外高大与雄伟。门楼下，城门大开，行人络绎不绝，一张张绽开的笑脸，互相传递着春到古都的信息：“人民解放军就要进城了！”12点30分，经过一上午的精心准备，我带领121师出发了。我站在一辆美式敞篷吉普车上，后面是一名战士手擎一面鲜艳的人民解放军的军旗，掌旗

兵的两侧，是两名护旗兵挎着冲锋枪，护卫着神圣的军旗。随后是一辆中卡车，车上是警卫班，配有轻机枪、六 炮。接着是前卫连，之后是蔡正国师长、李丙令政委率领的师部，再后是接防的部队。团的干部骑马，指战员个个精神饱满，步履矫健，当我们来到西直门时，城楼上还站着荷枪的傅作义的士兵，他们拒不交出城防，说没有接到上级的命令。后经我严正交涉，他们才同意交接防务。这样，北平城门上，换上了身着草绿军装、臂戴“平警”臂章的解放军战士站岗。古都北平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在城头迎风飘扬！我乘坐的汽车一进入西直门，迎面跑来一大队的学生、工人、市民。他们有的摇着彩色小旗，有的高呼口号。有一辆广播车停在路旁高声播着：“北平得到了真正的和平！热烈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突然间，不知从哪里涌来那么多的人群，包围了我们正在行进的队伍，那些活泼热情的女学生，在队列的左右扭起了大秧歌。她们一边扭，一边唱。还有的女学生的衣服上用粉笔写了很大的两个字：“解放”。看这眼前热烈动人的情景，听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歌声和震耳的爆竹声、锣鼓声，使人真的感到是解放了！是啊，解放了！往日，准敢出来看“兵”，出来迎“兵”？今天，不光是年轻人在和解放军一同欢乐，就连小脚的老太太也站在路边看热闹，高兴地谈论着。“怪不得能打胜仗呢，你瞧他们那枪、那炮多棒呀！”“哟，这些小伙子多精神，那国民党兵，一个个都跟钻炕洞的耗子一样！”我乘坐汽车来到洋楼林立的东交民巷——这里是当时的领事馆区，一座座各种式样的小洋楼，同北平低矮的四合院，形成鲜明的对比。一走进东交民巷，似乎有一种异样的气氛。在一座日本式样的小楼里，我见到了先期来到这里的平津前线司令部的政治部主任陶铸同志。他是随同傅作义将军的谈判代表一起进城的。我向他汇报了41军121师进城的情况。他让我们尽快接防完毕，做好以公开的武装力量对付暗藏敌人的准备，要切实注意遵守群众纪律。我离开东交民巷，便驱车来到121师驻地旃坛寺。这里更加热闹，北京大学、东北大学的学生来到这里同部队联欢。师政治部主任何英同志和东北大学学生代表在台上讲话。著名舞蹈家戴爱莲领着一批进步学生，跳起优美的青春舞，博得战士们热烈的掌声。联欢会一直持续到深夜。第二天，吴克华同志率两个师进入北平，我军还有154师和军后勤部在丰台，没有入城。军部率直属队进驻西单报纸胡同。

到了午夜，爆竹声、歌声还不时传来。望着窗外的万

家灯火，我兴奋得久久不能入睡。想到这3个月来的战斗生活，想到蒋家王朝将彻底覆灭，新中国即将诞生，中国的革命形势发生了何等巨大的变化啊！如果不是能够扭转乾坤的巨手，怎能指挥这般伟大的战争？重温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使我更加感到毛主席军事战略思想的英明正确和指挥艺术的高超。真是用兵如神，胸中自有百万兵啊！

古都新生

1949年2月3日，在北平人民的记忆中，是多么难忘的一天。这一天，在古都北平举行了轰动世界的解放军入城式。

入城式由我们兵团司令员程子华任总指挥，参加的部

队有我们41军，还有华北2、3兵团的部队和特种兵部队。上午9时30分，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彭真等首长，由北平饭店乘车来到前门城楼下面，健步登上箭楼，傅方代表郭宗汾、周北峰等也登上箭楼，我和吴克华等同志特意登上座落在前门后右侧的一座银行小楼，自始至终观看这极为壮观的入城式和群众欢迎解放军的热烈场面。上午10时，4颗信号弹腾空而起，入城仪式正式开始。挂着红色指挥旗的指挥车，由永定门向前门开来。后面是4辆载着毛主席、朱总司令巨幅画像的大卡车。领袖像后面是整齐的军乐队，军号闪闪发亮，号声震天动地。再后是装甲车队、炮车队和骑兵、步兵方队。北平的天空分外晴朗，各界群众沸腾了。放眼望去，前门大街上，数不清的红旗、横幅，涌不断的人流、车队。那震耳欲聋的口号声、鞭炮声、歌声，汇成一曲胜利的交响曲，在人们耳边回荡。“快看，快看，民主人士出来了！”不知是谁喊了一声。我循声望去，只见几个穿长袍、戴眼镜的先生向人群走去。那是周健人、胡愈之、张奚若、钱伟长、费孝通、李广田、张东荪等知名人士。他们满面笑容，举着小旗，汇入欢迎人民解放军的行列中。坦克的轰鸣声由远而近，一直开到前门楼下。这些收集和缴获敌人的武器，如今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消灭敌人的新装备。汽车牵引的大炮，都是清一色的美国货。有些学生爬到坦克上，用粉笔写上：“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对准蒋该死——开炮！”有的大炮筒上，骑了四五个小伙子，他们神气地摆着手，把人们扔上来的花环，套在炮筒上。骑兵、步兵的方队经过前门楼下。他们高举着“打大仗，打胜仗，威震辽东”和“塔山英雄团”、“塔山守备英雄团”、“秋毫无犯”等大旗，雄赳赳地走着。各师、团干部，分别走在他们队伍的前列。远远地，我看见骑马的还有女同志，仔细一看，才看清她是121师供给部政委、红军女战士吴朝祥同志。她骑着高头大马，接受人民的检阅。从永定门入城的队伍，经过前门，向右拐进了东交民巷，这是有意安排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帝国主义列强，任意欺侮中国人民，在他们眼里，中华民族是一块任人宰割的肥肉，东交民巷是他们的领地，中国人民是不得随便进入的。今天，我们就是要让他们看看，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支无坚不摧的英雄军队！坦克冒着青烟，大炮高昂着炮口，骑兵、步兵挎着钢枪，由西向东行进。马达隆隆，马蹄嘚嘚，歌声阵阵。震得洋楼上的玻璃窗子瑟瑟作响。事后，才知道这些外国使馆的官员，由于不了解我们的政策，吓得紧闭大门，有的公使太太躲进暗室，有的公使吓得不敢在东交民巷住了。队伍开出东交民巷，绕过傅作义在东单临时开辟的飞机场，经过东单牌楼、北新桥到太平仓。部队与另一路从西直门入城的部队汇合，再折向南行，经长安街，转和平门，从广安门出城。从上午10时到下午4时，前面的队伍过了德胜门，后头的还在向前门走。北平的街道，变成了人的河流，整个北平市，成了欢乐的海洋。“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和“跟着共产党走”的歌声，从黎明唱到午夜。庄严的入城式宣告了文化古都北平回到人民的手中，在全中国、全世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家外国通讯社当天发出的电稿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规模空前未有，士气十分高涨，装备异常精良，实为一支强大的有战斗力的部队。”“中国

革命方兴未艾，南京当局大势已去。”傅作义将军为保护北平古城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北平毕竟是一个满目疮痍的旧城市，要使它获得新生，还需要各方面做大量的工作。首先安定社会秩序，就要花费很大的力气。北平是国民党统治华北的大本营，社会情况极为复杂，有下野的军阀，有失意的政客，有蛰伏的汉奸、特务，有封建把头、恶霸惯匪，有小偷、地痞、流氓等，各种人物都会跳出来表演一番。那些投机倒把的商人，妄图借此机会，大捞一把；地痞、流氓也想趁机敲诈抢劫；国民党特务也寻机进行破坏。且北平是华北最后解放的城市，东北、华北、西北等地的国民党逃亡的旧官吏几万散兵游勇糜集于此。中共北平市委、北平市军管会召集各方代表，举行联席会议。聂荣臻、叶剑英、彭真等同志都参加了会议，研究恢复北平治安、恢复生产和安定秩序问题，明确北平接管委员会、纠察总部和警备司令部的各项工作任务。对我们执行警备任务的部队，提出尽快安定社会秩序的具体要求。此后，北平街头出现了散兵游勇登记处。当晚，121师政委李丙令来电话报告：“原在东北抗日的将领马占山到我部来登记了。”马占山，行伍出身，识字不多，但马上功夫尤为娴熟，号称“马三枪”，驰马对敌，连发三枪，无不命中。“九·一八”后，在东北坚持抗战，历尽艰辛。1946年，蒋介石发动内战后，他不愿与共产党兵戎相见，寓居北平。对这样一位具有民族气节的抗月名将，当然不能慢待。我们当即答复说：“好，我们表示欢迎，并报告上级，给予适当安置。”随后，即有一大批流散的国民党官兵前来登记。

那些日子，佩带“平警”臂章的警卫战士，在北平人民的大家庭中，成了举足轻重的一员。白天，他们在博物馆、报馆、图书馆、仓库、文物古迹和要害部位站岗值勤；夜晚，他们身背钢枪，在路灯下巡逻，保护古都的安全。哪里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威胁，他们就出现在哪里。在半截胡同里，几个“平警”战士奋不顾身，追捕手持马刀、手枪的特务；在西单，“平警”战士在搜捕那些换下军装、假造解放证的散兵游勇；在北新桥，“平警”战士查获企图诈骗的3个流氓；在崇文门，“平警”战士逮捕了身背电台的军统特务。

“平警”战士爱人民，人民支持“平警”战士的工作。

不少群众主动找到部队，检举揭发敌人的破坏活动，剔除危害社会治安的潜在因素。西城区连续发生几起诈骗、抢劫案，保卫、侦察部门在当地群众的支持下，很快破获了冒充我华北驻北平办事处的诈骗集团。

在北平市委、市军管会的领导下，我们和北平市公安局、

纠察总部等单位一起努力，很快安定了北平的社会秩序，保护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得到了各界人民的衷心拥护。1949年2月12日，北平人民从四面八方涌向天安门广场，前来参加庆祝北平和平解放的大会。大会主席台设在天安门城楼上。广场成为旗的海洋，人的河流，着节日盛装的腰鼓队、秧歌队聚集在这里。大家同敲一个鼓点，同唱一支战歌，声震古都，响彻全城。北平市第一任市长、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叶剑英同志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地宣告：北平市人民政府成立了！北平人民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权力机构！古都获得了新生！接着，北平工人代表、学生代表、民主人士代表和我军“塔山英雄团”的代表都讲了话。一致表示要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为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北平而奋斗！古都获得了新生，从城内开出的20多万人的傅作义部队也面临着新生的问题。我们按照平津前线司令部的命令，改编傅部104军的309师。这项任务既不同于改造解放战士，也不同于

和明火执仗的敌人作斗争。我们选派了 121 师参谋长韩复东为副师长的一批文武双全的干部去完成改编任务。这是一场改造与反改造、教育与反教育的斗争，十分复杂曲折。最典型的要算 361 团教导员宋裕宽去的那个营了。同宋裕宽一起去的还有一位副营长和六七个连队干部。宋裕宽任教导员。他刚到营里时，国民党营长陈其溪等人出来欢迎，表示愿意接受改编。开始，我们对他们进行中国人民解放军宗旨、建军原则教育，讲解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广大士兵感到很新鲜，很喜欢听，排以上军官则有抵触情绪。紧接着，发生了接近我方干部的战士陆续失踪的怪现象。宋裕宽等同志非常着急，他们分头到班、排了解情况，都没有什么结果。后来，发现陈其溪住处常有小汽车开来。宋裕宽同志设法接近给陈做饭的一位战士，用实际行动教育了他。一天晚上，这个战士跑过来报告说：“失踪的战士是被他们活埋的。陈其溪不是这个营的营长，是国民党的特务。”

面对这些情况，宋裕宽同志一面火速地向保卫部门报告，一面和同来的同志们一起稳住敌人，顺藤摸瓜，搞清了这个营里潜藏着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的一个特务组织——华北特别站（亦称华北“剿总”技术总队），陈其溪是少将队长。一共有 19 名特务人员，企图长期潜伏进行破坏活动。那天晚上，气氛非常紧张，有多种迹象表明，他们将有所“行动”。我军派到该营的干部随时做好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

第二天是星期天，我们事先派去两大卡车部队埋伏在庄稼地里。待全营会操时（傅军会操不带武器），宋教导员突然宣布，排以上军官到北平参加学习班，暂由我方到这个部队“参观”的干部接替他们的职务。这下子敌人傻了眼，当时便有人跪下来，请求人民宽恕。我方的保卫、公安人员即对他们进行了严格的审查，查清了特务分子，其余的人员仍回部队工作。

搬掉压在士兵头上的石头，我们的政治教育工作很快开展了起来，被抓来当兵的穷苦人纷纷起来诉苦。他们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控诉国民党怎样欺压他们，反动军官怎样虐待他们。血泪的控诉使他们擦亮了眼睛，提高了觉悟，认清了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的本质区别。我军按照政策规定，对愿意留在部队的人员表示欢迎；对少数要回家的，一律发给“解放证”和路费；对有病和伤残的，尽量给予治疗。同时，由战士民主选出了士兵委员会，实行三大民主。这样，逐步使这支部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改编结束后，这个师编为独立师。当我方干部撤离时，全师干部战士恋恋不舍，互赠纪念品。有的激动地说：“这两个月，你们教我懂得了为谁当兵，为谁打仗，使我们好象换了一个人。”那时，中国革命的形势，也和北平一样，正发生着深刻的变革。为进一步推动革命形势的发展，毛主席先后发表了《将革命进行到底》、《把军队变为工作队》等文章。接着，党中央又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制定了促进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该采取的基本政策。我从实际斗争中，切身感受到党中央、毛主席决策的英明正确。一进北平，很多没有预想到的新问题、新情况出现了。我们的干部战士多数来自农村，又长期在农村作战，入城后，对党关于利用资本家恢复生产的政策不理解，思想有些混乱。有的营、团干部问我：“工商业是资本家的，

大量私有财产是官僚、军阀和流亡地主的，什么才是穷苦老百姓的？”有些同志认为从胶东打到东北，又从东北打到关内，古都都解放了，该喘口气、歇歇脚了。还有的同志则在花花世界面前昏昏然，滋长起了和平享乐的思想，甚至想起娶媳妇，安安稳稳过日子的事情来。

面对干部战士的各种思想问题和资产阶级思想的进攻，我们展开了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在新生的古都，进行新的政治整训，要求把干部战士的政治思想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122师365团有个“肖永华连”（以战斗英雄肖永华同志命名的连队）政治整训有声有色。他们有意识地把全连干部战士撒出去，让他们接触社会，接触群众，帮助驻地群众打扫卫生，参加工厂、商店的劳动，到学校给学生上课等。

晚上，大家坐到一块儿，各式各样的反映都出来了，一个班长说：“有钱人坐在黄包车上，驼背的工人拉黄包车，太不合理了！”一个战士说：“我们去打饭，不少人围着我们，看我们吃啥，见我们吃高粱米、老咸菜，那些太太们直撇嘴，我就把饭盒盖上。”

这个连把大家的所见所闻，综合起来，组织讨论，并把一些不合理的现象画成漫画，编成小节目。最后，大家的思想统一到旧社会不平等，根子在三座大山没推翻。我们在社会制度上闹革命，就是为了全中国人民的解放。接着，全连开展了“挖苦根”活动。连队的文娱骨干拉起二胡，唱起了：“我的儿，你为啥这样苦，你为啥受冤枉，只因为，城里有那刮呀刮国民党。”参军不久的解放战士，苦根越挖仇越大，咬牙切齿地宣誓要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到底。通过各种活动，使战士们自觉认识到：我们吃高粱米、老咸菜，是为了广大劳苦群众得解放。解放全中国，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迈进，是我们的崇高理想。“肖永华连”的经验，在全团普遍开花。其他各师，也都有自己的经验和典型。这场政治整训蓬勃开展起来了。这时党中央决定从西柏坡迁至北平。总部通知我们：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来平后，即检阅驻平部队，让我们军的3个英雄团（即“塔山英雄团”、“塔山守备英雄团”、“白台山英雄团”）和连以上干部参加受阅。听到这个消息，我们的心情都很激动。部队欢呼雀跃，有的擦拭武器，有的整理服装，有的操练队形，有的整顿军容风纪。春天的气息来到北平郊外。3月25日上午，从市内通往西苑机场的路上，小汽车、大卡车川流不息。我们按时赶到西苑机场，那里排列着整齐的大炮、坦克、装甲车和步兵方队，静候着中央领导同志的到来。为了组织好检阅，阅兵总指挥、平津前线司令部参谋长刘亚楼同志想预演一下，他对军长吴克华说：“吴军长，你来当主席和朱总，我来演习一次向你报告。”吴克华同志连连摆手说：“哎，不行，不行，我哪能代替主席和朱总呢？”下午3时，机场上空升起4颗信号弹。紧接着，从南向北，一溜儿敞篷吉普车缓缓驶入机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等领导人的阅兵车队，有一二十辆。我和吴克华同志在最后一辆阅兵车上。我们前面是程子华同志。阅兵首先从步兵开始，后按高射炮兵、坦克兵和骑兵部队的序列进行。一声“敬礼”的口令，站在队前的干部，举手向领袖行礼，检阅场上异常的肃静，只能听到汽车发动机的声音。

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身穿朴素的灰布军大衣，举起右手给部队还礼。毛主席的车子在“塔山英雄团”的旗帜前驶

过时，车子稍微停了一下。主席用那深邃的目光，注视着这面血染的战旗。

检阅的车队驶过，队伍里响起雷鸣般的口号声：“毛主席万岁！”“朱总司令万岁！”“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大家使劲地喊呀，尽情地呼呀，擦着激动的泪水，不断地振臂欢呼。有的喉咙喊哑了，仍在继续高呼。

傍晚，晚霞如火，我们带着难以平静的心情返回驻地，那些因工作离不开，未能参加受阅的同志，拉住我们，问这问那，同我们一起分享欢乐。

在中央首长检阅推动下，我们军的政治整训取得了较大的成果。我们到部队驻地走一圈，都被那琳琅满目的宣传栏吸引住了。文化教员写诗、作画，战士们纷纷写决心书，大家都憋足了劲，随时准备为解放全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仁义之师”

我军经过长期的战争生活，第一次进入像北平这样具有重大影响的都市，不能不说是面临着一场新的考验。为了胜利完成党交给我们军警备北平的光荣任务，军党委召开了党委会议，进行了专门研究，作出了有关决议。要求全军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发扬拥政爱民的优良传统，搞好军民关系，做到秋毫无犯，视军纪为命脉。北平的正月，寒风怒吼，滴水成冰，正是“三九四九冰上走”的时节。进城后的第二天早上，我曾到各警备区域内看望部队。目睹的情景，实在令人感动。在西直门内，战士们顶着一条难以御寒的棉被，或穿一件很薄的大衣，挤在老乡家的门道里、屋檐下。战士们冻得嘴唇发紫，也没有一个人去叫老乡家的门。驻在德胜门的部队，也同样露宿在街头。我问战士们冷不冷？他们风趣地回答：“不冷，我们有火龙衣！”细问起来，才知道战士们夜间冻得不能入睡，就在地上来回走动、跳跃。有的战士对和他们一起露宿的机关干部开玩笑说：“哈哈，你们不冷，你们比我们多铺了一层”。原来，机关干部比他们多铺了张报纸。迎着凛冽的寒风，我们登上鼓楼，驻扎在那里的部队更艰苦。窗子没有糊，屋里没有生火，地铺上也没有干草，北风一吹，真可谓“透心凉”。驻地的群众见子弟兵冷得不能入睡，心里很不安，多次来请，或派小孩来叫，邀请战士们到家里取暖，但战士们都婉言谢绝，坚持不进民房，不打扰群众。我们到了121师的“长岭连”，他们“三请三不进”的故事已经传开了。刚到驻地的当天夜晚，老乡请他们进屋去住，他们谢绝了。半夜，北风越刮越大，窗上的纸都被刮破了。群众不忍心子弟兵受冻，就采取“合屋并床”的办法，腾出几间房子，公推几位老人来请部队去住。这个连的干部回答说：“谢谢大家的关怀，我们年轻，火气旺，人多，挤着暖和。”第二次谢绝了。到了第三次，大娘、大婶、大嫂一起来请，不管怎么说也要让子弟兵进屋。连队没办法，只好实说：“上级有规定，不得进民房，你们的心意我们领了，但房是不能进的。”解放军不进民房的消息很快传开了，不少人跑到有部队的地方去看。恰好部队在开饭，吃的是高粱面、玉米面两合一的馍，还带着冰渣，咸菜是干豆角和胸茄子、腌萝卜，喝的是“扎牙根”的冷水。他们怕牲口啃树皮，就用雨衣包起拴牲口的树干；怕牲口拉粪影响卫生，每匹马后头挂了个布粪兜。老百姓看着这一切，深为感动。经过北平市委、军管会 and 市人民政府的关怀和多方努力，部队的住房很快有了着落。但又出现了另一个新问题：原来，能够腾出房来的人家，大多是官僚、资本家、高级知识分子和其他知名人士。部队住进这些人家里，对部队的政治素质和政治纪律水平又是一场实际的考验。警备司令部通信科住进著名京剧演员程砚秋家里。我们早就听说他在日本鬼子占领北平时不为侵略者、汉奸唱戏的民族气节。一天，我和吴克华、欧阳文等同志去看望他。程砚秋先生热情地接待我们。他一一耐心地为我们介绍京剧的行当，有些我们知道，有些我们听也没听说过。他对解放军入城表示欢迎，说：“贵军为民赴汤蹈火，理应盛情款待，只是家人甚多，寒舍狭小，实在抱歉。”我们说：“这已给您添了不少麻烦，请程先生谅解！”他还对我们的警备工作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军政治部《战斗报》的同志，住进北京大学教授、清史专家郑天挺家里。郑教授有9个女儿。刚开始，他们家人谁都不敢和部队同志接近。只时常从门缝里、窗子里看部队的人在干什么。慢慢地，他们看到这些解放军和报纸上宣传的、人们传说的没甚两样，就主动与报社的同志打招呼，请报社的同志喝茶。郑家四姑娘很爱听部队的

同志讲战斗故事，很快就和报社的同志熟悉了。

后来，战斗报社要搬到别的地方去。四姑娘对报社的同志说：“过去在我的心目中，兵这个概念跟粗鲁和欺侮老百姓联系在一起，所以家里人都不敢和你们接近，现在，刚了解和熟悉，你们就要走，我们真舍不得！”她们把报社的同志一直送出门外，还不停地说：“你们是有文化的军队，是最文明的军队！”一些住进官僚、大资本家公馆的同志，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入城守则》、《约法八章》，既对房东讲礼貌，又注意政策和纪律。住进牛街、黄寺等少数民族街区的同志，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当时，北平城内，到处垃圾成山，像作家老舍笔下的龙须沟，又何止一条。121师驻地旃坛寺右侧和北海公园相连接的那条路上，垃圾堆的很高，甚至超过了北海的围墙。风一吹，到处尘土飞扬。我们动员部队，利用休息时间，把垃圾清除掉，造福北平人民，一连几个星期天，部队派出大卡车、骡马车，展开了一场清除垃圾的大会战。干部战士人人挥锹抡镐，人推车载，很快把16万多吨垃圾清理出去。有的群众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说：“住进了共产党的兵，每天缸满院净；住了国民党的兵，每天捣乱起哄。”在执行警备任务中，看守仓库的任务是最重要的。我们共接管了108个仓库。这些仓库星罗棋布，有海运、北新、天坛、太庙等，每个区都有。仓库里的东西，更是五花八门：有成堆的军需装备；有成山的大米、“洋面”；有令人眼花缭乱的绫罗绸缎；有外国产的大卡车、小轿车、自行车等，真是应有尽有。

364团驻区内有一座面粉仓库，里面全是“洋面”。一天，来了两个人说是军管会的，要拉面粉。站岗的同志见他们的证明没有盖上公章，就严加盘问，并告诉他们，没有公章，一斤也拉不走。来人马上换了一副笑脸，一边掏出“哈德门”香烟，一边说：“小兄弟，洋面是公家的，分到你头上能有几两？你通融一下，别人又不知道，咱亏待不了你。”我们的战士严词拒绝，并向他们发出了警告。365团5连负责看管一个军械仓库。接管后的第二天，来了一个衣冠楚楚的国民党军官。他找到5连连长说：“你我都是军人，懂得武器的重要，请兄弟帮忙，将我这支左轮换换。”5连连长目光严峻，用两个字回答他：“不行！”这个团9连的同志看管被服仓库，一个胖胖的国民党职员拎着一个鼓囊囊的提包来找站岗的同志。他先掏出花生、大枣和雪白的馒头，站岗的战士一时不知所措。

这个职员乘机进攻：“库里的衣服没有登记，多一件少一件根本没人知道。你给换两件吧！”战士这才明白过来，马上把这个人送到连部进行批评教育。364团2营到铁狮子胡同后，副营长见4连的几个同志鞋子破了，就叫文书到国民党军队驻地仓库拿9双皮鞋来，给班排送去。文书对副营长说：“进城前，咱们都学过政策纪律，看管仓库要原封不动。”副营长有些不耐烦地说：“这是命令，出了事我负责！”

文书只好拿来皮鞋，分发给战士，但他们不接，而且说：“我们缺鞋是实际情况，但绝不能因此违犯纪律。”文书只好把鞋拿了回去。为这事，副营长在党小组会上受到了同志们的批评，并要他向连队战士作检查。这些事情，一桩桩，一件件，都汇报到军政治部，欧阳文同志高兴地对我说：“政委，咱们在城外评入城资格的活动开花结果啦！咱们抓住这些好的典型，通报一下，你看怎么样？”我也为有这样自觉的干部战士而感到欣慰，就说：“很好，表扬先进，批评落后，善始善终把工作做好。”政治部的同志说干说干，两天以后，连队战士就已互相传阅着油印的军党委签发的文告《把城

市政策纪律贯彻到底》。

部队自觉的政策纪律观念，还表现在对文物古迹的保护工作上。我们一到京郊，这个问题就非常明确地摆在我们的面前。

北平城自从元朝建都以来，封建帝王搜刮民脂民膏，修建了我国规模最大的宫殿和众多的名胜古迹。这既是劳动人民聪明才智的结晶，又是帝王将相压迫、剥削人民的铁证。用北平群众的话说，北平的一草一木，都有保护的价值。同时，北平又是一个有着光荣革命传统和斗争历史的城市，也有不少革命文物。

部队进北平后，我到故宫走了一趟。进天安门，到太和门，沿着汉白玉甬道，步入太和殿。这里是明、清两代皇帝举行即位大典、朝会和庆祝节日的地方，为三大殿之首。目睹宝座龙床和殿台上的宝鼎、金缸、铜龟、铜鹤、日晷、嘉量等珍宝，我禁不住对随行的同志说：“将来让我们的子孙后代看到这一切，就是一次生动的阶级教育。”

故宫的职员纷纷向我控诉说，日寇抢走了许多文物，国民党败退时又盗劫一大批。我们告诫他们要同“平警”战士一起，看管保护好这些文物。我们在故宫的每座大殿里都派了战士守卫，不准任何人进去，不准拿任何东西，战士们都把决心书贴在墙上，交接班时对照检查。

363团负责守卫团城、北海、故宫、景山、太庙、六国饭店等重要地方。团长乐军和政委周之同等团领导，几乎每天都在执勤点上检查。

战士交接班十分仔细，有时墙壁、门板上多了一个钉眼都要查清是谁钉的。难怪参谋长李福泽同志说：“我们的执勤工作又多了一项内容，就是交接班时要数钉子眼。”有些兄弟单位的同志，很想看看故宫是个啥样，就跑来找我们，想“走后门”进去看看。执勤的同志婉言相劝，始终没放一个人随便进故宫。在中南海执行警卫任务的同志，也极为严格，在天气异常寒冷的时候，有的同志把松树上掉下的干树枝拣起来准备取暖用，营里干部发现后，马上要求他们把松枝放回原处。现在看来，对这些事情的处理似乎太机械了。但在当时，严格要求部队，一丝不苟地执行纪律是完全必要的，确实起了很好的作用。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部队的名声在北平群众中传开了。一天，欧阳文同志拿着两张报纸和一大叠信对我说：“莫政委，你看，群众表扬咱们的战士呢！”我接过一看。可不是，报纸上不光有通讯介绍“平警”的情况，还有不少照片。群众的来信，热情洋溢，称赞我军是仁义之师。我们交换了意见，决定利用召开警备工作会议的机会，大张旗鼓地表扬先进，批评落后，把警备工作做得更好。几天之后，警备工作会议在一个小礼堂里召开了。欧阳文同志代表军部表扬了好的单位和个人，点名批评了极个别的同志。同志们说：这是“政策纪律点将台”。会后，政治部起草了一个征询群众意见的启事。登在当时的《新民报》上。启事说：“……为了更好地保护人民利益，维护治安，进一步密切军民关系，希各区政府工作同志及北平

市各界人民，对本军维护人民利益及遵守政策纪律的优缺点，多多提出意见，本军表示热烈欢迎，并诚恳接受各方批评。”由于全军上下一致，北平的军政、军民关系处理得很好，北平的名胜古迹和革命文物都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我军完成了上级赋予的警备任务，人民群众热情称赞我军：“高粱米，粗布衣，财不贪，色不迷，民为父母，纪律第一，堂堂正正，举世无双”，堪称“秋毫无犯”、“仁义之师”。当群众听说我41军即将南下消息

时，很快掀起了一个赠送锦旗和礼品的热潮。房东大娘大婶和那些手巧的姑娘，绣成了一面面锦旗。锦旗有大有小，但旗子上多半绣着这样八个大字：“秋毫无犯”、“仁义之师”。胡愈之等知名人士和北平各界代表，亲自给41军各师赠旗。北平各界群众赠送的“仁义之师”的锦旗，至今仍存放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回想41军这支战斗部队，过去一直在农村或小城镇作战，并没有警备大城市的经验，为什么在警备北平期间执行政策、遵守纪律都比较突出呢？我认为，最主要的还是靠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我军坚强的政治工作，靠长期培养起来的政策纪律观念。1948年秋在辽西作战时，部队的政策纪律观念就表现出来了，参战的团队受领了“秋毫无犯”的大旗。正如毛泽东说过的：“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辽西战役的时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里很多苹果，我们的战士一个都不去拿。看了那个消息很感动。在这个问题上，战士们自觉地认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我们的纪律就建筑在这个自觉性上边。”那时，各级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对自己要求都是很严格的。进城后不久，我曾到军管会向叶剑英等领导同志汇报工作。我说：“担负巡逻任务的部队很艰苦，干部战士很自觉，库房里有上千辆自行车，没有一个人去动它，干部也不搞特殊化。”叶剑英同志说：“好，这样好。我虽是军管会主任、北平市长，但任何东西部不能私自处理。我体谅同志们的辛苦，但不能随便动用自行车。”警备司令员程子华同志也是这样，不随便批条子，不通过私人关系动用国家财产。我们在北平两个多月的警备任务结束了，部队即将南下作战。离开北平前，战士们提了两条要求：一是参观故宫；二是看场京戏。军党委研究后认为，部队想看看故宫，心情是可以理解的，要求也不算高。可那时有规定还不能参观，我们“平警”不能违犯这个纪律；而且，北平周围还有几十万兄弟部队，城里还有总部直属队，如果我们参观了，兄弟部队怎么办？因此只能向大家解释。对于第二个要求，我们觉得广大干部战士打起仗来，出生入死；执行政策纪律，严肃认真，现提出这个要求，并不过分，应当满足。但看戏的经费从哪里来呢？我们下了狠心，从历年积蓄下来的“家底”中，拿出一部分金子换钱给部队买票。同时，由政治部严密组织，让数万名干部战士分批轮流到长安、吉祥几个剧院看戏。京剧名家程砚秋、马连良、赵燕侠都登台演出了。这件事情，也在部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干部战士非常高兴，表示：领导越关心我们，我们越要做好工作，党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为解放全中国而奋斗。

第十一章二十年打个来回

“打到江南去”

1949年初，春回大地。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国民党政权在长江以北的力量土崩瓦解，其精锐部队已丧失殆尽。遥望长江以南，还有蒋介石统治的半壁河山。国民党统治集团坚持反对人民的立场，拒绝我党提出的和平条件，妄图利用和平谈判的手段，争取喘息时间，调整兵力，凭借长江天险，阻止我人民解放军解放全中国的伟大进军。为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而不容许半途而废”的指示和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命令，我们在警卫北平期间，便组织指战员学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毛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评战犯求和》及1949年新华社元旦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等重要文献，为南下进军做好准备。4月11日，第四野战军在北平市内中山公园音乐堂召开野战军13兵团直属队及41军连以上党员干部会议。会上请朱总司令作进军江南的动员报告。当朱总司令在罗荣桓等同志的陪同下走上讲台时，全场欢声雷动，朱总司令向大家频频招手致意。朱总司令说：“本来，毛主席要来给大家讲话，但他的工作太忙了。我来之前，毛主席说：问候同志们！”全场又响起热烈的掌声。朱总司令首先给大家报告了国内的形势。讲敌我力量的对比，讲解放战争创造的“天津方式”、“北平方式”和“绥远方式”的意义，讲我们的有利条件和蒋介石的“和谈”阴谋，讲南下要注意的政策纪律和群众纪律等问题。要求我们发扬优良革命传统，像在北平一样，严格执行党的各项政策和纪律。强调当了“官”，但不能“发财”。台下的干部聚精会神地听着、记着。朱总司令又讲了工作队、军事民主和学习等问题。最后，他兴奋地站起来，挥动着有力的大手说：“同志们，党中央、毛主席号召我们打到南京去，解放全中国，这是光荣的历史使命，让我们把革命的红旗插上祖国的每一寸土地！”朱总司令的报告，极大地鼓舞着每个指战员。会后，各部队分别召开了士兵代表大会，传达学习朱总司令的指示精神。不久，我调任第四野战军14兵团政治委员，刘亚楼为兵团司令员，黄永胜、刘震分别为第一、第二副司令员，吴法宪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兵团下辖第39军（原第2纵队）、第41军（原第4纵队）、第42军（原第5纵队）。临离开北平南下时，我和刘亚楼同志去香山双清别墅毛主席处，请示并辞行。毛主席亲切接见了我们并和我们谈了话。因他工作太忙，我们只坐了一刻多钟便告辞了。后来我们便去天津组建兵团机关。各军进行动员和准备后，于4月中旬开始，先后踏上了南下进军的征途，刘亚楼因事未行，我和吴法宪于5月上旬率兵团机关，从天津出发，沿平汉铁路，向祖国的南方挺进。越走越炎热，雨也下个不停。山多路窄，道路泥泞，对部队行军作战很不利。为保证行军任务的完成，各部队根据本部队的装备及驮载牲口的数量等情况，合理规定行军路程，掌握好行军速度，适当地安排短期休整。在食品短缺的情况下，尽量使干部战士吃饱吃好。同时，加强行军中的思想政治工作，开展遵干爱兵运动。在一些险要地段和一些重要的路口，搭宣传棚，摆点将台，演唱顺口溜、快板书，鼓舞士气。南下沿途均系新区和游击区，革命政权尚未建立，群众尚未发动起来，远不像老区那样踊跃支前，遇到困难较多。各部队要求大家树立牢固的群众观念，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宣传群众，尊重民族风俗习惯，以秋毫无犯的行动感动群众，密切军民关系。许多部队都做到了行军途中“人不踏一棵青苗，马不啃一棵树皮”，每到一地，大家总忘不了为群众挑水、扫院，做好事。一路行军，一路做群众工作，不断收到沿途群众赠献的锦旗和慰问品。兵团机关到了宋朝的古都开封。这

里的建筑古色古香，别具特色，可城区环境很差，黄沙一片，道路不平，电话不通。我们在此休息了两天，还爬上了铁塔。进入郑州后又休息了两天，便继续南下。部队进入湖北境内时，正是三伏酷暑季节，许多干部战士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身上衣服总是湿漉漉的，不少人患了湿疹，有的阴囊溃烂，行军时被两腿擦得血水流个不停，疼痛钻心。南方蚊虫多，许多干部战士宿营时，被蚊子叮咬得整夜不能入眠，不少人因中暑而昏倒。“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1949年7月，正是晴川、芳草相映的时候，我南下大军，浩浩荡荡地进驻武汉。我们在武汉稍许休整。有一天假日，我与15兵团邓华司令员等几位领导同志，登临名垂千古的黄鹤楼（该楼最后一次被毁是1884年，即清光绪十年，当时人们说的黄鹤楼，实际上是后来修建的奥略楼），俯视长江汹涌流水，一泻千里，联想国民党反动派大势已去，我军乘胜追击，胸中不禁涌起无限豪情。武汉三镇真不愧是全国三大火炉之一。41军有一个团是中午通过武汉的，便有70多个战士昏倒。有的说若把面饼贴在墙上准会熟，有的说，把鸡蛋打在马路上，也会煎熟。武汉的三伏热天，对指战员是一次艰苦的锻炼。不久，14兵团奉命改建空军，兵团司令刘亚楼同志调任空军司令。因原13兵团政治委员肖华未及到任，便率领全国青年代表团出国访问去了，我被调任为13兵团政治委员。该兵团已进驻湖南常德，司令员为程子华，副司令员为彭明治、黄永胜、刘震（兼39军军长），参谋长为曾国华，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吴法宪，下辖第38军、39军衡宝战役胜利后正在常德地区集结休整。

挺进湘西

我是于1949年9月下旬到达湖南常德13兵团任职的。当时，在祖国大陆上的国民党残余部队，绝大部分谓集在华南和西南。据守广东的是余汉谋集团；据守湖南、广西的是白崇禧集团；据守西南的是胡宗南集团和云、贵、川等一批地方军阀，计100万人。在这些残余势力里，以白崇禧实力最强。且保存最完整。白崇禧为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素以诡计多端闻名，有“小诸葛”、“白狐狸”之称。在我人民解放军强大的军事压力下，白崇禧将其指挥的桂系部队主力5个兵团撤至衡（阳）宝（庆）公路两侧和粤汉铁路衡山至郴县一线布防，并与广州绥靖公署余汉谋部（后改为华南军政长官公署）建立了所谓“湘粤联合防线”。白崇禧急忙从衡阳飞往芒江，召开湘西“军政联防会议”，妄图在湘西设一道“人防长城”，阻止我军西进。遵照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关于对白崇禧部要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的指示，我第四野战军（辖12、13、15兵团）及第二野战军第4兵团共9个军32万人的兵力，分3路进行大迂回战略包围，以我13兵团为右路，挺进湘西，南下广西断敌向云南、贵州的逃路；以第4、第15兵团为左路，自江西进军广东，尔后第4兵团迂回广西；以12兵团的41军为中路，经湖南南部直趋广西北部。湘西是湘、鄂、川、黔4省的边陲之地，共有20多个县。境内高山连绵，地势险要。当时，不仅有敌刘嘉树部第100军沿芷江、安江一带设防，还有宋希濂在西北大庸部署的第122军牵制我向湘西进军。尤其是湘西匪患闻名全国。白崇禧在8月芒江会议上将10余万土匪和游杂武装编成了3个暂编军、10个暂编师，其主力盘踞在湘黔、湘川公路沿线。面对这一复杂而艰巨的任务，四野司令部和我们的兵团都作了周密的战略部署，除我兵团38军、39军负责右路战略迂回外，随后又安排47军跟后向大庸之敌122军进击，保障我侧翼安全。湘西战役始于9月13日。38军在军长梁兴初、政委梁必业率领下为先头军，于8月中旬分别由常德、桃源、临澧、安化出发，向沅陵、溆浦疾进，进入湘西大山区，先后占领了沅陵、辰溪，敌军大部西逃。白崇禧所谓“湘粤联合防线”的左翼要地芷江，即被置于我进攻矛头之下。芷江，山峦重迭，地势险峻，素有“滇黔门户，西楚咽喉”之称，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在芷江建有较大的飞机场，成为江南有名的空军基地。抗战胜利时间名中外的芷江洽降就在这里举行。长沙和平解放后，黄杰率其湖南逃亡政府也迁到这里。为了歼灭芷江之敌，我38军在辰溪、麻阳稍事集结后，于9月底分3路包围芷江，以112师由麻阳直插芷江以南地区，切断敌南逃或西窜之路；114师尾随112师跟进，以一个团进到芷江便水，阻击可能来援之敌，师主力则沿沅水南北两岸东进，进逼芷江正面之敌；151师经麻阳的高村进占芷江唐家桥以西高地，向西包围芷江。113师首先歼灭当面花桥、游家坳敌，然后会歼芷江逃敌。这时，我已到13兵团上任。为确保这个战斗的胜利，我们向指挥员提出了湘西作战的任务和要求，并要求他们进行充分的战斗动员，做好各项战斗准备工作。要攻下芷江，必先攻下花桥。9月30日，我338团即由辰溪长冲出发，向敌左翼迂回，于10月1日前进至花桥以南，拟向花桥守敌背后发起猛攻；339团一个加强营也于30日由中秋铺出发，向敌右翼迂回，于10月1日到达花桥东南500高地隐蔽；337团全部并附师两个炮兵连拟从正面攻击，首先歼灭游家坳之敌，继而向花桥攻击前进。10月1日凌晨5时，所有参战部队都按时到达指定位置。6时50分，337团和炮兵连即从正面向花桥发起攻击；338团和

339 团均按计划由敌侧后奋力进击。花桥守敌数次向东突围，都遭我左、右侧部队迎头痛击。由于部署周密，指挥得当，部队英勇顽强，当天上午 10 时即结束战斗。除敌一个外线警戒连逃跑外，其余均被歼，俘敌上校团长王光亭以下官兵 1200 余人，毙敌 120 人，创造了干净彻底歼灭敌人的山地战斗范例。当花桥守敌被我全歼，我主力逼近芷江时，敌 17 兵团司令刘嘉树察觉我兵力强大，便于 10 月 1 日慌忙率兵团司令部和 100 军主力及省政府机关从芷江南逃。1 月 2 日，112 师进占芷江，114 师和 151 师分别进至芷江附近以东和以西地区。38 军指挥所于当天进入蓝江城。刘震副司令兼军长、吴信泉政委率领的 39 军，于 9 月 13 日由石门、公安一带分成两路纵队向湘西挺进，奔袭黔阳。其左路 117 师、152 师取道澧县、常德、烟溪、淑浦，直插黔阳江部的江口；右路的 116 师、军直机关、115 师取道石门、桃源、沅陵、辰溪、怀化，沿湘黔公路向黔阳攻击前进。10 月 2 日，左右两路大军先头部队分别到达淑浦以南、怀化以北地区，向江口、黔阳奔袭。左路前卫 117 师在崎岖的山路上勇猛奔袭。经过远距离艰苦行军，315 团进至黔阳的湾溪、大坪。349 团进至积木槽，315 团进至江口。在这一地区，与敌接触，歼敌一个加强排，俘敌 120 人。缴获汽车 2 辆。该师随即翻过海拔 1800 米的雪峰山。向黔阳发起攻击。152 师南下绥宁的瓦屋塘附近，准备阻击宝庆方向可能西援之敌。右路前卫 116 师向怀化前进时，芷江、怀化守敌已向黔阳逃窜，右路主力随即配合 38 军 112 师向黔阳追击。其前卫 348 团经一昼夜 100 多公里的急行军，于 3 日逼近黔阳，发现敌尾随部队正在渡江，立即向敌发起攻击。跳水夺船，乘胜追击，占领安江（现黔阳县城）。10 月 4 日，348 团和左路的 117 师在安江胜利会师。安江地处雪峰山下，湖南第一纺织厂就座落在城郊。部队进城后，严格执行城市政策，担负警卫纺织厂、仓库、银行的工作。与此同时，116 师以 347 团为前卫，继续向洪江追击，于 4 日占领洪江，敌已向会同方向溃逃。346 团于 3 日到达黔城（原黔阳县城）后，发现敌人封锁了江口，立即选敌薄弱部强渡沉水，当夜急行军 60 公里，于 4 日凌晨在洪江至会同之间的岩脚附近截住逃敌。岩脚地处峡谷，该团 2 营先占领了岩脚两侧高地，切断了敌人逃路，并以六炮向敌袭击，将敌最前面的一辆汽车击中起火，堵塞了逃路，然后该部发起进攻，将敌截成数段。此时从洪江南下尾追逃敌的 347 团亦已逼近。在我军前后夹击下，敌首尾难顾，敌 100 军直属队、103 军一部及湖南省逃亡政府人员共 4000 余人，被迫全部投降，共缴获汽车 80 余辆，各种枪（炮）500 余支（门）。38 军 112 师继续向会同、靖县方向追击，于 4 日占领会同，5 日占领靖县。至此，我兵团完成了切断湘南敌人西窜之路的任务，有力地配合了衡宝地区的正面作战。

当我兵团湘西作战时，衡宝正面战场已于 10 月 5 日拂

晓突破敌人第一线防御，推进 20 多公里，控制了渣江至界岭一线阵地。白崇禧趁我立足未稳之际，急速集中兵力反击，并将其 305 师和暂一师西调武冈、常宁，加强保护其右侧安全，企图阻我右路兵团东进。据此，四野司令部命令我兵团迅速东进，求得先敌到达武冈，攻占该城，进而配合中路我军歼敌于衡宝地区。我兵团接到命令后，即令 38 军、39 军挥师东进。10 月 6 日，39 军 152 师从绥宁的瓦屋塘出发，昼夜兼程向武冈疾进。7 日，到达武冈城郊；117 师从黔阳出发，也昼夜兼程向武冈疾进，于 9 日上午 8 时抵达武冈城郊与 152 师会合。

占领洪江后，兵团部进入该城，后移驻安江县城指挥。

我站在安江附近遥望，东南不到 100 公里就是武冈，就是 20 年前红 7 军进湘时打第一次硬仗的那个武冈。那一次，红军作战多英勇啊！可是由于敌人援兵忽至，又有飞机配合，最后，我们撤退了。许多战士，尤其是 24 岁的团长何莽同志牺牲在城下！现在，我们兵团的 39 军正集结在洞口。作战地图上标出的两个巨大的红色箭头，像刚刚搭在弯弓的弦上，一放手就会朝南射去。我们这次进攻的路线，大体上是当年红 7 军活动和出桂北上的路线。

10 日早上 8 时 40 分，攻城战斗开始。经过一小时激

战，全歼守敌 63 师 189 团及该师炮兵连、14 军留守人员等 2700 余人，其中俘敌 63 师副师长黄范以下 2400 余人，缴获各种炮 20 门、汽车 5 辆、轻重机枪 46 挺、长短枪 1900 余支。

10 月 7 日、8 日，当 39 军围困武冈时，38 军分南北两

路纵队向东进发。北路 114 师、军直、军后勤由芒江出发，经榆树湾、安江向祁阳西北方向前进；南路 113 师、112 师分别由黔阳、会同出发，经洪江向祁阳西南方向前进，151 师留守芒江一带，负责湘西防务。先头 114 师以两天半急行军，冒雨急进 130 余公里，12 日 10 时进至武冈之竹篙塘一带。因 39 军已于 10 日占领武冈，敌 14 军军直机关及 62 师、10 师西逃之路已被切断，进退两难，只得逃至石下江一带。敌 62 师已被迫同 39 军谈判，但又拒绝向我投降。兵团令 114 师和 39 军 117 师 351 团正面出击，39 军 115 师主力由武冈高沙向石下江方向突击。各部队采取军事打击和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手段，将敌 62 师全歼，并迫使敌新编第 8 军第 1 师 400 余人投降。这次战斗共俘敌 2900 余人，缴获汽车 30 余辆。112 师占领城步。湘西作战自 9 月 13 日在常德发起，至 10 月 13 日竹篙塘之战结束，历时整整一个月。在这一月时间内，我兵团指战员发扬了英勇顽强的精神，特别是在我们追敌途中传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喜讯。大家受到巨大鼓舞，战斗情绪异常高涨，纷纷表示要克服湘西大山地区的重重困难，以长距离的迂回，日夜兼程的高速追击，歼灭白崇禧，向新生的共和国献礼。湘西作战，共歼灭了白崇禧 62 师、63 师全部，100 军、103 军、新 8 军各一部，共 1.8 万余人，迫使当地土匪武装投诚起义 8000 余人，解放湘西 12 座县城，有力地配合了衡宝战役正面战场的作战，为进军广西造成了有利形势。

打回广西

同年 10 月，我兵团根据四野司令部的命令，分别在安江、洞口、武冈地区就地休整，待命向广西进军。兵团司令部已于 10 月初进驻安江。白崇禧集团在衡宝地区被我四野歼灭 4 个主力师后，即将其剩余主力 15 万人龟缩于广西全州县、桂林及以南地区，妄图作垂死挣扎。此时，我二野进行的广东战役已胜利结束。我湘西、湘南、广东三路大军，遵照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关于广西战役的指示，紧跟敌踪，形成了北、东、南三面对桂系者巢广西的包围，将其完全置于我军攻击矛头之中。白崇禧部队已成为在华南地区最后残剩的一个孤零零的集团。

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在广西已盘踞了近 30 年。他

们长期对各族人民进行残酷的压榨，横征暴敛，穷兵黩武，打着“建设广西”的旗号，极力推行“自治、自给、自卫”和“寓兵于民，寓将于学，寓征于募”等反动政策。并且用封建地域观念和狭隘的地方主义，对群众进行欺骗宣传，煽动群众的排外情绪，摧残少数民族，用保甲制度来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广西的各族群众长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阶级矛盾异常尖锐。

广西各族人民具有光荣革命斗争传统。压迫愈深，反

抗愈烈。近百年来，广西各族人民为反抗殖民主义和封建统治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如太平天国运动、抗法斗争等。尤其是党领导的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和建立的红 7 军、红 8 军，曾狠狠打击了封建统治势力，建立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后来根据地虽然丧失了，但在广西的土地上留下了革命火种。直到解放大军进入广西前，仍保持着我党领导的地方武装。为迎接解放大军人桂，他们曾派人到安江与我们接头。在交谈中，我了解到留在广西坚持斗争的同志，其处境十分艰险、困难，有的失掉了党的联系，有的被捕被杀，也有极少数人投敌叛变了。尽管斗争多么艰难曲折，但广西的革命红旗始终没有倒，终于迎来了解放之日！这使我想起了我所知道的一段重要史实：西安事变后，为团结抗日，我党与国民党进行第二次合作。在这一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南方数省的革命武装队伍面临着不同的境遇和考验。由于当时交通不便，和中央联系十分困难，对党中央抗日统一战线的精神理解不全面，带来的后果也是各种各样的，其中有许多沉痛的教训。就广西来说，当时，阴险狡猾的“小诸葛”白崇禧，先发制人，接过我党统一战线和团结抗日的口号，于 1937 年秋，把韦拔群同志牺牲后右江地区恢复发展起来的革命武装 3000 多人、600 多支枪骗出去，说国共两党合作抗日了，要他们出来打日本，被分别编成国民革命军第 8、第 9 独立团。党中央得到这一消息后，即派张云逸同志从西安赴桂林找白崇禧交涉，要他交还这支队伍，但这只“白狐狸”却拒不见面。1938 年春节后，这支队伍被拉到江苏徐州，有的被编入桂系部队，有些则在台儿庄用土枪与日军“决一死战”。结果，这些满腔热血的抗日志士，几乎全部牺牲，只剩下 20 几个人经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辗转到延安。那时，我在延安任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曾接见他们。还有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同志及总政治部、组织部的同志都接见过他们。张云逸同志生前在北京时，也曾和我谈过这件不幸的事。为了防止白崇禧率残部逃往国外，于广西境内歼灭这股残敌，中央军委作了周密部署：以四野我 13 兵团为主力组成西路迂回部队，由湘黔边沿黔桂边猛插广西西部，关闭敌经贵州西逃云南的通道；以二野 4 兵团和四野 15 兵团 43 军为南路，进至信宜博白一带，防敌往雷州半岛逃窜海南岛，与西路军构成对白崇禧的钳形

合击态势后，以重兵从桂北正面展开强大攻势，迫使敌与我决战，达到大量、彻底歼敌之目的。我们兵团在湖南安江休整待命时，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于11月初从衡阳发来电报，令我们西路军13兵团准备全部搭汽车前进，来一个大迂回——由安江直插贵州的富禄、榕江，尔后折向广西的河池、东兰、百色、龙州一带不让敌人逃到越南去。我看完电报，心里嘀咕开了：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的办法对付“本钱小、占地利、极机灵”的白崇禧，这是毛泽东同志提出来的战略指导思想，无疑是正确的。但在实际指挥上，应考虑具体情况。

20年前，我是红7军军部参谋。除了从安江到榕江这一段路程外，其它地区的地形情况，我大体是知道的。当年我们转战这一带，有几条河，多少道山梁子，我还有些印象。现在，不要说一个兵团十多万大军，就是一个师、一个团的机械化开进，道路问题、车辆问题（短时间哪里去找那么多可靠司机）、汽油问题、防空问题、给养问题，都很难解决。林彪要我兵团全部搭汽车前进，这是很不实际的。鉴于这种情况，兵团司令员程子华同志和我等几位领导同志进行了认真研究，决定给林彪发一电报，提出我们的看法和意见。不久，四野总部发来电报，同意我们的意见，不再要求我们乘车迂回。

这样，悬在我们心头上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哪知就在我们整装待发之际，林彪又来了一个电报，要我们兵团司令部随39军爬老岭山插柳州。这真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又给我们出一个难题。

因老岭山陡路窄，下雨泥泞难行。而我们兵团指挥所原是乘汽车的，若爬老岭，势必步行，电台不能畅通，不便与各军间的通信联络，兵团很难履行指挥职能。我们想再发一个电报提出意见，但又觉得林彪的第一道命令被我们顶回去了，这次再顶，似乎不妙。那时，四野政委罗荣桓同志早已去北京开会，我们更感到为难。恰好这时中央调我兵团副司令彭明治同志去北京，准备出任驻波兰大使。我们便让他经过衡阳时，向林彪转达我们的意见，效果可能会好一些。他到四野总部后，当面向林彪陈述了我兵团几位领导同志一致的意见，据理力争：要么放弃兵团指挥，徒步随39军开进；要么兵团组成一个车队，沿安江——衡阳——桂林一线公路前进，建立行进中的指挥所，在行进中实施指挥。最后，林彪总算接受了我们的意见。

11月6日、7日，担任西路战略迂回的38军、39军，从湘西南的洞口、武冈向西秘密出发，进入湘黔桂边的苗、壮族地区，奏响了广西战役的序曲。10日，这两个军先头部队第151、116师分别袭占靖县、通道，敌第103军即沿黔桂边西逃，我军尾随追击。

接着，我116师于12日、13日先后占领永从、从江，115师于13日、14日占领黎平、榕江，15日尾追敌第17兵团楔入广西。其路线正是当年红7军出桂北上时走过的路线。这时，49军也归13兵团建制，进入桂北。位于湘桂路两侧我中路军的第41军，于11月14日开始移驻安江、新宁、全县一线后，按兵不动，尽量示弱于敌，以免惊动敌人。挺进粤境的南路军，以二野第4兵团的第13军先行，分头占领了廉江、信宜、吴川之线，其主力则隐蔽集结于罗定地区。

这时，白崇禧错误判断南线我军孤军深入，兵力不强，企图利用我正面进攻尚未开始之机，调集主力，联合余汉谋残部，发动“南线攻势”，夹击我南路军，控制粤桂边沿海地区，打开逃往雷州半岛和越南的通道，以挽救其覆灭的命运。白崇禧在其动员令中说：“此次南路攻击乃我生死存亡的关

键，胜利则大量美援立即可获，败则涂地”。白崇禧的部署是：令其主力第3兵团、第11兵团（鲁道源兵团）由桂东北向玉林、容县方向秘密调动；其第1兵团由桂林以北地区调往南丹地区，以迟滞我西路军迂回南下；其第17兵团抢占百色，策应南线作战；逃至合浦、北海、灵山地区的粤军余汉谋部2万余人回头东进；华中军政长官公署也从柳州撤至南宁。敌人的这个部署和企图，为我所识破，决定将计就计，诱歼此敌。

11月24日，毛泽东电示林彪、陈赓（二野4兵团司令员）：“这是歼灭该敌的好机会，为此请你们注意：陈赓所率4个军除1个军仍照陈赓前部署，由罗定、容县之线迂回敌之左侧背外，主力似不要进入广西境，即在廉江化县茂名信宜之线布防，置重点于左翼即廉江化县地区，待敌来攻而歼灭之。同时以一部对付余汉谋之配合进攻。”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我野司即令4兵团13军配属14军42师集结于廉江、化县之间地区，构筑阵地，坚决阻击敌人；令4兵团主力迅速进至信宜、茂名南北地区隐蔽集结；令在广州地区的15兵团之43军，日夜兼程，秘密西进，至信宜东北之东镇城一带集结；令我西路军一部改向思恩、柳州方向急进，尔后突过红水河，攻取宾阳，直插广西心脏地区，一部则继续向果德、百色前进，追歼西窜之敌；令中路军即速大举南下，向梧州、荔浦等地攻击前进。接到四野司令部命令时，我13兵团指挥所正经衡阳向桂林一线运动中，因此，得以及时调整进入桂北地区的两个军的行军路线。

除令38军之先头部队继续向百色前进外，由梁兴初军长、梁必业政委率军主力转向德胜前进；兵团副司令兼军长刘震、政委吴信泉率领的39军则停止西进，立即南下，军主力分路向柳州、宾阳急进，插入广西心脏地区，以求在由桂林南逃之敌的道路上布设层层防线予以拦截；命令115师以每日70公里的急行军抢占珠玉塘渡口，搜集船只，保障主力顺利渡过浔江，继续向南急进。在这样的形势下，如果兵团随39军插入柳州，甩在深山老林里，电台发挥不了作用，野司虽可越级指挥，但不能及时掌握战场情况的变化，将是很被动的。我兵团部从安江出发的时候，程子华司令员奉命调回北京，这样，进军广西的任务就落在我的肩上了，深感责任重大。当年红7军离开广西时，我们就相信一定会打回来的。20年过去了，今天我率部解放家乡，是20年打个来回啊，心情格外激动。

兵团指挥所随即沿宝庆向桂林开进。后来，兵团所到之处要出安民告示，发布告，兵团没司令员，是个缺憾。于是我发电报请示，上级命黄永胜为代司令。

沿湘桂铁路南下的中路第41军，在其军长吴克华、政委欧阳文率领下，以日行60公里的速度向桂林急进，于11月22日解放了当时广西省会桂林。接着由钟伟军长等率领的49军进入桂林，控制桂林地区。由12兵团副司令兼军长韩先楚、政委罗舜初率领的40军，于25日解放桂东重镇梧州。至此，以粉碎敌“南线攻势”的钳形包围已经形成。

11月27日起，我南路兄弟部队以出其不意的强大攻

势，在粤桂边发起第一次大围歼战。经过6天激战，粉碎了敌人的“南线攻势”，相继解放了陆川、容县、北流、玉林、博白等县城，歼敌白崇禧部第3、第11兵团大部 and 余汉谋集团残余第13兵团大部，击毙第11兵团副司令胡若愚，俘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第3兵团司令张涂、粤桂边“剿匪”总指挥部中将司令喻英奇等。

这时，广西局势急转直下，敌人整个部署全部打乱。白崇禧急令其第3、第11兵团残部向合浦、钦州撤退；令其第1兵团集结于南宁及其以东地区，掩护其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向钦州撤退；并令其第10兵团火速赶往钦州，以掩护各部渡海逃窜。为了彻底打破敌人外逃的企图，我各路大军在“活捉白崇禧”、“决不让敌人跑掉”的口号下，齐头向南急进。我西路39军不顾一切疲劳，日夜兼程，追击歼敌。

11月25日解放柳州。

12月1日解放上林。

2日解放宾阳。

3日，越过昆仑关，击溃九塘南北地区的敌人。

4日晚，进占桂南历史名城南宁，缴获汽车400辆，炮艇3艘。当夜，南宁全市灯火通明。工人、学生连夜贴标语，挂横幅，刺绣五星红旗，欢迎解放军进城。

南宁解放时，我兵团部尚在桂林。我去电南宁，询问39军进城情况，得知大革命时期遗留下来的革命者孙醒侓、杨赐璋等人在地下党领导下，已纷纷出来参加接管城市工作，我听后很高兴。

在桂林稍停一天后，兵团指挥所即向阳朔进发。到阳朔时正是傍晚，漓江上的奇峰倒影，在晚霞映照下，秀美旖旎。此时北国已是冰天雪地，而这里却是山青水秀，鸟语花香，令人心旷神怡。“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山水甲桂林”，由于担负着急速追歼残敌的任务，羡慕了数十年的阳朔山水也无暇览胜。次日晨即绕道赴柳州。因铁路、公路均被敌人破坏，我们绕了好大一个弯子，一边修路，一边行军，还要用船只摆渡过江。

整整走了两天，才到达柳州。我兵团指挥所共有一二十辆汽车，领导同志每人乘坐一辆吉普车，除警卫员外，我自己带着一支手枪，一支卡宾枪和一支自动步枪。

另外，每个兵团首长还配一个武装排，各乘一辆中卡车跟随。警卫排除带机枪和自动武器外，还携带六炮，指挥所的战斗力是很强的。如遇敌情，就可单独作战。在柳州住了3天，一边指挥肃清残敌，一边与地下党联系，布置接管城市工作。并向国民党被俘军官训话。之后，我又率兵团指挥所向南宁前进。沿途所见敌军溃败之象，真是难以言状。被打散的敌军官、太太，以及残兵游勇，无一不被路遇的群众剥得赤条条的。有的被捆绑起来，弃置路旁；有的用稻草围着腰部，跟在我们的队伍后面，不敢离得太远，他们怕当地老百姓甚于我们解放军。从这里可以看出广西人民受迫害之深和对敌人仇恨之烈。当我们兵团指挥所的车队埋锅做饭时，路旁便有不少这些赤身露体、饥渴不堪的残兵游勇伸出颤抖的手来要饭，我们每餐不知要“接待”多少这样的人。回想20年前，他们追击我们红军队伍时，是那么如狼似虎，岂料今天落得如此下场，历史真是无情的审判官！我兵团39军占南宁后，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除留116师347团警备南宁外，主力于次日渡过邕江，沿邕（南宁）钦（州）公路疾驰，配合13、14、40、43、45军等兄弟部队，进行粤桂边第二次大围歼战，聚歼逃敌于钦州以北地区及灵山东北地区。我兵团38军完成了远距离战役迂回任务后，在滇桂黔边纵队桂西区指挥部所属部队的积极配合下，先后解放了桂西重镇百色等10多个县城，封闭了敌人逃往云南、贵州的通道。白崇禧不愧为“小诸葛”，在我南下大军入桂时，为预备日后逃窜，修好了龙州通往越南的公路。12月8日，也就是粤桂边第二

次大围歼战胜利结束的这一天，白崇禧给其“副长官”夏威和桂系残敌首领发了一份密电。电称：“为将来发展生存计，组织越南志愿军，以武鸿卿（越南国民党人）为总司令，徐启明（白崇禧第10兵团司令）为副司令，谭何易为第3军副军长，姚槐为第2军副军长。军、师长人选尽量由越方推荐，原任军、师长可暂任副职，以资号召。政治上拥护保大（越南的傀儡皇帝），军事上与法军合作，求胡志明主力而攻略之。若敌军尾随攻犯，则成国际复杂问题，美国不能坐视，于我有利”。这是白崇禧苟延残喘时制定的一个罪恶计划，意在投靠越南的傀儡政权保大，以保存实力，并不借拱手将自己的部队归保大的反共将领武鸿卿指挥。为了粉碎白崇禧的罪恶阴谋，我兵团39军与兄弟部队13军和43军在粤桂边纵队第3支队、滇桂黔边纵队左江支队的积极配合下，日夜兼程，不顾阴雨路滑和饥饿疲劳，勇敢追歼企图逃窜越南之敌，先后解放了桂西南的龙州、上思、思乐、明江、宁明等县。12月11日，进占中越边境要塞镇南关（今友谊关），标志着广西战役的胜利结束和广西全境的解放。“美不美，家乡水”。我们兵团指挥所离开柳州后已乘车走了两天，离可爱的家乡——南宁越来越近了，我的心也跳动得越来越厉害了。因南宁是我的出生地，是我童年的摇篮，是我革命生涯的起点。在南宁，既有深沉的母爱，也有当年莘莘学子共同追求革命的真挚友情。大革命的锻炼，国民党监狱的铁窗生涯，促我投笔从戎，走上革命斗争的戎马之路。随红7军主力离开广西后，20年来，家音断绝，母亲早已病逝，南宁沦陷时，在日寇蹂躏下，大兄文驹被日寇杀害，父亲在逃难中活活饿死在床上。想着这一切，在离南宁的最后一段行程中，我的心情实难以平静下来。而偏偏在离南宁45公里左右的迁江时，我的右腹突然胀痛起来。车队没有军医跟随，只有一名卫生员。他给我检查一下，右腹靠下压疼，很快疼痛加剧，说是急性阑尾炎发作，没有其它药品，只给我服消炎片。加上从迁江至南宁的公路全被破坏，一个工兵连在前面修路，修一段，车子走一段，真是急死人，随着汽车的剧烈颠簸，我的阑尾更加痛得厉害。那天晚上，我痛得不能入睡，心想：20年好不容易盼着打回来，难道我等不了这一天？20年的艰苦斗争都过来了，这最后几十里我就走不到么？我不相信！第二天早上，继续赶路。我的肚子仍然发痛。车子走走停停。一路上，我看到：敌人逃跑时遗弃的辐重车辆，有的汽车轮胎正冒着蓝烟；那些被缴了械的桂军及其家属散失在路旁，脸上浮现着惊恐和泪痕。在路旁一根被剥光了皮的大树干上，写着这样一句话，“××：我在前面三岔路口等你。你的爱妻”。竟引得我们哑然失笑。我终于回到了故乡的身边。挨近南宁的北门时已是黄昏，一簇簇带血色的晚霞还留在天际。我没料到会从北门进城。这里曾是敌人杀害革命者的刑场，它激起我心里无比悲痛的回忆，一幕幕悲壮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同我一起被捕的罗如川、周国杰、雷沛涛、高孤雁、李仁及、张铮、周飞宇、雷天壮、何福谦、梁砥、莫品佳、梁六度、陈立亚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国民党左派人士和革命群众就在这里的敌人枪口下壮烈牺牲，血溅北门城外；广西农民运动先驱、右江革命根据地创建者之一的韦拔群同志，于1932年10月19日在东兰被叛徒杀害后，敌人曾把烈士的头颅挂在北城门上“示众”。我翘首仰望曾悬挂着烈士头颅的残破城楼，深感自己进城后责任的重大。我想：如果烈士们的英灵有知，看见我们浩浩荡荡的胜利大军回来了，他们也会含笑九泉吧！当年红7军老战友卢绍武、谢扶民等同志也随军打回了广西。初进南宁，我先被安排在川西路（今

民主路)一个原商人的房子里住,十几天后搬到桃园路靠近邕江的原国民党一官员住的小院子里(今广西军区机关)。大家听到我回来了,一时间,我的住所门庭若市,从革命军烈属,到家人亲戚朋友,来往不断,有人间长问短,也有些人向我询问自己的丈夫、兄弟参加红7军后的下落。我们红7军离开广西时共有7000多人,后来到中央苏区时1300多人,绝大部分都牺牲了,有的连姓名都没有留下,更甭说有什么下落了。见到他们的亲人,看着他们一双双期盼的眼睛,我如哽在喉。作为一个幸存者,我非常怀念那些牺牲了的红7军战友们!有一天,我抽空回亭子探望家人,九姑鸾恩、大姐碧云、二姐湘菱、八妹湘萍、三兄文骥、四兄文骥、七弟文骥、四嫂月娥及晚辈儿女都盛情迎接我。兄弟姐妹见面,都非常激动和高兴,有的亲昵地叫我“阿万”,有的呼我“阿六”(我排行第六),或“六哥”、“六弟”。不少乡亲朋友闻讯也赶来看我,大家眼里含着激动的泪花,问这问那,充满了亲情、乡情。我想,若当年盼望儿子闯世界的妈妈还健在的话,那该是多么高兴啊!我环顾家里的变化,看到房子破烂不堪,有两间小房被日军烧毁,无力修复。屋子里空空荡荡,连一把椅子都没有,洗脸毛巾也是一块破粗布充当。吃饭的碗筷也得轮流使用。让人看了真有些凄凉!这也是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摧残中国人民的一个缩影!在亭子,我也抽空去看望原南宁一中我的老师杜善庭和我父亲生前好友雷际云,询问他们的家庭及生活情况。他们都很高兴,说共产党不忘故里。广西解放了,人民翻身了,当年的红军又回来了。弹指20年,打了一个来回。

第十二章 建设新广西

接管南宁

历经磨难，千疮百孔的南宁，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1949年12月4日，我兵团39军116师解放南宁，随即与南宁地下党组成南宁市临时治安委员会。12月中旬，我率兵团部抵达南宁。进城后，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迅速接管城市，建立人民政权。12月2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南宁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我任主任，兵团副政委吴法宪任副主任。该委员会为当时南宁最高权力机关，统一领导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事宜，办公地点与兵团政治部一起设在民生路原广西银行的楼上。南宁市警备司令部也于当日成立。接着，又成立改编委员会，我任主任。在军管期间，我们根据中央关于“接收一切公共机关产业和物资，并加以管制和监督”的指示精神，结合南宁的实际情况，分别派出军代表，对南宁原国民党军政机关、司法、交通、银行等部门和物资实行全面接管，责令其留守人员保管好物资、档案，完整移交。对其旧职人员，按中央指示，实行“包下来”的政策，继续留用。对暂无工作的职员，也发给大米，解决其生活问题，有些分配了工作，如原银行分行长邓绍棠为广西银行第二办事处主任等。12月29日，我主持召开了南宁市各界代表座谈会。我在会上向代表们阐明南宁军管时期的工作方针和任务，号召全市各阶层群众共同努力，肃清潜伏的匪特，维持治安，恢复生产，建立起新的社会秩序。解放后，南宁定为广西省会，成为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省府和广西军区都在南宁成立。其实，早在接到进军广西的命令时，我就电传张云逸，请他去汉口向中南局请示组织广西省委，并建议派陈漫远、李天佑等参加过百色起义的干部入桂工作。1949年9月，正值我军在中南战场胜利进军之际，中共广西省委经中央批准在武汉成立。省委领导班子由张云逸、陈漫远、莫文骅、何伟、李楚离等人组成。1950年1月初，中央决定由我兼任南宁市委书记，孙以瑾任副书记。1月22日，南宁市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和对外办公，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任命我为市长，刘锡山、雷荣珂任副市长。随后，逐步健全下属各级工作机构和各种群众团体，把全市的各项工作纳入正常轨道。市人民政府的建立，标志着南宁历史上第一个人民政权的诞生，在南宁的历史上翻开了新的一页。广西解放后，我的主要工作在省委和军队，任省委副书记、省政协副主席、广西军区副政委，军区党委副书记等职。南宁市的具体工作，主要由孙以瑾、刘锡山等同志负责。他们在解放初期为建立新南宁立下了汗马功劳。1950年1月，召开南宁市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我以市长身份作了《南宁市施政方针及今后三个月的任务》的报告，阐明党的方针政策和当时的形势及市政府的施政方针，提出了肃清匪特、巩固治安、建立革命的社会秩序作为南宁市今后三个月的中心工作。军管会副主任吴法宪作关于接管工作情况的报告。会上还选举产生了市首届协商委员会，我为主任委员，孙以瑾、张景宁为副主任委员。这样的会议，仅1950年就召开了3次，那时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还处在议政性质，但作为党联系人民的纽带，沟通政府与人民的联系，扩大人民政权的基础，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建国之初，由于各条战线亟需大批干部，我们除了依靠南下工作队和地下党的干部，大力培养选拔本地工农干部外，还吸收了一些大革命遗留下来的革命骨干参加工作，如黄道生为改编委员会委员，杨赐璋为邕宁县副县长，孙醒依为妇联委员。同时，根据中央精神启用了一批民主人士，在省里，我们启用民主人士李任仁为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周君实（周国杰烈士父亲，无党派人士）为省府常委，陈此生、莫乃群、张

一气、杨东莼等为省协商会副主席。在南宁任用雷荣珂为副市长，张景宁为市协商会副主任委员。此外，还有方管、陈培元、雷鲲池、周君实等民主人士任市人民政府委员等。这样，既能发挥他们的特长，为新政权服务，又能通过他们广泛团结社会各阶层人士，发展党的统一战线，扩大民主政权的基础。李任仁是白崇禧的老师，在广西有一定的影响，我常到他家里看望，询问他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当了解到他家楼板上有了白蚂蚁时，立即给他调房。他搬出后不久，楼房便塌下来，故他对党很感激，积极工作。实践证明，启用这些人是正确的，长期以来，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能与党同舟共济，肝胆相照，为地方建设作出了贡献。南宁是国民党桂系军阀的老巢，也是全国解放较晚的城市，国民党军政官员、散兵游勇、土匪特务多如牛毛，黑社会势力也十分猖獗。解放后要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必须肃清匪特，彻底铲除国民党反动派的社会基础，荡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解放广西的战役结束后，我们立即着手肃清匪特和收缴民枪的工作。在南宁市，由于驻军和省市机关多，土匪不敢公开活动，但国民党溃退时，曾布置大批敌特潜伏下来。他们造谣惑众，或设赌、贩毒、盗窃，或哄抬物价，煽动群众拒用人民币，或勾结土匪抢劫，骚扰水陆交通，严重破坏我新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

1950年初，广西部分地区发生土匪暴乱时，南宁市的匪特活动最为猖狂。社会上，谣言四起，什么“第三次世界大战已在朝鲜打响”，“国军已在东南沿海登陆”、“解放军要撤回东北”等，弄得人心惶惶，几天之内物价暴涨，人民币流通受阻。为打击匪特的嚣张气焰，安定社会秩序，市军管会、警备司令部、公安局集中力量，连续破获几起潜伏的匪特案件。

2月14日，惩办了潜入南宁市的匪“广西总队”司令施鼎昌、副司令严志仁、军需主任焦同安、特别总队司令陆建平等4名匪特；端午节前，破获匪特“华中长官公署左右江反共别动军驻邕谍报组”，逮捕了主犯苏芬、杨化隆、周汉生等8人。

国庆节前夕，匪“21纵队第6支队”司令梁光等阴谋策划在国庆节那天，向庆祝国庆的游行队伍投掷手榴弹，企图破坏游行，制造混乱。就在他们准备进入市内前杀牛会餐时，被我及时捕获，保障了南宁市第一个国庆节的安全。为了巩固和强化社会治安，我们还实行了户籍管理制度，强令反动党团骨干、匪特和帮会分子自新登记，集训旧职军政官员，清查潜漏敌特等一系列措施，为彻底肃清匪特，维护社会长治久安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此同时，为了配合剿匪，我们还进行了收缴民枪的工作。广西由于长期以来社会很不安宁，匪盗众多，许多人家都有自卫的私枪。

民枪的大量存在，成了社会治安的隐患。在收缴民枪上，省委、军区和地方政府花了很大的气力。南宁市由于有驻军的支持，市委、市政府的宣传发动工作做得好，收缴民枪工作比较顺利。我们挑拣出最好的民枪来武装公安部队、工人纠察队和市郊民兵组织。在这一时期，我们着力革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恶习，明令禁毒、禁赌、禁娼，先后查封鸦片烟馆，关闭赌场，取缔花艇、妓院，把打击贩毒、严惩鴉公鴉婆同教育烟鬼、赌徒结合起来，综合治理社会滴疾，对赌徒令其改行，各操生业；对吸毒者则收监劳动改造，强迫戒绝。对无视法令、挺而走险的走私毒贩，则予以严惩。缉获的烟毒，当众焚烧。南宁在国民党统治下，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设妓院（花艇），纳花捐，卖淫是公开的，仅“公娼”就有180名，花艇104只，多在市区的巨江北岸一带。这些娼妓大都是穷苦人家的女儿，为生活所迫卖身受辱，受尽

嫖客的蹂躏和鸨公鸨婆的欺榨。为了把污秽荡清，我们查封了妓院、花艇，建立教养所把妓女集中起来，一面帮她们治病，一面改造思想，学习正当的谋生技能，帮助她们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些在今天看来算不上什么，但在当年百废待举、经济极度困难的条件下，光管她们吃饭就很不容易了。就这样，我们在整顿社会治安，巩固政权上多管齐下，把解放初南宁的社会混乱状况逐步扭转过来。

广西的剿匪斗争

五星红旗插上镇南关，标志广西全境的解放，但枪声并没有停息。一场保卫新生革命政权的剿匪斗争，在八桂大地上展开了。广西是一个山多、民穷、枪多、匪多的地区。

当地有“无山不有洞，无洞不有匪”之说。国民党溃退前，布置所谓“总体战”，将全省划为5个“军政游击区”，有计划地留下一批正规武装和特务分子。他们与反动地主恶霸武装、惯匪相勾结，汇成一支庞大的政治土匪。他们杀人放火，制造暴乱，对我人民政权构成严重威胁。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公开活动的土匪武装有200多股，约9万人（内有正规军3万多人），为中南6省之最。我率部到南宁不久，便时常收到一些地方匪特袭击我小股部队，制造暴乱，骚扰百姓的报告。据了解，这些土匪不仅受滞留香港的一些桂系军阀头目所遥控，而且得到台湾国民党“小朝廷”的支持。台湾的飞机常常飞到土匪盘踞之地，投下枪支弹药和银元黄金，期望他们有朝一日作“反攻大陆”的内应。镇压暴乱，肃清匪患，是广西解放初期的头等大事。剿匪工作由省委领导。对土匪的政策是执行中央的“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方针。剿匪的军事行动主要由军区负责；反霸和发动群众工作由省委、省政府负责。剿匪必须反霸，反霸才能发动群众，促进剿匪。这两方面的工作互相交叉，彼此联系，因而常常是党政军三方配合行动。最初，省委书记兼省人民政府主席、广西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张云逸同志和省委副书记兼省政府副主席陈漫远及广西军区副司令员李天佑等同志尚未到职，由我组织和临时主持省委工作。不久，他们到达南宁后，我仍负责省委和广西军区的日常工作。我们根据中央、中南军区的指示精神和广西的实际情况，决定省委、军区的工作重点是：发动群众，清剿匪特，巩固社会治安。剿匪是压倒一切的任务。

1950年1月10日和1月24日，省委和军区连续两次联合发出《关于剿匪工作指示》，指出发动群众、武装群众、清剿匪特是全省军民的头等任务，是当前的中心工作，并提出在6个月内肃清股匪。广西军区发布关于剿匪的“军字第一号布告”，申明我们剿匪的决心和政策，号召“全省人民动员起来，配合人民政府、人民解放军，以期最短时间内肃清残匪、惯匪，巩固和平秩序，开始和平建设”。

全省的剿匪工作于1950年1月15日全面展开。中南军区要求我们1950年上半年肃清股匪，下半年肃清散匪，并根据广西的复杂情况，要求我们在剿匪中“政策要稳妥”。

广西军区共抽出10个师另1个团，连同地方武装共14万兵力投入这场战斗。具体部署是：以45军全部和38军的151师、39军的152师等部队担负对宾阳、武鸣、梧州、龙州、玉林5个地区和柳州地区的来宾、武宣、象县（今象州县）的剿匪任务，并负责镇南关（今友谊关）至岳圩之线的边防守备任务；以38军的113师335团担负宜山地区的剿匪任务；以39军的115师担负桂林与柳州两地区之间的护路和剿匪任务。在我军事打击下，匪情开始减轻，大部分股匪溃散到远离城市的深山岩洞潜伏起来，社会秩序转趋安定。这时，我们的剿匪方针临时改变为驻剿为主，军事追击与政治攻势相结合，并结合筹粮发动群众。我剿匪大军狠狠打击仍在顽抗之国民党残余正规武装，取得全歼敌17兵团司令刘嘉树以下7000余人的胜利。部分残敌见势来降。1月23日，敌桂西军政司令官莫树杰率其所部官兵1300多人到金城

江接受我人民解放军的和平改编。到1月底，全省收降改编残敌正规武装20股，计1.4万多人。然而，就在这时，一股土匪暴乱的逆流却在暗中涌动。

1月25日，恭城县上空响起了密集的枪声。以原国民党退役中将军长钟祖培（北伐时的师长）为首的“恭城人民反共救国军”，胁迫群众4000多人举行暴乱，将我驻各乡小部队及政府工作人员全部杀害，次日上午，匪徒包围了县城，并一度攻入县城。我守城部队只有一个排，加上县大队地方武装共150人。他们英勇地连续打退敌人多次进攻，坚守4昼夜，至30日，我援兵赶到，歼匪一部，其余溃退。

这次离广西解放仅45天的恭城暴乱，其规模之大、人数之多、手段之残忍，震动了省内外。接着，玉林、梧州、平乐等地也发生了严重的土匪暴乱，被杀害的干部群众达3000多人，损失公粮约40万公斤。

面对武装匪徒的猖狂暴乱，我们迅速派出部队镇压匪乱，杀了钟祖培等一批匪首骨干。同时，召开省委会议，重新认识匪情，调整剿匪部署和对策。

3月23日，军区发出“军字第二号布告”，坚决严惩暴乱首要分子，重申“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号召各界群众合力清剿匪特。省委还于3月23日至31日召开了剿匪中的第一次高干会议，省委、军区、各地委、各军分区主要负责人出席了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总结两个多月剿匪工作，研究当前和今后的剿匪方针。会上，大家分析了目前的剿匪情况和土匪暴乱原因，有的说，过去对土匪的破坏性估计不足；有的说，分散驻剿，容易受土匪的牵制和袭击，不能形成有力的拳头出击；有的说，这次土匪暴乱，是敌人利用我们征粮工作上出现的偏差和春荒之际，以“反北佬”、“反征粮”等反动口号，煽动群众闹事，这也提醒我们在筹粮时必须注意政策，做好群众发动工作，以孤立匪特。

大家各抒己见，共商对策，最后大家的意见集中到两点：一是剿匪工作必须与建立改造乡村政权以及解除地主富农的武装结合起来，这样才能挖掉土匪的根基，发动群众，形成军民联合剿匪局面；二是改变分散驻剿的方针，集中兵力重点进剿。按照会议新的部署，集中优势兵力，迅速平息了各地土匪暴乱。5至7月间，调派8个团的兵力，重点进剿桂东地区的十万大山、六万大山、大容山、圣堂山等地的股匪，为加强剿匪和发动群众工作，省委和军区决定以45军为主，成立“广西桂东南党政军委员会”。经过3个月的重点进剿，先后歼灭了匪“广西左右江反共别动军”第5师800多人，宾阳地区“反共救国军十二纵队”司令陈洪豪所率700多人，大容山区“桂南反共救国军”所属暂1军军长庞积善以下2400多人，“桂南反共救国军独立兵团”第2军军长朱光奎、副总指挥李扬威等股匪，基本上摧毁了大容山区、六万大山区、圣堂山区等地股匪，取得了歼匪3万余人的胜利。

4月20日，我写了《广西四个月剿匪初步总结》，肯定各剿匪部队的功绩、经验，指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教训，号召“全体党、政、军、民，更大的提高剿匪积极性，通力合作，为完成剿匪任务，安定社会而斗争”。后发表于5月5日的《广西日报》上。

在此期间，我陪张云逸同志到武汉出席中南军政委员会会议时，曾两次向中南局汇报剿匪情况，中南局同意广西剿匪的部署和安排。中南局领导人林彪、邓子恢还嘱咐我们：广西情况复杂，政策要稳一点。

1950年6月，美帝发动侵朝战争，并侵占台湾。广西土匪又猖狂起来，

他们与台湾国民党遥相呼应，谣言惑众，蠢蠢欲动。面对国际上大气候的变化和匪患抬头的情况，省委、军区的主要负责人都很着急，大家常聚在一起，分析各种原因，总结经验教训，以便把下半年的剿匪工作搞上去。

当时，我也提出了几点看法。我认为1950年上半年的剿匪斗争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剿匪进展不快，这里面有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的原因，而主观原因是主要方面，这就是我们有一些问题还没有很好地解决。

关于部队地方化问题，早在1949年12月10日，省委、军区已联合下达《关于主力部队地方化初步指示》，并以一部分主力地方化，建立了10个军分区。问题是部队的思想没有打通，存在“广西苦不愿干”、“不愿下乡”等情绪，加上部队多是北方战士，不习惯广西气候炎热的环境，愿打大仗，不愿剿匪打小仗，对剿匪斗争亦缺乏经验。在剿匪政策上，主要方面是好的，执行政策比较稳妥。我们贯彻落实毛主席关于“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匪首和顽固的反革命分子，也适时地争取了一批股匪来降。但一些地方和部队在掌握政策上有宽严失当的现象，有的土匪抓了因不知是土匪又放了，有时因抓得大多没地方关押，经初步教育，也放了；另一种是乱打、乱捕的现象，因为广西枪多匪多，“匪民难分”，在行动上就出现了乱抓乱捕，匪民不分的情况。当然，有一个客观原因，那就是土匪暴乱时往往裹胁群众参加，例如在二三月间土匪暴乱中，参加者中有六七十岁的老大婆，也有十四五岁的孩子。主观原因是由于我们看不到这种现象正是土匪的罪恶造成的。帐，该算在土匪身上。还有的部队筹粮给老百姓打白条，有的不给就抓，老百姓有枪就打，这样抓住就定为土匪。对筹粮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我们要求部队用现钱购买，不打白条。那时，陈赓兵团路经广西去云南，也曾发生一些购粮打白条的现象，我与陈赓同志商量，部队购粮时一定要给现钱。为了解决他们的困难，我从兵团的家底中拨出约合两万元大洋的金子支援他们，解决了他们筹粮用款问题，也缓和了在筹粮中与人民群众的矛盾，打破了敌人“反筹粮”的阴谋，使陈赓兵团顺利地通过广西。我在3月高干会议上讲了这些问题，要部队引起注意，在《广西四个月剿匪初步总结》的报告中，我也专门指出了这两种偏向的危害和纠正的办法，希望能纠正这些错误。如何处理民枪也是一个大问题，我和几位领导专门讨论过，记得中南局领导曾叮嘱我们：广西情况复杂，政策要稳妥谨慎。考虑到广西历来匪多，匪多枪就多，老百姓有枪是保家护院用来自卫，当然也有用来械斗、抢劫的，各种情况都有。而枪多，匪也多，民枪可以转为匪枪，两者有时互为因果。因此，剿匪必须收枪。广西百姓差不多家家有枪，爱枪如命。收枪在当时农村基层政权尚未建立起来的情况下，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需要有一定的条件，就是我军到达之处，新生政权才有权威，才能收到成效。军队未到，出了布告，也很难收到效果。因此，我们采取区别对待的办法，凡我军到达之地，则由当地政府出面用“枪换肩”的形式收缴；我军未到达之地暂不宣布收缴。这样做收到了一定效果，特别是大中城市和我军到达之处，收缴民枪比较顺利，但军队未到的地方，枪还收不上来。出布告反而打草惊蛇。剿匪必须发动群众，否则难以取得预期的胜利。省委、军区对这个问题一向比较重视，先后发布过《关于在驻剿中大力发动群众的指示》、《关于保护夏收夏种的指示》等，从多方面入手调动群众的剿匪积极性。我对广西的情况比较熟悉，经常要求部队采取一些措施，加强同地方党政部门和当地群众的联系，如召开座谈会，和

地方同志研究匪情；深入乡村群众家中宣传剿匪政策，帮助群众解决生产和生活上的实际困难，消除群众的顾虑，发动群众起来抓匪。但由于语言不通，情况不熟悉，加之尚未进行土改，群众还没有完全发动起来。客观上也存在一些原因，主要是匪患重，兵力不足。开始，部队只能占领大中城市和城镇，山区都控制不了。那时，还要抽一个师护送 500 辆大汽车，从来宾县至镇南关（今友谊关）向越南运送战备物资，支援胡志明。1950 年 6 月以后，由于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38 军要调离广西，兵力更加单薄。我几次向省委建议，请中南局、中南军区考虑给广西增派部队。张云逸和我到中南局开会时也提出了这个要求，后来便有 21 兵团（3 个师）由湘入桂参战一事。根据匪患和兵力情况，开始剿匪时，只能在大中城市和重点县城，并照顾到重要公路和水上交通线及重要桥梁、渡口的安全。当城市周围地区的匪患肃清之后，才能向山区进剿。后来，我们集中兵力，形成重点，一块一块地搞。在剿匪的战略方针上，大家的思想认识是一致的。随着广西酷暑天气的到来，部队不适宜进行大规模的进剿，各部队于 7 月转入夏休整训，结合进行整风学习。省委和军区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精神，于 7 月 13 日至 8 月 3 日召开了整风会议，亦称第二次高于会议。会议传达了中央和中南局关于整党整风的指示精神，通过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总结广西解放以来开展减租退租、剿匪、统战等方面的经验教训。8 月 14 日，我在军区整风会上作了《八个月剿匪与发动群众总结报告》，在总结成绩和经验基础上，着重分析剿匪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原因。从 8 月到 9 月，部队进行整风学习，从思想政治工作入手，以剿匪为中心，认真检查了过去剿匪工作中的失误和不足，统一了思想，提高了认识，增强了信心，为后来的重点进剿取得胜利奠定了基础。整风结束后，省委、军区又先后下达了《争取主动剿匪》和《在重点剿匪区对于乡村地主富农枪支处理的暂行办法》及《剿匪战术指示》等。为调动剿匪的积极性，军区党委颁布了《剿匪立功暂行办法》，并于 9 月 3 日在广西军区召开的首届英模代表大会上颁布。这些措施落实到剿匪工作中，产生了良好的效果，扩大了剿匪成绩。从 10 月开始，转入冬季重点剿匪阶段。9 月 18 日，省委发出了冬季剿匪指示，指出一切工作必须围绕剿匪这一中心任务进行，必须动员党、政、军、民的力量，合力剿匪；各级党委必须实行党委一元化领导，统一剿匪的领导与组织等，确立冬季重点进剿的方针。10 月 16 日，广西军区发出了 4 个月的剿匪计划，确定了以冬季实行土改的 17 个县和主要交通干线两侧及人多粮丰地区为重点剿匪区。其兵力部署为：45 军 134 师以邕宁为中心于左江沿岸之永淳、扶南、绥禄、上思及钦州地区，监视十万大山之匪，并有支援龙州军分区，加强边防之任务；135 师置于兴业、玉林、博白、北流、容县等地区；133 师置于贵县、横县、宾阳、来宾、迁江等地区。10 月 31 日，我在广西人民代表大会上作了《各界人民动员起来，加紧肃清土匪》的报告。指出剿匪是压倒一切的任务，号召农民、工人、学生、商人及开明人士动员起来，努力投入剿匪反霸工作，造成一个剿匪反特、反谣言的群众运动。经过整风休整后的部队广大指战员，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他们克服种种困难，英勇作战，人人争抓匪，多抓匪，形成剿匪立功高潮。各级党、政部门全力以赴，投入剿匪工作，部队所到之处，后勤供应及时。群众广泛发动起来了，为剿匪部队带路、送情报、做饭、送柴、护理伤员等。由于党政军民齐心协力，10 月份便取得歼匪 1.8 万人的战绩，取得了冬季剿匪第一仗的胜利，受到中南

军区的通报表扬。剿匪工作进展不快的被动局面正在扭转。就在这时我们收到了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同志的来电，要求进一步加快剿匪的步伐。朝鲜战争爆发后，美蒋勾结，妄图“反攻大陆”，出现了觊觎华南，进犯广东的动向。中央要求，两广必须统筹，广西迅速完成剿匪，以抽出兵力增援广东，加固海防，以备不测。在这种大的局势下，广西剿匪的进度已为中央、毛主席所关注。提前肃清广西匪患是国内外时局发展的迫切要求。11月14日，毛主席电示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第三书记方方并告邓子恢、谭政及张云逸、莫文骅、陈漫远、李天佑，指出“为对付台湾匪帮可能向广东进犯，有增强广东兵力之必要。为此必须提前肃清广西匪患，以便从广西抽出一个军增强广东”批评广西剿匪工作落后，要叶剑英前往广西帮助剿匪工作。11月16日，毛主席致电华南分局及广东军区、广西省委及广西军区，要求检查剿匪落后的原因。并提议“广西军区从12月起仿照西南办法每月发一次剿匪通报”。当晚9时，我们接到毛主席16日的电报后（14日电报尚没看到），深感不安，因广西的剿匪步伐跟不上全国的形势。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广西剿匪已关系到党中央、毛主席战略全局的安排。我即以省委名义草拟了一份电文，经张云逸、陈漫远、李天佑同意签发，报告毛主席，表示接受批评和坚决改正。次日，省委召开常委会议，学习贯彻毛主席指示，研究和制定措施，加快剿匪步伐。11月20日，我们又以张云逸、陈漫远、莫文骅、李天佑的名义发电给毛主席，认真检查在领导剿匪工作中存在的“严重缺点”，详细汇报了冬季进剿情况及下步计划。当天，毛主席给张云逸、陈漫远、我和李天佑回电，表示同意我们“对广西工作的检讨及方针计划，望本此做法，取得成绩，以利主动地应付时局”。

为认真贯彻落实毛主席的指示，省委于11月底召开第三次高干会议。

高干会议在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指导帮助下，由

张云逸主持召开。会上，叶剑英传达了毛主席关于广西剿匪工作的几次重要指示，并作了重要讲话。他说，广西剿匪已不是广西一个省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全国的一场政治、军事斗争，因此，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加快剿匪步伐，要“打快板”，不能“悠悠地敲慢板”，才能配上“世界革命与战争的交响旋律”。张云逸在会上作了《为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在半年内肃清全省股匪的任务而斗争》的报告，要求“全省党、政、军、民动员起来，打通思想，首先是打通干部的思想，贯彻以剿匪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造成浓厚的剿匪空气”，“务期达到明年5月以前消灭全省股匪之目的”。张云逸和我在会上作了对过去剿匪工作的分析，检查缺点和如何执行毛主席指示的发言。这次会议对全省肃清股匪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是广西剿匪斗争中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会后，省委、军区、省人民政府根据第三次高干会议精神，先后发出了《十项剿匪法规》、《为完成1951年4月底肃清全省股匪及迅速广泛发动群众的指示》、《关于颁发剿匪立功标准草案的指示》、《关于杀人、收枪、反霸等工作的补充指示》等文件。在毛主席的指示和省委第三次高干会议精神的鼓舞下，全省军民满怀信心，掀起了以桂南和瑶山为重点的轰轰烈烈的剿匪斗争高潮。在此之前，38军因抗美援朝已撤走，39军亦准备撤走。12月，中南军区将陈明仁将军的21兵团从湖南调到广西参加剿匪斗争，从而加强了广西剿匪的力量。桂南剿匪首先拉开战幕。横亘10多个县的桂南地区，南临大海，西南与越南毗邻。其中十万大山、六万大山

地势险要，为土匪长期盘踞之地。我军曾于 1950 年 5 月进剿该地区，但尚有一定的股匪未被歼灭，危害我西南部海边防的安全。台湾国民党也企图把这一地区作为“反攻大陆”的落脚点。歼灭这一地区的土匪，有着极重要的意义。

12 月初，我军以 45 军全部及 21 兵团的 219 师，连同

玉林、钦廉、龙州军分区部队共 17 个团兵力，由 45 军指挥，对桂南地区股匪实施围剿。12 月 19 日，45 军 133 师对盘踞于灵山西南、永淳以南、钦州东北的煌墩、旧州、陆屋、武利地区股匪发起攻击。经过两个多月的围剿，共歼匪 1.6 万余人，基本肃清该地区股匪。这样一来，十万大山、六万大山的土匪陷于孤立，惊慌失措。十万大山的股匪为了活命，企图向越南逃窜。我军修正原计划提前进剿。先巧妙迂回，东西南北四面下网，构成铁壁合围之势，断绝土匪外逃去路。经过 12 天的外围战斗，消灭了匪“两广反共救国会”及“粤桂边反共救国军”大部。12 月 25 日，我军乘胜向十万大山地区进剿，至 1951 年 2 月下旬，共歼匪 3 万余人，基本消灭该地区股匪。“粤桂边反共救国军”总指挥女匪首韦秀英被击毙，副总指挥郭德光、“两广反共救国会”主任韦雨庄、原国民党广西省政府副主席方一引、原夏威夷兵团副司令钟飞等缴械投降。

与此同时，我 45 军 135 师和玉林军分区部队对六万大

山区股匪也发起猛烈攻势，歼匪 1.5 万人，主要匪首杨风池、伍达顾被击毙，冯宗铭被活捉，陈日东、曾仲英、曾东元等被迫向我投降。至此，桂南地区股匪基本肃清，共歼匪 6.4 万余人，取得了桂南重点进剿的胜利。桂南剿匪战斗开始不久，瑶山重点剿匪战斗也于 1951 年 1 月 8 日打响了，这是广西剿匪斗争中最为壮观的一幕。瑶山位于桂林、柳州、平乐、梧州 4 个地区交界处，山岳连绵，地形复杂，历来为土匪聚散之地。在我军冬季进剿开始后，各路土匪骨干纷纷上山，企图负隅顽抗。据侦察，瑶山里有匪两大系统、8 个军、13 个师、7 个旅、19 个团、2 个纵队、7 个支队的番号，共 3 万多人。瑶山不仅是桂东北地区土匪的指挥中心，也是全省土匪的总指挥部，拔掉这颗“钉子”，将使全省剿匪局面大为改观。为打好这关键性的一仗，省委、军区作了周密的部署和安排。1950 年 12 月 9 日，军区制订了《桂北大小瑶山重点进剿计划》，对兵力部署、作战方法及其它有关事项作了明确的规定，省委、军区将此计划报告中南军区、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得到了肯定。由于该地区聚居着瑶族同胞，我们严格要求进剿部队认真执行少数民族政策，为此，颁布了一系列关于发动少数民族同胞参加剿匪和尊重少数民族语言、生活习惯的指示。进山前，先派出 40 多支侦察队，一方面是侦察地形和匪情，另一方面也是了解山区的民情和社情，作好进剿前的准备。为加强对该地区剿匪工作的领导，省委和军区党委分工负责军事剿匪的军区副司令员李天佑同志担任瑶山进剿指挥，省委副书记何伟兼政委，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粟再山兼副政委，领导和指挥剿匪战斗。1 月 8 日，大小瑶山会剿拉开战幕，我军以 14 个半团的兵力投入战斗。首先，以 32 个连的主力部队、7 个县大队、两个区中队及民兵群众数万人，以环绕瑶山的桂江、浔江、柳江及柳（州）平（乐）公路突然实施两线式的严密封锁，构成了 500 多公里不可逾越的大包围圈，切断了土匪外逃的去路。之后，我 52 军 214 师、215 师和 5 个军分区的部队，从不同方向对瑶山外围土匪长期盘踞之地进行突袭。土匪一触即溃，四散逃命。我军改变战术，就地铺开兵力，驻剿与搜剿相结合，分片包

干，拉网扫荡。经过 10 多天的战斗，匪 55 军副军长刘锦堂、参谋长朱满锡、48 军参谋长姜荫祥、新 1 军军长余铸、政法部主任陆泽东等重要匪首被我生俘；匪 14 纵队司令王最被击毙；匪“广西游击联军”总司令黄品琼、48 军副军长卢荣被困在山上冻饿而死。共歼匪 8000 余人。2 月 2 日，我以 30 个连的兵力，分路乘胜挺进瑶山腹地，向金秀、老山、圣堂山等纵深地带奔袭合围，再歼匪骨干 800 多人，其余残匪分散隐蔽。我即以分散对分散，组织了飞行队、飞行组日行百余里，穷追猛打，跟踪搜捕散匪和逃匪。省委及时派出随军工作队 4000 余人，分别进驻大小瑶山的 78 个乡。他们与主力部队一起，深入发动群众，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与剿匪政策，做到“人人开口，家喻户晓”、“标语上山，标语入洞”，对土匪开展政治攻势，使一大批散匪不得不投降自新。至 3 月中旬，瑶山会剿胜利结束，共歼匪 3.8 万余人，四大匪首林秀山、韩蒙轩、甘竟生、杨创奇及其他重要匪首无一漏网，彻底、干净地消灭了盘踞在瑶山地区的股匪。桂南、瑶山剿匪的胜利，是广西军民执行毛主席指示、落实省委第三次高干会议精神而取得的重大胜利。在此期间，其他各地的剿匪工作也取得很大成绩，全省共歼匪 18 万多人，收缴枪支 22 万支。全省除桂西 30 多个县外，基本消灭了股匪，从根本上扭转了剿匪的被动局面。毛主席于 1951 年 1 月 2 日和 1 月 23 日，先后致电广西省委、军区领导及中南军区党委，表扬广西“过去几个月剿匪工作有很大成绩”。匪焰大降，民气大伸。广西的残匪已陷入垂死挣扎的境地。瑶山会剿一结束，我们又部署进剿桂西北地区股匪的工作。在这段时间，按照军委要作好美蒋登陆作战准备的指示，我到钦州、北海一带视察海防，布置战场，筹备粮食。我先到钦州乘机帆船到龙门港，沿日军进攻南宁时的水路视察，再到北海一带，对合浦、灵山、钦州、防城 4 县的地形、交通运输及匪情等方面进行了了解，布置粮食筹备和修桥等工作。这时这 4 县尚属广东管辖，因离广东较远，鞭长莫及，尚没进行土改和镇反工作，群众没有发动起来。

我回南宁后，从战备工作方面和长远考虑，广西需要一出海口，便提出建议：把这 4 县划为广西管辖，另把广西突出广东的怀集县给广东管辖（此事我去北海前曾议论过）。叶剑英、张云逸等同志都同意我的意见，即上报中央，中央很快就批下来了。今天，北海已成为广西对外开放的窗口，在广西的改革开放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我从北海回来后，即参加研究桂西北的剿匪工作。我与李天佑同志于 3 月共同起草了《西北部剿匪部署情况》的报告，呈省委、军区和华南分局，提出了兵分 3 路进剿 3 个重点匪区的具体计划：21 兵团的 215 师两个团及桂林、柳州军分区各一个团，围剿地处柳北四十八崙之匪；宜山军分区 3 个团及 214 师两个团，进剿罗城、宜山、南丹、天峨地区之匪；21 兵团 219 师及南宁、百色军分区各一个团会剿桂西北之匪。这个报告经省委、军区审定后执行。纵横百余里的鹿寨县四十八崙，是桂北一个重要的土匪老巢。

其地形极为复杂，山陡崙深，山多岩洞，山山相接，洞洞相连，路隘林密，人烟稀少，盘踞在那里的 35 股大小土匪 1700 多人凭借其特殊地形，采取十分毒辣手段，强迫组织全民自卫队，制造民匪不分，企图长期与我对抗，把四十八崙变成小“台湾”。

3 月 20 日，我 215 师和柳州、桂林、宜山军分区部队共 6 个团的兵力，在当地县大队和 4 万多民兵的配合下，分两路对四十八崙和九万大山地区的土匪发起进攻。我军吸取桂南和瑶山会战的经验，采取层层包围、多路奔袭

合围的战术，由外向内步步紧逼。缩小包围圈，然后逐一搜剿，共歼匪“桂中军政区”司令何次山、副司令向天雷以下 2500 余人；九万大山区会剿 19 天，歼匪 4700 余人。接着，对三江和大苗山地区股匪奔袭合围，全歼两地区股匪。

至 5 月 20 日，柳北重点剿匪战斗以歼匪两万人的胜利宣告结束。在进剿柳北的同时，于 4 月 6 日以 4 个团的兵力对天峨、南丹重点区展开进剿，不到一个月，全部肃清该地区土匪 9000 多人。4 月 15 日，我军又以 6 个团兵力，会同云南、贵州军区部队对桂西百色地区进剿，至 5 月底，歼匪 1.5 万余人，基本清除该地区的大股土匪。历时两个半月的桂西北进剿，共歼匪 5 万多人。4 月 25 日，省委发出《庆祝全省剿匪胜利的通知》，指出：“广西剿匪胜利不仅为广西人民除掉一大祸害，为广西今后发动群众进行农村社会改革提供了一个最有利的条件，是斩断了美帝国主义在大陆上一只爪牙，是广西人民对抗美援朝运动的一大贡献”。

同月下旬，省委召开高干会议，我在会上作了剿匪基本结束的报告。此后，我军转入捕捉散匪、开展反霸退押和土改的阶段，以巩固剿匪斗争的胜利。1950 年 10 月至 1951 年 5 月底，8 个月共歼匪 33 万多人，加上原来的，全省 1 年多时间，共歼匪 40 余万人，其中师以上匪首 537 名，军以上匪首 170 名，基本肃清了全省股匪，胜利完成了毛主席交给的剿匪任务。

1951 年 5 月 1 日，我们以军区几位领导人的名义致电毛主席、朱总司令及中南、华南军区领导，报告广西已基本完成剿匪任务，说“现在全省已出现为历史从来没有过的社会安定、人民情绪高涨、城乡交流畅旺、工商界繁荣的局面”。

同一天，省委、军区在南宁主持召开有 7 万多人参加的隆重庆祝“五一”节大会，结合庆祝全省剿匪斗争的胜利。我在大会上作了简短的讲话，并向乡亲们告别。因我已接到调动工作的新任命。5 月 16 日，毛主席怀着喜悦的心情，致电广西军区并告中南军区，对广西剿匪取得的成绩表示“甚慰”，“望鼓励剿匪部队继续进剿，歼灭一切残匪”。

广西剿匪工作于 1952 年以全胜而宣告结束。历时一年零四个月的剿匪斗争的胜利，为刚刚解放的广西得以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成为广西人民革命斗争史册中的光辉一页。在这场伟大的剿匪斗争中，广西省委认真贯彻党中央、中南局的指示精神，结合广西具体情况所采取的剿匪方针和决策是适时而有成效的，政策是稳妥的，整个剿匪工作成绩是主要的。毋庸讳言，由于当时种种原因，在剿匪的开始阶段进展不够快，在一些地方，民枪收缴不够彻底，群众没有完全发动起来。

省委和军区在实际工作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缺点和不足，这是剿匪斗争中的支流。但是，中南军区政治部个别领导人来广西后，对广西剿匪斗争却一口否定，扣下几顶大帽子，如说不收民枪、不杀土匪头，七擒七纵，宽大无边，右倾等。他不经省委、军区，亦不找省委同志谈，也不经中南局、中南军区，把自己的片面看法直接电告毛主席。他不是善意地帮助省委工作，而是动员别人“揭发”省委主要领导人，不久，省委主要领导即被“靠边”了。这种不正常的作法，引起了省委同志的反感，挫伤了干部的积极性。

创业维艰

解放之初的广西，百废待兴。国民党留下的只是个工商凋零、农业破落、交通闭塞、文化教育极端落后的烂摊子，经济完全处于崩溃的境地。大批的难民、失业工人及贫苦群众，生活无着，嗷嗷待哺。要在旧社会的废墟上开创新业，是我们面临的艰巨任务。

为了发展生产，恢复经济，我们首先把工作重点放在恢复商业上。这是因为旧广西工业落后，工业企业极少，先恢复和发展商业，才能为工业建设打下基础。刚解放时，工商界怕“共产”、怕挨斗的思想很普遍，不少商户关门歇业。我们通过人民代表会议，召开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与工商界人士交朋友等形式，宣传党的保护工商业的政策，打消他们的顾虑。

我的表兄劳寿之也是商人，我多次给他做工作，嘱咐他合法经营，正当做生意，并通过他影响和带动别的商户。在恢复商业的同时，工业企业亦得以恢复。当时的省城南宁“电灯不明，自来水不清”，全市只有一座设备简陋、发电不正常的水电厂和一个火柴厂，故有“半截烟窗，一根火柴”之说。南宁发电厂设备非常的落后，只有一台500千瓦的透平发电机和一些闲置不用的煤气机、柴油机等旧设备。我们接管时，电厂的流动资金已经用完，电也发不出来了。军管会便拿出1万块大洋作电厂的流动资金。同时组织部队和机关干部到横县运木头给电厂作燃料，使电厂很快恢复发电。柳州、桂林、梧州等地的电厂和水厂，也在解放后迅速恢复了生产。其他各工矿企业，多是边接管边恢复生产。贵县原有一个糖厂，解放前夕停产了。

1950年夏，为恢复该厂生产，我与张云逸、陈漫远等同志商量，决定由省政府和军区各拨出10万大洋，共同兴办这个糖厂（至1951年底中央决定军队不搞生产，于是军队交出全部资金赠地方），解决了广西制糖问题。在恢复工商业上，我们采取了“克服困难，全力维持”的方针，积极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利用银行信贷、税收调节等方法，鼓励私人投资，扩大经营，以扶持工商业的恢复发展。匪患严重时，我们还派出军队为商户押运护航，维护交通线的畅通。经过努力，使许多解放时已歇业的商店重新开门营业，萎缩了的工业再现生机。到1950年底和1951年初，南宁市工商业的户数和规模超过了1949年，财政收支趋向平衡，金融物价趋向稳定，市场也逐步繁荣，财政经济状况有了初步好转，党和人民政府的威信大为提高。

1951年5月间，不少工商界人士得知我调离广西的消息后，给我送来锦旗、条幅，并争着请我吃饭。这对我个人是很大的鼓励，但更重要的是说明了党的政策赢得了民心。解放之初，省内的铁路、公路和内河航运已基本陷于瘫痪。我率部入桂作战前夕，考虑到湘桂铁路广西路段，设备陈旧，运输能力低，加上战争影响，铁路设施破坏严重等情况。

因此，我早在1949年10月25日，从湖南安江发一电报给党中央、毛主席，其中说道：“桂省粮食不够，今年又大水灾300万灾民。而我8个军（13兵团3个军，加41军，45军，二野陈赓兵团的3个军）入桂，军粮、民粮均成问题，请考虑。建议中央抢修湘桂铁路及将宾阳至南宁段100多公里接轨（有路基），以利湖南粮食南下，否则，大军到南宁后继续向左右江前进及陈赓部进到云南则无粮食接济。为了开展广西经济，解决盐食，以免入超过大，请中央考虑新设邕钦铁路150公里以后，再设通龙州铁路。这个对国际革命重要”。1950年初，我算了一笔帐：40万大军入桂后，大约1

年要 500 辆军车运输军用物资和支援越南革命斗争，耗费很大。这笔消耗，足够在广西境内修一条铁路。我当时以个人的名义直接报告毛主席，建议尽快修铁路，不仅是着眼于军事方面，也着眼于“开展广西经济”。毛主席接到电报后，仅隔 3 天，便批示“同意”，要铁道兵马上组织动工，限于 1951 年 5 月 1 日通车到南宁。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关怀下，我们解放广西后，便立即组织民工抢修铁路。

至 1950 年 1 月 12 日，湘桂铁路桂林至柳州段修复通车。

4 月，新建的湘桂线从来宾至南宁段通车。10 月，全线铺轨至中越边境的凭祥，正式通车。国民党政府历时 10 年想建而没有建成的这条全长 403 公里的铁路，人民政府仅用一年时间就全线通车了。为保障铁路运输，军区还派出一个师的兵力护路。1950 年 4 月，原红 7 军干部、上海电讯局局长黄荣调回广西工作，省委安排他担任省交通厅长兼邮电局长。我找他谈话时，他说：“我对交通工作不熟悉”。

我便鼓励他说，不熟悉就学习。他上任后，边干边学，为改变全省交通落后面貌。作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在发展农业上，我们组织农民兴修水利，兴办农场，鼓励农民开垦荒地，帮助农民解决生产困难问题，设法扶持农业生产。我初到南宁时，亭子等地的一些群众和有识之士向我建议：兴修郊区良凤江引水灌溉工程。我是农村长大的人，从小深感农民靠天吃饭的苦处，天旱盼雨望穿秋水，荒年时不知有多少农户家破人亡。

为此，我在 1950 年 1 月南宁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期间，召开了良凤江灌溉区代表座谈会，商量兴修引水灌溉工程之事。大家一致赞同。会后，我即带领工程技术人员到实地勘察，制订计划方案，经过一段时间筹备，于 9 月正式开工。开工后，受益的两个乡群众踊跃参加修渠劳动，政府发给每人每天 5 角钱生活补助费。

开始，省、市财政有困难，拨不出经费，我便从军区拨出 2500 大洋给此水利工程，还组织国民党战俘和散兵参加 28 万个工日的劳动，后省政府还用以工代赈方式，拨给工程几千大洋。经过一年的艰苦会战，于 1951 年 9 月胜利完工，灌溉面积达 1.2 万亩，成为广西历史上第一座现代型的引水灌溉工程，改变了灌区人民靠天吃饭的历史。直至今日，这个水利工程仍发挥着造福人民的作用。南宁东郊青秀山下有一波光粼粼的小湖，而附近的田地却是望天田。我曾计划在良凤江引水灌溉工程完工后，着手兴建青山湖引水灌溉工程。

另外，我还打算兴修一条从钦州到横县的运河，把钦江与西江连接起来，以方便钦州地区与广州的水路运输。那时，我和工程师雷开同志曾作了研究，并搞出设计方案，送省委和省政府研究，后因工程较艰巨，耗资巨大，广西经济困难，加上我很快调离广西，这个工程只能成为我未了的心愿。在恢复发展经济的同时，我们也致力恢复发展文化教育事业。解放初期，我们对旧的文化教育机构采取“维持现状，逐步改造”的方针，首先动员学生回校复课，恢复正常教学秩序，充分依靠和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组织他们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加强对他们的思想教育。尽管当时还处在经济恢复的困难时期，我们也尽力安排对教育的投资，兴办学校和保育院，降低学费，增招工农子弟入学，扩大社会教育面。那时，亭子乡父老雷际云等，要求在亭子修建小学，以方便学生上学。我在工作之余，曾到邕江岸边的马路散步，看到亭子村的孩子们仍像我 20 多年前一佯，要渡过邕江到南宁上学，感触很深，

经与军区其他领导同志商量，考虑当时地方政府拿不出钱，决定从军区经费中拨出两万块大洋在亭子渡口附近建起一所小学。使附近的孩子免受渡江之苦。后来我调离广西时，心里仍惦念着学校，曾为学校题写校名“亭子学校”，还写了“当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的条幅勉励同学们。那时，王震同志在新疆组建生产建设兵团，屯垦御边，需要大量的女干部去工作，去组建家庭。他给我来电报，要我们广西给予支援。尽管我们广西也需要大量的女干部，但考虑到边疆建设的需要，我们从广西各学校里选拔了500名女学生。她们在新疆安排了适当的工作，也组建了美满的家庭。她们为边疆建设洒下了汗水，也贡献了美好的青春。

50年代初期，越南抗法战争也处于关键的时期。为了支援越南人民的独立解放战争，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广西给予了大力的支援。每天上百辆汽车将军用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越南。我们缴获的一些枪支弹药也送给了越南。1950年初，胡志明主席到北京路过南宁时，特地向我们表示感谢。那时，他是秘密来的，几乎没带什么随员。他到后，张云逸在一个酒店宴请他，我、陈漫远、黄永胜、雷经天去作陪。过了几天，我请他到明园去玩。李天佑带了一个小孩一同去了。胡志明会讲汉语，中国诗也读得很好。休息时，我请胡志明吃冰淇淋。他给我们每人赠送了一枚越南金币。金币有我们5分硬币那么大，上面铸有胡志明的头像，是1948年发行的，我一直珍藏着。南宁是新的省府所在地，原来的市容破烂不堪。为打扮南宁，我们按照轻重缓急，有计划地搞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市政建设，如拆旧城墙，筑马路，建担水码头，疏通阴沟，兴建礼堂和人民公园等。开始，我提议把望仙坡上的古炮台与白龙塘一带规划为人民公园时，有人认为那里很荒凉，四周树木稀疏，且离市中心较远，不同意我的主张。我便在市政会议上对干部们这样说：“我们共产党人应有长远发展的眼光，不能把眼睛只盯在今天南宁巴拿大的地方，要看到几年、几十年后南宁的发展。”大家同意后，我带雷鲲池、雷荣珂、周君实等人去察看地形，后发动机关干部参加修建公园的义务劳动。1951年清明节，我们在公园内召开植树大会。我在讲话中要求各单位植树要包种包活，要像妇女哺育孩子那样，用我们辛勤的汗水浇灌。会后，我们省委、军区和市委的领导同志与全市的机关干部一起，参加了公园的植树劳动。

1958年毛主席在南宁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时，亲自

选定人民公园为接见广西各族人民的地点。当年我们种下的树木已枝繁叶茂，郁郁葱葱。韦国清同志陪毛主席登上公园的古炮台，向毛主席介绍说：“这个公园是莫文骅当南宁市长时兴建的”。毛主席听后满意地点着头。

后来，人民公园已成为南宁的一景、热闹的市中心。

1978年12月我回南宁时曾写了一首小诗，其中几句写到了人民公园：

山岗翘首望穹苍，

俯视公园扮靓妆。

菊花衬红白套紫，

牡丹呈绿翠兼香。在党的领导下，广西各族人民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奋斗，历经千疮百孔的八桂大地复苏了，充满着春天的气息。

第十三章 奉调东北

盛情的款待

1951年春，广西剿匪工作基本结束时，陶铸同志代表广西到中南局开会（此时张云逸同志已去广州休养，由陶铸同志主持省委工作），他回来后对我说：“中央决定，你地方化了！”我表示服从组织决定，留在广西地方工作，并开始做长期干下去的准备。可是，两个月后，中央军委来电报，调我到东北军区任政治部主任。这使我感到很突然，但想到朝鲜战火已烧到鸭绿江边，那里工作需要，我便很快交代好工作。4月下旬做剿匪工作基本总结后，便于5月初离开南宁，踏上北上的行程。后来知道，陶铸同志去中南局开会时，已决定把我调走，但他回来却没有向我直说。我离开南宁后先乘船到广州看望在那里休养的张云逸同志。张老是早年批准我加入革命武装斗争行列和介绍我转党的老首长，我曾在他领导下工作多年，得到他不少帮助和指导，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我们建立了深厚真挚的革命情谊。他在广州见到我后很是高兴，同我一起照相，并抱病带我到文物商店里，选购了象牙笔筒、狮子和象三件礼物送给我作纪念。凑巧，陈漫远同志那时也在广州，于是我们三人合影留念。临别时，张云逸同志对我今后的工作给了一番勉励。张老是我军著名高级将领，指挥部队征战南北，战功卓著。他对党对革命忠心耿耿，鞠躬尽瘁。他作为百色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以及在部队分散的艰难困苦中坚持把队伍带到湘赣苏区永新，是非常不容易的，表现了他坚强的党性和坚定的革命信念。张老这次来广州休养时，心情不是很好，主要是他对有的人状告广西剿匪的不实之词及其种种作法不满意，加之有些头晕，便向毛主席告假休养，此后，张老就再没有担任行政工作。

1954年他曾把自己的意见写信给中央，中央很关怀他的身体情况，刘少奇副主席给他回信说：“你对党对革命是完全忠实的，党中央在政治上是完全信任你的”。又说，中央已决定他作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候选人。后来，他当了人大常委，虽然没有了行政工作，但也得到一些安慰。1974年11月，82岁高龄的老首长张云逸大将逝世，我甚为悲痛，写诗以悼之：

雷鸣一声妖魔死，半世功勋录青史。
力疲倚马枕寒流，腹空啖蕨如甘旨。

局危奋起挽狂澜，灭敌挺身冒毒矢。
鞠躬尽瘁已长眠，雨露朝朝育桑梓。

5月中旬，我途经北京时，很想趁此机会到中南海去看望毛主席，汇报工作和思想。我先打了一个电话给他的秘书叶子龙同志，想不到叶子龙同志很快就来电答复说，毛主席叫我当天下午4时到他的住处去。我听后非常高兴和激动。我按时来到中南海毛主席的住处。毛主席热情接待了我，并留我一起吃晚饭。我们边吃边谈。他先问广西剿匪的情况。

我说：“广西剿匪开始进度较慢，主要是兵力不足，另外，我们在工作指导上也有缺点错误。主席的电报很及时。叶剑英同志到广西指导工作后，又调去了21兵团，对我们帮助很大。现在广西已胜利完成剿匪任务”。

毛主席问：“你们一共杀了多少人？”

我回答说：“没有精确数字，大约共杀了××万吧”。

毛主席又问：“为什么杀那么多人？”

我答道：“不是有人说过杀人少，七擒七纵，宽大无边么？后来有人下

令连队有杀人权，可以先斩后奏”。

毛主席听后“唔”了一声，没再说什么。接着，毛主席又问我去哪里工作。我告诉新的工作单位和职务后，毛主席说：“我怎么不知道？”我听了心中愕然。心想：过去正兵团级干部的调动都要报毛主席审批。既是中央军委的命令，怎么军委主席都不知道呢？这算怎么一回事？！我本想问毛主席一句，但考虑已成事实，便没再说什么。我另转一话题说，广西省委、省政府曾写报告给中央，拟重建“镇南关”，我临离开广西前，已批了两万元人民币，并电请主席题写关名，不知主席意见如何。毛主席沉思一会说：“‘镇南关’是中越边境的历史名关，重建关楼是件好事，至于关名，要考虑考虑，现在时代不同了，你们若再用此关名，越南的同志会高兴吗？”主席的话给我很大的启发和教育。国家不论大小，必须平等相待，友善和睦，这是共产党人的一贯主张。旧关名是明清封建统治者为镇压、统治南疆少数民族而命名的，现在再用此关名，确实不利于中越两国人民的友谊，也不利于南疆各族人民的团结，过去，省委写报告时并没有考虑这一点。说明我们政治水平低。我听后，表示赞同主席的意见，并表示把主席的指示传达给广西的领导同志。后来，广西根据主席的指示，先把“镇南关”改为“睦南关”，后又改为“友谊关”。辞别主席时，他握着我的手，勉励我到新的战斗岗位作出新的成绩来。

冷漠的目光

1951年5月下旬，我又回到了历史名城沈阳，这是东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东北军区机关所在地，也是我国抗美援朝的前哨基地，我离别这个城市已有5年，如今，这里已变为崭新的工业城市。在绿树婆娑的整洁街道上，工厂林立，车水马龙，行人匆匆，许多来自祖国各地的优秀儿女，都经这里奔赴朝鲜战场。我到军区上任时，主持军区工作的副司令员贺晋年和副政委张秀山、周桓等同志都很热情地欢迎我。次日下午，我去拜访东北中央局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高岗。我想，他是熟人，不应有什么拘束。

我来到他的会客室，他尚没下楼，公务员给他送来一盆新鲜的樱桃，放在桌上。等了一会儿，高岗下来了，我给他敬礼，向他报到。他冷漠地看了我一眼，跟我握了一下手，便坐下来吃他的樱桃，一粒接一粒，吃个不停，哼也不哼一声，好象屋里没有其他人一样。他吃够了樱桃，用手帕一抹嘴巴，才从牙缝里挤出3个字：“你来了！”我想接下来他会向我介绍军区的情况或对我今后的工作作一些嘱咐和交代，可他没话了。我耐着性子坐了一会，浑身感到不舒服，便告辞了。说起来，我和高岗还有一点姻亲关系，我弟媳与他爱人是表姊关系，都是江苏人。他之所以如此冷待我，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在延安时，他想兼八路军留守兵团政委未能如愿，对当时军民关系发生的问题，我们也有不同的看法。想不到事隔10多年，他仍记恨在心。军区政治部主任原为周桓同志，我到之前，他升任军区副政委。政治部下设秘书处和组织、宣教、保卫等部，共有干部百余人，苏军上校阿那洛夫担任政治部顾问。我到任后，即投入接待志愿军出国作战的工作。

当时。国内师以上干部前往朝鲜战场，一般都要经过沈阳，我们都给予热情接待，安排好他们的住宿、吃饭，帮助他们解决生活、衣着等问题，如来自南方的13兵团司令员黄永胜没有带皮大衣，我发现后，叫人连夜缝制一件貉子皮大衣送给他。开始，由于准备工作不充分，有不少指战员只着单衣，在战场上被冻伤。吸取此教训，尽量在出国前帮助他们解决好御寒问题。随着战争的激烈进行，我志愿军牺牲人员不断增多。有的烈士遗体运回来，我们便负责接待烈士家属，举行追悼会，安葬烈士遗体等工作。如军长蔡正国烈士，就是我们负责安葬的。后来，志愿军指战员陆续复员或部队调防，一批批人员经过沈阳，我们的工作更为繁忙，有的伤残战士提出的困难问题较多，我们都给予帮助解决，若不能帮助解决的，便耐心向他们作解释工作，当时，政治部的干部比较年轻，各部、处的主要领导干部，多数是30出头的人，他们工作热情、主动、肯动脑筋。军区交给我们政治部接待帮助志愿军出国作战的各项任务都完成得较好。

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根据东北局向中央反映一些干部严重贪污、浪费的情况，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8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进行的指示》。军区党委遵照党中央的指示，立即在全军区范围内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三反”运动。运动的具体工作由政治部负责，我担任军区“三反”运动办公室主任。这一运动，对于贯彻七届二中全会精神，清除干部队伍中的腐化分子，抵制旧社会的恶习和资产阶级腐蚀，是非常必要和及时的。我们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发动后，一方面动员广大干部检查交代自己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等问题，另一方面检举、揭发别人的问题。总的看，运动是健康的，但在中间集中火力“打老虎”阶段，政治部却发生了一起畏

罪自杀事件。在运动中发现政治部秘书长经济上有问题。经过揭发和同志们帮助，他交出了在接收沈阳时私拿的两小盒珠宝首饰。

当同志们继续追查他的问题时，他的思想压力很大。为减轻他的思想压力，帮助他端正态度，在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带着爱人和小孩到他家里去看望，肯定他交出珠宝首饰的认识态度，并给予安慰。整个谈话过程都比较轻松，他也很感激组织和领导对他的关心，并送我们出门口。但想不到第二天早上，他却在家里用驳壳枪自杀了。他自杀的主要责任在自己，但我们思想政治工作也欠过细。后据分析，他的问题可能牵连到军区个别领导人，他感到问题很复杂，没有勇气向组织说清楚而走上绝路。我当时没有估计到这一点，只做了安定情绪的工作。高岗听到政治部秘书长自杀的消息，以为抓到整我的把柄。

他把政治部的各部部长一个个找去询问：“××是怎样自杀的？为什么莫主任找他谈话的第二天就自杀了？是不是莫主任逼他自杀的？是否要他揭发××？”那些部长都说我在运动中没有搞逼供信，也没有要他专门揭发××。在这件事上高岗没能找到碴口，可后来评级别时他却来了一下。1953年评级别时，根据我担任过兵团政委，属正兵团级，在军区党委会上，也定我为正兵团级，但报到高岗那里，他却说：“者同志不要骄傲嘛，莫主任评为副兵团级就可以了。”军区党委会定的东西，让高岗一句话给改了。当时，干部部门有种解释，说副司令、副政委是副兵团级，我也只能评副兵团级，不然，不好领导工作。评级要以别人为标准，真是莫名其妙！对此，我有些想法。总政治部罗荣桓主任知道后，来电叫我到北京，他和副主任肖华安慰我说：“胸怀要宽宏一点。个人的事情算了！”并邀我去万寿山玩。林彪也和我谈话，给以安慰。我也知道高岗的为人，跟他有多少道理好讲，又是个人的事，算了！当时，高岗在东北集党政军职务于一身，权力很大，但水平却很低。他平时讲话都是别人写好了稿子，他开会念稿，遇到生字就出洋相。一次，他在军区抗美援朝干部大会上讲话，连稿子上坦克的“坦”字也不认识，念了几次都念不出来，结结巴巴地说：“克……克……这是什么克？”旁边的人告诉他是坦克，“呵，坦克……”台下人都笑起来了。高岗不爱学习，却常常装出一副学习的样子。他的办公桌子上总摆着一本《联共党史》。有人进来请示工作时，他就翻上几页，头也不抬，半天不理人，好象学习很认真似的。待他看了几眼后，才抬起头，慢吞吞地说，你们要学习呀，《联共党史》很重要啊！给人一种装蒜的感觉。高岗爱跳舞是出了名的，他不仅在沈阳跳，还经常跑到长春和哈尔滨去跳。不过，他舞姿很笨，舞风也差，舞伴们都很怕他。他一跳起来常常通宵达旦，第二天10点多钟才起床。这些事情，只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高岗的为人和品质。

向文化大进军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部队一方面进行整军备战和支援志愿军出国作战，一方面抓紧进行部队现代化、正规化的建设，以适应未来战争需要。要建设一支现代化的革命军队，首先必须提高广大指战员的文化素质。因我军指战员主要是工农子弟，他们的思想政治觉悟比较高，作战英勇顽强，但由于很少有机会上学读书，文化水平普遍偏低，与现代化战争的需要很不适应。因此，迅速提高指战员的文化素质成为实现部队现代化建设的迫切任务。为此，中央军委在 1952 年度部队训练的指示中规定：“全军除海、空军及雷达部队之有文化外，均执行以文化教育为主的方针。这一方针，是为了更有准备和更有步骤地执行正规化、现代化的训练计划和掌握现代技术”，并决定从 1952 年 6 月至 1953 年 5 月，在全军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文化教育运动。这是一场向科学文化的伟大进军，军区政治部具体负责这一工作。我们分别召开各级干部会议，层层进行宣传、发动，号召全区部队，把学文化与抗美援朝战争结合起来，为了粉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保卫国防，尽快掌握新装备新技术，努力提高部队的文化知识水平，掀起一个向文化大进军的学习热潮，使部队成为一个大学校。我们根据军区指战员的文化实际情况，制定了军区文化教育实施方案，按文盲、半文盲等类型举办训练班，主要课程是识字和语文科。后陆续开办速成小学和速成中学。政治部除了宣传发动、举办各类学校外，还负责调配文化教员、编印文化学习教材、总结推广文化学习经验等工作。我带政治部的同志下部队检查督促和调查研究。在党的号召下，“建军备战、学文化”已成为广大指战员的行动口号和努力方向。大家克服种种学习难关，积极参加学习，有的干部或英雄模范，分批参加脱产学习。他们像小学生那样，拿起文化课本，认真攻读，不懂就问，虚心请教，进步很快。

经过近一年时间的学习，军区人员 80% 扫了盲，有不少人达到高小程度。原来已有初小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员也得到了进一步提高。军区部队开展文化教育的经验曾在总政召开的文化教育会上作过介绍。在基本完成部队扫盲的基础上，我们遵照总政治部 1953 年发出的“关于加强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是现代化国防建设中的重要工作，是全军政治工作中心任务之一”的指示，从 8 月份开始，对军区的干部战士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政治理论教育。军区根据在职干部政治文化水平分为高级班、中级班和初级班。文化程度在高小以上的军级干部和一部分理论水平较高，并有自修能力的师级干部编为高级班，主要学习中共党史，以自修为主，辅以必要的专题报告和讨论；文化在高小毕业以下的团级干部和一部分师级干部，以及一部分已学过政治常识的营、连、排机关干部编为中级班，也以中共党史为主要学习内容，采取自修、上课与讨论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学习；文化程度在高小以上的连、排干部，以及一部分营级干部编为初级班，主要学习政治常识，以上课为主，自修、讨论为辅。文化程度在高小以下的干部，则以学习文化为主，并进行时事政策教育。为了培训中共党史教员，军区先后举办两期党史教员训练班，共培训 200 多人。各大单位分别举办政治常识教员训练班，共培训 300 多人。

当时，军区还在长春成立政治军事干部学校，我兼任校长，学员有 1000 多人，主要是培训连、排干部。1953 年 7 月，朝鲜停战协定正式签字。历时 3 年多的朝鲜战争以朝中人民的胜利和美帝国主义的失败而结束。不久，我带领几名机关干部前往朝鲜战地参观、学习。我们时而坐车，时而步行，从

东海岸到西海岸，从上甘岭到三八线，沿途看到一座座被敌人炸成秃头的山岗，一处处被毁成废墟的村镇，一群群失去亲人的孤儿寡母，到处听到志愿军和人民军英勇抗敌的感人事迹。

12月上旬至1954年1月下旬，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亦称“高干会”）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军委各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直属院校的主要领导干部共120多人。东北军区我和贺晋年等同志出席了会议。会议由彭德怀同志主持。朱德同志致开幕词和闭幕词。彭德怀同志作《四年来的军事工作总结和今后军事建设上的几个基本问题》的报告并作总结讲话。聂荣臻、肖华就组织编制和政治工作问题作了报告。刘伯承、贺龙、陈毅、叶剑英等同志也作了重要发言。会上还有苏联顾问提出的建军计划。会议着重讨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问题，确定今后我国军事建设的总方针、总任务是：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以保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抵御帝国主义侵略。会议还确定现代化军队建设中长期的、经常的中心工作是训练部队，特别是训练干部。会上还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会议在讨论发言中，曾出现削弱军队政治工作和主张实行“一长制”的倾向。我和一些同志不同意这种意见。我们曾去找参加会议的陈毅同志，请他向军委反映我们的看法和意见。当时，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同志因病不能到会，但他听到会议的这种情况后，抱病前往中南海向毛主席汇报，说军队建设搞现代化，也要搞革命化，军队要加强政治工作，党委制在我军中要长期坚持下来。毛主席非常赞同这一意见，向会议打了招呼，会议很快扭转了风向。会议快结束时，彭德怀同志说很快就要调整干部，大家可以酝酿。这时海军司令员肖劲光来找我，说将成立北海舰队，想推荐我去当舰队司令，征求我的意见，我表示同意。因我过去就是军事干部，也想调换一下环境，继续从事军事工作。

后来，总政治部副主任肖华同志来找我，说我长期搞政治工作，有了经验，不要改行。他和罗荣桓同志正在筹办政治学院，他们俩只能是兼职，要我去主持政治学院的筹备工作。他利用会议休息时间拉我到学院的院址看了看。后又带我到罗荣桓同志家里，罗又劝说我一番。我说，已答应肖劲光同志到北海舰队去。罗说：“没关系，再说你也没有搞过海军”。他们俩的谈话，充满了对我的信任和期望。后来我才知道，为了配一名主持学院日常工作的副院长，罗荣桓把全军兵团以上高级干部都仔细过了一遍，考虑比较了一段时间，最后选定了我。

第十四章第二次办学

参加创建政治学院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1954年5月，我从沈阳奉调到京，参加创办解放军政治学院。这是我戎马生涯中的第二次办学，而且一办就是10多年。

政治学院是在罗荣桓同志倡议之下创办起来的。当时正值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开始提上日程的时候，为了在新形势下保持和发扬我军光荣传统，做好政治工作，培养大批具有一定政治理论水平和科学文化知识，适应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需要的政治工作领导干部，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罗荣桓力主创办我军高级政治院校。罗荣桓呈送的报告很快得到毛主席批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也都赞同。于是，在罗荣桓领导下，开始了筹办政治学院的工作。根据罗荣桓同志“不与民争利”的要求，院址选择在北京西郊永定路西边的一片砂石荒地上。在我未到之前，已成立了以罗荣桓为主任的筹委会，肖华、王宗槐、贺长清等为委员，并于1953年6月开始破土动工。

按照罗荣桓同志提出的“先建学员楼、后建办公楼、宿舍楼”的施工原则，我到校时，最先上马的东四、东五两幢学员楼已接近竣工。我家暂住一幢学员楼底层，因潮湿，只好用烧煤炭办法来排湿。我上班后，罗荣桓主任便把我请到他家里，研究制定办院指导方针等问题。他认为，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培养能担负人民解放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领导工作的干部，就必须从实际出发，学好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通过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把广大干部在长期战争中积累的经验总结起来，变成全军共同的财富。根据罗荣桓主任的指示精神，我们起草了《关于筹办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的基本方案》，以总政治部名义报中央军委。

8月，军委通过了这个方案，8月24日学院被正式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一天，我同肖华同志到罗荣桓主任家里商议学院领导成员的配备问题。罗主任问：“谁当院长？”我同肖华异口同声说：“当然是你喽！”罗笑了笑，接着说：“你们要我挂，我就挂一段时间”。他还提议肖华同志也兼任第一副院长，我任副院长兼教育长，主持学院日常工作。因学院都是搞政治的，所以罗荣桓同志决定不设政治委员。11月，中央军委正式任命罗荣桓兼任政治学院院长，肖华兼任第一副院长，我任第二副院长兼教育长。袁渊为副教育长，谭佑铭为政治部主任，李改为训练部长，伍瑞卿为院务部长，学院的日常工作由我主持。1955年，我不再兼教育长，由梁必业同志继任，后他又兼政治部主任，1957年调离。

开始，中央军委批准成立了学院临时党委会，我任党委书记。后来，正式成立学院党委会，肖华任书记，我为副书记。依照军委通过的办院基本方案，我们在继续建造校舍的同时，迅速建立学院各级组织机构，如政治部、训练部、院务部等，学院各项工作正式运转起来。办院校，重要的是选配教员，教员队伍的强弱，对教学质量是至关重要的。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关怀下，我们从全军和地方抽调了一批干部和知识分子充实我们的教员队伍。其中不乏一些专家学者，如从抗大就开始担任哲学课教员的许以明同志，学识渊博，理论功底深厚，读了很多书，光书目的索引卡片就装满了一大箱子。还有教政治经济学的教员李唯一，马列著作特别熟，课也讲得好。但大多数教员的文化水平和任教能力还很低。于是我们开办了教员培训班，自己培训。办政治经济学教员训练班时，苦干无人讲课，调来的不少教员连政治经济学都没接触过。我想起了曾在延安中央党校和马列主义学院讲授政治经济学的王学文同志。当时，他在中宣部工作，我便去拜访他，请他到政治学

院执教，他欣然同意。

后向上级请示，因他在地方的教学任务很重，调不过来，只能兼课，我们就把训练班中学员提出的疑难问题集中起来，请他解释。我们自己集训教员外，还选派了一批教员到中央党校、军事学院等院校进修。尽管当时我们的条件还很艰苦，但还是给教员创造了较好的工作生活条件。教员配有台灯，两人一间宿舍，配备了生活用品，还给每个教员发了100元钱用于购买书籍。办院初期，教职员的情绪很高，意气风发，都想把学院办好，但缺乏办学经验。

罗荣桓主任提倡走出去，学习兄弟院校的经验，决定由我带领一个有26名教员、干部组成的学习参观团，于10月中旬先后到南京军事学院和高级步兵学校学习取经，向刘伯承院长、宋时轮校长学习有关设置教研室、教员备课授课、学员作风培养、机关工作、后勤管理等方面的经验和方法。收获很大，学到不少好经验，增强了大家办好政治学院的信心。在学院筹建的同时，我们按照罗荣桓同志“边建设边开学”的指示，首先招收短期高干文化班。经过半年的准备，于1955年2月中旬速成系第一期开课，罗荣桓、谭政（新到任的总政第一副主任）、傅钟（总政副主任）、肖华等总政领导同志到学院参加开课式。那天，他们一早就来到学院。我首先陪他们参观几座已经竣工的学员楼、教学楼，还有用席子搭成的临时食堂，最后来到也是用席子搭成的大棚子里。开课式便在这个大席棚里举行。

数九寒天，棚内炉火熊熊，可寒气依然袭人。因没有窗户，棚内光线很暗，大白天也只好开着灯。罗荣桓院长在全体学员的热烈掌声中走上了用木头、草席搭成的临时主席台。他用目光巡视了坐在台下的经过战争锻炼的军、师级干部，心里很是高兴。我宣布开课式开始后，便请罗院长讲话。罗院长缓步走上讲台时，台下又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他频频招手，笑眯眯地说：“自己人嘛！不必拍这么长时间！”接着他满怀深情地回忆起当年红军大学艰苦的学习生活。他说，军队办大学，在红军时代就已有过，在保安红军大学时，我和谭政、莫文骅都是那里的学员。抗战后，红大改称抗大，傅钟、莫文骅同志曾担任抗大政治部主任

。在保安红大时，学校的领导干部由学员自己兼任，大家生活在一起，桌子、凳子都是用石头垒起来的，大家在石洞里听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讲课。虽然那时生活很苦，但大家很愉快，学到了不少东西。他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现在环境好了，但红大的优良作风，是我们应该遵循和学习的，千万不要忘记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啊。

1955年9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我被授予中将军衔，并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授衔后不久，罗荣桓元帅乘车来学院看望，我们按条令规定的礼节，组织干部和学员佩带军衔，列队站在大门两旁迎候。罗帅下车同我们几位院领导握手后，大步走过欢迎队伍，到了办公室。他批评我们的迎候礼节，告诫我们再不要搞那些形式上的东西，以免影响学院的正常教学秩序。过了几天，罗帅又来到学院，我们没有列队欢迎，只有几位院领导和部门负责同志在门口迎接，但罗帅又提出批评说，你们这样不好，我是院长，你们也是院领导，这样搞，以后我怎么工作。从此，罗帅到学院时，我们再也没有迎送。

他有时干脆不打招呼，直接到学员队听课或去基层了解情况后，再到办公室找我们领导干部谈工作。从学院创办开始，罗帅就反复强调，政治学院

要像红大、抗大那样，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传统作风，要成为继承和发扬我军优良传统作风的模范。罗帅坚持勤俭办院的方针，反对把办公室、宿舍、俱乐部修建得过分豪华，把办公室的用具设备搞得过分讲究。学员职务有高有低，高的有中将，如梁兴初中将，聂鹤亭中将，职务低的有少校、大尉。也有少数民族干部，如与我一起参加百色起义的覃健中将就是壮族。

起初按职务编班，军以上干部还配有沙发。罗帅说，这样不行，要搬掉沙发，混合编班，都当普通一兵。职务高的和职务低的，文化高的和文化低的编在一起，让大家互相取长补短，密切上下级关系。我们在罗帅直接领导下工作，对罗帅勤奋忘我、深入务实的工作风范耳濡目染，深受熏陶。在实际工作中，我们认真贯彻罗帅指示，注意言传身教，抓好学院作风建设。我认为，能否培养好作风，是办学成败的标志，尤其政治院校更要有好的作风。如果理论学的满腹经纶，而作风不好，行为不端，学员回到部队，也会把兵带坏。继承红大、抗大传统作风，并不是简单地去重复和模仿过去的某些做法，而是把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作为一种永不枯竭的巨大战斗力和无形的宝贵财富继承下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学院创建初期，我们带领全院人员克服困难，艰苦创业，一边工作，一边参加建院义务劳动，如平整操场，修建道路，植树，种草，我们还办起了农场，种了稻子和蔬菜，养了猪、鸡、鸭，全院人员用自己的劳动汗水来改善生活条件。

建院之初，白手起家，需要的经费较多。我们按照罗帅指示，艰苦奋斗，勤俭建院，从不利用罗帅的身份和名望批条子为学院增加额外经费。我觉得，政治学院如果利用元帅的牌子到处伸手，就背离了“政治”这两个字的含义。

建立起正规化教学体制

1956年3月16日，政治学院举行首届开学典礼暨国防部授予政治学院大军区级的军旗仪式。这标志着学院建设进入了教学体制逐步完善，以教学为中心的各项工作的逐步正规化的新阶段。在庄严的气氛中，谭政大将代表中央军委授旗，我代表政治学院接旗。国防部长彭德怀和院长罗荣桓元帅在典礼上作了重要讲话。中央军委副主席朱德为政治学院开学题词：“提高干部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是政治工作建设的基础”。参加大会的还有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等同志。

创办政治学院，在我军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在延安时期虽然有过一个军政干部学院，但招生后没有正式开学。

政治学院是军队的高级党校，是全军最高学府之一。它的任务是培训军队中高级干部，提高马列主义理论素养，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增强党性锻炼，学习现代的军事科学知识和军队政治工作，使之能够更好地担负起现代化建军中的领导工作，有效地加强我军政治建设，以适应现代化建军和作战的需要，从而完成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任务。根据军委通过的学院训练方针和任务，学院在罗帅领导下，继承和发扬红大、抗大的光荣传统，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坚持了正确的办学方向。罗帅多次在学院的讲话中强调指出：政治学院是搞政治的，要从书本上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以帮助我们认识事物，掌握事物发展的规律。但书本上的东西，往往只是一些概念，绝不能单纯满足于书本的学习，把书本上的东西变成死的教条，更不能把抽象的概念公式化。

如果把理论看成静止的东西，那三分钱也不值。罗帅在强调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针时，还非常重视党员、教员和干部的世界观的改造。他指示我们学习革命理论必须结合改造思想，增强党性。他提出了“思想回炉”的要求，回炉冶炼，百炼成钢。

我们广大干部虽然经过战争环境的锻炼，战争关过来了，但胜利之师容易滋长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和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只有经常“思想回炉”，不断改造思想，战胜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才能保持无产阶级的政治本色，以适应革命形势发展和我军建设的需要。为了推动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我们在教学过程中，有计划地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一方面让学员走出校门，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活动，如参加工地劳动、整社运动等，在社会实践中增加感性认识，加深对书本知识的理解，促进世界观的改造；另一方面，请一些有丰富实践经验和有专门研究的专家学者来院讲学，作报告。

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先后邀请了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国务院各部委的负责人及其他各方面人士70多人。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报告中对形势的分析，对理论的阐述，对党的方针政策的讲解，深入浅出，给学员留下了深刻印象。这种走出去，请进来的学习方法，在当时的军队院校中尚不多见。

罗院长对学院的要求是很严的，可在政治学习上对我们却很照顾。他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经常把中央的主要精神向学院传达，把对学院教学方面有关的重要文件让我们看，给我们“吃小灶”。他的夫人兼秘书林月琴同志，也积极地帮我们选些有关文件参阅。使我们能及时了解国内外形势变化。那时国际共运出现分歧，发生重大变化，我们知道的情况都很早，这对学院的

政治理论教学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我们以中央精神为指导，结合教学内容来讲解，新鲜深刻，学员非常欢迎，进一步提高了教学质量。政治学院在实践中逐步摸索出一条以探讨中国革命问题为主，以研究我军政治工作建设为重点，认真学习和贯彻毛泽东思想的政治理论教育的新路子。罗院长总结学院开办几年来的教学经验，提出了“一条线五结合”的学习方法。“一条线”，就是学习毛主席著作以中共党史为主线。“五结合”即：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学习马、恩、列、斯的著作相结合，和学习党的路线、政策相结合，和了解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以及军队建设相结合，通读和专题研究相结合，经常性理论教育和政治运动相结合。这一方法中的个别提法，虽然今天已不适用，但从整体上说，它确实体现了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体现了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政治学院坚持罗帅提出“一条线五结合”的学习方法，在全国率先倡导通读毛主席著作，不仅使广大学员全面系统地学习毛泽东思想，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加深对立场、观点、方法的理解，使理论学习收到明显成效，而且对全国即将兴起的群众性学习毛主席著作热潮的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军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政治学院的创建和发展，始终得到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重视和关怀。毛主席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接到建院请示报告后，第二天即予批准。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一起先后5次接见政治学院的毕业学员，并合影留念。毛主席还亲笔为院刊题写了《思想战线》的刊名。刘少奇同志从党费中特批50万元，支持学院的筹建，这个数目在当时是相当可观的。朱总司令等8位元帅亲临学院视察。周总理曾高度评价政治学院组织通读毛主席著作，并在1961年指示外交干部要到政治学院学习。学院筹办了地方外事干部班。1963年3月19日，毛主席在薄一波同志的报告上批示，同意工交系统各部设立政治部，并指示“派地方干部到莫文骅管的政治学院学习”。学院又开设了培训地方干部的两个班。彭真同志在大会堂向我敬酒时说，祝贺你们！毛主席为政治学院作了批示，再接再厉，好好搞啊！叶剑英元帅也给我打电话祝贺，并询问我的身体怎样，勉励说，政治学院任务很重，继续努力啊！谷牧同志表示，政治学院扩建时，要地给地，要钱出钱，没人施工，由地方办理。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这几年，是政治学院历史发展的鼎盛时期，到1965年共毕业学员9000人，培养了大批具有马列主义理论素养的政治工作领导干部，为我军在新形势下，继承和发扬光荣传统，加强政治建设，做出了贡献。我在政治学院期间，有幸在罗帅直接领导下和肖华同志的帮助下工作，就是后来肖华同志不兼副院长、罗帅也不兼任院长了，但他们仍然很关心政治学院工作。罗帅对军队和政治学院建设，耳提面命，循循善诱，关怀备至，这使我得益匪浅。作为罗院长的助手，我带领大家响应罗院长的号召，怀着一颗“忠诚党的教育事业”之心，以“在学院干一辈子，死了就埋在八宝山”的忘我精神，刻苦攻读，勤奋工作。全院上下，政治热情高，学习空气浓，成为政治学院最红火的时期。为了领导教学，把好理论关，我白天工作，晚上看书，星期天跑书店，仅买书就花掉了3000多元。那些年，我挤时间读了不少政治理论和历史、文学等方面的书籍，《资本论》读了两遍，还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选集》（四卷本）、《毛泽东选集》等，是我有生以来读书最多的时期。那时，政治学院还开办了越南班，培训越南师团职干部。1958年胡志明主席来我国访问时，还来学院看望了越南班的学员。胡主席来学院，事先我们没有接到上级通知，一点情况也不知道，是中

联部的同志带他来的。到学院时，胡主席也没有走校门，而是从靠马路边一侧的松树墙的小道进来的。那时是按苏联社会主义大围墙的办法，学院四周没有砖墙，栽松树墙。当我接到报告时，胡主席已在学院幼儿园看望孩子们，我便赶快到了幼儿园。胡主席穿一身中山装，也没带随员，真是轻车简行。看过幼儿园的孩子们后，我陪胡主席来到了越南班。胡主席看望了越南学员，并讲了话。胡主席离校时，我们组织了欢送。在政治学院期间，我还先后两次率军事代表团出国访问，一次是1961年8月，以我为团长的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捷克斯洛伐克；另一次是1963年7月，以刘亚楼为团长、我为副团长的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了古巴。

“原汤”与“二道汤”

政治学院是在国内政治风云多变，政治运动不断的历史条件下创办和发展起来的。政治理论领域是政治运动的敏感点，每次运动来了，学院教学受到冲击，学院领导也难免被裹进运动的漩涡。

在罗帅领导下，政治学院率先组织通读毛主席著作，坚持全面系统地学习毛泽东思想。此举，当时在全国范围内属开风气之先，亦是政治学院对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重大贡献。

然而，在当时复杂的情况下，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往往受到各方面的压力。

50年代，人们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并不一致，社会上一些人对政治学院在政治理论教学中主要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作法，颇有非议，认为简单化，他们有所谓“原汤”和“二道汤”的说法，认为马、恩、列、斯的著作是经典著作，是“原汤”，“原汤味道浓”，而对毛主席著作评价不那么高，错误地认为是“二道汤”，“味道不浓”，主张政治理论教育主要学“老祖宗”的经典著作。社会上的这种看法对军内也有影响，有的人亦持此看法。在我们学院内部也有人错误地认为毛主席著作“理论少，实际多”，“不系统”，学起来“不过瘾”，对学院的理论教学持怀疑态度。在这种境况之下，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在学院内外都要做工作，进行说服教育，甚至是必要的斗争，就难免会得罪一些人。罗荣桓同志是我们党内较早认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作用的高级领导人之一。他在建国之初就明确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写的东西是经典性的东西，毛主席写的许多东西也是经典性的”。他认为毛泽东思想早已越出一般经验的范畴，而上升为经过实践检验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理论。罗荣桓院长认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化，政治理论学习首先要学好毛主席著作。在罗帅领导下，政治学院对社会上所谓“原汤”、“二道汤”之类的错误说法进行了抵制，坚持以罗帅倡导的“一条线五结合”的学习方法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活动。实践证明，罗帅提出的关于以党史为线索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主张，对于领会毛主席著作的精神实质，掌握革命理论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是非常正确有效的，受到广大学员的欢迎。

50年代初，我军开始步入正规化建设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曾一度出现主张学苏军搞一长制，取消和削弱政治工作的偏向，一些人对学习毛主席著作不理解，不支持，对政治学院不怎么感兴趣。这当中不少是来自上层的压力，实际上是在建军问题上的反映。

1958年夏，全军开展反对教条主义运动，政治学院成为重点。总政领导亲自挂帅，带工作组进驻学院，开展反教条主义斗争。开始，我正在南宁参加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大会，听到学院一夜之间出现许多大字报的情况，我马上乘飞机回来。我们学院领导都检查了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检查了教条主义的影响，但通不过。工作组把我作为斗争对象，发动群众揭发批判，大字报也上了墙。运动来势很猛，搞得空气很紧张，使人感到不挖出教条主义来，运动不会收兵。折腾了两个多月，虽然揭发出一些工作中的缺点，如房子为什么盖成平顶不搞尖顶？大队部不知在哪，那么官僚啊？而发现最大的“大西瓜”是刘少奇同志批给50万元建院经费没用完，为什么存银行，不上交呀？等等，但没有挖到什么教条主义的象样材料。当时，罗帅因病已辞去总政治部主任的职务，但仍兼任政治学院的院长，正在北戴河疗养。我不便

向他报告学院运动情况，只送简报给他。他从简报中看出了问题，认为工作组的搞法不对头，便给总政治部领导打电话说，你们整政治学院教条主义，怎么不告诉我呀，我还是院长啊，你们搞了两个多月，未见什么教条主义啊，政治学院不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吗？这时，工作组马上转变风向，又是一夜之间我由批判对象一下子变为支持对象。由于风向转得太快了，以至有的人刚贴上批判我的大字报，不好揭下来了，只好又写张拥护我的大字报覆盖上去。政治运动中有些现象确让人啼笑皆非。这场历时 72 天的运动，便告结束了。

政治学院所处的复杂情况，也使兼第一副院长的肖华同志有所考虑，他提出以后不再兼副院长了，觉得总政如有错，他有责任，政治学院有错，他也有责任，挨一头，不挨两头。罗帅也表示要辞去院长职务。我觉得不行，没有罗帅挂帅和肖华的参与领导，靠我是很难支撑政治学院局面的。我对他们说，你们要辞职，我也不干了，到部队去。后来他们还是辞去了学院的领导职务。1961 年底，军委任命我为院长。罗帅不兼院长了，但我们仍向他汇报请示，他也很关心学院的工作。

“‘立竿见影’看来在政治学院不行”

60年代，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以极“左”面目出现，对学习毛主席著作提出了“带着问题学”的主张，后来又将其膨胀成为“30字方针”。

一时间，林彪鼓吹的“背警句”、“走捷径”、“一本万利”、“带着问题学”、“立竿见影”等实用主义货色泛滥，背语录成风。罗荣桓同志对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和实用主义的一套非常厌恶。罗帅曾在一次军委常委会上，当着林彪的面，明确指出，带着问题学毛选，这句话有毛病，只学习“老三篇”太简单。主要是学毛主席著作的精神实质。罗帅在学院一次干部会上说：毛泽东思想是对马列主义的发展，毛泽东思想本身也要发展，它是科学，不是教条。我们要认真读书，但不要本本主义。

他以轻蔑的口吻说：“‘立竿见影’，看来在政治学院不行”。

他还说：“学习毛主席著作哪能像立根竿子一样马上就能见影”，“一个青年人没有经过革命实践，学习就能‘立竿见影’了？未免太简单了”。

当时，林彪的“30字方针”在军内外已经叫得很响了，可在政治学院并不买帐。我们仍然坚持罗帅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系统完整地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方针，继续开展通读毛主席著作的活动，我要求党史教研室有计划地分单元辅导学员学习《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对林彪鼓吹的“立竿见影”的提法，给予公开抵制。我在学院教职员大会上说：“我认为‘立竿见影’，首先要立竿，才能见影。竿就是毛泽东思想。立竿，就要通读好毛主席著作”。这段话，后来“文革”时成为我反林彪的罪行之一。在学习方法上的对立和斗争，实质上是怀有野心的林彪一心想把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抢到手，政治学院也就成为他的“眼中钉”。

1963年12月16日，罗帅的病情恶化，弥留之际，我们学院的几位领导赶到北京医院，一直守候在他的病榻前。中午时分，戎马一生的罗帅走完了他艰难而又光辉的人生旅程，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带领学院领导为他守灵，望着罗帅的遗容，想到跟随他南征北战的战斗岁月和他的谆谆教诲，我悲痛万分。罗帅是我最为敬重的老首长、好老师！我在罗帅直接领导下工作多年，对罗帅的品格和风范感触尤深。罗帅逝世后，我写了悼念罗帅诗：

尽瘁为民仆，终身对党忠。
阵上元戎概，帷中长者风。
韬略辅国计，思想励英雄。
宇内风云急，晚辈待扶帮。
国骏途中逝，哀哉折栋梁！
遗训铭肺腑，行为宜健康。
力量从悲出，奋发益自强。

这首诗表达了我对罗帅的敬仰、感激和悼念之情。在罗帅治丧的日子里，我为国家失去栋梁之材，我们失去好师长而悲痛不已，心情非常沉重。同时，心里也有一种难以名状的忧心和预感，罗帅走了，他在政治学院所开创的事业还能坚持下去么？这种忧心和预感，不久果然来了。1964年7月，军队院校开展整风，政治学院又成为运动的重点。工作组进院搞了一个多月，抓住了我抵制林彪实用主义学习方法的“罪行”，说我对新军委的方针和林彪的指示阳奉阴违，另搞一套等等。9月16日，工作组向林彪汇报，林彪对工作

组恶狠狠地说“政治学院很不政治，莫文骅不知天高地厚，要和他摊牌！”于是，工作组便发动学院开始了对我进行几个月的批判斗争。后来，他们挖空心思，找到了我在延安时期写的一本《红军第七军简史》，说这本小册子中有诽谤原红7军某领导人的话，给我又加了一条“罪状”。说起来，这本小册子已是20年前的事了。1944年延安整风后期，由朱总司令、陈毅军长主持召开在延安的原红7军干部座谈会。座谈会上，大家畅所欲言，回顾红7军创建和发展的斗争历史，总结经验教训。

会后，因大家要离开延安回去，我在中央党校学习，领导上便让我把会上大家的发言整理成材料，“张军长云逸亦从华中来电指示做这件事”。这样，我按照组织上的要求，根据座谈会上同志们的发言和过去搜集的材料，整理成了这本小册子。初稿草就后，10多名原红7军干部进行了传阅、座谈，提出修改意见，书中每部分内容主要是哪些同志的意见均有说明。我在前面的说明中写道：这本小册子“无论是历史经过也好，历史的经验教训的意见也好，难免有遗漏及认识错误之处。特别是主要的红七军负责人张云逸、邓小平同志不在，未能参与其事，他们的意见未能提出。因此，只能作为研究红军史的参考材料，并供党中央作红七军结论的参考”。写后由八路军总政治部作为“秘密文件”铅印存档。以后我们从没有提及过它。1964年，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委员李志民同志在中央档案馆发现了这本小册子，他拿来作为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印发给学员参考。事前我也不知道。他们送给政治学院10份。

我知道后，告保密室不外传，不使用。并电告李志民同志把印发的小册子收回，说明这是供中央参考的材料，不宜印发。叶帅也来电话询问这件事，我如实相告，叶帅表示同意我的处理意见。本来，作为研究红7军历史之用的参考性材料，其整理编印过程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就材料内容本身也没有什么值得非议的地方。可是工作组看到这本小册子后，却拿来大作文章，硬说小册子里有诽谤原红7军某领导人的话。其实，他们所说的话，小册子里根本没有。他们是把自己说的话，强加给小册子，迁罪于我。他们造出靶子，再用来批判别人，始作俑者正是他们自己。既然林彪已经有话，对我下了那么大的狠心，我的厄运是躲不过的，小册子不过成为他们打人的工具，且一箭双雕。

1965年3月，他们在军委办公会议上宣布撤去我的政治学院院长和党委书记职务的决定。我当即表示：决定与事实不符，我保留个人意见。我被撤职后，政治学院诵读毛主席著作活动从此被取消了，政治学院的扩建计划被撤销了，按照毛主席1963年批示开办的地方干部班，也办不下去了。很遗憾，辜负了毛主席的期望！政治学院开始走向衰落。

1965年夏，我报名参加了农村“四清”工作队，到江西萍乡工作了4个月，后因胆囊炎发作，痛得厉害，工作队派医生送我回北京治病。1966年7月，组织上分配我到福州军区担任副政治委员。虽是降级使用，但让人从中也看出些变化，先前决定说得那么重，怎么又让去紧张的前线军区任职呢？

8月初我去福州军区报到，8月下旬便赶回北京，准备搬家到福州。当我整理好行李准备启程时，我打电话向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同志辞行。叶帅说：“暂不要走，等一等再说”。

过了几天，叶剑英同志又来电话告诉我：“你的问题可以平反了，你也可以不走了”。

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同志也来电话说我的问题将很快得到平反，平反后的工作将有所变动。不久，经党中央、毛主席批准，总政作出决定：撤销原来对我的处分决定，冤案终于得到了平反。

第十五章 “文革”劫难

身陷囹圄

1967年元旦，北京的街头听不到鞭炮声，没有一丝节日的气氛。大街小巷到处是大字报、大标语，到处是乱哄哄的人群和造反派“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喧嚣声。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冲击下，“文革”运动进入全面进攻、全面夺权的阶段。党和国家被拖进了“打倒一切”的全面内乱。4月上旬，经聂荣臻元帅提议，毛主席批准，中央军委重新任命我为政治学院院长。我是在医院里接到这个命令的，当时我胆囊炎发作，正住院治疗。我感谢毛主席和党中央对自己的信任，但又不愿再回政治学院工作，曾向总政治部主任肖华面谈了自己的想法，未获同意，我只好服从组织的安排。我胆囊炎手术出院后，身体虚弱，经医院建议、组织批准，让我在家休养3个月。

这时，“文革”夺权的狂潮已开始冲击军队系统，政治学院的“文革”运动也起来了，两派组织都找上门来，逼我表态支持，我都拒绝了。后来学院的“三军无革派”掌了权，他们多次来我家里，要我表态支持。遭我婉词拒绝，但他们仍不罢休，每天都派人来“争取”我，紧缠不放。不久，他们又拿来了以政治学院党委的名义表态支持“三军无革派”的声明给我看，让我签名，我还是不同意。

他们纠缠了两个多月，最后终于向我摊牌了，你不答应，“无革派”就不会与你合作，也不会拥护你，往后有你好戏看！这时，“三军无革派”得到林彪的公开支持，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也都站在这一边，该组织在军内外红得发紫，叫得很响，威风一时。大潮之下，压力很大：若支持他们，会得到这一派的拥护，日子会好过一点，林彪、吴法宪、黄永胜、邱会作过去都是四野的熟人，站过去，自己也会“红”起来，说不定还会有一番“发迹”；若不支持，目前的处境都很危险。可我还是没有同意，并非是先见之明，而是有我自己的看法：不是口口声声说：“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缔造，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吗，你指挥的军队怎么还分成两派？

领导干部支一派，打一派这怎么得了呢？这样搞下去，今后10年军队也不会平静。我更记得延安时期康生搞“抢救”运动的历史教训，打了那么多“特务”，运动时头脑发热，到头来还是要甄别平反。造反派对我先拉后打，于是，灾难降临了。9月18日黄昏，当我休养时间快到，准备上班时，政治学院造反派的一群彪形大汉，突然闯进我家，不容分说，就把我揪走了。杨枫怕我凶多吉少，也陪我上了车。

本来，从我家的西松胡同出长安街，可直接到政治学院，但他们故意转弯抹角，经西单转西直门，兜了一大圈，不知他们要把我拉到哪里去？到了政治学院，他们把我关进原来住的一间房子里，当晚便审问我到深夜。他们说我和肖华、吴克华相勾结，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反对林彪，是“三华反三军”；说我根据《红七军简史》写的公开发表的《回忆红七军》小册子里有多处吹捧邓小平，为中国第二号赫鲁晓夫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是刘、邓的黑干将。这样，一夜之间，“刘（少奇）、邓（小平）黑干将”、“三华反三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可怕的罪名栽到了我的头上。从此，先是关押批斗，后是农场劳改，开始了长达8年的迫害。我被关押后，领章、帽徽都被剥夺，每月只发给22元生活费。随着全国动乱的升级，造反派对我的管制也越来越严，不准我回家，也不准家人来探望。批判斗争的次数与规模也不断升级，除在学院被审讯、批斗挨打外，还曾被拉到东郊体育场和50

多名将军一起被批斗。当时，我已年届花甲，胆囊手术后的身体尚未恢复，每天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和肉体的摧残。无休止的大会小会轮番批斗，扭臂弯腰，刑讯逼供，使我周身浮肿，血压升高，脉搏曾每分钟达 130 次；写不完的检举揭发、交代认“罪”材料，使我的手臂颤抖，头晕目眩。

仅 1968 年 12 月份，我就被迫写出了 12 份材料，计 70 页 3 万余字。“抄材料真累，写材料更累，我成了作家了”，我在日记中留下了这样的话。在恐怖的日子里，在威逼面前，我据实讲话，据理申辩，实事求是，绝不害人。我的日记里多次写着：“我讲的情况，他们说都是流水帐，他们要的是反革命活动的材料，我说，我编不出”，“写的揭发材料，自己也觉得不够味，勉强交卷，准备挨斗”，“按事实来说，交代清楚了，按你们的要求是交代不清的”，“会上顶起来了，他们骂我顽固”，为此，我的“问题”升级了，成了“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全军两个最顽固分子之一”，带来的是新一轮更严酷的批斗。

拉车行

1969年11月，我被关押了两年多后又被押送到河北望都农场劳动改造。离开北京的那天，我们几位“牛鬼蛇神”被装在一辆大卡车上，看着街头贴满一张张带有火药味的大字报和大标语，心头翻起阵阵苦涩。当年，我曾以胜利者的姿态，率部最先进入北平，为古都的新生激动得一连几个晚上不能入眠，而今却被当作劳改犯押送出京。

感慨之中，我们都为国家的前途命运担忧！大卡车驶向保定地区的望都县后，到了离县城大约15公里的柳陀村，那里是38军的一个农场，我们便在农场开始了劳改生活。我和同来的几个“牛鬼蛇神”住在一间平房里，没有炉子，晚上很冷，冻得难以入睡。每月只有9元钱标准的伙食。每天除了繁重的体力劳动之外，还少不了没完没了的揭发批判，交代检查，仍进行着精神和肉体的轮番折磨。春去秋来，掏厕所，起猪圈，运粪施肥，锄地拔草，种瓜种菜，农场的脏活重活让我们几个劳改的“黑线人物”干遍了。过度的劳累，使我身体日衰，患了严重的心脏病。劳作一天，脉搏跳动加剧，血压升高，头晕目眩。盛夏酷暑，我和张弥同志被分配到几公里外的地方拉马车运砖头，一人在前面拉，一人在后面推。天气炎热。酷日灼人，我俩穿着短裤、汗衫背心，头戴草帽，肩上搭着被汗水浸透的毛巾，气喘吁吁地在坑坑洼洼的乡间土路上拼命地拉。每趟下来，全身湿透，精疲力尽，重车重载，遇到沟坎过不去，幸亏过路的老乡帮把手。当老乡知道我是60多岁的老红军，不解地问：老红军遭这份罪，这是咋的了？老翁做马匹，惩罚性的劳改，并没有磨掉我的信心与希望。晚上，我写了一首《拉车行》小诗：

壮马今休息，我们代其力。
已是花甲人，啧啧称良匹。
酷日汗如雨，驱车何其疾。
道路长且曲，终须到目的。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我养成了坚持读书和写日记的习惯，然而，在极左的年月里，写日记，记笔记却无端生祸。我曾在《毛泽东选集》的扉页上写有“书中有真理”5个字，被攻击成反毛泽东思想，因为按造反派的逻辑“有真理，还有不是真理的了”；在《毛泽东选集》中有毛主席给东北局的电报，批评不愿打锦州而打长春。我旁注：“1948年，举棋不定，实伤脑筋”几个字，成为反林彪的“罪行”；我撰写的《回忆红七军》小册子，成为“吹捧邓小平的罪证”，打成“邓小平黑干将”。写日记给我带来不少麻烦，但我矢志不悔，在失去自由的情况下，仍坚持读书，学习英语，天天写日记，被没收后又再写。

因为我相信，邪恶只能横行一时，阴霾终将过去，自己的问题一定会得到解决，重新为党工作。我公开向造反派说，你们有权，可以把我斗死、打死，但最后会有人给我平反的。我相信这一天，等待这一天，精神不垮，希望不灭。处在被关押的情况下，写日记并不容易，我是经过力争才坚持下来，有些话和诗是分散写在书刊、笔记本中才得以保存下来。

“文革”8年迫害，我写下了几万字的日记，留下了那个年月的难得的回忆。在遭迫害的8年中，我先后读了《马克思、恩格斯通讯集》（13卷）、重读《资本论》（1—2卷）、《反杜林论》、《列宁选集》等马列著作和《孟

子》、《战国策》、《资治通鉴》、《中国文学史略》、《魏晋六朝诗选》、《古诗源》等文史书籍，以及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康德的《宇宙发展概论》、朱可夫的《回忆与思考》和《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等书籍，共读了120多本，作读书笔记、摘记5万多字，成为我一生中读书最多的时期之一。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终于盼来了所希望的这一天。当时，他们给党中央打报告，说我是坏人，开除军籍、党籍、送农场劳改。

1969年10月毛主席批示：“莫文骅似乎不是坏人，由于不会团结人，所以得罪人不少。我不熟悉此人底细，因此，请军委处理”。毛主席的批示，使我的问题出现了转机，问题的性质变了，由敌我矛盾变为内部矛盾。因此，发还我解放军领章帽徽，工资照发，伙食标准也提高到每月15元。但由于江青的纠缠，使我的问题又拖了3年。那还是在1956年，我偶然看到电影新片《宋景诗》的广告，说宋景诗是农民起义领袖，并大加赞扬。我认为：宋景诗领导农民起义后，曾率黑旗军，转战山东十几个州县，影响较大，但后来他降清并按清廷的要求离开山东，率部过黄河南下打捻军，最后失败了。影片把宋景诗当作农民起义的领袖来歌颂，是不妥当的。

因此，我写信给当时的中宣部长周扬，周扬把信转给了周总理，周总理建议召开有关人员参加的座谈会讨论。在中宣部召开的座谈会上，我谈了自己的看法，影片创作人也作了解释，说我的意见是自然主义的看法。第二天，继续开会，范文澜、林默涵等同志发言都表示赞成我的意见。周扬坐在我的旁边，他用手在桌上给我写“江青搞的”的几个字。

会议总结时，周扬建议影片作修改。后来周总理又召开一次修改影片《宋景诗》的会议。该片作了一些修改。后据了解，这个影片确是江青搞的，她对我的批评信很恼火。

这事已过了10多年，想不到江青仍记恨在心，非要处分我不可。直到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军委工作后，在叶剑英和邓小平同志的关怀下，我的问题才得到彻底平反，不堪回首的8年迫害终于结束了。

“创 疤”

在那极左的“文革”年代，一人遭难，株连全家，妻儿老小亦不放过，1967年9月，我被造反派关押之后，过了几个月，杨枫被所在单位（科技大学）的造反派关押起来。她是科技大学政治教研室的副主任，在学校里算不上什么当权派，她是受我的问题株连的。

那时，政治学院为了动员杨枫揭发我的问题，曾把她押到政治学院审讯，关在我住的一楼西边的房子里，但我们不能见面。有一天，我听到房门外一阵熟悉的快促脚步声，我猜想是杨枫被揪来了，因房门紧锁着，我想从门缝里看，却看不见她，心里很为她和家人挂念。

后来，有一天从门窗往外望，看到几个人跟着一个女的，从背影和走路看，是杨枫，才知她被押回科技大学。直到1968年7月，学院在批斗我的大会上宣读了中央军委4月28日关于把我和杨枫的问题列入肖华专案审查的批示，这使我感到，杨枫受我株连，我的问题不解决，她也解脱不了。秋风落叶的季节，瑟瑟寒风，草木凋零。我在一片枫叶上，写下了“红枫”两字，寄托对杨枫和子女们的挂念。

1938年我和杨枫在延安结婚以后，在战争年代，部队转战南北，杨枫拖儿带女辗转追随。出延安，进东北，入北平，下武汉，奔南宁，历尽艰辛，难得团圆，是共同的革命目标把我们连在一起。我们的爱情也经受了党内斗争风雨的考验。1942年康生在中央党校搞“抢救”运动时，年轻的杨枫被隔离关押，打成国民党特务。有人动员我与她离婚，划清界限。在压力面前，我不相信她是特务，也不相信中央党校会有那么多“特务”。而今“文革”动乱，我们横遭厄运。身隐囹圄。

但我们的心是相通的，相信自己的清白和对党的忠诚。在最险恶的日子里，杨枫和孩子们记着我的话：不叛党，不叛国，不参加小组织，不自杀。后来，我被遣送河北望都劳改，她也被送往安徽农场劳改，历尽磨难，天各一方。直到1972年我从农场回家，我们分别5年后才得团聚。我被关押后，家中被抄，子女们受株连也成了“黑帮子女”。

大儿安来被其单位作为“五·一六”分子关进“牛棚”；二儿安临被送到内蒙插队；大女晓萍被送到“五七”干校劳动；二女晓峰在北京郊区当工人；14岁的小女晓都尚在中学读书。孩子们失去昔日温暖的家，失去父母的爱护，如同离群的孤雁，顶着“黑帮子女”的帽子，风雨飘零。尤其尚未成年的小女一人在家，无依无靠。我们每月给她挤出20元的生活费，钱不够用，她只好把家里的旧书、怀表、自行车等值点钱的东西拿去卖掉，才勉强维持下来。那年大女儿被送河南“五七”干校劳动，二女儿晓峰去当工人。我正关在囚室里，是从学院的广播中听到消息的。我不能为她们送行，只能从窗门缝向外偷看，见3个女儿向外走去，小女儿都是去送行的。当时，我非常难过，百感交集，随即写下《送女行》一首小诗，分散抄在书页缝里。

咫尺一窗隔，女别目送行。

如刀割肺腑，涕泪满胸襟！

崎岖踏远道，肝胆炼丹心。

遥祝幼苗长，葱葱吐红英。

难熬的严冬终于过去了，迎来了希望的春天。随着我的问题的解决，受

牵连的杨枫和孩子的问题也相继得到解决。杨枫被“解放”出来，从安徽农场返回了北京；大儿摘掉“五·一六”的帽子，重新安排了工作；二儿在内蒙插队，坚持自学，考上了大学；大女儿从河南“五七”干校回京安排了工作，后被推荐上了大学；小女儿参军后也上了大学；唯独二女儿“文革”初期，被作为“黑帮子女”分配去北京郊区工程队从事体力劳动，我从农场回到北京后，正好有征兵指标，她要求参军，已搞好了申请表和体检，而工程队却不肯让她走，她想不通，说爸妈都“解放”了，自己还没解放。

一天，她到火车站送参军的小妹，由于精神受到刺激，不幸得了精神分裂症，经过多方救治，没有痊愈，这是“文革”给我家留下的一块难以医治的“创疤”。在10年浩劫中，我白白耗费了像10年内战一样长的宝贵工作时间，落下了严重的心脏病，有一年突发两次心肌梗塞，医院曾下了病危通知书，这是10年来身心备受折磨和摧残的结果。这也是留在我心灵和身体上的一块难以治愈的“创疤”。

我总算是幸运的，看到了祸国殃民的林彪和“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覆没，而刘少奇、彭德怀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被无辜迫害致死、致残，党、国家和各族人民遭受了深重的灾难和损失，这更是一块无法估量的大“创疤”！

第十六章 任职装甲兵

整顿部队

1975年初，经毛主席、周总理提议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军委常委会工作由叶剑英同志主持。我们党、国家、军队开始出现了全面整顿的新形势。7月，在叶剑英、邓小平同志的关怀下，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同志签发命令，任命我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政治委员。此前两个月，原成都军区司令员黄新廷同志重新工作后，已被中央军委任命为装甲兵司令员。在此前后，原装甲兵的贺晋年、程世才、张文舟等老同志也先后重新出来工作。

后来，军委又增派钟汉华同志任装甲兵第二政委。装甲兵在“文革”中是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破坏的重灾区，原兵种司令员许光达大将被迫害致死，许多领导干部被打倒，一批长期在装甲兵工作的教员、科研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被遣散，院校、科研机构被撤销，部队军政素质下降，兵种建设遭到严重破坏。

为了结束“文革”造成的混乱局面，恢复和建设装甲兵，我们新组建的装甲兵党委排除干扰，顶住压力，坚决贯彻毛主席关于“军队要整顿”的指示和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精神，着手整顿各级领导班子，消除派性，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政策，解放干部。兵种党委成立了以我为组长，由姚国民、贺晋年、邱相田等同志参加的整顿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装甲兵机关和所属单位的专案复查、调整领导班子和安排超编干部等工作。兵种党委还派出有兵种领导同志带队的几个工作组，分赴装甲兵各大单位贯彻军委扩大会议精神，整顿部队。

我们把为许光达同志恢复名誉作为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突破口，组成专案组经过深入的调查核实，推倒了加在许光达同志头上的一切不实之词。装甲兵党委于1975年8月14日向军委上报了《关于为许光达同志恢复名誉的报告》，经邓小平等军委领导同志审批后，总政1975年10月21日批复：“经中央军委批准，给许光达同志平反，恢复名誉，对许光达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并将批复和装甲兵的报告转发全军。随着整顿工作全面展开，使兵种建设开始出现新的转机。然而，这刚刚出现的希望，不久又淹没在“四人帮”搅起的黑风恶浪之中。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我们党委一班人对来自上边“左”的东西冷眼相对，用心应付，保护干部，团结广大机关干部一起，顶压力，排干扰，稳定部队，努力使“四人帮”的破坏减少到最低程度。粉碎“四人帮”之后，按照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部署，深入进行了揭批“四人帮”的三个战役，我们结合装甲兵实际，全面进行思想、政治、组织和作风纪律整顿。

揭批“四人帮”运动，大大推动了落实政策和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使一批老干部重新出来工作，一大批教员和科研技术人员重返部队，心情舒畅地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据统计，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共复查了483名同志的问题，清理了1234人的档案材料，推倒了里面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给152名同志彻底平了反，恢复了名誉；给133名同志撤销或减轻了处分；对被迫害致死的同志予以平反昭雪；38名受迫害的军政和技术骨干收回部队，安排了适当工作；199名被错误处理离队的同志分别情况作了妥善安置。1977年6月，兵种机关召开落实政策大会，为许光达等同志平反昭雪。至此，装甲兵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政策的历史任务基本完成。

清除“左”的影响

粉碎“四人帮”之后，装甲兵建设面临百废待兴局面，把林彪、“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把装甲兵现代化建设搞上去，已成为广大指战员的共同心愿。然而，由于林彪、“四人帮”多年的干扰破坏，特别是“左”的影响根深蒂固，还影响和制约着各项工作的开展。长期以来，林彪、“四人帮”以左的面目出现，极力鼓吹“突出政治”，搞乱了人们的思想。本来，人与武器的关系是统一的，不能割裂代替。打仗靠人的勇敢精神，也要靠武器的进步，是人与武器的结合。

林彪一伙却无限夸大精神力量的作用，把人的因素推向极端，肆意用“突出政治”去冲击业务工作，抓训练，搞技术被诬蔑为“单纯军事观点”、“唯武器论”。搞乱了思想，也搞乱了工作，对军队乃至整个国家建设都是灾难性的后果。其影响所及，当时不少人仍心有余悸，不敢抓训练、钻技术，业务荒疏，素质下降，部队训练事故增多。这种情况表明，在政治思想领域拨乱反正，清除“左”的影响，端正思想路线，对于开创装甲兵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是十分迫切的首要任务。

在粉碎“四人帮”的最初阶段里，我们结合揭批“四人帮”反党罪行，在政治思想领域重点清理“突出政治”的“左”的影响，摆正军政关系，恢复和发扬我军政治工作优良传统，发挥政治工作对业务工作的服务保障作用，调动大家爱军习武的积极性。各单位陆续举办了各种业务讲座和科学文化补习班。兵种机关还组织了机关干部学习汽车、坦克驾驶，使部队学军事、学科学技术蔚成风气。

装甲兵装备复杂，技术性强，对我来说还是一个知之不多的新领域。过去，我们红军、八路军打仗是靠“小米加步枪”，直到1945年我进东北时才第一次看到坦克。

为了尽快熟悉和了解装甲兵，我除了参加兵种业务工作会议，听汇报掌握情况，翻阅有关资料，学习兵种知识外，还抽出时间下部队，到院校，去工厂，调查研究。1975年9月，我在安徽三界参加装甲兵战术训练现场会时了解到，坦克部队的训练是很苦的。隆冬季节，车内像一座冰窖，乘员手、脚、脸都冻肿，不少人得关节炎；盛夏，车内高温达40度，驾驶员拉操纵杆需要很大的拉力，乘员体力消耗很大。当时坦克连队伙食标准低，乘员体力跟不上。我即把调查情况向军委发了一个电报，建议适当调整坦克乘员的伙食标准，被军委采纳了。1980年我到石家庄装甲兵指挥学院调查研究。学院是恢复后新建的单位，离市区较远，条件较差，一些同志不大安心。在与教员座谈中，我发现教员的书很少，学习研究空气不够浓。

于是我便在各种座谈会上，讲述我军军校发展的历史，讲红大、抗大的传统作风，勉励大家献身国防教育事业，为装甲兵建设培养合格人才。针对教员的读书问题，我在全院大会上曾说：“教员没有书，就好比战士没有武器，做饭的没有锅铲，这怎么行呢？在延安抗大时，我们的教员范文澜先生光线装书就有10多箱，还有的教员光读书的索引就装了一大箱子。那还是在战争时期。现在和平时期教员更应多读书，才能当好这个教员，不误人子弟”。我还在学院中层以上领导干部会议上强调，院校以教学为中心，各级领导要当好后勤部长，要舍得在教员身上投资，重视教员的培养提高，努力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造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风气。后来，学院为改善教员的工作条件采取了一些切实可行的措施，给每个教员配了一个书

架，发了100元的书费。

教员看书学习的积极性高了，也带动了教学质量的提高。装甲兵本来有很好的政治工作传统，在多年的实践中，确立起保证军事训练任务为中心的政治工作指导思想，摸索和积累了许多具有兵种特点的政治工作经验，形成了“三场”（车场、驾驶场、射击场）政治工作、开展一专多能、技术革新、爱护武器装备消灭车辆事故等一套政治工作的传统经验。其中“三场”政治工作颇具兵种特色。“三场”是装甲兵部队的训练现场，是部队教育训练的主要场所。做好“三场”政治工作，是把思想政治工作渗透到军事训练中去的的重要途径。各级政治机关和政工干部，纷纷深入训练现场，针对现场车辆集中、情况复杂、时间紧张、条件艰苦、人员思想变化大的情况及不同训练课目中人员思想变化规律，研究总结了车场、驾驶场、射击场及战术演习中政治工作的一般内容和方法，较好地发挥了政治工作的服务保障作用。

我们在深入批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破坏军队政治工作罪行基础上，开始探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清除“左”的影响，恢复和发扬我军政治工作光荣传统，端正政治工作方向，做好新时期政治思想工作问题。

1978年6月召开了装甲兵第三届党代表大会，会议的工作报告总结了装甲兵政治工作的经验教训，对今后政治工作建设，明确提出要“坚持政治与军事、业务、技术的统一”，要“恢复和发扬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认真研究新的历史条件下政治工作的新情况、新特点，大力加强装甲兵政治思想工作”。

1979年云南、广西边防坦克部队参战归来后，装甲兵党委和政治部迅速派出由机关和院校政工干部组成的调查组，到各参战部队帮助总结战时政治工作经验，兵种编辑出版了《自卫还击作战装甲兵政治工作经验》选编和宣扬英模事迹的《装甲英雄》一书。同时，兵种组织了装甲兵英模报告团，分赴各军区装甲兵部队、院校、工厂，介绍英模事迹和作战经验，推动了装甲兵部队的全面建设。

向现代化进军

粉碎“四人帮”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装甲兵建设也进入了恢复和发展时期。装甲机械化部队装备复杂，技术性强，唯有严格正规的训练与管理，才能使人与武器结合起来，生成强大的战斗力，在 10 年浩劫中，装甲兵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建立起来的适合兵种特点的部队训练、院校教育和技术保障体制，及一整套教育训练、装备管理等工作制度，遭到严重破坏。5 所院校撤销了 4 所，坦克乘员训练基地（团）等训练机构被砍掉，训练和管理法规遭废止，部队军事技术水平陷入谷底。从贯彻 1975 年军委扩大会议以后，装甲兵教育训练开始逐步恢复。北京、沈阳、济南、南京、广州、武汉和兰州军区先后组建了坦克乘员训练基地或训练团，集中培训新乘员和修理工，“恢复了“先训后补”的训练体制。

至 1979 年装甲兵陆续恢复了装甲兵指挥学院、装甲兵工程学院、蚌埠坦克学院和装甲兵技术学校等 4 所院校，重新建立了指挥、技术两条线，分级培训的院校教育体制，初步适应了装甲兵现代化建设对人才的需要。

在新的历史时期，装甲兵在总结和继承几十年训练和技术工作经验基础上，开始了全面改革，并取得新的成绩和经验。

武器装备现代化是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标志。人民装甲兵武器装备发展走过了一条从无到有，从国外进口到自行研制的过程。我军坦克部队初创时期，主要是收集日军遗弃的坦克和缴获国民党军队的坦克装备自己，部队使用的是美式、日式、英式等“万国牌”坦克；建国后，购买了苏联坦克。

50 年代末，我国自行研制了“五九式”中型坦克，结束了我国不能生产坦克的历史。“五九式”中型坦克是仿照苏制 T—54A 中型坦克生产的，其战术技术性能在 50 年代末属于世界先进水平。60 年代以来，我国开始自行设计和研制新型主战坦克和其它装甲车辆。装甲兵装备科研起步晚，但发展较快，至“文革”前，装甲兵武器装备已形成了中型、轻型、水陆坦克和装甲运输车等几个基本系列，并发展了多种配套车辆，初步建立起符合现代战争需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武器装备体系。

10 年动乱期间，装甲兵装备科研遭受严重挫折，丧失了时间，与先进国家的差距拉大了。当我们批人家“乌龟壳”的口号喊得震天响的时候，我们失去的正是与之抗衡的重要手段和力量。

进入 70 年代，许多国家的坦克已发展到了战后第三代，主战坦克已居于主导地位，其综合作战性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我们面临的形势是严峻的，因为坦克对阵，劣者将成为靶车，落后就要挨打！这种情况对我们装甲兵新党委来说压力确实很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政策给装甲兵装备科研带来了巨大活力。

1978 年 3 月 7 日，经邓小平同志亲自拍板，开始了改革开放后我军最大一桩装备技术引进。在坚持自力更生、独立自主发展我国坦克工业的基础上，积极引进先进技术，使我们跨越了某些传统技术的发展阶段，装备科研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加快了更新换代的步伐。随着先进技术的采用，我军装甲兵一方面对现有装备进行技术改造，其火力、火控等方面都有了大幅度提高，可与国外先进坦克装甲车辆相抗衡；另一方面，为研制新型主战坦克和配套装备奠定了基础，装甲兵装备科研开始了向更高的目标迈进。直到这时，悬在我们心头多年的石头才落了地。军事理论是军队现代化的先导，正如列宁所

说：“没有科学，尤其是没有军事科学，是无法建立现代化军队的”。军事理论先进与否，是赢得战争的重要因素。长期以来，在许光达为第一书记的装甲兵党委的领导下，人民装甲兵经过不断探索，确立了适合我军特点的兵种作战理论与使用原则。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装甲兵作战理论研究得到了恢复和加强，总结了还击作战中装甲兵实战经验，探讨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装甲兵作战理论。装甲兵作战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也是在不断克服“步兵制胜”传统观念的影响中发展起来的。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军习惯于单一兵种作战，靠“小米加步枪”打仗，“铁脚板赛过汽车轮子”，“大炮不能上刺刀，解决战斗靠步兵”的传统看法，根深蒂固，直到60年代中期，“将来打仗主要靠步兵”的思想，仍占据上风。未来战争，在一定意义上说是钢铁与技术的较量，将一改旧战场人海战术的作战样式，过去战争年代，驳壳枪一挥“冲啊！”显然是不行的。集火力、机动力、防护力于一身的坦克，仍将是最好的进攻性武器，机械化、装甲化和高度合成已成为当代陆军发展的必然趋势。进入70年代，由于反坦克武器的发展，尤其是战斗直升机的出现，引起人们对坦克前途的忧虑，曾出现直升机取代坦克的观点。

其实，坦克与反坦克武器，这两种不同的武器系统，各自有不同的战斗性能，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是相互促进，竞相发展，不可能互相取代。战斗直升机取代不了坦克和其它装甲车辆的作用，更改变不了陆军机械化、装甲化的发展方向，有直升机的配合，更能发挥装甲兵的快速突击作用，装甲兵的地位作用更为突出。

“空军制胜”、“坦克制胜”已经过时，“直升机制胜”更不可能。未来战场是空地一体，高度合成的现代战争，要求陆军各武器系统与主战兵种同步向机械化、装甲化发展，密切协同配合，发挥整体威力，靠合力制胜。

军事学术的活跃和繁荣，促进了部队战备训练，全军装甲兵部队进一步加强了合同战术训练。1981年9月举行的华北大演习，参加演习的3个坦克师完成了4个课题，探讨了战争初期防御作战中装甲兵的运用，提高了现代条件下诸军、兵种合同作战的水平。此后，合同战术训练之风吹遍全军。在中央军委领导下，装甲兵广大指战员通过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卧薪尝胆，励精图治，终于从“文革”的泥沼中走了出来，踏上健康发展的轨道。从粉碎“四人帮”到80年代初的这几年时间，成为装甲兵历史发展的重要时期。

1982年9月，按照中央军委“关于将军委炮兵、装甲兵、工程兵机关改为总参谋部业务部的命令”，撤销了装甲兵领导机关，我也卸去了装甲兵政委职务。

在装甲兵工作期间，我以党员代表和人民代表的身份，先后参加了党的十一大、十二大和五届人大、六届人大，并担任六届人大常委。

此后，我又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党的十三大、十四大。1988年下半年，经中央军委批准我离职休养，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